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周愚文 博士

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教育
(1895-1945)

研究生：江嬾乙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謝誌

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一件奇蹟，而是眾人努力與堅持的結果。不回顧什麼都沒有，一回顧才警覺：要了解今日的自己，必得「面向歷史而生」。我很幸運，在進行嚴肅的博士論文的研究時，能同時進行一場感性的回顧之旅，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從小在家族、學校課堂上所感受到客家人重視教育的點點滴滴。終於澄清長久以來的疑惑，即使被認為重男輕女，但客家人對女子的教育其實也是相當重視的。

總之，感謝這些客家先輩們，感謝愚文恩師，感謝我親愛的另一半—丁太，感謝生命中這些一路伴我成長的人，也感謝進行學業與研究的路上，碰到的那些和善的笑容與美麗的風景。能研究故鄉的歷史，又能成就自己，真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日治官民調查的各項資料、校史紀錄、耆老訪談，與訪談所得的文件、照片，輔以今人的論著等資料，以探討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客家子弟教育推動的情形，包括對新式教育的因應情況、對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及受教情況與社會地位的關係等三大項。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勇於接受且支持新式的學校教育

早期桃竹苗地區各地學校的設置有限，客家人也對新式教育包持觀望的態度，但是當這些受過新式教育者，有機會成為社會上的老師、醫生、庄長、企業家等精英階層後，學校教育就變成地方士紳競相支持的對象。以關西地區而言，雖位屬偏僻，但在咸菜礮公學校設置後，前幾屆的畢業生即培養出當地最早的西醫、庄長與農園實業家，而且女子教育也開始受到重視。

二、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努力進行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漢學的延續與詩社的勃興

首先，漢學的延續主要在非立案的書房，表現出傳統語言文化的傳承，但立案書房設置後採納新式教育學科與師資又是一種轉化。其次，桃竹苗地區詩社數量在日治時期的不降反升，反映出傳統文教成就的傳承；但是詩社參與者受教方式與身分的改變，及創作內容的因應時事，顯然又是一種轉化。

三、接受學校教育有助於桃竹苗地區客家精英階級的養成及家族地位的維持

傳統教育被系統化的學校教育取代後，能成功掌握新式教育機會的人，就能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於是留日也好，留臺就學也罷，總有某幾個關鍵人物、某幾個家族，成為迎向新式教育，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帶領者。例如：日治時期石光公學校就有呂、朱、陳、范四大家族表現優異，影響當地對教育的重視。

總之，客家人重視教育的傳統，由清代延續至日治，教育方式由儒學轉往學校教育發展，透過個人、家族與鄉親共同努力，終於培養出許多社會上的精英階層，使得客家人在不同的政權交替後，一樣能享受成功的教育果實。

關鍵詞：日治時期、客家、客家教育、臺灣教育、桃竹苗地區

**A Study on Hakka Education at Taoyuan, Shinchu and Miauli Area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Abstract

Shyan-Yii Chia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n education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The sources such as the information investigated b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school history records, and oral records interviewing senior citizens were used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Hakka children's education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1. Hakka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accepted new education and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chools when they cultivated good generation. Educational outcomes were reflected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elite class and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for girls. At Kansai County, the first doctor and mayor and modern farmer were graduated from the Shyan Tsay Perng common school. Once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became new social elites, the advantages of schooling were presented significantly.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chooling.
2.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mainly in the continu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etry societies. First, the continuity of Confucianism mainly was carried out by the studio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as succeeded, but new subjects were taught in those studios which showed a kind of modern pedagogy transformation. Secondly, the poetry societie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which reflected the achieve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distinct change was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content of poets responding to current events.
3. Schooling was helpful to th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certain key figures and their family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such as the four families of the Shi Guang common school at Kansai.

In short, th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of the Hakka tradition was continued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lthoug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re changed from private studios to public common schools, due to the effort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the folks together, new social elites were educated, which made the Hakka in the Tao, Zhu and Miao areas enjoy successful educational fruits after regime shifted.

Key words: Japanese colony ;Hakka; Hakkan education; Taiwan education; Tao Zhu Miao areas

目次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iv
表次	vi
圖次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方法與限制、對象與步驟	3
第三節 研究史料	8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9
第五節 研究限制	12
第二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	13
第一節 政治與社會	13
第二節 教育政策	27
第三節 桃竹苗客家聚落的特徵	37
第三章 學校教育	51
第一節 桃竹苗地區的初等教育機構概述	51
第二節 桃竹苗地區的中等教育機構概述	71
第三節 關西地區初等教育的推廣	81
第四節 關西地區的升學情況	106
第五節 小結	115
第四章 社會教育	119
第一節 概述	119
第二節 家長會與主婦會	123
第三節 青年團	130
第四節 日語推廣	141
第五節 小結	157
第五章 傳統文教	159

第一節	客家族群傳統文教概況	159
第二節	漢學延續	164
第三節	詩社發展	205
第四節	小結	228
第六章	結論與省思	231
第一節	結論	231
第二節	後續研究的省思	233
	參考文獻	239
	附錄	249
附錄一	採訪日誌	249
附錄二	受訪人物照片	265
附錄三	桃竹苗地區的公學校	277
附錄四	日治時期臺灣的中學校	289
附錄五	日治時期臺灣公私立高等女學校	293
附錄六	石光公學校畢業生升學情況整理	297
附錄七	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詩社一覽表	305
附表 7-1	桃園地區的詩社	305
附圖 7-1	以文吟社今址	309
附表 7-2	新竹地區的詩社	310
附圖 7-2	江穎川擔任第一屆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賀匾	313
附圖 7-3	江穎川與擔任第二屆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賀匾	313
附表 7-3	苗栗地區的詩社	314

表次

表 1-1	訪談人物表	4
表 2-1	日治時期新竹州各郡的閩客人口區域分布	41
表 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	43
表 2-3	桃園縣閩客族系人民之區域分布	44
表 2-4	新竹縣各鄉鎮市人民之族系分布	46
表 2-5	苗栗縣各鄉鎮市人民之族系分布	48
表 2-6	日治新竹州時期客家人集中地	50
表 3-1	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	55
表 5-1	日治時期新埔的蒙館	168
表 5-2	日治時期關西的書房	171
表 5-3	《增廣昔時賢文》取材來源	202

圖次

圖 2-1	新竹州郡圖	39
圖 2-2	桃園地區大正 9 年郡庄圖	45
圖 2-3	桃園縣閩客分布圖	45
圖 2-4	新竹地區大正 9 年郡庄圖	47
圖 2-5	新竹縣閩客分布圖	48
圖 2-6	苗栗縣閩客分布圖	49
圖 3-2-1	桃農第二屆畢業照	77
圖 3-2-2	桃園農業學校校門、校舍、走廊	77
圖 3-2-3	桃農豐富詳實的農業實習課	77
圖 3-2-4	相撲、劍道、運動會	77
圖 3-2-5	桃園農校學生打靶及行軍等軍事訓練	78
圖 3-2-6	桃農第二屆學生畢旅：阿里山神木、小火車及臺南社神社	78
圖 3-2-7	國語學校的學生	78
圖 3-2-8	劉熙春國語學校漢文作文簿封頁	79
圖 3-2-9	劉熙春國語學校漢文作文簿舉例	79
圖 3-3-1	關西地區設校過程	82
圖 3-3-2	黃南琚(字燭環)所撰聯句及〈石光公學校之起源〉一文	88
圖 3-3-3	石崗仔公學校時期獎狀	90
圖 3-3-4	江兆和第六學年全勤獎狀	90
圖 3-3-5	石光公學校家庭通信簿	91

圖 3-3-6 昭和 17 年(1942)石光國民學校師長	95
圖 3-3-7 范鼎香老師在坪林國民學校上課	98
圖 3-3-8 石光的畢業生返校留念	99
圖 3-3-9 剛就讀臺北高等學校尋科的呂耀樞與父親呂阿全	100
圖 3-3-10 昭和 17 年坪林國民學校開校紀念	104
圖 3-3-11 昭和 17 年坪林首屆畢業生師長	104
圖 3-4-1 新竹家政女學校同學	108
圖 3-4-2 呂耀樞於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時期	110
圖 3-4-3 呂耀樞於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三年級	110
圖 4-1 羅士鑑的石光青年團手帳	134
圖 4-2 范士敬勤行報國青年隊修業證書	136
圖 4-3 江兆和畢業證書與畢業紀念冊	137
圖 4-4 江兆和勤行報國青年隊手冊	138
圖 4-5 江兆和勤行報國青年隊修業證書	138
圖 4-6 江兆和勤行報國青年隊指導員助手結業證書	139
圖 4-7 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一回結訓照	140
圖 4-8 特別鍊成所隊員名簿	140
圖 4-9 國語講習所結業證書	155
圖 5-2-1 范士敬公學校畢業證書	182
圖 5-2-2 英才書院女學生	186
圖 5-2-3 陳德秀向陽書院束脩帳	188
圖 5-2-4 陳德秀詩習作	189
圖 5-2-5 塾師劉善元及家人	189
圖 5-2-6 劉仕英的〈誨人不倦〉	190
圖 5-2-7 劉仕英的〈富與貴〉	190
圖 5-2-8 劉仕英小楷詩文	191
圖 5-2-9 劉善元家族照	191
圖 5-2-10 范士敬使用的《童子尺牘》舉例	193
圖 5-2-11 徐慶松使用的童蒙書	199
圖 5-2-12 范士敬所用 4 本童蒙書	200
圖 5-2-13 3 本尺牘類童蒙書	200
圖 5-3-1 栗社詩人合影	22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研究動機

臺灣近年關於本土的研究相當興盛，在族群的議題上，也受到廣泛的討論，相映於歷史研究的傳統也由以往由現代主義執掌的「大敘述」、「大寫歷史」

(History) 的方向，演變成關注後現代主義提及「他者」(the Other) 的歷史。¹後結構史學的分析方式主要受到傅柯 (M. Foucault) 的影響，挑戰許多過去歷史學的預設，改強調歷史書寫上誰擁有權力和誰發聲 (voice) 之間的問題。由於傅柯較重視受權力團體壓抑為「他者」的人視何者為知識，及他們對自我的了解。²於是以往被忽視的族群史、區域史、弱勢群體史等都受到相當的重視。筆者只是在研究的對象和對歷史解釋的角度上採取更多元的角度，在時空範圍的限縮下，再以族群來區隔。但本研究認為所謂的歷史研究，應如胡適所說的「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借用所蒐集到的史料(文本)試著以作者的觀點(史識)盡力解釋過去發生過的歷史(史實)。雖然同意美國後現代史學家懷特(Hayden White) 等主張的「所謂歷史的客觀性，其實是一種迷信」，³但是並不同意後現代主義取消對真實的追求、對一、二手史料界線的混用，及不尊重古人或當事人等認為歷史只是一種解釋而已等觀點。⁴本研究強調研究對象從臺灣的漢人，且限於臺灣的客家人，試著打破全部臺灣人教育史面貌，都可以一元敘述進行的主張。就如筆者在撰寫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之研究 (1684~1895)》⁵時，因為選擇範圍限於客家族群的研究議題，竟引起很多人的好奇與質疑。⁶可是再經過多年的醞釀與探索之後，發現一個被很多人想當然爾但內涵卻又不盡相同的教育史課題，就此開啟了繼續探討臺灣客家教育史的興趣與信心。

延續筆者在碩士論文的關懷，如：客家史在正史中受到的漠視、客家重教育的文化傳統和個人為客家子弟的出身背景等，都使筆者對客家教育的研究有一分獨特的感情與執著，所以筆者最主要的研究動機，就是希望在已完成清代臺灣客家研究基礎上，對之後臺灣客家族群的教育情況作一個系統性、完整概括的探討。

當在進行前一課題訪問耆老時，他們不只提供日治時期文獻以外的非正規教育經驗，如家族中的江兆和伯父、關西陶社的徐慶松社長、苗栗的許昌琦老先生、

¹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2000年)，頁13-14。

² D. Armstrong, 'Historical voice: philosophical ideal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voice'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2, no.2, pp. 206-7, 2003。

³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頁114。

⁴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頁124。

⁵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 (168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⁶ 最大的質疑就是客家人受的教育和閩南人受的教育並無不同？筆者的回應是：也許當權的統治者對閩、客族群並未採行不同的教育制度，但是客家族群又是如何因應這樣的教育措施？是否會因為客家的獨特文化氛圍，產生相對應事實與成果？

龍潭太極拳社的廖德雙老先生等，他們除了受過日治時期的學校教育之外，多曾提及走讀式或家傳口授式的傳統「漢書」教育。而這些耆老們所親身經歷過的教育形式，無疑是珍貴的口述史料。但是耆老快速凋零，使得日治時期客家教育的研究變得更急迫，此是動機之二。

貳、研究回顧

透過研究過清代臺灣客家教育史，發現關於客家族群⁷的研究，已如雨後春筍般興盛，國內有大學陸續成立客家研究相關系所，進行客家研究，甚至有形成「客家學」之勢。⁸整體而言，臺灣目前關於客家研究的專書、論文及期刊等相當多，內容也十分豐富，筆者在 2003 年進行全國的博碩士論文資料整理後，發現了數百篇關於客家的研究論文，可概分為客家開拓史、客家文學、客家採茶戲、客家山歌、客家建築、客家民俗、客家運動等各類。⁹之後數量仍在持續增加中，而後續與客家相關的研究也大致不脫離前述範疇。但是其中關於客家教育的內容仍相當稀少，有的文獻大多是 1990 年代教改中小學開始推動鄉土教學後，開始出現有關客語教學或藝術與人文的音樂、戲曲教學等的相關研究。若將研究內容限縮至客家教育史，則關於臺灣客家教育史的研究，除了幾篇期刊論文，¹⁰仍相當少。因撰寫碩士論文時受限於時間的斷限和資料蒐集的豐富性，只研究清代的狀況，但在進行耆老訪談和蒐集資料時，發現到臺灣的客家教育史史料仍多被忽略，因此仍有許多主題值得再深入探究，於是本研究將研究時間範圍延伸至日治時期。

然而有關日治時期以客家人為主要的教育相關研究，目前尚未得見。一般在論文主題上，多集中在有文學成就的個人或團體，如：吳濁流、賴和、龍瑛宗等的文學成就或認同意識等，主要的論文有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¹¹、簡志龍《賴和漢詩中的社會現象分析與研究》¹²、吳衿鳳《龍瑛宗小說中的知識分子

⁷ 「客家」一詞究竟出現於何時？是否屬於族群？後詳。有研究者認為「客家」只是漢族民系的一支，不應稱為「客家族群」，見湯錦台，《千年客家》（臺北市：如果、大雁出版社，2010年），頁 286。但筆者採用張致遠〈苗栗縣各族群語言的變遷初探〉的解釋：「族群」(ethnic groups)，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血緣、宗教、祖先等特徵，而自己認為或被其他人認為構成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上述其中任何一項特徵或其組合都可用來當作區分族群的標記。依照以上的定義，本研究認為採用「客家族群」來稱呼，仍屬合理。網址：<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4.htm>，查詢時間：2012 年 8 月 20 日。

⁸ 臺灣北部的客家人主要集中於桃、竹、苗，因此相有相關客家研究的系所主要集中於的桃園的中央大學的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新竹的清大、交大等；臺灣南部有客家人聚居的六堆，相關的客家系所有：高雄師範大學的客家文化研究所及屏教育客家文化學院等。

⁹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附錄一客家碩博士論文，依性質整理成族群、空間與聚落、語言、文學、戲曲歌謠、建築、運動、信仰與婦女等類別。

¹⁰ 參見陳聰明：〈清代臺灣地區客家教略述〉，《史聯雜誌》，18 期，1991 年，頁 156-170；莊吉發，〈從現藏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文教措施〉，《臺灣文獻》，51 卷 4 期，2000 年，頁 15-31。

¹¹ 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¹² 簡志龍：《賴和漢詩中的社會現象分析與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與社會》¹³、王慧芬《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¹⁴等；此外，對於日治時期詩社的研究也頗多，而詩社的發展與社會教化有關，也是本論文關心的主題之一，其中有關苗栗縣的栗社就有兩篇論文，如：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¹⁵和曾鈞煜的《栗社研究》¹⁶等足資參考。另外，婦女史方面，游鑑明的《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¹⁷及《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¹⁸，和張典婉的《臺灣客家女性》等¹⁹，相關著作仍多，無法一一例舉。但是以日治時期客家教育史為研究主題的論文則尚未出現，因此也顯示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教育值得研究。

最後，本論文題目是「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教育（1895-1945）」。因為發現日治時代距今尚近，各機關、私人保存的資料、記憶尚多。而在家鄉新竹縣關西鎮的走訪下，發現如深入研究，單以關西鎮一地，就有相當豐富的內容可進行研究。尤其在學校教育部分，因為日治時期在桃竹苗地區新設的學校雖不多，但要一一整理也頗豐富，故以關西地區設置的關西、石光、坪林等三所初等學校為例，其設置時間剛好分布在日治早期、中期、晚期，因此可以關西地區的設校實況來瞭解日治時期教育的推廣。

第二節、研究目的、方法、對象與步驟

依照以上的研究緣起，茲說明研究目的、方法、對象與步驟如下：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

- 一、瞭解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對新式教育的因應情況。
- 二、瞭解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對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
- 三、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客家人的受教情況與社會地位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歷史研究法的文獻分析與訪談法為主。文獻分析方面，儘量使用直接

¹³ 吳衿鳳：《龍瑛宗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¹⁴ 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¹⁵ 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1年。

¹⁶ 曾鈞煜：《栗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¹⁷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7年。並於1988年出版成書。

¹⁸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

¹⁹ 張典婉：《台灣客家女性》，原為其碩士論文，於2004年出版。（臺北市：玉山社）

史料，並做到史料的內外部考證，再與訪談法取得的資料相對應，以求獲得真實的史實。

訪談法方面，由於主題為日治時期臺灣的客家教育，通常筆者只要以客語開口或交談，長輩們皆樂於受訪，客語成為開啟訪談的鑰匙。筆者使用的是海陸腔客語，但關西地區的長輩們通常嫻熟海陸腔和四縣腔，可以視對話者使用的腔調隨時轉換。若是長輩夫妻都曾受日本教育，彼此間則多以日語溝通，若其中一人日語不流利則多以客語溝通。受過日本教育者，光復後多任教職或公職，所以國語也相當流利，因此訪談皆能順利進行。整體而言，長輩們仍以客語受訪為主。

參、訪談對象

受訪對象的尋找，是採滾雪球的方式。筆者先返鄉參與父母在家鄉的民謠班、文化發展協會等活動，由父母先散播筆者的研究論文主題消息，並詢問可能的受訪對象。另參加坪林 70 週年校慶，直接見到可能受訪的日治時期畢業生；並接觸正在籌備石光國小 100 週年校慶的潘校長，應諾協助校慶特刊文稿等，潘校長並提供可訪談的耆耆。因此，透過筆者畢業的坪林國小母校，曾教導筆者姊弟並已退休的學校老師們、在地的長輩、里鄰長們、或受訪者的進一步介紹等，得到約 30 位 80 歲以上，曾於日治時期就學或任職教師的長輩們，為本論文主要的受訪對象。受訪對象名單如表 1-1，共計 43 人。其他訪問摘要及訪談合影，見附錄一採訪日誌，及附錄二受訪人物照片。

表 1-1：訪談人物表

	姓名	受訪年紀	時間	說明
1	劉國耀	50 多歲	2002 年 3 月 29 日	1、曾祖父開設家塾，大伯公劉仕英為書房助教。 2、祖父劉熙春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庄役所會計、公學校訓導。 3、借得族譜、戶籍謄本、家族照片、書房詩稿，及國語學校作文影本等。
2	許昌琦	72 歲	2002 年 4 月 28 日	1、頭屋公學校畢業。 2、考上高等科。 3、光復後開始念童蒙書，以教職退休。
3	徐慶松	82 歲	2002 年 4 月 29 日	1、關西公學校畢業。 2、曾在太和宮處與香公伯黃雲海讀漢書。 3、第七任關西陶社社長。
4	陳運棟	70 歲	2002 年 9 月 28 日	1、國民學校畢業即光復。 2、苗栗向陽書院後人。 3、私立大成中學校長退休，史學研究者。
5	廖德雙	73 歲	2002 年 10 月 20 日	1、龍潭公學校畢業，念 2 年半中學即光復。 2、念公學校放學或晚上，2、3 年由其父親或祖母，教授童蒙書，念過《三字經》、《昔時賢文》、《四字雜言》、《七字雜言》等。

表 1-1：訪談人物表(續)

6	徐金統	83 歲	1、2012 年 4 月 25 日 2、2012 年 8 月 9 日	1、公學校一~三年級寒暑假曾念私塾。 2、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 3、曾受教於范鼎香、呂阿全老師。 4、光復後任職坪林國小教師。
7	江金棟	61 歲	2012 年 04 月 25 日	1、父江兆和為石光第 20 屆(1938)畢業生。 2、借得江兆和公學校家庭聯絡簿、畢業證書、紀念冊、勤行報國青年隊名冊、證書、手冊等。
8	范光建	83 歲	1、2012 年 4 月 27 日 2、2012 年 4 月 27 日 3、2012 年 5 月 7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 2、考上花蓮農林學校。 3、光復後任教石光國中至退休。
9	邱秀惠	約 50 歲	2012 年 4 月 30 日	1、借得石光國小存，日治創校開始，手書稿《學校沿革誌》影本。 2、借得 2 份畢業紀念冊掃描檔。
10	江穎川	75 歲	1、2012 年 5 月 1 日 2、2012 年 8 月 14 日	1、現任第一屆「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前身即關西陶社。 2、借得日治時期童蒙書 3 本。
11	范士敬	90 歲	1、2012 年 5 月 2 日 2、2012 年 8 月 14 日	1、石光第 17 屆(1935)畢業生。 2、曾任教坪林國小 30 多年後退休。 3、為筆者小學一年級上學期的導師。 4、借得昭和 11 年(1936)所讀《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繪圖百家姓》、《童子尺牘》、《指南尺牘》、《白話註解初學指南尺牘》等，共 4 本。
12	劉建榜	83 歲	2012 年 5 月 2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 2、考上花蓮農林學校。 3、光復後曾任石光、坪林、南和等校教師後退休。
13	范光銘	83 歲	2012 年 5 月 7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 2、考上新竹中學校。 3、父范朝燈，在 10 兄弟中排行第 5。
14	江葉梅妹	86 歲	2012 年 5 月 7 日	1、筆者三叔婆，本為芎林陳家人，3 歲大即被當家 80 多歲的祖母賣給葉家當童養媳，另買入一男嬰為其弟。其後續弟妹皆有讀書，只有她沒讀書。 2、但與葉家人無緣，海外戰死，22 歲嫁入江家。
15	邱福興	82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3 屆(1945)畢業生。 2、夫人賴香妹，同為坪林國民學校同學。 3、曾受教於范鼎香、范何英妹、涂元全、陳開華等老師。
16	賴香妹	82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3 屆(1945)畢業生。 2、拍得石光公學校時期全勤賞狀、坪林國民學校畢業證書。
17	楊美蓮	82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1、坪林國民學校第 3 屆(1945)畢業生。 2、光復後曾任坪林國小教師，為石光第 5 屆(1923)畢業生楊習日長女。 3、電話訪問。
18	陳送妹	93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1、石光第 15 屆(1933)畢業生。 2、逢茂農園經營者陳傑昌長女。 3、日治末期即曾任教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校。 4、電話訪問。
19	劉建燈	88 歲	2012 年 5 月 9 日	1、石光公學校第 20 屆(1938)畢業生。 2、曾任職坪林國小 40 多年(1942-1991)，中間亦曾短期調至照門、關西等學校。

表 1-1：訪談人物表(續)

20	高玉嬌	81 歲	2012 年 5 月 9 日	1、新埔國民學校畢業 2、考上高等科，念一學期即光復。
21	邱金球	88 歲	1、2012 年 5 月 10 日 2、2012 年 5 月 15 日(與石光潘校長同訪) 3、2012 年 8 月 10 日	1、石光公學校第 20 屆(1938)畢業生。 2、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念新竹師範臨時教員講習所。後考上臺南師範學校屏東預科。 3、日治末期即在石光任教，光復後歷任坪林、山崎、石光等校教職，最後以太平國小校長退休。
22	劉范鏗妹	91 歲	2012 年 5 月 11 日	曾於日治時期(昭和 10 年左右)坪林國語講習所受教於涂元全，涂為石光第 3 屆(1921)畢業生。
23	曾秋梅	82 歲	2012 年 5 月 11 日	1、為童養媳，警察通知至講習所上課 2、公公劉永木為甲長，家中經營茶園，午休時請上過公學校的婦人教女工日語。
24	陳双錦	88 歲	2012 年 8 月 15 日	1、石光第 20 屆(1938)畢業生 2、兄陳双祿為石光第 4 屆(1922)畢業生。 3、陳双祿考上新竹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後留日念醫學大學。 4、陳双錦公學校畢業，即留日讀關西中學校。
25	余新源	89 歲	1、2012 年 8 月 16 日 2、2012 年 8 月 20 日	1、關西公學校第 33 屆(1937)畢業生。 2、考上桃園農校，5 年畢業後，至新竹州廳上班。 3、借得日治第 2 屆桃園農校相簿翻拍。 4、妻范日妹為關西公學校第 35 屆(1939)畢業，考上關西實業補習學校，2 年畢業後，在太和宮教幼稚園。 5、光復後曾任關西鎮公所祕書退休。
26	楊澄清	87 歲	2012 年 8 月 17 日	1、父母曾受私塾教育。母曾受教於邱運金。 2、關西公學校第 35 屆(1939)畢業生。 3、關西農業補習學校 2 年 4、新竹師範簡易師範 1 年。 5、派錦山國民學校任教 2 年，1944 年轉回關西任教。 6、提及錦山設有國語講習所的情況 7、光復後，受呂杰全賞識，派為東安國小教導主任。
27	邱永貞	83 歲	2012 年 8 月 17 日	1、關西國民學校 38 屆(1942)畢業生。 2、至臺北依父，念馬偕辦的學校：宮前女中。 3、姑姑黃月妹關西公學校畢業後，念臺北第三高女，檢定後有訓導資格，任教關西公學校，並至關西實業補習學校兼課。
28	關西長老教會	1922 ~	2012 年 8 月 19 日	1、蔡長老，家族自日治時期曾祖父開始信教至今，一家都是教徒。 2、用客語宣教。
29	廖金德	79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1、父廖梁水，昭和年間，至龍潭因躲雨而信教。 2、念銅鑼國民學校 5 年即光復，最記得日人對每一戶發天照皇太神。 3、主日學由石光人嚴寬准傳教。
30	蘇添明	78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1、曾祖父、祖父是抗日分子，祖父胡傑榮避去淡水念牛津學堂，開始信教，家族也全加入。 2、關西國民學校念 4 年即光復。 3、嚴寬准牧師娘在主日學時，教羅馬拼音，用客語念詩歌。
31	鄒子英	85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1、念錦山分校時老師全為客家人，第 6 年至關西念書後，才被日籍老師教。 2、嚴寬准牧師娘學歷較高，畢業自淡水高等女學校，會教羅馬拼音。

表 1-1：訪談人物表(續)

32	范碧蓮	82 歲	2012 年 8 月 24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坪林第 1 屆(1943)畢業生。 2、畢業後考上臺北第三高女，24 屆畢業；其母何英妹為臺北第三高女第 4 屆畢業。 3、石光第 3 屆(1921)畢業生范鼎香的長女。 4、嫁給呂阿全的長子呂耀樞為妻。
33	呂耀樞	83 歲	2012 年 8 月 24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23 屆(1941)畢業生。 2、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直升高等科、光復後升臺大醫學院。 3、石光第 1 屆(1919)畢業生呂阿全的長子。 4、與夫人范碧蓮一同受訪，借得呂阿全贈孫女的《岳山小集》詩文冊影本。
34	徐玉竹	89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20 屆(1938)畢業。 2、高等科畢業，滿 20 歲後考上警察學校，受訓 6 個月後任巡察。 3、光復後，受 6 個月警察訓留用。
35	張秀嬌	88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20 屆(1938)畢業。 2、新埔高等科 2 年畢業後。 3、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 4、畢業後歷任教職，至退休。 5、石光第一屆(1919)張金輝長女
36	陳嫦娥	87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22 屆(1940)畢業。 2、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 3、昭和 19 年(1944)返回石光以「助教」資格任教。 4、石崗仔公學校訓導陳阿郎的姪女，陳阿郎為 1917 年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
37	呂嬉美	77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光復後第 4 屆。 2、石光第二屆(1920)呂義星長女。
38	呂榮初	96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13 屆(1931)畢業。 2、考上新竹中學校，4 年後，升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直升臺大醫科。成為開業醫師。 3、呂阿全二哥岳朗長子。
39	呂金福	96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13 屆(1931)畢業生。 2、與呂榮初同家族，但不同房，以務農為主。
40	朱其章	98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11 屆(1929)畢業生 2、曾被石光第一屆(1919)畢業生黃本源教過
41	林鄧平妹	93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18 屆(1936)畢業生。 2、曾在詹金英主持書房處，讀過 7 日漢書。
42	呂劉益妹	92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第 19 屆(1937)畢業生。 2、劉鵬元(石光 11 屆)為其三叔、劉朝棟(石光 19 屆同學)為其滿叔，皆當老師。
43	黃浩文	79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光復後畢業生，1964 年畢業於臺師大。 2、現任桃園以文吟社副社長。

說明：依訪問時間先後為序。

確定受訪對象後，以事先取得的受訪者電話，進行電話約定到訪日期，扼要告知訪談目的。訪問當天，若有需要會以電話再確認一次。並且攜帶禮盒，準時到達受訪者所約定的地點，由於長輩多已年長，大多約在受訪者家。到達訪談地點後，在訪談進行前，先閒聊並自筆者介紹，以取得長輩的信任；再展示筆者預

定撰寫的論文大綱，讓受訪者了解筆者訪談的目的。但在訪談進行時主要採用無結構訪談法，以避免打斷長輩們的思緒，通常會視受訪者所回答的情況，適時提問，以儘量不打斷長輩的思緒為主。有些訪談內容可能跨越光復之後的身為校長、老師的生活，及學校、教育單位等的情況。

訪談完後，若有疑問會以電話詢問，若確認為值得再次訪談的報導人，則會再次約訪。若借有童蒙書、照片、詩集等資料，於翻拍、掃描或影印後，儘早歸還，若無法如期歸還，則以電話聯絡使用情況，保證完整歸還。例如自徐金統老師處借得的老照片，於掃描後不但附上電子檔，並將照片整理成冊，以方便徐老師往後閱覽，使其從擔憂老照片外借會遺失，到歸還時的欣喜與安慰。

總之，本論文在文獻分析及訪談法得到資料後，並輔以取得的圖片、照片、史蹟的資料蒐集等，補足內容，使舉例更生動詳實。

肆、研究步驟

本研究將依以下步驟進行：

- 一、蒐集閱讀、訪談等相關研究資料，以確定研究問題。
- 二、撰寫初步研究計畫，確定研究架構。
- 三、蒐集相關史料、文件、照片、進行訪談等，以修正撰寫文獻。
- 四、整理相關訪談摘要，進行謄逐字稿，摘要重點，撰寫論文。
- 五、針對已蒐集的資料進行閱讀、分析、考證、比對。
- 六、於文獻分析有一定成果後，再次進行訪談查核。
- 七、完成初稿的撰寫、修正，到最後結論、完稿。

第三節 研究史料

本研究主要參考的資料有三大類，分別為文獻類、口述史料、圖片文件類；另參考今人論著等。

首先，屬於文獻類，可以了解日治時期客家人的分佈及事功，又可分成二類，第一類為官方史料，包含全臺性的、地區性的二種。全臺性的有日治時期系統性的檔案資料或調查，如：日本時期保留下來的官方檔案，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編採《學事年報》、《學事要覽》、《臺灣列紳傳》、《新竹廳志(一)》、《新竹廳志(二)》、《桃園廳志》、《桃園郡要覽》，新竹州出版的 8 冊《新竹州統計書》、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成的 5 本《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當時發行的《新竹廳報》、《桃園廳報》、《苗栗廳報》、《新竹州報》等，或後人整理的《日治時期教育

資料彙編》等；地區性的則是地方鄉鎮志、學校史料等，如《新埔鎮誌》、《關西鎮志》、《芎林鄉誌》、《頭份鎮志》等，另外，學校方面則有石光國小存的創校以降手書之《學校沿革誌》、各校編的週年慶校刊等。

第二類則是日治時期私人編採的臺灣史料，如：臺灣教育會編的《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風俗志》、《人文薈萃》、《臺灣人士鑑》、《臺灣人物誌》、《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等。

其次，運用訪談法，進行口述史料的蒐集與分析，在進行碩士論文時即已訪談的有許昌琦、徐慶松、廖德雙、陳運棟等先輩，其受初等教育的經歷、詩社的詩集冊、漢學書房教育的口述紀錄等。本研究進行時，則偏重於訪問日治時期石光公學校、坪林國民學校等校受教育的客家長輩們，而這些受教者，很多在戰後成為臺灣主要的初等學校教師。

再者，則希望輔以圖片、文件、實物、史蹟等以資輔助，如：漢學書房教材、名冊、學校教育的作文等的影本，及關西地區與教育設施相關的老照片等。

最後參考今人的論著，包括今人編纂的地方志、教育、客家研究相關著作、或單篇論文等，以達成研究目的。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壹、範圍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臺灣客家子弟的教育為主要範圍，時間是從臺灣割讓給日本起（1895），至民國 34 年（1945）臺灣光復為止，前後共計 51 年。但為了敘述的完整性，有些傳承背景會往前述及清朝統治時期，而之後的發展演變上也會論及戰後，但主要的研究時間仍以日治時期為主。

另外，在空間方面，主要是以客家族群分布的主要聚落之一桃竹苗地區為主。以 1943 年末的戶口統計，當時全臺共有廣東籍 913,099 人，分布在全臺 5 州 3 廳中，其中新竹州即佔了 520,307 人，是全臺 8 州廳中，唯一超過福建籍人口的一州，當時新竹州的福建籍有 318,529 人，²⁰故本論文撰擇桃竹苗地區的教育發展情形，以代表客家族群的教育發展應屬合理。其範圍包括現今的桃、竹、苗四縣市，其中新竹市屬市區，在日治時期多為閩人集中之地，也成為此區重要的中學設置地，其區劃多歸於新竹郡或州之下，故文中多略而不論。實際訪談結果發現，由於日治時期交通已大有進步，因此即使是出生在新竹偏鄉如關西庄的小學畢業生，除了有桃竹苗地區的中學可選擇，也可能往北至臺北、基隆念小學、中學；或往南至臺中念中學、或至屏東念師範學校；更有一校 7 人往東至花蓮念農

²⁰ 臺灣總督府：《臺灣戶口統計(昭和 18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 年)，頁 40、42。

林學校。因此，在研究範疇上雖以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客家庄的客家人為主，但他們為了升學卻會跨越桃、竹、苗的區域限制而擴及全臺各地，甚至留學至日本或中國等地。但原則上，本論文仍以日治時期居住於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集中於此區的客家庄居民為主要的研究範圍。

由本研究雖以桃竹苗地區為範圍，分析時會先以宏觀角度看全臺狀況，再探討本區情形。之後，會再以微觀角度，以關西地區為例做個案分析。

貳、名詞釋義

一、客家人

首先，何謂客家人？一般以為「客家先人是南遷中原士民的後代」，湯錦台考證，最早的說法是清仁宗嘉慶年間廣東惠州豐湖書院山長徐旭曾，後經晚清的丘逢甲、黃遵憲在 1905 年成立的「客家研究會」，亦提倡此客家正統漢人的說法，直到羅香林出版了《客家學導論》、《客家源流考》等書，乃將此觀念發揚。²¹他所撰《千年客家》利用史書或方志，將自古而來被視為客家人發源地的閩粵贛三省交會地區的族群發展，做了追溯、整理，發現在唐宋元明等朝代中國的地方文獻中並未很早出現以「客家」為名的稱法，但山區漢族因戰亂等多次移入、移出，又與當地畚族產生混血，於是產生的新民系。²²湯氏依現有文獻整理發現，「客家人」名稱較早出現又可信的紀錄是到清代，如清康熙年間編的《永安縣誌》始出現「客家」連用的稱呼，²³及 1840、50 年代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東南沿岸用 *hakahs*、*Hakkas* 等詞，用以稱呼客家人的紀錄與調查。²⁴但作者認為以上的說法只能是客家人之所以成為客家人所認同的「中原意識」，但並非事實，其中有些移入的流民，依後續研究顯然來自非中原的江漢之民。因此他認為「客家人其實也是客家話、中原概念和客家意識等文化與語言上的多種特徵共同形成的綜合體」。²⁵總之，在清代之後「客家」族群已在中國東南沿岸被認知與稱呼，而此時正是閩粵等地區人民開始大量向海外移出的時候，臺灣的客家人也於此時正式大量來臺。

關於客家人的移民臺灣，無論清代或日治時期，皆未在官方紀錄上使用「客家」一詞。清代方志多見「客莊」、「粵族」之名，來指稱當時移民的客家人，但來臺客家人未必只有廣東籍，閩籍也有客家人，因此造成在後續研究客家人統計上的困難。²⁶但是如晚清代來臺的外國傳教士馬偕，由他巡遊北臺灣的紀錄可知，客家早已是一種很普遍的稱呼，他在《馬偕博士日記》中提到巡視北部各傳教區，如月眉、頭份、龍潭埤、咸菜甕(關西)、新埔等地時提到「客家人」，或

²¹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 24-26。筆者在撰寫《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碩士論文時，也多採羅香林的看法。

²²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 13-108。

²³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 120。

²⁴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 125、127-8。

²⁵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 26。

²⁶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47-55。

「客家庄」。²⁷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官方文獻上，也只以閩廣來分，當時日人做了相當仔細的戶口普查，甚至現今的戶政事務所尚能調到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可以得知原祖籍。日本雖然未對客家人有不同的教育設置或禮遇，只在戶籍謄本「種族」欄上記以「廣」、「福」二字區別來自廣東省和福建省的漢人。²⁸或認為「所謂客家是由廣東遷往移住民之總稱」²⁹、或逕稱「粵族」³⁰。所以毋庸置疑的，遲至清代已有「客家」這一名稱及其對應的民系出現。依湯錦台的研究這個漢族「新民系」的形成時間應該更早，大約在明代中葉。³¹因為一些在閩粵贛地區特殊的信仰或文化，不但被保存且被傳承至臺灣來。

臺灣的客家人主要自清代移民臺灣，移民臺灣後，延續原鄉的信仰、文化與教育特色，總之在族群上具有勤儉、重農、重武、重宗族、重教育、婦女能幹、重風水等特色。³²本研究桃竹苗一帶的客家人主要為乾隆年間來自梅州與惠州，有些梅州客家人則是從南部六堆二次移民而來，使用的語言以四縣腔和海陸腔為主，二者之間雖然語調不同，但因彼此混居，二者之間可以互相溝通與了解。

筆者雖然認為是否為客家人最主要的關鍵在主觀上的認同，但本研究為了較無爭議，是以客觀條件的居住地、語言的使用、文化的脈絡等，為判別的基準。選擇從清朝、日治至今仍為客家人聚居之地的桃竹苗地區為研究的範圍。

二、教育

本研究中指的「教育」，是採廣義的定義，包括正規的學校教育，以及非正規的各種施教形式及教化措施，亦兼及民間的教化、文化傳統、文風和私人教授漢學、設置詩社等，及日治後期全面推動國語運動的社會教育部分。

所謂「客家教育」，係指一群名為「客家」的人，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傳承清朝統治時期的堅苦移民、開墾、文教推展，到日治時期如何繼承傳統，卻又接受新式教育以適應時代與發展。然而無論政治上的統治者怎麼改變，他們都想方設法善用教育這把鑰匙，幫他們的子弟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²⁷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南：人光，1996年），頁81、127、148、149、159、168、172。日記摘譯自1872年到1901年。馬偕於1872年開始於淡水傳教，足跡遍及北臺灣，主要為中部以北，並擴及宜蘭、花蓮等地，一直到1901年因喉癌過世為止。

²⁸ 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與田野研究》（臺北：南天，2008年），頁224-5。另筆者於關西戶政事務所申請的高祖父江阿德為戶主的戶籍謄本，於種族一欄即記為「廣」。

²⁹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南投：省文獻會，1995年），〈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 第十六卷〉，〈一四、鳳山出張所二十八年十二月份之機密報告〉，頁465。

³⁰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 第十六卷〉，〈一四、鳳山出張所二十八年十二月份之機密報告〉，頁468，「抵抗筆者軍者僅廣東移往之粵族而已」。

³¹ 湯錦台：《千年客家》，頁105-6。

³²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55-66。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日語能力不足、訪談得到的學習經驗限於日治後期，及語言轉換的問題三項。

壹、日語能力不足

由於本研究課題前人著墨不多，雖然在日人官方檔案或私人著作中有史料可尋，但在進行研究上，遇到日文史料的蒐集與解讀的問題。筆者雖曾修習日語，但只算入門，尚不能精通，但為了研究臺灣史仍持續自學中，所以只能先從已有的中文文獻資料上，及受訪的客家耆老訪談稿中，以求對相關的主題及時空背景知識有較多的認識。當實地訪談後，再閱讀日文資料，如臺灣教育會編的《臺灣教育沿革誌》，或是石光國小存的《學校沿革誌》等，都能對內容有較好的掌握，並透過請教受日語教育成年的范士敬老師、邱金球校長等，更能把握重要教育史料的意涵。

貳、經驗限於日治後期

這些耆老們雖然曾受過日本教育，但是平常生活上仍使用客語為主。尤其在漢學的書房教育及詩社的活動中，完全以客語教學、溝通或創作。此外，訪談法雖為本論文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受限對象壽命本論文只能訪問到日治後期的受教者，因此其受教經驗只能佐證日治後期。但有些受訪者接受日本教育時，已是接受日本教育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配合《學校沿革誌》、校慶特刊等史料，加上受訪者追述，通常可以溯及受訪者父、祖輩的受教情況或工作情形，故仍可稍補日治早期教育的情況。實際受教經驗則以日治後期為主。

參、語言轉換的問題

在之前的訪談經驗中，多少都曾受到受訪者害怕錄音或是不了解筆者的研究目的，而拒絕筆者進一步的訪談或錄音。但本研究在進行訪談時，除了少數不熟悉的長輩只答應電話訪問外，大部分由於有熟人介紹、又以客語為訪談用語、加上筆者對受訪者或其父、祖資料的熟悉等，大部分皆很樂意受訪。遇到不願受訪者，筆者會用更多的時間說明來說服受訪者，解釋筆者的研究目的為何？以及何謂學術研究？若仍不同意，只得運用可得的書面資料，放棄訪談，以免使受訪者覺得困擾。

此外，除儘量將思考及用語，從國語轉成客語外，還必須將學術研究這個嚴肅的話題，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給不同文化脈絡的受訪者聽懂且能接受。最後，畢竟日治時期遺留至今，仍健朗、耳聰目明、頭腦清楚的受訪者日漸凋零中，因此本論文僅針對筆者能力許可訪談的耆者及其家人，或透過他們留下來的文稿和紀錄等，互相佐證受訪者的說法。但為了達到厚實的描述，本論文的訪談多以客語進行，在行文中為求順暢，則儘量以可得的國字表達，並求不失原意。但在客語語言轉換至中文文字的過程中，難免要加以解釋，以免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第二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

清康熙 22 年（1683）鄭成功的舊部施琅攻臺，擊敗鄭軍，臺灣棄留未定，施琅並提議在臺灣設置郡縣，¹終於在國防與治安的考量下，於康熙 23 年（1684）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²清廷雖然對治臺採取消極的治理態度，以縣治的劃分設置而言，即以人民的移墾在前，清廷的設縣治理在後。直至中法戰爭爆發，法軍攻佔基隆，清廷久攻不下，才發現臺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乃在光緒 11 年（1885）將臺灣獨立設省。³卻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遂有割臺之議，至此清廷總共統治臺灣 212 年。臺灣人民除原住民外，移民大多來自大陸原鄉，且長期在兩岸密集的移墾與往來，加上科舉文教等的推行深入民間，當時臺灣移民大多已認同中國為其祖國。

光緒 21 年（1895），由於中日馬關條約的簽定，確定割讓臺灣、澎湖列島給日本，一直到民國 34 年（1945），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後，臺灣始光復。⁴日本統治近 51 年間，日本遂將臺灣視為其殖民地，以此推行各項政治措施，影響臺灣的整體政治、社會及教育政策發展。在此政治變革之際，身為漢民族中，重視文教事業的客家族群，在既有耕讀傳家的傳統之下，如何因應新政權推行的新式教育，或者保留其舊式教育傳統，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以下分別從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教育政策制定、與桃竹苗客家聚落的特徵等三節，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政治、經濟與社會

臺灣東西 143 公里，南北 385 公里，南北面積 35,760 公里，因天然資源及地理位置的關係，在近世初期重商主義時代，曾捲入各殖民國競相攫取殖民地的漩渦中；到了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再度成為各國爭奪的目標。⁵在十九世紀後半，英、美、德、法等列強都曾接觸到臺灣，或「砲擊」之，或欲取得之，而日本即在此強烈的帝國主義競相攫取殖民地的國際潮流下，取得臺灣及澎湖。⁶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即將臺灣做為殖民地加以統治，並訂立了相關的法令及政策，並主導且影響臺灣的經濟及社會發展。

¹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 年），卷十〈藝文志〉，頁 351。見施琅的〈平臺紀略碑記〉中載：「奏請於朝，為置郡一縣三，……」

² 不著撰者：《清聖祖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131、134。

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大通書局，1987 年），卷六，〈遵議臺灣建省事宜摺〉，頁 297。

⁴ 臺灣省文獻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二十冊），〈卷五教育志教育行政篇〉，頁 28。

⁵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1999 年），頁 1。

⁶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6。

壹、政治

在政治上依序說明統治基礎的法制、行政區劃、掌統治權的總督和臺灣獨特卻影響力極大的警政。

一、法制

在日本佔領臺灣初期，民事裁判是根據地方習慣或條例的，關於刑事，則依軍令治罪。⁷大體有關日本人的事項，則照日本法，以方便日本人的活動，凡與日本人無關的事項，則尊重舊習慣。⁸於明治 29 年(1896)，發布〈法律第六十三號〉，強調臺灣為殖民地，必須行使等殊政策，委任臺灣總督得頒布命令以為法律，使臺灣不受日本母國憲法的保障。⁹此即所謂的「六三法」，雖然規定三年為期，後來一再延長，迄 1906 年另以法律第三十一號（簡稱「三一法」），取代，仍維持委任立法原則，授予總督律令制定權和緊急命令權，只不過規定總督之命令或律令不得與日本本國的法律或敕令牴觸，該法沿用至 1920 年。¹⁰1921 年，制定「法三號」取代「三一法」，標榜日本本國的法律原則上亦適用於臺灣，總督的律令制定權僅限於因臺灣的特殊情況而必要時。¹¹

由於臺灣的法制權是以總督為立法的核心，因此其殖民政策的演變，也就由領政總督的態度轉變分成：無方針主義及漸進政策的確立、內地延長主義政策及皇民化政策等三個時期。¹²而這樣的殖民統治政策演變，也影響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至於詳細的殖民政策轉變，詳見下文總督統治部分。

整體而言，臺灣既為日本的殖民地，故臺灣制訂的很多法令都與日本本土不同，治理臺灣的總督有依情勢自行立法執行的權力，而不必通過日本國內的議會審議，造成臺灣人適用的法令較日人為嚴苛，而且臺灣人沒有修訂法律的權利。於是臺灣一地就在以總督為首的專制管理之下。

二、行政區劃

日治之初，參酌清代舊制，於明治 28 年(1895)5 月，設臺北、臺灣、臺南等 3 縣，及澎湖等 1 島廳，¹³當時的桃竹苗地區屬於臺北縣內。同年(1895)8 月又改定為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次年又另設撫墾署，辦理山地行政。¹⁴依照明治 28 年(1895)所保留的各地民政支部與出張所的各件公文報告來看，日軍尚未掌握各

⁷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89。

⁸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0。

⁹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制度》，頁 21。

¹⁰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1。

¹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

¹²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6-80。

¹³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第 31 年統計摘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 年），頁 9。

¹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0 冊）（臺北：捷幼，1999 年），〈卷五教育志教育行政篇〉，頁 29-30。

地，北自淡水支廳，南至鳳山出張所，多有匪徒嘯聚、抗拒日軍之事，¹⁵此時期的公文報告也充斥了針對臺灣各地風俗民情的調查報告，以為往後的統治做準備。¹⁶從其密集改設及當時臺灣各地人民的抵抗來看，初期的行政力量能深入地方的情況有限，多屬行政法令上的發布而已，設置情況會視統治臺灣各地的情形加以調整。從明治 28 年(1895)5 月的縣廳初設，一直到大正 15 年(1926)7 月間，總共有 11 次的行政區劃調。¹⁷其中，有幾次變革較大的區劃調整，必須加以點明。

首先，明治 30 年（1897）6 月，將全臺由 4 縣廳，增設為 9 縣 3 廳，¹⁸並在縣廳之下設置各街庄社長，支給事務費，以協助地方行政。¹⁹當時的桃竹苗地區由臺北縣中劃出獨立為新竹縣。由地方行政機關設置可知，當時的地方行政已能深入地方，雖然實際執行的地方行政人員，多沿用清代遺留下來的縉紳之士，²⁰且能用各種獎章或是頒授紳章來拉攏這些傳統的士人為其所用²¹，實行以臺人助其治臺的統治手段。

其後，較大的變革出現在明治 34 年（1901）11 月，改全島為 20 廳，廳下設支廳輔助，當時的桃竹苗地區分設為桃仔園、新竹與苗栗等 3 廳。²²明治 42 年（1909）10 月，將 20 廳縮為 12 廳，將原街庄社或合數街庄社設區，設區長一人及書記若干人等。²³而此時桃竹苗地區的廳劃也重新調整，桃仔園廳改稱為桃園廳，苗栗廳則併入新竹廳。²⁴

至大正 9 年（1920）改設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 5 州，保留東部的臺東、花蓮港 2 廳，此時桃竹苗地區則總合在新竹州之下。²⁵這樣的設置形態，大體上一直維持到日本戰敗投降時。在 1920 年後，這樣穩定的行政區劃，顯示了殖民政府已能穩定的統治臺灣，並在此時期於教育政策上頒布〈臺灣教育令〉，

¹⁵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頁 42、69、465。

¹⁶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頁 22-5 歲時節慶之情況、頁 26-7 鴉片、頁 27-8 對十人調查可否設置支廳於淡水港有關舊制之情況、頁 29 本地人對纏足之輿情、頁 153-7 吉井大藏收稅官囑託調查要點、頁 158 屯田之沿革、頁 158-9 本島田地之計甲暨大小租之說、頁 159 鄭成功時代之臺民男女頭髮、頁 159 總理地保約首之選擇、頁 159-62 江湖賤業種類、頁 162-3 有無辦理私文公文之郵局及其方法、163-4 明志書院、學海書院、登瀛書院、頁 164 臺灣古來戶籍制度、頁 165-6 農業制度情形等等，內容無所不包，都是為了解臺灣情況以利往後之統治。

¹⁷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 年），頁 8-9。

¹⁸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頁 9。

¹⁹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計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2 年），頁 31-33。

²⁰ 詳見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年），頁 165。

²¹ 詳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南投：省文獻會，2001 年）等書所載可知。

²²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計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2 年），頁 31-3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頁 8。

²³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計要覽》，頁 31-3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頁 8。

²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計要覽》，頁 31-3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頁 8。

²⁵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頁 9。

使得臺灣的現代化教育得以發展與進步。

由行政區域的劃分可知，早期的變動較頻繁，是由於對臺灣當地的不了解，至後期則是為了各地的繁榮不同而加以調整。整體而言，可說為了因應治理臺灣的需要，而能靈活的變動。

相對應於地方行政區域的設置及變動，各級行政長官幾乎都是派任日本人。臺灣地區最高行政長官，為臺灣總督，管理臺灣島政務。總督府之人員、編制，及各級地方行政官制，時有更改，配合地方行政區域變革而設置之。在各級地方行政長官中，臺灣人所能擔任的皆為較基層的街、庄長，或其下的保正而已，且由日人選派。其他長官皆由日人擔任，臺灣人民無法參與。

雖然臺灣人對這樣的情形多所不滿，尤其在臺人民智漸開，與日人接觸日久，或留日者日增後。終於在 1920 年代，臺灣開始有地方自治改革運動之倡，要求將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協議會員等改為民選，協議會改為議決機關。²⁶經過 10 餘年的努力，終於在昭和 10 年(1935)4 月，總督府正式發布地方制度改革相關的新法令，其要點為明訂州、市、街庄為法人及其公共事務之範圍；擴大自治立法權；廢除州、市預算的認可制度；將街庄長和助役由名譽職改為有給職；廢除州、市協議會，改設州、市會為議決機關，廳及街庄仍設協議會諮詢；確立選舉制度，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半由州知事官選、半由民選，凡年滿 25 歲以上男子、獨營生計、居該市街庄 6 個月以上、年納市街庄稅 5 日圓以上者，即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州會議員半由總督任命，半由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出，任期 4 年等，其餘多如舊。²⁷實際執行上，先後於昭和 10 年(1935)11 月及昭和 14 年(1939)11 月曾舉行兩次州、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但州知事、市尹、街庄長等行政官員，始終維持官方任命。²⁸由此可見，臺灣人終於爭取到有限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雖然離真正自治仍有相當的距離。

三、統治

在統治上，臺灣總督是實際上握有律令頒布及行政大權者，是主掌臺灣統治的最高行政長官，其意向會影響其下行政官員在臺灣的施政方向。其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因應殖民地全面控制的需求，而發展的警政系統。警察，看似地位不高，但在臺灣的統治成功與否上，卻占了關鍵性的地位。茲說明如後。

(一) 總督

日治時期殖民行政的特色之一，即是臺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

²⁶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186-187。

²⁷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189。

²⁸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191。

大權，形成總督專制之體制。²⁹如前文法制部分所述，無論是「六三法」、「三一法」，或是後來的「法三號」等，臺灣總督都是臺灣立法的核心。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內出現政黨內閣，總督的選派即改由文官擔任，軍事上另以臺灣軍令部統轄。³⁰即 1919 年，原敬內閣進行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³¹但日治 51 年間，共歷 19 位總督，除了 1919 年至 1936 年間任用 9 位文官總督外，早期及後期總共任命了 10 位武官總督。³²雖然總督的任期並不固定，整體來說，武官總督的任期較文官總督長，而武官、文官、再武官的總督任用，也顯示了對臺統治政策的轉變。

日本統治臺灣的政策，乃依照日本本土的需要與國際情勢為主，輔以統治臺灣的情況演變，來選擇派任總督，於是總督的統治政策就決定了臺灣的施政方向。由歷任總督的「無方針主義」進而明揭「同化主義」，由「內地延長主義」進而強調「皇民化政策」，都以同化臺灣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為其主要目的，整體施政上是採行民族差別對待的殖民政治。³³由於日本在統治臺灣時並沒有明確的施政方針，乃依不同總督視統治情況及個人理念而定，但仍有少數總督的統治宣言或政策方向實際的影響了某一段時間臺灣的政策方向。為了方便說明治臺政策的演變，依政策的演變與差異可以概分成三個時期，略述如下。

1. 無方針主義及漸進政策之確立³⁴

早期的總督以軍人為主，如最早的樺山資紀、乃木希典總督等。由於日本欠缺經營殖民地之經驗，於是初期決定暫時採「放任主義」政策，一面進行特別立法，一面尊重臺灣人固有的風俗習慣，對吸食鴉片採漸禁政策，對辮髮、纏足採不干涉，而鼓勵放足斷髮。³⁵至於，奠定臺灣統治基礎的第 4 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以習醫出身的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的意見為主，對臺灣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從事調查，採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政策。³⁶於是採用漸進主義原則，適度尊重臺人的風俗習慣，利用傳統的保甲制度，作為協助警察的輔助機關；成立「壯丁團」，協助鎮壓武裝抗日；利用臺人精英士紳擔任地方基層行政人員、教師等職務；推動各種調查事業等，如 1898 年設的臺灣土地調查局、1901 年的臺灣舊慣調查會、1903 年公布的〈戶籍調查令〉、於 1905 年 10 月 1 日實施

²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0。

³⁰ 施淑宜總編：《見證臺灣總督府 1895~1945(上)》(臺北：立虹，1996 年)，頁 166。

³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1。

³²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2。

³³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5。

³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6-80。以下三個時期的政策轉變，採用吳文星對總督治臺政策轉變的分期。

³⁵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6。

³⁶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7。

臺灣史上第一次的人口普查等。³⁷

另外在教育上也採漸進原則，於 1898 年以地方經費設置 6 年制公學校，重視日語教學以求同化；在傳統書房則制定〈關於書房義塾規程〉，促使書房漸次加設日語、算術等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也在公學校設漢文科，並聘用書房教師、宿儒任教該科等。³⁸此外，對傳統的詩社、寺廟等也採尊重和籠絡的態度。承認臺灣社會的特異性，並以此為專制政治的基礎，由其對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的訓示可知，要與日本人同等待遇就要同化成為日人。³⁹在此方針下，先是鎮定土匪，次則注全力於經濟發展與財政的獨立，教育上的設施則少顧及。⁴⁰此一時期為武官總督領政的時期，其中奠定治臺基礎的兒玉源太郎任期 8 年，繼任的佐久間左馬太任期 9 年較久，其他總督任期較短，總督派任年限並未固定。總之，早期統治的目的在於日本人政治、經濟權力的確立。

2.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影響到日本國內也掀起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臺人受此風潮影響也產生民族自覺而組織團體，發行雜誌，展開向日本政府要求自由平等權利和尊重等民族運動。⁴¹

於是日本不得不改變對臺灣的統治方針，以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到了 1918 年，明石元二郎總督更確立了以同化主義為方針，以「臺灣日本化」、「臺灣人日本人化」為統治目標，各地乃有風俗改良會、國語普及會等團體。⁴²並於 1919 年 1 月 4 日公布〈臺灣教育令〉，以養成忠良國民為目標的教育制度。⁴³1919 年，由於世界各殖民地的民族運動狂飆下，日本佔領的朝鮮也發生「三一運動」，迫使日本改變殖民地統治方針，改派文官總督來治理臺灣，最早的文官總督是田健治郎，採取日本內地延長主義來統治臺灣，強調臺灣是日本領土，必須使臺灣人成為日本人，於是開始注重教育及提高臺灣人的政治地位。⁴⁴田健總督是此一時期最重要的總督，在他任內，於 1922 年通過除了初等教育外，強調中等教育以上完全開放日臺共學的「新臺灣教育令」。⁴⁵另外，有 1920 年的地方制度改革，1921 年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的設置、同年在臺灣施行新法律，及 1923 年的民法商法的

³⁷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7。

³⁸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7。

³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6。

⁴⁰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6。

⁴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8。

⁴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師大歷史研究所，1983 年），頁 37；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7。

⁴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南天，1939/1995 年），頁 91、93。

⁴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9。

⁴⁵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79；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112；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1978 年），頁 39。

施行等。⁴⁶雖然他的警察、地方政府、婚姻法改革和新教育制度被批評為寫的比做得多，並在新教育令公布一年半後就返回東京任職新內閣的農商大臣。⁴⁷但繼任的內田、上山總督也以「共存共榮」、「人民融洽為經，文運的暢達與產業的興隆為緯」等，繼續前任政策的統治方式。⁴⁸

這樣的同化政策，自田健總督以後，被後來續任的 8 位文官總督所延續。此一時期的總督，除了第一位的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和最後一任的文官總督中川健藏有 4 年左右的任期外，中間的總督任期皆相當短，約一年多，其中最短要屬南弘總督，竟然只有 2 個月。以這些文官總督普遍任期甚短的情況下，自然較少變革性作為，施政上以守成居多。於是這種延續日本內地政策的作法，自然也被繼任總督所遵行，一直到日本國內的帝國主義野心勃興，這樣的政策方向才發生變化。

3. 皇民化政策

1936 年 9 月，臺灣再度由文官統治轉變為武官統治。⁴⁹翌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為因應長期戰爭及確立國防體制之需要，於 1939 年頒〈國家總動員法〉，臺灣亦在該法下進入「戰時體制」。⁵⁰而隨著戰事的擴大，有「帝國南門鎖鑰，南方發展據點」之稱的臺灣，也開始有「皇民化運動」的提倡。⁵¹這樣的情況隨著日本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各種攻策的推行更為激進。此後，更積極普及日語，推廣用日語的臺胞家庭成為「國語家庭」，獎勵臺胞養成日式生活習慣，供奉日本神祇，組織臺灣青少年團，鼓勵臺胞改為日本姓氏，進而於 1942 年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役制度，招募臺籍壯丁從軍等。⁵²

雖然臺灣總督每年必須長時間留在日本，以爭取帝國議會對預算和政策的支持，並且回答關於施政的質詢，因此真正治理殖民地的通常是留在臺灣的官員，而這些官員和其它在臺日本人，包括日籍教師等，都視其優越的地位為理所當然。⁵³其中文人總督在統治條件上，顯然較武人總督不利。兒玉源太郎總督曾提議他辭職後，讓後藤接任，後藤拒絕並表示高級軍階的權威是臺灣總督的基本條件。⁵⁴雖然我們不應高估總督實際統治臺灣的權限，但不同階段總督的命令及理念，仍直接影響治理臺灣的措施。

⁴⁶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9。

⁴⁷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05.

⁴⁸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9。

⁴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1。

⁵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2。

⁵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2。

⁵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2。

⁵³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103-104.

⁵⁴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05.

(二) 警政

臺灣的統治，除了總督的專制之外，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實際發揮統治效用，深入地方基層的警察制度，使日治時代的臺灣無論何時何地，都在嚴密的管控之下。

治安的維持，最初以軍隊為主，到了 1898 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時代，乃改革警察制度，在各地大量增設派出所，設置訓練機關，儲備警察人才，募集臺人巡查補作為輔導機關，並採用保甲制度作為警察的補助機關。⁵⁵保甲制度規定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保立保正，甲立甲長，由保甲中的戶長推選，經地方官認可後出任，任期 2 年，是無給的名譽職，在自宅處理保甲事務。⁵⁶負責人口調查、出入者調查、風水火災及土匪強盜等警戒搜查、傳染病預防、鴉片及其他地方保安必要事項等警察事務外，尚兼及道路橋樑的修理及清掃、害蟲預防、戰役預防等普通行政事務。⁵⁷保甲的經費自行負擔，保甲員工作沒有報酬，並接受警察指揮。⁵⁸在早期的「土匪」平定後，下級行政機關的街庄長組織既不健全，又欠普及，反倒是警察及保甲制度已以周密的警察網遍及全島。⁵⁹日人持地六三郎稱之為「支廳長的警部，乃是郡長；派出所的巡查，乃是町村長」，於是臺灣是在典型的警察政治之下，警察除了普通的警察衛生事務外，兼管戶籍事務，並利用保甲制度，稅捐的徵收、土木的幫助、殖產的獎勵、糖業的助成、教育及救恤的設施等，無所不與，亦即有了警察的力量，則無事不可為。⁶⁰所以取締人民出入，搜查土匪犯罪，監視需要監視之人，牽制臺灣人子弟的日本留學、「勸誘」出賣土地、應募股票公債以及郵政貯金、利用保甲建築道路等，都是警察政治的效果。⁶¹但為對付臺灣人而設的警察制度，難免也有「壓迫過酷」的批評。⁶²

有如此掌握實際統治的警察及詳密的保甲制度，難怪在日治時期，雖然警察的養成不需要高深的教育，只需短期的養成訓練，⁶³而且臺灣人地位也遠低於日本人，但在此種政治實情下，臺灣人若有機會擔任警察一職，其地位也足以媲美受過專門醫科教育或中等師範教育的臺灣人，晉升為日治時期臺灣很特殊的社會統治階層。

⁵⁵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6-7。

⁵⁶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89。

⁵⁷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4。

⁵⁸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4-5。

⁵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5。

⁶⁰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5。

⁶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5-6。

⁶²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7。

⁶³ 徐玉竹 2013 年 3 月 10 日口述，只要受過 6 個月的訓練。

貳、經濟

日本統治臺灣最初也最重要的考量即是經濟，但由於殖民地的特性，因此在發展上是以日本人掌經濟大權、為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發展，有明顯的階級性，在教育經費的劃分上，也是以地方自籌、自付為主。

一、發展概況

日本統治臺灣主要是以其政治力為後盾，不但支持日人的資本進入臺灣，更進而掌控了臺灣的整體經濟發展，甚至用臺灣的經濟發展所得挹注日本國內。

日本在統治臺灣時，財政負擔之重曾使日本人擔憂，但在兒玉、後藤實施的臺灣財政獨立計畫，促使臺灣增加收入，利用土地調查、專賣、事業公債及地方稅的實施等方式，於是至 1904 年，日人佔領臺灣 9 年半，臺灣財政即已提前獨立。⁶⁴本來為實現臺灣財政的獨立及富裕，臺灣住民的財政負擔不能不重，但以 1904 年的歲入平均負擔額來看，臺灣人為 4.554 圓，不但較法領安南的 2.18 圓重，更較日本國內 3.343 圓重，能如此實行而沒受到反抗的關鍵即在殖民地政治。⁶⁵

首先，由 1898 年兒玉總督時期開始土地、地籍調查等，結果確切的掌握臺灣耕地面積、查明了土地的所有狀況、明瞭地形以助治安等，制定土地登記原則，以登記作為權利轉移的條件；⁶⁶1910 年至 1914 年為期 5 年的林野調查及整理，確定「無主地國有」原則；⁶⁷及原為廣大先住民保留區的「番界林野」的重整⁶⁸等。都使原為臺灣人開墾的土地或無主之地，朝向日本人資本家為主所設立的商社集中。先不論臺灣法令的公佈是否為臺灣人理解，更不說臺灣是否懂得在改朝換代後需要採行登記，方有耕種權。即使臺灣原有的土地擁有者不願出賣土地，靠著警察權力的勸誘或強逼出賣之下，⁶⁹以日本人為主的資本家，仍可以低廉價格輕易地取得土地。

其次，更透過對日本資本家較為有利的資本取得，設立一些具保障性的特別法，推行樟腦、鴉片、食鹽、菸葉及酒等專買制度，關稅保障和優惠補助等，驅逐英、美、德等外國資本原在臺灣所佔的地位。⁷⁰

最後，最重要的是日治時期臺灣交通建設的進步。晚清臺灣交通不便、進步緩慢的情形，可以從 1871 年至 1901 年在北臺灣傳教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馬偕的日記中得知，日記中記載當時臺灣南北的交通主要靠沿海的船運，各村、鎮的交通則靠步行，到了劉銘傳建設臺灣後，才有少數電燈、人力車、鐵路等的記載。

⁶⁴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77-8。

⁶⁵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91-2。

⁶⁶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91-2。

⁶⁷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92。另外，1915 年至 1925 年間，加強官有林野整理，使林野由放領、承購等，建立林野私有財產制，使林野資本主義化。

⁶⁸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3。

⁶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5。

⁷⁰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40-41。

⁷¹到了日治之後，為了統治方便，在交通建設上，包括郵電整備深入各地、鐵路增築貫穿南北、公路修築遍布鄉間、港口整建增加貨物吞吐等，十餘年間各項建設粲然大備。⁷²由於交通建設的快速發展，也使臺灣人在島內升學、島外留學的選擇上有更多的可能，即使鄉下的學生，也可能因得到較好的升學資訊，而有更多的升學選擇。詳情可見第三章學校教育中關西地區學生升學選擇部分，學生不但會選擇留在桃竹苗地區升學，也可能遠到宜蘭、花蓮、臺中、屏東等地升學，甚至是留日。整體而言，日本殖民政府本來為了加強對臺灣的控制而積極建設臺灣，建設的結果，卻間接使得臺灣的學生因為交通更方便而升學的選擇更多元。

二、專賣與特權

雖然臺灣的經濟發展十分有利日本的資本家，但這完全是日本統治臺灣於日人優惠與獨占的結果，十分不利臺灣人的產業及教育發展。亦即日本人不但政治的支配者，也是經濟發展上的資本家，臺灣人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處在被動與不利的地位，即使臺灣原有的地主或士紳，保有的實力也十分有限。但少數因特殊事件向日人效忠的臺灣人，則能得到一些專賣權利，而成為新資本家，如迎接日人有功的辜顯榮，即被指定為官鹽總批發人。⁷³

以帝國製糖會社的股票分配而言，其中 90% 為住在日本的日本人，住臺灣的日本人占 3%，臺灣人只占 7% 而已。⁷⁴可見主要的資本家以日本人為主。另外，企業社員階級是日人獨占，如華南銀行的百名行員中，臺灣人只占 6 名，臺灣較少被任用；⁷⁵官吏及公務員也是日本人獨占，退職後留臺灣者亦眾：會社、農會、農業倉庫、同業組合、公共埤圳組合、水利組合、市街庄等機關，幾乎都是退職官吏的收容所。⁷⁶而掌有地方教育大權的主要公學校校長，在校長卸任後，也可能成為官方指派的庄長人選。例如：曾於 1910 年任咸菜礮公學校校長的小林三次郎，即在 1920 年被官方指派為首任的關西庄長。⁷⁷

臺灣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 58%，以臺灣人為主，只在東部有少數的日人移入和原住民；漁民、礦夫、工業勞動者也以臺灣人為多，且日人勞動者的工資高過臺灣人一倍。⁷⁸在臺灣，土地的集中較日本國內差，而臺灣的中產階級往往與

⁷¹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頁 37-38、102、147、149、154-155。

⁷²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93。

⁷³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04、106。

⁷⁴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00-2。

⁷⁵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15。

⁷⁶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52、115。如當時的臺灣青果會社社長由殖產局轉任，臺灣電力會社社長則由臺北醫專校長轉任，嘉南大管理者則由臺南州知事轉任。

⁷⁷ 陳南宏、戴玉蘭：《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新竹：關西國小，1999 年），頁 96，歷任校長名錄；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新竹：竹縣文化局，2010 年），頁 112-3。

⁷⁸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09-10。

農民階級具有共同的利害，形成臺灣民族運動的中堅。⁷⁹較特別的是自由業，即教師、醫師、律師等，也以日本人為多，但臺灣的醫師也不少，因為 1899 年 3 月開辦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專收臺灣人子弟，至 1919 年止是臺灣唯一的專門學校。⁸⁰此外則因：(1) 臺灣人頗多資產家，具有醫師開業的財力、(2) 醫師不必受雇於官廳或資本家、(3) 官界及實業界的進路為日人所獨占，凡此 3 點，都促使臺灣的知識階級主要出路是當醫師。⁸¹最後早年養成的醫師，變成民族運動的主導者，也是臺灣統治政策本身產生的結果。⁸²而這樣以日人為主要的經濟支配階級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即會因應臺灣的政治情勢與經濟發展，於社會上產生一些殖民地特有的社會運動。

日治之初，總督府確立「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基本經政策，制定各項農業法規、設立農業研究機構、農業組織、興修水利工程等以農業為主的殖民經濟。⁸³於是在學校設置上，有了公學校培養忠於日本母國的所需的語言、文化等基本教育後，臺灣的中等以上學校可說是少數精英的教育，在就讀的保障上又以日人優先，於是臺灣人可以就讀的就以實業學校為主，其中又以農業補習學校為多。

至於工業的發展，早期屬農產品加工為主；到了日治後期，1930 年之後，為了配合日本南進的政策，總督府在臺灣推動「工業化」政策，發展與軍需相關的基本工業，例如 1936 年上任的小林躋造，即標榜「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為施政方針。⁸⁴這樣的發展變化，表現在學校的設置上，即要到日治晚期才有一些工業學校的設立。於是經濟上的階級性，也顯現在教育上，包括直接影響學校設置的類型。

三、教育經費

最後，關於教育的支出分配上，由於日本治臺時的教育政策偏重在極少數的高等教育和普羅大眾的基礎教育。因此教育的支出依鶴見(Tsurumi)的研究可知，殖民政府的教育支出主要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專門學校、師範學校、高等學校，以及 1928 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並兼及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等教師之薪資；至於小、公學校其它支出，包括資本財等，則由學校所在之郡、市、街、庄共同負擔，因而郡與市負擔比國庫更高比率的教育預算。⁸⁵臺灣的普通教育，並非義務教育；小學校最初為官立，自 1921 年以後改歸市街庄

⁷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04-5。

⁸⁰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16。

⁸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16。

⁸²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17。

⁸³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196。

⁸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01-2。

⁸⁵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36.

(間有用州或廳等地方費用)經營；公學校的設置，則自 1900 年以來，乃由地方街庄提議，經地方廳認為經費維持不成問題後，始可設立；教員的俸給及旅費等以外的經費，則由該學區內的住民負擔。⁸⁶

由此可知，一個地方是否能設置公學校，主要視該地方的仕紳階級是否能捐獻錢財或土地等以支持學校的設置(後詳)。即日本殖民政府鼓勵臺灣推廣初等教育，並不是以提升臺灣人民的文教水準為目的，主要是為了使臺灣人能同化入母國的下層階級中，但是臺灣的地方仕紳卻覺得教育是人民有機會向上提升的手段，故亦能大力支持。可見這是雙方目的殊途，方法卻同歸，終使臺灣人民得利的結果。這也顯現即使教育背後有其政治、社會目的，但教育亦能保有其自身的價值。

雖然若細觀其中的教育經費分配，仍會得出日人、臺人，甚至原住民等分配不均的結果。在地方政府每年的教育經費中，每個小學校兒童分配 50~60 日圓，公學校兒童為 25~30 日圓，日人兒童恰為臺人兒童的 2 倍，至於由國庫支出的原住民教育經費則每人每年平均為 6.5 日圓~18 日圓。⁸⁷更不論實際的受教品質，較優良的師資一定為小學校所聘用，資淺的教師則為公學校師資⁸⁸，或任用尚未合格的「教員心得」⁸⁹擔任教師。而原住民兒童的教育更慘，多由該地未受過教學訓練的警察兼領，或由警察的妻子擔任助理教師，教學內容多以日語會話為主。⁹⁰由此可見，在整體經濟，甚至是教育經費的分配上，都有階級的差別，是以日人為優，臺灣人次之，原住民最劣。

參、 社會

依照上文簡述的日本統治臺灣所產生的專制政治及經濟獨占情況，在社會活動上也產生以日本統治者為主所推動的運動，相對則產生以臺灣人為主、對抗官方的社會運動。雖然在政治上，兩者大體上是相對的，但在相對的力量中，日本人中有少數人對臺灣人的立場是表示同情的，而大部分的臺灣人在面臨日本人的高壓統治時，無疑是順服的。

首先，在推廣良好的放足斷髮運動和國語普及運動中，前者有時勢所趨的必然性，所以推動的成效頗為良好；後者則為日本皇民化政策下的必然趨勢，並透

⁸⁶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73。

⁸⁷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36.

⁸⁸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36。

⁸⁹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台師大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10-3。日人稱代理教師為「教員心得」，以新屋公學校而言，日治時期代理教師即超過一半，占了 54.51%強。

⁹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233-4.

過學校和國語傳習所等來教育人民。另外，鑑於漢文無法立刻禁絕，統治初期對傳統士紳特別尊敬、禮遇，對書房、詩社也任其發展，直到後期才加以禁絕，於是漢文乃得以在民間傳承、保存。推展運動的過程熱鬧紛亂，甚至會遇到一些反對力量，以下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擇要簡述之，以展現當時社會變革的重要生活事項。至於國語普及運動因與教育活動相關，將列入第四章社會教育部分討論之。至於書房及詩社，則將在第五章傳統文教部分加以闡述。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日本的輿論有「標榜嚴禁鴉片、男人剪辮、女人放足為臺灣統治上的三大主義」⁹¹的說法，總督府為了有利統治，採行的是漸進政策。⁹²首先鴉片的使用是透過戶籍調查，確知使用者⁹³，在買賣上則納入政府專賣而控制數量⁹⁴，以期使其自然消失。在當時發行的《新竹廳報》、《桃園廳報》、《新竹州報》等報紙中，都載有購買或吸食鴉片等的特許鑑札規定、更換時地或遺失者等內容，在當時每期的官方廳州報中占有頗多的版面，實難一一例舉。例如：明治 42 年(1909)12 月的《桃園廳報》，即由桃園廳長西美波，發布桃園廳令第三號，規定鴉片烟膏購買吸食特許鑑札的換給規程。⁹⁵其中對於鴉片購買、吸食特許鑑札換給的時間、地點、若不在居住地又應如何換給等，皆有相當清楚的說明，全文並以漢文譯出，⁹⁶以達到通達周知的效果。同時並以表格列出各地換給的時間與地點，究其換給的地點皆在各地警務課的支廳或是派出所。⁹⁷可見鴉片的購買、吸食都屬於警察的業務，表現出其對臺灣人民吸食鴉片的控管態度。至於當時由對岸來臺的中國人則不在此限。⁹⁸以明治 41 年(1909)新竹廳的官方統計，具有鴉片吸食特許者，共有 6,661 人。⁹⁹而在大正 7 年(1918)新竹廳的官方統計則是由大正 2 年(1913)開始的 7,926 人，逐年遞減至 7,509、7,062、6,654、6,262 人，到大正 7 年時剩 5,565 人。¹⁰⁰而新竹州官方統計擁有吸食鴉片特許者，也由昭和 6 年的 3,872 人開始往下遞減，分別為 3,586、3,283、2,973 人，至昭和 10 年(1935)時為 2,671 人。¹⁰¹昭和 11 年(1936)末時全新竹州擁有吸食鴉片特許證者只剩下 2406 名，而且自昭和 5 年(1930)至 11 年(1936)間，經勸導治療而戒斷者達 2,258 名，官方宣稱已收到相當良好的成績。¹⁰²到了昭和 13 年(1938)底，吸食許可的人數已降至

⁹¹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5。

⁹²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10。

⁹³ 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若為鴉片使用者即有註記「阿」字。

⁹⁴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39。

⁹⁵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31 號，1909 年 12 月 15 日，頁 352。

⁹⁶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31 號，1909 年 12 月 15 日，頁 352。

⁹⁷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31 號，1909 年 12 月 15 日，頁 353-354。

⁹⁸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31 號，1909 年 12 月 15 日，頁 352。

⁹⁹ 新竹廳：《新竹廳統計摘要明治 41 年》(新竹：新竹廳，1909 年)，頁 21。

¹⁰⁰ 新竹廳：《新竹廳統計摘要大正 7 年》(新竹：新竹廳，1919 年)，頁 318。

¹⁰¹ 新竹州衛生課：《昭和 11 年度新竹州衛生概況》(新竹州衛生課，1938 年)，頁 107-108。

¹⁰² 新竹州：《新竹州要覽昭和 12 年版》(新竹州，1937 年)，頁 166。而此官方的統計資料，也被

1,955 名。¹⁰³由以上這些官方統計的資料可知，漸禁主義的確達成相當好的效果。

在此漸進政策下，總督府並不明令禁纏斷髮，而是透過學校教育或是報章雜誌的宣導，鼓勵臺灣人放足斷髮。¹⁰⁴有些人因前往日本，不甘因髮辮受辱，即斷髮，見日人女子能自由活動，回臺後，即贊同放足。¹⁰⁵在斷髮和放足運動中，學校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教科書中宣導纏足之害外，也用教學或展覽會加強宣導¹⁰⁶，學校的臺人教師更是領風氣之先¹⁰⁷，如國語學校和醫學校，即首倡斷髮風氣¹⁰⁸，其後更用紳商們組織各種的斷髮會和放足會等加強宣導之¹⁰⁹，總督府乃因勢力導，進而於 1915 年將禁纏列入保甲規約中¹¹⁰，利用警政的力量全面而普遍的推行之。其中，參事、區街庄長、保正、甲正、教師、醫生等社會領導階層，是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者，加上殖民政權以公權力利用地方行政和保甲規約相輔助，使這些社會領導階層得以積極扮演社會動員的角色。¹¹¹

總之，自 1900 年起，即有放足團體出現，展開放纏足運動；其後斷髮運動繼之而起，至 1910 年代中期，遂達到社會大眾普遍放足和斷髮之目的。¹¹²整體而言，日本政府先聽任臺人的自由意志是否選擇斷髮、放足，其後再以學校行其教育、同化之目的，最後再以保甲組織達到全面推行的目的。

臺灣在日治時期，無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上，都充滿了殖民地的特性，在政治上沒有自治的實權或表達意見的自由，完全以總督的命令為依歸，也不在日本法律的保障之下，尤其警察的控制力更到了無所不在的地步；經濟上臺灣人是主要的生產者，但不是主要的資產家，也不是企業主要的受雇者，薪資待遇也較差；至於社會活動則要看執政日人的臉色，以推行合乎日本社會價值的活動。可見臺灣人在日治的社會中，整體的表現都是受統治而被壓抑的。表現在教育政策的理念與實行上，也是相類似的結果，詳見下節教育政策的發展情況。

五味田恕所引用，出現在其：《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菅武雄，1938 年)，頁 61-62。

¹⁰³ 新竹州：《新竹州要覽昭和 15 年版》(新竹州，1940 年)，頁 156。

¹⁰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14。在第三章學校教育部分將提到國語學校作文中的內容為例，說明國語學校推行斷髮的情形。

¹⁰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15、218。指的是臺北富商李春生及其家人。

¹⁰⁶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26、229。

¹⁰⁷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30。

¹⁰⁸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27。

¹⁰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29-36。

¹¹⁰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49。

¹¹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54。

¹¹²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10。

第二節 教育政策

綜觀日治時期臺灣文武總督的分派及其治臺政策的演變，大致可將臺灣的教育政策，分別以 1919 年〈臺灣教育令〉的發佈，和 1937 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二件事，劃分為三期¹¹³，分述如後：

壹、第一階段：〈臺灣教育令〉發佈前（1895-1918）

日本統治臺灣第一階段的總督皆以軍人執政，歸納前後任總督的治臺政策走向，可以名之為漸進主義。¹¹⁴臺灣的教育政策，最早是由接受美式教育後，擬在日本推動「國家教育」觀點卻受挫的伊澤修二所主導。¹¹⁵這一階段中，除了創始者伊澤的教育政策外，最具有影響性的總督是 1898 年上任的第三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其民政長官為後藤新平，後藤共任職 8 年，奠定臺灣大規模和多元的教育體系。¹¹⁶由其創始及奠基的精神，可命之為漸進時期。

1895 年初，伊澤修二向內定為臺灣首任總督的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呈遞一個教育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教育計劃，¹¹⁷其中包括訓練日本人和臺灣人成為日語講習員、訓練臺灣人成為懂日語的新領土官吏的「應急事業」；和建立培育日籍教員和新領土官吏或通譯的國語學校，及建立培育臺籍教員的師範學校等的則屬「永久事業」。¹¹⁸樺山應同意此計畫，乃於 1895 年春末就任第一任臺灣總督時，伊澤隨同到任，伊澤即出任總督府民政局的代理學務部長。¹¹⁹伊澤於一次探訪的機緣中，將學務部遷至清領時曾文風鼎盛的芝山巖，並在此處設立第一所學校，透過對地方仕紳的演講，招得最初的學生。¹²⁰雖然在他離臺期間，留守的 6 名學務部官員被仇日的臺灣人殺害，但隨後於 1896 年 4 月，他帶領 13 名新部員和 36

¹¹³ 綜觀各家對日治時期教育的分期，繁簡不一，但一般大多依照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政策變化及法令頒定作分期的依據，如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34-6，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7-70、張鐸嚴：《臺灣教育發展史》（臺北：空中大學，2005 年），頁 55-61 的分期等多分為三期；其它如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及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臺北：南天，1997 年）等書，雖未將日治時期的教育政策加以分期，但依據內容繁簡來取捨，筆者以為分三期來擇要說明，已能見其梗概，且較易掌握政策變化的趨勢。其中，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4-5，對時人（日人為主）研究臺灣教育的分期作詳細的比較整理後，亦分為三期，可見若要掌握概要，如此分期甚為合理。

¹¹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12。1898 年，兒玉總督在地方長官會議訓詞中的用詞：「將來與其徒然追求積極方針而誤了時潮，不如確實地採取漸進主義，方為卓見。」

¹¹⁵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3.

¹¹⁶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9-10,18.

¹¹⁷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4.

¹¹⁸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頁 11-14。

¹¹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4；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頁 16。

¹²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4.

名新的講習員，重啟芝山巖學校，並嚴加戒備。¹²¹以此為嚆矢，伊澤在全島設立 14 個國（日）語傳習所，給予臺灣人中願任新政府職務者和願就學的兒童以日語為主的基礎教育，後因學務部的預算被大量刪減，而入稅吏、獄官、警察等之手，憤而去職。¹²²但在 1899 年 10 月被任命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之前，他仍擔任臺灣的教育顧問。¹²³雖然伊澤修二真正主持臺灣教育的時間很短，但仍為臺灣的教育規劃出方向，尤其國語（日語）教育的普及，一直貫串整個日治時期，後期甚至演變成皇民化政策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至於為了達到普及國語教育所規劃設計的師範教育，則在臺灣成為學生升學時少數而主要的選項之一，在教育選擇集中的情況下，師範教育出來的畢業生，即成為後來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來源之一。

1898 年起後藤新平在任的 8 年間，是臺灣大規模和多元的教育體系開始發展的時期。¹²⁴後藤在少年時代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他曾表示，作為一個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他只是實行所謂的生物政治學，他認為人類社會和大自然一樣，須經過長時段的緩慢進化，因而任何欲急速改變臺灣人生活及社會是不智的。¹²⁵他在 1903 年的「學年諮問會」上，曾謂：

總督連政治方針都還未見示，教育的方針更講不到；教育是無方針的……祇要討論普及國語就行……不經深思熟慮，祇因為教育為一善事，故即開辦學校，這已誤解殖民政策，今後必須自負嚴重的責任。¹²⁶

於是後藤對臺灣的總指導策略著眼於：為新政權爭取支持；發展臺灣受過教育的臺灣人階層以供職於殖民政府；教育臺灣人為日本國民；普及女子學校教育；產生臺籍教師和醫護人員；和使本島學校制度盡可能地自給自足等目標。¹²⁷為了達成上述的政策目標，並符合後藤社會應緩慢進化的理念。後藤在融入臺灣原有教育文化的情形下，漸次創設了一些正規的教育機構。

他的理念想必也被後續的執掌教育者所貫徹，不但設有各地漸次普及的公學校，培養了許多基層的工作人員為殖民政府所用，也使日本文化、語言等深入民間。關於女子學校教育一項，更顯現在男女中學校數的對等設立上，可以比較附錄四日治時期臺灣的中學校，及附錄五日治時期臺灣公私立高等女學校，即可得

¹²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5.

¹²²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6.

¹²³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7.

¹²⁴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8.

¹²⁵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81.

¹²⁶ 轉引自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84。

¹²⁷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8.

知，這在臺灣的教育史上可謂首見。至於，其他培養臺籍教師和醫護人員，和使臺灣學校制度盡可能地自給自足等，皆一一實現，並不因後藤的去職而改變。

1898年7月，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立6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¹²⁸同年8月續頒的〈臺灣公學校規則〉點明公學校的教育對象為臺灣人，教育目的主要在使臺灣人養成日本的國民性格，並精通日語。¹²⁹其中漢文和算術等實用課程的設計，其目的都是在吸引臺灣人來就學，並且在課程中加強教化的任務。¹³⁰對於傳統書房則頒布「關於書房義塾規程」，漸次加強管理，使之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¹³¹於是1898年11月起書房需受殖民地地方政府的管轄，其中規定：固定的教學時數、用總督府核准的教科書、塾師要向地方政府報告學生學業入退學、家長職業，及漸次增設日語和算術等。¹³²總之，其主要目的要使臺灣人能離開傳統書房，而開始進入公學校就讀，但在公學校設立不及不足之時，將書房以納入管理的方式接受其存在，並使書房教學內容漸漸與公學校一致。

此一時期，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又缺乏制度，視各類學校的需求，零星設置。分別設有國語學校以培育師資及公私業務人才，醫學校以造就醫事人才，另設若干農事試驗所以及工業、林業、糖業講習所等作為職業教育機關，以訓練低級技術人員。¹³³此外，1915年，因臺灣人的請願及捐資，而設立4年制的公立臺中中學校。¹³⁴對於山地同胞則另設蕃人公學校，1914年另頒〈蕃人公學校規則〉，修業年限僅4年，較一般公學校少2年，教材、課程也不同于一般公學校。¹³⁵至於日人在軍政廢除後，攜眷至臺者漸多，總督府則據日本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另設專給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及中學校，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教育，俾使其得以回國內接受高等教育；另設有工、商業學校各一所及於醫學校附設醫學專門部等，為日人高等教育機關。¹³⁶

伊澤原始的教育計畫有設置師範學校以訓練臺人成為日語教師，1899年臺北、臺中、臺南等3所師範學校設立，招收國語傳習所（1899年公學校才開辦1年）畢業，受過4年日本教育的18歲至25歲的臺灣人始有資格申請。¹³⁷國語學

¹²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23，除了臺東、恆春等少數地方，地方無法負擔經費的情況下，國語傳習所可存續。

¹²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29，在其發布的規則中稱臺灣人為「本島人」。

¹³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20-22.

¹³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12；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74-975，錄有〈關於書房義塾規程〉全文。

¹³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74-975。

¹³³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12。

¹³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12。

¹³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12。

¹³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13。

¹³⁷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22-23.

校開辦師範科的 5 年後，1902 年臺北和臺中師範停辦，1904 年臺南師範也停辦，其原因恐怕是：提供足夠的教師以配合公學校所需，又要避免創造或鼓勵臺人追求更高教育的需求。¹³⁸後藤即直率的說不要使臺灣人接受超過其身分地位的教育，並以預算和政策考量，拒絕開設職業教育機構。¹³⁹總督府 1903 至 1910 年的學務部長持地六三郎即指出：「正規教育的對象是中上階層的子弟，因此臺灣的教育，雖稱之為『普遍教育』，實為『菁英教育』。」¹⁴⁰

醫學是另一個需要中等教育的職業，從 1897 年附屬於日本臺北醫院的醫學講習所開啟了臺灣的現代醫學教育，1899 年日本國會通過預算設立學校訓練臺籍醫師，於是設置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可申請公費，但公費生畢業後需由官方分發服務 5 年，畢業生總共只受 11 年教育（6 年公學校、1 年預科、4 年本科），故其學術標準不如日本的醫學專門學校，但改善了臺灣人整體的健康和衛生。¹⁴¹從此，除了教師和醫生外，臺灣人能受較高程度的教育的機會相當少。

此外，雖然女子被鼓勵入學，例如公學校教授實用且受歡迎的縫紉等技藝課程，並延攬受尊敬的臺籍婦女到學校任教等，並在 1897 年立即為女童開辦手藝科，且 1900 年手藝科首屆畢業的 12 名畢業生中有 9 名立刻成為公學校教師等，但此一時期公學校仍很少有女學生。¹⁴²

將少數的基督教教會學校納入管理，增加日語為必修課程，但允許宗教課程的存在，並於 1905 年頒布「私立學校規則」，默認據臺前即已設立的私立學校，但不鼓勵開設新校。¹⁴³這也就是北臺灣以馬偕為首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所辦的私立淡水中學校、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及南臺灣馬雅各為代表的私立長榮中學校、私立長榮女學校等，可以繼續經營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此一時期的教育制度並非一開始即有明確的教育計畫，缺乏系統性的考量與執行的一貫性，完全是因時、因地制宜。視臺灣的文教發展情況，及執政者要達到的預定目標，而設制相關的教育機構，或是頒訂相關的教育令來進行之，學校的存廢、設置，變動性相當大。

大體上，第一階段的教育可依種族的的不同，分成日本人、臺灣人與原住民等三種差別待遇的教育制度，彼此之間無法轉換與銜接。就今日的教育程度而言，臺灣人能接受的教育，除了極少數人有機會接受師範、醫學校、臺中中學校等的中等教育外，一般只到公學校程度而已。因此，此一時期殖民政府設置最多的教育機構是以初等教育程度的公學校為主。而且女童入學的數量相當少，要到進入

¹³⁸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22-23.

¹³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3.

¹⁴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4.

¹⁴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5.

¹⁴²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29

¹⁴³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34-37.

第二階段後，才有較明顯的改善。這樣的教育設置，卻是臺灣現代化教育制度的嚆矢。

貳、第二階段：〈臺灣教育令〉發佈後（1919-1936）

在 1919 年之前，臺灣的施政方針借用矢內原忠雄的話，是以兒玉、後藤政治為基調，根據對臺灣社會特殊性的認識，社會方面尊重舊習慣；政治方面則臺灣人予差別的警察專制統治，其內容為治安之安定、島內產業資本主義之發達、日人官僚及資本勢力之確立，以及對教育設施之漠視等。¹⁴⁴因此除了佔領初期最實用的醫師養成外，至 1919 年止完全沒有專門教育機關，實業學校亦付之闕如，對於臺灣人的中等教育亦不完備；比較這一期間產業異常的資本主義發展，可知日本佔領臺灣的最初 25 年間，統治的權力大部分放在經濟，對於教育並不重視。

¹⁴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興起了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的風潮；而日本卻受惠於大戰之賜，資本主義空前發達，但其國內也興起了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因而日本國內某些學者及政治家也開始同情臺胞所遭受的待遇；相對的臺灣人民也開始產生自覺等。¹⁴⁶於是日本在因應多方變革下，不得不改變其治臺方針，以強化對殖民地控制的合理性。

於是 1918 年 6 月，明石元二郎就任臺灣總督，並明白揭示同化主義為其施政方針，「夫臺灣之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的」。¹⁴⁷而於 1919 年明石總督死後，繼任首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亦明示其內地延長主義為施政方針，強調臺灣係日本領土的一部分，故臺灣的統治必須使臺灣人成為日本人，以效忠於日本朝廷，為達到此目的，首先需以普及教育，施予教化與指導，方能達到政治平等之境界。¹⁴⁸田總督以後，歷任 7 任文官總督，上述方針一直未變，但其同化主義乃是以日本本位為統治方針，並不是以殖民地的福祉為考量。¹⁴⁹尤其在詳細考察其統治手段，及其頒布的「臺灣教育令」中的內容明顯可知。

身為一個陸軍中將，明石相信警察和軍隊是殖民地統治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以達到良好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¹⁵⁰其直言，臺灣人必須被教育成為日本人，以強化日本之擁有臺灣，他以教育作為同化工具，使殖民地學校制度成為政策轉

¹⁴⁴ 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6。

¹⁴⁵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72。

¹⁴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4-6。

¹⁴⁷ 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7。

¹⁴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7。

¹⁴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8。

¹⁵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83.

變的主要工具。¹⁵¹雖然他的教育改正計劃一開始受到殖民地官員的反對，但是最終他的教育計畫仍成為 1919 年 1 月的〈臺灣教育令〉，首次將殖民地所有臺灣人的公立學校整合為一個單一的、相互配合的體系。¹⁵²依〈臺灣教育令〉第二條規定，臺灣的教育目的在「培養忠良之國民」，而以普及日語、「涵養德性」為教育之重點，由於日語的使用程度不一，故在教育上仍維持差別待遇，即提給 350 萬臺胞的教育機關，除收容四分之一學齡兒童的公學校外，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僅 4 年制高等普通學校 1 所、3 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2 所、5 年制師範學校 2 所、3 年制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 1 所、6 年制（預科 3 年、本科 3 年）農林及商業專門學校各 1 所，8 年制（預科 4 年、本科 4 年）專門學校 1 所。¹⁵³然而為了不及 20 萬之在臺日人，則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置 5 年制（得另設修業 1 年之補習科）中學校 2 所、4 年制高等女學校 3 所、5 年制（預科 2 年、本科 3 年）工業及商業學校各 1 所、3 年制高等商業學校 1 所，以及師範學校、醫學專門學校兼收日籍學生。¹⁵⁴由此可見，新教育制度在強調中等職業教育，使臺灣人因應殖民地快速的工業和商業發展之技術與半技術勞工之需求，仍舊是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並不鼓勵殖民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同化，其目的只是使臺灣人同化於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和中下的部分。¹⁵⁵

因明石的健康不佳，死於 1919 年 10 月，繼任首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更大幅度地修正了教育制度。¹⁵⁶1922 年 2 月，頒布新的〈臺灣教育令〉，其目的是為了「撤銷內臺人間之差別教育，全達均等地步」。¹⁵⁷該教育令要點大致有三：（一）完全撤廢臺日人教育之差別主義；（二）原則上完全共學，只是初等教育階段，常用日語者進小學校，不常用日語者進公學校，中等以上教育則完全不設任何差別；（三）除公學校及師範學校需配合臺灣之特殊情況外，其餘教育制度比照日本國內教育制度。¹⁵⁸其中第二點，雖給予臺籍兒童進入小學校的機會，但核准與否在於學童的教育水準、日語能力，以及家族的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和財富，原就讀公學校而希望轉學至小學校的臺籍學童，須經入學考試。¹⁵⁹而想進入普通中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學校的入學考試與知識能力，或優秀的表現無關，日本人血統是最大的優勢。¹⁶⁰這在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的臺日人的升學情況中，明顯可知。以

¹⁵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84.

¹⁵²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85.

¹⁵³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9。

¹⁵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39。

¹⁵⁵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88-90.

¹⁵⁶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91.

¹⁵⁷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41。

¹⁵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41。

¹⁵⁹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94.

¹⁶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17.

1937年，新竹中學的臺日人入學率分別為10.04%與64.29%，¹⁶¹新竹高等女學校臺日人的入學率分別為24.24%與67.47%，¹⁶²可見日人升學，明顯較臺人升學容易。更不用說，在初等教育的就學率上，臺灣人更是遠不及日人普及。以1931年新竹州的官方調查而言，當時的在臺日人州平均就學率已達98.81%，同時間臺灣人的州平均就學率只達31.06%。¹⁶³此時，已強調日臺共學，近10年，但在新竹州小學校中的臺灣人也只占了10.78%。¹⁶⁴以此數據，足證日臺人就學情況的不公平。

依照實際的教育情況顯示，職業補習學校及男、女中學校數顯著增加，至於學生情況，除職業補習校臺籍多於日籍外，餘均日籍生較多，尤其男、女中學及高等學校等高等教育預備學校，日籍生更遠多於臺籍生。¹⁶⁵以昭和7年度(1933)至昭和12年度(1938)高等學校畢業的尋常科學生而言，臺日人比例分別為7:32、4:30、4:30、5:29、5:28、6:31。¹⁶⁶這樣日籍生占據重要升學學校名額的印象，也深印在就讀高等學校校生的記憶中，並且會強化這樣不平等的印象。¹⁶⁷全臺中學校的學生日籍生共有4,064人，臺籍生則只有2,791人；¹⁶⁸全臺的高等女學校則有日籍生1,428人、臺籍生則只有660人。¹⁶⁹而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時，臺籍生僅6人，日籍生則有49人；¹⁷⁰1936年，入學的學生有臺籍生29人，日籍生57人。¹⁷¹由上可知，表面上是日臺有共學的機會，但實際上臺人要進入較好設備、師資的小學校仍要符合一定的條件，此顯然是對日人有利的；至於中高等教育機會仍然是日籍學生的天下。

臺灣人不但在臺灣沒有接受專門教育的機構，直至1919-1920年前後，即去日本留學（特別學法律政治），也受政府的干涉。¹⁷²雖然受阻於殖民地的小學校和中學校，臺灣的富人則繼續送子弟到日本的小學校、中學校、高女學校、專門學校或大學。¹⁷³因為相對比較之下，對臺灣人來說，在日本進入大學、專校、中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比在臺灣爭取稀少的名額容易多了。¹⁷⁴

¹⁶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年），頁165。

¹⁶²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頁191。

¹⁶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新竹州：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1932年），頁69、72。

¹⁶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3。

¹⁶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41。

¹⁶⁶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頁182。

¹⁶⁷ 呂耀樞2012年8月15日口述，呂耀樞起先回憶時說平均每屆尋常科只有2位臺灣人考上，等筆者詢問與他同班的臺灣人同學時，他背出其他5位同學的名字，亦即當他就讀時，該屆40位尋常科的學生中，有6位臺灣人。

¹⁶⁸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頁166。

¹⁶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頁195。

¹⁷⁰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二十八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年），頁329。

¹⁷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頁251。

¹⁷²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172。

¹⁷³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90.

¹⁷⁴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26.

到了第二階段，殖民政府在臺推行的初等教育可謂相當成功，因此臺灣人民開始產生升學的需要，於是政府在此一時期開始在各州設立普通、職業等各式中等教育機構，除了男性就讀外，也開始設置女子高等學校。此時，所謂女子高等學校的教育年限及程度顯然不及男性就讀的「中學校」，可是已命名為「高等學校」，可見在教育事務的認知上，女性能受到中等程度的教育已叫高，且主要為了配合初等教育中的女性教師需求，並沒有進一步受教的期望或需求，而男性顯然在受了「中學校」的教育後，有機會再接受更高等程度的教育。由教育機構設置的歷程可知，此時臺灣現代化教育機構設置，看似量上呈現男女平等的表象，但實質受教情形是男多於女、男佳於女，呈現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尤以高等教育更是如此。

總之，雖然 1919 年公布的〈臺灣教育令〉，使臺灣的教育制度從多途分化，各校依需要設立，開始產生連接的系統性，也使日臺人開始有共學的機會，表面上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在實際執行上，反而使臺灣人在受良好教育或升學的機會上更易受挫，更不要說在共學後，日臺人可能遭受實質的差別待遇。因此，在日本國內政治風氣有人開始同情臺灣人，到日本升學又較容易的情況下，臺灣人中較有能力的家庭，自然將子女送至日本接受教育。而在日本接受教育的青年，在接受日本的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或者和大陸的學子接觸後，對臺灣的不平等待遇自然產生反思和反動，於是在 1920 年代產生一些反日本殖民運動和組織也是難以避免的結果。

參、第三階段：中日戰爭後（1937-1945）

日本的帝國主義在一次世大戰後，朝向兩大途徑邁進，其一是強化殖民地之控制與壓制國內之勞工運動；其二是發現軍事生產與侵略中國之新利益。¹⁷⁵於是被視為南進跳板的臺灣，自然無可避免的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政治變動的影響。何況在 1920 年代，由「臺灣文化協會」所展開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皆對臺灣產生廣泛的影響。¹⁷⁶

於是 1936 年 9 月，臺灣再度由文官統治轉變為武官統治，次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日本為因應戰爭及國防體制的需要，於 1938 年頒布〈國家動員法〉，臺灣也在該法籠罩之下，進入「戰時體制」。¹⁷⁷在日本製造蘆溝橋事變後，隨著戰事的擴大，臺灣的戰略地位益形重要，為使臺胞具有日本國民之愛國心及犧牲精神，臺灣遂有「皇民化運動」的提倡。¹⁷⁸於是積極普及日語，優待使用日語的

¹⁷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59。

¹⁷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60。

¹⁷⁷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61-2。

¹⁷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 62。

臺胞家庭，獎勵臺胞養成日本式的生活習慣及供奉日本神祇，創設勤行報國青年隊，擴充青年學校，組織臺灣青少年團；1940年，鼓勵臺胞改從日姓；翌年，策動成立「皇民奉公會」，運用街庄保甲等地方組織，編成區會、部落會及奉公班等系統，並將大日本婦人會、臺灣少年團、臺灣產業奉公會及其他團體結成奉公壯年團等，以強化勤勞，實踐戰時生活，鞏固民防等。¹⁷⁹1941年6月日本政府決定，殖民地的臺灣人今後可以應召服役，次年強制臺灣男子加入4個志願團，在日本、臺灣和南洋擔任軍隊的苦力、通譯、農業工人和海員。¹⁸⁰至1943年，志願兵總數竟達60萬人。¹⁸¹由其種種政策可知，皆為因應戰時的兵員、軍需所準備，以達全民皆兵的目的，於是在教育制度上，也產生相對應的變革。

在日本國內的教育強化其軍國主義及極端國家主義之時，臺灣的教育政策，在學制上也呈現三大特色：（一）強化初等教育，以奠「皇民教育」之基礎；（二）配合日本戰時學制改革，修改中等以上教育法令；（三）修改臺灣師範教育令，以適應國民學校教育之需。¹⁸²首先，1937年，總督基於徹底普及日語、統一小學、公學校學科，及公學校兒童學習漢文之必要大減等理由，廢除漢文科。¹⁸³接著於1939年，設置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議決義務教育實施綱要，預定於1943年開始實施6年制義務教育。¹⁸⁴且在1939年時，書房剩17至18所，於是隨著義務教育的開辦，相對就關閉了書房。¹⁸⁵1941年臺灣比照「國民學校令」，將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但實際的課程內容和學校，仍有第一、二、三號表國民學校的不同，足以區分原來的小學校，規定過「日語生活家庭」之子弟入「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小學校），其餘家庭弟則入「第二、三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公學校、蕃人公學校）。¹⁸⁶依總督府統計，1943年4月時，全臺第一號表的學校數有153所，學生53,797人；第二號表的學校有883所，學生797,729人；第3號表的學校有40所，學生11,148人。¹⁸⁷看起來臺灣人的就學數仍是最多的，但是若以當時新竹州學童的就學率而言，當日人達到99.97%時，臺灣人的就學率只有65.71%。¹⁸⁸在教育的質量上皆呈現不平等的情況。

1943年，臺灣實施義務教育，但學生入學限制仍照前述規定；同時，強制廢除書房，並比照日本中等以上學校學制改革，修改各級學校法規，刷新教育內容，

¹⁷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62。

¹⁸⁰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29。

¹⁸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62。

¹⁸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63。

¹⁸³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63。

¹⁸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育之研究》，頁63。

¹⁸⁵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 p.114.

¹⁸⁶ 黃秀政、張政彥、吳文星：《臺灣史》，頁211。

¹⁸⁷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年），頁2。

¹⁸⁸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八年），頁4、5。

縮短修業年限等，此時，中學校修業年限縮短為 4 年，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之高等女學校改為 3 年，實業學校男子改為 3 年，女子改為 2 年，高等學校高等科由 3 年縮短為 2 年，大學本科由 3 年縮短為 2 年。¹⁸⁹中等以上學校不斷增加的結果至 1944 年已有實業補習學校 90 所、職業學校 27 所、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各 22 所，及作大學預備機關的高等學校、高等農林、商業、工業學校及臺北帝國大學等各 1 所，另有私立臺北女子專門學校之設。¹⁹⁰

雖然在政策制度上，臺灣的教育制度似乎與日本國內相同，但在實際上 1943 年開始實施 6 年制義務教育時，臺灣人國民學校就學率雖提高至 65.7%，¹⁹¹翌年臺籍學齡兒童的人學率增為 71.2%，1945 年則超過 80%。¹⁹²但始終不及日人近乎百分百的人學率。

尤其在 1941 年後，日本人挑起了太平洋戰爭，使臺灣在美軍砲火威脅之下，有多少經費用於維持教育機構，當可產生相當大的懷疑。而且 1942 年 1 月臺灣總督府命令設立的各式奉公隊，使自大學以至職校、女校等所有的學生和職員參加，協助糧食的生產，及在工廠或其他地方從事義務勞動；連國民學校的學生也常參加軍事訓練，進行義務勞動，恐怕也沒有多少時間或資源留給學校教育，¹⁹³更何況臺人始終沒有得到公平的人學機會。

由此可知，日本統治臺灣的最後十年，在教育政策上對臺灣的教育制度上比照日本國內的制度，但除了義務教育的實行看似有利外，其他的內容仍是以母國的需要為主，且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不但減少修業時數，更加强戰時的需要和訓練，以使臺灣人為母國奉獻、服從，不但未考慮臺灣人對教育的感受與需求，更影響了臺灣人受教的機會與目的。

綜合以上所述，簡要地將日本統治臺灣的重要總督的統治理念，及其下重要的民政長官或學務部長的教育理令及教育政策制定可知，臺灣的日治時期的教育，無論是第一階段採取漸進的政策，到第二階段制度化時期的同化，或是第三階段的皇民化時期，都是以日本母國的統治需求為出發，其目的在教化、統治臺灣人，使臺灣人熟悉、接納日本文化後，能馴化入日本社會的底層，為日本而奉獻。故其在臺灣的教育設施，並不以臺灣人的需求為主要考量，而日本人和臺灣人也始終受到不同的差別教育。

在教育制度的設計上，也使臺灣人積極的追求少數菁英才能就讀的醫學或師

¹⁸⁹ 黃秀政、張政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11。依筆者訪談實例，升高等女學校者未必一定要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故改之。

¹⁹⁰ 黃秀政、張政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10、211。

¹⁹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八年)，頁 5。

¹⁹²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13, 1943 年臺灣人入學率，男子 76.6 及女子 54.1，次年男子 80.7%、女子 60.7%。

¹⁹³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130.

範學校，於是這兩種出身的人就成為日治後期，甚至臺灣光復後地方上重要的社會領導階層。也正因为殖民地教育制度設計的限制，反而促使有能力或財力的臺灣人，競相出走到日本以求接受更好的教育。

初等教育普及，可說是日本人統治臺灣期間相當成功的結果，以國語運動的普及在皇民化時期的深入民間可知。但是除了對日本的效忠與馴服外，也產生了一些如「臺灣文化協會」等的社會運動的領導階層。至於，日本人在臺灣初等教育能推動的如此成功，很大一部分也要歸功於臺灣在日治之前，相當有成效的漢文教育，臺灣人本身對教育是相當重視的，即使政權轉移，在現實生存的考量之下，若能因教育而受益，臺灣的仕紳仍會支持學校的設置與推廣，以客家族群對文教推廣普遍支持的態度可知。

第三節 桃竹苗客家聚落的特徵

壹、 行政區劃

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政治區劃時有變更，依統治者的行政需求，經歷了幾次變革。有時合併，有時分離，但在日治後期大正 9 年(1920)之後，則統合在新竹州之下。以下分別說明桃、竹、苗地區行政區劃的變動情形。

自清末光緒元年(1874)時此區已設立新竹縣，遲至光緒 14 年(1888)又將苗栗獨立設縣，可見此區已有一定人口開墾與開發。至於明治 28 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殖民政府將臺灣設為 3 縣一島廳，此區則列在臺北縣下的基隆、宜蘭、新竹等三支廳之一，劃屬新竹支廳；¹⁹⁴同年 8 月，制定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後，此區則分屬於臺北縣下基隆、宜蘭、新竹、淡水等 4 支廳之一的新竹支廳，另外在臺灣民政支部下的 5 個出張所之一的苗栗出張所也兼管此區。¹⁹⁵但是依據明治 40 年(1907)波越重之編之《新竹廳志》在建置沿革中的記載，明治 28 年(1895)的記事多為清除反日勢力討平臺地反抗勢力的記事。¹⁹⁶直至明治 29 年(1896)3 月才有 3 縣一島廳 12 支廳的設置，¹⁹⁷並另設撫墾署，辦理山地行政，此區則分屬於臺北縣下的新竹支廳及臺中縣的苗栗支廳。¹⁹⁸次年(1897)又修訂地方機關組織規程，改全臺為 6 縣 3 廳，於縣廳下樞要之地設辦務署，其下又置街、庄、社輔助行政，此區則又合一為新竹縣。¹⁹⁹至於今日桃竹苗各縣的縣置變化則分述如後，

¹⁹⁴ 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0 冊)，〈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頁 28-9。

¹⁹⁵ 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0 冊)，〈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頁 29-30。

¹⁹⁶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一)》(臺北：成文，1908/1985 年)，頁 11-4。

¹⁹⁷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一)》，頁 14。

¹⁹⁸ 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0 冊)，〈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頁 30。

¹⁹⁹ 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0 冊)，〈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頁 30。

至於在區劃內的新竹市，在日治時期多為閩人集中之地，且多劃在新竹區域之下，只另以街或市來標名其為人口集中的都市地位，因此將不另外討論。

清領時期今日的桃園縣多屬於淡水廳或新竹縣之下，至日治時明治 30 年(1879)的 6 縣 3 廳時期，桃園才正式成為行政區劃之名，日本人把原桃澗保分為桃仔園、中壢二辦務署，隸臺北縣；至明治 31 年(1898)日本人把中壢辦務署併入桃仔園辦務署，今日桃園縣的雛形才形成。²⁰⁰明治 34 年(1901)日本人置桃仔園廳，管轄桃澗堡、海山堡及竹北二堡之北 94 庄；明治 36 年(1903)改名桃園廳，「桃園」二字才正式成為一個行政區劃的名稱。²⁰¹至大正 9 年(1920)日人廢廳置州，桃園廳被析分為中壢、桃園、大溪等郡，隸新竹州之下。²⁰²

光緒 13 年(1887)，臺灣正式建省；光緒 15 年(1889)，析新竹縣為新竹、苗栗二縣，以中港溪為界。²⁰³明治 28 年(1895)，新竹縣被廢，改設新竹支廳，隸臺北縣；明治 30 年(1897)復設新竹縣，管轄範圍與光緒元年(1875)的新竹縣大致相當，包括今苗栗、臺中、桃園等縣的一部分；明治 31 年(1898)，新竹縣再被廢，設新竹辦務署，管竹北一堡及竹南一堡，竹北一堡係今新竹縣中心地區，竹南一堡則屬今苗栗縣；明治 34 年(1901)改設新竹廳，管轄範圍增加竹北二堡之南半，仍與今之新竹縣範圍不合；明治 39 年(1906)新竹廳的轄區擴大，與新竹縣初設時相近；到大正 9 年(1920)，新竹州成立，下設新竹等 8 郡，其中的新竹郡可謂今日新竹縣之雛形。²⁰⁴

苗栗縣成立於光緒 15 年(1889)，隸屬於新設於臺中的臺灣府。²⁰⁵明治 28 年(1895)日人據臺即遭裁撤，其後苗栗先後成為「出張所」及支廳，先後隸屬於臺灣民政支部及臺中縣；明治 30 年(1897)，新竹縣復置，苗栗地區析分為苗栗、頭份、苑裡等辦務署，劃歸新竹；明治 31 年(1898)新竹縣被廢，苗栗等辦務署劃歸臺中縣；明治 34 年(1901)20 廳時期，苗栗地區又合而為「苗栗廳」；明治 39 年(1906)苗栗廳又被分為苗栗等支廳，再隸屬新竹廳；至大正 9 年(1920)，苗栗地區被分為數郡，隸屬於新竹州下。²⁰⁶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至日治結束。以下舉圖 2-1 為例，可概覽桃竹苗地區的郡庄分布。

²⁰⁰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臺北：南天，2000 年)，頁 170。

²⁰¹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170。

²⁰²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170。

²⁰³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200。

²⁰⁴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200。

²⁰⁵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237。

²⁰⁶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頁 238。



圖 2-1 新竹州郡圖

資料來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堡圖集》，(臺北：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頁4。

貳、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

依明治39年(1906)出版的《桃園廳志》，記錄當時的產業活動以農業為主，其中又以稻米、茶葉為主要的農產品，²⁰⁷在全廳20萬人口中，3分之2都務農，於田園耕作的人口占了13萬餘人之多。²⁰⁸此區並兼及一些山區的樟腦業、礦業，和農業生活所需或附屬的基礎工業，至於商業不但從事者少，而且多以農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雜貨零售業為主，會依農業的豐歉而變化，至於近山區的關西、大溪、三峽等的商業活動又與臨近原住民區的事業同興廢。²⁰⁹雖然近海地方因為不適合農業耕種，自然產生一些捕漁活動，但多數家庭仍兼及農業耕種。²¹⁰總之，日治初期的桃、竹地區，整體的產業活動都顯現以傳統農業社會為主的架構。

至於同為日治明治末期編成的《新竹廳志》，雖然資料相當豐富，但多是針對舊時地方志內容的整理，在產業的介紹上，似乎並未實地走訪新竹廳各地。但

²⁰⁷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臺北：成文，1906/1985年)，頁111-2。當時的桃園廳包括桃澗堡(今桃園、南崁、平鎮、中壢、龍潭等地)、海山堡(包括今三峽、大溪、鶯歌等地)、竹北二堡(包括今楊梅、新屋、埔心、關西等地)等，主要是今日的桃園縣境及新竹縣的關西鎮。

²⁰⁸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頁111、128-9。

²⁰⁹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頁143-51。

²¹⁰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頁155。

在各項產業的介紹上仍以農業為主，並在稻米的栽種上提到樹杞林(今竹東)、新埔、北埔等地²¹¹；製腦業必要的樟樹多產於與番界相接之地，產業進行順利與否與日人對番地的控制相關，多在今竹東、南庄等地²¹²；茶的種植面積則以新竹以北最多。²¹³而在此書中，所提到的產業、物產仍以農業為多，而以上提到的區域，多為客家人集中聚住之地。由此可知，日治初期桃竹苗地區，除了沿海地區外，靠山的客家人集中聚集地仍以農業為主要的產業。即使到了日治後期，各地的交通都有很大的進步，但大部分近山客庄的產業仍以農業為主。甚至在關西鎮的鄉下地區亦有日本移民來這個地區種植橘子，進行農業方面的移民。²¹⁴

參、 人口分布與語言

雖然日治時期桃竹苗的政治區域設定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但日治大部分時期是歸劃在同一區之下，其下可以郡、街庄來分別區域，大致上與今日的市鎮劃分相同。依照今人針對族系統計的結果，在民國 45 年時，全臺福佬人佔 74.5%，客家人佔 13.2%，其他人佔 0.1%，原住民佔 2.4%，外省人佔 9.9%；全臺各縣市的強勢族系多為福佬人，只有桃竹苗三縣的客家人較多，桃園雖未過半卻有 43.3%之強，較福佬人的 47.9%略少，新竹縣(含今新竹市)則為 57.2%，苗栗縣更高至 67.0%。²¹⁵雖然此三縣離光復已 11 年之久，主要組成人口中，其中一個族系項目，也由日治時期的日本人改為外省人，但是閩客之間的組成變化並不大。由此可見，在日治時期此三縣當為客家人較集中之處，針對此三縣來研究客家族群的教育設施與文教表現有其合理性。

如依照昭和 6 年(1931)12 月的官方統計可以瞭解當時新竹州(含今日桃竹苗四縣市)各族系人口的分布情形，其中尤以福建、廣東籍人口占多數。雖然來臺灣的客家人並不等於廣東人，為了方便統計及說明，只好將日本人統計的廣東人視同於客家人來計算。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族系分布情形，詳見表 2-1。但可惜的是在此分資料中，只有各郡的統計情形，並沒有各街庄的統計，在討論客家人集中在桃竹苗某些街庄時，仍要以光復初期的統計為準。另外，依照今人陳鸞鳳整理前人的研究發現，桃竹苗地區自日治時期到光復後 10 年的這段期間，各族群的人口分布情形，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桃園縣仍呈現北閩南客，新竹縣與苗栗縣仍呈現海閩山客的分布情形。²¹⁶這樣的結果，也符合在日治晚期曾在新竹

²¹¹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頁 470。此時新竹廳包括竹北一堡(今)、竹南一堡、竹北二堡與內灣、上坪、大坪、南庄等番地。

²¹²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頁 509-11。

²¹³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頁 515。

²¹⁴ 2012 年 5 月 11 日劉范鐸妹口述、5 月 10 日邱金球校長口述。提及「石川仔」(客語)家庭，來臺種橘子。

²¹⁵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頁 12-4。

²¹⁶ 陳鸞鳳：〈戰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收於施雅軒等，《第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

市區任保甲書記的謝水森所言，日治時期前後新竹市區以閩南語為主，海線南自竹南，北到竹北，還有新豐靠海的部分，都是閩南語為主，竹東湖口都是客家人。²¹⁷尤其在桃竹苗各地，在日治時期一直呈現著客家人集中某地聚住的情形。

表 2-1 日治時期新竹州各郡的閩客人口區域分布 單位=人

市郡名	總數/ 各街庄	日本 人	本島人					朝 鮮 人	中國 人	計
			福建	廣東	其 他	平地原 住民	山地原 住民			
新竹市	總數	5,481	37,411	5,192 ²¹⁸	-	7	1	27	335	48,454
新竹郡	總數	490	30,936	76,255	3	7	4	3	154	107,852
	舊港庄	108	12,110	2,854	3	1	-	3	20	15,096
	紅毛庄	29	3,409	7,072	-	1	-	-	10	10,521
	湖口庄	87	143	13,811	-	-	-	-	13	14,054
	新埔庄	101	299	22,675	-	-	1	-	42	23,118
	關西庄	79	243	21,897	3	4	2	-	48	22,276
	六家庄	19	2,171	4,731	-	-	1	-	7	6,929
	香山庄	51	12,498	2,070	-	1	-	-	14	14,634
中壢郡	總數	652	13,940	84,473	-	13	-	-	198	99,276
	中壢街	374	6,763	17,633	-	3	-	-	111	24,884
	平鎮庄	16	625	11,907	-	1	-	-	11	12,560
	楊梅庄	195	671	24,437	-	-	-	-	49	25,352
	新屋庄	28	1,316	18,407	-	1	-	-	14	19,766
	觀音庄	39	4,565	12,089	-	8	-	-	13	16,714
桃園郡	總數	969	77,047	5,188	-	345	-	11	174	83,734
	桃園街	777	22,245	522	-	15	-	11	132	23,704
	蘆竹庄	37	15,384	740	-	132	-	-	2	16,295
	大園庄	62	15,624	1,303	-	6	-	-	22	17,017
	龜山庄	60	15,046	937	-	184	-	-	3	16,227
	八塊庄	33	8,748	1,686	-	-	11	-	15	10,493

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2002)，頁 45。

²¹⁷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1995 年)，頁 18。謝水森為日治晚期在新竹火車站前派出所最後一任的保甲書記，相當於今日的里幹事兼辦戶口，對人口遷移經辦過比較瞭解。

²¹⁸ 依日治時的官方調查資料可知，日治時期已有廣東人入住新竹市區，雖為少數，人口也與日人相當，超過 5 千人，占了 10.7% 之強。可是，若依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18-9，曾於日治晚期任保甲書記的謝水森所言，「光復後，新竹市才有客家人漸漸搬進來」，似乎就太言過其實。當然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謝先生所在的區域的確沒有「廣籍」的人居住；另外，則因市區經濟活動以商業為主，客家人為作生意，在人口占少數，官方用語又以日語為主的情況下，自然就隱而不顯。

表 2-1 日治時期新竹州各郡的閩客人口區域分布(續)

大溪郡	總數	837	28,752	20,278/ 20,279	-	154	4,634/ 10	-	90	54749/ 50,122
	大溪街	388	25,102	2,837	-	134	10	-	71	28,542
	龍潭庄	71	1,737	16,572	-	20	-	-	12	18,412
竹東郡	總數	882	1,462	64,336	-	23	5,000/ 101	1	135	71,839/ 66,940
	竹東庄	357	199	14,600	-	1	1	1	62	15,221
	芎林庄	18	134	10,558	-	-	-	-	33	10,743
	橫山庄	133	241	11,145	-	9	41	6	7	11,485
	北埔庄	45	115	9,549	-	5	28	-	27	9,769
	峨眉庄	11	47	6,837	-	4	31	-	5	6,935
	寶山庄	13	545	9,730	-	2	-	-	1	10,291
竹南郡	總數	1,203	38,387	43,337	-	1,544	895/ 455	6	192	85,524/ 85,124
	竹南庄	526	15,095	1,484	-	6	-	6	34	16,865
	頭分庄	61	2,274	16,525	-	1	-	-	39	19,400
	三灣庄	16	105	7,883	-	1	-	-	12	8,027
	南庄	92	269	9,684	-	51	455	-	34	10,585
	造橋庄	256	1,629	4,756	-	221	-	-	8	6,870
	後龍庄	236	18,513	2,990	-	1,264	-	-	41	23,044
苗栗郡	總數	1,619	22,690	90,787	-	546	-	11	480	116,133
	苗栗街	1,060	1,728	16,885	-	55	-	11	232	19,971
	頭屋庄	14	154	6,971	-	86	-	-	30	7,255
	公館庄	203	369	17,480	-	33	-	-	66	18,151
	銅鑼庄	32	170	12,452	-	1	-	-	33	12,688
	三叉庄	96	285	6,755	-	104	-	-	44	7,284
	苑裡庄	72	13,031	8,138	-	177	-	-	65	21,483
	通霄庄	127	6,236	14,884	-	86	-	-	9	21,342
大湖郡	總數	638	824	26,416	-	39	2,255/ 101	-	35	30,207/ 28,053
	大湖庄	308	310	10,225	-	10	4	-	21	10,878
	獅潭庄	32	82	5,408	-	25	97	-	4	5,648
	卓蘭庄	52	276	7,180	-	2	-	-	10	7,520

資料來源：

- 1、新竹州：《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昭和6年)》(新竹州：1933年)，頁20-41。
- 2、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2。

說明：

- 1、庄名加匡之地廣東人較多，筆者將其視為客家人集中之地。
- 2、《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昭和6年)》的統計資料以昭和6年(1931)底主，並詳列各庄人口數；《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一冊的教育相關統計則以昭和6學年度為主，有些統計資料列至昭和7年(1932)3月末。

新竹州在大正、昭和年間陸續出了一些統計書及教育統計要覽，但資料保留不全，故選此二冊以方便對照各項統計資料，以說明桃竹苗地區的教育發展概況。前二書中，各郡總人口數大致相同，橫欄黑體字出自《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正常字體出自《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昭和6年)》。各項人口統計大致相同，但在大溪、竹東、竹南與大湖等4郡的原住民人口統計上差異頗大，²¹⁹以反黑表示。在第三章學校教育閩客籍比較部分，將引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一書的數據，故此處保留該書的原住民人口數，以推估當原住民就學率計入各郡就算率時，可能的影響。將表2-1新竹州各市郡街庄的閩客族群人口比率，計算整理如表2-2。

表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

	桃園郡	桃園街	蘆竹庄	大園庄	龜山庄	八塊庄	大溪郡	大溪街	龍潭庄	中壢郡	中壢街	平鎮庄	楊梅庄	新屋庄	觀音庄
福建	92.0	93.8	94.4	91.8	92.7	83.4	52.5	88.0	9.4	14.0	27.2	5.0	2.7	6.7	28.0
廣東	6.2	2.2	4.6	7.7	5.8	16.1	37.0	10.0	90.0	85.1	70.9	94.8	96.4	93.1	72.3

表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續)

	新竹郡	舊港庄	紅毛庄	湖口庄	新埔庄	關西庄	六家郡	香山庄	竹東郡	竹東庄	芎林庄	橫山庄	北埔庄	峨眉庄	寶山庄	新竹市
福建	28.7	80.2	32.4	1.0	1.3	1.1	31.3	85.4	2.0	1.3	1.3	2.1	1.2	0.7	5.3	77.2
廣東	70.7	18.9	63.2	98.3	98.1	98.3	68.3	14.2	89.6	95.9	98.3	97.0	97.9	98.6	94.6	10.7

²¹⁹ 再查昭和4年(1927)至昭和11年(1934)間，5本新竹州的教育統計要覽，及大正10年(1921)至昭和13年間的8本統計書，發現：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一覽(昭和4年)》(出版地、年不詳)，頁1-2，大溪郡山地原住民5,316人、竹東郡山地原住民4,354人、竹南郡平地原住民1,603人、山地原住民759人、大湖郡山地原住民2,129人；新竹州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8年)》(新竹州教育課，1933年)，頁2-3，竹東郡山地原住民5,140人、竹南郡平地原住民1,543人、山地原住民901人、大湖郡山地原住民2,355人；新竹州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9年)》(新竹州教育課，1936年)，頁2-3，人口數同昭和8年；新竹州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10年)》(新竹州教育課，1937年)，頁2，大溪郡山地原住民5,025人、竹東郡山地原住民5,411人、竹南郡平地原住民1,511人山地、原住民797人、大湖郡山地原住民2,423人；新竹州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11年)》(新竹州教育課，1938年)，頁2，大溪郡山地原住民5,148人、竹東郡山地原住民5,482人、竹南郡平地原住民1,581人山地、原住民976人、大湖郡山地原住民2,442人。但在歷年統計書上，大正10年至大正13年的4本統計書所調查統計的原住民人數甚少，多為個位數，至昭和6年、8年的統計書才有如上述的詳盡統計，但原住民人數較之教育統計要覽仍少得多，詳如表2-1；至於昭和11年、13年的統計書則未分福建、廣東與原住民等，統計列為本島人，故法得知各族群於各地的人口分布。

表 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續)

	竹 南 郡	竹 南 庄	頭 分 庄	三 灣 庄	南 庄	造 橋 庄	後 龍 庄	苗 栗 郡	苗 栗 街	頭 屋 庄	公 館 庄	銅 鑼 庄	三 義 庄	苑 裡 庄	通 霄 庄	四 湖 庄	大 湖 郡	大 湖 庄	獅 潭 庄	卓 蘭 庄
福 佬	44. 9	89. 5	11. 7	13. 1	2.5	23. 7	80. 3	15. 5	8.7	2.1	2.0	1.3	3.9	60. 7	29. 2	9.0	2.7	2.9	1.5	3.7
客 家	50. 7	8.8	85. 2	98. 2	91. 5	69. 2	13. 0	78. 2	84. 5	96. 4	96. 3	98. 1	92. 7	37. 9	69. 7	90. 7	87. 5	94. 0	95. 6	95. 5

說明：

- 1、人口百分比以表 2-1 的福建、廣東人口除以該市郡街庄的總人口，得出各地的閩客占該地總人口比率，小數點下 2 位 4 捨 5 入。
- 2、在市郡名加一橫線，粗體字為客家人居優勢庄。

閩客族群這樣的分布情形，在日治時期閩客分庄集中的情形十分明顯，有 22 個庄全庄的客家人占九成以上。光復後即使行政區域重劃、人口繁衍與遷徙，有些鄉鎮的閩客集中情形稍緩，但整體的閩客分布情形仍相近。以下分別將今人研究光復後桃竹苗地的閩客分布情形，表列並圖示之。詳見表 2-3 至 2-6。

表 2-3 桃園縣閩、客族系人民之區域分布

鄉 鎮	桃 園	大 溪	中 壢	楊 梅	蘆 竹	大 園	龜 山	八 德	龍 潭	平 鎮	新 屋	觀 音	復 興
福 佬	77.1	85.4	41.0	7.0	88.5	53.5	89.5	81.5	13.1	6.5	8.0	35.2	22.0
客 家	7.5	10.4	51.3	87.2	3.3	35.6	6.0	14.8	80.3	79.5	91.7	62.8	11.1
原 住 民	-	0.2	-	-	-	0.1	0.6	-	0.1	-	-	-	65.3
其他 (外省 人)	15.5	4.0	7.7	5.8	8.2	11.0	3.9	3.7	6.5	14.0	0.4	2.0	1.6

資料來源：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頁 176-7。

說明：

- 1、原始資料為陳紹馨、傅瑞德編撰：《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社會變遷的基本指標》第一冊。
- 2、調查時間民國 45 年 9 月，單位為%。
- 3、若有超過 100% 的情形則為 4 捨 5 入的結果，如中壢、大溪。
- 4、黑體字為客家佔居優勢的鄉鎮，總共有中壢、楊梅、龍潭、平鎮、新屋、觀音等 6 鄉鎮。



圖 2-2：桃園地區大正 9 年郡庄圖

資料來源：施崇武、劉湘櫻、唐菁苹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上)(南投：臺灣文獻館，2009 年)，頁 18。



圖 2-3：桃園縣閩客分布圖。

資料來源：陳鸞鳳：〈戰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頁 45，收錄於施雅軒等著：《第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3-64。

桃園地區的客家人分布情形，配合圖 2-2，日治時期桃園地區的郡庄分布，及圖 2-3，今人以光復後的桃園縣鄉鎮圖為底，所標示出的客家人集中處，可見

日治與光復初期客家人的集中情形變動不大。以下新竹與苗栗地區，也呈現大致相似的情形，只有少數地區，政府於光復後將近山之區另劃鄉鎮，乃出現不同的鄉鎮名稱。但原則上並不影響原來閩、客或原住民的分布情形。

表 2-4 新竹縣各鄉鎮市人民之族系分布

鄉鎮	新竹	關西	新埔	竹東	香山	竹北	湖口	橫山	新豐	芎林	寶山	北埔	峨眉	尖石	五峰
福佬	62.9	1.9	1.7	5.8	85.1	49.3	1.6	1.5	33.6	3.5	8.8	8.9	3.5	3.9	2.1
客家	13.3	96.2	97.0	86.4	12.5	48.6	91.1	95.8	60.9	94.5	90.6	88.7	96.2	25.5	18.1
原住民	0.1	0.8	0.1	0.1	-	-	-	0.3	0.5	-	-	0.4	-	67.7	76.2
其他	23.8	1.1	1.2	7.7	2.4	2.0	7.3	2.4	5.0	2.0	0.7	2.0	0.3	3.0	3.6

資料來源：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頁 209-11。

說明：

- 1、原始資料為陳紹馨、傅瑞德編撰：《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社會變遷的基本指標》第一冊。
- 2、調查時間民國 45 年 9 月，單位為％。
- 3、若有超過 100%的情形則為 4 捨 5 入的結果。
- 4、黑體字為客家佔居優勢的鄉鎮，如：關西、新埔、竹東、湖口、橫山、新豐、芎林、寶山、北埔、峨眉等 10 鄉鎮。

潘英在研究中指出：新竹縣的拓殖，泉人集中在新竹市附近以經商為多，粵人則大力拓殖沿山鄉鎮，除了竹北、新豐為緩衝區外，其餘鄉鎮閩粵分明，不過粵人佔多數的地區閩人絕少，閩人佔多數地區，粵人仍有部分勢力，而這樣的情況一直沿續到民國 45 年，即使全臺 4.3%的外省人來到新竹縣並佔人口的 9.5%，除新竹、尖石、五峰外，並沒有重大變化，但影響尖石、五峰族系結構者並不是外省人而是客家人。²²⁰以上說明，配合圖 2-4 與 2-5 會更清楚。

²²⁰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頁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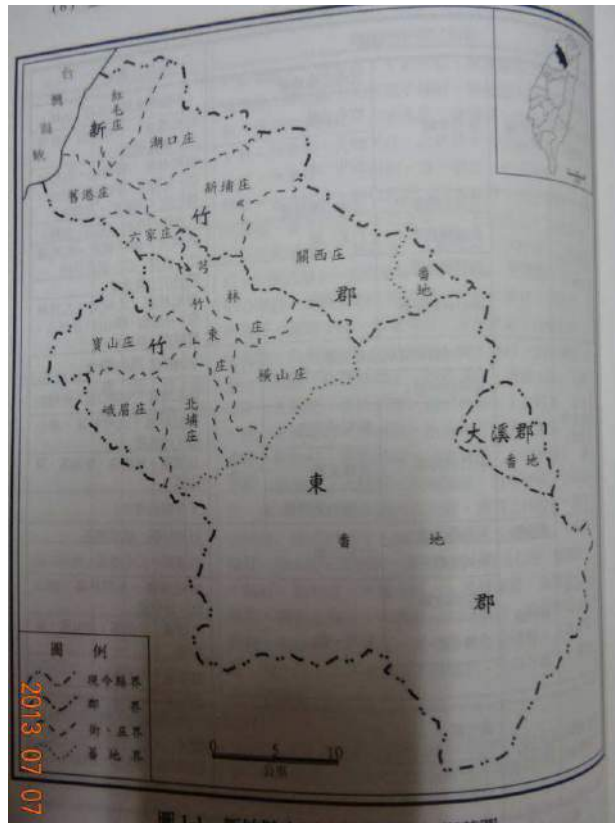


圖 2-4：新竹地區大正 9 年郡庄圖

資料來源：劉明怡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四新竹縣》(南投：臺灣文獻館，2010 年)，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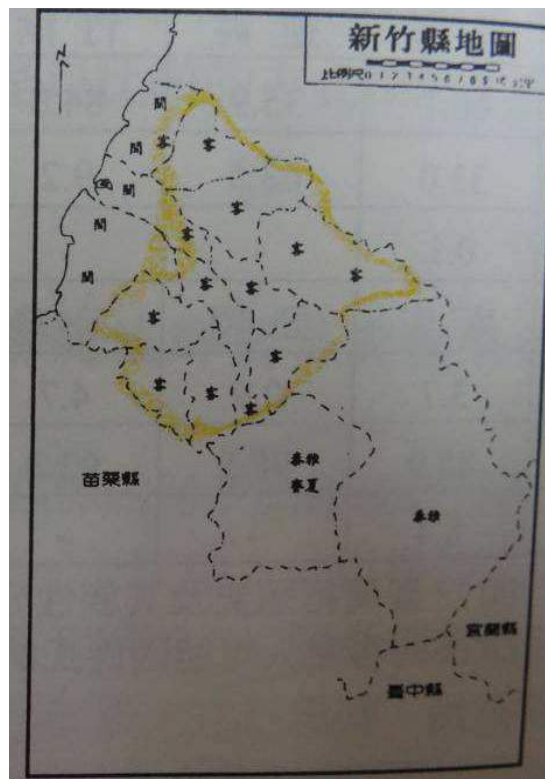


圖 2-5：新竹縣閩客分布圖

資料來源：陳鸞鳳：〈戰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收於施雅軒等：《第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

表 2-4 苗栗縣各鄉鎮市人民之族系分布

鄉鎮	苗栗	苑裡	通霄	竹南	頭份	後龍	卓蘭	大湖	公館
福佬	8.1	66.1	35.9	84.8	13.4	81.5	7.2	3.1	2.3
客家	79.3	33.0	63.5	9.2	83.2	13.9	90.8	93.8	96.3
原住民	-	0.1	-	-	-	3.3	-	-	-
其他	12.6	0.8	0.5	6.0	3.4	1.3	2.0	3.1	1.4
鄉鎮	銅鑼	南庄	頭屋	三義	西湖	造橋	三灣	獅潭	泰安
福佬	1.8	3.7	0.9	4.7	9.6	25.4	2.8	4.8	2.9
客家	94.5	85.9	98.5	92.3	90.0	71.4	96.4	91.6	46.6
原住民	-	8.4	-	-	-	2.5	-	1.8	48.8
其他	3.7	2.0	0.6	3.1	0.4	0.7	0.9	1.9	1.8

資料來源：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頁 244-6。

說明：

- 1、原始資料為陳紹馨、傅瑞德編撰，《臺灣人口之姓氏分布：社會變遷的基本指標》第一冊。
- 2、調查時間民國 45 年 9 月，單位為％。
- 3、若有超過 100%的情形則為 4 捨 5 入的結果。
- 4、黑體字為客家佔居優勢的鄉鎮，如：苗栗、通霄、頭份、卓蘭、大湖、公館、銅鑼、南庄、頭屋、三義、西湖、造橋、三灣、獅潭等 14 鄉鎮。



圖 2-6：苗栗縣閩客分布圖

資料來源：陳鸞鳳：〈戰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收於施雅軒等：《第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

由今人對清朝桃竹苗的開墾拓殖結果，和日治時期昭和 6 年(1931)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到民國 45 年(1956)的族系人口分布資料顯示，可以得到某些鄉鎮為客家人集中的區域，若以當地的學校設置、教育活動或升學表現等，足以當成客家人在教育上的表現與成果。雖然這些鄉鎮未必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聚居，而且日治的郡街庄與戰後的鄉鎮設置稍有出入，例如：戰後新設的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和苗栗縣泰安鄉等，這 4 個鄉在日治時期並未獨立設置，在民國 45 年(1956)時，也是原住民較多，閩、客人較少的區域，不屬於本論文討論的範圍，故可從略。至於其他客家人較集中的鄉鎮，如戰後桃園縣的：中壢、楊梅、龍潭、平鎮、新屋、觀音等 6 鄉鎮；新竹縣的關西、新埔、竹東、湖口、橫山、新豐、芎林、寶山、北埔、峨眉等 10 鄉鎮；苗栗縣的苗栗、通霄、頭份、卓蘭、大湖、公館、銅鑼、南庄、頭屋、三義、西湖、造橋、三灣、獅潭等 14 鄉鎮等。從日治到戰後的長時段中，都是客家人集中居住之地，因此這些地區的文教活動的推廣與表現，都是本論文要討論的範圍。

以 1920 年行政重劃後設置的新竹州為例，當時的地區包含今日的桃竹苗 4 縣市。由北而南分別為桃園郡、中壢郡、大溪郡，其中桃園郡各街庄皆為閩人居優勢，中壢郡則為客家人居優勢，大溪郡中的大溪街則閩人較多，龍潭庄則客家人為多，北閩南客分布的情形相當明顯。當時的新竹市即今日的新竹市，閩人為多，可略而不論。其中，新竹郡包括舊港(今竹北靠海部分)、紅毛(今新豐鄉)、湖口、新埔、關西、六家(今竹北靠山部分)、香山等庄，除了舊港、香山 2 庄外，其他各庄都是客家人過半之地，竹東郡則完全是客家人居優勢區。至於竹南、苗栗 2 郡，除了竹南、後龍、苑裡 3 庄外，其他各庄則明顯是客家人居優勢區。

表 2-5 日治新竹州時期客家人集中地

市郡名	市 街 庄 名	戰後的區劃
桃園郡	桃園街、蘆竹庄、大園庄、龜山庄、八塊庄	桃園縣(北部)
大溪郡	大溪街、龍潭庄	桃園縣(靠山)
中壢郡	中壢街、平鎮庄、楊梅庄、新屋庄、觀音庄	桃園縣(南部)
新竹郡	舊港庄、紅毛庄、湖口庄、新埔庄、關西庄、六家庄、香山庄	新竹縣(北部)
竹東郡	竹東庄、芎林庄、橫山庄、北埔庄、峨眉庄、寶山庄	新竹縣(南部)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
竹南郡	竹南庄、頭分庄、三灣庄、南庄、造橋庄、後龍庄	苗栗縣(北部)
苗栗郡	苗栗街、頭屋庄、公館庄、銅鑼庄、三叉庄、苑裡庄、通霄庄、四湖庄	苗栗縣(南部)
大湖郡	大湖庄、獅潭庄、卓蘭庄	苗栗縣(靠山)

出處：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

說明：1、新竹州設置於 1920 年直至戰後。

2、街庄名用粗體字者為客家人較多之地。

由表 2-5 的整理可以發現，閩客族群在分布上，桃園郡各庄皆為閩籍居優勢，而中壢、竹東及大湖等 3 郡全為客籍居優勢，其中又以中壢郡與竹東郡的發展程度與桃園郡較相近，為了有助研究客家人集中區對教育的發展是否有其特色，在資料可求時，即可以比較桃園郡與中壢或竹東郡的教育發展情形，以使客家教育的特色更能顯現。總之，對於這些客家人集中地區的認識，有助於往後各章在分析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傳統文教發展時，有具體的聚焦，以掌握客家地區教育的發展與特色。

第三章 學校教育

日治時期的學校設置與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依照第二章總督府相關人事與教育政策的制定，可依 1919 年〈臺灣教育令〉的頒布和 1937 年日本開始發動侵華戰爭等二件大事，將對臺灣的教育政策分成三個時期。

學校的設置實況，也依前後三個階段的教育政策，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

首先，為第一階段(1896-1918 年)，因剛殖民為了方便統治，設定教育目的為培育順民與基層統治者。這樣的設定，也奠定了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制度。於是殖民政府在臺灣廣設初等教育機構，以培育忠於日本母國的殖民地人民；又設置了相當於今日中等教育的國語學校師範部，以培育初等教育的師資及統治臺灣所需的基層人員。

其次，為第二階段(1919-1936 年)，為了因應初等教育學生增多後產生的升學需要，漸漸設立菁英式的中等學校；此階段也出現少數高等教育機構，其中最知名的便是 1928 年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即使第二階段已出現日臺共學的呼籲，可惜反而實質擠壓了臺人的升學機會，於是在學校的設置數量有限，又以少數日人為優先的情況下，少數較有資產與能力的臺灣人，會設法將自己的子女送到日本或中國等地去留學，以求得較佳的升學機會，其中又以留日為多。

最後，第三階段(1937-1945 年)，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在教育上的影響有：改日本姓氏、改初等學校校名為國民學校、推動國語(日語)普及運動等；實質上的影響則有：實業類型學校增多，青年團、國語傳習所等的推廣，使全民納入學習日語、堅實愛國精神的系統中。雖然啟動戰時體制，但教育機構的設置並未暫緩，反而增設了更多縮短年限的農林、理工、家政、商業實業等類型的職業學校，使升學的管道更形多元化。

以下將分成桃竹苗地區的教育機構概覽與關西地區學校的設立情形二部分來說明；而教育機構概覽部分，再分成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二節說明。在關西地區初等教育的設置情況說明完成後，再以該地畢業生的升學情況作結，以期呈現桃竹苗地區學校教育量與質的發展。

第一節 桃竹苗地區的初等教育機構概述

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除了依教育政策不同可分成三階段外，實際的教學情況也依日人、臺人、番人等種族不同，設計成三軌分類就學的教育系統。本研究以客家人的受教情況為研究對象，因此將偏重介紹臺人所受的學校教育型態，並舉客家人集中區的學校為例。桃竹苗地區雖為客家人較集中之區，但各郡街庄閩、客族群比例仍有不同。一般而言，自日治始桃園地區是北閩南客，新竹地區則靠海多閩靠山多客，至於苗栗地區則依交通路線，海線多閩、山線多客(詳情請見

第二章第四節)。大部分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以日人占多數，少數就讀的臺灣人，可能來自臺灣各地，很難分辨其閩、客籍，但是初等學校，或其附設的實業科、高等科等，仍有就近入學的特性，因此可依人口的閩客籍分布情形，配合第二章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口分佈及各地學校設置的情形，整理出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較多客家人就讀的學校。(詳見附錄二)

初等教育階段，日本人念的是「小學校」、臺灣人念的是「公學校」、原住民接受的則是「番人教育」，即使到後期強調日臺共學，但學校教育的實質內容也有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課表的差別。而中等教育階段，若是以升高等教育機構為主的中等學校多是日本人優先錄取，臺灣人大多只能念一些實業類科的職業學校。就算鼓勵臺灣人入學的師範學校，日本人也多有至公學校任教的，但在師資培育上，也有小學校與公學校的不同管道，以區分教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師資和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師資。其他差別待遇處處可見，實難一一細數。

本節將介紹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初等教育，第二節再說明中等教育的情形，至於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則尚未出現。另外在日治後期，為了全面普及日語，在各街庄廣設國語練習會、國語講習所或是簡易國語講習所等，及專為公學校畢業後留鄉青年所設的青年團，或是廣設博物館、公會堂等，各項與教育相關的活動或機構，則屬社會教育的範疇。雖然在日治時期，這些活動的實際參與或負責的人員，常常以各地公學校校長、教師為主，常被各校記錄於各校的校史中，但究其性質仍屬社會教育，將留第六章社會教育來討論。至於相當於公學校程度，且為公學校設置補充或競爭的書房，將留待第四章漢學推廣部分加以說明。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機構，按照設置機構的不同可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日本領臺初期所設置的國語傳習所時期；之後是〈公學校令〉公布後的公學校時期；最後則是皇民化運動開始後，統一學校名稱為國民學校時期。第一階段國語傳習所是日語教育或新式教育傳入的奠基期，因此國語傳習所畢業者日後常成地方行政或實業發展的重要人物，到了第二階段的公學校時期，初等教育日漸擴大，此時能升學或留學者，漸漸取代傳統的士紳，成為社會新興的菁英階級；但到了第三階段國民學校時期，雖已進入戰時體制，教育卻更形普及，但能升學者尚有限，若能升學者一般在光復後也能得到較佳的工作或地位。無怪乎今人吳文星言，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雖言為普及教育，實乃精英教育。¹茲依序說明各類初教機構的情形。

壹、 國語傳習所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最早設立的初等教育是芝山巖學務部學堂，於明治28(1895)年設置於八芝林街(今臺北市士林)，²後來雖被當地臺胞所毀，再復設。但是芝山巖學堂在臺灣新式教育的創設確有其代表性意義。首先，曾是臺北國語師範學校的學生，回憶學生時期到實習公學校的情況，即提到「教室前面掛著『六

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85。

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55-6。

士』老師的舊照片，呈現芝山巖精神為公學校教育的基本理念」³。其次，在石光公學校《學校沿革誌》的學年度大事中，出現了 15 次，該些年的 2 月 1 日皆記有舉行芝山巖學堂的紀念訓話或遙拜式，即使每年因記載者的不同，使得每年的重大行事記錄皆稍有差異。⁴由其出現的活動紀錄，應可視為重大節日，而斷定芝山巖設學在日本殖民政府推廣教育的關鍵地位。

除此之外，日治初期也設有教授日語以培養通譯人才的語言學校，像臺北縣立日本語學校和基隆、宜蘭、新竹支廳等設立的語學校。⁵其中，新竹支廳於明治 28 年 11 月 21 日，也在竹城學館招收 15 歲以上、25 歲以下，共 22 名的學生，經過 6 個月的日語訓練後，分派各地警察、憲兵隊、國語傳習所等擔任通譯，後於國語傳習所成立後乃廢。⁶因其設立的地區，主要在新竹市區，客家人多集中在現今的竹東、湖口等地⁷，故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較低，但實況仍待查考。

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各地廣設初等教育機構，乃自國語傳習所起。一般國語傳習所招收的學生可以分成甲、乙兩科。甲科招收 15 歲以上 30 歲以下，已有基本的漢學基礎者，主要是希望在接受半年的日語讀書、作文後，⁸儘速培養統治所需的通譯人才。畢業後，甲科畢業生可得到就業保障，並授與「秀才」的尊稱，⁹以獎勵地方的士紳階級入學，為殖民政府所用。

乙科的招生較年幼，預定招收 8 歲以上 15 歲以下，接受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等，修業年限 4 年，且可依各地情況選設地理、歷史、唱歌、體操一科或數科，若有女學生則可加設裁縫。¹⁰甲乙兩科的招生對象及修習內容不同，乙科較接近今日初等教育，是以培養良好的國民為目的。為了提高乙科學生的出席率，各校亦設有一些獎助學金的優待，但是依上級視察時仍要借用當地書房學生的情況以為應付，¹¹可見初期招生情況並不順利，卻是各地初等教育的開始。

只是國語傳習所的設置，主要是因應初期接收臺灣的情況所設，維持的時間甚短。最早設置的機構是明治 29(1896)年 7 月的臺北國語傳習所，後來全臺各地陸續開設，直至明治 31(1898)年 7 月「公學校令」公布後，除澎湖、恆春、臺東

³ 屋錦正統(1932 年演習科畢業)：〈北二師的回憶(北二師の思い出)〉，收於劉漢初主編：《滋蘭集--北師壹百週年紀念文錄》(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學院，1996 年)，頁 61。

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部分編頁碼。由於沿革誌非一人一時所記，乃是每學年度的用毛筆增補的重要大事記，內容繁簡不一，重要記事，記自大正 2 年起，至昭和 19 年度止。在大正 9 年度(頁 40)、昭和元年度(頁 72)、2 年度(頁 85)、4 年度(頁 148)、7 年度(以後無頁碼)、8 年度到 16 年度(記在 1 月 31 日)、18 年度等學年度的記事，皆記有學校舉辦紀念芝山巖的相關活動。在總共 33 年度的記事中出現 15 次。

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58-162。

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63。

⁷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18-9。謝水森先生：日據時期前後以閩南語為主，海線南自竹南，北到竹北，還有新豐靠海邊的部分，都是閩南語為主，竹東湖口都是客家人，早年我是擔任保甲書記，相當於現在的里幹事兼辦戶口，譯前(火車站)派出所工作，我是最後一任的保甲書記，對人口遷移因經辦過比較瞭解。光復後，新竹市才有客家人漸漸搬進來。

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68。

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79。

¹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69。

¹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79。

外，陸續結束，直接改設為公學校，各附屬分教場(分校)，也多獨立成為公學校。¹²而在公布前，又另外設置了 47 所分教場，¹³可見擴建速度之快。

明治 29 年(1896)全臺共設有 14 所國語傳習所，其中 2 所設於新竹、苗栗，¹⁴往後並以這些國語傳習所為中心，在全臺各地區陸續增設分教場。位於新竹的國語傳習所，另外增設有新埔、中港、北埔 3 個分教場，其中明治 30(1897)年 12 月 24 日增設新埔分教場，次(1898)年 3 月 12 日增設北埔分教場。¹⁵此二分教場皆位於客家人聚居之地，所招生徒應以客家人為主。

至於苗栗的國語傳習所，所在處也位於客家人聚居之區，其下另設的 3 所分教場，如大甲、後龍街、苑里等地，¹⁶則位於閩人較多之區。今日的桃園地區，只有在桃仔園(今桃園)、大嵙崁(今大溪)2 地設有臺北國語傳習所的分教場，後來皆改設成公學校，是較早設立的公學校。¹⁷但桃仔園、大嵙崁 2 地則以閩人為多，故不納入本文討論。

雖然桃竹苗地區的國語傳習所及其分教場總共設置 10 處，但只有 3 處位於客家人居住地，分別為新竹國語傳習所的新埔和北埔分教場，及苗栗國語傳習所等 3 處。考量日治時的交通與地緣關係，客家人較可能至三地就近入學。可惜在已知的傳習所畢業名冊上，並沒有將傳習所及分教場的名單分開，增加閩客籍判別上的困難，只能透過畢業生名冊上人名的事功與居住地，核對出可能是客籍的菁英分子。而且依照畢業冊中人名名的探究可知，新竹國語傳習所在未設新埔或北埔分教場之前，已有多位客家人就讀，並不限於新埔或北埔分教場。至於畢業於苗栗國語傳習所是否皆是客家人，也就未必。但考量到就近入學，因此以下將扼要介紹新竹國語傳習所及其附設的新埔與北埔分教場，及苗栗國語傳習所的招生成果及畢業生情況。

一、新竹國語傳習所

新竹國語傳習所(今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創於明治 29 年(1896)3 月 31 日，設於新竹街西門的明志書院，9 月時的明志書院被日軍徵用為醫院，曾借用鄰宅楊溪水先生的房宅為校舍。¹⁸並在桑原戒平所長任內招募有甲科生 72 名、乙科生 58 名，共招有 130 名學生，於同年 11 月 21 日開課。¹⁹雖然共招得學生 130 名，但畢業生名冊顯示，「第一期」有 41 位畢業生，「第二期」則有 45 名畢業生，共

¹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1-2，國語傳習所一覽；同前書，頁 242-7，公學校設立。

¹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1-2，國語傳習所一覽。

¹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67。當時，全臺設置的 14 個國語傳習所分別為：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臺中(位在彰化)、鹿港、苗栗、雲林、臺南、嘉義、鳳山、恒春及澎湖島等。

¹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1

¹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2。

¹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1；桃園廳編：《桃園廳志》，頁 226、227。

¹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4-185；洪六：《新竹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1998 年)，頁 22。

¹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4。

培育了 86 名畢業生。²⁰畢業生名單，詳見表 3-1。

表 3-1 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

第一期(明治 30 年)			第二期(明治 31 年)甲科		
編號	姓名	備註	編號	姓名	備註(畢業年齡)
1	鄭蘭汀		1	吳成	(29.9)
2	張雨溪		2	徐瑞興	(21.7)
3	謝介石	閩	3	李雲盛	(19.9)
4	陳啓泰		4	連培	(25.4)
5	林清楊		5	陳雲如	(23.5)
6	黃瑞軒		6	黃戒三	(18.3)
7	黃世元		7	黃濤	(20.11)
8	郭世昌		8	蔡煌	(22.1)
9	林文瀾		9	周莊臨	(30.5)
10	林思永		10	吳穎臣	(16.1)
11	羅祿		11	葉心榮	新埔庄長、大新吟社、客 (17.5)
12	何水治		12	鄭邦景	(20.1)
13	古火旺	1899 國語學校國語部畢	13	鄭蘭	(19.8)
14	郭東海		14	陳子昌	(20.8)
15	洪火炎		15	林孔昭	大新吟社、客(21.9)
16	黃水來		16	劉金波	1901 國語學校國語部畢 (17.4)
17	林德峻		17	宋吳祥	(15.8)
18	胡祥泰		18	鄭軒蚶	(22.1)
19	葉開榮	咸菜壩庄清末官吏、客	19	林樹榮	(20.1)
20	翁龍		20	林德坑	(21.4)
21	洪崇三		21	鄭昌	(22.1)
22	魏煥南		22	鄭鳴琴	(20.8)
23	范姜開望	新屋庄、客 1899 國語學校國語部畢	23	劉金標	楊梅庄助役、庄長、客(17.4)
24	賴永清		24	黃連添	(20.6)
25	余耀宗		25	鄭立	(28.1)
26	蘇萬宗		26	劉清貴	(17)
27	陳灶生		27	陳應	(25)

²⁰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6 號，明治 31 年 5 月 14 日，〈新竹國語傳習所卒業式報告〉；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臺中：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第 4-6 頁。

表 3-1 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續)

28	張采香		28	鄭邦爐	(21.7)
29	陳清渠		29	王石鵬	臺灣三字經、詩社、閩(19.11)
30	林如翰		30	官德燕	(19.4)
31	傅杏興	1899 國語學校國語部畢	31	林德利	(25.8)
32	范姜羅	新屋庄、客	32	陳謝巖	(30.5)
33	莊玉磷		33	翁星彩	(28.4)
34	古雲梯	樹杞林保正、區庄長、客	34	張炎/炙	(23.6)
35	鄭夭桃		35	翁林耀	(19.8)
36	林澄玉		36	蔡清琳	北埔事件發動者、客(16.6)
37	陳泉		37	周國珍	(33.5)
38	謝阿蘭	謝金蘭、咸菜棚庄長、客	38	范新順	(21.6)
39	曾錦鏞		39	張振輝	(25.5)
40	蔡清和		40	黃秋源	(22.1)
41	鄭慈王		41	鄧福運	(18.1)
		--	42	陳俊士	(23.4)
		--	43	賴琳秀	(18.5)
		--	44	周國香	(20.1)
		--	45	梁逢盛	(23.4)

說明：粗體字為客家人。

資料來源：

- 1、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年7月-1898年10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第4-6頁。(依南投國史館臺灣分館臺灣總督府資料檢索整理)
- 2、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69。
- 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畢業校友名冊(網頁資料)，1899年國語學校國語部。

(一)客籍畢業生舉例

雖然要在新竹國語傳習所的畢業生名冊中，將人名一一考究分辨其閩、客籍頗有困難，但仍可找到許多客家人就讀的證據。

首先，新屋的特殊姓氏「范姜」家族²¹，就見到范姜羅、范姜開望2位²²，此2人不但是客家人，而且是日治時期首先代表范姜家族接受殖民政府的新式教

²¹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33、頁41依范姜氏族譜說明范姜氏起源乃是感念范氏血脈及姜姓繼父恩情所形成的複姓。清代臺灣為開墾社會，維繫血統十分不易，為了繼承父系血脈常有寡母攜幼子改嫁或招贅以維繫家族的情況。

²² 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年7月-1898年10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第4-5頁。

育，使范姜家族能在新屋地區興盛不被取代的原因。²³ 范姜羅為日治初期即授佩紳章的范姜騰之子，范姜騰並捐地設立新屋區首座公學校：楊梅壠公學校新屋分校，在明治 38 年(1905)分校設立後，范姜開望即成該校的雇員。²⁴ 范姜羅於國語傳習所畢業後，繼續至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學。並於明治 41 年(1908)起，開始擔任楊梅壠公學校新屋分校的訓導。²⁵ 此後，范姜羅繼其父之後擔任新屋庄長期間，不但拔擢范姜子弟也多提拔畢業自新屋分校的學生至新屋庄內擔任行政人員。²⁶ 前引張秀琪論文的重點放在范姜家族日治時期在新屋地區的發展，但透過她對該家族及地方子弟教育的探討，可知此舉不但奠定家族的地位，也能促使地方發展的例子。後文關西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中，亦可發現類似的例子。

第二位葉開榮，是新竹國語傳習所第一期生²⁷。他青少年期多次回廣東祖籍拜師學藝，是聞名全臺之中醫及地理、擇日權威，30 歲即任臺北府大嵙崁總局咸菜礮撫墾分局總理，從 1891 年至 1895 年。日人領臺後仍予留任，並進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結業後曾至宜蘭投資樟腦及墾地組合頗成功，可惜被洪水沖沒，又轉至金瓜石開金礦亦失利，乃退隱芎林飛鳳山寺為主持。²⁸ 葉開榮原為晚清的地方管理階層，透過受國語傳習所的教育，轉而成為日治初期的實業家。

第三位謝金蘭，家住大旱坑庄(今關西鎮東平里)，家族原為小東坑一帶的中產之家，於 10 歲接受書房教育，至 1895 年 17 歲時，因臺灣被日本人統治改往新竹國語傳習所學習日文。2 年後畢業，被任命為新竹縣的警吏，1899 年又升臺北縣的巡查補。1901 年時受雇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在臺北一帶進行土地調查的工作，到了咸菜礮支廳成立後，1902 年 9 月又被任命為桃園廳咸菜礮區街長。²⁹ 於街長任內並編成《咸菜礮沿革史》³⁰ 傳世。這樣的學、經歷發展使他有機會累積聲望、擴展人脈，1908 年時即與陳耀樞、郭壽三等人合組「咸菜礮興業公司」，投入樟腦、造林等山區事業的經營等，³¹ 並於 1915 年獲得總督府頒發紳章，1920 年地方行政制度調整，轉任街庄協議員。³² 謝金蘭所以能晉升地方上的士紳階級，除了本身的能力外，接受過國語傳習所的教育，應是使其向上流動的關鍵因

²³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 75，引述范姜後人范姜雨秋所述。

²⁴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 73-76。

²⁵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 74-77。

²⁶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 78。

²⁷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頁 4。

²⁸ 羅慶武：〈關西鎮之開拓及歷代首長略傳〉，頁 267，收於呂順安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265-270。

²⁹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1916 年)，頁 119；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13-114；陳志豪：《機會之庄--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新竹：竹縣文化局，2010 年)，頁 149；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頁 5，錄有謝阿蘭之名，即可能為謝金蘭；羅慶武：〈關西鎮之開拓及歷代首長略傳〉，頁 267。

³⁰ 謝金蘭編、新竹文獻委員會譯：《咸菜礮沿革史》(新竹：竹縣文獻會，1953 年)，手書稿，無頁碼。

³¹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13；陳志豪：《機會之庄--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149。

³²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13；陳志豪(2010)，《機會之庄--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150。

素之一。

最後在甲科生的畢業名冊中，也見到後來成為新埔大新吟社主將的葉心榮與林孔昭 2 人之名(詳見第五章第二節大新吟社)。³³葉心榮在結業後，不但受任為辦務署通譯，且於昭和初年任新埔庄長，最後於昭和 9(1934)年死於庄長任上。³⁴葉氏可以晉升為庄長的關鍵助力，應與曾在國語傳習所受教有關。

由以上例子可知，日治初期設置的國語傳習所，的確為地方基層培育了早期統治所需的通譯及管理人才，也儲備了後期統治地方所需的行政人員。

依設置區域判斷，雖然當時新竹國語傳習所設於以閩人為主要的新竹市區，但仍可由畢業生的籍貫、成就等資料，找出客家人就學的代表。

(二)客家庄分教場舉例

以下分別介紹新竹國語傳習所下，新埔分教場與北埔分教場的設立情況。

新埔分教場的創立，依今人校史記錄，是明治 31 年(1898)3 月 29 日設於新埔文昌廟，招收一年級學生 39 人(即乙科生)，速成科學生 18 人(即甲科生)。³⁵當時的校長為山崎準繩，於明治 35 年(1902)記有〈新埔公學校創校記〉一文，詳記了創校於文昌廟之艱辛，文中亦提到學校設於「戊戌春時」，即明治 31 年(1898)春。³⁶運作時間甚短，同年 10 月 1 日即改設為新埔公學校。³⁷若以甲科生只需半年的受教時間而言，應可培育出畢業生，可惜未見到相關的畢業名冊。

北埔分教場的創設，依今編校史所記，設於明治 31 年(1898)5 月 1 日，當時的學區甚大，包括樹杞林(今竹東)、橫山(庄)、沙坑(區)、九芎林(今芎林)、月眉(今峨眉)、新城、草山(今寶山)及北埔等街庄。³⁸剛開始招生時，由於日人據臺未久，就學人數甚少，至 5 月 20 日尚無法開學，於是將頗有聲譽的邱芝汀在自宅辦理的亦樂書房學生 50 多人，全部讓出，納入分教場就讀，合計學生 80 多人。³⁹可見當時日人以強迫入學方式，使得招生才成功，可惜未見畢業名冊，不知在改制為公學校前是否有畢業生。

³³ 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第 4-5 頁。

³⁴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編輯：《新埔鎮誌》(新竹：新埔鎮公所，1997 年)，〈人物誌〉，頁 463-464，光緒 7 年(1881)生於照門農家子弟幼聰慧，17 歲時畢業於新竹國語傳習所甲科，成績優異，7 月即任職新埔辦務署，明治 33 年轉任三角湧(三峽)辦務署，34 年派至桃園廳，38 年任命桃園通譯，42 年囑託以農會事務，大正 8 年(1917)轉新竹州郡役所服勤兼通譯，大正 12 年(1923)授以勳八等勳章，同時任命為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乙種試驗委員，13 年(1924)6 月任命為地方學習會講師，7 月辭去所有本官兼官，專心任新埔庄長，至昭和 9 年(1934)積勞逝於任內。

³⁵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埔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專刊》(新竹：新竹縣新埔國小，1998 年)，頁 26，學校沿革。較《臺灣教育沿革誌》所記的明治 30 年(1897)12 月 24 日，晚 4 個多月，可能是公文書准予設立，與實際設立之間所產生的落差。

³⁶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埔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61。

³⁷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埔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6。

³⁸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新竹：新竹縣北埔國小，1998 年)，頁 35，〈沿革概要〉。校史中記載的設立時間亦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11 所記的時間晚 1 個多月。

³⁹ 邱鴻章、邱鴻章：〈我的祖先和母校之緣〉，頁 156。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56-157。

因為同年 10 月 1 日北埔分教場業經上級核准，改設為北埔公學校。⁴⁰由於國語傳習所分教場之名設立的時間甚短，隨即改設為公學校。於是在歷屆畢業校友名冊中，另列有速成科三屆的畢業生，分別畢業於明治 32 年(1899)3 月的姜振乾、姜紹猷等 10 名、明治 34 年(1901)的何乾榮等 3 名，最後是明治 36 年(1903)的姜瑞昌等。⁴¹由於是國語傳習所向公學校的過渡，因此造成畢業生究竟屬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歸類上的困難。

例如速成科第一屆(1899 年 3 月)畢業的姜振乾，⁴²明治 37 年(1904)時曾與其他 22 位地方士紳共捐 273 圓 32 錢，編入北埔公學校財產。⁴³依其在校史記事上位列第一，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果然在 1916 年編成的兩本人物傳記：《臺灣人物誌》、《臺灣列紳傳》上，都可查到姜振乾之生平，只是內容詳略及偏向上稍有出入，入選的原因可能是他當時被聘為「新竹廳參事」。《臺灣人物誌》中記錄，他不但是地方豪農，也曾任新竹製腦株式會社取締役、中港製材株式會社監查役、臺灣殖產株式會社監查役，及北埔埤圳聯合會管理者等，於 1911 年開始擔任新竹廳參事，另外也任北埔公學校學務委員、日本赤十字社特別會員等，年納稅額 5000 圓。⁴⁴《臺灣列紳傳》則另外提到其資產約 20 萬圓，並曾授佩紳章等。⁴⁵可是這兩本書對姜振乾畢業的學校有不同的見解。首先，臺灣總督府編成的《臺灣列紳傳》，將其列為「國語傳習所卒業甲科生」。大園市藏編的《臺灣人物誌》，則依公學校已成立之事，將其列為「北埔公學校速成科畢業」。⁴⁶會有畢業自同一單位，卻有兩種記法的原因，在於速成科本來的招生目的及課程內容即同於國語傳習所甲科，但其畢業時間為北埔公學校成立之後，因此又被列為公學校畢業生。可見是一種名實之爭下，分採不同觀點的結果。⁴⁷就公學校已經設置而言，當列入公學校畢業生為佳。

另一位與姜振乾同為速成科第一屆畢業的姜紹猷，較姜振乾年長 8 歲，也是北埔庄的地主富戶，幼時曾受教於彭裕謙秀才與塾師梁元，至明治 32 年(1899)授佩紳章時，身家更達 30 萬圓。⁴⁸而在北埔校史的紀錄中，除了在明治 37 年(1904)7 月 4 日的記事，見到姜振乾的捐款紀錄外，同年 7 月 10 日的記事上也見到姜紹猷為首 5 名的捐款紀錄。⁴⁹由此可見，在國語傳習所的設置與公學校的設置雖有名稱或法令的變革，但在教育活動具延續性而無法截然二分。於是地方士紳也把握住新式教育機會，拿到進入新時代菁英階層的門票。

⁴⁰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5，〈沿革概要〉。

⁴¹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223，〈歷屆校友名冊〉。

⁴²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223。

⁴³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40。

⁴⁴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 140。「取締役」、「監查役」皆類似於今日之「監事」。

⁴⁵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30。

⁴⁶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 140。

⁴⁷ 這也是為何在今人游馥璋的碩士論文「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之名冊」中未見到姜振乾之名，因其本不是國語傳習所的畢業生，卻又在同論文「附錄四：畢業生之職業調查」中，見到該論文依《臺灣列紳傳》資料，將其列為國語傳習所畢業生代表的原因。

⁴⁸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34。

⁴⁹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40。

二、苗栗國語傳習所

苗栗市街本為客家人集居之區，應有更多的客家人接受了國語傳習所的教育，可惜個人事功不顯，資料待補。以下將介紹苗栗國語傳習所設立的情形。

苗栗國語傳習所設於明治 29 年(1896)9 月 1 日，於 15 日正式開課，位於社寮崗的褒忠亭(今苗栗市北苗里義民廟)。⁵⁰創設時的所長橫堀三子頗積極招生⁵¹，開學時，採用各種方式吸引學生入學。首先，是會場布置相當隆重、各處國旗飄揚；由所長宣讀「教育勅語」，並由僱員加以翻譯；更精彩的則是教師於開幕活動中進行化學酸鹼試紙試驗、幻燈片的播放等新式教學法，藉此感動與會者，並吸引學生入學。⁵²總之，招生成果頗佳，不但甲科生招生額滿，乙科生也有 36 名。⁵³另外在今人出版的校史中，對乙科生的記載稍有出入，少了 4 人，但詳載各年級的人數，一年級男生 21 人，二年級男生 1 人，三年級男生 10 人，合計 32 人。⁵⁴可見學生在實際入學後，仍可能流失，畢業人數皆較入學人數少。

其中具儒學基礎的甲科生，為收倡導之效，在招生條件上更寬。例如當地士紳吳朝宗雖已 33 歲，在地方具有一定的財力與名望，即在學務部長特許下准予入學，以起倡導入學的作用。⁵⁵另外，也有塾師黃淡梅、廖水石等在開學日帶著書房的生徒一起入學。⁵⁶其中，黃淡梅在第一回受訓畢業後，於次年(1897)，即留在苗栗國語傳習所擔任雇員。⁵⁷至於實際的畢業生，1897 年有甲科生 32 名，1898 年 10 名，未記畢業年 16 名，共 58 名。⁵⁸同年 10 月，由早間恆擔任首任校長，到次年(1898)10 月 1 日，《公學校令》公布後，即更名為「苗栗公學校」。⁵⁹

整體而言，無論是新竹或苗栗的國語傳習所畢業生，都較招生時的人數少，可見學生有流失的情形。但是在短短 1、2 年之內，國語傳習所也為桃竹苗地區培育了上百位統治初期急需的通譯人才，不但有助於殖民政府進行接收與管理的工作，也將日式初等教育的種子在桃竹苗地區播下。雖然我們無一一得知這些前往受教者的意願、心態或背景為何？可以確定的是：無分閩客籍，皆在此風潮巨

⁵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5；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苗栗：苗栗市建功國小，2006 年)，頁 105。「褒忠」是清代嘉獎義民所頒，後來演變成客家區特有的義民信仰，且在各地形成以公廟為中心的祭祀圈。

⁵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4。

⁵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5-6。

⁵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85。

⁵⁴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10。

⁵⁵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10。但在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頁 6-8 的名冊中，雖有多位吳姓的學生，但未見到「吳朝宗」之名，不知是未畢業或是另有他名。此外，以畢業名冊中苗栗地區有年齡紀錄者，年齡最小的是 17 歲，最大的尚有至 36 歲者，且 2、30 歲者並不少見，可見年齡並未限制學生是否能就讀。

⁵⁶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10。但在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頁 6-8 的名冊中並未見到廖水石之名，但有廖石水之名，不知何者為誤。

⁵⁷ 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頁 6。

⁵⁸ 游馥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頁 6-8。

⁵⁹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5。

變中同受薰染。而且這些搶先接觸到新式教育者，稍後也大多成為日治時代地方上的新菁英分子。這些特性就顯現客家人是一個很獨特的族群，移民的適應性超強，對於學習強勢語言也不會排斥，但又固執的保有某些傳統的文化與價值觀，所以對應新的殖民政權時，看似快速接受移植的語言、文化，同時卻又固執的保持某些傳統的價值與語言。

貳、公學校

為了普及日語，散布在全臺各地的國語傳習所雖能收到不錯的效果，但在公庫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推展更全面的教育，隨即公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自籌經費的方式設置公學校，因此最早設置的公學校皆以地方名為校名，且多從國語傳習所及其分教場改設而來。⁶⁰明治 31 年(1898)10 月 1 日調查時，臺北縣有 21 所、臺中縣有 17 所、臺南縣有 14 所及宜蘭廳有 3 所等，全臺共計設置了 55 所公學校。⁶¹往後公學校的設置一直穩定增加。公學校初設時，沿續傳統的書房數量仍遠大於新式學校，但書房的生徒漸漸流失，就如苗栗國語傳習所設置時一般，在殖民政府的鼓勵或強迫下，書房的生徒一直流向公學校。書房的教育功能與重要性，漸漸被公學校教育所取代。書房與學校的消長，詳見第四章漢學推廣部分。

明治 31 年(1898)〈公學校令〉公布後，各地陸續廢止國語傳習所，改設公學校，新竹、苗栗也在第一波 13 個廢止名單中，只保留了較偏遠地區的恆春、臺東、澎湖島等地的國語傳習所。⁶²因為各地傳習所廢止的情形不一，所以各地設置公學校的時間也不一致。前述這些在桃竹苗地區所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及其下的分教場，自然成為此區最早設立的公學校。原屬於臺北國語傳習所的桃仔園、大嵙崁分教場，分別改設為桃仔園、大嵙崁等公學校；新竹國語傳習所及其下的分教場，分別獨立為新竹、北埔、中港、新埔等公學校；苗栗國語傳習所及其下的分教場則獨立為苗栗、大甲、苑里、後壠等公學校。⁶³以上在桃竹苗地區最早設立的 10 所公學校中，有 3 所位於客家人聚居區，分別為：新埔(今新竹縣新埔國小)、北埔(今新竹縣北埔國小)與苗栗(今苗栗縣建功國小)等 3 所，此 3 所公學校即是桃竹苗地區客家庄最早設立的公學校。以下將依各校百年校史所述，將各校設置情況，簡述如後。最後，並補述桃園郡與中壢郡、竹東郡的學生就學情況比較，以比較閩客族群對初等教育的推廣情形如何。

一、新埔公學校

新埔公學校的前身，即為新竹國語傳習所新埔分教場，明治 31 年(1898)3 月 29 日，同年 10 月 1 日即改名為新埔公學校，在新埔的文昌廟上課，學區包括當

⁶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43-7。

⁶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44-7，公學校設立統計。

⁶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02。

⁶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44-5。

時的竹北二堡第一、二、三區(今新埔、照門、湖口)。⁶⁴此校與北埔公學校同為新竹地區最早設立的公學校。

隨著學生日多，文昌廟實在狹窄，不敷使用，到了明治 35 年(1903)由地方士紳，如廳參事范慶霖、街長潘作霖、庄長吳秀鳳、范獻廷、紳士蔡緝光、潘成鑑、詹際清，及學務委員藍華峰、曾維英等向新竹廳長提出申請，地方籌得 2,800 多圓，及中央補助 563 圓下，在新埔街東集義亭左側，⁶⁵興建磚柱土牆瓦頂的教室 4 間、宿舍 1 棟及運動場等，至同年 11 月 11 日，遷至新校舍(現址)並舉行落成典禮。⁶⁶隨著新式教育的推廣普及，在原屬新埔公學校學區內，漸次設立其他的分教場或公學校。

最早成立的是 1909 年 5 月的大湖口公學校(今新竹縣湖口國小)；之後 1917 年成立照門分教場，並於 1921 年獨立(今新竹縣照門國小)；其次則是 1923 年在本校設置高等科，並成立枋寮分教場，6 年後亦獨立成枋寮公學校(今新竹縣枋寮國小)；最後，1942 年因應義務教育的推廣，改校名為「新埔旭國民學校」，並成立光復前最後一個分校「南分教場」(石頭坑，今新竹縣寶石國小)。⁶⁷在行政區劃上，除了大湖口公學校於 1920 年後另屬湖口庄，其他各校皆位於新埔庄。於是新埔地區的公學校，即以新埔公學校為首開始發展。例如：昭和 6 年(1931)3 月 14 日在新埔公學校舉辦全郡的國語演習會；⁶⁸昭和 6 年(1931)10 月 4 日在新埔公學校辦全郡的聯合體育會；⁶⁹昭和 8 年(1932)3 月 12 日又是在新埔召開國語演習會；⁷⁰昭和 15 年(1940)新竹郡教育會總會即在新埔公學校召開；⁷¹石光公學校畢業的校友回憶其兒時在新埔公學校舉行的全郡網球運動會中獲得全郡第二名的殊榮⁷²等。由此可見，較早設置的新埔公學校，在臨近地區的公學校教育推廣上，具有領頭而行的重要性。

二、北埔公學校

明治 31 年(1898)5 月 1 日設立的新竹國語傳習所北埔分教場，其學區曾占了新竹地區的一半以上，但維持時間甚短。同年的 10 月 1 日即經奉准改設為北埔公學校，由教諭宮得三代理校長，並借慈天宮作為臨時校舍，學區與分教場學區相同。⁷³同年 12 月樹杞林(今竹東)、九芎林(今芎林)、月眉(今峨眉)分別設立公學

⁶⁴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7，學校大事記；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記設於明治 31 年 4 月。

⁶⁵ 山崎準繩：〈新埔公學校創校記〉，1903 年，收於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61。

⁶⁶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6，學校沿革。

⁶⁷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6。

⁶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70，昭和五年度。

⁶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

⁷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

⁷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四年度，主要行事，昭和 15 年 2 月 4 日記事。

⁷² 2012 年 8 月 16 日陳双錦口述。

⁷³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陸--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5，學區同為樹杞林、橫山、沙坑、九芎林、月眉、新城、草山及北埔等街庄。

校，校區因此縮小。⁷⁴ 另外並於大正 5 年(1916)設立草山分教場，至大正 10 年(1921)升格為草山公學校；同年 4 月 24 日又設立南埔分離教室，至大正 13 年(1924)4 月 1 日停辦南埔分離教室，並同時創設高等科。⁷⁵ 此後學校穩定維持了頗長一段時間。至昭和 16 年(1941)更名為北埔國民學校；最後在昭和 18 年(1943 年)成立日治時期最後一所分校「大坪分教場」。⁷⁶

北埔公學校創校後，學級、教師與校舍建築等皆緩慢增加。創校時學級數一，教職員數共有兩人，其中一人為日人教諭，是兼代理校長宮得三，另一人為由塾師轉任雇員的臺人梁元。⁷⁷ 設校次年，學級數增加為二，日人教諭和臺灣人雇員皆增加為二人，新增雇員為彭裕謙秀才，且 3 月時，有了速成科第一屆畢業生 10 名。⁷⁸ 明治 34 年(1901)有速成科第二屆何乾榮等 3 名畢業生，2 年後(1903)尚有速成科第 3 屆畢業生 1 名姜瑞昌。直到明治 36 年(1904)後，始有郭泉興等 5 名本科生畢業。⁷⁹ 剛開始招生時，由於日人據臺未久，就學學生甚少，至 5 月 20 日尚無法開學，如前述於是將邱芝汀在自宅辦的亦樂書房學生 50 多人，納入分教場就讀，合計學生有 80 多人。⁸⁰ 將書房的學生轉入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就讀，在日治初期是屢見不鮮的事。例如：前文提及的苗栗國語傳習所開學時，塾師黃淡梅、廖水石攜生徒一同入學；此處北埔公學校將邱芝汀亦樂書房 50 多名學生納入分教場就讀；下文將提及咸菜礮公學校的石崗仔分教場創設初期，分校主任亦在學區內的各書房奔波招生。由此可見，書房生徒轉入學校為學生，是各校創設時重要的學生來源。而且能入書房受教者，大多是家境較佳，至少有空閒讓子女就學，家長對子女受教育亦有一定的能力與意願。

三、苗栗公學校

苗栗公學校(今苗栗縣建功國小)是從「苗栗國語傳習所」改制而來，是苗栗地區最早成立的學校。苗栗國語傳習所設立於 1896 年 9 月 15 日，次年 10 月派日人早間恆為首任校長。⁸¹ 至 1898 年 10 月 1 日〈公學校令〉公布後，苗栗國語傳習所即更名為「苗栗公學校」。⁸² 次年(1899)並附設「小學科」，專收日人之子女就讀，直到次年 4 月廢止，另設「苗栗小學校」。⁸³

⁷⁴ 不著撰者：〈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大事記〉，頁 38，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8-47。

⁷⁵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4。

⁷⁶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4。大坪分教場到光復後，民國 35 年(1946)9 月 1 日才獨立為大坪國民學校。

⁷⁷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5，沿革概要、頁 53，歷屆教職員一覽表、頁 166-7，梁元曾孫謝志榮撰：〈北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祝詞--兼簡述我家與學校〉一文。

⁷⁸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5。

⁷⁹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35、頁 223。

⁸⁰ 邱鴻章、邱淮章：〈我的祖先和母校之緣〉，頁 156，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56-157。

⁸¹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5。

⁸²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5。

⁸³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5。

值得注意的是，女童要在設校 10 年後才進入學校就讀，而且初入學時，男女比例相當懸殊。苗栗公學校 1903 年 3 月首屆畢業生只有 2 名，皆為男性，一直到 1908 年 4 月初才有女生 5 人首度入學，同年入學男生有 86 人。⁸⁴直到 9 年後，1917 年才有 2 名女生畢業，⁸⁵依就學 6 年推斷，最早入學的 2 名女生可能中途即退學了。可惜今人出版校史初等科第 1 屆至第 12 屆的畢業生名冊從缺，往後各屆的畢業名單亦不完整，因此無法追查人名及其事功。⁸⁶苗栗公學校位於市區，按入學者眾，可見應對新式教育較能接納，而且日治時苗栗亦有女性受教書房的記載(見第五章第二節漢學推廣)，為何男女性就學比例如此懸殊，女性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如此之遲，值得注意。

此後，苗栗地區即以苗栗公學校為創設起點，先在學區內依各地方所需設立分教場，再獨立成公學校。首先，1915 年設立「四湖分教場」，1918 年獨立，稱「鴨母坑公學校」(今西湖鄉西湖國小)；其次，1916 年設立「頭屋分教場」，1920 年獨立為「頭屋公學校」(今頭屋鄉頭屋國小)。⁸⁷大正 12 年(1923)4 月附設二年制高等科，招收公學校畢業生經考試入學，但日人優先，2 年後，高等科首屆畢業典禮，畢業生男 37 人，女生 11 人。最後，於 1930 年改校名為「苗栗第一公學校」，同時並另分出學生成立「苗栗第二公學校」(今苗栗縣大同國小)。⁸⁸而不能免俗的，於 1941 年依〈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第一公學校改名為「苗栗東國民學校」，第二公學校改名為「苗栗南國民學校」。⁸⁹

由以上 3 校的創設過程，可以發現：直接創設公學校或分校，有不同的條件；各校設立高等科的時間相當接近；創校前期各校學生或畢業生皆男多女少；各公學校的校長皆為日人。

首先，最早設立的公學校，其學區含蓋不同的行政區，通常不同行政區會直接另外創設公學校。如：新埔公學校初設時因橫跨至不同行政區，故 1909 年時，於湖口另創設大湖口公學校。此外，北埔公學校因沿續國語傳習所設立，涵蓋的學區太廣，跨多個行政區，故明治 31 年(1898)改設為公學校的年底，即在原學區內的其他三個行政區，另創設樹杞林、九芎林與峨眉等 3 所公學校。

而該行政區內首設的公學校，後來幾乎成為該行政區內推廣學校教育的核心學校，為了方便學生入學，大多設於該行政區較繁華之處，此後陸續創設其他分校或分離教室，待分教場發展至一定規模後，再依各地的情況加以獨立。至於各分教場是否獨立，除了學生人數外，地方是否有足夠的財力、土地以捐建學校，

⁸⁴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6。

⁸⁵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10。

⁸⁶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285。同前書，頁 110，〈建功國小創校一百一十週年大事記〉中記載，1917 年 3 月之畢業典禮，首次有女生畢業，當時畢業的生男 75 人，女 2 人。但是今人整理的初等科第 15 屆(1917 年 3 月)畢業生的名單只有 52 人。可見資料疏漏甚多，詳情無法查考。

⁸⁷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6。

⁸⁸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6。

⁸⁹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 110 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頁 106-7。此校在日治時期 1920 年之後皆屬於新竹州的轄下，光復後先隸屬新竹縣，在 1950 年苗栗設縣後，始屬苗栗縣，並陸續又分出 4 校，但至今仍是班級數頗多的大校。

更是設立的關鍵。至於詳細的設立過程如何，實難以一一探明，下文將以關西地區的設校過程為例，加以說明(詳見第二節)。

前述 3 所學校的高等科皆創設於大正 12、13 年(1923-4)，新埔與苗栗公學校創設於大正 12 年(1923)，北埔公學校的高等科則創設於大正 13 年。其時間正進入教育政策的第二階段，當時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已進入穩定期，各項建設也穩定發展，在各地普設公學校的情況下，學生對升學的需求日增，但中學的設立有限，乃有二年制高等科的出現。

至於男女的就學比例相當懸殊，則是各校相當普遍的情況，剛開始幾乎沒有女學生入學，而教師也清一色皆是男性。至於女子教育的發展如何，另敘。

最後，公學校的校長由中央派任，一般皆由日人擔任，前述三所學校於日治時期全部皆為日籍校長，幾乎成為慣例。雖然如此，詳細核對資料的結果發現，日治時期由臺籍人士擔任校長的情況，並非沒有，數量上雖然較少，且多在偏僻地區的小學校。依昭和 6 年(1931)官方統計資料，全新竹州除了崁頭厝公學校長為方石福、烏眉公學校長為頭屋出身的客家人徐阿乾⁹⁰、南和公學校麥井林⁹¹，及獅潭公學校為羅其英⁹²外，全州 86 所公學校中，只有 4 所因全校教職員只有 4 人以下的小學校，沒有日籍教師，才由臺籍教師擔任校長。⁹³由以上資料可知，日治時期只有少數的學校，由臺灣人擔任校長，另外如：苗栗白沙屯公學校校長鄭澤松。⁹⁴但考證的結果，臺籍教師任校長者，較筆者先前的認知為多，因為偏遠地區設校後，常有全校無一名日籍老師的情況，只好委由臺籍教師接任校長，若該校有日籍教師，皆以日籍教師優先，呈現殖民地教育現場十分不平等的狀態。

依據昭和 7 年(1932)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對新竹地區教育機構的統計可知，當時公學校有 86 所，另有 10 間分教場，其中 11 所附有高等科，9 所附有補習學校。⁹⁵可見到了教育的第二階段時，是初等教育普及最快的時期，當時的新竹州，即今日的桃竹苗地區，初等教育學校已有近百所

⁹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徐阿乾 1912 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的公學師範部乙科；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宦績篇八二，頁 58，徐阿乾畢業於頭屋公學校，考上臺北國語學校，畢業後派任苗栗公學校，後調至五湖當分校主任，後奉派南和公學校當校長，又調至烏眉公學校當校長，光復後擔任頭屋鄉第一、二屆鄉長。

⁹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麥井林 1914 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的公學師範部乙科。

⁹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羅其英 1915 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的公學師範部乙科。

⁹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29、33。

⁹⁴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52，光復後曾任苑裡初中校長。

⁹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3-4。但不知何故第 3 頁總表性的〈教育機關一覽〉表中所統計的公學校只有 75 所，卻與同書 18 頁至 27 頁詳列各郡中各街庄設校詳情的〈公學校一覽〉中，最後合計的公學校為 86 所，前後有 11 所的落差。可能的解釋有：1、分校之誤，但在分校統計上前後二表中分校皆為 10 所，可見並非分校之誤。2、統計時間的誤差，前者為昭和 7 年 3 月所計，後者則為昭和 6 年 12 月所計。但是後製表者的校數卻較前製表者的校數為少，不符合地方越趨發展，升學需求越高，且分校最後多走向獨立的情況。即使公學校常附設高等科或實業補習學校，也多是實業補習學校後來另外獨立，並不影響原公學校的存廢。推諸以上各種可能斷定：數字有出入的原因，即是統計並非一人獨立完成，而是數人同時整理又同不同資料。依此，筆者決計採納〈公學校一覽〉統計的結果。

之多，這些分校往後也紛紛獨立。

四、閩客比較

就如第二章所述，為了方便閩客比較，以下將舉閩籍人居優勢的桃園郡與客家人優勢的中壢郡與竹東郡作比較，但這樣的比較仍有風險，因為各郡的繁榮程度並不一致，各郡下的各街庄也不是平均發展。但為了容易說明，只得擇要為之。

昭和 13 年(1938)時桃園郡有人口 92,102 人，中壢郡則為 114,708 人、竹東郡有 75,050 人，⁹⁶可見這 3 郡中以中壢郡最為繁榮。當時的設校情況為：桃園郡有 12 所公學校，中壢郡 13 所，竹東郡則設有 10 所公學校及 4 所分校。⁹⁷以學校數而言，差別不大。至於學生總數，桃園郡公學校學生共有 7,745 人，其中 2,412 人為女生；中壢郡則有學生 10,565 人，其中 2,854 為女生；至於竹東郡則有 7,027 位學生，其中 2,451 人為女生。⁹⁸而以上各郡公學校的學生數佔該郡總人口的百分比，依桃園、中壢、竹東為序，分別為 8.41%、9.21%、9.36%；而女學生占該郡公學校學生數的比率，分別為 31.14%、27.01%、34.88%。

依計算所得數字可以發現，此 3 郡的學校數及公學校學生比率相當接近，至於在女學生占學生數的比率上，則會發現，閩客族群之間沒有很大的差異。在 3 郡中反而是中壢郡的女生就學率偏低，而竹東郡的女生就學率較高。就發展情況而言，位於較繁榮地區的經濟情況較好、觀念較開放，理應有較多的女生入學，但是在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反而是較靠近山區屬較偏鄉的竹東郡有較多的女生入學。

這樣的情況，也反映在更早的教育統計資料中。以昭和 6 年(1931)3 月為例，官方統計的公學校就學率，也出現類似的情形，桃園郡的男女生就學率分別為 38.71%與 11.87%，中壢郡則為 41.02%與 11.97%，⁹⁹兩郡就學情況相近。但若以竹東郡的情況而言，相對好很多，分別為 47.50%與 18.08%，¹⁰⁰而且竹東郡中尚加入蕃地的超低就學率，分別為 10.98%與 2.70%，¹⁰¹雖然山區人口較少，但多少仍會拉低整體的就學率，但竹東郡卻仍能維持在較高的入學率。若以產業發展而言，位於丘陵區的竹東郡多以務農維生，而位於中壢街庄的客家人則有較多的職業選擇，經濟情況也較好，照理經濟情況較好的家庭應有較高的能力與意願讓子弟就學，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近山務農的竹東郡客家人，較能保持耕讀傳家的文化傳統，因此較能鼓勵並支持子弟上學，包括女性。

另外，若細究各郡下各街庄內的公學校就學率，將會更具體。以新竹郡中客

⁹⁶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 13 年)》(新竹州，1941 年)，頁 11。

⁹⁷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 13 年)》，頁 36、38。

⁹⁸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 13 年)》，頁 37、39。

⁹⁹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0。

¹⁰⁰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1。

¹⁰¹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1。

家人比率皆在 98% 以上的湖口、新埔與關西 3 庄而言¹⁰²，此 3 庄是本郡中男女就學率皆較高者，男生就學率分別達到 46.40%、47.70% 與 51.44%，而女生就學率也是本郡前 3 名，分別為 15.51%、22.12% 與 20.12%。¹⁰³其實新竹郡中閩人優勢的舊港庄與香山庄，前者男生就學率也高達 47.37%，但女生就學率卻只有 8.12%；而後者的男女就學率分別為 41.00% 與 8.07%。¹⁰⁴所以若要說重男輕女，恐怕在新竹郡中是閩籍較為嚴重。但是也有一個客家人居優勢的紅毛庄，男女就學率分別只有 26.14% 與 5.62%，是本郡中最低的。依第二章第三節的閩客籍人口分布統計，紅毛庄在昭和 6 年(1931)，客家人口占 67.2%。雖為客家人口居優勢區，與其他庄相比，是客家人較少的庄，而且部分位置靠海。當時該庄的農業人口占全庄的 60.4%，其他客家人居優勢的湖口、新埔、關西等 3 庄農業人口分別為 81.2%、56.4%、69.4%。¹⁰⁵依以上統計數字，紅毛庄就學率較低的原因若非產業因素，即可能受是族群組成影響。

若以全州整體而言，各郡中較繁榮的市街庄，如：新竹市、中壢郡的中壢街、桃園郡的桃園街、竹東郡的竹東庄、竹南郡的竹南庄與苗栗郡的苗栗街等，皆是各郡中就學率較高者，¹⁰⁶但未必是最高者，而且有些郡反而是庄比街就學率更高，如大溪郡，下轄閩客族群對比明顯的大溪街與龍潭庄，¹⁰⁷雖然大溪街較繁榮，按理就學率應較高，其男女就學率分別為 47.87%、12.88%，但卻稍低於龍潭庄的 52.73% 及 17.47%。¹⁰⁸其次，竹南郡的竹南庄男女就學率分別 58.27%、13.79%，卻稍低於頭分庄的 62.47% 與 19.90%。¹⁰⁹竹南庄閩籍人口占 85.5%，頭分庄客家人占 85.2%。¹¹⁰再如前文所述，新竹郡的舊港庄靠海開發較早，理應較繁榮，閩籍占 80.2%，¹¹¹其就學率也少於客家人占 90% 以上的關西、新埔 2 庄。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全郡客家人占優勢的中壢郡，該郡中就學率最高的是楊梅庄的 43.45% 及 17.47%，而中壢街則稍低為 41.72%、14.93%。¹¹²中壢郡雖為客家人占多數，但楊梅庄的客家人占了 96.4%，中壢街客家人則僅占 70.9%。可見在各郡下的各庄間仍有差異，未必最繁榮者就學率就最高；而且該郡中若某庄客家人占的成數較高者，就學率大多較高。例如：客家人較多的竹東庄、頭分庄、苗栗街、公館庄、銅鑼庄與獅潭庄等，公學校男生就學率皆有 40% 以上，¹¹³而且竹東庄的女生是全

¹⁰² 詳見表 2-2。

¹⁰³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69。

¹⁰⁴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69。

¹⁰⁵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昭和 6 年)》，頁 21、171、172，各庄農業人口，除以該庄人口總數所得比率。農業人口以成人為多，但總人口數含幼年人口。另外，若依五味田怨編：《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頁 191，所描述的舊港、紅毛、湖口、新埔、關西等各庄概況，當時無論閩客或靠海、靠山，各庄主要產業活動仍以農業為多。

¹⁰⁶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0-72。

¹⁰⁷ 依第二章表 2-2 大溪街閩籍占 88.0%，龍潭庄則客家人占 90.00%。

¹⁰⁸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0。

¹⁰⁹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1。

¹¹⁰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表 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

¹¹¹ 詳見第二章第三節表 2-2 新竹州閩客人口的區域分布。

¹¹²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0。

¹¹³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1-72。

州就學率最高的一庄，為 28.72%。¹¹⁴惟其女生就學率，均遠低於全州各庄的男生就學率。

此時桃竹苗地區中，總體就學率最差的 2 郡，分別是閩人居優勢的桃園郡與客家人居優勢的中壢郡，在全郡平均是 31.06%的情況下¹¹⁵，桃園郡卻只有 25.95%、中壢郡也只有 27.41%。¹¹⁶只能說數字一旦簡化，就容易失真。但從以上所舉各郡庄的就學率表現，也足以破除客家人為了維繫宗族傳統，多被認為較重男輕女，必然忽視女子教育的說法。只能說實際的就學情況，仍得視她生在何庄、何種家庭而定。

若以鄰近關西庄的龍潭庄、竹東庄與新埔庄等而言，此 4 庄位於山地與平原交會的丘陵地，當地的客家人多以務農、產茶維生，卻自然顯現了客家人耕讀傳家、重教育的文化傳統。而且在如此重視教育的氛圍下，與其他庄相比，此 4 庄的女性就學率，皆高於平均的 14.90%¹¹⁷，其中竹東庄更幾達 2 倍之多。可見若是堅持耕讀傳家文化的客家庄，其男女就學率較高會於其他街庄。

由以上討論可知，就新竹州而言，閩客籍重視教育的情況相近，但純客庄似乎較好些；其次，各地的繁榮程度雖會影響該地的就學率，但客家庄則未必如此；再來重視教育的客家庄也較重視女子教育，其就學率顯然較閩籍居優勢的街庄為佳；但各庄、各家庭間仍有差異，未可一概而論。

參、 國民學校

1937 年之後，日本進入了戰時體制，開始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在社會上，推動改日本姓氏、說日語的家庭及改成日式化的宗教信仰等，是社會教育活動相當發達的時期，留待第七章社會教育部分說明。在教育上，則將小學校、公學校合併，一起改名為「國民學校」，但實際的教師、學生、教材等多如舊，在教育現場並沒有重大的變革。主要的變革有：首先，昭和 12 年(1937)廢除公學校漢文科，其次，昭和 16 年(1941)年配合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學制改革，將臺灣的小學、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但仍以確保教育效果為理由，將課程分成第一、二、三號表，即是原來的小學校、公學校與蕃人公學校。¹¹⁸

此一時期雖然遇到戰爭，學生因應戰時體制也動員起來，真正上課的時間減少很多，但並不影響學生就學的人數、意願或學校的設置，包括從分校變成獨立設校，可見教育的推廣已頗有成效。並在 1943 年開始推行六年制義務教育時，學齡兒童就學率為 65.7%，次年(1944)，更增為 71.2%，到了 1945 年，已超過 80%。¹¹⁹可說已達日治時期最好的就學情況。

¹¹⁴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1。

¹¹⁵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2。

¹¹⁶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0。

¹¹⁷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2。

¹¹⁸ 黃秀政、張政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11。

¹¹⁹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12。

至於女子教育的推廣也有相當的成效，雖然女性的入學率或人數仍不及男性，但是由戰後臺灣很多女性從事教職或其他職業，不得不歸功於日治後期持續推動學校教育的成果。以上是一般情形，至於新竹地區的情況如後。

一、就學情況

1939年就讀竹東旭國民學校(今竹東國小)的吳木麟回憶，入學時有5班(い、ろ、ぼ、に、ぼ)，男女各2班，中間班則約男女各半。¹²⁰可見當時在竹東市區，入學的男女學生比例已相當。吳並回憶到：通常一、二年級都由會講客家語的老師擔任導師，除了音樂外，國語(日語)、算術、修身、理科、體育等課程都會教。¹²¹所以通常任教低年級的老師多是出身當地或通該地方言的老師，這樣的情況在筆者訪談關西地區的耆老時也有類似的情形。若遇到不懂客語的日籍老師，就要由臺籍的老師當媒介，例如：1934年就讀北埔公學校的宋健和即說當時入學有2班(い、ろ)，一班全是男生，另一班則男女合班，由於任教い班的老師是退休庄長田中利七的公子田中利之，不懂客語，學生又不懂日語，師生只好相對而笑，幸賴任教ろ班的北埔望族邱文琳老師勤跑兩班，才使得溝通順利無礙於上課。¹²²

到了4年級(1942年)後，吳木麟回憶到：

時局吃緊，升旗用的鐵管被竹桿取代。日籍老師一個接一個應徵當兵，連戴著眼鏡風吹欲倒的音樂老師都站在臺上向全校師生告別，看到他眼睛隱約有反光的淚滴。班上導師也由高等科畢業的女老師接任。

另外為了支援前線每人撿拾空罐、蝸牛上繳等；為了建構防空壕，動員五、六年級男學生到河床撿石頭等。較特別的是，反而為了躲空襲警報，避至山邊的「彭府」大宅防空洞，頭一次接觸到彭老先生教授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¹²³最後學校停課，街上開始疏散致大山背(今橫山鄉豐鄉村)親戚家協助做農事，到1944年時即在空襲中畢業，可惜因家貧，即使學校老師推薦亦放棄升學。¹²⁴關於老師被徵當兵一事，就讀北埔公學校的宋健和也提到教他四年級的井口幸老師，當時為1937年，師範畢業即派至北埔任教，後來被徵當兵，宋健和於昭和19年(1944)因學徒動員駐於新庄子國民學校，即遇到派駐該校，擔任對空監視哨哨長的井口幸老師。¹²⁵

¹²⁰ 吳木麟：〈賀百年校慶--回憶五十年前的小學生活〉，頁148，收於曾水妹主編：《春風一百希望兩千--竹東國小百週年校慶》(新竹：新竹縣竹東國小，1999年)，頁148-151。

¹²¹ 同上引註。

¹²² 宋健和：〈憶兒時--螢雪時代往事知多少？〉，頁159，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陸--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59-164。

¹²³ 吳木麟：〈賀百年校慶--回憶五十年前的小學生活〉，頁150，收於曾水妹主編：《春風一百希望兩千--竹東國小百週年校慶》，頁148-151。

¹²⁴ 吳木麟：〈賀百年校慶--回憶五十年前的小學生活〉，頁151。

¹²⁵ 宋健和：〈憶兒時--螢雪時代往事知多少？〉，頁161，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陸--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59-164。

同樣於 1939 年於北埔入學的姜義鎮也提到，一、二年級還稱北埔公學校，從三年級起稱北埔國民學校。在高年級階段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授課影響極大，經常開防空壕，課後割軍用馬草、種植蓖，採挖「頭蝨頭」纖維，每月還要捐獻破銅爛鐵。後來美軍轟炸，天天躲警報，因此很少真正上課。¹²⁶

1943 年時與日籍父親同時任教北埔國民學校的女老師首藤晶枝，亦提到「不久，學校的一半教室成為軍事物資倉庫，上課分上、下午的二部制。」¹²⁷

這樣因為戰爭所影響的情況不但國民學校如此，即使是升上中等學校的學生，雖然有不同的「任務」，相同的回憶皆是很少有時間上課。即使如此，有機會或能升學者，戰後也都繼續升學。可見教育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

二、學校數量

依前文所述，在昭和 6 年(1931)底時，新竹州的公學校已有 86 所，可以確定的是除了這 86 所改為國民學校之外，另外 10 所分校也紛紛獨立，或者成立新的分教場。因此在全區的國民學校總數，一定超過上百所。例如：原屬關西公學校的馬武督分教場，於 1941 年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原屬於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教場，1942 年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詳見第二節)或如前述，新埔公學校於 1942 年成立的南分教場，北埔公學校於 1943 年成立的大坪分教場等。另外，桃園郡於日治末多了春日、海湖 2 所國民學校；中壢郡到了日治後期，除了宋屋、草湳坡分教場分別獨立改校名外，又新設了白川、崁仔腳、東勢、北野等 4 所國民學校。¹²⁸筆者雖未一一考究桃竹苗地區的國民學校數，但所見各例正如推論，學校設置的數量一直是穩定的成長中，以因應居民就學的需求。

三、臺籍校長

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時期，關西也出現了首位臺灣人校長。在日治時期的關西庄前後設有 4 所學校，只有 1941 年設立在馬武督(今關西鎮錦山里)的錦山國民學校，於 1944 年曾出現臺灣人校長盧仁祥¹²⁹，相對於其他 3 所學校，錦山國民學校規模較小，位於山區、交通不便，且該區為原住民和客家人居住的交界。依當時任教該校的楊澄清所述，在 1941 年設立時，錦山國民學校只有一位日籍老師即高島校長，在高島校長離職後，只好由臺籍老師盧仁祥接任校長一職。¹³⁰可見臺灣人有機會當校長，只是因該校沒有日籍老師，只得便宜行事，與前文公學校

¹²⁶ 姜義鎮：〈鳳凰花下憶兒時--回憶童年生活〉，頁 154，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53-155。

¹²⁷ 首藤晶枝作、宋健和譯：〈教子女雙鷹周遊各地〉，頁 197，收於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96-198。

¹²⁸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59-60。與附錄二桃竹苗地區的公學校比較。

¹²⁹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楊澄清以國小主任退休，於日治後期曾任教於錦山國民學校。光復後，盧仁祥成為新埔國校第二任校長。

¹³⁰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時期並無二致，可見一直至日治終了，學校中臺籍教師與日籍教師之間的升遷機會，始終都不平等。

以上是初等教育發展的情形。綜上所述，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給臺灣人就讀的初等教育設置較為普遍，從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到國語學校的設置，至光復前已逾百所，義務教育的就學率也達七成以上，但原則上女子教育的部分仍有待推廣，但較晚清時期的狀況，女子教育已進步良多。至於日人雖然廣設初等教育，其目的只是為了培養成懂日語，具日本母國精神的殖民地子民，並不是真正要提升臺灣人民的教育程度。接下來介紹桃竹苗地區中等教育的設置情形。

第二節 桃竹苗地區的中等教育概述

依據昭和 7 年(1932)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所編《新竹州教育要覽》對新竹地區教育機構的統計，可知當時區內設有公學校有 86 所，另有 10 間分教場，其中 11 所附有高等科，9 所附有農業補習學校，但真正列入普通中學者，只有新竹中學校和新竹高等女學校 2 所。¹³¹但本研究為了說明接受初等教育後的可能情形，便將高等科、農業補習學校、各類實業學校及師範教育等同屬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一併納入分析。

日治時代到了教育政策分期的第二階段，為了因應大量公學校的畢業生，解決大量臺籍畢業生無法升學的窘境，遂成立 2 年制的高等科及各式實業補習學校以解決需求，而當時臺灣屬農業社會，因此最多的是農業補習學校。這兩種學校多以附設於公學校的方式辦理，但因其銜接初等教育，遂列入中等教育範圍。因附設於公學校內，鄰近學區學生可就近入學，減少通學的不便；且可在讀完後有更好的升學機會或工作機會等，遂成公學校畢業生升學時的常見選項。

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主要創設於第二階段（詳見附錄三及附錄四），可惜能考上的臺籍學生甚少。若非成績頂尖、來自常使用日語的家庭、或出自地方士紳之家，能考上普通中學的臺籍學生更是罕見。此類學校在桃竹苗區，只有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等女學校 2 所而已。

到了教育政策的第三階段，為了因應戰時體制，原本的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紛紛縮短修業時間 1 學年，中學校由原本的 5 學年減為 4 學年、高等女學校則由 4 學年降為 3 學年。而桃竹苗地區的實業學校與師範學校，主要也創設在最後這個階段，在昭和 6 年(1931)的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的統計資料中，除了 2 年制的實業補習學校外，未見到有任何實業學校或師範學校設置的紀錄。

此一時期，師範教育機關有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臺北第二師範學校、臺中師範學校及臺南師範學校 4 所。到 1940 年增設新竹及屏東師範學校，1943 年時將

¹³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3-4 及頁 27。前後有異，此採〈公學校一覽〉統計的結果。

竹師改為臺中師範學校新竹預科，將屏師改為臺南師範學校屏東預科。¹³²其中，新竹師範的設立是桃竹苗地區，創設師範學校之始。

以下依序介紹 2 年制的高等科、農業補習學校、新竹中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各類實業學校及師範學校。

壹、高等科

依據昭和 7 年(1932)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所編《新竹州教育要覽》的統計可知，當時 86 所公學校中有新竹第一公學校、新埔公學校、中壠公學校、桃園公學校、大溪公學校、竹東公學校、北埔公學校、竹南公學校、頭分公學校、苗栗第一公學校與苑裡公學校等 11 校附設高等科。¹³³幾乎州內每一市、郡皆有 1 至 2 所公學校附設高等科，新竹市、新竹郡、中壠郡、桃園郡、大溪郡各有 1 所；其中竹東郡有竹東與北埔 2 所公學校，竹南郡有竹南與頭分 2 所公學校，苗栗郡有苗栗第一與苑裡 2 所公學校附設高等科，全州只有大湖郡未設高等科。¹³⁴以下舉相鄰新埔及關西兩庄所設的高等科為例說明。

以客家人聚集的新埔及關西地區而言，新埔公學校的高等科設置於大正 12 年(1923)4 月 1 日¹³⁵，招收公學校畢業生 40 人成立一班¹³⁶，成為新竹郡、關西、新埔地區設置最早、影響最大者，培育出許多人才。另外，位於關西庄的石光國民學校也設有高等科，但已是 1943 年 4 月 1 日。¹³⁷兩年後，臺灣光復，於是石光第一且唯一一屆高等科學生，一直到民國 36 年 7 月才畢業，共 41 人，其中至少有 8 位是女性。¹³⁸由於石光位於關西、新埔 2 庄交界，因此屬於關西庄的石光公學校畢業生，也可能會選擇新埔高等科就讀，以新埔高等科第一屆 18 位的畢業生為例，其中即有 4 位是來自石光公學校的畢業生。¹³⁹可見高等科雖然附設在新埔公學校中，但鄰近學區的學生若為了就近升學，仍可能跨學區就讀。

雖然高等科老師的編制屬公學校，且學校的教師臺日籍約各佔一半，誰有資格教高等科呢？依當時就學的邱金球回憶，當他就讀高等科二年內，曾被 4 位

¹³² 《臺灣省通志》(第一冊)，卷 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頁 81，轉引自吳文星(1983)，《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7。

¹³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4，35-44。

¹³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35-45。

¹³⁵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6。

¹³⁶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6。

¹³⁷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新竹縣石光國小，2004 年)，頁 23。

¹³⁸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6。依畢業名冊，只能由名字判斷性別，故只能推估至少有 8 位為女性。

¹³⁹ 核對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1，〈新埔國民小學高等科畢業生名冊〉高等科第一屆，與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特刊》，〈石光國民小學歷屆畢業生名冊〉，87-8 頁。可以發現新埔高等科第一屆 18 位畢業生中，有 1 位徐清榮是石光第 4 屆畢業、有 3 位范瑞泉、林阿亮、黃駿波等是石光第 5 屆畢業，來自新埔本校的則有 7 位(20 屆的林阿安、蔡春勝、陳薦熬、詹桂爐；21 屆的陳唐棣、劉木斯、陳英漢)，另外 7 位不詳。又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3，高等科第 17 屆名單中，也出現本研究重要受訪者邱金球校長，他曾於 2012 年 5 月 10 口述中提及當時下橫坑唯一一戶的日本人「石川仔」，邱與其女兒一同前往新埔念書，只是對方讀的是「新埔小學校」，而他讀的是新埔公學校高等科。

「田」老師教到，令其印象深刻，分別為澤田、外田、鶴田、內田 4 位，但同一位老師的任教時間卻不長，當時一個學年分三學期，常換個學期，即換老師，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高等科都由日籍老師上課。¹⁴⁰

高等科的畢業生，在日治後期國民學校師資缺乏時，更成為補充其師資的重要來源。¹⁴¹例如：1938 年畢業於石光公學校 20 屆的邱金球、張秀嬌及次年 21 屆畢業的劉香蘭等人皆是如此。邱金球和張秀嬌皆為新埔高等科畢業。¹⁴²邱金球於 1941 年新埔高等科畢業後，受到當時新埔公學校校長的推薦，通過測驗，至新竹師範接受 6 個月的臨時教員養成所訓練，於昭和 17 年(1943)以「助教」資格派回母校石光公學校任教。一年後，考上臺南師範學校，因進修而離職。¹⁴³張秀嬌則是 1940 年新埔高等科畢業後，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三年畢業後即成為國民學校教師。¹⁴⁴劉香蘭念了一年新埔高等科後，尚未畢業，即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3 年後畢業，也到照門國民學校任教。¹⁴⁵雖然日治後期大多數人只要具備中等學校資格，即可以到初等學校任教。但若無法立刻考上中學，像劉香蘭先讀高等科，也是個不錯的選擇，不但能一邊就學，也能一邊準備考試，以後同樣能比一般人得到較好的工作機會。總之，公學校後多讀 2 年的高等科，是個不錯的進路。

貳、農業補習學校

新竹州依據昭和 7 年(1932)《新竹州教育要覽》記載，當時 86 所公學校中有 9 所附設農業補習學校。¹⁴⁶且設於昭和 6 年(1931)之前，其中關西、龍潭、南坎等 3 所農業補習學校最早，成立於大正 13 年(1924)4 月，次年成立公館與大湖 2 所農業補習學校，再一年是楊梅、芎林與後龍等 3 所農業補習學校，最晚成立的是昭和 6 年(1931)的湖口農業專修學校。¹⁴⁷除了南坎與後龍 2 所農業補習學校位在閩南人較多之區外，其他皆是客家人居住之區，這和那個時代客家人以農業為生有關。

至於在新埔、關西地區，大正 13 年(1924)於關西庄的關西公學校開始附設關西農業補習學校後，再無類似補習學校設立。於是關西、新埔地區學子若想念實業補習學校，該校是唯一的選擇。而且關西農業補習學校也曾由校長或派員到石光公學校招生，例如：昭和 2 年(1927)3 月 12 日關西農業補習學校的校長佐久間四郎，即親自到石光公學校招生；¹⁴⁸昭和 7 年(1932)3 月 12 日，又派鈴木彌一

¹⁴⁰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經查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50，歷屆教職員一覽表中，日治後期的確有：澤田豐一、外田勝義、鶴田正衛等日籍教師，至於內田，新埔公學校的歷屆教職員皆無姓內田者，只於相近時期找到一位內藤利久。

¹⁴¹ 不但日治後期如此，在光復初期日籍師資撤走時，更是如此。

¹⁴²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3。邱金球為新埔高等科第 19 屆(1941 年 3 月)畢業生，張秀嬌為新埔高等科第 18 屆(1940 年 3 月)畢業生。

¹⁴³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⁴⁴ 張秀嬌 2013 年 3 月 10 日口述。

¹⁴⁵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⁴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3-4 及頁 27。

¹⁴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7-8。

¹⁴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5，昭和元年度重大記事；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

教諭，到石光針對六年級的畢業生進行招生演講。¹⁴⁹但是訪談石光、坪林地區長輩時，並未遇到關西實業補習學校的畢業生，反倒關西庄街的農家子弟會就近就讀該校。例如：楊澄清於 1939 年關西公學校畢業後，就讀 2 年制關西農業補習學校。後來由賞識他的日人老師高木勇推薦，前往就讀新竹簡易師範 1 年。¹⁵⁰可見就讀農業補習學校不只是學農而已，當日治後期國校教員不足時，也有機會任教職。

參、新竹中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

在日治時代桃竹苗地區，屬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學，只有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等女學校 2 所而已。能升入這 2 所學校者，以日本人優先。在大正 14 年(1925)4 月 10 日放榜的 100 位考生名單中，依姓氏判斷：日人 53 名、臺人 47 名。¹⁵¹約相當於 1 比 1 的比例，但日人稍多。而在昭和 2 年(1927)新竹中學校的第 1 屆 40 位的畢業名單中，則可依姓氏推出日人占了 23 位，臺人則占了 17 位，¹⁵²畢業生比例也相當接近，但日人只約占總人口的 1/10，以此相較則相當不公平。

另依昭和 6 年(1931)的統計表顯示，在新竹中學校的 5 學年中，日籍、臺籍學生分別為第一學年日人 48 名、臺人 49 名，共 97 人；第二學年日人 37 名、臺人 51 名，共 88 人；第三學年日人 43 名、臺人 53 名，共 96 人；第四學年日人 24 名，臺人 39 名，共 63 人；第五學年日人 27 名、臺人 33 名，共 60 人。¹⁵³就後來就學的情況看來，似乎日本人和臺灣人約各半，甚至臺灣人還稍多些，這即是日人因故轉學或退學較多的結果。如昭和 8 年度(1933)到昭和 13 年度(1938)6 年之間，日人每年少則 12 位，多則有 36 位學生退學，然而臺灣人每年退學數皆不超過 9 個。¹⁵⁴

於是曾就讀新竹中學校的臺灣人，幾乎都記得考上時日臺人的不公平比例。如：畢業於石光公學校第 13 屆(1931)的呂榮初¹⁵⁵，他一畢業，即順利考上新竹中學校，即是官方統計資料中第一學年的學生。但他回憶說，當年他考上新竹中學校時，該年招收的學生中，臺灣人 49 名，日本人 51 名，日本人硬是比臺灣人多 1 人。¹⁵⁶無論是官方的記載或學生的記憶，臺灣籍學生都是 49 名，可見呂榮

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新竹：新竹縣關西國小，1999 年)，頁 96，佐久間富四郎，於 1922 年 8 月至 1923 年 10 月任職關西公學校校長。

¹⁴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大記事；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13，鈴木彌一教諭 192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3 月任職關西公學校。

¹⁵⁰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另外，蘇添明 2012 年 8 月 19 日口述，亦很得意的說他是光復後關西初農第 3 屆畢業。

¹⁵¹ 不著撰者：《新竹州報》，第 468 號，1925 年 4 月 10 日，頁 103-104。

¹⁵² 不著撰者：《新竹州報》，第 25 號，1927 年 3 月 31 日，頁 85。

¹⁵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4。

¹⁵⁴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 13 年)》(新竹州，1941 年)，頁 18。

¹⁵⁵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6。

¹⁵⁶ 呂榮初 2013 年 4 月 20 日口述。研究者訪問他時，他已 96 歲，除行動不便外，耳聰目明，敘事清楚。

初的回憶資料是相當可信的，那麼日籍學生為何會有 2 名的誤差？可能的解釋有二：一、因為官方統計的是昭和 6 年(1931)12 月末的就學情況¹⁵⁷，學生難免流失；二、呂榮初等臺灣人，將臺灣學生多一名記成日本學生多一名。但筆者以為第一個推論較為可能。因為升學的機會難得，臺灣人對公平性會更敏感，而且日人的退學率較臺人為高。

這樣的日人多、臺人少的招生情況，也顯現在新竹高等女學校的招生名單中。大正 13 年(1924)4 月 13 日，100 位考生名單中，日人占了 70 位，臺灣人只有 30 位，而這 30 位中有 9 位名字中有「妹」，¹⁵⁸可見客家人未在女性升學中缺席。到了次年(1925)4 月 10 日放榜的 100 位考生名單中，日人仍占 58 位，而臺人共有 42 位，其中名字有「妹」可視為客家人者，共有 17 位。¹⁵⁹當時的中學可跨區就讀，亦即學生除在地的外，也來自全臺其他地方，在這種競爭激烈的升學情下，客家人仍能占 1/5 左右，可見客家人頗重視女子教育，並未在升學場上缺席。

這樣招生不公平的情況，到了日治後期，似乎更為嚴重。在昭和 10 年度之前，每年招生數皆為 100 名，但從昭和 11 年度開始，新竹中學校變成每年招收 150 名學生，其中 11 年度日人 90 名、臺人 58 名；12 年度則為日人 99 名，臺人 49 名；昭和 13 年度時，則為日人 99 名，臺人 54 名。¹⁶⁰難怪畢業於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1943)，應屆考上新竹中學校的范光銘即說，在每年 150 名入學名額中，只有 50 人左右為臺灣人。¹⁶¹比例從相近的 1：1，變成了 1：2。可見招生結果，的確不公平，且按第二章臺、日人在桃竹苗地區的人口數及比例分配名額，理應臺人應有較多機會，但實際上卻非如此，而是人口比例少的日籍生卻有較多的錄取名額。

由此可見，臺灣人升上中學之艱難。而且這兩所中學校的設立也在臺灣教育令頒布的第二期之後，新竹州新竹中學校設立於大正 11 年(1922)4 月 1 日¹⁶²，至於新竹高等女學校則晚了 2 年才設立¹⁶³。第一波中學設立潮多在大正 10 年前後，第二波設立則多在昭和 12、13 年(1937)，此時已進入日本開始推行戰時體制(詳見附錄三、四)。

肆、實業學校

日本人所讀的實業學校，是 1917 年及 1918 年成立的總督府商業實業學校和

¹⁵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4。

¹⁵⁸ 不著撰者：《新竹州報》，第 359 號，1924 年 4 月 13 日，頁 79。

¹⁵⁹ 不著撰者：《新竹州報》，第 468 號，1925 年 4 月 10 日，頁 103-104。

¹⁶⁰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 13 年)》(新竹州，1941 年)，頁 18。

¹⁶¹ 范光銘 2012 年 5 月 7 日口述。

¹⁶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09，昭和 13 年 9 月 22 日政府公布的告示，詳列當時臺灣所設立的中學校名稱、位置及設立的時間。另外，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5，亦有相同的設校記載。

¹⁶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69，詳列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的名稱、位置、設立年限及設立的政府單位。

總督府工業學校，修業年限 5 年；而臺灣人就讀的實業學校，為 1919 年成立的公立臺北工業學校、公立嘉義農林學校及公立臺中商業學校，修業年限只有 3 年。¹⁶⁴到了 1922 年新教令公佈，各校改為州立，撤除日臺差別，修業年限統一為 5 年。戰時又一律改為 4 年，並增設許多農工實業學校。¹⁶⁵

桃竹苗地區的農工商實業學校即創設於這個時期，主要有：1938 年成立的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1940 年成立的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實業學校，及 1944 年成立的新竹州立新竹農業學校與新竹州立新竹工業學校等。¹⁶⁶

另有由二年制實業科改制而來的實業補習學校，但各地二年制或三年制並不相同，¹⁶⁷因屬單獨設立的性質，不是附設在公學校中，在升學時也與以上的農工商實業學校同樣列入升學榜單中；至於一般附設於公學校的 2 年制實業補習學校，則不被列入，因此將此類實業補習學校，歸入此類來討論。在桃竹苗區亦有，以女性就讀的學校為多，例如：新竹家政女學校、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等。¹⁶⁸上文所列的實業學校，在石光國民學校日治最末一屆的升學榜上，就列出新竹農業學校、新竹工業學校、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與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等 4 所學校。¹⁶⁹可見新設的中等學校，即使是實業學校，也立刻成為學生升學時的選擇，反映出學生對升學的積極與迫切，並不因戰時學習效果有限而退卻。

余新源畢業於關西公學校第 33 屆(1937 年)¹⁷⁰，後來考上桃園農業學校；5 年後畢業，為桃農第二屆的畢業生，保存有相當完善的相冊，可以見證桃農初創時的教學情況。無論是新建的壯觀校舍，還是實踐性十足的農業實習課，不但有養雞、鴨、鵝，連豬、馬等各類家禽、家畜，還有對動物內臟的宰殺與解說；至於種植蔬菜、茄子、稻米等，則是必然的課程。另外，相撲、劍道課、運動會等體育活動，以及戰時的操槍、行軍等，或是畢業阿里山或參拜神社之旅等，無不歷歷在目。¹⁷¹以下舉其中幾張照片為例。

依余新源所述，當時桃農每年招收 100 名學生，分成甲乙兩班上課，他是甲班。¹⁷²而圖 3-2-1 畢業照之後的建築，即是當時的教員辦公室。

¹⁶⁴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83。

¹⁶⁵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83。

¹⁶⁶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84-86。

¹⁶⁷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86。

¹⁶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 19 年度重要大事〉，記載了該年的升學紀錄，當時有學生考上新竹工業學校、新竹農業實業學校、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等校。另於訪談中得知有新竹家政女學校。汪知亭(1978)，《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87，家政女學校設於都市的，應改辦商業實踐女學校；設於鄉區的，改辦農業實踐女學校……。這類學校，多數就是光復後各縣市的初級中學或初級職業學校。依汪氏的說明可知，新竹家政女學校即是後來的新竹商業實踐學校。

¹⁶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 19 學年度重大記事。

¹⁷⁰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85。

¹⁷¹ 余新源祕書 2012 年 8 月 16 日口述、說明。所有桃農相片皆為余祕書提供。

¹⁷² 余新源祕書 2012 年 8 月 20 日口述。



圖 3-2-1：桃農第二屆畢業照



圖 3-2-2：桃園農業學校校門、校舍、走廊



圖 3-2-3：桃農豐富詳實的農業實習課



圖 3-2-4：相撲、劍道、運動會



圖 3-2-5：桃園農校學生打靶及行軍等軍事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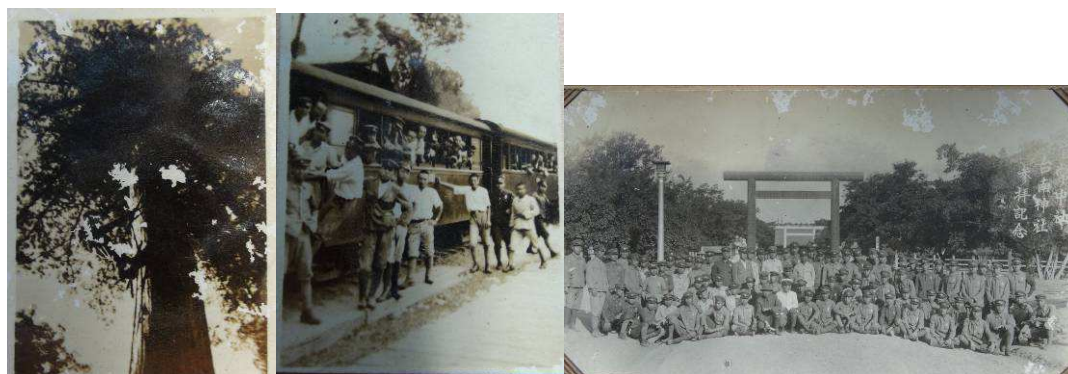


圖 3-2-6：桃農第二屆學生畢旅：阿里山神木、小火車及臺南神社

伍、師範學校

全臺最早設計給臺灣人就讀的師範學校，是國語學校的師範部乙科，因此日治早期全臺各地學生想升學時，國語學校是最主要也是少數的升學選擇。桃竹苗地區公學校畢業生想升學者，有醫學校與國語學校可選，兩者未來都有工作保障，但是國語學校是免費，吸引更多人就讀。¹⁷³出身苗栗郡公館庄的劉熙春，於1910年時就讀國語學校，至1913年畢業，圖3-2-7為其就讀於國語學校時期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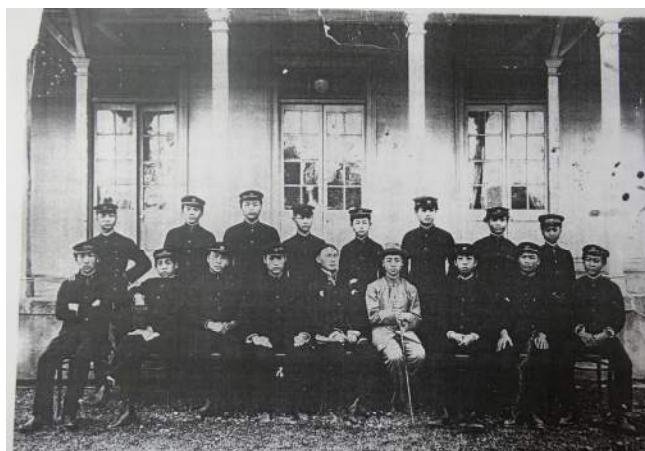


圖 3-2-7：國語學校的學生

¹⁷³ 劉國耀 2002年3月29日口述，解釋他的祖父劉熙春選擇就讀國語學校的關鍵。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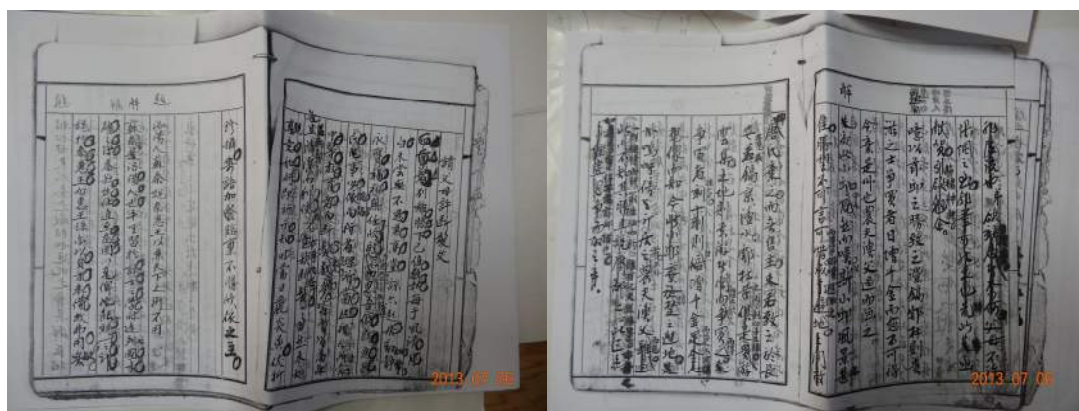
說明：此照約攝於 1910 年，前排左 3 即為劉熙春。

其後人尚保有其明治 43(1910)4 月起，就讀國語學校時期第四學級的漢文作文簿，其中文章有〈夏侯師長啟〉、〈夏休中消遣記〉、〈請父母許斷髮文〉、〈祝友斷髮文〉、〈重農論〉、〈賀壽文〉等文章外，並穿插漢文教師引一段古文後，請學生解釋者，如：「洛陽人蘇秦說秦惠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噫以蘇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划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等文章段落為題，由學生來解。¹⁷⁴按此時國語學校漢文作文內容已偏重生活應用，除書信、賀壽外，其中關於斷髮的文章亦頗合時事。由中略窺日人雖已領臺 15 年有餘，且考上國語學校的學生也多是各地精英，但其髮式仍有如舊者。不但斷髮要探問家長意見，同學若斷髮成功，則不免為文恭賀之。¹⁷⁵詳見圖 3-2-8 及圖 3-2-9。而學生未斷髮的情況，亦可由圖 3-2-7 國語學校學生的照片得見，尤其前排左 5 未載帽者，其髮式前額太高，即可能為傳統的辮子頭。



圖 3-2-8：劉熙春國語學校漢文作文簿封頁。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¹⁷⁴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借得之漢文作文簿影本。

¹⁷⁵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借得之漢文作文簿影本。

圖 3-2-9：劉熙春國語學校漢文作文簿舉例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以上所舉國語學校的作文簿之例，可略窺早期國語學校的生活，及學生上漢文課的情形。難怪早期畢業自國語學校學生的漢文程度大多相當不錯，不但可以在公學校中兼教漢文，取代原聘塾師，也有能力加參加地方詩社活動，如呂阿全、吳建田等人(詳見第五章第三節詩社發展)，或成為書房塾師(詳見第四章漢學推廣)。

稍後 1918 年新竹郡關西庄石光公學校有第 1 屆畢業生時，升學的 8 人中，即有 5 人考上國語學校乙科。依該屆畢業生呂阿全的說法，26 位畢業生中有 8 位考取上級學校，及格成績輝煌，使得鄰近大校皆刮目相看，以後乃學風大振云云。¹⁷⁶至於當時的《學校沿革誌》記載有 5 位學生考上「國語學校乙科」，這 5 位學生分別為：呂阿全、張金輝、朱新本、陳興城、陳登榜。¹⁷⁷而該學年度，正好遇上殖民政府改變教育政策，大正 8 年(1919)1 月 4 日頒佈〈臺灣教育令〉，4 月 1 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將原來的國語學校本校改為臺北師範學校，臺南分校改為臺南師範學校。¹⁷⁸以上 5 位畢業生雖然招生時是考入國語學校乙科，但正式入學後，就讀學校已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5 年後他們畢業時，即為臺北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之後，石光公學校從第 1 屆至第 6 屆都有畢業生考上臺北師範學校，這些校友畢業後，大部分皆選擇返鄉服務。¹⁷⁹1943 年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的畢業生徐金統，於 1、6 年級受教於呂阿全，2 到 5 年級則受教於范鼎香，受訪提到呂阿全及范鼎香老師都是臺北師範畢業時，語帶敬意，意指相當優秀。¹⁸⁰

1937 年之後，師範教育機關有北一師、北二師、中師及南師 4 校，但桃竹苗地區首設師範學校，是在 1940 年增設新竹師範學校，但 1943 年時將新竹師範改為臺中師範學校新竹預科。¹⁸¹很快的就有關西公學校附設關西農業補習學校畢業的楊澄清，前往該校就讀一年制簡易師範科成為訓導，拿到正式的教師資格。另有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畢業的邱金球，及以坪林青年團幹部資格考試入學的范士敬，前往該校就讀半年制的臨時教員養習所，拿到助教資格，成為國民學校的代理教師(詳見第四節)。

綜上所述，日人在臺灣推動初等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培養懂日語，具日本母國精神的殖民地子民，並不是真正要提升臺灣人民的教育程度，故在中等教育

¹⁷⁶ 呂杰全：〈石光國小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22，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作者自刊，1978 年)，頁 20-5。

¹⁷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7，大正七年度重大記事。

¹⁷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603-4，國語學校沿革一覽表及文字說明；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頁 71，國語學校沿革一覽表，及頁 115 文字說明。

¹⁷⁹ 詳見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及傑出校友〉，頁 1-9，收於葉文滋、王文俊主編：《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新竹：新竹縣石光國小，2013 年)，附件。

¹⁸⁰ 2012 年 4 月 25 日徐金統口述。

¹⁸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67。

的設置上，普遍不足，若非確有需要或不得已才設之，因此在性質上屬菁英教育，但類型上多偏向基礎性的職業類科。且到日治晚期為了因應戰爭所需，才有更多實業學校的設計，使得初等學校的升學者，除讀師範學校外，有更多的職業選擇。

雖然日治殖民式的教育政策是偏頗的，以達成殖民統治為目的，但在學校教育的設置與推廣上，仍是有貢獻的。整體而言，桃竹苗地區在日治時期的學校教育已初具規模，為往後的教育發展奠下基礎。

第三節 關西地區初等教育的推廣

有了前述的整體瞭解後，本節將以新竹州關西地區為例，更微觀地去查考初等教育的推動情形。關西地區在新竹地區算是鄉下地方，雖然清朝後期劉銘傳為了開山撫番，曾在大崙崁(今大溪)設立撫墾總局，在咸菜礮(今關西)設立分局，並於文昌祠(今關西鎮立圖書館)內辦公，但並非正式的行政機構，實際墾務多由地方出資所組成的墾號負責。¹⁸²而且一直到 1895 年日治之後，關西的馬武督等山區仍是原住民聚居之地。¹⁸³在此種發展環境下，晚清時掌握地方開墾大權者即是地方上的菁英階層。到了日治時期由於統治勢力深入鄉間，誰能迎合新的統治者需求，誰即能掌握地方領導權及經濟權，故日治早期多屬能積極配合統治當局措施與產業轉型者能得到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到日治中期後，則是新式教育出身者開始崛起，掌握地方的經濟與領導地位。¹⁸⁴而這些新的地方領導階層興起，大多與新式教育的設置息息相關。

本節欲以關西初等教育學校的設置情況，說明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如何由人口集中的市區，漸漸發展，最後深入鄉間。關西地區的初等教育機構，總計有 4 所。第一所是設立於 1899 年的咸菜礮公學校(1921 年因應 1920 年街庄更名而奉令改為關西公學校)，並於 1913 年附設石崗仔分校，其於 1917 年獨立為石崗仔公學校，¹⁸⁵成為關西地區的第二所公學校，與咸菜礮公學校同於 1921 年更名為石光公學校。第三所公學校則是 1920 年由當時的石崗仔公學校附設的坪林分離教室，後於 1924 年改稱為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教場，直到 1942 年奉准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¹⁸⁶至於最後一所創設的學校，也是 1935 年從咸菜礮公學校分出的馬武督分教場，並於 1941 年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¹⁸⁷關西雖為客家人聚居之地，但近山區的馬武督區則為客家、原住民交錯區，為了呈現關西客家人聚集區在日治前、中、後三期的初等教育發展情形，以下將分別選擇以咸菜礮公學校、石崗仔

¹⁸²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75。

¹⁸³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78-9。

¹⁸⁴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167-8。

¹⁸⁵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48、52；另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由捐地獻資對創校有大功的黃南琚用書法於昭和 4 年所述的〈石光公學校之起源〉一文，對石光公學校的創設始末有詳細的描述。

¹⁸⁶ 林桂蘭主編：《新竹縣坪林國民小學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特刊》(新竹：新竹縣坪林國小，2002 年)，頁 23，〈六十年大事記〉。

¹⁸⁷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63。

公學校，及坪林國民學校的設立及教學等情形，來說明公學校教育是如何在客家人聚居區日漸普及。

關西地區的公學校教育發展，只以一所公學校的發展，即可反映出殖民政府三階段的教育政策；以關西地區全區公學校的發展而言，由關西市街、石崗仔地區，到坪林、錦山的設校過程，不但顯現空間上是由點到面的擴展，也正巧符合殖民政府三階段教育政策變動的時間。

在介紹關西地區各公學校之前，茲將關西地區公學校的設置過程，圖示如圖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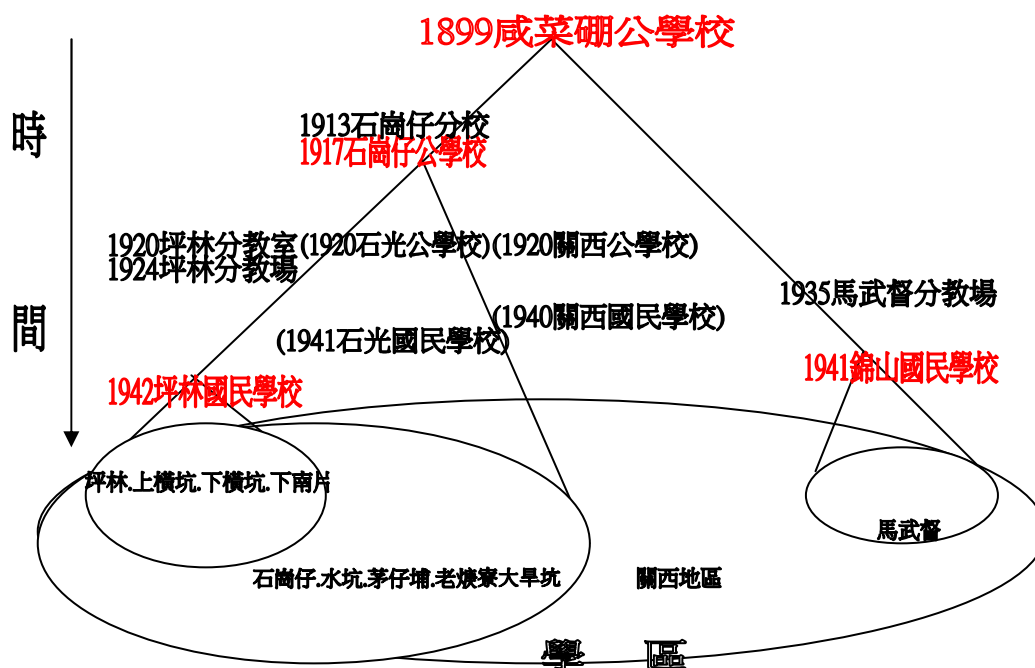


圖 3-3-1：關西地區設校過程

壹、咸菜硼公學校

咸菜硼公學校是關西地區最早設置的新式初等教育機構，也是桃竹苗地區〈公學校令〉公布後早期設立的公學校之一。日治初期桃竹苗地區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只分布於市街所在的新竹、苗栗二地，雖有教育成效，但就入學與影響性而言，範圍尚小。一直要到在各地廣設公學校之後，殖民政府推行的初等教育才開始深入各街庄，而此發展過程可由依次設立的公學校發展看出。依行政區劃，在各街庄設立的首座公學校，通常是該街庄最重要的初等教育機構，該校校長也常被視為該街庄各公學校之首。¹⁸⁸在此情況下，咸菜硼公學校校長不但負有推動關西地區教育之責，在校長卸任後轉任為關西庄庄長¹⁸⁹就不足為奇。

¹⁸⁸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口述。

¹⁸⁹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113-4。1920 年關西

一、創立與發展

依照關西公學校的設置與發展，是配合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的三階段教育政策，關西公學校的發展亦可由校名的變化一窺其貌。

(一)咸菜硼公學校(1899~1919)

咸菜硼公學校設立的時間，相當於第一階段的教育政策執行時期，因應關西當地的情勢，在市區設置學校，並鼓勵書房的學生、或地方士紳之子女就讀。以地理位置而言，殖民政府在第一階段前期設置的初等教育機構國語傳習所，離此地最近的是新竹國語傳習所新埔分教場。但自晚清到日治，關西、新埔兩地一直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劃，因此就如前文介紹新埔公學校的設置可知，咸菜硼公學校的設立並不受新埔公學校設置的影響。在「公學校令」公布後，各地方街庄只要能自籌經費，經過該地街庄社長提出，經上級的行政長官，如辦務署長、知事廳長等同意，皆可以於該地設置公學校，當然相關的合併或分離獨立也是如此。¹⁹⁰於是明治 32 年(1899)2 月創立，¹⁹¹在地方士紳郭壽三的發起下籌設「咸菜硼公學校」，同年 2 月 3 日奉准成立，4 月 24 日開學。成立後，由地方士紳羅碧玉、劉瑞球、陳遠芳(茅仔埔，今大同里)、范洪灶(坪林，今上林里)、徐開祿、陳騰芳(坪林，今上林里)等擔任學務委員，於 1909 年 2 月共同訂立「公學校基本財產設置契約」，委任郭壽三及時任咸菜硼區長謝金蘭二人名義，向臺灣總督府請撥「桃園廳馬武督官有森林原野」自六畜山至白石山，計劃闢為田園及造林之孳息，以支應公學校所需的費用，果然獲准開墾。¹⁹²次年，郭壽三及謝金蘭邀集勸募興學，參加「咸菜硼公學校基本田園開墾關係契約宣誓書」，投資加入者共范榮良、王思溫、陳遠芳、劉瑞球、陳春民、范洪灶、余鴻年、羅吉安、羅碧泰等 9 人，共 11 份分段進行開墾，學校即依此學租收入維持 10 多年學校經費，直至 1922 年 12 月起地方公學校教育由政府庄役場接辦，該等校產乃轉移為地方政府公產。¹⁹³由於學校的設立，經費是靠地方自籌，因此學務委員的組成，影響日後學校的發展。

最早提倡者郭壽三是咸菜硼市街上的菁英，另外 6 位學務委員，羅碧玉、劉瑞球、徐開祿等來自熱鬧的咸菜硼區，而陳遠芳、范洪灶、陳騰芳等則屬後來才劃入咸菜硼支廳石崗仔區的菁英。這樣各地區分配性的菁英代表與各地分攤式的經費來源，在學校發展一段時間後，由於交通便利的不一致性，距離學校較遠的石崗仔區居民，自然會想設立專屬該區的學校。

有了石崗仔公學校設立成功的經驗，當坪林地區的庄民繁衍出較多的人口與設校需求時，加上坪林區的范洪灶與陳騰芳家族的經費支持，在有意願又有能力的情況下，坪林國民學校的創設，乃水到渠成。

庄的首任庄長即是在咸菜硼公學校擔任 7 年校長的小林三次郎，到 1924 年任滿後，辭去庄長職務，轉任當地「食鹽賣捌人(食鹽經銷商)」以及庄協議員，繼續在當地經營事業。

¹⁹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238-9。

¹⁹¹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71 號，1905 年 7 月 5 日，頁 122；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計為明治 32 年 4 月。

¹⁹²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48。

¹⁹³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48。

咸菜礮公學校創校初期校舍尚未完備，暫借文昌祠為教室，¹⁹⁴至明治 37 年(1904)始有第一棟校舍落成，共一排 4 間，後有菜園及田地。¹⁹⁵並於次年(1905)6 月 25 日舉行盛大的落成儀式，當時的廳長竹內卷太郎、當時的街長謝金蘭等也都親臨致辭。¹⁹⁶至大正元年(1912)時授課尚要分三處，分別為本部 4 間教室、文昌廟 2 間教室及紅茶公司後 2 間竹圍內的石灰屋教室等，學生輪流至各區上課；大正 8 年(1919)又完成校舍 7 間、廁所 1 間、工友室 1 間，至此學校建築規模初定。¹⁹⁷就學生人數亦穩定成長，大正 2 年(1913)在石崗仔區士紳、居民的要求下，為了達到經費分攤公平，及解決石崗仔區學生遠道就學人數較少、就學不便等問題，終於創設了石崗仔分校，並於大正 6 年(1917)正式獨立。¹⁹⁸並於大正 10 年(1921)因州縣重劃，奉令更名為「關西公學校」。¹⁹⁹

(二)關西公學校(1920~1940)

更名為關西公學校後，是學校規模擴大最重要的時期。此時期，也是全臺教育政策及教育推展進入最穩定的第二階段。為因應全臺各地公學校畢業生漸多，臺灣人的升學管道卻有限的情況下，關西學生常為了升學的需要，不但要遠赴他鄉至臺北、臺中等地升學，甚至赴日留學者亦有之。加上第一次大戰後，全球民族自決風氣的影響之下，日本殖民政府陸續於大正 8 年(1919)公佈〈臺灣教育令〉，大正 11 年(1922)又公佈〈新臺灣教育令〉、「臺灣公學校官制」等，並以府令將初等中等學校規則加以修正。²⁰⁰在內外皆有推力的情況下，關西公學校乃於大正 13 年(1924)附設「臺灣公立農林專修補習學校」，招收公學校畢業生。²⁰¹這所附設在關西公學校的臺灣公立農林專修補習學校，成為日治時期關西地區的最高學府，由於是以農林職業教育為主，讓其他有心又有能力升學者，不得不奔波至外地求學，或者先至臨近的新埔公學校附設二年制高等科就讀，以求往後得以升學或有更好的發展。

後來為了擴充關西農林專修補習學校的學習環境及未來發展，昭和 6 年(1920)將關西公學校校舍遷至今關西客運現址，當時僅有正門前教室 1 排。²⁰²此後，陸續於昭和 11 年(1926)增建北側木造教室 3 間、昭和 12 年(1927)建南北側木造教室 2 間、昭和 13 年(1928)又建南側木造教室 2 間、奉安殿、2 間宿值室及將事務

¹⁹⁴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71 號，1905 年 7 月 5 日，頁 123，當時士紳羅碧玉、藍炳然的賀辭。

¹⁹⁵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0；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71 號，1905 年 7 月 5 日，頁 123。

¹⁹⁶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71 號，1905 年 7 月 5 日，頁 122-123。

¹⁹⁷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0。

¹⁹⁸ 黃南瑤：〈石光公學校之起源〉，收於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2。

¹⁹⁹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2。

²⁰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24、357；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6。

²⁰¹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56。

²⁰²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62。

室擴大等。²⁰³

除了校舍的擴充與遷移外，昭和 10 年(1925)又於原住民與客家族群交界的馬武督山區，增設了馬武督分教場²⁰⁴，以利當地學生就近入學。

(三)關西國民學校(1940~1945)

到了第三階段，為了因應戰爭，教育上建樹變的少。殖民政府為了因應母國的戰時體制，將臺灣的小學校、公學校等學校名稱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但實際課表上仍因日人、臺人、原住民等身分的不同，將課表分成一、二、三號表。關西公學校遂於昭和 15 年(1940)4 月 1 日更名為關西國民學校，次年(1941)馬武督分教場亦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²⁰⁵

二、就學狀況與影響

以上為咸菜礮公學校主要的建設與發展過程，重點是校名與硬體設備的變化。下文將介紹實際就學情況與傑出畢業生，以說明咸菜礮公學校設立後對關西地區發展的影響。

(一)就學實況

日治初期一般民眾經濟不佳、交通不便，加上對學校教育懷有恐懼，即使上學全勤者學校會有獎勵，但剛創校時上學者相當有限，畢業生更是屈指可數。咸菜礮公學校第一屆的畢業生只有 3 位、第二屆 4 位、第三屆 2 位、第四屆 5 位、第五屆 7 位，到了第六屆之後，畢業生才超過 13 人以上。²⁰⁶

依實際訪問到的資料可知，早期願意接受日本教育者，並不是很光榮或很樂意的。例如晚清即為坪林地主的范家，到了日治初期，身為長子的范朝棟，雖然進入咸菜礮公學校就讀，畢業後也有不錯的發展，在早期教職缺乏時，曾擔任石光公學校的「訓導心得」(代理教師)，再升為「訓導」，曾任教職 15 年，並擔任庄役場助役多年。²⁰⁷但是依其孫女范碧蓮的說法，當時去讀公學校叫「讀狗書」。所謂「讀狗書」(客語)，乃以狗比喻日本統治者，是一種貶低日人的說法。²⁰⁸顯示早期前往公學校讀書是相當不得已的，但是為了家族在社會上的發展，又不得不派人去念公學校，故派老實的范朝棟前往就學。²⁰⁹

²⁰³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63。

²⁰⁴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63。

²⁰⁵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63。

²⁰⁶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1-172。

²⁰⁷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臺北：月旦，1997 年)，頁 45；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礮--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1，范朝棟為第二屆畢業生 4 名之 1；其中 2 年任教於石光公學校，參見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職員名簿〉，無頁碼，大正 9 年 4 月 1 日至大正 11 年 3 月 31 日，以訓導心得資格任用。

²⁰⁸ 范碧蓮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²⁰⁹ 雖然排行次子的范朝燈家族有不同的看法，詳見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 34，「根據范家的習慣，每一房只有長子才能接受正式學校教育，范朝燈排行老二無緣入學，八歲時進私塾讀書……」。但是依據日治時期臺灣才開始設現代化的學校教育，而且往後范家人也幾乎人人入學，依此判斷范朝棟後人的說法較為可信。

此外，在日治初期不相信日本人設置學校的說法，也出現在范士敬的訪談中。出生於大正 12 年(1923)的范士敬，上有 3 位兄長分別出生於明治 35 年(1902)至明治 40 年(1907)間，正好是日本人統治臺灣初期，家族中祖父曾在關西暗潭開設私塾，於是他的 3 位兄長就在私塾負責炊煮的工作協助祖父，卻沒有接受學校教育，理由是大家都說：「不要去讀書，讀日本書將來會被調去做兵」，於是他的 3 位兄長即未受日式教育。²¹⁰怕被調去當兵而害怕入學，是早期國語傳習所時期招生困難的原因之一，²¹¹可見在關西地區的客家居民，對日式教育的接受度是更慢的，也不認為讓孩子接受學校教育是必要的。

直到第 10 屆(1914)37 位畢業生中，首次出現 2 位女性的畢業生。²¹²往後女性的畢業生人數，也才慢慢的增加，但始終少於男性。

透過第 13 屆(1917 年 3 月)畢業生彭騰英日後的回憶，可以了解一下咸菜礮公學校經營近 20 年時的學校情況。²¹³彭騰英生於明治 36 年(1903)，於 9 歲時入學，入學時，有 67 位同學，最大的 16 歲，最遠的從上橫坑(咸菜礮庄)、銅鑼圈(龍潭庄)徒步而來。就學期間，男生常因農忙缺席，女生更常因生病、家事等理由而輟學，至大正 5 年(1926)4 月畢業時，全班只剩 39 名。上學全勤者，學校每有獎勵，課程除了日本教育外，還有漢文教學，是由王思溫先生教導。²¹⁴由他的回憶可知，即使到了日治統治 20 年後，關西地區的教育已較為人所接受，但是就學率與畢業率之間，仍有相當大的落差。

關西地區的首座公學校在日治時期培育了 40 屆畢業生，傑出的人自不在少數。²¹⁵若以量而言在日治時期共培育了 2,664 名男學生，1,068 名女學生，共計 3,732 人。²¹⁶可見該校對關西地方各項發展與影響的重要性。以下將列舉畢業生中的重要人物，說明該校在關西地區的重要性及影響。

(二)代表人物

關西地區早期只有咸菜礮一所公學校，因此一些後來在石光、坪林等地有特殊貢獻或教育成就的家族先輩們，都是畢業自咸菜礮公學校。

首先關西地區各學校的臺籍師資來源，最早即是來自咸菜礮公學校，詳見下文石光公學校師資部分的介紹。其次關西最早的公醫郭澄海，最早的本地人庄長羅享錦，及新竹州紅極一時的逢茂農園主事者陳逢茂，都是畢業自咸菜礮公學校。

郭澄海是關西地區首位公醫師，最先就讀於咸菜礮公學校，但在畢業名冊未

²¹⁰ 范士敬 2011 年 5 月 2 日口述；范士敬 2011 年 8 月 14 日補充兄長年齡，並借得戶籍謄本翻拍。

²¹¹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41。其他三個原因為：人民不忘懷祖國、各地治安不良及芝山巖之變等。

²¹²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2。

²¹³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30，原文作者寫「民國 5 年」畢業生；今依同前書，頁 172，光復前第 13 屆畢業生名冊，更正為民國 6 年(1917)3 月。

²¹⁴ 彭騰英口述、彭新德撰稿：〈九七人瑞憶母校〉，頁 130，收於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30-1。

²¹⁵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96-197。

²¹⁶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27。

見其名。1904年念完咸菜礮公學校5年級後，即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於1909年4月畢業。²¹⁷曾任職總督府臺北醫院，1912年回咸菜礮街開業，次年任臺灣公醫咸菜礮職務。²¹⁸石光公學校獨立後唯一有記載的公醫，就是郭澄海，每一學期皆要到校巡診，對學生進行健康檢查。²¹⁹

羅享錦是日治時期首位擔任庄長的關西在地人，他是咸菜礮公學校第4屆畢業生。²²⁰1913年畢業於國語學校乙科師範部後，曾於大正3年至6年間回母校任教²²¹。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任庄助役，1924年起任關西庄長，在職中兼任所得稅調查委員、州勢調查委員等，亦曾任關西庄協議會員與新竹州協議會員等。在參與地方事業上，主要的有關西信用組合長、關西茶葉組合長、赤柯山茶葉組合理事、臺灣紅茶株式會社社長等職。²²²

陳逢茂是日治時期跨國際經營的逢茂農園主事者，他是關西庄坪林人，咸菜礮公學校第10屆畢業生。²²³該農園本為陳騰芳於1916年所創，逢茂為其孫。1922年接手並視察日本國內事業後，於關西庄上橫坑建立第一農場，成為州農會指定柑橘苗木養成苗圃、州農會指定模範柑橘園、州指定模範造林地等，本園並有外交部員、香港派駐員等。²²⁴後來畢業於石光第8屆的陳能雲，即曾任逢茂農園外派於香港的代表。²²⁵其他傑出者尚多，不一一贅述。

貳、石光公學校

石光公學校最初為咸菜礮公學校的石崗仔²²⁶分校，設立於大正2年(1913)4月²²⁷，於大正6年(1917)獨立，當時稱為石崗仔公學校，至大正10年(1921)改稱為石光公學校，昭和16年(1941)改稱為石光國民學校，昭和18年(1943)增設高

²¹⁷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131。其父即是咸菜礮公學校創校人之一的郭壽三。另見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80。1986年任臺北醫學院董事會董事長的其子郭宗煥，因感念先祖郭壽三為創校時的學務委員，及先父郭澄海就讀關西並任校醫，本人也是關西的畢業生，乃捐關西國小一座郭壽三紀念圖書館，以紀念並鼓勵後學。

²¹⁸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131。

²¹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校醫一欄只記有大正6年6月1日任命郭澄海以公醫資格任職，此後別無第二個人。頁25，大正六年度主要記事，六月1日郭澄海拜命為校醫。頁29，大正七年度主要行事，4月15日校醫來校種痘。

²²⁰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71。

²²¹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12。

²²² 五味田怨編：《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菅武雄，1938年)，頁208。

²²³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72。

²²⁴ 五味田怨編：《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頁212。

²²⁵ 陳能雲：〈半世紀生活的回憶〉，頁13，收於校慶籌備委員會：《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新竹：新竹縣石光國小，1973年)，頁12-13。

²²⁶ 劉明怡等撰：《臺灣地區辭書 卷十四新竹縣》，頁245，日治明治34年(1901)隸屬新埔支廳石崗仔庄，大正9年(1920)改隸新竹郡關西街石岡子大字，下轄上石岡子、下石岡子小字，昭和12年(1937)改為石光保，民34年(1945)光復後改為石光里。依此書所紀，符合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校史中時人所記。但地名與校名的變化不同，造成後人研究上的困擾。本研究出現的地名或校名，以時人所記或符合實際情形為主。

²²⁷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9。

等科。²²⁸該校的創立始末，及其後續對地方文教的發展與貢獻，可以參看手書《學校沿革誌》稿，書中詳細的記錄了學校的創始過程及發展。該書卷首即收錄對創校具有重大貢獻的地方士紳黃南琚的「敷洽皇仁春遍，山陬僧公說法，頑石點頭」書法聯句，及其所撰〈石光公學校之起源〉一文。該文雖用毛筆小楷寫於昭和4年(1929)，但地方士紳於大正2年(1913)創設石崗仔分校時，黃南琚雖非石崗仔區的區長，²²⁹卻是設校過程中，捐地、出資最多者，其言當屬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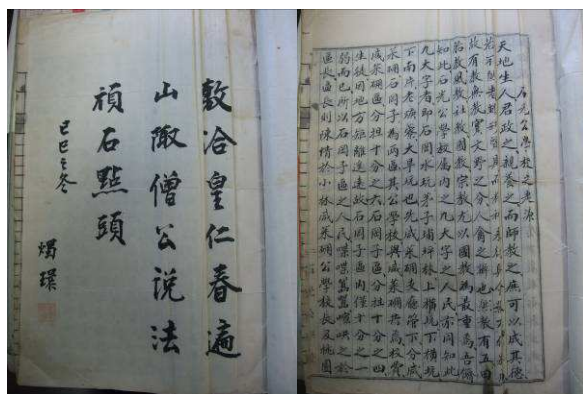


圖 3-3-2：黃南琚(字燭環)所撰聯句及〈石光公學校之起源〉一文

資料來源：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

其後，除了歷年經費、兒童數統計、歷任校長、師長、學務委員、學區等資料外，自大正2年度(1913)的分校創立時期開始，至昭和19年度(1944)的每學年度，都有「重大行事」的紀錄。

一、創立

依照居創校大功臣之一黃南琚日後所撰〈石光公學校之起源〉可知，石光公學校要獨立設校主要原因是，原該地分擔咸菜礮公學校經費的不均。石崗仔區的人民需分擔咸菜礮公學校的經費的十分之四，但該校卻距離石崗仔較遠，不利該區的學生上學，造成就學人數不成比例，只占全校的十分之一。於是石崗仔區的地方士紳，乃向當時咸菜礮公學校長及當時管轄的地方長官--咸菜礮街長、桃園廳廳長等，懇請於石崗仔區另設學校，終於大正2年(1913)，得到同意設立石崗仔分校。²³⁰設立分校後，第一屆招生不錯，但因農忙、交通、天氣、師資不良等

²²⁸ 范明遠主編：《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創校八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新竹：新竹縣石光國小，1993年)，頁6，〈學校沿革大事記〉。

²²⁹ 羅慶武：〈關西鎮之開拓及歷代首長略傳〉，頁268，收於呂順安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265-270。記「黃南琚於大正元年至4年(1912-5)，擔任桃園廳石崗仔區區長」一事，當屬有誤，因為黃南琚寫作的〈石光公學校之起源〉中，稱他人為區長，稱自己為拙者。另查《學校沿革誌》頁3，大正二年度記事，當時的石崗仔區長為陳遠芳。另在《學校沿革誌》，大正7年(1918)9月13日的紀事中，才由黃南琚擔任石崗仔區長。

²³⁰ 黃南琚：〈石光公學校之起源〉，無頁碼，收於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原文如下：「石光公學校屬內之九大字之人民，亦同知此。九大字者，即石岡、水坑、茅子埔、坪林、上橫坑、下橫坑、下南片、老更煥藜、大早坑也。先咸菜礮支廳管下，分咸菜礮、石岡子為兩區，其公學校與咸菜礮共焉。校費，咸菜礮區分擔十分之六，石岡子區分擔十分之四；生徒，因地方距離遙遠故，石岡子區內僅十分之一弱而已，所以石岡子區之人民，喋喋囂囂，喧哄之於區長，區長則陳情於小林咸菜礮公學校長，及桃園廳長。至大正二年，廳長俯順輿情，許以分校，其時權借區役

因素，造成學生流失頗多。剛開始時，歷任分校主任皆辛苦奔走在學區內各個書房進行招生，至大正 2 年(1913)5 月 1 日時，終於招到 60 位學生，其中並有 1 名女生。²³¹但至大正 8 年 3 月 30 日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時，只剩男學生 26 名。²³²可知創校初期，學生流失之多，但幸而第一屆畢業生升學考試繳出了漂亮成績，奠定日後學校發展的基礎。

設校之後，歷經一段辛苦的建設。起初校舍只能借石岡子區役場的一角上課，前二任的主任宿舍及辦公室也借用區役場，並修理役場後的一間破舊民房充為教室。有了第 2、3 屆學生，遂另借地方公廟乾元宮上課。²³³而且初創時，分校的主任及雇員曾積極到各書房招生(詳見第五章第二節漢學推廣部分)，但是教學效果相當有限。依當時學生呂阿全回憶：第一屆學生入學時有男女學生共 60 名，年紀大者甚多，卻不守規矩，臺籍老師無法管教，學生於授業中擅自出遊者有之、到校園後山塚埔賭博者有之、人人果園摘食者有之、分隊而戰打架者有之、上課時邊架火燒飯邊答者有之，更有 3 名女同學被戲弄到不敢上學。²³⁴這樣的學風與學習環境不良的情況，一直到中尾治主任到任時才加以改善。

於是也是在中尾治任內，終於在大正 6 年(1917)3 月 31 日，得以獨立為石岡仔公學校，而不再是成菜礮公學校石岡仔分校。²³⁵

二、就學實況

第 3 任中尾治分校主任上任時，積極動員學區內的保正(今里長)、地方士紳、學務委員等籌買校地及塚埔；另發動民眾義務勞動，開拓校地，並興建校舍、校長宿舍等。²³⁶校友呂杰全喟嘆「中尾校長是一位政治手腕卓越之校長」。²³⁷但是第一屆學生畢業時，僅剩 26 名學生，主要是因為學生年紀大輟學或轉學而減少，但考上上級學校者 8 名，及格成績輝煌，令鄰近大校刮目相看，自此學風大振。²³⁸自此，石光連續前 5 屆都有學生考上師範學校，很多人或返鄉或回母校服務，成為關西地區重要的師資來源。

場及假校舍而設教焉。」

²³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5，大正二年度重大行事。

²³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1，大正七年度重大行事。

²³³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4，收於校慶籌備委員會：《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頁 4-5。

²³⁴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石光公學校累年兒童之狀況一表，大正 2 年有 2 名女生入學，呂氏所指 3 名，可能包含大正 3 年入學者。二者稍有出入，但第一年未有女畢業生則相同。

²³⁵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0 號，1917 年 4 月 16 日，頁 18。

²³⁶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4。

²³⁷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

²³⁸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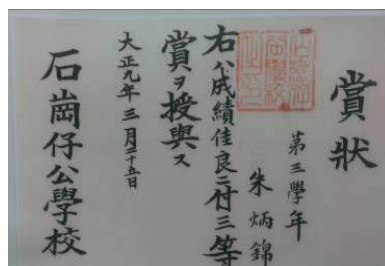


圖 3-3-3：石崗仔公學校時期獎狀²³⁹

資料來源：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校史資料展

當時學校為了鼓勵學生的上學表現，成績好者會頒發獎狀，見圖 3-3-3。對於全勤的學生，學校也會頒發獎狀來鼓勵之，見圖 3-3-4。反之，也可以此判斷，若連每一學年全勤都要獎賞，反而顯示學生的缺席情形嚴重，才要以此鼓勵學生勤學。在石光的校史紀錄中，即曾見到學生因寒流來襲、暴雨、廟會活動等原因缺席，尤其以距石光本校較遠的坪林地區，最常發生。²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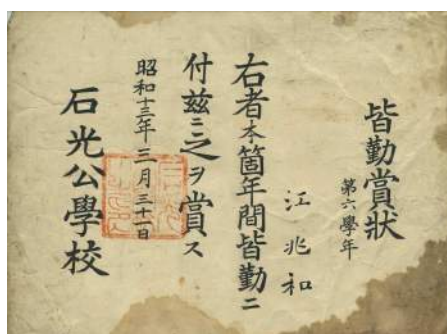


圖 3-3-4：江兆和第六學年全勤獎狀

資料來源：江金棟提供。

日治時期公學校對學生的各項發展情況，及親師之間的聯繫，做得相當好。平時老師即常常於學區內活動，如：大正 2 年、3 年(1913-4)石崗仔分校剛成立時，分校主任及老師，必須到各保的書房進行招生。²⁴¹平時也到學區內進行家庭訪問。²⁴²由於學區內河川隔交通不便，遇到大雨還要護送學生放學。²⁴³到了日治後期，昭和 5 年(1930)後，由於社會教育組織，如主婦會、家長會等學校教師必須到學區內各地去演講外，也需針對學區內的留鄉青年或未受學校教育者，教授日語等。²⁴⁴

以上是教師參與社區的情形，相反的家長、居民也透過學校舉辦的各項講演

²³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2003 年)，頁 87。朱炳錦是石光第五屆畢業生。

²⁴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61，大正 14 年 1 月 31 日寒氣凜烈，7 名兒童缺席；頁 79，昭和 2 年 7 月 31 日，因河水泛濫坪林方面的兒童缺席甚多；頁 117，昭和 4 年 3 月 14 日，坪林廟舉行祭典，兒童缺席甚多等。

²⁴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5、7，大正 2 年重大記事；頁 9，大正 3 年重大記事。詳見第四章儒學推廣，書房與公學校的消長。

²⁴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7，大正 4 年度重大記事，家訪以督勵學生出席；

²⁴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

²⁴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 5 年度~昭和 11 年度重大記事。詳見第 6 章社會教育部分。

會、運動會、學藝會、畢業典禮等，參與學校的活動。例如：大正 14 年(1925)11 月 24 日晚上 7 點於運動場舉辦「通俗演講會」暨餘興節目、照片欣賞等，竟有上千人參加，至晚上 9 點才結束。²⁴⁵可見相當多學區內的居民來參與活動。其他每學期常見的常態性的運動會、學藝會及畢業典禮等，²⁴⁶當然是親師交流最好的時機。

至於學生在學的各项表現都詳記在《公學校家庭通信簿》中，此簿連用 6 年，上面詳載學校教育共同的基本規定，如：學期起迄、休業日、祝祭日、紀念日及教育相關勅語外。也包括兒童個人的學習資料，如：家庭基本資料、受教時的校長導師、在校 6 年的獎賞表現、成績、出缺席，及健康檢查資料等，²⁴⁷見圖 3-3-5。其中資料不但詳實，而且也有親師簽名欄，²⁴⁸使師生和家長都能對學生的就學情況、學習成長過程，有資料可以檢證。但與今日不同的是，雖名為通信簿，但內容大多都是各項資料的登錄，並沒有親師間的溝通對話，屬資料通知較多。



圖 3-3-5：石光公學校家庭通信簿

資料來源：江金棟提供，其父江兆和使用的《公學校家庭通信簿》。

說明：由左而右共有 3 圖，分別為封面、頁 12、頁 14。

三、師資

該校師資來源除日籍教師外，公學校畢業生也是其一。石崗仔公學校第一屆 26 位畢業生中，有 8 個升學，²⁴⁹其中 5 個考上臺北國語學校乙科，而這 5 位在師範學校畢業後，有 4 位返鄉任教。²⁵⁰而各地區公學校升上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大多返鄉任教，也是日治時期的常態。但在石光公學校尚未有畢業生時，該校主要的師資來源，除了日本人外，以鄰近較早設立的公學校畢業生為多，其中又以同庄的咸菜礮公學校畢業生最多。

陳登彬是石光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中最早返校服務者，在他返校服務之前，

²⁴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65。

²⁴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各年度重大記事。

²⁴⁷ 江兆和使用：《公學校家庭通信簿》(未明單位，1932-1938 年)，全冊。

²⁴⁸ 江兆和使用：《公學校家庭通信簿》，頁 14-15。

²⁴⁹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

²⁵⁰ 江燦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1-2。

《學校沿革誌》中共記有 11 位老師。²⁵¹日治時期石光校長一直為日籍，至於其他 11 位教師，除 2 位日籍教師外，其他 9 位老師皆有地緣關係。其中 5 位教師畢業自關西地區最早設立的咸菜硼公學校，1 位畢業自新埔公學校，最後 3 位是在地人，可惜不知其就讀的公學校。9 位臺籍教師簡介如下。

畢業自咸菜硼公學校 5 位教師，其中 2 位是專教漢學的老師：陳俊湘、邱運金皆以「雇」²⁵²的資格任用。陳俊湘是陳遠芳的三子，其祖父陳琳生在清代即為石崗仔等地的大佃戶，後遷居茅仔埔(今大同里)，在 1901 年日本殖民政府進行土地調查時，陳琳生即為地方的清丈委員。²⁵³陳遠芳(陳琳生三男)歷任地方保正、稅調委員、學務委員與桃園廳石崗仔區區長等，曾多次參與學校事務並捐款，此外曾任私塾塾師。陳俊湘是咸菜硼公學校第 8 屆的畢業生(1911 年 3 月)，於石崗仔分校成立時，以「雇」的資格，成為石崗仔分校首任漢文教師。²⁵⁴其後大正 6 年(1917)石崗仔公學校正式獨立，其六弟俊樓、七弟俊明皆為石光的畢業生。²⁵⁵

邱運金為咸菜硼公學校第 6 屆畢業生，接任陳俊湘的「雇」缺，於大正 3 年(1914)4 月 10 日至大正 6 年(1917)3 月 31 日，任教於石崗仔分校 3 年後離開。離開學校後，仍在街上開設書房。²⁵⁶

邱運金離職後的「雇」缺，曾短暫由日籍的宮田吉藏接任，到大正 6 年(1917)9 月 12 日，才由新埔公學校第 11 屆畢業生，後來從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農科畢業的徐嶽生²⁵⁷接任，徐在石光一教即 9 年 6 個月，至大正 15 年(1926)3 月 31 日止，而其依願離職時，當時記載《學校沿革誌》者已稱他為「訓導」。往後石光公學校即不再有以「雇」資格任用的教師。

今人吳文星研究發現，早期師範生中不少人已具有相當之漢學基礎，於師範畢業後常取代舊士紳擔任公學校的漢文課程。²⁵⁸這就是為什麼公學校雖至 1937 年才廢除漢文科²⁵⁹，卻不必另外聘塾師以「雇」資格教漢文的原因，當時師範畢業生的漢文能力已相當不錯。像石光第一屆畢業生呂阿全，即是關西陶社的一

²⁵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⁵² 校史中記為「雇」，一般稱雇員，專指在公學校專教漢文的老師，一般多聘請私塾教師或地方士紳。

²⁵³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21。

²⁵⁴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21。

²⁵⁵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6、10。

²⁵⁶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日治後期從簡易師範畢業並任教於錦山國民學校的楊澄清，光復後為了學習中文，亦曾短暫就教於邱運金，他還記得學念「增廣」(《增廣昔時賢文》)時，一旦發音錯誤，母親還會糾正其發音。楊澄清於任教錦山國民學校時，呂杰全、楊習日校長都曾督促其書法，呂杰全並贈其《岳三小集》一冊。並曾在坪林、石光、關西等校任教，以國小主任退休。

²⁵⁷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112-113、163。徐嶽生出身老焮寮，但他的伯父徐阿爐是石崗仔公學校的學務委員，也是興業公司改組後的第一任社長，以及石光信用組合的發起人之一。徐嶽生退出教職後，同時即接任關西庄的「會計役」，到 1929 年陳俊玖升任庄長後，徐即改任「助役」一職。往後雖然於 1934 年庄長改由日人佐藤今朝松接任，一直到 1945 年光復前為止，徐皆一直擔任關西庄的助役兼會計役，成為地方行政組織中的要角。

²⁵⁸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97。

²⁵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88-389。

員，能吟漢詩，參與詩社活動，可知其傳統漢學的能力相當不錯，自可勝任教授漢文科。

另外 3 位咸菜礮公學校的畢業生是郭阿昌、范金立與范朝棟。郭阿昌是以「訓導」²⁶⁰資格任用，店仔崗(今北山里)人，咸菜礮公學校第 5 屆(1909 年 3 月)畢業，1913 年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於大正 4 年至 6 年(1915-7)間任教石崗仔分校，日治時曾任關西庄協議員，並參與關西陶社的活動。²⁶¹

范金立則是咸菜礮公學校第 14 屆(1918 年 3 月)畢業，與陳開華同於大正 8 年(1919)以「訓導心得」的資格任用，只在石崗仔公學校教了一年就調回咸菜礮公學校。後來又與陳開華同樣於 1922 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教員講習科，進修一年。²⁶²可知即使是以代課教員任用，只要進修皆可以升為合格的教師。

范朝棟為咸菜礮公學校第 2 屆(1906 年 3 月)的畢業生，大正 9 年(1920)以「訓導心得」任用，至大正 11 年(1922)時《學校沿革誌》即記載其榮升「訓導」一事。²⁶³范朝棟即是當時關西坪林地區很有名望的范家(大范屋)，光復後以十子十登科聞名的范朝燈的大哥，其獨子范鼎香，即是與分校主任呂阿全一起促使坪林分教場獨立的功臣之一，范鼎香為石光公學校第 3 屆畢業生。范朝棟後來轉至關西庄役場工作。

另外 3 位擔任老師的分別是：陳俊深、陳阿郎與陳開華。陳俊深及陳阿郎均以「訓導」資格任教，分別在石光教了 10 年與 6 年；而陳開華本以「訓導心得」任用，總共在石光任教了 17 年。²⁶⁴這 3 位應為在地人，但並未見到就讀本地公學校的紀錄，卻在今國立臺北大學的校友名冊中查知，陳俊深、陳阿郎分別是 1916 年與 1917 年的臺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故具有正式教員資格。²⁶⁵陳開華則與前述范金立是 1922 年的臺北師範學校教員講習科畢業²⁶⁶，故只能以「訓導心得」的資格任教²⁶⁷。由於三人在學校任教甚久，對地方的升學、發展等影響甚深，簡述如下。

陳俊深是茅子埔(今大同里)陳家人，與陳俊湘為同輩的宗親關係²⁶⁸，但未見到其就讀關西公學校的紀錄。他的文言底子亦相當不錯，曾為關西陶社一員，筆名「靜軒」。²⁶⁹曾任咸菜礮興業公司董事長，負責馬武督(今錦山里)地區的開發，昭和 17 年度(1942)時，曾以貴賓之禮招待過石光公學校全體的教職員，令當時

²⁶⁰ 正式師範畢業的臺籍教師。

²⁶¹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21。

²⁶²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21-22。

²⁶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大正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⁶⁵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頁 12、14。

²⁶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4.htm>，頁 1。

²⁶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⁶⁸ 余新源祕書 2012 年 8 月 16 日口述。余新源為關西鎮公所祕書退休，相當了解地方家族的發展。

²⁶⁹ 林柏燕：《陶社詩集》(新竹：竹縣文化局，2001 年)，頁 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人本名一覽表〉。

擔任石光助教的邱金球校長印象深刻。²⁷⁰其弟陳俊宏，大正4年(1915)畢業於關西公學校第11屆，曾在新埔開業，為地方上有名的醫師。²⁷¹

陳阿郎原名陳登郎，曾出現在范朝燈傳記中，為范朝燈鄰居，下南片(今南和里)人，是陳嫦娥²⁷²的叔叔，曾在石光教了6年，後來曾調往各地教書。他將兒子送往日本留學，並以子在日本升學較容易，且念得不錯，又無歧視問題等的經驗，建議范朝燈讓長子范光霖到日本留學，於是范朝燈接受他的建議，果然讓長子留日。²⁷³

陳開華在石光教了17年，家住上橫坑(今上林里)，曾教過石光、坪林地區無數的子弟，范士敬(石光第14屆)、邱福旺與賴香妹夫妻(坪林第2二屆)、楊美蓮(坪林第2屆)、陳送妹(石光第19屆)等都曾受教他。²⁷⁴

四、升學表現

石光公學校在日治時期共培育出27屆畢業生，其中有許多優秀的人才。²⁷⁵計1,400位男性畢業生，509位女性畢業生，共有1,909位。²⁷⁶以下將扼要介紹石光國小在日治時期畢業生的升學表現與事功，從大正8年(1919)開始的第1屆，到光復前的第27屆。資料整理摘要，詳見附錄六石光公學校畢業生升學情況。

各屆升學表現以石光國小保存的校史《學校沿革誌》為主，但該紀錄缺漏很多，主要的升學紀錄只出現5次，即初獨立的前4屆，之後缺漏一直要到光復前的最後一屆才再現。因此第5屆之後到第26屆的傑出者只能輔以訪談及其他書面資料。²⁷⁷以下擇要說明之。

《學校沿革誌》中記載第1屆畢業生有5位學生考上「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這5位學生分別為：呂阿全、張金輝、朱新本、陳興城、陳登榜等。²⁷⁸雖然有5位考上，但查考現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網路上的畢業名冊後，發現大正12年(1923)的畢業生，只有呂阿全、張金輝、朱新本3位，未見陳興城、陳登榜之名。但是陳興城應該也順利畢業，因為他也在大正12年(1923)3月以訓導資格

²⁷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17年度重大記事；2012年8月10日邱校長口述。

²⁷¹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22。

²⁷² 日治時期石光公學校第22屆畢業生，新竹家政女學校畢業後，曾返回石光任教。

²⁷³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106。於是范家的十子中，前四子皆選擇留日深造，即使因戰提早返臺，也都有不錯的發展。

²⁷⁴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及傑出校友〉，頁21。

²⁷⁵ 筆者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巧遇到該校創校百週年校慶，受石光國小現任潘校長之邀，將日治時期石光的升學情況及傑出校友寫成〈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與傑出校友〉一文，蒙其收在《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中，詳情請見該文。本研究則扼要摘錄其中重要的部分。

²⁷⁶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95。學生總數為筆者計算加總所得。

²⁷⁷ 石光第1屆至第20屆的重要人物敘述，主要感謝高齡88歲的邱金球校長不厭其煩的一一講述，是訪談石光傑出校友時最重要的報導人。其他要感謝的長輩尚多，有我的恩師徐金統老師、范士敬老師、劉士賢老師、范光建老師及陳雙錦老師；另呂杰全老師的公子呂耀樞醫師及其夫人范碧蓮老師，也是范鼎香校長的女兒，詳見附錄的訪談名錄。

²⁷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30-31，大正七年度主要行事。

到關西公學校任教，後來娶了同年至關西公學校任教的該校首位臺籍女教師—魏庚全，並一起在關西教了 10 幾年。²⁷⁹呂阿全、張金輝、朱新本等 3 位師範畢業生，於畢業後，先後皆曾回「石光公學校」任教。其中又以呂阿全²⁸⁰於大正 12 年(1923)臺北師範學校一畢業即回母校任教，歷經教員、坪林分校主任、教導、校長合計約在石光教了 25 年，²⁸¹對學校及地方貢獻良多。他自言：傳承「石光公學校」首任校長中尾之精神，以一期生；又是家鄉人之故，是以培育人才、校運興隆為己任，即使總督府下令嚴禁學校補課，仍於課外加教小學校課本或教算盤、漢文等，俾使學生於畢業後能考上上級學校。²⁸²他曾任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教場主任，並與范鼎香及地方父老等一同促成坪林國民學校獨立及良好的升學表現(詳見下文坪林國民學校創立部分)。

張金輝²⁸³雖較呂阿全晚回石光任教，於大正 14 年(1925)自湖口公學校調回石光，之後也有調動，但總共在石光教了 16 年 8 個月，並於日治後期在石光擔任教頭(教務主任)，光復後接任石光第 1 任校長。石光國小光復後前 3 任校長都是該校的畢業生，由此可知日治時期公學校教育對石光地區教育傳承影響之大。

²⁸⁴

另外，第 1 屆畢業生中有 2 位：陳登彬與黃本源，雖未考上師範學校，卻分別於大正 9 年(1920)、大正 10 年(1921)，以「訓導心得」的資格回母校任職，且分別持續教了 17 年 4 個月及 9 年 10 個月，較最早具師範畢業資格的呂阿全老師的大正 12 年(1923)3 月返回石光任教還早。²⁸⁵由此可知，就算非師範畢業的石光第 1 屆畢業生，亦對母校教育也有貢獻。陳登彬在任教次年(1921)即被派至坪林分校，往後的 16 年都在坪林分校任教，於昭和 12 年(1937)9 月 1 日離職。²⁸⁶



圖 3-3-6：昭和 17 年(1942)石光國民學校師長

資料來源：邱金球校長提供。

²⁷⁹ 楊澄清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配合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13。

²⁸⁰ 後更名為呂杰全、見圖 3-3-4 前排左 3。

²⁸¹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4，收於校慶籌備委員會：《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頁 4-5。

²⁸²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23，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20-24 最後兩段，在六十週年校慶特刊時，可能因涉及補習與某師私德之故，未全文刊出。

²⁸³ 圖 3-3-4 前排左 5。

²⁸⁴ 江燦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及傑出校友〉，頁 2。

²⁸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⁸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說明：後排左至右：邱金球(20 屆)、劉興潭、中熊國三、河野スガ、呂潤玉(19 屆)、朱金雀(21 屆)、宮本三枝(宮本政四郎妻)；前排由左至右：傅招裕(第 6 屆)、宮本政四郎、呂阿全(第 1 屆)、春田直行、張金輝(第 1 屆)、星野經男、花木武二。

石光第 2 屆畢業生的升學表現也相當出色，這一屆總共 29 人，其中男生 27 位，女生 2 位。這是石光有女生畢業的開始。在這不到 30 位的畢業生中，即有 8 位考上臺北師範學校。其中朱盛淇、戴連秀、戴振鐘、范朝坤 4 位一畢業即考上臺北師範學校豫科；²⁸⁷次年劉碧嵐、劉鏡華、呂義星、朱新在等 4 人也考上，與本校第 3 屆畢業生朱金鑑、范鼎香等同時於大正 15 年(1926)以本科畢業。²⁸⁸

其中，朱盛淇、呂義星、戴連秀²⁸⁹等，都曾返回石光任教頗長一段時間，分別為 7 年、12 年與 8 年。²⁹⁰朱盛淇雖然列為石光第 2 屆畢業生名冊上，但實際上於 5 年級時即插考考取臺北師範學校，並與呂阿全一樣，師範一畢業即回母校任教，即大正 13 年(1924)，昭和 4 年(1929)中等教育檢定考試及格，至昭和 6 年(1931)於石光公學校退職，前往東京留學。昭和 9 年(1934)日本大學專門部法律本科畢業，同年並高等考試司法科及格，次年高等考試行政科及格，先後任職於恩師鈴木喜三郎法律事務所、東京地方裁判所律師等，成為開業律師。昭和 11 年(1936)回臺開業於新竹，同年並任新竹州會議員，並曾任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生活部長等。²⁹¹劉碧嵐於日治時期可能派教他處，曾負責今日太平²⁹²、錦山²⁹³等較偏僻地區的國語講習所業務²⁹⁴，亦曾為關西陶社一員²⁹⁵。

第 3 屆畢業生人數變化不大，總共 27 人，男生 26 人、女生 1 人。²⁹⁶其中朱金鑑、范鼎香與前述第二屆的 4 位學長一同考上臺北師範學校，並於大正 15(1926)一同畢業，²⁹⁷朱金鑑與范鼎香 2 位畢業後皆返鄉任教²⁹⁸。

²⁸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3，大正八年度重大記事；另外上網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4.htm>，頁 11-12，但在大正 13 年(1924)的豫科本科畢業生名冊中，只見劉朱盛淇、戴連秀、戴振鐘等 3 人，並未見到范朝坤之名。

²⁸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1，大正九年度重大記事，詳記 6 位考上名單；另外上網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4.htm>，頁 15-16，6 位亦同時畢業。另屆別資料，依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

²⁸⁹ 圖 3-3-11 前排左 4。

²⁹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⁹¹ 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鑑，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amesyang-007/article?mid=40698&prev=-1&next=4067>。網頁資料參考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頁 195；臺灣新民報(1937)，《臺灣人士鑑》，頁 175；五味田恕(1938)，《新竹州情勢與人物》，頁 129；太原肥洲(1940)，《新臺灣的支配人物與產業史》，頁 289，及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1953)，《中華民國人事錄》，頁 62 等。蒐集相當齊全，符合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資料，並且更完整。

²⁹² 日治後期為石光學區。

²⁹³ 日治後期為關西學區。

²⁹⁴ 前者為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後者為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²⁹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人本名一覽表〉。

²⁹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3，大正九年度重大記事；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

²⁹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1，大正九年度重大記事，詳記 6 位考上名單；另外上網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http://r8.ntue.edu.tw/pastalu/04.htm>，頁 15-16，6 位亦同時畢業。

據說朱金鑑在學成績良好，讀師範時成績為全班第一，擔任班長，為師長所賞識。²⁹⁹畢業時與朱新在一同派任關西公學校，但朱金鑑只教了 6 年，因介入地方派系之爭而去職。當時朱金鑑師範時期的日人老師，還特地南下安慰失意的他，使他重新振作，轉而朝其他事業發展。³⁰⁰昭和 9 年(1934)時曾任石光產業組合專務理事(總幹事)，與當時的石光產業組合長徐嶽生，共同於石光組合內附設共存醫院，受到地方父老讚譽及政府褒獎，昭和 10 年(1935)自治選舉時，獲選為庄協議員，在地方政經活動上頗活躍。³⁰¹於是昭和 12 年(1937)5 月 27 日擔任石光第一任家長會會長，當時的副會長有范朝燈、林石火，至於任期多久則不明。³⁰²

范鼎香³⁰³則回石光母校任教 14 年有餘³⁰⁴，並在坪林尚為石光分校時，與呂阿全一同被派至坪林分校任教，一同促成坪林國民學校的獨立，並進一步與呂阿全合作一同推動坪林的升學，果然坪林獨立第一年，雖然在 69 位學生中，只有 13 位學生想升學、能升學，結果這 13 位想升學的學生竟都能如願考上中學，這不能不說是范鼎香與呂阿全通力合作、無私奉獻的結果。³⁰⁵因為他們從學生升上 4 年級開始，即給學生義務補習，平時即義務為學生補習至 6 點，寒暑假時也義務為學生補習、上課，使學生能在精熟學習公學校教材外，也能精熟小學校的教材。³⁰⁶讓就讀公學校的學生能通過以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課本為內容的升學考試。有時也帶學生散步至關西街上，甚至請學生吃冰，這些都是學生難忘的回憶。身為坪林第一屆畢業生的徐金統老師有感於恩師的無私奉獻，即說「他們是真正的老師」。³⁰⁷

畢業生除了報考師範學校外，第 3 屆終於有畢業生陳俊樓、陳興錦考上臺中一中，但要到畢業第二年才考上。³⁰⁸臺中一中是大正 4 年(1915)在臺灣人爭取下，終於設立給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校，雖然教學年限 4 年較日制中學的 5 年少一年，教學內容也偏職業類、少外語等，使臺灣人難以與升學為導向的日人就讀的普通中學競爭，但已是少數臺灣人能升學的管道。³⁰⁹

另屆別資料，依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

²⁹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²⁹⁹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³⁰⁰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³⁰¹ 五味田怨編：《新竹州情勢與人物》，頁 213；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164。但上網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3-04.htm>，發現徐嶽生為 1921 年畢業，朱金鑑則為 1926 年，陳志豪敘述「朱金鑑比徐嶽生晚一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有誤。

³⁰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重大記事。

³⁰³ 見圖 3-3-5，及圖 3-3-9 前排左 2。

³⁰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³⁰⁵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呂阿全為徐金統公學校 1、6 年級導師，范鼎香為徐金統 2-5 年級導師。

³⁰⁶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³⁰⁷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金統是呂、范 2 人的學生。

³⁰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9，大正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³⁰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743-747。



圖 3-3-7：范鼎香老師在坪林國民學校上課

資料來源：徐金統老師提供。

說明：左前方的鐵櫃放置教育敕語，右前方的木棍是劍術課所使用的木劍。

第 4 屆畢業生人數稍微增多，總共 38 人，其中男生 37 人，女生 1 人。³¹⁰最特殊的是這唯一的女生張玉春，竟順利的考上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³¹¹，是石光公學校最早升學的女同學。這在石光公學校的升學史上雖然不是唯一，卻是開始、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在普遍重男輕女的時代，更顯得彌足珍貴。由於傳統社會對女性角色主內的期許，女性多嫁入夫家後，較少留在原鄉發展，女性的升學情形，在史料上常難以得見。但由前例可以反映兩件事：首先，只要有機會，女性的學業表現未必輸給男性；其次，日治時期對女子教育提倡是有成效的。可惜這唯一畢業又升學的女性，訪問時竟無人知道她後來的發展。

至於陳双祿，校史資料上沒有紀錄，但口訪時得知是升學者，他是光復後一直在石光國中任教英文直到退休陳双錦老師的兄長。依陳老師的說法，陳家為地主，父親只育有他們兄弟二人，兄弟年齡相差 17 歲。³¹²其兄，陳双祿考上新竹中學校，5 年後畢業，考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3 年後畢業，繼續到日本岡山縣念公立醫學大學，5 年後畢業為醫生。³¹³日治時即回臺，在關西開設有田醫院。³¹⁴較特別的是陳双祿曾以「有田」為名，參加關西陶社的活動。³¹⁵

第 5 屆中在教育界表現最突出的畢業生，當屬楊習日³¹⁶，在照片中見他穿文官服，為師範畢業生，與第六屆的朱盛秋、傅招裕一同畢業於昭和 3 年(1929)的臺北師範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養成講習科。³¹⁷

³¹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8，大正十年度重大記事；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

³¹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9，大正十一年度重大記事。新竹中學校設立於大正 11 年(1922)，新竹高等女學校要到大正 13 年(1924)才正式設立。

³¹²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

³¹³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

³¹⁴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

³¹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人本名一覽表〉。

³¹⁶ 見圖 3-3-9，前排左 1。

³¹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4.htm>，頁 23。

第 13 屆(1931 年)中最值得一提是呂榮初。呂榮初是呂阿全二哥呂岳朗的兒子，呂岳朗曾讀過「漢書」(客語)。³¹⁸後舉家搬至竹東往內山的「上坪仔」，但當地交通不便，又沒有設立學校，於是呂榮初只得回石光跟奶奶住，每天赤腳走 2、3 里路到石光公學校上學。新竹中學校當時要 5 年才能畢業，但他只念了 4 年，由於成績很好，即順利考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就讀。他考上的是理科，理科又分 2 組，甲組是現在的工科，乙組才是醫科。呂榮初念的是理科中的乙組，預備未來習醫。3 年後，直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曾在臺北多田內科擔任醫師 2、3 年。³¹⁹

第 23 屆(1941 年)出了一個地方上的傳奇人物，這個傳奇的創造者呂耀樞，他是呂阿全的長子。不論是坪林第 1 屆畢業的學弟徐金統，或是石光畢業的第 20 屆學長邱金球，在事隔 70 年後談來，至今仍津津樂道。³²⁰他以一個公學校畢業的學生，竟然能以第一名考上全臺唯一每屆只招收 40 人的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當時的高等學校尋常科，考試的內容完全以日人就讀的小學校為主。每年考上該校尋常科或高等科的臺灣學生都屈指可數，只有 1、2 人是常態。³²¹幸好堂哥呂榮初曾於暑假返鄉時，告訴呂耀樞可以直接考高等學校的尋常科，之後就可以直升高等科、臺北帝國大學等，以後都不必考試。於是呂耀樞把握機會，十分努力一舉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成為 40 人之一³²²。並使得當時他的導師宮本政四郎，原代理教師出身且剛升為正式教師不久，竟因此事被拔擢為坪林獨立後第二任校長。³²³但就呂耀樞所說，他之所以有能力考上高等學校的尋常科，除了堂兄告知這個升學訊息外，最重要的是他父親呂阿全老師，自幼買各種小學校的教本教他、安排進度，並日日在家自習 1、2 個小時的成果。³²⁴因為在他就讀石光公學校時，日本籍的校長是全面禁止補習的。後來呂耀樞選擇習醫，回竹東開設呂內科診所。³²⁵



³¹⁸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¹⁹ 以上資料為 2013 年 3 月 10 日呂榮初口述。

³²⁰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³²¹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²²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該屆有 6 個臺灣人，包括呂耀樞、黃際鍊、吳文山、施民生、盧焜熙與林榮勳。其中吳文山是新埔的客家人。

³²³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 13 年度(1938)職員，宮本政四郎仍以教員心得新任，昭和 14 年度(1939)始升訓導，竟於昭和 19 年度(1944)即任坪林國民學校第二任校長。

³²⁴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²⁵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圖 3-3-8：石光的畢業生返校留念

資料來源：呂耀樞提供

說明：站立手扶小女孩肩者即為呂耀樞，小女孩是呂耀樞胞妹。



圖 3-3-9：剛就讀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的呂耀樞與父親呂阿全

資料來源：呂耀樞提供，筆者翻拍。

說明：這張照片拍於昭和 16 年(1941)4 月 4 日攝於台北新公園，當時呂阿全正巧是教師節與同事到臺北進行 1 日之旅，順道前往關心在臺北就讀的長子。拍攝者是昭和 15 年度(1940)剛到石光國民學校任職的日籍老師林育三，後來於昭和 16 年度(1941)9 月 1 日徵召入營。

石光校史《學校沿革誌》，在日治時期最後一學年度(昭和 19 年度/1944)的重要大事中，記錄了 10 位升上中等學校的學生名單，除了黃駿迪是第 26 屆畢業生外，其他 9 位都是第 27 屆畢業生。³²⁶升學名單如下：新竹中學校的富山三雄、劉坤炎；臺北第三中學校的岡本學典（即呂學典）；新竹工業學校的宮本紹男(即呂紹男)、黃駿迪(26 屆畢業生)；基隆水產學校的呂榮爵；新竹農業實業學校(位於苗栗)的李宏源；新竹高等女學校的宮本綾子³²⁷；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的富田英子³²⁸；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的潘竹春等。³²⁹

經歷日治 50 年後，對照石光最後一屆的升學紀錄有幾個發現：首先，升學所讀中等學校的類型不再限於師範學校或普通中學，呈現多樣化的走向，新增了各類農工商等實業學校可選擇。其次，在升學區域的選擇上，除了就近到新竹市入學最多外，至臺北升學仍然是重要的選項之一。第三，改日本姓氏者較多，以致核對時出現困擾。

另外，從整體畢業生的人數變化上，也有二點觀察：第一，學生數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從第 1 屆畢業生只有 26 位，之後每一屆幾乎都在增加，雖然可能某幾屆稍有高低，但到了第 20 屆以後，除 21 屆為 85 位外，每一屆皆有上百位

³²⁶ 屆別資料，依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4。

³²⁷ 本名呂文鳳，為呂阿全之三女，呂耀樞之妹。

³²⁸ 推測為張秀英，因張金輝改名為富田英治。

³²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年十九年度重大記事，詳記 10 位考上名單；屆別資料，依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4。

的畢業生，可以發現接受學校教育的人口是越來越多。雖然無法得知當時學齡兒童的總數，但整體上似乎符合全臺公學校學童的就學率，從 1919 年時的 20.7%，到 1944 年時升至 71.1% 的趨勢變化。³³⁰第二，女子受教育的人數始終較男性受教人數少，但在數量及比例上也有日漸增加的趨勢。石光的第一屆畢業生中無女生，在 27 屆中有 9 屆女性是個位數、有 7 屆是 10 餘位，總數上明顯女性受教人數較男性為少。可能原因有的長輩會感嘆是客家族群重男輕女的結果。但與全臺公學校在 1919 年時女性的就學率為 7.4%(男性 32.4%)，到 1944 年時女性的就學率為 60.7%(男性 80.7)的趨勢相比較，³³¹雖然似乎稍低，但並未特別差。而且若考慮到城鄉差異、生計選擇等情況，就會發現重男輕女幾乎是當時臺灣漢人社會的普遍現象。較特別的是，在畢業生總數最多的第 24 屆，全部 170 位畢業生中，女性占 59 位。由此可知，日治時期石光地區在女子教育的推廣上，仍是有成效的。³³²

儘管日治後期，因為戰爭的關係，學校缺少許多具師範資格的老師，也難以進行正常的教學，但從學生升學表現與高等科或中等學校的增設可知，初等教育的推廣是越來越普及。只可惜由於資料的缺乏，造成前幾屆的畢業生有較好的升學表現，後來畢業生反倒不如獨立初期為佳的印象，實在是不得已的結果。此外，後來的學生也可能因為社會越趨繁榮，有了更多的職業選擇，並且可能朝其他地方發展，以至於後來發展的情形，較不容易被鄉親所熟知與記憶。

參、坪林國民學校

坪林本屬於石光的校區，可是因為鳳山溪阻隔其中，使學生上學不易，於是針對幼小的學生於大正 9 年(1920)設立坪林分離教室，大正 12 年(1923)4 月升格為坪林分教場³³³，終於昭和 17 年(1942)，在當時的分校主任呂阿全與數位老師，及地方士紳、父老的通力合作下，得以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

一、創立

最早，在石光校史即有坪林地區交通不便，影響學生上學的記載，大正 4 年(1915)2 月 4 日：「夜來風雨造成硝子、石垣等破損，坪林、下南片方面交通斷絕，學生缺席者多。」³³⁴大正 9 年(1920)《學校沿革誌》即詳載坪林分離教室設的原因，即是「石崗仔公學校的通學區域位於鳳山溪東西，鳳山溪貫流其中，一旦夏季驟雨即泛濫成災。坪林、下橫坑、上橫坑、下南片等各部落學生通學不便且危險，徒使父兄擔憂等」。³³⁵終於使教育當局同意設置坪林分離教室，但是只針對 1 到 4 年級的學生。5、6 年級仍要到石光公學校本部上課。

³³⁰ E. Patricia Tsurumi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4-245.

³³¹ E. Patricia Tsurumi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 244-245.

³³²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及傑出校友〉，頁 19。

³³³ 新竹州內務局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

³³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5，大正三年度重大行事。

³³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7，大正九年度重大行事。大正 9 年 4 月 1 日。

於是又見到昭和 2 年(1928)7 月 31 日的校史記載，因為河水氾濫，所以坪林方面的學童缺席甚多。³³⁶到了昭和 7 年(1932)6 月 8 日，因為豪雨所以午後停課，並分配老師引導學生放學，除大旱坑是仍屬石光公學校學區外，另外需要老師引導或父兄接回的上橫坑、下橫坑與下南片三地，³³⁷都是因鳳山溪阻礙，後來劃入坪林國校的學區。

依黃南琚所撰〈石光公學校之起源〉可知，因為中隔大河，以致交通不便，已為坪林分校的獨立埋下伏筆：

區內坪林、上橫坑、下橫坑、下南片與學校中隔大河，每遇洪水，生徒稚幼，不能渡涉，多致缺席，中尾先生屢為憂之，與拙者商及，拙者乃以祖嘗黃廣恒昌之祭祀公費，節斂釀出，每年初拾石（此換算金百圓）製造竹筏一具，雇工撐渡，俾生徒及其父兄得以安懷無礙。

果然在呂阿全分校主任，奔走各方，期使坪林分校，不至於廢校，反而得以獨立的原因，交通不便，即是外在的客觀因素。

除了環境因素外，坪林國民學校得以由分校獨立，更是人為努力的結果。有一年初夏，呂阿全與范鼎香、陳開華、陳登彬老師自下橫坑家訪回校，遇 3 位州教育人員到校，該夜於校庭開映教育電影，多方招待之。³³⁸聽對方滔滔說出「此分校由北島校主張，得佐藤街長同意廢校，搬回本部一同辦理，省經費，文書已行云云」。³³⁹呂阿全大驚之餘，乃告知本地熱心教育的范朝燈等，與之共議分校獨立。³⁴⁰次日，范朝燈、陳傑昌、劉滿元、陳逢茂等攜請願書 4 份，從關西街至石光本校請願獨立，並邀佐藤街長、北島校長同行到郡州，二者雖拒，地方士紳仍在一日內走完關西街、石光本校、新竹郡、新竹州。³⁴¹於是州郡當局頗感棘手而躊躇，而廢校與獨立兩派則各自暗中運作。³⁴²范士敬所以於昭和 4 年(1927)就讀公學，即是因為當時任教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校的范鼎香老師，害怕坪林遭到廢校，於是在其積極的招生下，同為家族的范士敬即在同宗人為表支持的情況下，雖不足齡也提早入學。³⁴³

適時關西國校舉行州際研究會，有佐伯州視學臨席，北島校長趁機請州視學到分校視察，分校老師本來頗感榮耀。³⁴⁴呂阿全雇慮時間已為傍晚，交通不便，於是自雇汽車招待視學，但報告完校務及學區概況後，竟遭到州視學責罵，制止

³³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9，昭和二年度。

³³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

³³⁸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³⁹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⁰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¹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²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³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³⁴⁴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其提分校獨立之事。³⁴⁵分校老師 4 名老師皆以校為家，每日各班加教 1 小時，將學級、校園整理完善，辦理各項學藝會、每月學業考查成績等，皆較本部各班為佳。³⁴⁶受此不公，頗感不平。另有一日，忽然大橋郡守和中原郡視學，巡視分校，對分校的上課情形及校園深為讚賞，認為之前訪視的國校反而不如此分校，應該彼此對調，並讓該國校的老師到此分校學習。³⁴⁷幸而有一次呂阿全到關西時，遇到佐藤街長，問及廢校一事，經呂阿全多方解釋：帝國議會已每年提及臺灣要實施義務教育，到時無學校之處必要設校；何況坪林因河川阻隔之故，學區共 4 保有餘；人口眾多，每年學齡兒童超過 2、3 班等，佐藤街長才感慨輕信介入地方派系的北島熊雄校長之言，從此不敢到坪林視察。³⁴⁸最後，最關鍵的是北島校長調任他校，石光公學校改由宮崎徹雄校長接任，呂阿全於是利用宮崎校長好釣魚及杯中物之事，與地方人士計議，池塘供他釣魚，以酒肉釣之，於是在老師與地方人士合議之下，常約宮崎校長釣魚及飲宴，常至范鼎香、范朝燈、范朝宗等處，並由范朝燈、范朝宗、陳傑昌、劉滿元等地方保正、士紳作陪，趁他酒興提及獨立一事，後來更計劃帶至較偏僻的上橫坑賴龍來處、下橫坑劉滿元處，讓他感受 6、7 歲小兒過河上學、遠行之苦，後來對其提及該區學童於坪林分校念完 4 年後，因為要奔波渡過鳳山溪，到石光本校念書時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最後多數輟學，宮崎校長竟無言以對。³⁴⁹於是提及仲西郡視學亦是釣客，約他到此，並由呂杰全、范鼎香將此計劃通告地方人士，請其某一星期六視導本校及分校，路上遇之鄉民皆恭敬行禮，中午大宴范朝宗府，並請地方父兄言及，通學石光之苦等，欣悅之餘及允坪林獨立，眾皆歡騰。³⁵⁰於是 1942 年 5 月 13 日舉行獨立盛典。

第二任校長宮本政四郎轉述首任富山貢校長在交接時對他叮嚀的話：

這個學校和一般新創設的學校有些不同的地方，因為長期處於分校的身份，但已充分發揮學校的機能。從分校主任呂阿全先生開始，包括范鼎香及其他各位先生，未曾辜負學生家長及地方賢達的期待與指望，自動自發，努力教學，相信你一定能夠圓滿達成校長任務。」³⁵¹

坪林該地的士紳和師長積極的爭取獨立，終於獲得了獨立的果實。

³⁴⁵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⁶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⁷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8。

³⁴⁸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9。

³⁴⁹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9。

³⁵⁰ 呂杰全：〈慶祝坪林國民小學卅週年校慶〉，收於呂杰全：《岳三小集》，頁 19-20。

³⁵¹ 宮本政四郎口述、邱金球校長譯：〈宮本政四郎校長日語賀詞〉，收於林桂蘭主編：《坪林國小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特刊》，頁 30-1。在石光任教 6 年後，於 1944 年(昭和 19 年度)調任坪林擔任第二任校長。



圖 3-3-10：昭和 17 年坪林國民學校開校記念

資料來源：范碧蓮老師提供

二、師資

坪林國民學校於日治後期才獨立，獨立不久即光復，所以獨立後其師資多沿續分校時期的師資，而且絕大部分皆是石光公學校的畢業生，詳見圖 3-3-9 說明。除了創校居大功的呂阿全與范鼎香，分別是石光公學校第 1 屆與第 3 屆的畢業生，³⁵²兩者先後從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分發至石光任教，後來又分配至坪林分校教書，就成為坪林國校得以獨立的最重要推手。至於陳登彬、黃本源等在坪林分校教了 10 多年，也都是石光公學校第 1 屆畢業生。³⁵³



圖 3-3-11：昭和 17 年坪林首屆畢業生師長

資料來源：徐金統老師提供照片並說明。

說明：1、背後石像：二宮尊德(原為范朝燈所捐，光復後移至南和里范家)。2、後排左起：陳錦英(上橫坑人嫁新埔)、陳梅英、彭贊銜(石光第 19 屆、范鼎香姑表兄弟)、陳送妹(石光第 15 屆、坪林首位家長會長陳傑昌女兒)、范何英妹(范鼎香妻)；前排左起(前 4 位皆著文官服為日治時期師範學校畢業)：楊習日(石光第 5 屆)、范鼎香(石光第 3 屆)、富山貢(日本人、坪林首位校長)、戴連秀(石光第 2 屆)、古沐金(石光第 14 屆)。

³⁵²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第 1 屆、第 3 屆畢業生名冊。

³⁵³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第 1 屆畢業生名冊(1919 年 3 月)。

三、升學表現

在石光有第 25 屆(1943)畢業生時，脫離石光獨立的坪林國民學校有了第 1 屆畢業生，雖然在 69 人中只有 13 人選擇升學，但在 1、6 年級是范鼎香老師教，2 至 5 年級是呂阿全老師教導之下，且在 4 年級以後這 2 位老師就全力於課後為學生加強小學校教材的情況下，這 13 位學生皆考上理想的學校而能升學。³⁵⁴其中有 7 名：徐金統、范光建、劉建榜、謝金臺、譚仁誠、羅欽章、姜洪章等考上花蓮農林實業學校；范朝燈的 5 子范光銘考上新竹中學校；范鼎香的長女范碧蓮考上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范朝宗的兒子范光順、楊習日的長子楊燕雄等也考上臺北的中學。³⁵⁵至於范光權等人，由於時間日久資料待考，但整體成果已是傲人。後來徐金統、范光建、劉建榜、范光銘、范碧蓮等皆任教職³⁵⁶，范光順成為律師等。大部分也留在關西任教或發展，對於地方教育的傳承貢獻良多。

另外，筆者在相關訪談及校史資料整理後，有幾點發現：

首先，關西公學校校長是關西街教育權力最大者，屬市區學校，日籍老師較石光、錦山、坪林為多。就讀關西的余新源、楊澄清、邱永貞在公學校至少遇到一半的老師為日籍，就如楊澄清所說日、臺籍老師的比例為一半一半；反觀石光、坪林，除了校長一定為日籍外，公學校六年可能只遇到一位日籍老師，或者全部被臺籍老師教到畢業。

其次，日、臺籍老師的薪資是不對等的，一樣是訓導或教員心得，薪資就差了 5 分之 2 左右。

再者，依楊澄清 18 歲就進行教學研究的示範教學工作，及其說明；加上石光《學校沿革誌》中的記載，研究會常在坪林分校辦理，常由一些年輕或新進教師負責，少部分會出現較資深優秀的老師，如書法特優的呂杰全老師。由此可知：教學研究會與今日教學觀摩相近，沒有人喜歡示範教學給眾人品評，常指派一些年輕的臺籍教師示範。

最後，查閱了關西 100 週年、石光 90 週年、坪林 60 週年的校慶特刊中的教職員名錄與畢業學生名冊後，發現：早期的畢業生常成為在地的早期的臺籍教師，符合日治時期的教育目的，一般人受公學校教育培養國民的美德即可；較優秀的人才即入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培養成公務員或公學校教師，而這些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畢業後也大多返鄉任教。所以常見到石光畢業的學生若不回石光教，也多至關西，關西畢業的學生也多回關西或至石光、坪林、錦山等校任教。

³⁵⁴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配合林桂蘭主編：《坪林國小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特刊》，頁 62，第 1 屆畢業生名冊。

³⁵⁵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配合林桂蘭主編：《坪林國小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特刊》，頁 62，第 1 屆畢業生名冊。

³⁵⁶ 研究者前後親自訪問了這 5 位坪林國民學校日治時期的第 1 屆畢業生。

第四節 關西地區的升學情況

日治前關西地區設立的公學校只有咸菜礮公學校，當時臺灣人的升學管道有限。1919 以前，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是當時兩所臺人的最高學府。³⁵⁷所以教師與醫師遂成為少數臺灣人得以合法向上流動的兩個管道。³⁵⁸證諸咸菜礮學校早期的升學代表，即有相印證的例子。如：郭澄海於咸菜礮公學校就讀 5 年後，即至臺北的總督府醫學校就讀，後來成為關西地區的公醫，也是第一個西醫。另外，咸菜礮公學校第 4 屆的畢業生羅享錦，考上國語學校乙科師範部，畢業後曾返回母校任教，後來改經營茶業等事業，並成日治時期首位臺籍關西庄長。由於關西市區後來的學生數相當多，研究者較無法掌握。但 1918 年後獨立的石光公學校，位於關西、新埔兩庄交界，屬於較鄉下的客家人聚居區，發現以石光的畢業生的升學情況，即可代表日治時期客家庄學生的升學移動情形。

以下將以石光公學校畢業生的升學情況為主進行分析，並兼及關西、坪林兩校的畢業生。發現其升學移動情況，可以概分如下：一、就近入學，以桃竹苗地區為主；二、跨區至臺灣本島桃竹苗以外的地區就讀，以臺北為最多；三、留日升學。總之，即使是家境許可，是否有人介紹帶領或得到訊息是升學時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壹、就近於桃竹苗地區升學

這一類的升學又可分成四種，分別為升普通中學、高等科與實業補習學校、實業學校與師範學校臨時教育養成所等。

一、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等女學校

能選擇此類學校就讀者，通常是成績頂尖或家世突出者，在桃竹苗地區，只有大正 11 年(1922)設立的新竹中學校與大正 13 年(1924)的新竹高等女學校可以選擇。這一類的學生可以石光地區的呂家及坪林地區的范家為代表。

呂阿全是石光第 1 屆(1918)的畢業生，於大正 12 年(1924)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回母校任教。³⁵⁹呂阿全是石光呂家中，最早接受日式學校教育成功的典範，當他回石光任教後，接著呂家下一代呂錦榮、呂榮初與呂耀樞都成為地方上成績傑出的升學驕傲，後來都成為醫師。³⁶⁰呂阿全大哥清波的兒子呂錦榮，為石光第 8 屆(1926)畢業生³⁶¹，成績頂尖後來成為醫師。³⁶²呂阿全二哥岳朗的長子呂榮初，為石光公學校第 13 屆(1931)的畢業生，考上新竹中學校，當時為 5 年制，但他念完 4 年後，即升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後來直升醫學院。³⁶³於是在呂榮初暑

³⁵⁷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90。

³⁵⁸ E. Patricia Tsurumi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45-47.

³⁵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53，大正十二年度主要行事。

³⁶⁰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⁶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8，第 8 屆畢業生名冊。

³⁶²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⁶³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呂榮初 2013 年 4 月 20 日口述。

假回鄉時，告訴呂阿全的長子呂耀樞，考上臺北高校尋常科，即可直升時，即讓呂耀樞締造了一個升學傳奇。³⁶⁴但這所比新竹中學校更難考上的學校，位於臺北，將列入下文跨區就讀部分說明。

另外呂阿全的女兒也表現傑出，長女呂潤玉為石光第 19 屆(1937)畢業生³⁶⁵，三女呂文鳳為石光第 27 屆(1945)畢業生³⁶⁶，都考上新竹高等女學校。³⁶⁷

至於成績不錯但家世有加分效果的則以坪林范家為代表。石光第 18 屆(1936 年)有范朝燈的雙生子范光宇、光宙，後來北上考取臺北的私立中學，後因范朝燈的日籍友人深井米次郎由新竹高等女學校，調任新竹中學校校長，透過轉學考，將 2 子轉入新竹中學校。³⁶⁸於是范家排行第五的范光銘，是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也同此機緣考上新竹中學校。³⁶⁹

另外，楊習日的女兒楊美蓮，坪林第 1 屆(1943)畢業生也考上新竹高等女學校。³⁷⁰

二、高等科與實業補習學校

石光第 5 屆(1924)畢業時，新埔公學校已開設高等科，當時即有林阿亮、范瑞泉、黃駿波等成為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第 1 屆(1925)的畢業生。³⁷¹其中林阿亮，曾任太平國語講習所的講師。³⁷²

就讀高等科一般只是進一步升學或就業的過渡，例如、石光第 20 屆的邱金球與張秀嬌、21 屆的劉香蘭等，就讀新埔高等科後，後來皆繼續升學。³⁷³其中邱金球即曾明白的說，讀高等科只是一種資歷而已。³⁷⁴邱金球考上新竹師範臨時教員養成所成為石光的助教後，又繼續考上臺南師範的屏東師範部。張秀嬌與劉香蘭則一同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成為同學。這三人陸續於日治末、光復後續任教職，直至退休。除此外，石光第 20 屆畢業生徐玉竹，則以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的學歷，在滿 20 歲後，考上警察，受訓 6 個月後，即成正式的巡察。³⁷⁵雖然考當時警察者不限學歷³⁷⁶，但是高等科的學習，仍有助於他通過考試。

最後，前述關西公學校 35 屆畢業生楊澄清³⁷⁷，亦於關西農業補習學校畢業

³⁶⁴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而這個直升高校傳奇，在 70 年後的今天，在訪談時仍被一同走過那個時代，今年 89 歲的邱金球校長與 84 歲的徐金統老師所津津樂道，他們都是呂阿全在石光與坪林任教時的學生。

³⁶⁵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19 屆畢業生名冊。

³⁶⁶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4，第 27 屆畢業生名冊。

³⁶⁷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但呂文鳳考上後，不久臺灣光復，所以她是新竹女中畢業。

³⁶⁸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 109。

³⁶⁹ 范光銘 2012 年 5 月 7 日口述。

³⁷⁰ 楊美蓮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

³⁷¹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8。

³⁷²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³⁷³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15。

³⁷⁴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³⁷⁵ 徐玉竹 2013 年 3 月 10 日口述。

³⁷⁶ 徐玉竹 2013 年 3 月 10 日口述，當警察者，無論中學、大學都可以考。

³⁷⁷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86。

後，考上新竹簡易師範，修業 1 年後，成為正式的國民學校教師，任教於錦山國民學校。³⁷⁸可見高等科和實業補習學校，常是求職或進一步受教的有利跳板。由於學校位置及升學門檻較低，反而是當地人就地升學的常見選項。

三、實業學校

石光公學校第 20 屆的畢業生張秀嬌、21 屆的劉香蘭，與 22 屆的陳嫦娥、張小喬等，由於一同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成為同學。³⁷⁹畢業後，張秀嬌、劉香蘭與陳嫦娥等皆任教職，劉香蘭及陳嫦娥分別返回新埔的照門公學校與關西的石光公學校任教。



圖 3-4-1：新竹家政女學校同學

資料來源：劉香蘭老師提供。

說明：後排左 1 張小喬、左 2 張秀嬌、左 4 劉香蘭，前排右 1 陳嫦娥。

四、師範學校

畢業自關西公學校附設的關西農業補習學校的楊澄清，受該校高木勇老師推薦，考上新竹師範，在受過一年簡易師範後，畢業即成為「訓導」，是正式的老師，有官服，並不是「助教」。畢業後，僅 18 歲而已即被派往關西的錦山國民學校教授一年級，並被高島校長委以教學觀摩之責。³⁸⁰按楊氏所述，他在錦山國民學校教了 2 年，後在關西教了 1、2 年就光復。³⁸¹而錦山國民學校設立於 1941 年 4 月，可見楊老師至新竹師範就讀的時候為 1940 年左右。當時該校除了有簡易師範科也設有演習科，楊氏考到的是簡易師範，主要開設於戰時，班上的同學來自臺灣各地，從臺北到高雄皆有，畢業後也分發至全臺各地，不一定回鄉。³⁸²所以楊澄清受教於新竹師範設置後較早期的例子。

其次，石光公學校第 20 屆(1938 年)畢業生邱金球，於昭和 7 年(1932)7 歲時入學於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校，昭和 13 年(1938)3 月 31 日於石光公學校畢業。次年(1939)先就讀新埔高等科，2 年後畢業。畢業後，正當無事，受到當時的新埔國民學校校長推薦，至新竹師範接受半年的臨時教員養成所訓練，得到助教資格，於昭和 17 年(1942)3 月 31 日結業，4 月 1 日即被派至石光當助教，擔任 2 年級級

³⁷⁸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³⁷⁹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15。

³⁸⁰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另外，蘇添明 2012 年 8 月 19 日口述，亦很得意的說他是光復後關西初農第 3 屆畢業。

³⁸¹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³⁸²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楊主任稱其運氣好，得以派回故鄉任教。

任。當時僅 18 歲而已，是學校最年輕的老師。但他本人並不滿意，一心想穿上文官服，考上正式的教師資格，於是代理教師一年後，於昭和 18 年(1944)，即考上臺南師範學校的屏東師範部(預科)，繼續進修。³⁸³

最後，石光公學校第 17 屆畢業生范士敬以曾參與青年團幹部訓練的資格，由坪林國民學校推薦，於昭和 17 年(1943)考上新竹師範的臨時教員養成所，經過半年的訓練，得到國民學校「助教」的資格，於昭和 18 年(1944)奉派回石光國校任教。³⁸⁴繼任邱金球離開石光公學校產生的助教缺。

貳、跨區至桃竹苗區以外就讀

跨區就讀的例子相當多，北至臺北、基隆，東至花蓮，南至臺中、臺南或屏東，幾乎只有交通到得了的地方，就有學子前往就讀，可見能掌握就學機會者，為了升學，是不怕路途遙遠的，此類例子以日治晚期為多。唯一的例外就是臺北，臺北由於中等學校創設最早也最多，日治早期即是學生的升學首選，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日治後期。

一、臺北

臺北可以選擇的學校甚多，從日治早期最早設立的國語學校、醫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女學校，及其他各類私立學校，關西地區的學生都可能前往就讀。舉例如下。

(一)國語學校、醫學校

臺北是日治時代最多中等教育機構的地方。從只有國語學校、醫學校可升學的時期，到臺北師範學校成為石光第 1 到第 6 屆畢業生最多升學的選擇時期，臺北以其優秀的發展與最多學校的設置，成為跨區就讀時，最多人選擇的地方。在國語學校時期，在羅享錦之後接任關西庄長的陳俊玖，即為國語學校國語部出身。而醫學校畢業者，則以就讀咸菜礮公學校 5 年後，後來成為關西首位公醫的郭澄海為代表。

(二)臺北高等學校

因此若是成績相當頂尖，或是家族能支援時，留在新竹升學也交通不便，不如到臺北念書，將有更多的可能與選擇。若以臺灣中等學校的目標，依照的順序是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北第三中學校的順序，可是高等學校尋常科在全臺灣只有一所，在全日本也是少數，一旦考上又有直升高等學校高等科後，繼續直升大學的優勢，不必再經過其他考試，自然比一般中學校更具吸引力。³⁸⁵依今人徐聖凱的研究指出，最難考入高等學校高等科者，為公學校出身，且並非就讀臺北市中學校的臺灣人；而最難考入高等學校尋常科者，則為公學校

³⁸³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其助教資歷及考上臺南師範一事，皆詳載於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七年度重大行事。

³⁸⁴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詳見第六章社會教育第三節青年團部分。

³⁸⁵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師大，2012 年)，頁 139。

出身，又非在臺北市就學的臺人子弟。³⁸⁶但出身關西鄉下石岡子呂家堂兄弟竟然辦到了。呂榮初為石光公學校第 13 屆畢生³⁸⁷，畢業後順利考上新竹中學校，就讀 4 年後，即順利考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³⁸⁸而呂榮初在就讀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期間，曾於暑假時返鄉，告訴其堂弟呂耀樞，若能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往後就能直升(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大學，就不必再考。³⁸⁹於是本在石光公學校教書的父親呂阿全，從公學校一年級即同時指導、安排進度學習小學校與公學校課本的呂耀樞，終於在石光公學校畢業後，一舉順利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³⁹⁰於是呂耀樞這個不可能的升學任務，成了地方上津津樂道的傳奇。



圖 3-4-2 呂耀樞於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時期
資料來源：呂耀樞提供



圖 3-4-3 呂耀樞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三年級
資料來源：呂耀樞提供

³⁸⁶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145。

³⁸⁷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9。

³⁸⁸ 呂榮初 2013 年 4 月 20 日口述。

³⁸⁹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³⁹⁰ 呂耀樞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

(三)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至於女性升學方面，臺灣人還是以招收臺灣人為主的第三高等女學校最為可能，是許多臺灣女性選擇就讀的學校，例如：范鼎香之妻范何英妹，是竹東人，畢業自臺北第三高女第 4 屆，他們的女兒范碧蓮為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2 年)畢業生，則是臺北第三高女第 24 屆畢業生。³⁹¹

另外，石光第 4 屆(1922)畢業生中唯一的女生張玉春，順利的考上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³⁹²，可惜不知其後來發展。同時，關西公學校第 18 屆(1922 年)畢業生黃月妹³⁹³，受兄長黃德助之助，於畢業後考上臺北第三高女。第三高女畢業後經過檢定具有訓導資格，不但於 1929 年 7 月開始在關西公學校任教³⁹⁴，並在公學校附設的關西農業補習學校兼課。³⁹⁵而當時能有資格至公學校附設的高等科或農業補習學校任教，一般以日人優先，而黃月妹竟然能至農業補習學校兼課，可見其學力當備受肯定。符合當時人的想法，若能到考上臺北第三高女者，其成績要比考上新竹高等女學校更好才行。³⁹⁶除了在新竹高等女學校未成立前，關西地區的女學生只能前往臺北應考外，到了後來臺北市區的文教競爭，應該比桃竹苗地區更為激烈，故時人乃有這種看法。並且在前面 4 個例子中，就有 3 個後來皆成為老師。

(四)其他

這類的學校，以私立學校為多。最早出現的是石光第 3 屆畢業生吳拱照，畢業後念的是臺北的成淵中學，後來成為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³⁹⁷還有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畢業生范光順，考上臺北的私立泰北中學。³⁹⁸關西第 33 屆的畢業生黃欽文、范綱進，一同考上私立的臺北商業學校。³⁹⁹

其次，要舉的例子是長者教會辦的女子學校---宮前女中。邱永貞於關西公學校第 38 屆(1942)畢業後，至臺北依靠父親生活，通過入學考試後，念今中山北路的宮前女中，是馬偕在臺設置的學校之一。學校有教會老師，也曾被馬偕的後

³⁹¹ 范碧蓮 2012 年 8 月 24 日口述。范碧蓮考上第三高女的事她的同學，徐金統、劉建榜等在口述時皆有談到。

³⁹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9，大正十一年度主要行事。新竹高等女學校要到大正 13 年(1924)才正式設立。

³⁹³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3。

³⁹⁴ 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16。

³⁹⁵ 邱永貞老師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黃月妹即邱永貞的姑姑，因其父入贅，邱永貞從母姓，其夫為楊澄清。楊澄清於 1944 年從錦山國民學校調回關西國民學校教書，曾與黃月妹為關西國民學校同事，楊指出關西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55 的照片，並非該校第一位女教師魏庚全之照，實為有關西美人之名的黃月妹老師。

³⁹⁶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³⁹⁷ 黃榮洛：〈以文化協會領導抗日的吳拱照烈士〉，收於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163；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頁 473-474；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

³⁹⁸ 劉建榜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³⁹⁹ 余新源 2012 年 8 月 16 日口述。

人教到，但學校以日本老師為多，學生來源來自全島各處教會信眾，但沒有信仰者亦可考入就讀。⁴⁰⁰

其他例子尚多，難以贅述。但由以上去臺北就讀各類學校的例子可知，臺北的中學校，較其他各地而言，可說有最多的選擇，該地在日治時期的文教發展與升學機會，已比臺灣其他地方更盛、更多，位於北臺的學生自然會選擇前往就讀，即使是位於關西鄉下的學生也不例外。

二、淡水、基隆

蘇添明家族自祖父胡傑榮開始信基督教，為關西長老教會的一員。其曾祖父與祖父是抗日分子，在逃避日人追捕時，曾祖父讓祖父先逃，後來其曾祖父即失蹤。胡傑榮只好避去淡水讀馬偕開辦的牛津學堂，從此開始信教，以為較為安全，因為日治初期外國人仍有一定的勢力，怎知讀幾年後，尚未畢業，仍被殖民政府查知，只得輟學。⁴⁰¹這是日治初期為躲避殖民政府也不得到淡水求學的例子。

石光公學校第 15 屆(1933 年)的畢業生中，陳送妹是坪林逢茂農園陳傑昌的女兒，後來考基隆高等女學校。⁴⁰²至於為何要遠至基隆升學，原因即是當時的新竹高等女學校名額十分有限，考得上的沒幾個，只得遠到基隆升學。由於學校離家甚遠，住在學校宿舍，一年只能回家 2 次。⁴⁰³當時中學的老師皆為日本人，正巧石光公學有缺老師，於是一畢業就教書。⁴⁰⁴於昭和 16 年度(1941)即到當時的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校擔任「助教」。⁴⁰⁵

三、臺中、屏東

依前文所述在石崗仔公學校第 3 屆畢業生中，終於有陳俊樓、陳興錦考上臺中一中，但要到畢業第二年才考上。⁴⁰⁶陳俊樓於臺中一中畢業後，留日升學，歸入下文。

石光第 22 屆(1940 年)畢業生有張俊達考上臺中師範，他的父親即是第 1 屆畢業生張金輝。⁴⁰⁷光復後也追隨父親的腳步，回石光任教，二代同為石光的老師。

⁴⁰⁸

⁴⁰⁰ 邱永貞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宮前女中即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於光復後併入淡江中學。

⁴⁰¹ 蘇添明 2012 年 8 月 19 日口述。

⁴⁰² 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12，陳送妹老師原來說的是「基隆中學」，按當時只招男生，女生進得應是「基隆高等女學校」，故改之。

⁴⁰³ 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

⁴⁰⁴ 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

⁴⁰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

⁴⁰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9，大正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⁴⁰⁷ 邱金球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

⁴⁰⁸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15。

四、宜蘭、花蓮

關西公學校第 33 屆(19)畢業生范玉紅，考到宜蘭農林學校。⁴⁰⁹本以為到宜蘭念書已經很遠，竟發現還有更遠的例子。在坪林國民學校第 1 屆(1943)的畢業生中，雖然在 69 人中，只有 13 個人選擇升學並能升學，而這 13 位學生卻皆能考上上級學校而升學。其中最令人訝異的是，竟有 7 名學生：徐金統、范光建、劉建榜、謝金臺、譚仁誠、羅欽章、姜洪章等，一同考上花蓮農林實業學校。⁴¹⁰

當放榜時，由於路途太遠，只能請當地的店主以電報代碼方式告知考試結果，7 位皆順利考上，並前往就讀，直到後來因為戰亂，才陸續改念他校。⁴¹¹日治後期由於戰爭的關係，並沒有多少時間花在課業上，當時就學花蓮農林學校的徐金統，描述最生動詳實的記憶，就是學生宿舍欺負人的學長學弟制、夜行軍、挖壕溝、防空演習、避空襲、逃難，及最後切過中央山脈逃回新竹的旅程。⁴¹²其實，當時要奔波至花蓮念書是相當辛苦的。除了公學校時期就要準備公學校與小學校的 2 份教材外，交通更是一大考驗。徐金統即描述了從關西前往花蓮就讀所需的交通：

先坐巴士到竹北，再坐火車，坐到蘇澳，到蘇澳大概下午 3 點多，下車找旅館，在那邊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 8 點，因為當時的蘇花公路是單行道，再買那個車票，大概下午 3 點多就到花蓮。⁴¹³

回程就得利用下午返回的車，等於去一趟就要 2 天的時間。

依當時的交通情況，似乎只要到得了的地方，關西地區的老師和學生就會把握難得的升學機會，想辦法考進去，而偏遠地區的新學校可能較少競爭，例如花蓮農林學校，就成了想升學的坪林國民學校師生的目標。但是考試時，只寫錯一題數學的徐金統，本來相當難過，以為沒希望了。⁴¹⁴直到考上，才理解考題並不難。

參、留日

留日升學是很多家境較佳，又無法忍受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臺灣人，為其子弟較容易有升學機會，所作的選擇。若家族或鄉親有人可以帶領、介紹，走上留日之路，幾乎是日治後期家境許可者，很常見的選擇。可以分成升大學與升中學兩種情況。升大學才留日者，因為年齡較大，常是家族或地方上留日升學的開路先

⁴⁰⁹ 余新源 2012 年 8 月 16 日口述。

⁴¹⁰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范光建 2012 年 4 月 27 日口述；劉建榜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⁴¹¹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老師甚至說，在戰末時因為這 7 位學生都離開花蓮農林學校，該校校長還特定到新埔來開家長說明會，但光復後，這 7 位同學大多轉念桃農、淡水水產等北臺灣的學校。

⁴¹²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詳見附錄八徐金統訪談逐字稿。

⁴¹³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⁴¹⁴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鋒等有兄長、學長、鄰里、親族留日有成後，才較會出現年齡較小，以升中學為目標的留日學生。

一、升大學

以留日升大學而言，在日治中期，即有石光第 2-4 屆的學生，在臺灣完成中等教育之後，進一步前往日本升大學。朱盛淇雖然列為石光第 2 屆(1920)畢業生名冊上，但實際上於 5 年級時即插考考取臺北師範學校，並與呂阿全一樣，師範一畢業的大正 13 年(1914)即回母校任教，並於昭和 6 年(1931)於石光公學校退職，轉而前往東京留學。⁴¹⁵於昭和 9 年(1934)日本東京大學專門部法律本科畢業，後經高等考試司法科及格、高等考試行政科及格等，先後在日本及新竹成為開業律師，往後並走上從政之路。⁴¹⁶

石光第 3 屆(1921)的畢業生陳俊樓於臺中一中畢業後，選擇留日升學，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後，在日本的法院工作，之到臺灣光復才返臺。⁴¹⁷

石光第 4 屆(1922)畢業生陳双祿，陳家為地主，只育有 2 子，兄弟年齡相差 17 歲，身為兄長的陳双祿，畢業後考上新竹中學校，5 年畢業後，再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理科，3 年後畢業。⁴¹⁸照理，若想習醫，在臺灣也可直升臺灣帝國大學。但不知何故，卻轉往日本岡山縣念醫學大學，5 年後畢業，成為醫生，返臺開業，在關西街上開設有田醫院。⁴¹⁹有了兄長留日的啟航之旅在前，身為弟弟的陳双錦就更早就前往日本留學，詳見下文升中學的部分。

到日治後期，赴日升學更為常見，關西公學校 33 屆(1937)畢業的余玉振、葉清流與林安富，畢業後順利考到新竹中學校，於竹中畢業後，葉清流和林安富也選擇到日本留學。⁴²⁰

二、升中學

范朝燈的長子范光霖是石光第 17 屆(1935)畢業生。⁴²¹由於升中學時新竹州只有新竹中學校，一個年級三個班，二個班是日本人，剩下 50 個名額由臺人競爭，因此臺灣人的升學競爭相當激烈，於是范朝燈聽從鄰居陳阿郎之言，將長子送往日本鹿兒島縣念鹿屋中學，後考上京都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回臺，入臺大第二附屬醫院服務。⁴²²石光同一屆同學中朱金鏤、朱金輝等後來也都留日。⁴²³可見到了日治後期為了讓子女受到較好的升學發展，越來越多家庭有能力與機會將子女送

⁴¹⁵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3。

⁴¹⁶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3。

⁴¹⁷ 天主教內思高工--在臺復校五十週年校誌(1954-2004)，〈肆章、筆路藍縷、胼手胝足〉，網址：http://www.savs.hcc.edu.tw/50years/htm/04_r_3.html。

⁴¹⁸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

⁴¹⁹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陳双祿是陳双錦的兄長。

⁴²⁰ 余新源 2012 年 8 月 16 日口述。余新源也是同校該屆的畢業生，對少數一起努力升學的同學印象相當深刻。

⁴²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十九屆畢業生名冊。

⁴²²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 105-107。筆者核對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及訪問陳阿郎的姪女陳嫦娥老師後，發現此處的陳阿郎，即是石光公學校早期的老師。

⁴²³ 邱金球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往日本留學。

石光第 20 屆(1938)的畢業生陳双錦，石光公學校畢業後，由於兄長陳双祿在日本念醫學大學，即前往依附兄長，就讀日本岡山縣私立的關西中學校⁴²⁴。5 年後畢業，就讀大學期間正逢二次大戰，未畢業，即回臺。⁴²⁵

在現有關西地區留日升學的例子中，未見到有客家女性到日本留學的例子。並不是家族沒有能力，更可能的是受限於當時社會對女子受教的觀點所限。以經營跨國企業的逢茂農園園主陳傑昌的子女而言，長子瑞堂與次子逢鑑，都留日，進而旅居日本，身為妹妹的陳送妹則只留在臺灣念公學校後，念中學，最後返鄉教書，進而結婚。⁴²⁶雖然女性能有這樣的職業選擇與發展，已算不錯，但受限於社會、家庭對男女的期許不同，發展即迥然不同。

由以上舉例可知，僅舉關西地區較偏鄉的石光與坪林二所學校的升學成果，就可以展現如此輝煌的升學成果，及為了升學奔波至全臺的情況，應可說明客家庄對教育的重視。即使沒有好的環境，但只要有人適切帶領，有一群人對教育的重視，都會起帶領與引導的結果。

總之，即使是成績頗佳、家境許可，但是否有人介紹、帶領，或適時得到訊息，反而是升學時很重要的關鍵。

第五節 小結

綜前所述，日治時期全臺初等教育機構的設置，並非一步到位全島設置，而是考量殖民地各地的繁榮情況、配合地方士紳的教育經費支持與需求，一步步發展。以關西地區為例，第一階段時期(1919 年之前)只在 1899 年於咸菜礮街上設置了第一所公學校--咸菜礮公學校；第二階段(1919 年-1936 年)則於 1919 年將原屬咸菜礮公學校的石崗仔分校加以獨立，成為關西地區第二所公學校；第三階段則於 1941 年將附屬於關西公學校(原咸菜礮公學校)的馬武督分校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另於 1942 年將原屬於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校，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這樣先後分別設校的過程，正巧符合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教育政策的三個階段。或可藉關西地區公學校設置的歷程，窺見殖民政府在臺灣，如何由點到面、一步步普及初等教育的過程。前文已說明，關西地區如何從咸菜礮公學校、石崗仔公學校，到坪林國民學校的設立過程，至於同為第三階段才設立的錦山國民學校，由於位客家與原住民交界區，暫不討論。此三校不但反映了殖民政府初等教

⁴²⁴ 上網查發現岡山縣雖不位於日本的關西地區，但的確有一個財團法人關西學園，在經營關西高等學校等學校。

⁴²⁵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

⁴²⁶ 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兄長名另查不著撰者：〈致力於繁榮鄉里的聖人伯一陳傑昌〉，頁 129-130，收於劉立敏計劃主持：《關西坪林地區百年發展與文化記憶名錄》，頁 126-130。

育推動的成果，由於位於客家人聚居之地，也反映了客家先民如何因應或配合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努力推廣教育的成果。

在閩客族群的比較上，以公學校的就學率為例發現：首先，閩客籍重視教育的情況相近，但純客庄似乎較好些，例如：湖口、新埔、關西、楊梅、龍潭、頭分等庄，皆較同郡各街庄為佳。其次位於較繁榮處的閩客各街庄，皆有較佳的就學率，可見經濟發展，雖會影響普及教育的因素之一，但某些客家庄卻未受到限制。如：閩人居優勢的桃園郡和客家人居優勢的中壢郡在就學率的比較上皆偏低，反而是客家人居優勢的竹東郡的就學率較高。最後，重視教育的客家庄也較重視女子教育，其就學率顯然較閩籍居優勢的街庄為佳，如：客家人較多的關西、龍潭、竹東與新埔等庄，雖然其整體就學率未必最高，但是女生的就學率皆在平均以上。破除一般人認為客家人重男輕女，所以較不重視女子教育的說法。但在各庄、各家庭間仍有差異存在，不可一概而論。

在日本政府為了有效殖民，所設計的國民教育與統治精英的壓抑性教育制度下，卻無法壓抑一旦受教者日多而所自然產生的升學需求。到了 1920 年之後，桃竹苗地區合稱「新竹州」，進入了政治制度上的穩定期，初等教育也穩定發展，於是臺人產生中等教育的需求，全臺各地開始增設中等教育機構，但桃竹苗區只有新竹中學校與新竹高等女學校 2 所，分別設於大正 11 年(1922)與大正 13 年(1924)，難以滿足此區臺人的升學需要。於是當地人除了就近入學外，家境稍佳者也會選擇奔波到臺灣其他地區的中等學校就讀。

依筆者訪談的結果，較關西市街晚發展的石光及坪林地區，到了日治中、後期，也有讓兒子留日的例子，可知留日已成獲得較好教育機會的可能選項。若留在桃竹苗地區升學，只有新竹中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可選擇，因此只有家境不錯、能力也好的，才有辦法升學。到了日治後期為了因應戰時所需，設置了更多初級的實業學校，臺灣人想升學者才有較多的選擇。1937 年後，即教育政策發展的第三階段，該區才增設了桃園農林職業學校、新竹家政女學校、中壢家政實業學校、新竹工業職業學校等，或是新竹師範半年制的簡易師範。若不留在家鄉就近升學，在日治中期後，較常見負笈遠至臺北升學，主要念師範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各類私立學校等，也有少數人往南至臺中，念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或是再往南，至臺南師範學校念屏東預科。而以交通的困難度來說，為了能念中學，竟也有遠至花蓮念花蓮農林學校者。可以說，只要有機會升學，這些客家子弟往往是無懼路遙途遠爭取之。到日治中後期，甚至也有進一步留學日本升大學或中學者。

總之，日本殖民政府統治臺灣是臺灣人民受壓迫的時期，也是臺灣開始透過學校教育、物質建設等，走向現代化發展的時期。於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加強

控制臺灣，使臺灣成為有利母國發展的殖民地目標下，不但多方促進經濟建設與交通發展，也間接促進臺灣的現代化教育，並開啟臺地的民智，雖然這些顯然並不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初衷。由此歷史事例可知，這樣的發展更彰顯教育本身的價值。而在此潮流之下，客家先民們又是如何順應這樣的教育舉措，以使他們的子弟能掌握較佳的教育機會。

在掌握了這些教育機會之後，這些受教者，大部分返鄉並成為地方上的菁英階層，不論成為教師、醫師、企業家或地方政壇要角，常從日治中、後期一直活躍到戰後；少部分則因戰後臺灣的政治情勢再次變化，從而選擇留日發展或留學他國。總之，無論他們受教的動機為何，他們之所以有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顯然與其機會受現代教育所賜。

第四章 社會教育

日治時期為了加強國民教育及推廣日語，除了學校教育外，也常利用各種活動或組織來推廣社會教育。1930年代起，總督府利用社會教育，加強普及日語、灌輸日本國民精神等同化措施。¹

這些社會教育組織並非中央統一運作，常因應各地的需求而產生，且視各地方民政首長的推廣而異，若在一地推動情況良好，也常影響其他州郡的設置。因此各地的名稱、活動內容並不一致。但是日治的桃竹苗地區，由於有一位行政長官武藤針五郎，先後任職桃園廳、新竹廳等地，相當鼓勵支持組織各類型的社會教化團體，並且積極辦理各種活動，使得1920年地方行政區域調整後，合併桃園廳與新竹廳之後組成的新竹州，其下各郡的各類社會教育相當活躍。²

由於社會教育類別相當繁多，《臺灣教育沿革誌》以全臺為範圍，將社會教育分為本島社會教化起源、社會教化團體、國語普及事業、青年團附青年輔導教育、青年訓練所、少年團、家長會及主婦會、部落教化、圖書館及博物館等十節來介紹。³但是內容多有重複，例如：在各廳、郡成立的各種社會教化團體中，即於其下的市街庄設有家長會、主婦會、處女會與青年會等。⁴但之後家長會及主婦會一節，又再次介紹桃園廳興風會下的家長會及主婦會。⁵另外，為普及日語，家長會也常例用工餘之暇辦理夜學會、國語練習會等來推廣日語，主婦會則常在各地推行國語練習會，而這些組織都為了普及日語所推廣的組織，與後來在臺北州興起的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皆被列入國語普及事業一節。⁶至於青年會與處女會，後期被各地附設於公學校下的青年團與女子青年團所取代，也會舉行普及日語及培育良好日本國民精神的夜學會、講習會、講演會等。⁷總合以上所述，自然產生分類介紹上的困難，原因即是社會教育本不是由中央統一設置或推廣的結果，是各地的因推廣日語及國民精神所產生的自發性組織，一旦興設，若效果良好，其他州郡即可能依例推廣。不但名稱可能更動，就算名稱相同，各地推廣的內容、方式也未必相同，組織所參加的成員也可能調整。例如：原本興起於日本的青年訓練所，最早於昭和2年(1927)由日本移民至花蓮港廳吉野村的人，回日本視察後回臺所設，專門招收日人16歲以上未滿20歲，依照私立學校中的實業補習學校所設；昭和10年(1935)又改為青年學校，亦有女子青年訓練所。⁸後來戰時擴大，又廣召臺籍青年，成為加強青年軍事訓練的設施。⁹新

¹ 黃秀政、張政彥、吳文星：《臺灣史》，頁211。

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019、1047。

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8-19。

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026。

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083-1087。

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044-1054。

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056-1074。

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1074-1077。

⁹ 臺灣歷史辭典-八畫-青年訓練所，網頁資料，網址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08/cca220003-li-wpkbhisdict001754-0541-u.xml>，此網頁資料撰寫者為何義麟，引自何義麟：《重修臺灣省通志·文教志社會教育篇》一書。

竹州於昭和 7 年(1932)2 月 20 日由新竹市尹，設立了一所「新竹青年訓練所」，其下設有 1 位主事、4 位教練指導員、4 位學科指導員，收有 44 名學員。¹⁰雖有詳細的數字統計，但依其所設位置與客家族群無直接關係，故從略。

為了使條理清楚，本論文將不再對所有的社會教育措施逐一介紹。首先，依時間順序，扼要介紹日治桃竹苗地區辦理社會教育的情形，之後再針對客家人為主的關西地區實際訪談中得到的口頭與文件資料為主，先介紹普設各地的家長會與主婦會；再介紹青年團相關的組織；最後，說明各式的日語普及運動。

第一節 概述

日人治臺教育政策的第一階段時，未有餘力推動社會教育活動，教育的推廣主要是接納舊有的書房、詩社等活動，並建立新式的學校教育機構，此一時期雖然學校教育明顯不普及，書房也漸納入管理，但是社會教育的推動尚屬有限，主要限於都市或士紳階級開始推廣斷髮、放足或禁鴉片等。但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多屬都市或社會的上層階級，跟客家族群偏居鄉村的生活型態影響相當有限。

壹、第一階段(1895-1918)

依照日治期臺灣教育會的說法，臺灣的社會教育在國語傳習所時，即透過幻燈片、理化實驗的教學活動開啟民智，到了明治 30 年(1897)總督府進行村落教授及國勢調查；至明治 38 年(1905)左右於公學校內辦理國語夜學會、國語普及會等活動；之後總督府開始利用設置博物館、動物園、圖書館等，以實行通俗教育；另也借用臺灣教育會的幻燈片、圖等到各學校對學生、家長進行演講；到了大正 4 年(1915)更以補助金的方式，鼓勵各公學校對兒童進行國語演習會。¹¹當時與桃竹苗地區相關的是：大正 4 年(1915)6 月始政 20 週年紀念日時，桃園廳開始創設國語練習會，是統一計畫下實施國語普及事業的嚆矢。¹²

另外，為了改善臺灣島的舊習以便與日本人同化，各地漸次成立各項社會運動，例如明治 33 年(1900)開始的天然放足會與各地開始推廣的風俗改良會等，皆透過各地方行政首長、評議員與臺灣有力人士加以推廣。¹³例如：桃園廳於大正 3 年(1914)時，即出現，由三角湧區長倡導的同風會、埔子區長倡導的家長會等，並在廳長武藤針五郎支持下相當興盛，2 年後又有主婦會的設立。¹⁴例如：大正 8 年(1919)5 月武藤針五郎改任新竹廳長，其任內設立了以中上階層婦女為主的國語練習會，於 3 個月內每天 2 小時，教授禮儀、日語、裁縫等；並為商人、車夫等男性設立國語夜學會，教授各職業所需的日語，後雖遇到行政區重劃，但

¹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¹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17-1018。

¹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19。

¹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18。

¹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19。

這些社會教育團體皆在各地方持續辦理，而且全臺各州、廳皆有類似的社會教育機構。¹⁵所以第一階段到了大正年間，除了中央的推動外，各地方首長的支持或鼓吹，使得各項社會教育活動開始多元而興盛。

貳、第二階段（1919-1936）

到了 1919 年之後，教育政策進入本論文分期的第二階段，在政治上也進行行政區域的重劃。如：大正 9 年(1920)新竹州設立，原在桃園廳長及新竹廳長的武藤廳長任內推廣的各項社會教育活動，皆維持相當興盛。¹⁶而且原桃園廳改制為桃園郡，隸屬於新竹州，原桃園廳下的各項社會教育事業亦統一於桃園郡興風會之下。¹⁷興風會的組成目的為：振興日本母國國風、促進街庄內日臺親和風氣、矯正陋俗及改善衛生、獎勵日語推廣禮儀，及啟發智能、良善品德、增進公益等。¹⁸其組成為以地方基層首長會核心，包括首長夫人，除了負責的行政人員外，另通令各地方學校及警察單位等，分別在其下各街庄保，成立家長會、主婦會、青年會、處女會等組織，並分別成立國語練習會等活動以推行日語。¹⁹新竹州的其他各郡亦分別起而仿效，而這些功能大致相同的社會教化團體，卻分別採用不同的名稱，如：中壢郡是進光會、大湖郡是尚風會、大溪郡是文化會、新竹郡是振興會、竹東郡是進新會等。²⁰但這些不同名稱的社會教化團體，所舉行的各項活動實際上大同小異。

由於各地公學校本為該地推廣日語的中心，因此很多社會教育的活動也會委派該地公學校來負責。殖民政府開始透過分布在各地的學校，以其為中心，繼續推廣夜學會、婦女會、國語表演會等各項社會教育活動，也積極在各地設置圖書館或公會堂。例如：昭和 5 年(1930)，臺北州將國語普及事業，改以新頒布的國語講習所及簡易講習所要項來進一步推廣，影響各州效法之。²¹於是昭和 5 年(1930)以後，改採以各公學校為中心的方式在各地廣設國語傳習所，以固定時間、地點的方式上課，較之前活動式的推廣，受教時間更長，也更有系統。

以新竹州於昭和 7 年(1932)的統計，當時的社會教育組織可以分成 10 類，分別為青年訓練所、青年團、女子青年團、圖書館、公民講習所、家長會、主婦會、國語講習所、國語練習會、生活改善會等。²²其中並詳細統計各郡、庄中懂日語的男女人口數及比例，能列入懂日語者的類別為公學校在學者、公學校半途退學者、公學校畢業者、國語練習會及其他等，每一個項目中整體而言皆男多於

¹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47。

¹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20。

¹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20。

¹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21。

¹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22。

²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23。

²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0。

²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139。

女，只有國語練習會一項可能男女相近，甚至是女多於男。²³例如竹東庄的女性有 72 人，男性只有 63 人；北埔庄女 65 人、男 34 人；後龍庄女 51 人、男 48 人等。²⁴但整體而言，新竹州當時懂日語的人口只佔 17.76%，男 27.62%、女 7.57%。²⁵當時各地的日語推廣情形仍以較市區懂日語的比例較高，例如新竹市 36.67% 為最高，其次為公館庄的 32.46%、第三為銅鑼庄的 30.63%，而以大湖庄、紅毛庄、觀音庄、新屋庄、大園庄及香山庄的情況較差，都未超過 10%，其他各地推廣情形不一，互有高低。²⁶可見此時桃竹苗地區通行的語言，仍以客、閩等方言為主要的溝通語言。

參、第三階段（1937-1945）

到了 1937 年以後，由於日本發動中日戰爭，將臺灣納入戰時體制，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在這一階段，處於教育基層核心的公學校，首先廢除漢文科，後來改名為國民學校。²⁷學校仍繼續推廣青年團、女子青年團等組織(詳第三節)。地方上也更積極推動國語普及運動，在各地利用學校或公廟等公共場所，請一些學校教師、地方曾受日語教育者當講師，針對未受日語教育的成人進行「國語講習所」的日語教授，或於各街、庄、保處，推動更基礎的「簡易國語講習所」的日語教學(詳第四節)。

昭和 12 年(1937)4 月底時，全島國語講習所有 2,812 所，學生 185,590 人，簡易國語講習所為 1,555 間，學生 77,781 人，全臺懂日語者已達到 37%。²⁸由此可見，前述的各項社會教育活動，雖然各地的推廣、辦理情形不一，資料的留存也有限²⁹，但實際上社會教育的推廣，不但未因戰時而取消，反而更形活躍。

依訪談資料可知，此一階段不但於各庄內繼續召開家長會與主婦會等，各校更積極組織青年團以使青年報效國家，也積極推廣國語講習所等活動以推廣日語等。³⁰雖然沒有普遍性的資料可查閱，但依實際設置的例子可知，這些活動或組織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依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昭和 6 年(1931)底時關西庄只

²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34-139。

²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137-138。

²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135。

²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135-139。

²⁷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頁 211，1937 年廢除漢文科，1941 年改小學校、公學校等為國民學校。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昭和 15 年度(1940-1941)的記事，即開始出現國民學校的校名，該校教師並改成日本姓名。

²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4。

²⁹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五十年來教育統計概況〉，網址：<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Edu.htm>，表 467〈最近本省的教育概況〉，呈現的社會教育機構的總數只剩 130 所，雖然類別較日治時多，但數量遠不及日治時期。

³⁰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其父江兆和青年隊相關文件資料、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劉范鐸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曾秋梅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等，曾提到關西庄石光、坪林地區青年團、青年隊及家長會與國語講習所的情形。

有關西青年團與石光青年團 2 個青年團，³¹因當時關西庄只有關西與石光兩所公學校，到了昭和 17 年(1942) 4 月時，坪林國民學校奉准獨立。³²由同年 12 月 17 日江兆和即代表坪林青年團，參加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的訓練可知，³³坪林國民學校成立後，即將坪林地區公學校畢業的青年組成青年團，從石光青年團中劃出。依照前文中青年團設置的慣例，設置最多的方式是一所公學校即設一個青年團，極少數的庄是全庄設一個青年團，因此在 1945 年之前，還有一波增設學校，關西庄即在其中，故多一所坪林國民學校，即多一個坪林青年團。可見到日治後期新竹州青年團的數量，一定比昭和 6 年(1931)的 67 團為多。

以下將依序介紹由庄長、保正負責的家長會與主婦會，及由學校負責的青年團與國語傳習所等為例，說明日治後期關西地區的社會教育情形。

第二節 家長會與主婦會

臺灣教育會提到最早提倡家長會的是大正 3 年(1914)年底，在桃園廳三角湧區長黃純青倡導由家長組成同風會以推廣教化；另埔子區長簡朗山則開始設立家長會，以改正社會風氣，促進官民合作、開發地方產業等為目的，效果良好。³⁴但是在新竹州官方調查的資料中，最早成立家長會的地方卻是竹東郡的橫山庄，大正 3 年初即已成立 4 個家長會。³⁵這樣的結果，顯現出社會教育機構由各地籌組發起的性質。約大正 5 年，桃園廳的主婦會也順勢成立。³⁶雖然各地的社會教化組織成立的時間並不相同，但整體而言，一般皆先有男性的組織，之後才有女性團體產生，女性團體不但成立較慢，總數上也較少。

桃園廳的家長會及主婦會創立較早，也特別興盛，間接影響到臺中州等其他地方。³⁷以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官方的統計資料而言，桃園郡與中壢郡的家長會有些成立於大正 4、5 年間，除了晚於竹東郡橫山庄外，的確在各郡中是較早成立的。³⁸但各郡下各庄家長會的設立次序，並沒有規則可循，依各街庄主其事者是否推動而定。

到了大正 9 年(1920)因地方制度調整，桃園廳改制為桃園郡納入新竹州，家長會及主婦會也納入桃園郡的社會教化組織--興風會之下。³⁹可見原本有些組織是各區先成立的，後來在各郡積極推動設立社會教化團體後，為了使各地的社會

³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要覽》，頁 94。

³² 關西庄設校詳情，請見第三章第二節關西地區學校的創設。

³³ 資料詳見江兆和所留存的《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手帳》(臺灣：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2 年)，頁 31，履歷書部分紀錄；及《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員名簿》，頁 15。

³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3。

³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3。

³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3。

³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4。

³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0-111、113。

³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4。

教育推動更有系統，在各郡首長的領導下，又重組在各郡的教化團體之下。

家長會的成員為家長，後者為主婦，除了因身分不同在每月舉行一次演講會偏重主題不同外，前者強調保甲等地方公眾事務，後者則以婦德家務等家庭內事務為主，其他國語練習會，及禮儀推廣等是二者共同的推廣要項。⁴⁰總之，皆以養成懂日語、具國民精神的忠良國民為主旨，與其他各類的社會教育團體並無不同。依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各地的家長會與主婦會皆相當興盛。⁴¹以下先說明家長會，再介紹主婦會。

壹、家長會

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各地的家長會與主婦會皆相當興盛，家長會尤其如此。當年新竹州共有 142 個家長會，會員 89,211 人。⁴²人數頗多，各地設置的情況不一。以下分成設立時間、設置數量、經費來源與實際運作等來說明。

一、時間

各地家長會設立的時間不同，主要在大正 3 年(1914)至 15 年(1926)間，最早設立的是竹東郡的沙坑、大肚與南河等家長會，成立於大正 3 年(1914)初。⁴³最晚的是大正 15 年(1926)，新竹市同時設立的 13 個家長會。⁴⁴

若屬同一街庄者，大多同時成立，少數也在前後幾日內成立。如：新竹郡舊港庄的 12 個家長會，皆同時成立於大正 11 年(1922)6 月 24 日，並由同一人許三全為代表。⁴⁵但是關西庄下的 19 個家長會，雖同時成立於大正 14 年 5 月 27 日，卻以各保保正為代表。⁴⁶其他各庄家長會，如新竹郡的紅毛庄、新埔庄、中壢街、平鎮庄、楊梅庄、新屋庄等，各庄內有數個家長會同日成立，並由各庄庄長擔任代表。⁴⁷這種情況最多，在此不一一例舉。但各庄間何時設立，則無規則可循。只有竹東郡各庄差異最大，除了峨眉庄的峨眉和富興家長會是同時成立外，其他庄內的家長會雖有同年成立的，卻沒有同年同月成立的。⁴⁸由以上各種設立情形可知，各地庄長在設立家長會一事上，仍然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各家長會，若不是由庄長擔任代表者，則委由各保保長為代表。

二、數量

各街庄的家長會數目不一，如：苗栗郡，全郡各街庄都只設一個家長會，全郡 8 個街庄，只成立了 8 個以街庄命名的家長會，所以每個家長會的成員相當多，

⁴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4-1085。

⁴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6-121。

⁴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

⁴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3。

⁴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

⁴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108。

⁴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8-109。

⁴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8、110。

⁴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2-113。

最少的頭屋家長會也有 935 位會員，最多的是苗栗街家長會，會員竟達 3,372 人，全郡共有會員 16,210 人。⁴⁹新竹郡各庄皆有家長會，其中湖口、六家、香山等庄，一庄只設一個家長會，會員各有 1、2 千人；關西庄的家長會最多，共有 19 個家長會，是全新竹州設置最多家長會的一庄，這些家長會以保為單位，會員數較少，以 1、2 百人最常見，最少的是老煥寮家長會，會員只有 56 人，代表者即是老煥寮的保正徐阿爐。⁵⁰其他各庄則不一定，如舊港庄有 12 個、紅毛庄 3 個、新埔庄 4 個。⁵¹其它各郡中的街庄，視各庄情況而定，設 1 個、2 個、3 個、4 個、8 個家長會的都有，個數不一，全州只有竹東郡北埔庄未成立家長會。⁵²由於有些是以庄為單位，有些則以庄下保為單位，因此各家長會會員的多寡，差異頗大。

三、經費

家長會經費來源，主要可分成市街庄費與各郡的社會教化團體兩大類。例如：新竹市成立 13 個家長會，即市內的 13 個區來命名，每個家長會皆以 10 圓市費來維持，代表者即為各區區長，且是新竹州中最晚設立的地區，皆成立於大正 15 年(1926)3 月 1 日，⁵³時間如此統一，經費又從市費而來，推測應該是由新竹市尹統一下令的結果。

其他以街庄費維持的尚有：中壢郡全郡 17 個家長會，雖各個家長會支出經費不同，但全部也只要 134 圓而已。⁵⁴另外，大溪郡龍潭庄的龍潭、三坑子、銅鑼圈、三洽水等 4 個家長會以庄費維持，各家長會經費 6 圓。⁵⁵苗栗郡下 8 個與庄同名的家長會，也以街庄費來維持，各庄經費不同，共花 126.04 圓。⁵⁶最後，竹東郡橫山庄的 4 個家長會，則各以保甲會費 3 圓來維持。⁵⁷

其他則多以各郡社會教化團體之下，各庄支會的經費來維持。如：新竹郡的 41 個家長會經費皆來自振興會，共花經費 296.85 圓。桃園郡的 18 個家長會，則由興風會費支應，共 134 圓。⁵⁸竹南郡 14 個家長會經費，由矯風會支應，共 81 圓。⁵⁹最後大湖郡的 6 個家長會所需的 35 圓，則由郡尚會補助金來維持。⁶⁰以上各郡的家長會，所需經費皆由該郡的社會教化團體來支應，且各郡的社會教化團體，也多由地方首長發起並負責，故與前述街庄費維持的家長會大同小異，都類似於今日里民大會，但出席者皆為一戶之長，以男性為主，故取名為家長會。

⁴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4。

⁵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5，昭和 4 年度重大記事，昭和 4 年 10 月 2 日記事「徐阿爐保正」。

⁵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110。

⁵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3。

⁵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

⁵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0-111。

⁵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2。

⁵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4-115。

⁵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3。

⁵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1-112。

⁵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7-110。

⁶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

竹東郡的家長會，經費來源最複雜，有來自保甲的，也有來自教化團體的，更有會員捐助的，也有唯一沒有成立家長會的北埔庄，非常能表現出社會教育團體的特色。如：除了前述的橫山 4 庄經費來自保甲會費外，芎林庄 2 個家長會由教化團體費維持，寶山庄的 2 個家長會則由進新會費維持，竹東庄的 3 個家長會則由會員自籌。⁶¹竹東郡的家長會經費是各郡中來源最複雜的，顯現出各庄自我籌組的性質，但是家長會成立後，皆是以地方行政基層單位庄或保的家長所組成，無論經費來源為何，各街庄長或保正仍然是各家長會的代表者，或實際的召集人。

四、實際運作

雖然在官方的統計資料中，石岡子家長會設置的時間是在大正 14 年(1925)5 月 27 日，與關西庄其他 18 個家長會同時成立。⁶²但是實際上要到昭和 2 年(1927)2 月 20 日才有石岡子家長會正式召開活動的紀錄，並由庄長羅享錦、士紳吳錦來、校長等，針對學校教育的方針、教育上的注意事項等，進行演講。⁶³在此同時，並未見到學區內其他家長會的活動。由此可見，官方統計資料中的各個家長會，並不是每個都同時啟動，可能要視各保的情況而定。

家長會的運作活動最主要顯現在每月召集會員，開辦相關的講演會。不論是街庄費維持或各種社會教化團體出經費維持的家長會，大體上皆類似於今日的里民大會，不同的是現在的里民大會，只要是里民皆有資格自由參與。但在日治時代，只有一家之長才可參加，若無故缺席，則可能收到警察單位的通知單。⁶⁴到了戰時，更是宣導愛國精神、配給制度、收繳物資等行政命令的主要場合。⁶⁵

以客家人聚居的關西庄石光公學校學區內的家長會而言，這些家長會每月舉行的講演會，多由學區內的公學校校長、教師負責，並且被記錄在《學校沿革誌》的重要大事中。

在還未進入戰時體制前，一般講演會的主題，以教育為主。例如：昭和 4 年(1927)11 月 4 日在大旱坑及老煥寮召開的家長會，即由石光公學校校長及呂義星訓導出席，演講體育的重要，參與的會員有 60 餘人；過二天，11 月 6 日，下南片(今南和里)家長會召開，由石光公學校校長及陳登彬訓導出席，同樣以體育的重要為題，參與的會員有 60 餘名；同時石岡子(今石光里)的家長會則由石光公學校的朱盛淇訓導出席，演講女子教育的必要性；11 月 7 日下橫坑(今新力里)及坪林(今上林里)家長會召開，由石光公學校的校長及呂阿全訓導講家庭教育、女子教育與體育的重要性。⁶⁶以上這些家長會以各保之名命名，各保保長即其代表，皆位於石光公學校的學區內。召集後的演講工作，即由公學校的老師負責。

⁶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2-113。

⁶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9。

⁶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4。

⁶⁴ 劉范鐸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下橫坑有家長會，假如有人沒去，派出所會有調單來。

⁶⁵ 劉范鐸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⁶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41，昭和四年度重要大事。此時石光公學校的保名已由日治初期的石崗仔改為石岡子，此依校誌所紀。

故學校老師不但要教育兒童，也負有開啟民智，教化百姓的社會教育責任。由於活動具強制性，難怪關西地區的老師地位也較高。

當時的家長會與今日的各校設置的學生家長代表，所組成的家長會性質並不相同，在日治時期學生家長代表所組成的家長組織叫作「保護者會」。以石光公學校而言，一直到昭和 12 年(1937)5 月 27 日才召開保護者總會，並選出朱金鑑為會長，林石火、范朝燈為副會長。⁶⁷一旦選出後並無任期的限制，日治末及光復後皆曾 2 度短期回石光任教的邱金球即言，他返石光任教時，朱金鑑都是當時的家長會會長。⁶⁸並且在《學校沿革誌》中，雖記有歷屆家長會會長姓名，但日治時期及光復初期任會長者，皆未記起迄時間。

綜上所述可知，當時的家長會是一種社會教化組織，目的以推廣日式的語言、禮儀、文化或概念，到了戰時就成為團結民心、宣導政令最有效的組織，雖與今日學生家長組成的家長會名稱相同，但組成的目的與性質卻不一樣。

貳、主婦會

昭和 6 年(1931)時，全新竹州的主婦會共有 90 個，會員 51984 人。⁶⁹雖然較家長會總數 142 個，會員 89211 人少得多，但以分布情形來看，仍是相當興盛。

一、時間

就設置時間而言，其雖稍晚於家長會，最早設立的是中壢郡中壢街的 4 個主婦會，同時設立於大正 4 年(1927)7 月，⁷⁰其次是桃園郡桃園街的 4 個主婦會，同時設置於大正 5 年(1928)8 月。⁷¹桃園街設置的時間大致符合臺灣教育會先前所載⁷²，但是仍有些誤差，因為最早設置的是中壢郡而非桃園郡。除了新竹市、新竹郡的婦女會成立較晚，一直到昭和 3 年(1926)至 6 年(1929)間成立外，其他各地的主婦會多成立在大正 4 年(1915)至 14 年(1925)間，又以大正 10 年前後最多。⁷³若該地有成立主婦會者，各地主婦會成立的時間，皆晚於當地的家長會。

二、數量

各郡庄主婦會的設置情形，最常見的是與家長會相對而設，即該庄有幾個家長會，就有幾個主婦會，而且名稱也相同，但有少數的幾個庄雖有家長會，卻未設主婦會。例如：新竹郡的主婦會設置情形如下：湖口庄 1 個、新埔庄 4 個、關西庄 19 個，設置數目與該庄的家長會數目相同；但是舊港庄雖有 12 個家長會、

⁶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重要大事。朱金鑑是石光第二屆畢業生，後來考上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奉派至關西公學校任教，6 年後因事辭職，轉成地方上成功的實業家。林石火是警察出身，范朝燈為坪林地區熱心教育事務的地主。

⁶⁸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⁶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

⁷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7。

⁷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8。

⁷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3。

⁷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121。

紅毛庄有 3 個家長會、六家、香山各有一個家長會，這 4 庄卻都沒有設置主婦會。⁷⁴另外，中壢郡的中壢街 4 個、平鎮庄 3 個、楊梅庄 4 個、觀音庄 3 個主婦會，也與家長會數相同，但是新屋庄雖有 3 個家長會，卻也沒有設主婦會。⁷⁵所以即使是同一個郡，其下各庄的家長會和主婦會的設置情形，仍然可能出現極大的差異。

其他與家長會設置相同的郡有：桃園郡、大溪郡、苗栗郡各郡，及竹南郡的竹南庄、頭分庄、三灣庄、南庄等，其主婦會設立情形，皆與家長會設置數量相同。⁷⁶桃園郡全郡、大溪郡的大溪街及竹南郡的竹南庄是閩人較多的庄，相對的大溪郡的龍潭庄及苗栗郡的 8 庄則是客家人較多的庄，所以難以比較閩客族群設立上的差別。

在家長會與主婦會設置上，差別最大的是竹東郡，竹東郡共有 6 庄，其中竹東、芎林、橫山、峨眉、寶山 5 庄，共成立了 13 個家長會，只有北埔庄沒設，其中橫山庄的 4 個家長會還是新竹州中最早成立的，成立於大正 3 年(1914)。⁷⁷但是全竹東郡，竟然只有在橫山庄，於昭和 3 年(1926)3 月 20 日成立了唯一一個橫山修養婦人會，由詹順妹為代表，而其他 5 庄都沒有成立主婦會，是設立上差別最大的一郡。⁷⁸而該郡幾乎可說是純粹客家庄，而且北埔、竹東、芎林、峨眉各庄，皆是新竹州中相當早設置公學校之地，受教的女性人口也不少，為何皆未設主婦團體，頗令人訝異。不過在分析家長會時就發現，竹東郡成立家長會的經費及先後設置情形，各庄之間，差異甚大。由此差異情形可知，竹東郡應是新竹州中在設置社會教化組織中，最沒有統籌規劃的一郡。

但是也很難對竹東郡的客庄下輕忽主婦會的論斷，因為閩人較多的新竹郡舊港庄與新竹市的情況也是如此。舊港庄雖設有 12 個家長會，新竹市也設有 13 個家長會，但舊港庄並未設立主婦會，而新竹市即使位於市區，也只在昭和 4 年(1927)由市費設立了一個主婦會。⁷⁹由以上概述可知，主婦會的設立數量自然較家長會少。

三、經費

主婦會維持的經費來源，若有設立，與前述各庄家長會相同，主要來源也是街庄費與各郡所屬的社會教化組織。甚至各主婦會的代表者與前述該庄有成立家長會的代表者大部分皆相同，若該庄是由庄長任代表，則該庄成立的主婦會代表亦是該庄庄長，如新埔庄即由新埔庄長葉心榮，擔任新埔庄新埔、照門、石頭坑、枋寮等家長會與主婦會的代表。⁸⁰至於關西庄的 19 個主婦會的代表即與 19 個家

⁷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117。

⁷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7-118。

⁷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8-121。

⁷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2-113。

⁷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9。

⁷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

⁸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116。

長會代表相同，皆由該保的保正擔任。⁸¹其他各庄的代表者，皆如上所述，若不是庄長，就是保正。

只有前文提及在竹東郡唯一成立的橫山修養婦人會是由詹順妹代表，其經費來源未列。⁸²至於新竹母姊會雖設置在新竹市東門女子公學校，但其經費來源市費，且由新竹女子公學校的校長仲田雅男為代表。⁸³可見各地的主婦會大部分仍是由庄長、保正在管理，即使是學校附設，也有半官方的性質，唯一由私人自行籌組的可能就是竹東郡的橫山修養婦人會。

四、實際運作

關西庄的 19 個主婦會設置於昭和 5 年(1930)3 月 12 日，當時石岡子主婦會的會員有 184 人，由振興會費維持，只需 3 圓，當時的代表是黃鶯登，⁸⁴黃鶯登即是當時石岡子大字的行政代表⁸⁵。在實際運作上，石光公學校的《學校沿革誌》也有相關的演講記載。昭和五年度重要大事載：「4 月 4 日，石岡子主婦會：校長、范何教心出席演講」。⁸⁶以此記事，只能判別公學校也要支援主婦會的演講活動，並且派女老師主講。可惜校史中並沒有記載講題，也沒有提到是否有派老師至學區內的其他主婦會演講。因為當時石光公學校的學區內尚有店子岡、茅子埔、坪林、下橫坑、下南片、老煥寮、大旱坑等 7 個主婦會，⁸⁷既然同時設立，何以只針對學校所在地的主婦會派員演講？除了學校教員有限，難以支應外，更有可能的是其他主婦會只是虛設，卻沒有實際的運作。

之後，石光公學校在昭和 7 年(1932)2 月 19 日召開的午後職員會議中，才分配負責各地主婦會的演講者：下南片：北島校長與陳登彬、下橫坑：北島校長與呂阿全、石岡仔：何教心、茅子埔：何教心、老煥寮：朱盛秋、坪林：呂阿全、大旱坑：呂義星等。⁸⁸但並未說明演講主題為何。

雖然在主婦會組織說明中，與家長會相同，皆列有國語練習會一項以推廣日語，但在實際執行中，各地的國語練習會常兼收男女，且在公學校中，也常見到國語練習會員參與國語演習會表演的紀錄，可見原應附屬於家長會或主婦會的國

⁸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6-117。

⁸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9。

⁸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5、28。

⁸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6。

⁸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6；劉明怡等撰：《臺灣地區辭書 卷十四 新竹縣》，頁 245，日治明治 34 年(1901)隸屬新埔支廳石崗仔庄，大正 9 年(1920)改隸新竹郡關西街石岡子大字，下轄上石岡子、下石岡子小字，昭和 12 年(1937)改為石光保。本文為求方便將這些大字代表，依 1937 年後改稱為保，稱其代表為保正。

⁸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53，昭和五年度重要大事。當時的校長為北島熊雄，范何教心即是該年剛上任的范何英妹教員心得，畢業自臺北第三高女，為石光第三屆畢業生，後來返校服務的范鼎香訓導之妻。

⁸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16-117。詳見黃南琚：〈石光公學校之起源〉，無頁碼，當時石光公學校下共有石岡、水坑、茅子埔、坪林、上橫坑、下橫坑、下南片、老煥寮及大旱坑等九大字。其中只有水坑沒有設立主婦會。

⁸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大記事。當時的校長為北島熊雄，何教心為范何英妹教員心得，其他老師皆為訓導。

語練習會，常常是合併辦理的。綜觀日治時期，推廣日語的組織甚多，前後期設置的名稱不同，且常常需要公學校教師加以支援，因此產生分類上的困擾，將另在第四節中重新整理說明。

第三節 青年團

日治時期為了保持學校畢業後的青年仍能維持一定的日語能力與日式精神態度，前後設立了許多不同的組織，而青年團或女子青年團，即是從早期的青年會與處女會演變而來，但是彼此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青年團屬日治後期設立的社會教育組織之一，由於其成員的集會、培訓及升遷有相當的組織，又以各學校學區為範圍，並由學校校長擔任團長、該校教師負責訓練，影響地方青年甚鉅。以下分成新竹州成立的青年團與女子青年團的情形，及舉石光與坪林青年團為例；最後，並介紹青年團受訓表現良好者，可以進一步參與的勤行報國青年隊，來說明其可能有的發展情形。

壹、青年團

一、新竹州成立情形

新竹州針對初等教育畢業的青年辦有不同類型的社會教育團體，日人主要參加的是「新竹青年訓練所」。針對沒有升學的日籍青年，進行普通中學及職業類科的訓練。⁸⁹新竹州於昭和 7 年(1932)2 月 20 日由新竹市尹，設立了一所「新竹青年訓練所」，其下設有 1 位主事、4 位教練指導員、4 位學科指導員，收有 44 名學員。⁹⁰新竹州所以成立青年訓練所是受昭和 2 年(1926)日人在花蓮吉野立青年訓練所的影響，調查時仍屬初設階段，當以日人為主，尚未招收臺灣青年。

(一)青年團

臺籍青年於公學校畢業後，早期主要參加的社會團體是各地成立的青年會，後來才另以各公學校畢業生為單位另組青年團。這兩種團體雖然前後出現，但彼此間並沒有承接的關係，只是因應不同時期的社會需求而設。例如：以關西庄而言，昭和 6 年(1931)之前，社會青年主要參加的是青年會，參加者應是社會中較有成就者；昭和 6 年(1931)之後才以各公學校為單位，另為畢業後未滿 20 歲的青年組織青年團。昭和 3 年(1926)6 月 17 日關西庄召開關西青年會總會，當時到場的來賓有：庄長、役場吏員、派出所主任、關西公學校校長伊集俊秀、郡視學及當地的羅璧玉、徐阿炉(徐阿爐)、范朝燈等賢達出席。⁹¹當時的會長為郭阿昌，副會長陳逢茂，將原來的關西庄青年會改為關西青年會，並且分成關西分會與石光分會二個單位。⁹²但是青年會與後來成立的青年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是

⁸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目次，頁 1075。

⁹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⁹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90，昭和三年度重大記事。

⁹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90，昭和三年度重大記事。郭阿昌 1909 年畢業自咸菜厝公學

前後成立的一些青年團體。

以石光公學校的學區而言，到了昭和 6 年(1931)11 月 2 日召開教職員大會時，才開始討論青年團設立相關的文件。⁹³至昭和 7 年(1932)1 月 1 日石光青年團正式成立，當天下午即召開集會，共有 19 人參加，由北島熊雄校長主講「青年的責任」，呂阿全訓導主講「青年的修養」。⁹⁴同年 2 月 4 日又舉行隆重的創團式，有新竹郡課長及郡視學到校參加，除了校長指導外，並有課長訓話、庄長祝辭及青年宣誓等活動，參與的會員共有 20 名。⁹⁵

據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的統計，當時全州共有 67 個青年團⁹⁶，12 個女子青年團⁹⁷。同年新竹州共有 86 所公學校 10 所分校，⁹⁸可見並不是每個公學校都有設立青年團，但設團總數與學校總數相當接近，青年團幾乎成了學校的附屬單位。原因即在於青年團成立的標準中有：一、青年團設置的區域以當地的小學校或公學校的通學區域為原則；二、參加者需初等教育畢業，未滿 20 歲者；三、主要指導者為學校及市街庄等的職員等適當者。⁹⁹雖然並不是每一個青年團都符合以上這些設置原則，但基於以上三個原因，青年團的指導者，一般由學校教師充任。後續的集會、召集、訓練也都在各校召開，這就是為什麼青年團常成為學校附屬團體的原因。

各地的青年團成立時間並不一致，新竹州最早成立的是位於新竹市的「新竹青年團」，也是當時新竹市唯一的青年團，集合日數最多，已達 144 日，平均參加團員數為 30 人。¹⁰⁰其他各郡的青年團數為：新竹郡 8 個、中壢郡 5 個、桃園郡 10 個、大溪郡 7 個、竹東郡 12 個、竹南郡 11 個、苗栗郡 8 個、大湖郡 5 個等。¹⁰¹新竹郡的 8 個青年團分別為：紅毛庄的紅毛青年會，當時該庄只有一所紅毛公學校；¹⁰²湖口庄的湖口青年團，當時該庄只有湖口公學校及其附設的下北勢分教場；¹⁰³新埔庄當時雖有新埔、照門、枋寮 3 所公學校，但只成立了一個新埔青年團，難怪集會時的平均團員數可高達 50 人；¹⁰⁴關西庄有關西、石光 2 所公學校，石光並附設坪林分教場，此時也有關西、石光 2 個青年團，平均參與團員數分別為 32 人與 23 人，關西才集合 4 日，石光才集合 2 日，可見這兩個青年團在調查時，才剛新設。¹⁰⁵另外，六家庄只有一所六家公學校，就成立了一個六家青年團；

校第 5 屆，曾任公學校訓導、庄協議員；陳逢茂 1914 年畢業自咸菜礮公學校第 10 屆，後來在坪林地區開設逢茂農園，為當時新竹州相當有名的示範農園，後來事業更跨至海外。

⁹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大記事。

⁹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大記事。

⁹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大記事。

⁹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9。

⁹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0。

⁹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7。

⁹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71。

¹⁰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¹⁰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99。

¹⁰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94。

¹⁰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94。

¹⁰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94。

¹⁰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94。

¹⁰⁶香山庄有香山、鹽水 2 所公學校，也分別成立香山和鹽水青年團。¹⁰⁷以上是新竹郡各庄公學校與青年團設立的情形，至於其他各郡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新竹州中，除了新竹市外，其他各郡皆以該庄設有幾所公學校，即設有幾個與公學校同名的青年團，少部分如同新埔庄一般，以全庄為範圍，設立一個與庄同名的青年團。如：中壢街雖有中壢與大崙 2 所公學校，但只有一個中壢青年團；平鎮庄有南勢公學校，及附設的宋屋分教場，卻只有一個以庄命名的平鎮庄青年團等；¹⁰⁸桃園街有桃園、埔子 2 所公學校，但只有桃園青年團；¹⁰⁹苗栗街有苗栗第一、苗栗第二 2 所公學校，設置的卻是苗栗大成青年團；¹¹⁰苑裡庄有苑裡、山腳公學校，卻只有一個苑裡青年團。¹¹¹這樣以街庄為單位來設置青年團的，在全州 43 個市街庄¹¹²中，只占了 6 個。若不考慮名稱，平鎮庄實際上只有一所獨立的公學校，設置一個青年團是合理的，也可扣掉不論。最後，觀音庄先設觀音公學校，才有新坡公學校，¹¹³但是設置的卻是新坡青年團。¹¹⁴但是以上各街庄至少都有一個青年團，其中中壢街、桃園街、苗栗街，屬於人口較多之地，交通方便，召集也容易只設置一個青年團尚屬合理。就像新竹市雖有新竹第一、第二、第三 3 所公學校卻只有一個新竹青年團一般。¹¹⁵可見在 1930 年代，新竹州的青年團設置是相當興盛的。

有通則，卻也有例外，因為在全州 43 個市街庄中，有 3 個庄，雖設有 2、3 所公學校，卻沒有設置青年團，分別為新屋、公館與通霄等庄。位於中壢郡的新屋庄設有新屋、大坡、崁頭厝等 3 所公學校，¹¹⁶苗栗郡的公館庄有公館、鶴岡 2 所公學校，及鶴岡附設的南河分教場；苗栗郡的通霄庄設有通霄、烏眉、南和等 3 所公學校。¹¹⁷這三個庄的公學校教育不可謂不發達，不知何故，卻都沒有成立青年團，¹¹⁸但是通霄庄雖然沒有青年團，卻有通霄女子青年團，至昭和 6 年(1931)統計時，已集合了 80 日，團平參加人數也有 28 人，¹¹⁹規模並不小。且通霄全庄公學校的畢業生已達 1270 人¹²⁰，設有女子青年團不奇怪，為何沒有設青年團？

最後，最特別的是，峨眉庄雖然只有峨眉一所公學校，不但成立峨眉青年團，連峨眉公學校附屬的富興分教場，也成立富興青年團。¹²¹另外竹東郡橫山庄，設

¹⁰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95。

¹⁰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0、95。

¹⁰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0、95。

¹⁰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1、95。

¹¹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5、98。

¹¹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6、98。

¹¹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

¹¹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1。

¹¹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5。

¹¹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8、94。

¹¹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1、95。

¹¹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6、98。

¹¹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6、98。

¹¹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9。

¹²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7。

¹²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4、97。

有橫山、沙坑 2 所公學校，及附屬於橫山的大山背分教場，¹²²在青年團方面，除了橫山和沙坑青年團外，也有一個大九青年團，¹²³極有可能為大山背分教場所設。可見由分校單獨設置青年團的情況，也有例可循。

綜上所述，雖然一所公學校成立一個青年團是最普遍的情形，但也有例外，例如：有 6 個街庄，全區超過 2 所公學校，卻只成立一個青年團；有 3 個庄，學校設了 2、3 所，卻未成立青年團；另外分校也可自行成立青年團等。之所以如此，可能跟青年團為社會組織，在成立上並沒有強制性，其設置、召集等，皆視各街庄推動的情況而定，無法一概而論。

總之，各街庄以各個公學校成立一個青年團最為常見，不因閩客族群分布而有差別。至於女子青年團，與青年團比起來，不但數量較少，成立較慢，參與人數也較少，最特別的是，在閩客族群的分布上也有些差異，詳見下文說明。

(二)女子青年團

新竹州的女子青年團共有 12 個，分別為：新竹市的新竹女子青年團，桃園郡的南崁、蘆竹、坑子、大園、龜山等 5 個女子青年團，竹東郡的竹東女子青年團，竹南郡的頭分女子青年團，苗栗郡的雞隆、富士、通霄等 3 個女子青年團，大湖郡也只成立了一個大湖女子青年團。¹²⁴與青年團比起來，女子青年團的數量少得多，尤其新竹、中壢、大溪等 3 郡，竟然皆未設女子青年團。

大溪郡下轄大溪街與龍潭庄，閩客族群相近約各占一半，其中大溪街以閩人為多，龍潭庄則九成以上為客家人，由於皆未成立女子青年團，無法顯現閩客間的差異。但若以客家人占多數的新竹郡、中壢郡而言，竟然皆未成立女子青年團，除了行政方面的因素外，很可能是族群分布或是城鄉差距等因素所造成。

由於女子青年團的成立數量實在太少，以閩客分布的情形來比較，會發現新竹市和桃園郡的 5 個女子青年團位於閩籍優勢區，其餘各郡的 6 個女子青年團則以客家人為主。若只算個數，似乎閩客各有 6 個女子青年團，無法顯現閩客族群間的差別。若考慮新竹州全部的閩客族群比例，就會發現大多數的郡或庄，皆以客家人為多。相對之下，由客家人組成的女子青年團就顯得不成比例，明顯較閩籍為少。

各女子青年團的團平均參加團員數並不一致，其中以頭分女子青年團的 27 人為最多，坑子女子青年團、大湖女子青年團的團平均參加團員數只有 6 人為最少。¹²⁵女子青年團的團體參加人數，整體上較青年團參加的人數少，青年團的團平均參加人數最多的是新埔青年團的 50 人，或中壢青年團的 49 人，一般而言各地青年團以 10 幾或 20 人最常見，但少的也可能如大湖郡的八角青年團般，團平均參加人數只有 5 人。¹²⁶

¹²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23。

¹²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6-97。

¹²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9-100。

¹²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9-100。

¹²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99。

總之，各地青年團的設置相當普遍，但各地的成立時間並不一致，參與人數與召集次數也不一致。已有女子青年團，但數量較少，參與人數與召集次數也較青年團少，分布上客家人的女子青年團數若以閩客族群的觀點來比較，顯然較閩籍的少。此外，因留下的只是數量化的統計表格資料，故能推估的實際情況，相當有限。

為了更清楚了解青年團的運作情形，只得透過實際參與者的訪談資料及文件，方能一窺其貌，以下將舉 1942 年成立的坪林青年團的參與者為例。至於女子青年團的數量較少，尚未有實際訪談的例子，相當可惜。

二、青年團舉例

(一)石光青年團

石光青年團的相關記事主要保存在《學校沿革誌》中。昭和 7 年(1932)11 月 22 日新竹州辦理青年大會，石光青年團由朱盛秋訓導帶領 5 名團員參加。¹²⁷11 月 24 日為青年紀念日，召集青年團員，進行「御沙汰書奉讀式」。¹²⁸12 月 7 日，新竹州辦理一週的青年團中堅者指導講習會，由木村視學指導，石光、關西兩青年團，共 20 人前往參加。¹²⁹

昭和 8 年(1933)8 月 22 日，北島雄熊校長、朱新本訓導與朱盛秋訓導，進行 5 日間巡迴的青年團員和公民生家庭訪問。¹³⁰10 月 16 日青年團員及公民生共同開墾柑橘園。11 月 5 日郡青年團大會於新埔召開，有 11 名青年參加。11 月 10 日石光青年團員紀念攝影。



圖 4-1：羅士鑑的石光青年團員手帳
出處：羅濟錦提供。

(二)坪林青年團

坪林的畢業青年本來附屬於石光青年團之下，在坪林國民學校於 1942 年獨立後，才另外獨立。青年團設立的主旨是鍛鍊青年的身心，以培養出忠良的國民。

¹²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重要大事。

¹²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重要大事。

¹²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重要大事。

¹³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要大事。

¹³¹免得青年在公學校畢業後，因為忙於家事，而喪失學校養成的教育效果及國語能力，乃辦青年團使畢業青年能定期與母校聯絡，以維持教育效果。¹³²若是在青年團表現良好，成為青年團的幹部，接受過進一步的訓練後，也可能因此成為助教，或是軍人。

1.助教

筆者的國小老師范士敬，為石光公學校第 17 屆畢業生，畢業後留鄉務農，做些耕田、採茶等工作。¹³³依其所述，范老師記得在昭和 12 年(1937)間，殖民政府頒發「總動員命令」後，凡是未去外地工作或讀書的留鄉青年，學校會發信通知，到校組成青年隊，青年隊分成分隊、小隊、大隊、中隊。每個月召集一次，利用下午的時間返回學校訓練，受訓的內容可能是軍事訓練，也可能是學科、演講，依教育局的指令而行，並由公學校的校長擔任團長，分配學校老師負責不同的教學內容。¹³⁴范士敬老師因為家境的關係，並未升學，成為留鄉青年，自然成為青年團的當然成員。他曾上過半年的書房，發現書房內容較難又不實用，就不去，又改進修日文。在家利用農事之暇的午後休息時間，透過私立中學校繳錢寄送來的各科資料進修「講義錄」的課程，類似今日的函授學校，范老師覺得語文、歷史、地理類有圖有字典可查閱，尚可自修，但遇到數學就頗感困難，於是只得利用晚上去拜訪坪林國民學校的陳瑞亭老師，請他指導，正巧當時的陳瑞亭老師正負責管理坪林青年團，范士敬也屬其中的一員。¹³⁵

有一次，范士敬又到坪林的學校宿舍找陳瑞亭老師時，陳老師正巧收到一份教員講習班的公文，問范氏是否符合資格？要不要參加講習？日治後期因為戰爭之故，師資相當缺乏，符合受訓資格者，只要接受半年的簡易師範訓練，即可派往國民學校擔任「助教」。¹³⁶范士敬仍記得公文中所列的短期教員講習班的資格中，第一中等學校、第二高等科、第三青年隊訓練過的優秀幹部，由學校推薦等，即有資格參加考試，通過考試者，方可參加新竹師範的教員講習班訓練。¹³⁷正巧范士敬符合最後一項資格，因范士敬在參加青年團訓練 2 年後，曾至青年隊受訓 3、4 個月的時間。¹³⁸詳見圖 4-2。

¹³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70。

¹³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72。

¹³³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范老師記憶相當好，訪談時他已 90 高齡，耳聰目明，仍記得於昭和 4 年 4 月 1 日於坪林分教場入學，昭和 10 年 4 月 1 日畢業於石光公學校第 17 屆畢業生。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17 屆畢業生名冊。

¹³⁴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³⁵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³⁶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他早范士敬一年，前往新竹師範接受「臨時教員養成所」訓練，得到助教資格，於昭和 17 年(1932)奉派至石光國民學校任教，一年後考上臺南師範進修，而離開。經查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七年度、十八年度重要大事，邱金球校長離職後的助教缺，即由受完訓的范士敬接任。

¹³⁷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³⁸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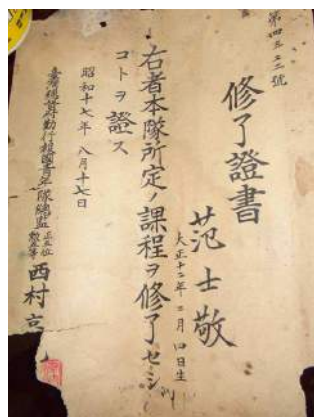


圖 4-2 范士敬勤行報國青年隊修業證書

資料來源：范士敬提供。

得知范士敬符合資格後，陳老師叮嚀他要讀書，內容包括六年級的日語、數學、歷史、地理等，並拿些參考書讓他準備，而范士敬也開始夜間點油燈苦讀的生活，當時家境不佳，點油燈讀書還被兄長罵，只好自己割月桃賣錢來買燈油。¹³⁹幸好，范士敬於昭和 17 年(1943)，在陳瑞亭老師的推薦下，前往應考，並順利通過考試，通過筆試後，仍要體檢與口試。¹⁴⁰

順利通過後，坪林國民學校收到公文，再由學校通知范士敬前往新竹師範接受半年的「教員講習班」課程，當時授課的都是日籍老師，范士敬還記得上的課有國語(日語)、地理、歷史、教育概論、音樂、數學等，由不同的老師教，中間也要測驗，結訓後，於昭和 18 年(1944)分派到石光國民學校，以助教資格任用。¹⁴¹由此可見，青年團雖然是對留鄉青年的社會教育組織，除了應付戰時體制，全體動員之需外，在公學校缺乏師資的時候，也成為代理教師的來源之一。臺灣光復後，大批日籍師資返回日本，大陸來臺的師資有限，薪資又不理想的情況下，這些「助教」也在師資缺乏的情況下，成為光復後國民學校重要的師資來源¹⁴²。

在研究日治學校教育時，青年團雖屬社會教育的範疇，卻因管理工作附屬於各地公學校校長及教師之下，所選送、培養出的幹部可能成為後來國民學校師資的補充來源之一等，可見此時社會教育的活動，也會影響到學校教育的發展。

2.軍人

關西庄的坪林國民學校獨立於昭和 17 年(1942)，坪林的設教最早起源於大正 9 年(1920)，當時是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教室，後來升格為坪林分教場。¹⁴³學校的校史中，並無青年團的記載。但由江兆和參加青年團留下的文件資料可知，他於昭和 17 年(1942)12 月 17 日，代表坪林青年團，參加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

¹³⁹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⁴⁰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⁴¹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八年度重大行事。

¹⁴² 范士敬老師在光復後仍擔任國校教師，一直到民國 69 年才退休。

¹⁴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詳見學校費用統計表格、昭和十六年度重大紀事。

花蓮港訓練所開辦的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的訓練。¹⁴⁴依此例可推坪林國民學校成立後，不但學區從石光的學區中劃出，連畢業自石光公學校坪林地區的畢業生，也另外劃歸坪林青年團。如：江兆和於昭和 13 年(1938)，畢業於石光公學校，是石光第 20 屆的畢業生¹⁴⁵。但當其所屬學區自石光公學校劃出後，青年團成員也自石光青年團劃出，另外組成坪林青年團。江兆和代表坪林青年團前往花蓮參加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受訓後，表現良好，後來調往其他各處的勤行報國青年隊訓練所擔任小隊長，且有詳細的資料留存，使我們能一窺青年團團員可能的升遷發展。也使筆者終於體認，為何江兆和在世時，何以有資格擔任江姓宗派族長之責，除了承襲嫡長一脈外，恐怕這段受訓經歷才是奠定其光復後為鄉親所敬的原因。



圖 4-3：江兆和石光公學校畢業證書與畢業紀念冊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青年團除了是留鄉青年的受訓團體外，後來也成為日治後期軍事用途人員的來源，青年團中選送優秀的人員參加進階的訓練，進入「勤行報國青年隊」，此類青年隊隸屬總督府之下，成員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團，已將青年調離家鄉，進入類似軍隊預備役般的嚴格訓練。筆者的世伯江兆和即經由此受訓管道，後來成為日軍的一員，詳見下文說明。

貳、勤行報國青年隊

各校負責管理訓練的青年團，若被學校選拔為優秀的青年團幹部，必須進一步到「青年隊」受訓。「青年隊」直屬總督府，必須抽調離鄉依安排的訓練所接受訓練。范士敬老師曾在公學校畢業後，回母校參加 2 年青年團訓練，並接受過青年隊的幹部訓練，以其口述。由臺灣總督府鍊成課，透過教育廳下令各州廳的教育課，再命各校推薦人選接受幹部訓練，分別為北中南三個訓練所，北部為臺北、中部為臺中、南部則為高雄，在此三地成立一個訓練所，各校依分配的名額，推薦適合的代表，通過口試、身體檢查後，前往各「訓練所」接受幹部訓練，訓練完成後回到各校擔任青年團的幹部，包括隊長、分隊長、小隊長等職。¹⁴⁶後來訓練所並不只限於北、中、南三所，也不在「鍊成課」下。因為筆者的堂伯江兆

¹⁴⁴ 資料詳見江兆和所留存的《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手帳》，頁 31，履歷書部分紀錄；及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花蓮訓練所：《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員名簿》，頁 15。

¹⁴⁵ 依江兆和昭和 13 年畢業證書及畢業留影紀念冊。

¹⁴⁶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和留下的名冊資料顯示，他參加的就不是前述的北、中、南三所，而最高的指導單位是臺灣總督府文教局。¹⁴⁷他先參加了花蓮港訓練所，接著支援臺中第二訓練所，最後在新竹訓練所擔任小隊長，進而成為「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的小隊長，最後成為正式的日本軍人。

筆者的堂伯江兆和，是石光公學校第 20 屆畢業生¹⁴⁸，小范士敬 3 屆，與范士敬熟識。江兆和於公學校畢業後，即任職派出所給仕，3 年後退職。於昭和 17 年(1942)參加「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受訓，至昭和 18 年(1943)3 月結業，受訓時間將近 4 個月，由於表現良好，並接受進一步的幹部訓練。¹⁴⁹詳見下圖文件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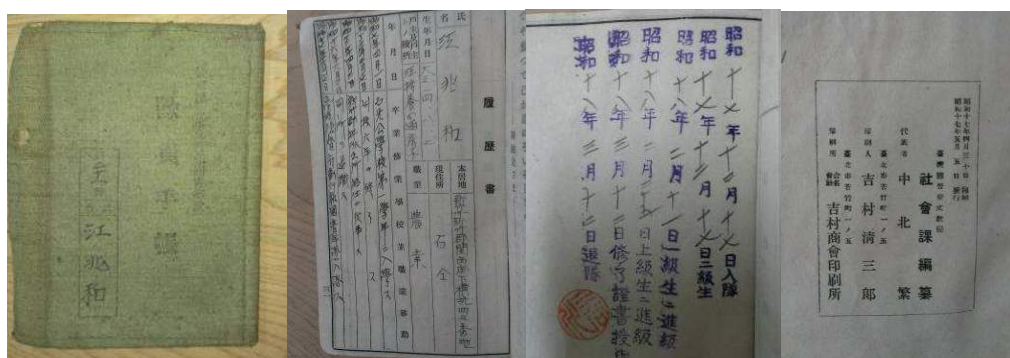


圖 4-4：江兆和勤行報國青年隊手冊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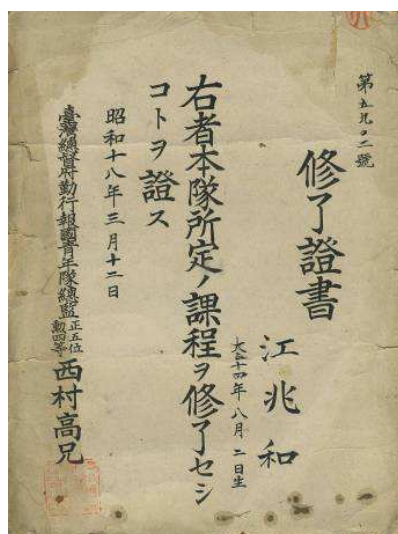


圖 4-5：江兆和的勤行報國青年隊修業證書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江兆和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受訓結業後，於昭和 18 年(1943)8 月參

¹⁴⁷ 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名簿》，無頁碼。

¹⁴⁸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

¹⁴⁹ 本文提到所有江兆和文件資料，由其長子金棟提供。

加了 7 日的第三回勤行報國青年隊指導員助手訓練(詳見圖 4-6)。通過之後，先支援第二十七回在臺中第二訓練所的勤行報國青年隊，二十七回於昭和 18 年(1943)12 月結業。¹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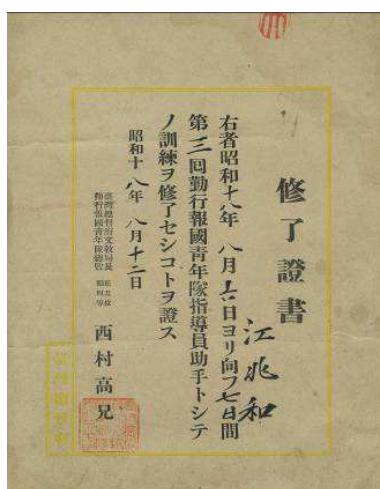


圖 4-6：江兆和的勤行報國青年隊指導員助手結業證書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至昭和 19 年(1944)3 月時，江兆和正式擔任新竹訓練所開辦的第三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第六小隊長一職。¹⁵¹接著又參加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的訓練，若依所留資料而言，應參加了二回。第一回於昭和 19 年(1944)8 月 31 日結業，有結業照可證。¹⁵²可能表現頗佳，到了第二回訓練時，即擔任第七小隊小隊長。¹⁵³到特別鍊成所受訓時，更向軍人身分邁進。其留下的隊員名簿內頁，即附上軍人應遵守的 5 條「敕諭」，強調軍人的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軍人素質等。¹⁵⁴手冊中的「隊訓」並顯示：一、我等竟然有此榮幸生為皇國子民，自應盡忠報國；二、我等需鍛鍊身心，全力為公，不怕艱難；三、養成良好的國語，努力鍊成皇國軍人所需的素質。¹⁵⁵由此可見，從青年團，到報國勤行青年隊，最後到特別鍊成所，已是透過一步步嚴謹的訓練，將臺灣各地的優秀青年，選拔並培育成為日本母國盡忠奉獻的軍人。雖然各期別的訓練時間甚短，但為因應戰時軍員之需，也是更彈性又應急的作法。

¹⁵⁰ 徐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金棟年 85 歲，為江兆和鄰居，對當年的時記述相當清楚。由江兆和雖留下「第二十七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名簿」，卻無其名，可證為支援一說。

¹⁵¹ 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新竹訓練所：《第三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名簿》，1944 年。

¹⁵² 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一回訓練結業照。

¹⁵³ 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昭和 19 年 9 月)，《第二回隊員名簿》，〈職員〉，無頁碼。

¹⁵⁴ 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二回隊員名簿》(1944 年 9 月)，〈敕諭〉，無頁碼。

¹⁵⁵ 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二回隊員名簿》，〈隊訓〉，無頁碼。



圖 4-7：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一回結訓照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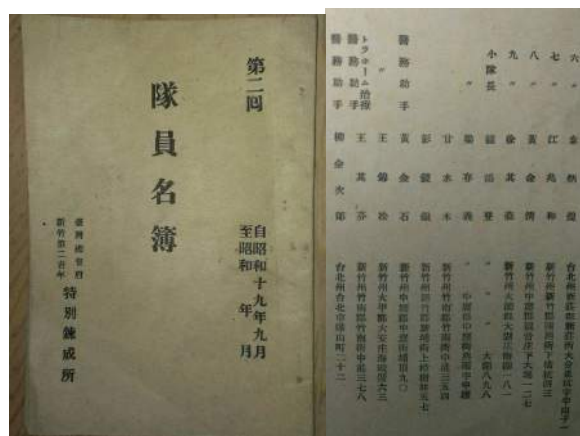


圖 4-8：特別鍊成所隊員名簿

資料來源：江兆和長子江金棟提供。

江兆和的鄰居徐金統，於日治後期正好考上花蓮農林學校，曾自花蓮跨過中橫至臺中，最後逃回故鄉新竹，在述說自身經歷時，即順帶提到江兆和曾於當時參加青年隊訓練，去過花蓮、臺中、新竹等地，從受訓，後來擔任小隊長訓練他人，訓練他人時頗為嚴格。¹⁵⁶最後，於昭和 20 年 2 月 1 日時加入「敢第一七九三部隊松尾隊」，成為輜重兵中的陸軍二等兵，8 月即升為一等兵，同年 9 月 1 日歸休除隊。¹⁵⁷幸而在江兆和尚未正式出戰時，日本即戰敗，而回鄉。由此事例可知，日治後期由於兵員缺乏，又為了維持日軍戰力，從留鄉青年團中選送培養的優秀幹部，也可能成為戰時兵力的來源。即使不是上陣殺敵，成為提供糧食、戰場補給、戰場清理、工事準備或戰俘管理等支援的工作，仍是臺灣青年或臺灣兵重要的戰場職責。透過勤行報國青年隊的訓練，自能勝任這些工作。

由以上文件資料可知，青年團是一般學校中組織的稱法，從中提拔出優秀的

¹⁵⁶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金統為江兆和的鄰居，清楚其參加青年隊受訓之事。甚至光復後，有受訓人的家屬來質問當年之事。

¹⁵⁷ 江金棟 2012 年 4 月 25 日提供，江兆和留下的《軍隊手牒》，頁 34、36，有詳細記載。江兆和於光復後，回家務農，在世時視同江姓族長，並任鄰長，為親族鄰里所重，於民國 96 年過世。

青年，進一步加入「勤行報國青年隊」加強軍事、體能及農事等訓練，以補充軍隊之不足，為了培養幹部，尚且有進一步受訓升遷的管道，而其業務歸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掌理，所以仍屬於社會教育類的組織。

第四節 日語推廣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社會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塊就是普及日語使用的人口，無論是家長會、主婦會、青年會、或處女會，到後來的青年團等社會組織，幾乎都有推廣日語的組織，各個組織之間並不相屬，而各地的推廣單位也不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組織內另外設立教日語的國語夜學會、國語練習會、公民講習所，及最晚出現，較正式有頒發結業證書的國語講習所等，常由公學校畢業生或師資支援，因此在校史中常見這些會的成員與學校學生一起參與國語演習會的記載，但彼此之間並無直接相關，若非經歷過當時之人，實在難以分別。以下試著將石光公學校《學校沿革誌》中及訪談時耆老提及的組織名稱，與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中出現的國語練習會、公民講習所及國語講習所等加以核對，則會發現：若時間不同，出現的日語推行機構即可能不同，雖然都是學習日語，但是負責的單位和教授的對象，未必相同，以下試著以時間為序加以梳理之。

壹、國語夜學會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最早的國語普及事業應是國語夜學會，依《臺灣教育沿革誌》的記載，最早出現於大正 3 年(1914)由臺中廳長枝德二因熱心風俗改良與國語推廣，於是設立每 3 個月為一期，每晚 1 個半小時教授禮儀、舉止、日語等課程。¹⁵⁸次年，臺中廳下共設了 30 個國語夜學會，有會員 2 千人以上。¹⁵⁹自此並推廣至各地。

由於推廣日語的方式相當多，依范士敬所述，國語夜學會是在國語講習所設置之前，較早設置來推廣日語學習的組織。¹⁶⁰在日治第二階段後期，昭和 6 年(1931)的新竹州官方統計社會教育一項資料中，並無另立國語夜學會的記載，只有當時全州 186 個國語練習會中，有 7 個國語練習會，有加入「夜學」二字，但皆列入在國語練習會項下。¹⁶¹可見符合范士敬的說法。

另外，在大正 6 年(1917)開始獨立的石崗仔公學校所留下的《學校沿革誌》

¹⁵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44。

¹⁵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44。

¹⁶⁰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⁶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總數要參閱頁 134。加入「夜學」二字者分別見頁 123 和頁 129。說明如下。頁 123，湖口庄內設有 9 個國語練習會，其中下北勢夜學國語練習會和湖口國語夜學練習會，加入「夜學」二字以與其他的練習會作區別，何況其中尚有下北勢國語練習會，乃加入「夜學」二字作區別。另外，頁 129，竹東庄唯一的國語練習會為竹東國語練習夜學會；峨眉庄的 4 個國語練習會，皆有加入「夜學」二字，分別為峨眉、中興、赤柯坪與富興國語練習夜學會等。但以上 7 所有「夜學」二字的皆列入國語練習會項下。

記載，國語夜學會也較國語練習會較早出現。由於關西公學校石崗仔分校設立的時間為大正 2 年(1913)，在大正 5 年(1916)1 月 15 日的主要大事中，即記：舉行夜學會的發會式。¹⁶²至同年 9 月 1 日，開辦第二期夜學會，有 68 名會員出席，當時的來賓有高添、吉澤 2 位巡查，並由當時的分校主任中尾治教諭擔任講師，並代理所有的訓示。¹⁶³由此可見在石光地區，夜學會的推廣仍是學校老師的責任，因當時學校只有一位日籍老師與一位臺灣籍的老師，故由中尾主任擔任夜學會講師。但由開會式上，有 2 位派出所的警察擔任來賓，可見以國語夜學會來推動國語普及，顯然有半強迫性的性質。雖然國語夜學會創始於臺中廳，是以三個月為一期，¹⁶⁴但是各地的推行情況未必相同。以石崗仔公學校的學區而言，除了發會式和第二期之間相差 8 個多月，但往後大正 6 年、7 年、8 年的夜學會記載，皆出現於該年 9 月，但開辦的班別不同，可能分期別，也可能分成男、女夜學會。

石崗仔分校於大正 6 年(1917)4 月 1 日獨立，同年 7 月 6 日舉行了國語練習會員修業詔書授與式。¹⁶⁵可見此時，公學校又附設了不同名目的日語教授組織，但先前於 9 月開辦的國語夜學會，並未立刻被取代，反而增設更多班。大正 6 年(1917)9 月 25 日晚上 8 點，舉行國語夜學會的發會式，共開辦三個班，分成：第一期有學員 24 人，由陳阿郎訓導任講師；第二期有學員 14 名，由山本磯一教諭負責；此外尚開辦青年夜學會，由升任校長的中尾治教諭負責。¹⁶⁶陳阿郎與山本磯一是此學年度剛調入石崗仔公學校的老師。¹⁶⁷而本來即負責夜學會講師工作的中尾分校主任，現在雖已升任校長，但仍擔任青年夜學會的講師。

至大正 7 年(1918)9 月 21 日時，又見舉行男子部夜學會發會式的紀錄。¹⁶⁸次年(1919)9 月 11 日，舉行的是「男女國語夜學會」發會式，¹⁶⁹但男女顯然是分開上課，因為 9 月 15 日記載的是：男子夜學會，除了週六、日外，每日上課的時間為午後 7 時半至 9 時，¹⁷⁰但是無女子夜學會的記載。在大正 9 年(1920)以後，《學校沿革誌》再無夜學會開課的紀錄，但從昭和 4 年(1919)的一條紀事推測，夜學會應該仍有舉行，只不知是因校史記錄者的改變，或是夜學會工作已成常態，或者其他未知的因素，造成紀錄上的缺漏。因為昭和 4 年(1929)4 月 8 日，又出現石岡子派出所的西村和西瀉 2 位巡查，到校與校長協議國語夜學會一事的相關記載。¹⁷¹可惜未列協議何事，這也是《學校沿革誌》中，最後一次見到國語夜學會的紀錄。若按《學校沿革誌》中，陸續出現的日語推廣組織而言，在國語夜學會沈寂之後，日語的推廣工作，可能交由國語練習會或公民教育所¹⁷²來進行。

¹⁶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7，大正四年度。

¹⁶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21，大正五年度。

¹⁶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44。

¹⁶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26，大正六年度。

¹⁶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26，大正六年度。

¹⁶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25。

¹⁶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0，大正七年度。

¹⁶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4，大正八年度。

¹⁷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34，大正八年度。

¹⁷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20，昭和四年度。

¹⁷² 只有在《學校沿革誌》中見到「公民教育所」的名稱，按《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的分類，

首先，如《學校沿革誌》於大正 6 年(1917)出現的國語練習會，其次則是昭和 6 年(1931)開始出現的石光公民教育所，最後，則是有頒發結業證書的國語講習所。國語練習會是與家長會、主婦會一般，由各庄長所設立推行的社會教化單位，附屬於各郡的社會教化團體之下。按石光公民教育所設置的時間，配合新竹州的官方統計可知，應為官方調查資料中的「公民講習所」，在新竹州皆附設於公學校之下，以該校校長為負責人。¹⁷³到日治後期，附設於各公學校下的公民講習所，又轉設為 3 年制的國語講習所。由於這些組織彼此之間並不相屬，又都是推廣日語的組織，因此相當容易混淆。連當時曾受教這些組織之人，即使知道上課的時間、地方、師資有別，因當時人皆稱之為「講習所」，也很難分清楚，¹⁷⁴何況是今人！筆者下文將試著將國語練習會、公民講習所與國語講習所，依出現的時間與演變，梳理之。

貳、國語練習會

如前文所述，石崗仔公學校的國語練習會，最早創設於大正 6 年(1917)7 月 6 日，¹⁷⁵但未載明究竟是由家長會或主婦會之下所設。若依後來石光公學校的《學校沿革誌》中代表國語練習會與學校學生一同參與學校活動，或參與州郡比賽的成員男女皆有，因此可以判定應為男女兼收，只是由學校協助主持與教學。但在大正 6 年(1917)創設之後，中間皆未見相關記載，一直要到昭和 6 年(1931)10 月 14 日，才又看到舉行國語練習會開會式的紀錄，當時參與的會員有 40 名，來賓有：石岡子派出所的 2 名巡查、役場吏員 2 名，及本校職員 5 名等。¹⁷⁶若依來賓身分判斷，與之前的夜學會相近，皆有巡查參與，不同的是役場吏員的加入，而且本校職員也列在來賓，之前教師乃直接列為講師。可見國語練習會的講師並不是由學校老師擔任，而是另聘講師，且由役場吏員加入管理。由來賓的不同判斷，若夜學會類似今日的夜補校，國語練習會就更像社區學院，只是設置的目的都以普及日語為目的。

另外一次紀錄是：昭和 7 年(1932)9 月 12 日舉行國語練習會發會式，有 17 名會員出席。¹⁷⁷由以上三次的簡單記錄很難判斷國語練習會的實況為何，只能推估國語練習會應當如國語夜學會一般，是一年開課一次，開課相關事宜可能由教師加以支援。

昭和 8 年(1933)6 月 11 日的記事即見到學校在舉辦表演活動時，除了在校

依其附屬於學校之下而言，應為「公民講習所」，針對未就讀公學校的成人進行日語推廣的工作。

¹⁷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34。

¹⁷⁴ 劉范鐮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這(設於坪林元和宮者)是講習所，那(附屬於坪林國民學校者)也是講習所。筆者依新竹州統計判斷：其實前者應為坪林國語演習會，後者則是附屬於學校的國語講習所。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8 月 14 日則說，全部是下午上課，早上先生都在學校上課呀！哪有講習所？故判斷劉范鐮妹所參加者是坪林簡易國語講習所。

¹⁷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26，大正六年度。

¹⁷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

¹⁷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

學生、青年團與公民生外，也派坪林國語練習會的邱傳應、石光國語練習會的呂吳琦妹參與演說或獨唱。¹⁷⁸甚至同年 10 月，坪林國語練習會的范良妹，不但與公學校六年級的呂海星，參加在關西公會堂舉行的新竹郡國語演習會活動，後來因成績優良，更進一步至州參加表演。¹⁷⁹

幸好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的官方資料相當齊全，當時全州共設有 186 個國語練習會。¹⁸⁰雖然當時的臺灣教育會認為國語練習會是家長會或主婦會下的國語推廣事業之一，¹⁸¹但依新竹州實際的設置情況而言，並無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無法看出國語練習會是附屬家長會或主婦會下，看起來，較像是如家長會、主婦會一般，以各街庄長為主要負責人，並由其主推的社會事業。雖然有些國語練習會只收女性，有些則只收男性，於是在某些國語練習會的取名上，除了以當地為名外，也會直接加入性別，但絕大多數的國語練習會並無點出性別，可見大部分皆為男女兼收。¹⁸²由於新竹州設置的國語練習會相當多，無法一一介紹，以下舉新埔庄與關西庄為例，說明其與該庄家長會、主婦會之間的關係。

以新埔庄而言，設有新埔、照門、枋寮、與石頭坑 4 個家長會與 4 個主婦會，¹⁸³但是新埔庄卻有石頭坑婦人、土地公埔、下枋寮、五分埔、照門、北打鐵坑、鹿鳴坑、內立與梨頭山等 9 個國語練習會，而且除了石頭坑婦人國語練習會點明會員為婦女外，其他國語練習會應屬男女兼收。¹⁸⁴至於維持的經費來自新竹郡振興會新埔支會，且其主事者如同家長會與主婦會一般都是以新埔庄長葉心榮為代表。¹⁸⁵當時新埔庄只有新埔、照門、枋寮三所學校，石頭坑尚未設立學校或分校，¹⁸⁶可見家長會、主婦會的設置可能依學區劃分，至於國語練習會則分散設在各區，用以補充學校教育之不足。

至於新埔庄隔鄰的關西庄，國語練習會設置的數量則與新埔庄的設置情形相反。關西庄以各保保正為首，各設置了 19 個家長會與 19 個主婦會，是新竹州中設置最多家長會與主婦會的一庄。¹⁸⁷相對之下，關西庄設置的國語練習會數量就相當少。全庄只設了關西、店子岡、石岡子、坪林、馬武督與十寮等 6 個國語練習會，經費全來自新竹郡振興會關西支會，主事者為關西庄長陳俊玖。¹⁸⁸而當時

¹⁷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¹⁷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¹⁸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34。

¹⁸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84-1085。

¹⁸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3-134。頁 123，設於新竹女子公學校的新竹婦人修養會、頁 124，新埔庄的石頭坑婦人國語練習會、香山庄的千埔婦人國語練習會、頁 131，後龍與公館女子國語練習會等 5 個，專為女性而設；另外頁 126，中壢郡觀音庄的觀音、頁 127-128，桃園郡八塊庄的下庄子、頁 130，竹南郡後龍庄的二張犁等 3 地，分成男子與女子國語練習會。

¹⁸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8、115-116。

¹⁸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4。

¹⁸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4。

¹⁸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石頭坑要到 1942 年才成立南分教場，詳見第三章第一節新埔公學校部分。

¹⁸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8-109、116-117。

¹⁸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4。

關西庄只有關西、石光二所公學校，及一所附屬於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教場。¹⁸⁹若由學區而言，關西、馬武督、十寮等國語練習會，都設於關西公學校的學區內，除了關西國語練習會外，後二者實屬學區中偏遠之地。至於店子岡、石岡子國語練習會則位於石光公學校的學區內，前者位於關西與石光兩校的交界區，石岡子國語練習會即設在石光公學校所在之處。最後的一處的坪林國語練習會，依范劉鑄妹口述，設於坪林的元和宮，與坪林分教場相近。¹⁹⁰由此可見，國語練習會和家長會、主婦會等是性質類似的社會教化事業，由各地庄長主其事者最多，但是各庄的設置的個數，未必與家長會或主婦會相同，各庄差異頗大。

此外，各地國語練習會的經費來源，與該街庄的家長會與主婦會相同，可以分成街庄費與社會教化團體費兩種。¹⁹¹以經費來源而言，國語練習會與家長會和主婦會的性質相同，但目的不同，明確的以推廣日語為主要目的。另外，既屬社會教育的性質，各地前一年的上課日數、師資、學生等，差異皆非常大。前一年的上課日數，多者可達 227 天，最少的只有 21 天，更多的則是沒有記載；師資最多的有 6 人，1、2 位的則是常態；學生最多可達 95 人，最少只有 5 人，最常見的是 3、40 人。¹⁹²可見各地的情況皆不相同。

在石光公學校的校史紀錄中，國語練習會是稍晚於國語夜學會後，出現的日語推行組織，設置的時間較家長會稍晚，但兩者皆於大正年間前期。但筆者訪問到的受訪者，其受教於坪林國語練習會的時間，約為昭和 10 年(1935)之後，此時各地方已開始設置 3 年制的國語講習所，因此難免產生名稱混淆的情況。而且日治後期在公學校任助教的邱金球也說，這些「講習所」的老師稱「講師」，薪資來自各庄役場，與老師的薪資來源不同。¹⁹³於 1941 年任教錦山國民學校的楊澄清說得更清楚，他說當時國語講習所的「講師」薪資來自「街役場」薪水只有 18 日圓，而其為「訓導」薪水表訂為 45 日圓，但他記得他領的是 48 日圓，卻往後每年調升 2 日圓或 3 日圓。¹⁹⁴可見當時的人可能分不清楚這些設置於學區內的日語推廣單位到底有何不同，但仍可分辨其差異。筆者則以受教學生年齡、授課者職稱與薪資來源等，判定其屬社會教育的範疇。

參、公民講習所

至於公民講習所，與「國語夜學會」一樣附設於學校，由學校教師授課，一年開辦一次。甚至我們可以推論，它的出現，直接取代了「國語夜學會」，是一種更正式的進修補校。詳見下文桃竹苗地區的設置情況，之後再舉關西地區為例，最後以石光公民講習所的記事來說明。

¹⁸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9。

¹⁹⁰ 以上各國語練習會的所屬學區，詳見第三章第三節關西地區初等教育的設置情況。

¹⁹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3-134。

¹⁹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3-134。

¹⁹³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5 日口述。

¹⁹⁴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一、桃竹苗概況

昭和6年(1931)新竹州官方統計的社會教育中，在青年團、女子青年團及圖書館後，列有「公民講習所」一項。¹⁹⁵由於並未列明何時開辦，只有概略列出前一年的上課日數，但也不是每一個公民講習所的上課日數皆列出，但有一項十分明顯的特徵，即當時全州共設有86所公學校(詳見附錄三桃竹苗地區的公學校)，即附設了84所公民講習所，且已設的公民講習所名稱，皆與當地的公學校名稱相同。¹⁹⁶可見此時的「公民講習所」，類似今日學校設置的「進修補校」，超過就學年齡已為成年人，為了推廣日語教育故另設立「公民講習所」，給失學的成年人就讀。

當時全州只有2所公學校，未設立公民講習所。如：苗栗郡苗栗街苗栗第二公學校，設於昭和5年(1930)4月，¹⁹⁷新竹郡舊港庄的貓兒錠公學校，新設於昭和6年(1931)4月，¹⁹⁸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因為學校剛成立，尚未來得及顧及設立附屬的單位。至於附設的10所分校，也未設置公民講習所。¹⁹⁹已設立的84所公民講習所的代表者，與各公學校的校長名稱幾乎全部相同，²⁰⁰只有一所公學校校長與公民講習所的代表不是同一人，如：坪頂公學校的校長是日人古川尚史²⁰¹，而坪頂公民講習所的代表竟是臺灣人朱新京²⁰²。另外有些學校與代表者的差異，只差了一個字，可能只是調查登記過程的誤差並非代表者不同。²⁰³由負責人幾乎皆為公學校校長，即可知公民講習所乃附屬於各公學校之下。

所以就公民講習所的設置情形與代表者多為公學校長可知，各地設置的公民講習所實在類似於今日針對超齡失學者所辦理的進修補校。而且任職公民講習所的講師，多者可達14人，如中壢公民講習所；²⁰⁴少者至少有2名講師，如竹東郡的竹東、二重埔、芎林、鹿寮坑、橫山、沙坑、北埔、峨眉等6個公民講習所。²⁰⁵一般以3位、4位、5位等講師，最為常見。²⁰⁶可是各公民講習所的學生數，

¹⁹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目次。

¹⁹⁶ 核對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27公學校詳目；及頁101-106公民講習所詳目。

¹⁹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

¹⁹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

¹⁹⁹ 核對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27公學校詳目；及頁101-106公民講習所詳目。

²⁰⁰ 核對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28-33公學校職員；及頁101-106公民講習所代表者。

²⁰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30。

²⁰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03。

²⁰³ 核對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32，尖山公學校長為林田德裕、造橋公學校長為穎川足介，頁33，富士公學校長為渡邊逸平；但公民講習所代表者部分，頁105，尖山公民講習所代表為林田德次、造橋公民講習所代表為穎川完介、富士公民講習所代表為渡邊一平等。以上三所公學校校長與公民講習所的代表者皆為一字之差，經查當以公學校校長資料為主，講習所代表是筆誤為致，皆為同一人。

²⁰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02。

²⁰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04。

²⁰⁶ 核對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27公學校詳目；及頁101-106公民講習所詳目。

與一般公學校學生數相比，並不多，例如講師多達 14 人的中壠公民講習所，學生總數才 38 人，²⁰⁷而前述講師皆為 2 人的竹東郡中的 6 個公民講習所，其中鹿寮坑學生較多，有 42 人，其他 5 所的學生則為 10 幾、20 幾人不等。²⁰⁸可見公民講習所的學生並不多，那麼何以需要這麼多的講師，很有可能跟開課日數或日期有關，由於不是每天都開課，因此很可能由不同的講師負責不同日期或不同科目的授課。如：苗栗郡的富士公民講習所開課時數達到 236 日，是全部公民講習所中開課最多者，但這只能算是特例²⁰⁹，因為其他公民講習所，只有少數的開課日數超過 100 天，絕大多開課日數皆在百日之內，而一年只上 5、60 天、7、80 天者，非常常見。²¹⁰依此情況可知，各校附設的公民講習所開課時，雖由學校的老師支援，但有些學校可能並未安排固定的教師授課，有些學校則可能固定由某幾位老師來授課，但詳細情況究竟如何，由於差異頗大，可能得視各校情況而定。

二、關西庄為例

以新竹郡關西庄的 2 所公學校附設的公民講習所而言，關西公民講習所共有 7 位講師，43 位學生，前一年開課日數為 90 日，學生出席率為 55%，所花經費為 83 日圓，公民講習所的代表者為宮島由多加。²¹¹宮島由多加是當時關西公學校的校長。²¹²

至於石光公民講習所則有 6 位講師，34 位學生，開課日數較少為 52 日，學生出席率為 72%，但經費與關西公民講習所一樣是 83 日圓，代表者為北島熊雄。²¹³北島熊雄是當時石光公學校的校長。²¹⁴石光公民講習所開課日數較少的原因，可能因為此公民講習所於昭和 6 年(1931)中才設，而州調查統計的時間則在該年年底。但是在該校所留的《學校沿革誌》中，並沒有見到「公民講習所」的組織，只見到「石光公民教育所」之名，且往後的活動紀錄中，也常見到該校「公民生」參與國語演習會表演的紀錄。

三、石光公民講習所

在石光公學校所留的校史紀錄中，並未見到新竹州官方統計中出現的「石光公民講習所」，若依開設情況與學生性質來判斷，可能是校史中於昭和 6 年(1931)開辦的石光公民教育所。昭和 6 年(1931)5 月 28 日，學校將校內的國語演習會，

²⁰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2。

²⁰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4。

²⁰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5。

²¹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1-106 公民講習所。

²¹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2。

²¹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1，新竹州公民講習所的調查時間為昭和 6 年 12 月末。另查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96，富島由多加於 1931 年 3 月至 1932 年 3 月，為關西公學校校長。應是「宮」島由多加，「富」島由多加，實乃筆誤。

²¹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02。

²¹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9，北島熊雄於昭和 3 年(1929)3 月 31 日至昭和 13 年(1939)10 月 6 日，共 10 年 6 個月，以訓導的資格任石光公學校的校長，是日治時期任職石光最久的校長。

與石光公民教育所的開所式一同舉行，活動內容有日語歌曲的獨唱與合唱，主事者講話，來賓由范朝燈代表致辭，及茶會活動等，參加者共有男性 22 人，女性 5 人，且註記往後只要每月 1 日、15 日出席即可。²¹⁵果然，7 月 1 日記事有「午後公民教育所生徒召集」，7 月 15 日則有「公民教育所生徒召集，大澤教心指導」等記載。²¹⁶可能往後每月形成慣例，就不見相關的記載。

到了昭和 7 年(1932)4 月 1 日石光公學校的始業式，除了為本校 74 名新生與坪林分校 62 名新生舉行新入式外，尚為 11 名公民生舉行入所式。²¹⁷而且昭和 8 年(1933)8 月 22 日時，北島熊雄校長、朱新本與朱盛秋兩位訓導，一同於 5 日內，進行青年團團員及公民生的家庭訪問。²¹⁸同年 10 月 16 日，當全校進行實力考查時，青年團員與公民生則共同開墾柑橘園。²¹⁹10 月 17 日，則辦理青年團員與公民生的一夜講習會。²²⁰

有些課程尚且因應不同性別所需而開設，例如：昭和 8 年(1933)11 月 25 日，即針對女子公民生與六年及級女學生，舉行二日的染色講習會。²²¹到了學年終了時，昭和 9 年(1934)3 月 24 日，除了舉辦一般生的休業式外，也同時舉行公民生的結業式。²²²

至昭和 9 年(1934)4 月 2 日，新的學年度開始時，同時辦理了新生的入學式、舊生的始業式及公民生的入所式。²²³但是 4 月 7 日石光公學校開始辦理「國語講習所」後，由於募集的生徒也是「公民生」，²²⁴兩個組織的講師與學生都可能產生重疊，於是公民講習所的重要性可能漸漸被新設的「國語講習所」取代。所以在昭和 9 年(1934)國語講習所開辦之後，除非校史有另記「國講」或「國講生」等字眼，可以判斷其為國語講習所的學生外，若是只寫「公民生」者，除了時人外，恐怕今人是難以判別此生參加的究竟是「公民講習所」或是「國語講習所」。因為到昭和 11 年(1936)時，雖然尚有公民生參與實施自治制演講的紀錄，²²⁵也有女子公民生參加在關西公學校舉辦的新竹郡國語演習會的活動。²²⁶但到昭和 12 年(1937)之後，就只有國語講習所的相關活動記事，而無公民講習所的記錄。²²⁷是否公民講習所於昭和 12 年(1937)起，就被國語講習所取代，除了時人外，恐怕無法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也在這一年，學校活動及記事開始出現「戰勝祈願」、

²¹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要大事。

²¹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六年度重要大事。

²¹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七年度重大記事。

²¹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²¹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²²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²²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八年度重大記事。

²²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重大記事。

「國防獻金」、「慰問出征家族」等大量關於戰爭活動的記事。²²⁸取代了很多其他學校活動在校史中重要大事的出現率，社會教育在校史記錄中的重要性就漸漸被戰爭動員的活動所取代。

由以上內容可知，青年團和公民講習所的相同點是：都是附屬於學校組織下的次級單位，其代表者以各校校長為當然代表，且負責教學或訓練者都由公學校教師擔任。不同的是：前者是針對公學校畢業的留鄉青年加以教育，使維持教育的成果；而公民講習所則針對成年未受公學校教育者，施以簡易日語教學的教育。既是學校的附屬單位，上課的時間與內容，常常配合學校的活動與行事歷，視情況所需作調整。不但授課時間，可能由午後改至夜間；上課內容，除了日語教學外，也可能進行勞動性的課程。總之，以各校視實際情況而調整之。

肆、國語講習所

國語講習所一般招收的是未接受學校教育的成人，雖然入學的人男女皆有，但一般失學者以女性為多，尤其在訪談中，一些原本以為沒上過學、童養媳出身的女性長輩卻多少皆有上過「講習所」的記憶。但依前文的判斷，滿 20 歲者，參加的應為國語練習會。若附屬於學校開設於昭和初年者，在新竹州特別稱為「公民講習所」，後來，學校又另外設立「國語講習所」，公民講習所的功能即被取而代之。而大正年間即在各地設立的國語練習會，後來也改稱為國語講習所，若論上課內容、講師及設置所在判斷，即屬各市街庄教化團體或個人所推動的「簡易國語講習所」²²⁹。該課程的內容、學生程度、及上課時數等，皆不如學校附設的國語講習所嚴格。

一、新竹州的設置情形

為了順利達到「皇紀 2600 年」(1940 年)日語普及率超過 50%的目的，總督府於 1930 年起開始公布法令，在各地市、街、庄設立「國語講習所」。²³⁰但各地的設置情形不一，並非法令公布即一次到位，而是慢慢增設或改設的結果。

(一)起源

國語講習所最早開始於 1929 年的臺中州，但詳列設置規定，強力推廣影響各州廳的則是臺北州。²³¹臺北州於昭和 5 年(1930)制訂，分成國語講習所與簡易國語講習所二類，²³²由於名稱皆稱為「講習所」因此造成分辨上的困難。臺北州所謂的國語講習所，開設目的為日語與良好公民的養成；講習時間一年，日數要達百日，每天 2~3 小時；入學者為滿 12 歲以上到 25 歲為原則，招收生員可多達 60 人，並依日語程度加以分組；講習科目為國語(日語)、體操、唱歌等，並可依

²²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重大記事。

²²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1-1054。

²³⁰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頁 213。

²³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97。

²³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0-1051。

各地所需加些實業科目。²³³與簡易國語講習所最大的差別在於國語講習所要設主事一名，由設置講習所的學校校長擔任；講師若干，由學校教師或其他適當者擔任。²³⁴如此，附設於學校的國語講習所，就成了學校內的次級組織，類似於今日的進修補校，與前面提及的公民講習所功能相近，但上課的日數較多，內容也應較前者豐富，修習時間也較長。

至於簡易國語講習所，以國語習得為目的；講習時間一年，日數達 60 日以上，每日 2-3 小時；招收學生 30 名，年齡 12 歲到 30 歲為準；講習科目以國語為主，亦可視情況增加修身、公民、算術、體操、唱歌等。²³⁵與國語講習所最大的差別即在於講師是地方士紳、學校職員、官公吏等有適當者皆可擔任；而其設立者無論是由市街庄等教化團體、私人團體或個人皆可。²³⁶於是就簡易國語講習所中的設立者、教學內容偏重於國語，及講師身分等而言，可發現簡易講習所極像了前文提及在新竹州各地廣設的國語練習會。今人吳文星即指出簡易國語講習所大多由短期的國語練習會、夜學會及普及會等改制而成。²³⁷這樣的改制，易造成今人研究上的混淆。

以關西庄的坪林地區而言，在昭和 6 年(1931)官方統計時，仍叫「坪林國語練習會」，²³⁸雖然在昭和 8 年(1933)後，由於新竹州發布訓令，已在新竹州各地開始推廣國語講習所。但是在昭和 9 年(1934)時，坪林國語練習會仍有邱氏五妹代表石光公學校參加新竹郡的國語演習會，²³⁹可見此處的國語練習會尚未改名，一直到昭和 10 年(1935)之後，才可能改稱為「坪林簡易國語講習所」，所以約於昭和 10 年(1937)受教於坪林元和宮「講習所」的劉范鏞妹，一直強調各地的教授日語的組織，皆是「講習所」。²⁴⁰

(二)初設

昭和 6 年(1931)底官方調查時，新竹州只有 11 所國語講習所，分別為新竹市設於新竹第一公學校的新竹國語講習所，及由新竹第二公學校設的水田國語講習所，主要以市費來維持，前年教授日數分為 46 及 41 日，會員分別為 35 人及 40 人，²⁴¹分別由當時的新竹第一公學校校長棧木末一，及第二公學校校長佐久間四郎擔任主事。²⁴²

新竹郡新埔庄附設有新埔女子國語講習所，以新埔公學校長金井勝為主事，²⁴³上課日數為 292 日，共有講師 3 人，學員 89 人，以振興會費來維持。²⁴⁴是當

²³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1。

²³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2。

²³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2-1053。

²³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53。

²³⁷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298。

²³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4。

²³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⁴⁰ 劉范鏞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⁴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

²⁴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及頁 28，公學校職員。

²⁴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頁 28。

時新竹州所有國語講習所中，開課日數最多者。

中壢郡的中壢國語講習所，上課情況也達 157 日，共有講師 9 名，會員 81 人，以街費來維持，登記的主事為宮島由多加。²⁴⁵

桃園郡的桃園國語講習所則由私人企業家簡長春所設，且分成 2 組上課，上課日數皆為 110 日，各有講師 1 名，會員卻分別為 39 人及 59 人，也是以街費來維持。²⁴⁶

大溪郡設有大溪及龍潭 2 所國語講習所，主事分別即為大溪公學校校長吉田次郎，及龍潭公學校校長川村均，²⁴⁷分別以街費及庄費來維持，未載前年開課日數，講師各有 5 位，學生分別為 50 及 70 人。²⁴⁸

竹南郡也有 2 所，竹南國語講習所的主事為竹南庄長陳美梅，有講師 10 位，學生 30 人；另一個為頭分國語講習所，主事是頭分庄長松隈梓，有 6 位講師，學生 45 人，皆未載明前一年上課日數，所需經費皆由矯風會支部費支應。²⁴⁹

苗栗郡有 2 所，由苗栗第二公學校長重信政敏²⁵⁰為苗栗國語講習所的主事，有 7 位講師，76 位學生經費 640 日圓，是其中最充裕者；另一所通霄女子國語講習所，應附設於通霄公學校下，但是統計上的名冊卻是前一任的校長橋邊一好，而非 1931 年 3 月 31 日上任的現任校長穎川定介，²⁵¹該講習所有 4 位講師及 72 位學生。²⁵²以上 2 所國語講習所，亦未載前一年授課日數，經費來源則為街費及補助。²⁵³

由以上概述可知，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的國語講習所應為初設，只有 11 所，且後 6 所未載前年開課日數，很可能在調查時始設。²⁵⁴各校的講師、學生數、經費數各所皆不相同，有因地制宜的性質。

另外，若依設置者的身分而言，可分 3 種，以公學校長最多，11 所中有 7 所的主事是當地的公學校校長，其次則為 2 位庄長，2 位私人或團體。²⁵⁵依設置

²⁴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頁 28。

²⁴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頁 29。當時的宮島由多加是關西公學校校長，但其任關西公學校校長只昭和 6 學年度，若非筆誤，則可能是宮島在昭和 6 年(1931)初時人在中壢。

²⁴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

²⁴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頁 30、31。

²⁴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

²⁴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與頁 113-114 竹南庄、頭分庄家長會主事，及頁 120 竹南庄、頭分庄主婦會主事皆相同。

²⁵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32 苗栗第二公學校的校長為重信政敏。2013 年 6 月 7 日查今苗栗大同國小網頁，校史沿革。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3/C0331360136/dt.htm>：

重信政敏為苗栗第二公學校 1921 年 4 月開校首任校長，續任至 1935 年 7 月。

²⁵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2013 年 6 月 7 日查苗栗縣通霄國小網頁，沿革大事紀，橋邊一好於 1928 年 4 月至 1931 年 3 月 20 日擔任該校校長。

http://www.te.mlc.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2&Itemid=1171

²⁵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

²⁵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2。

²⁵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122。

²⁵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122。

而言，頗符合國語講習所創始地臺北州的設置者身分。

其次，經費來源以街庄費最多，共 8 所，只有新埔庄的新埔國語女子講習所，及竹南庄的竹南、頭分國語講習所，經費分別來自該郡的社會教化組織振興會與矯風會，而且全部 11 所皆接受政府補助的經費以協助維持。²⁵⁶因此若以主事及經費來源而言，國語講習所多由各地公學校協助設立，並有因應各街庄所需因地制宜的社會教育性質。

(三)推廣

為了推廣日語，影響到新竹州於昭和 8 年(1933)4 月 2 日，發布國語講習所要項：首先，目的乃對未能接受學校教育者，進行日語教學及良好公民素養的養成；講習期間要 2 年以上；每天上課 2 小時，每年講習日數要達到 150 日以上，視各地所需分成 3 學期；講習科目有修身、公民、國語(日語)、唱歌、體操等，並可依各地所需加入一些實業科目，刪減除了國語以外的其他科目。²⁵⁷由此可見，新竹州的國語講習所設置內容應與臺北州者大同小異，較大的差別在新竹州附設於學校的國語講習所的修業年限在「2 年以上」，因而筆者在訪談時聽到在關西庄石光、坪林地區就學的時間都是 3 年，並有證書可證，詳見下文。

二、學校的國語講習所

以石光公學校《學校沿革誌》中瑣碎的記載整理出來的結果，國語講習所是所有推行日語的組織中，最晚出現的。一直要到昭和 9 年(1934)4 月 7 日，才見到相關的記載，當天才開始分派石光公學校教師至各個學區內募集學生，至 10 日才正式舉行國語講習所的入所式。²⁵⁸

石光公學校下附設的「國語講習所」開設於昭和 9 年度，當年的重要大事記載：昭和 9 年(1934)4 月 7 日為了募集國語講習所的學生，出動左列的職員，如：呂義星與陳開華訓導，負責水坑、茅子埔；朱盛秋訓導負責大旱坑；北島熊雄校長與朱新本訓導，則負責前往坪林、下南片等地召募公民生。²⁵⁹並於 4 月 10 日舉行國語講習所的開所式。²⁶⁰雖然此時石光公學校已開始開設國民講習所，但是以夜間上課 1 時半、以一年為期、招收成人為主的公民講習所仍照常舉行。因為 4 月 16 日的校史中，則出現「午後七時開辦公民生一夜講習會，集合 20 名」的紀錄。²⁶¹同年 10 月 13 日在六家召開的新竹郡國語演習會，可能石光公學校附設的國語講習所尚未培育出優秀的學生，所以當時派出的代表如下，有：六年級的學生范氏喬子參加即席演講，青年團員黃祥清等 6 名演出戲劇「國語的重要」，青年團員賴文光參加即席演講，公民生蔡金來、劉榮鑑參加「對話」、坪林國語

²⁵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1-122。

²⁵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1047-1048。

²⁵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⁵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⁶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練習會員邱氏五妹參加演講等。²⁶²而且由此線索可知，此時坪林仍屬石光學區，畢業自該校學坪林學生，仍屬石光青年團；而且此時坪林國語練習會仍在，尚未更名為坪林簡易國語講習所。到了昭和九年度的最後一個學期，昭和 10 年(1935)3 月 3 日舉辦的新竹郡國語演習會，參加者仍有五年級生范木青、公民生林炳焮、青年團員劉榮鑑與邱家富等。²⁶³

但是到了昭和 10 年(1935)10 月 16 日新竹郡主辦的國語演習會，參加者為六年級的范木青、青年團員黃祥清及國講生彭清涉等。²⁶⁴其中前兩者與昭和九年度的參與者相同，仍是公學校學生及青年團員，唯一的不同是本來的公民生卻變成了國講生，可見國民講習所的學生開始表現不錯，能取代公民講習所的學生參加新竹郡舉辦的國語演習會。

到了昭和十一年度雖然仍見到「公民生」、「女子公民生」參與學校活動的記載，但是只於昭和 11 年(1936)5 月 18 日紀錄了「舉行國語講習所開所式」²⁶⁵，校史中已不再見到公民講習所開所式的紀錄。同年 6 月 15 日記有「國語講師朱阿杞新任式」²⁶⁶，這是校史中唯一提到的國語講習所講師，此人並非公學校的教師，符合國語講習所講師，除常見的教師外，亦可聘適當者擔任。並且在此一年度，新竹郡應相當積極推廣國語講習所，在 8 月 24 日的石光公學校校史中，即見到由石光公學校為會場，主辦了新竹郡關西、新埔兩庄國語講習所講師的演習會，會期從 24 日到 27 日止，共 4 天，由當時的川野綠郡視學、北島熊雄校長及呂阿全訓導等，擔任此演習會的講師。²⁶⁷由此項研習活動可知，當時的關西、新埔兩庄的國語講習所設置的數量應該已達到某一個數量，為了使國語講習所，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才舉辦這場研習。

筆者推估，此時關西庄有關西、石光 2 所公學校，新埔庄有新埔、照門、枋寮 3 所公學校，至少即設有 5 所國語講習所，若把關西庄原設的 6 個國語練習會及新埔庄的 9 個國語練習會皆改設為國語講習所，則至少有 15 個簡易國語講習所，於是至少有 20 位的國語講習所講師受訓，何況各講習所常常不只有一位講師。

在昭和 17 年(1942)擔任石光公學校助教的邱金球，即說當時太平分校旁的國語講習所即有林阿亮、劉煥堂 2 位講師，並由當時學校編制內的劉碧嵐老師負責國語講習所的相關業務，因此劉老師常常不在學校。²⁶⁸若以研習會的講師為新竹郡視學、石光公學校的校長及老師而言，可見這些擔任國語講習所講師的學歷程

²⁶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其中青年團員賴文光是石光第九屆的畢業生，詳見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9；另見 2012 年 5 月 10 日邱金球校長口述，邱與賴文光是坪林的鄰居兼好友，此時坪林仍屬石光公學校學區，故青年團亦屬之。

²⁶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一年度重大記事。

²⁶⁸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度，較一般公學校教師差，故不得不辦理此一研習，方有助推動以後國語講習所的教學。例如：林阿亮是石光公學校第 5 屆畢業，後為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畢業。²⁶⁹劉煥堂也是石光公學校畢業，後讀新埔公學校高等科，再升青年學校等，²⁷⁰青年學校也不過戰時推廣的社會教育組織之一(見第三節青年團部分)。另外任教坪林元和宮的是涂元全則是石光公學校第 3 屆畢業，後經文官考試合格，始任職庄役場役員。²⁷¹

而且當時劉碧嵐可能負責關西地區全區的講習所業務，約與邱金球同時任教職，於 1941 年至 1943 年任教錦山國民學校的楊澄清即言，當時派出所旁邊即設有國語講習所，由劉碧嵐負責，當時該講習所學生多為女性，所以講師也多為多為女性。²⁷²雖然楊澄清不記得講師姓名，但依其所述，當不止 1 位。此外，若劉碧嵐也管轄至錦山國民學校學區內的講習所，則由其統籌關西地區的講習所的情形就甚為明顯。

可惜實際的講習所數量為何，並無官方資料可證，實際情形，難以考證。因為昭和 12 年(1937)6 月 26 日，石光公學校校史記的是：舉行石岡子全保、學校國語講習所開會式。²⁷³並且從此之後，以至到日治時期結束的昭和 19 年度止，石光公學校的《學校沿革誌》再無任何國語講習所的記載，都被戰時的各項活動所取代。²⁷⁴以至筆者只能在訪談或文件資料的佐證下，得以窺見這些活動的運作情形。

當時，若國語講習所業務附設在公學校下者，即稱為「國語講習所」，依下文，昭和 16 年(1941)國語傳習所的結業證書可知，附設於石光公學校區的國語講習所，其所長即由當時石光公學校的校長春田直行²⁷⁵擔任。而且此時國語講習所的受教年限是 3 年，以失學民眾而言，是較正式的教學機構。但一般民眾可能不清楚國語講習所和國語練習所之別，依曾受教於坪林國語練習所的劉范鐮妹即言：「讀 3 年每次半天的叫『講習所』，我讀的也是『講習所』，全部都是『講習所』。」²⁷⁶

²⁶⁹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8，收錄於葉文法、王文俊主編邱金球校長《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附件。

²⁷⁰ 葉文法、王文俊主編：《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229。

²⁷¹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6。

²⁷² 楊澄清主任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

²⁷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重大記事。另外，依劉明怡等撰：《臺灣地區辭書 卷十四新竹縣》，頁 245，日治明治 34 年(1901)隸屬新埔支廳石崗仔庄，大正 9 年(1920)改隸新竹郡關西街石岡子大字，下轄上石岡子、下石岡子小字，昭和 12 年(1937)改為石光保。故昭和 12 年時，地方的基層行政單位由「大字」，改為「保」，故稱石岡子全保。

²⁷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至昭和十九年度重大記事。

²⁷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歷代學校長及分校主任。春田直行，於昭和 15 年 10 月 12 日，至昭和 9 年 3 月 31 日，以訓導資格，共任職石光校長 3 年 6 個月。

²⁷⁶ 劉范鐮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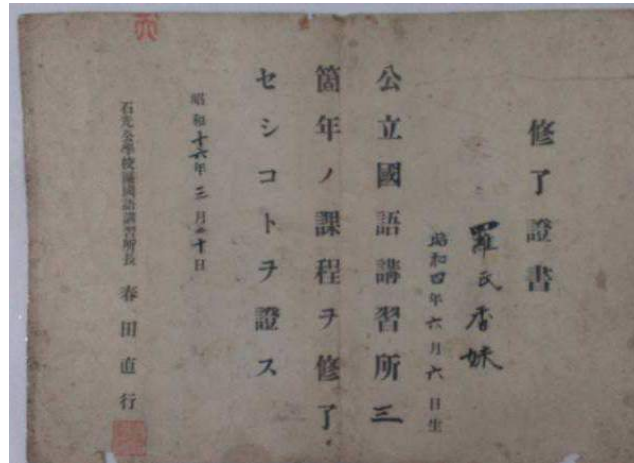


圖 4-9：國語講習所結業證書

資料來源：羅濟錦提供

三、簡易國語講習所

在訪談過程中，雖然受訪者難以辨明參加的究竟是何種講習所，只能就設置地點及講師來判別之。例如：曾在坪林元和宮學習日語的劉范鑄妹，出身坪林范家，身為長女，從小即被送至下橫坑劉家為童養媳。²⁷⁷在 20 多歲時，收到派出所的通知，要利用農事之餘的時間，到坪林元和宮上課，當時這個「講習所」由當地人涂元全擔任講師，只教一些起立、敬禮、早安、謝謝等生活日常用語，沒有紙筆考試，也沒有課本，主要以日常口語為主，不重視書寫，當時一起上課的以 20 多歲的女性為多。²⁷⁸她也提及當時僅十幾歲同為童養媳的三弟妹，就被要求去上學校設的「講習所」，每天下午要上課，而且要上 3 年。²⁷⁹依其講述的情況推斷，她說她弟妹要上者，應該就是學校附設的國語講習所。而且都不能不出席，若缺席，派出所的「調單」（上課通知）就會來，最後是當時已在國民學校教書的二叔說已將名單劃掉，才不必去了。²⁸⁰當事人曾秋梅也說，很想去上課，但是沒有機會去，二伯回家就說已把名字劃掉了，結果沒多久派出所的「調單」又來通知，但是家人仍不讓她去上課。²⁸¹由以上推斷，這些日語推行組織，皆有半強迫的性質，而學校教師也協助處理相關的事宜，才有權利更動附設在學校的國語講習所的學員名單。而且當時的講師涂元全並不是師範畢業，雖曾到學校代課，後來在參加文官考試後²⁸²，進入庄役場工作，但始終不是教師，所以有資格到坪林元和宮設置的「講習所」教書，只因其在石光公學校畢業的資格，²⁸³且日語能力不錯，故受到聘用。若就其設定地點及上課性質而言，這個「講習所」，

²⁷⁷ 劉范鑄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⁷⁸ 劉范鑄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⁷⁹ 劉范鑄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⁸⁰ 劉范鑄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曾秋梅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⁸¹ 曾秋梅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⁸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

²⁸³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第三屆畢業生。

極可能就是原來昭和 6 年(1931)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上指的「坪林國語練習會」²⁸⁴。

由於這些推行日語教學的社教組織，多由公學校教師管理或支援，到了日治後期似乎都稱為「講習所」，造成當時的人及今日研究分類上的困擾。

石光公學校學區內的大旱坑(今太平國小旁)也曾設有一個簡易國語講習所。曾由石光公學校畢業的劉煥堂²⁸⁵和林阿亮²⁸⁶擔任講師，教的都是一些失學的成年人，男女皆有。講習所用的課本內容，較公學校淺顯，內容以物品名稱為主，與一般公學校的使用的課本不同，一般公學校的課本介紹物品名稱後，就是動作，但是講習所的課本則沒有。而且講習所只有名冊，沒有學籍也沒有結業證書。利用下午或是晚上的時間上課，因為白天學生們都需要工作。講師的薪資發放也與公學校教師不同，由鄉公所負責，教師薪資則由區公所負責，區公所較大。²⁸⁷

筆者訪問到的受訪者，其受教於坪林簡易國語講習所的時間，約為昭和 10 年(1935)之後，此時各學校也有設置 3 年制的國語講習所，因此難免產生名稱混淆的情況。而且日治後期在公學校任助教的邱金球也說，這些「講習所」的老師稱「講師」，薪資來自各庄役場，與老師的薪資來源不同。²⁸⁸可見當時的人可能分不清楚這些設置於學區內的日語推廣單位到底有何不同，但仍可分辨其差異。但以受教學生年齡、授課者職稱與薪資來源等，不論其為何種國語講習所，可以判定的是皆屬社會教育的範疇。

以上這些講習所可被歸類為簡易國語講習所，其實仍算是官方支持較正式、有組織的講習所，另於訪談中發現有由甲長(今鄰長)所主持更簡易的講習所。曾秋梅提到雖然她沒有機會去參加學校辦的講習所，但是因為公公是甲長，家中又有很大的茶園，家中常請有很多女工幫忙採茶，於是身為甲長的劉永木，就請上過公學校懂日語的婦人，范朝欽的太太「阿欽嫂」，到甲長家中利用午休，約 2 小時的時間，教這些摘茶女工日語對話。這些女工將近 10 人，她記得的有「福嫂」、「蓮嫂」、「桂姐」、「林嫂」、「和伯孀」、張桂妹、張桂香姐妹等 7 人。²⁸⁹她特別提到桂妹、桂香二姐妹，可以讀卻不去讀，²⁹⁰口氣很是遺憾。可能是慨嘆自己想去讀學校設的國語講習所，卻不能去吧！由此可見，日治後期殖民政府的國語推行政策相當普及，已深入庶民百姓的生活中。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數點。首先，學生年齡的開放，使失學者有就學的機會，由於學生可小至 12 歲，大至 25 歲，因此不限於成年公民方可加入，更適

²⁸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24 述。

²⁸⁵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劉煥堂為石光公學校第 16 屆畢業生(1934 年 3 月)。

²⁸⁶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林阿亮為石光公學校第 5 屆畢業生(1913 年 3 月)；校籌備委員會主編：《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1，〈新埔國民小學高等科業生名冊〉，林阿亮且與石光公學校同一屆的范瑞泉、黃駿波等，同為新埔公學校高等科第一屆(1925 年 3 月)的畢業生。

²⁸⁷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²⁸⁸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²⁸⁹ 曾秋梅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²⁹⁰ 曾秋梅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

合於過了適學年齡失學又想進修的人。而且上課的時間也較有彈性，不必如公學校般長時間的綁在學校，對於一些家境不佳或有工作的人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當然更重要的是政府運用警察單位「調單」的強制性，即使家中不想讓子女就學，大多亦不敢反抗。於是國語講習所在日治後期興起，並自然而然取代了之前各類的推行日語組織。

其次，國語講習所在新竹州受到官方大力推廣的時間，要在昭和 8 年(1933)州訓令頒布之後，可惜缺少當時全州的統計，但若以前述關西、新埔 2 庄的推廣數量估計而言，推及全州，恐怕更多於昭和 6 年(1931)的國語練習會 186 所之數，比諸限制重重的公學校，也有更全面的普及性。更何況尚有由各地甲長等有力人士推行、主持，而未見記載者。

最後，是各類日語推廣組織設置以來，首次見到「講師」也要強制受訓的一次，足以證明殖民政府在推廣日語上，是一次比一次更有組織與制度。有了法令支持，又有政府經費補助，再結合原有的社會教化組織，更有結業證書的頒發。雖不能取代公學校教育，但論其普及日語的成效，自然更勝之前的其他組織，於是取而代之，成為日治後期社會教育中最重要的普及日語組織。

第五節 小結

新式教育制度產生後，學校教育是屬於正規教育的部分，而屬非正規教育，又能維持或促進學校教育的成果者，皆屬社會教育的範疇。由於社會教育的範疇相當廣，為免繁雜、難以聚焦，本論文只選擇最直接影響客家偏鄉居民的家長會、主婦會、青年團與日語推廣活動等，為社會教育的討論重點。至於博物館、圖書館、少年團與其他社會教化機構或組織等，多屬於少數居民才有機會參與，尤以城市居民為多，在此略而不論。

在桃竹苗地區設立的家長會與主婦會常成對而設，且視各地街庄長的態度而有數量與活動上的不同，在其中關西庄設置的家長會、主婦會數量較多，多達 19 個，相對的組成的會員數就較少，多以各保內數百家長或主婦所組成，舉辦的活動以演講會和提升日語的組織居多，但同一庄內各家長會或主婦會的運作情形也不相同，活動多寡差異甚大。由於經費來源可分成市街庄費和社會教化團體補助金等二類，加上這些組織的負責人多為各街庄長或保正，使其組織顯現出今日里民大會的特性，只是現在是自由參加，當時則是強迫參加。至於閩、客各街庄間，並沒有明顯的設置差異。

青年團的設置從日治後期開始興設，原本只是為了使青年在學校畢業後，仍能維持學校教育的成果，但是到了 1937 年後啟動了戰時體制，曾參與青年團幹部訓練的優秀青年，如參與勤行報國青年隊受訓，就有機會進一步成為學校師資缺乏時的助教來源之一，也有機會在接受進一步訓練後，成為正式的日本軍人。而就青年團附屬於各學校設置，再加上各地的勤行報國青年隊或鍊成所受訓的成

員，皆來自全臺各地，因此無法看出有任何的閩客差異，故本文只能就所蒐集到的圖片與文件資料舉例說明之。

最後，日語推廣活動是各類社會教育中最深入民間的組織，從國語夜學會、國語練習會、公民講習所，到國語講習所，這些推廣日語的組織，從早期的招募、自由參與，到國語講習所時期的半強迫性、加強師資訓練，與廣為興設等，都使日語教學更深入民間，其中以甲長可為女工設置簡易的國語講習所，可知其普及推行的狀況。使得即使為生活奔忙，或受限於家事或家人觀念的童養媳等，都有接受日語教育的機會，其組織的嚴密與全面令人難以想像。無怪乎在現今流行的客語、閩南語中，仍有大量的日語語彙。

總之，日治時期推廣各類的社會教育活動，除了提升日語的教育目的，也有貫徹統治政策的作用，其目的與今日單純提升或陶冶受教者的知識、能力等有別。但整體而言，仍有達到推廣日語教育的作用。只可惜在各郡、街庄、保等，同中有異的設置情況下，無法比較閩客族群間是否有異。

第五章 傳統文教

本章將介紹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在書房、詩社等傳統文教的發展與推廣情形。首先介紹清代客家人的發展概況，再介紹日治時期，當殖民政權引進新式教育以培育人材為其所用時，客家人對於傳統文教的態度，除了堅守傳承外，又是如何因應革新。以下分成客家族群傳統文教的推廣情形、漢學推廣與詩社發展來說明之。

第一節 客家族群傳統文教概況

客家傳統文教的推廣情形，可以分成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兩部分來說明，本節以全島發展的情形為主。至於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漢學延續與詩社發展則留待第二、第三節再加以說明。

壹、清領時期

依照筆者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的研究發現可知，清領時期臺灣的客家人即運用其正式教育和社會教化等淺顯或潛在的各種方式，促進教育的發展，以使其子弟能得到較好的生存方式與社會地位，整體的成果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這些傳統的文教方式，在日治之後，留在臺灣的士子已失去科考升遷的管道，但是由於傳統的漢文教育深入民間，尤其私塾相當普遍；加上殖民政府統治初期，為了拉攏民心，並未禁絕等因素下，臺灣的書房教育和詩社發展，頗興盛了一段時期。雖然在 1937 年開始殖民政府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之後，書房被明令廢止，詩社也受到壓抑，但是傳統的書房教育或詩社，並未因殖民政府的明令禁止而消失。甚至在國民政府接受臺灣之後，上完國民學校的人，於放學後，也有上私塾念漢文者。¹

清領時期臺灣客家族群的文教推廣情況，可以從教育文化傳統的傳承，到正式教育中學額的努力爭取、書院的設置，尤其最為普及深入民間的私塾的設置，甚至有以客語編成的童蒙教材的產生等，這些的產生一定要有足夠繁盛的漢文教育人口才有可能。清代的學額分配，即是以該地文教人口的多寡來分配。

以下依筆者《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的摘要為主，另外對應說明的事項加以補充，來概覽清代臺灣客家族群傳統文教的推廣情形。

一、教育文化傳統延續至原鄉

客家族群延續原鄉「耕讀傳家」的精神，呈現出男重文教耕讀，女子不纏足以持家的不同家庭教育方式，並在族譜、家訓中，將上述的精神加以傳承。在宗

¹ 筆者父親生於民國 28 年(1939)，雖然其進入坪林國民學校就讀時，已是臺灣光復後，但是他和他的同學仍於放學後，以走讀的方式接受傳統的啟蒙教育，也聽到他和他的同學，以客語背誦當時塾師教的童蒙教材《昔時賢文》中的句子。

祠建築上，以立匾額或立功名柱的方式顯耀其功名；²客家人特有的敬祀韓愈，因韓愈有開原鄉教化風氣之先；並特重敬惜字紙等的文教祭祀活動中，可見客家族群對教育的重視。另外，很特別的是產生以家族、宗族或廟宇（文昌祠）等為主的公嘗組織；南部客家聚居的六堆，更在因緣際會下，產生六堆科舉會這類地方性的教育支援系統，皆以撥發獎助學金的方式，獎勵士子就學或應考。

二、教育實況以私塾為教育主力

儒學中，粵籍生員的名額，主要分配在府儒學中，且閩籍較為有利，粵籍則相對不利。原因是臺地早期皆隸屬福建，所以各儒學初始皆以閩籍出身生員為主，然後才開放粵籍生員附入，因此入泮持權以閩籍為主，粵籍為從。³若依閩粵的學額比為 10：1，遠低於人口數閩粵比的 5.3：1。⁴但客家人仍然努力科考應試，求取功名。

清代臺灣的書院中，與客家族群的教育較有關係的為客家人創設，並由設置區域可以判讀其為客家人就讀的是，由臺北移至新竹的明志書院和苗栗的英才書院。社學部分，較不可考，只有舉人吳子光在中部所主持的文英社可見其梗概。義學，則以恆春縣義學為例，教育成效有限。

私塾學生數最多，多為民間自行籌設，以「向陽書院」與劉氏家塾為例。其中光緒 18 年（1893）開始設立的「向陽書院」，其塾師陳展鴻即言，自開闢以來，「義塾無之，而家塾則每村有焉」，⁵可見清領時期，各地私塾的設置應相當普遍。至於客語編成的啟蒙教材，如：《四言雜字》與《七言雜字》，可反映出客家族群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與男女有別的家庭教育內容。

三、教育成果受科舉名額分配所左右

雖然在正式教育中，學額即受閩粵籍貫的不同而加以分配，粵籍客家舉人共 35 位，若加入閩籍客家人則最多可增至 56 人，整體而言，客家保障名額發揮功效，中舉時間集中於晚清，粵籍武舉人偏少。至於客籍進士可考者共 5 人，佔全省進士比率 12.82%，客家舉人則佔全省舉人比率 14.23%，人口結構上閩籍人為 83.1%、粵籍占 15.6%，與全體粵籍人所占比率而言，約低於人口比，相當於人口結構。⁶而進士、舉人的主要教育方式以私塾為主，並受其父親重視文教的態度與實學所影響；⁷其主要事功為任官及地方公益。

²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54-6，筆者親自拍攝至今尚保存良好之湯氏宗祠的貢生柱和貢元匾等。

³ 臺灣省文獻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二十冊），〈卷五教育志教育行政篇〉，頁 28。

⁴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73。

⁵ 陳運棟：《穎川陳氏大族譜》（苗栗：協和堂，2000 年），頁 112。

⁶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91。吳文星的研究，更增加了 2 位客籍舉人。

⁷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91。

四、教育能促進社會流動

以客家人對教育的重視及鄉人對識字者或具科舉功名者的禮遇可知，教育使個人有較好的謀生機會，但身為較高功名的進士與舉人者的社會流動，則不如預期。若家中經濟情況並不良好，雖獲朝廷派任官職，亦未必能順利赴任，如奉派四川知縣的江昶榮，因苦覓不得幕僚，再上中法戰爭爆發，並未順利上任，最後在當地士紳的資助才得以返鄉。⁸反而具功名者對其子弟教育的重視，加上容易與地方縉紳之家交遊或結親等附加價值，有助於家族地位的維持與提升。

總之，客家人重視教育的傳統，由原鄉延續至臺灣，在蕁路藍縷、創業有成之後，經由正式及非正式的教育、個人與家族的共同努力，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顯然這些努力確實收到一定的效果。

於是在清代已紮根茁壯的漢文教育方式，在日本統治之後，雖曾面臨士紳階級在兩岸間去留的徘徊，但在大部分較低功名者或是尚未取得功名者，當其不得不繼續在臺灣生存時，面對政權的轉移，加上殖民政府並未強禁漢文，詩社反倒成為傳統士紳精神寄託之處，因而蓬勃發展。

貳、日治時期

日人領臺後，臺灣讀書人已失去參加科考入仕的舞臺，但中國傳統教育所形塑的文化氛圍、文人風骨等，本不可一日而改；再加上傳統教育的主力依靠的是民間的力量——廣泛設在民間的私塾。當掛名式的官學、書院等正式教育機構退場後，執掌教育主力的私塾反而成了維繫傳統教育的重要管道，也成了無緣科考的士子轉而謀生的重要場所。何況日人領臺初期並未立禁書房，反而將書房教育當成是正式教育的補充。因此在教育活動上，在日治時期，除了正式教育外，必然要討論到書房教育的存續與演化問題，雖然官方有數字詳細的統計資料，但這主要是指有呈報的、維持較長的書房為主。依筆者訪談的情況，仍有躲警察的「夜學」存在，⁹可見隱性、不在官方統計數字上的傳統教育方式仍是存在的。可以想見，實際上的漢學相關的傳統教育恐怕大於官方的統計數字，其教育內容也較日本殖民政府統計的教材內容更廣，更貼近平民百姓的生活，因此在後續的研究中，不得不另闢章節討論。（詳情請見第二節漢學延續的部分）

另外，在與教育相關的文化活動上，則屬於不見衰敗反而更盛的詩社活動。詩社的興起主要來自傳統士人嫻熟詩以應試後，成為詩人聚會時應酬、贈予、遊戲所形成的一種聚會方式。至日治時期，卻成為無法科考應試的士子們得以寬懷的活動之一，於是本來未必興盛的詩社，卻在日治時的臺灣反向興盛起來。雖然詩社創作的內容、活動方式時有變遷，各詩社的組成、興盛也各異，但卻成為日治時期一種臺灣獨特的文人組織與活動。詩社的成員，早期可能是具有傳統功名的士人或塾師，到了後期，卻可能是受了日治新式學校教育的公學校教師或地方

⁸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文化，1973年），頁199-201。

⁹ 徐慶松社長2002年4月29日口述。

士紳、百姓等。詩社雖然不能視為當時學校教育的補充，卻是當時文教活動上不可忽略的一環，且維繫傳統不墜。全臺各地的詩社興盛情形，前人研究頗多，足以證明其在日治時期的重要性，客家人在此活動中也並未缺席。更因為傳統詩社吟詠與就地結社的特性，在日治時期可以在桃竹苗地區分別找出以客家人為組成的詩社活動。(詳情見第三節詩社發展)此處將先概覽日治時期全臺書房教育與詩社活動的情形。

一、書房教育

在日本領臺之初，即對臺灣書房的運作情形，作了詳細的調查，並且於明治 29 年(1896)制定了相關的〈書房義塾規程〉7 條的諮問案，由各縣廳依各地情況加以回覆。¹⁰到了明治 31 年(1898) 11 月 10 日正式頒布〈書房義塾相關規程〉，規定書房漸朝公學校改良，漸次加開日語、算術等課程，並規範書房的用書、管理、衛生、調查生徒學習情況及其家長職業等，表現優良的書房甚至可以得到費用補助。¹¹可見殖民政府已試著將書房漸漸納入政府管理之下，而不再任由私人發展。由於書房使用的教科書也要得到地方當局的認可，到了明治 44 年(1911)即開始取締不合時宜的教科書。¹²到了大正 11 年(1922)6 月 27 日私立學校規則發布後，〈書房義塾相關規程〉終於宣告廢止。¹³以上是法規的修正情形，書房實際的數量，則可由日人相關的統計資料得知書房設置的變化概況。

依照昭和 14 年(1939)臺灣教育會編成的《臺灣教育沿革誌》一書所呈現的資料可知：在明治 30 年(1897)4 月時，全島的書房仍有 1127 間，學生有 17066 人，其薪資的給付以金錢、米油為主，另外有些地方則以薪炭、茶鹽補充。¹⁴到了明治 31 年(1898)2 月時，書房總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至 1707 間，每一間書房由一位教師主持，學生數亦增加至 29876 人，另有女生 65 人。¹⁵這次的調查中除了新竹縣外，還詳列了教師的資格，其中以秀才以下的低階功名占最多，共有 905 人，占 53%，超過一半以上。¹⁶自明治 31 年(1898)之後，書房總數時高時低，這和書房由私人主持，興廢不時的情況有關，但大體上乃呈現遞減的狀態，到了明治 39 年(1906)開始少於 1 千間，學生數也少於 2 萬人，到了大正 10 年(1921)之後，歷年調查則全臺書房多少於 200 間，其中較特別之處有：1、從明治 35 年(1902)開始，教員總數即稍大於書房總數，若統計無誤，則可推論一間書房不再只有一名教員；2、女生的人數雖時有上下，但整體而言是持續增加的，由明治 31 年(1898)的 65 人，次年即升至 126 人，至明治 39 年(1906)則突破 3 百人，到昭和年間較少時也有 648 人，較多時則有 862 人，與整體書房學生數或是男生數持續下降的情況不太相同。¹⁷亦即男生大多轉入學校接受教育，因此人數漸少，但

¹⁰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69-73。

¹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74-5。

¹²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79。

¹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80。

¹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80-1。

¹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82-3。

¹⁶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82-3。當時的新竹縣，包含今日的桃、竹、苗各區。

¹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84-6。

是女生若能進書房受教已不錯，故女生數不減反增，顯現對男女受教態度的不同。在《臺灣教育沿革誌》一書中，可以得到明治 30 年(1897)到昭和 8 年(1933)全臺書房設置的變化情形，可見到了大正 11 年(1922)之後，書房教員總數大於書房總數的原因，可能受到日本殖民政府規定，書房中除了教授漢書外，還要增加算術、日語等新式課程有關，因此可能得聘用除了具漢學專長以外懂日語或算術的師資。至於女生徒數的變化情形，可能也因日本政府將書房當作基礎教育的補充有關。很多女學生，因為超過了就學的年齡，或家庭無法讓女生接受全時的學校教育，於是就將學生送往就近的書房習得一些應世知能，因此造成此一現象。

二、詩社活動

清代在竹塹地區(今新竹)即由於開臺進士鄭用錫及名流林占梅，提倡詩學、設立書院，促使地人文風鼎盛、詩人輩出，內地騷人墨客也風聞而來聚會唱和，盛極一時，留下不少傑作詩文、書畫，及風雅事蹟。¹⁸依今人整理統計清代全臺共有 15 所詩社，其中竹塹地區即佔了 6 所，分別為斯盛社、潛園吟社、竹社、梅社、北郭園吟社，及竹梅吟社等。¹⁹

清代時雖然尚未有客家人組成的詩社產生，卻已有客家籍的士子蕭國香(字薦階)、彭裕謙、姜紹祖等人，參與竹塹詩社的活動。²⁰蕭國香為清代臺灣客籍舉人之一²¹，與鄭用錫、林占梅皆有往來，在其為秀才之時，即與 2 人交好。鄭用錫寫有〈薦階茂才小飲北郭園贈詩，和原韻〉四首，及〈薦階贈詩，再和元韻〉二首，依詩題可知，蕭氏曾進出北郭園，並受到用錫的禮遇，兩者並以詩互相唱和。²²而林占梅於咸豐六年(1856)亦留有〈頻年曲，答蕭薦階(國香)茂才見贈之作〉一詩，詩中亦對蕭氏之科考不順多所安慰。²³後來蕭國香終於同治元年(1862)考中舉人。²⁴至於北埔的彭裕謙秀才及其門生姜紹祖，亦曾參與詩社活動，彭裕謙在日治初期，曾應聘至北埔公學校擔任雇員，姜紹祖則不幸逝於乙未割臺之時的抗日活動。²⁵此時則未有客家人組成的詩社。

到了日治時期，竹塹詩社不但未減，反而增加，²⁶但是詩社本是士人交遊隨興所至所組的組織，大多興廢不時，少數因友誼堅固或運作得法，方能得以延續。因此在總數上的統計上，總有頗大的差異。²⁷由於詩社的吟詠皆以方言為之，常

¹⁸ 陳朝龍、鄭鵬雲編：《新竹縣採訪冊》(臺北：臺銀經研室，1962 年)，第七本〈風俗〉，頁 255。

¹⁹ 許楓萱：《清代明志書院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90-191。原文為 4 所位於竹塹地區，但表格整理為 6 所，且後面行文皆為 6 所。

²⁰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頁 101-104，載於《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5 卷 1 期，頁 91-139。

²¹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70。

²²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臺北：臺銀經研室，1959 年)，卷三〈七言律詩〉，頁 45-46。

²³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臺銀經研室，1965 年)，〈咸豐六年〉，頁 81-82。

²⁴ 陳培桂：《淡水廳志》(同治十年)(臺北：臺銀經研室，1956 年)，卷八〈選舉表〉，頁 246。

²⁵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頁 103-104。

²⁶ 林洋港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省文獻會，1993 年)，卷 6〈文教志〉，頁 95。

²⁷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銀經研室，1960 年)，附錄四〈臺灣詩社記〉，全臺共 66 所詩社，今桃竹苗地區於，日治時代桃園郡有以文吟社 1 所，新竹街有竹社、青蓮吟社與籟聲吟社等 3

形成閩、客分群的情況，與閩籍相比，客籍的士子顯然較少，但是在日治後期，桃竹苗地區，也分別有以客家人為主的詩社出現。詳見第三節詩社發展。

第二節 漢學延續

日治教育政策第一階段推動時，由於公立學校設置的不夠充分，極需傳統私人的書房來補充教育的不足，也是傳統文人失去科考舞臺後，重要的求職或傳承文教場所；但是到了1920年代後，「臺灣教育令」已公布，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臺灣人已越來越多，可是傳統的漢學教育仍然以私學、非正規的方式維持、進行著；到了第三階段，日式的正規教育已推廣、延長至中、高等教育，但是漢學仍一直以私學的方式被維持著，到了後期，很多書房的老師，根本就是畢業自公學校者。

壹、書房設置

書房日治時期在桃竹苗地區仍存在，這是日本統治者對臺灣傳統私塾教學的稱法，客家人一般稱之為「讀漢書」，利用夜間上課的，則稱之為「打夜學」。到後期，日本政府開始禁止書房教育，前陶社社長徐慶松表示，一旦有警察來取締，就會有人通報，並且要從後門逃走。²⁸有關該地區的狀況，分述如後。

一、設置情形

以下先就官方統計資料，呈現桃竹苗地區書房設置的概況，再舉新埔、關西地區的客家庄為例。

(一)新竹州概述

明治30年(1897)對全臺書房的調查顯示，當時新竹支廳有151所書房、學生2341人，苗栗支廳有39所書房、學生644人，合計書房共有190所，學生2985人。²⁹次年，地方行政調整後，此區為新竹縣，共有290間書房，學生5200人。³⁰雖然前後的調查可能因區域調整而有出入，但日治初期是呈現增加的。全臺的書房設置情況大體是日治初期短暫的增加，至明治36年(1903)以後，雖有些年可能數字稍有起伏，但整體而言是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³¹在明治36年(1903)6月25日的《新竹廳報》中，曾頒告示106號，詳列該年3月廳內通過認可開設的書房，總共有145所。³²總數上較明治30年(1897)的151所稍微減少。可見桃

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22冊)(臺北：捷幼，1999年)，〈卷六學藝志文學篇〉，頁29-31，則言全臺超過180個詩社；而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61-66，則指日據時代全臺相繼成立的詩社多達278個。

²⁸ 徐慶松2002年4月29日口述。徐慶松，生於1921年，8歲到14歲就讀關西公學校，17歲時跟從關西元和宮的香公伯黃榮海讀了一個月的漢書，包括《寫信必讀》、《幼學瓊林》等。相關生平可見自撰出版的《八十自述——徐慶松全集》一書。訪談進行於2002年4月29日，受贈2巨冊《陶社詩集》與《陶社課題詩選》二書，時為關西陶社社長。

²⁹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81。

³⁰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83。

³¹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84-986。

³² 不著撰者：《新竹廳報》，第105號，1903年6月25日，頁168-172。但往後的廳報中，亦有公

竹苗地區書房設置情形，也大致符合這樣的發展變化。

到了日治晚期，桃竹苗地區被官方所認可的書房明顯的減少。依新竹州官方於昭和 6 年(1931)底的統計資料顯示，該年度總共有 38 所書房，分別是新竹市 8 所，新竹郡 10 所、中壢郡 4 所、大溪郡 3 所、竹東郡 4 所、竹南郡 1 所、苗栗郡 4 所、大湖郡 4 所。³³其中最特別的是新竹市，按理說此時公學校已相當發達，屬於新竹州最繁華的新竹市已有 4 所公學校³⁴，設置相當早又密集，既然新式教育如此發達，為何仍有 8 所書房？較可能的解釋是，因為市街屬繁華之處，日人的掌控、調查效果較佳，所以調查出來的個數較為詳盡。其中只有集益堂書房和漢文專修書房是專教漢文，其他 6 所書房雖授課內容稍有差異，但 6 所設有修身、算術，5 所設有國語(日語)，4 所設有體操，甚至有 2 所還教唱歌。³⁵就這 6 所書房上課內容而言，幾乎與一般公學校無大差異，故其設置的原因應仍是補學校教育之不足。

其中最特別的是新竹昭和義塾，設立者竟是日人佐久間尚孝，該書房有 5 位老師，招收 63 名男學生，分成 2 學級教學，上課的科目為國語、修身、漢文、算術、唱歌、體操等，尚未有畢業生。³⁶由未有畢業生，可見應為新設。且上課內容與一般學校教育的內容相同，只是既不屬於政府為日人設的小學校，也未列入私立學校，竟列入書房。而且一般臺灣人設的書房，通常由 1 位老師主持，頂多 2 位，這間竟然有 5 位老師，非常不同於我們對書房的認知。

若配合第二章第三節閩客人口分布的情形來討論，可以發現：除了新竹市外，其他各郡的書房屬設置在客家庄為多。新竹市本為閩人和日人較多的城市，而且新竹市自晚清推廣文教以來，傳統教育本就較新竹州其他地區發達，書房設置較多，自然在情理之中。

至於新竹州其他 8 個郡中，全為閩人較多的桃園郡竟然沒有書房，而其他 7 個郡的書房皆設在客家人居優勢的地區。若縮小至庄來看更明顯，會發現設置書房之地以客家庄為多，例如新竹郡新埔庄即有維新、桂林、集古和東山 4 所書房，湖口庄有東山、文行 2 間，關西庄有馬武督、赤柯山 2 間，六家有育英書房，紅毛庄有維新書房，³⁷至於閩人較多的舊港庄和香山庄竟然卻沒有書房。

中壢郡各庄皆為客家人較多，書房有楊梅庄的啓明、吟香書房，平鎮庄的平東書房，與新屋庄的梨頭洲改良書房等，³⁸但是較熱鬧的中壢街和靠海的觀音庄卻沒有書房。

告書房的增減，如：第 111 號，1903 年 7 月 30 日，頁 200，有修文書房、香谷書室得到開設認可；第 117 號，1903 年 9 月 14 日，頁 216，存養齋關閉，第 125 號，1903 年 10 月 16 日，頁 240，鼇峰書室關閉，及第 128 號，1903 年 11 月 5 日，頁 250，守拙軒關閉等。可見即使是短時間內，書房的開關情形也會產生變動。

³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94。

³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18。

³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

³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

³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92。

³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大溪郡共有大溪與龍潭 2 庄，其中客家集居的龍潭庄三洽水即有三洽水改良書房和樂育書房；至於大溪街上的烏塗窟書房，則位於閩人優勢區。³⁹

竹東郡本來全區即是客家人為多，有竹東庄上坪的上坪就道書房，芎林庄有修道書房，橫山庄有南河育英義塾和大肚勵省義塾 2 間。⁴⁰竹東庄的上坪在大正 14 年(1925)呂榮初應該要上學時，還沒有學校，因此他只得回到當時已有設校的關西庄石崗仔區，依附祖母就近讀石光公學校。⁴¹可見在上坪地區在 1931 年時仍有一間上坪就道書房，由葉秋亮設立，招有男學生 86 人，女學生 19 人，分成 2 個學級，由 2 位老師教授，教授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唱歌、漢文、圖畫與體操等 7 科。⁴²此書房的規模、配置與授課內容，幾乎是一所小型的公學校。

此外竹南郡只在南庄設有文英書房，⁴³其他客家人較多的頭分、三灣、造橋等庄，及閩人較多的竹南和後龍庄，皆未見設書房的紀錄。

苗栗郡則有三義庄的養成書房，頭屋庄的仁隆、雲梯和啓蒙書房等。⁴⁴其他客家人較多的苗栗街、公館、銅鑼、通霄、四湖等庄，及唯一一個閩人較多的苑裡庄，都未見設書房的紀錄。就教授科目分析，頭屋庄的三所書房較為傳統，授課內容只有漢文與習字，⁴⁵其他多有加入新式教育的內容。

最後，大湖郡的三個庄皆為客家人居優勢，也都設有置書房。大湖庄有校集林改良書房、靜養書房，卓蘭庄的大坪林講學義塾書房，及獅潭的永興書房等。

⁴⁶

以上這些資料屬於官方的統計，在 1931 年時，新竹州共有 38 間書房，仍在學的學生有 1,679 人，已畢業的學生則有 3,033 人。⁴⁷這些書房應該是較具規模，教學內容或位置為官方所認可，因為除了極少數，像新竹市的集益堂書房和漢文專修書房是專教漢文，及頭屋庄的仁隆、雲梯和啓蒙書房只教漢文和習字外，其他皆設有新式學校教育的科目，少的只增加算術一科，多的幾乎就和一般公學校內容大同小異。除了國語、修身外，也有較活潑的畫圖、唱歌和體操等科目，這在傳統書房教育上是相當難以想像的。這樣的改變過程，可能和書房已被政府納入管理有關。

由於這是 1931 年的調查資料，書房屬私人辦理的性質，難免興廢不時，官方調查也難免有疏漏，實際的設置情況應較官方調查數量為多。尤其書房既屬私人設學，而可能利用家宅設置、短時間、學生少，屬臨時性的走讀，客家人稱為「打夜學」，更不在統計之列。這樣短期性的傳統書房教育，可是在訪談時發現，

³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施崇武、劉湘櫻、唐菁莘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頁 373-374。烏塗窟即「黑土掘」的閩南語發音。

⁴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3。

⁴¹ 呂榮初 2013 年 4 月 20 日口述。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9，呂榮初為石光第 13 屆畢業生，畢業於 1931 年 4 月。

⁴²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⁴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3。

⁴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3。

⁴⁵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3。

⁴⁶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3。

⁴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卻是許多長輩從嫻熟日文轉而接觸漢文識字的開始。而這類資料卻無法在官方或前人研究的文件資料上獲得，必得依賴訪談，始能知曉。而且由於這些短期性的漢文學習，沒有範圍與內容的限制，內容可能只是應世智慧與道德要求，修業後也沒有結業文件可資證明，隨著時代的更迭，也不再適合運用在生活上，漸被遺忘，只存在年長者的記憶中，一起凋零。詳見下文「打夜學」部分。

以上屬概略介紹新竹州實際設置書房的情形，下文將舉客家人集居的新埔、關西地區為例，說明書房的設置情形，及與公學校設置的消長情形。

(二)以新埔、關西地區為例

為何將新埔與關西放在一起討論，因為這兩庄從晚清的交通動線上，即是地理上相連的兩個地方。依《馬偕博士日記》所記：「1889年11月1日，到龍潭埤(今龍潭)去，這裡都是客家人，然後到鹹菜甕(今關西)……」；「11月2日：在新埔舉行禮拜。」⁴⁸尤其新埔與關西之間並無山川阻隔，而是相連的丘陵沖積扇，在日治時期關西若要前往新竹，新埔更是必經之地，因此這兩個客家鄉鎮的人民往來相當方便而密切。

新埔的傳統教育，就如清代的臺灣各地一樣，主要依靠的是私塾。所設書房的教育程度也多限於「蒙館」，一般學子若想考中秀才或舉人多靠自修。⁴⁹明治36年(1903)時，新竹廳總共有145所書房得到開設許可，其中新埔地區總共開設了16所，⁵⁰次年(1904)也可見到15所書房得到開設許可，有些開設者有變、或未從新申請許可，其中有4所是新開設者。⁵¹可見書房開設的變動情形，但總數上，遠較後人方志資料所蒐集者為多。這些蒙館教育興廢不時，有些且創於晚清，但學古、維新、桂林和東山等4所書房則創於日治大正13年(1924)。⁵²而且在昭和7年(1932)新竹州官方的統計上，新埔庄下也只列前述4所書房，⁵³其設置的位置、塾師見表5-1。到了1932年，書房所教內容已朝公學校方向發展，例如維新和桂林書房的教授科目為：修身、國語(日語)、算術、漢文及書法；至於學古書房則為漢文、國語(日語)、修身3科；東山書房則只有漢文和算術2科。⁵⁴依其教授科目可知，幾乎每一所在官方統計下出現的書房，其授課內容中的修身、國語(日語)和算術皆是日治時代公學校的必修學科。由此可知，當時官方統計內的書房，只是公學校的補充，設置的位置皆在離公學校較遠之處，分別為新埔庄的週邊，如五分埔、南打鐵坑、枋寮義民廟及汶水等。這樣設置在街庄邊緣，離公學校甚遠的情況，以關西庄更為明顯。

另外，其他的書房，依《新埔鎮誌》〈人物誌〉中提及者，則發現書房之數，遠超過《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另外，今人留傳下來的《大新吟社詩集》中，

⁴⁸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頁149。當年龍潭、關西、新埔間即可步行而至，至今這3個鄉鎮，即使分屬桃園縣及新竹縣，也仍然是台三線上重要的客家鄉鎮。

⁴⁹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教育誌〉，頁320。

⁵⁰ 不著撰者：《新竹廳報》，第105號，1903年6月25日，頁168-172。

⁵¹ 不著撰者：《新竹廳報》，第162號，1904年7月18日，頁369-370。

⁵²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教育誌〉，頁322。

⁵³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91-92。

⁵⁴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91-92。

亦可整理出於日治時期相當活躍參與大新吟社活動的塾師們，包括詹文光、詹金英、楊成泉、吳明相、陳新龍、張桂良等 6 位。⁵⁵詹金英是此區唯一的女塾師，因此吸引鄰近的女學生前往就讀。例如：1936 年畢業於關西庄石光公學校的鄧平妹⁵⁶，為地主之家的長女，下有 3 弟，卻甚受家人疼惜，在不需急著就業或升學的情況下，曾跨區到鄰近的五分埔，就讀詹金英主持的書房。當讀了 7 日用客語教學的「漢書」後，覺得「漢書」太深，於是就放棄不讀了。⁵⁷但這個在地方頗為有名的書房，並未出現在官方昭和 7 年(1932)的書房統計中；而且當時詹氏已 50 歲左右⁵⁸，繼承父志教漢書，可見此書房早在官方調查時即已存在，卻未被列入。

以下將廳報、鎮誌中曾提及新埔地區的書房整理如表 5-1，可以發現新埔地區在日治時期至少曾有 29 所書房運作過，其中塾師可能先後主持不同的書房，或同一書房隔年即換人主持。於是日治時期，書房的開設，除了要官方的核可外，仍常興廢不時，因此很難統計開設數量或規模，但此處整理的少數例子，仍可見證新埔地區書房的發展。詳見表 5-1。

表 5-1 日治時期新埔的蒙館

編號	地點	名稱	歷任塾師	學生	備註
1	文昌祠	文明書院	1 陳學光（道光 23 年舉人） 2 張登榜 3 李芯孫 4 張桂良（大新吟社）	陳壽生（從李芯孫學諸子詩文）	
2	五分埔	五分埔老學堂	1 詹際清（光緒 19 年秀才） 2 詹氏金英（大新吟社）		詹際清終身教漢書兼新埔公學校教師
3	枋寮義民廟	枋寮義民廟	1 陳順德（陳順捷） 2 陳新龍（大新吟社）		
4	犁頭山庄	求志書室	劉朝順(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5	枋寮庄	青雲書室	林瀝港(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⁵⁵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 年)〈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

⁵⁶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十八屆畢業生名冊。

⁵⁷ 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

⁵⁸ 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

表 5-1 日治時期新埔的蒙館(續)

6	枋寮庄	日新書室	<u>林陳送</u> (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7	打鐵坑庄	化鐵山房	<u>彭海生</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u>彭德勝</u> (明治 37 年/1904 開設者)		
8	大茅埔庄	桂林書室	<u>張萬龍</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9	汶水坑庄	學文書房	<u>陳良武</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u>陳良元</u> (明治 37 年/1904 開設者)		
10	汶水坑庄	文英書室	<u>陳房喜</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u>陳良武</u> (明治 37 年/1904 開設者)		
11	大茅埔庄	川上書房	<u>范阿滿</u> (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12	汶水坑庄	育英書房	<u>鍾興來</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13	汶水坑庄	小學山房	<u>黎阿團</u> (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14	大坪庄	自明書室	<u>林李海</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15	大茅埔庄	薺香書室	<u>范德龍</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16	鹿鳴坑庄	樂山書房	<u>范福元</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17	大茅埔庄	有斐書室	<u>曾榮標</u> (明治 36 年/1903 開設者) <u>林德標</u> (明治 37 年/1904 開設者)		
18	打鐵坑庄	北溪書房	<u>張乙妹</u> (明治 36、7 年/1903、4 開設者)		
19	大坪庄	桂林書房	<u>張萬龍</u> (明治 37 年/1904 開設者)		

表 5-1 日治時期新埔的蒙館(續)

20	犁頭山庄	學海書室	簡金連(明治 37 年 /1904 開設者)		
21	大平窩庄	志道書室	劉安然(明治 37 年 /1904 開設者)		
22	鹿鳴坑	大化書室	林澄康(明治 37 年 /1904 開設者)		
23	內立	內立書房	吳阿火		
24	枋寮	學古書房	陳阿伸	男生 46 人，女生 2 人。	大正 13 年 (1924)
25	五分埔	維新書房	詹文光 (光緒 20 年秀才、大新吟社)	男生 11 人，女生 9 人。	大正 13 年 (1924); 大正 4 年 (1915), 任新埔公學校漢文教師。
26	南打鐵坑	桂林書房	劉阿榮	男生 26 人。吳明相 (明治 37 年/1904, 修完漢學, 轉入育英齋, 明治 39 年 /1906 入新埔公學校, 後轉楊梅公學校。)	大正 13 年 (1924)
27	汶水坑	東山書房	鄭維海	男生 21 人	大正 13 年 (1924)
28	五分埔	自得書房	陳兆霖	陳壽生 (學經史)	
29	新埔	愛蘭書室	潘德宙	潘成鑑 (光緒 7 年至 17 年學漢學)	

表 5-1 日治時期新埔的蒙館(續)

30	鹿鳴坑	啟化書房	<u>楊成泉</u> （ <u>大新吟社</u> ）、（明治 45 年 /1912 辭書記官，始任教）		
31	照門	吟番書房	<u>吳明相</u> （ <u>大新吟社</u> ）、（明治 43 年 /1910 畢業於楊梅公學校後，教授漢文至大正 5 年 /1916。）		
32	太平窩	學古書房	<u>范阿賴</u> （明治 36 年 /1903 開設者） <u>范彩</u> （明治 37 年 /1904 開設者） 陳順德		

說明：

- 1、塾師名下加橫線者，係確認日治時期仍在執教或為日治時期的開設者。
- 2、若是在《新竹廳報》前後期及《新埔鎮誌》中，書房的開設位置及書房名稱相同者，則視為同一所書房。

資料來源：

- 1.不著撰者：《新竹廳報》，第 105 號，1903 年 6 月 25 日，頁 168-172。
- 2.不著撰者：《新竹廳報》，第 162 號，1904 年 7 月 18 日，頁 369-370。
- 3.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教育誌〉，頁 322-323；〈人物誌〉，頁 456，詹文光；頁 459，詹際清；頁 460，潘成鑑；頁 461，陳壽生；頁 467，楊成泉；頁 468，吳明相。
- 4.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92。
- 5.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

由於日治明治年間的關西地區是屬於桃園廳，因此相關的書房開設許可，多見於《桃園廳報》中，但是桃園廳未見到如新竹廳般，將書房同時核可開設後整理公告的例子，因此更增整理上的困難。只能就筆者於《桃園廳報》得見且判讀為設於關西者，另外補充石光國小存的《學校沿革誌》關於書房的記載，一併整理，詳見表 5-2。

表 5-2 日治時期關西的書房

編號	地點	名稱	開設者	認可時間	備註
1	芋仔園庄	崇文書房	吳錦坤、鄭廷旺	明治 42 年 (1909)	《桃園廳報》，第 203 號。

表 5-2 日治時期關西的書房(續)

2	坪林庄	登雲書房	范洪灶(坪林)、劉鼎福(下橫坑)、陳華達(下南片)、陳騰芳(上橫坑)	明治42年(1909)	《桃園廳報》,第203號; 《學校沿革誌》,頁4。
3	石崗仔庄	石崗書房	劉耀陳、朱盛桂	明治42年(1909)	《桃園廳報》,第203號。
4	大旱坑庄	東溪書房	鄧昌山、朱清石	明治42年(1909)	《桃園廳報》,第203號; 《學校沿革誌》,頁5。
5	老煥寮庄	知新書房	1、韓新良(開設者) 2、鐘敬恭(塾師)	明治44年(1911)	《桃園廳報》,第285; 《學校沿革誌》,頁4、10,學生20名。
6	老煥寮庄	東竹書房		(大正2年/1913)	《學校沿革誌》,頁4。
7	石崗仔庄	青雲書房	林金土	(大正2年/1913)	《學校沿革誌》,頁4、10,學生19名。
8		南坑書房		(大正2年/1913)	《學校沿革誌》,頁7。
9		漢和書房	宋進宋	(大正2年/1913)	《學校沿革誌》,頁10,學生45名。
10		東漢書房	鐘喜來	(大正2年/1913)	《學校沿革誌》,頁10,學生35名。
11	馬武督	馬武督書房	陳昌田	(昭和6年末/1931)	《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92。2位塾師,學生男生46人、女生12人共58人,已經畢業的有56人。
12	赤柯山	赤柯山大正義塾	羅碧泰	(昭和6年末/1931)	《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92。2位塾師,學生男生38人、女生1人共39人,已經畢業的有53人。

說明：以上所得資料，單石光公學校學區內的書房即有9間，若依第三章學校教育部分對關西地區的學校設置可知，遺漏的書房尚多。

資料來源：

- 1.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03 號，1909 年 3 月 5 日，頁 28-29。
- 2.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85 號，1911 年 6 月 26 日，頁 85。
- 3.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4-10。
- 4.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三)書房為正規學校教育的補充

能出現在官方統計資上的書房，一般也是經過官方所同意設立者，而設置的地點多位於該地方行政區域偏遠之處，以補正規學校教育的不足。如：桃園廳在明治 36 年(1903)4 月廳令第三號即對書房的開設訂有相關的規定，主要內容包括：書房名稱、設置位置、教室樣式坪數、教員數及履歷、教授科目及用書、上課時間日期，及修業畢業年數等，皆要通報；並提供相關的表格以登錄通報，尤其要每 3 個月造冊向廳長通報學生就學情形；而塾師若有吸食鴉片、受刑罰、或其他官方認為不適任者，則不宜擔任塾師；若有任何變動皆應呈報，經過認可；且能符合以上各項通報規定者，方能設置書房，否則就會受到取締等。⁵⁹各項規定可謂相當仔細。到了明治 38 年(1905)，除了原來的申報規定外，桃園廳長津田毅一發布桃園廳令第一號，強調凡是未經批准，或經註銷後，仍逕行開設者，處以罰金 5 日圓以下，以儆效尤。⁶⁰而這樣類似的規定也見於《苗栗廳報》中，苗栗廳於明治 41 年(1908)3 月 8 日發布苗栗廳令第二號，規定：書房設置的名稱、所在地、修業年限、教授科目、教科用書、每日教授時間、預定的學生，及教師住所、姓名及經歷等，都要呈報核可，一旦有變動要再次呈報，若廢止更要在 10 日內通報廳長，如有違反此令者將受 5 日圓以下之罰款或處罰，並在此令公布後 30 日內，既已設立者亦要補申報。⁶¹可見書房的設置情況各地不一，各廳的規定則大同小異，實際執行情況，則視各地方政府的規定而定。

若比對桃園廳、新竹廳與苗栗廳，對書房設置規定較多、較詳細的當屬桃園廳。桃園廳到了明治 41 年(1908)5 月 5 日，另外發布桃園廳令第三號，針對明治 36 年(1903)4 月廳令第三號公布的書房義塾相關規程細則，作了更詳細的規定與修正。⁶²除了原有開設所應呈報的事項外，對於預定招收的學生列出男女性別、維持的方法是收束脩或義捐等皆應詳列，書房的建築、坪數也應繪圖說明，並規定書房應規定公學校一里以上，列出與附近公學校的距離，必要時官方可指定開設位置。⁶³此外針對書房教授的修身、國語、漢文、算術應採用公學校教科書；受教年限 4 年，若有必要亦可申請延長；再次強調遇到大祭日、祝日、始政紀念日等應停課表敬意，紀元節、天長節等節日也要對學生訓話以昭恭祝等。⁶⁴其他繁瑣的規定，不一一列出。同時，桃園廳令第四號，則頒布「書房義塾教員檢定及免許規程」，不但規定塾師的資格，並且規定塾師要通過修身、國語、漢文、

⁵⁹ 不著撰者：《桃仔園廳報》，第 11 號，1903 年 4 月 21 日，頁 49-53。

⁶⁰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30 號，1907 年 2 月 25 日，頁 19。

⁶¹ 不著撰者：《苗栗廳報》，第 572 號，1908 年 3 月 8 日，頁 14。

⁶²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4。

⁶³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4、86。

⁶⁴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4-86。

算術與教學法等的檢定，方可擔任塾師。⁶⁵整體而言，此時設置的書房，開始往公學校靠攏，類似簡易的公學校，為公學校無法普及時的補充。若依官方針對實際設置書房的統計數量，漸漸減少而言，頗符合廳令所述。

今人吳文星研究後強調：在 1920 年以後，各項同化措施日益具強制性，固守舊態的書房漸遭取締或關閉，仍能開辦者唯有配合殖民政府的政策與法規要求，扮演代用公學校或推廣日語的角色。⁶⁶但若就 1931 年新竹州官方的教育統計中，仍可見到數所純教漢文的書房；而且筆者實際訪談日治末期受教者的例子中，也頗多利用課餘或畢業後的時間去上傳統書房，可見在官方統計與民間實情之間有相當的落差。當關西地區設置的學校漸多時，官方核可的書房就漸次減少。如在 1930 年時，關西在較平坦的地區已有關西、石光等 2 所公學校，及一所坪林分校，只有在山區的馬武督與赤柯山離公學校甚遠，該地一直要到 1935 年才有設有關西公學校的馬武督分校(見第三章第三節關西地區公學校的設置)。因此在昭和 7 年(1932)的新竹州官方統計資料中，關西庄只有 2 所書房，分別是位在馬武督(今錦山里)與赤柯山(今玉山里)的馬武督書房和赤柯山大正義塾。⁶⁷這兩所義塾的位置分別位於近山之處，屬原住民與客家人交界處。馬武督書房由陳昌田設立，有 2 位塾師，教授的科目較多，有：修身、國語(日語)、算術、漢文、體操、唱歌等；有男生 46 人，女生 12 人，而且分成 2 個學級上課，已畢業的學生有 56 人。⁶⁸赤柯山大正義塾規模較小，由羅碧泰所設，教師一位，教授科目只較前者少了唱歌一科，其他皆相同；有男生 38 人，女生 1 人，亦分成 2 個學級上課，已畢業的學生有 53 人。⁶⁹由其教學內容與編班情況可知，與一般公學校相近，只是規模較小。符合書房在日治中後期成為公學校教育補充的說法，多設置在公學校難以到達的偏遠之處。

二、「打夜學」⁷⁰

此種教育方式，一般沒有正式的學堂名稱，比正式的私塾學堂更簡易，利用學生白天農忙之餘或公學校放學後，到塾師家或是地方的公眾集會處，如廟宇等，於夜間進行漢學教讀，多教識字、寫信、簿記等應世知能，幫助受教者習得漢字或信牘。

1917 年畢業於咸菜碓公學校的校友彭騰英回憶到：關西的老廟被日人燒毀後，改建成太和宮，在太和宮內有「打夜學」(夜間上課)，由徐開祿先生教習漢文，學員多至 4、50 人。⁷¹徐開祿是晚清的秀才，也是關西陶社的重要社員，次

⁶⁵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7-88。

⁶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 卷 1 期，1988 年 5 月，頁 108。

⁶⁷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⁶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⁶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2。

⁷⁰ 到了戰後，利用學校對日本時代失學的人於夜間開設民眾國語文補習班，在客家區也沿用「打夜學」這樣的稱呼，參見賴韻如：《戰後桃園縣南勢國民小學校史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頁 85。

⁷¹ 彭騰英口述、彭新德撰稿：〈九七人瑞憶母校〉，頁 131，收錄於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

子徐秋旺常代父教漢學，也是陶社的社員之一，⁷²其漢文程度相當不錯。

同一個地點，同樣進行傳統的漢文教授，但前後期官方的態度是不同的。日治後期，日人對漢文的態度開始轉變。從 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日本人已在學校教育中廢除漢文一科。⁷³在關西市區，也出現取締書房的情形，如徐慶松所言：「日本人不肯人讀漢書呀！讀的時節有人來報，日本人要來了，警察要來了！斯要到後尾哩走(就要從後門走)，……就怕他來取締呀！」⁷⁴即使如此，畢業自關西公學校的徐慶松，利用晚飯後的空閒時間，約 7 點至 10 點左右，至公廟所在的地方，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⁷⁵當時的老師是任太和宮主持的「香公伯」黃榮海，他利用夜間教讀漢文，徐慶松即使只讀了 28 天，在點讀的傳統教學方式下，讀完《幼學瓊林》、《寫信必讀》等啟蒙書，⁷⁶奠定其傳統文言文的基礎；加上徐氏認真自學的精神，使其後來能書寫漢文，並進一步能進行漢詩的創作。⁷⁷完成公學校教育後，再進行簡單的漢文學習，是日治時代臺人普遍的事。

如南勢國小退休的曾香蘭主任提到：

日本那時候，我們家裡還可以的，都會把孩子送到書房讀漢文，因為生活中還是以漢字為主，會記帳，可以找到比較輕鬆的工作做，不然就要做苦工過活。當時唸是很簡單的三字經一類的，我們這裡是客家庄，所以是用客家話來讀的，像大園那一帶是講閩南話，就用閩南話來教。後來日本人設立了公學校，我們裡的人有些就會到中壢公學校就讀，之後中壢公學校設立南勢分校，平鎮終於有了第一所學校，我們就不必走這麼遠了。⁷⁸

由以上的例子可知，納入官方統計的書房，通常是較正式，較有規模者，像這種臨時去塾師處短期上課、或利用夜間上課的「打夜學」，所教的內容一般皆偏於應世智慧，以生活實用為目的者，包括傳統道德觀念、漢字讀寫、書信、記帳等，並未在官方的統計之中。但依實際訪談得到的例子，詳見下文塾師身份及書房教材舉例，這些未經官方核可，屬短期、課餘又非用公學校教材所設置的書房，其設置數量應多於官方同意所設的數量。

三、塾師身份

關於傳統書房塾師的身分，可分為傳統文人及受新式教育者兩大類，茲分述

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30-1。

⁷²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9，〈日據時代陶社詩人本名一覽表〉；依 2002 年 4 月 29 日徐慶松先生口述，徐開祿系其家族「房內」人，考中秀才，新竹官廳有送牌來。後來日本人來了，秀才牌即被沒收。

⁷³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該下一年級，黑書皮，漢文。安到漢文，1 年級有、2 年級有，到 3 年級第一學期還有，第二學期自由參加，後來因為霧社事件發生，就廢掉了。

⁷⁴ 徐慶松先生 2002 年 4 月 29 日口述。

⁷⁵ 徐慶松先生 2002 年 4 月 29 日口述。

⁷⁶ 徐慶松：《八十自述—徐慶松全集》，頁 27、28、31。

⁷⁷ 范振乾：〈狀元大伯—徐慶松先生〉，頁 4-5，收錄於徐慶松：《八十自述—徐慶松全集》，頁 2-7。徐慶松於 1946 年開始加入關西陶社，與詩友唱和，詩作多次入選各大比賽，並於 2000 年接任陶社社長至 2011 年止。

⁷⁸ 賴韻如：《戰後桃園縣南勢國民小學校史之研究》，頁 47。曾香蘭，生於 1943 年。

如後。在書房的師資方面，傳統教育出身者長期為書房師資的主要來源，在 1921 年以前高達 91.99%，其中又以童生等低階功名及無功名者占多數；到了 1922~1935 年，平均也有 54.82%，顯見書房師資一直是傳統勢力佔絕對優勢，以至學科、教材、教法等難以改變。⁷⁹全臺情況如此，在桃竹苗地區亦可發現：有愈來愈多接受新式教育者擔任塾師。尤其在明治 41 年 5 月 5 日桃園廳令第四號：「書房義塾教員檢定及免許規程」公布之後，更是如此。此令第四條規定任塾師者之檢定可分成無試驗檢定與試驗檢定二種；第五條說明塾師若以無試驗檢定任用，須符合：有臺灣公學校訓導資格者、公學校 6 年畢業兼有漢文素養者、經過本廳書房義塾教員講習 2 回以上者，或其他經廳長認可者等，但必要時仍應通過一科或數科的考核；第六條則詳列塾師應通過檢定的科目有修身、國語、漢文、算術與實地教授法等 5 科檢定。⁸⁰可見在官方有詳細具體的規定之後，即使是受過傳統教育的塾師，為了繼續任教也不得不通過官方的檢定。而在此廳令公布後，顯然受過新式教育者符合擔任塾師的資格。於是在傳統受教者漸漸凋零後，受新式教育者漸漸成為書房師資的重要來源。

若以關西、新埔地區主持書房者的背景資料來分析，也符合這個趨勢。首先，具初階功名或受書房教育者成為書房師資的主要來源，而且為了正式擔任塾師，有些也通過官方的講習或檢定；爾後，公學校畢業者愈來愈多成為書房中的師資，甚至也有畢業自師範學校者。

(一)傳統文人

傳統文人主持書房者，可分初階功名與無功名者，當然前者的號召力較強，也成為日治初期書房常見的師資來源，可是在鄉下地方有功名者太少，倒不如受過書房教育而設置書房者普遍。

1、具初階功名者

關西地區直到晚清才有較好的文教發展，首先是同治元年(1862)出了一位羅萬史舉人⁸¹，到了光緒年間才多了幾位考取臺南府學生員的秀才，分別為劉仁壽(字耀藜)、黃煥光、陳添祥(字兆麟)及徐開祿等。⁸²其中劉仁壽於入學後即設徒授業，可惜於光緒 20 年(1894)過逝，得年 47。⁸³黃煥光曾與劉仁壽及書生吳王華等慨捐銀元創「文昌祠」，恭奉文昌帝君、蒼頡至聖、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等，欲振地方文風，不幸於 39 歲英年早逝，幸而其家學、書法等，由獨子黃德洋繼承。⁸⁴

⁷⁹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 卷 3 期，1978 年，頁 80、87-88。

⁸⁰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7。

⁸¹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70。

⁸² 劉、黃、陳等人資料，見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225-228。這些先人的資料，劉仁壽生平由其孫劉達西校長提供，陳添祥由其孫陳榮鑑提供，黃煥光則由關西文史工作者羅慶武提供。所述當屬可信。徐開祿，則依 2002 年 4 月 29 日徐慶松口述，徐開祿係其家族「房內」人，考中秀才，新竹官廳有送牌來，後來日本人來了，秀才牌即被沒收。

⁸³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225。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光緒 24 年)(臺北：大通，1987 年)，頁 86，將劉耀藜列入〈選舉表〉，原因是其父原為九芎林(今芎林)人，其幼年時才與父移居成菜圃(今關西)。

⁸⁴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 227。今文昌祠已改建為關西鎮圖書館，但文昌祠仍設於圖書館的 2 樓，以嘗會組織的方式營運。每遇大考，多有學子到該處上香以求考試順利。

德洋於日治時曾開茶工廠，兼教漢書，是陶社重要成員之一。⁸⁵

最有影響力的則是陳添祥與徐開祿師徒，2人不但皆為秀才，且皆曾開設私塾，影響地方文教甚鉅。陳添祥祖籍廣東鎮平，考中生員後，新埔、中壢、咸菜礮地方設帳招請者不少。日治時於明治31年(1898)綬佩紳章。⁸⁶徐開祿除受教於陳添祥外，亦曾就學於在關西地區開設咸菜礮書房的藍炳然秀才，並曾赴大陸考試，可惜臺灣已為日本統治，往後即無緣科舉之路。⁸⁷依其同宗晚輩徐慶松的說法，徐開祿的秀才牌發下來到新竹時，已是日本統治，故被沒收了。⁸⁸可惜無其他佐證，但不論真實情況如何，由於兵馬倥傯已難查考。例如大正5年編成的《臺灣列紳傳》只提及其「幼少讀書，頗通理義。」⁸⁹大正10年(1921)編成的《人文薈萃》，其生平描述相當詳盡，言其「臺北縣試取錄第三名」。⁹⁰由以上舉例，可以證明徐開祿的漢學程度不錯，也曾參加初步的童試，取得最低階生員身份。後曾於明治33年(1900)獲推薦為街庄長，後移於保正。⁹¹其應於明治36年(1903)10月27日之前，曾短期任職於咸菜礮公學校為雇員。⁹²徐開祿有秀才資格，又曾於赤柯山設置書房，其得意門生有羅享錦、陳旺回、吳錦來等。⁹³徐開祿在1916年前後也曾在關西太和宮教授夜間上課的漢書。⁹⁴可見徐開祿以擁有晚清功名之故，除了縉升地方統治基層，也繼續於地方傳承書房教育。

陳添祥的學生中，最有名的除了考上秀才的徐開祿外，⁹⁵還有1903年至1916年於咸菜礮公學校，以「雇員」資格任教漢文的王思溫。⁹⁶可見早期書房教育出身者，除了繼續傳承書房教育，也可能受延攬成為早期公學校負責教授漢文者。這樣的情況，在第三章學校教育中出現的北埔、新埔、關西公學校的早期師資結構中，皆有例可循，可見並非特例。到了稍晚成立的石光公學校，其雇員資格的聘用則以畢業自公學校者優先(詳見第三章)，也顯現新舊教育的師資變化與替代。

以上這些塾師能在日治時期繼續任教書房，或是到公學校擔任雇員，可能跟他們能配合官方的講習要求有關。例如：黃德洋、徐開祿與王思溫等，皆曾參加書房教師的講習或檢定。桃園廳於明治36年(1903)7月28日開始，舉辦為期4

⁸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569，〈日據時代陶社詩人本名一覽表〉。

⁸⁶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20。

⁸⁷ 羅慶武：〈關西鎮之開拓及歷代首長傳略〉，頁267，收錄於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265-270。

⁸⁸ 徐慶松2002年4月29日口述。

⁸⁹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15。

⁹⁰ 連雅堂序：《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1921年)，頁135。

⁹¹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頁115。

⁹² 不著撰者：《桃仔園廳報》，第51號，1904年11月9日，頁136。錄有「同10月27日免除雇員 咸菜礮公學校雇 徐開祿」，依《桃仔園廳報》，第24號，1903年8月29日，頁181，徐開祿於前一年講習時，得到良好的表現，因此得以受聘擔任咸菜礮公學校雇員，可惜正確受雇日期未見。

⁹³ 羅慶武：〈關西鎮之開拓及歷代首長傳略〉，頁267。羅享錦為咸菜礮公學校第4屆畢業生，於1924年即擔任關西庄長，為本地人出任庄長第一人，之前為日人小林三次郎。

⁹⁴ 彭騰英口述、彭新德撰稿：〈九七人瑞憶母校〉，頁131。

⁹⁵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226。

⁹⁶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頁226；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12。

週的夏期講習會，參加的對象為桃園廳的公學校教員及書房教師，講習的科目有：修身、國語、教授管理法及算術等 4 科，志願者參加者共有 80 多名。⁹⁷最後通過研習，受發證書者共有 56 名，其中 44 名為書房教師，徐開祿得到 93 分以上的優等成績，在通過講習的書房教師中，名列第一。⁹⁸同時承續黃煥光秀才任塾師的獨子黃德洋，與陳添洋的另一名學生王思溫，也參加了這次的講習，並通過考核，授與證書。⁹⁹到了明治 41 年(1908)，黃德洋又參加了書房義塾教員檢定，得到修身與漢文 2 個科目的檢定通過。¹⁰⁰以上這些任職塾師者，皆是具初階功名者或是他們的子弟，可能因為名聲在外、或實力較佳，故能參加官方舉辦的講習或檢定，以得到任教的資格。而且這樣只通過其中幾科的檢定，並非永久有效，以這次為例，有效期限，只從明治 41 年(1908)10 月 1 日開始，至 44 年(1911)9 月 31 日，3 年內暫時有效。¹⁰¹等 3 年過後，必得參加另外一次的檢定，方有效力。¹⁰²但是廳報中呈現的資料詳簡不一，也多有缺漏，難以一一辨明。

2、受書房教育者

前述為關西地區市街上具有清代低階功名者，或其子弟開設書房的概略情形，一般也有受過書房教育多年者，即有資格開設書房教授生徒。例如在訪談中，范士敬即提到他祖父范炳芳，雖然沒有科舉功名，但是因為讀過幾年漢書，本身也是教漢書的，曾在關西街上的「暗潭」祠堂開設書房。長范士敬 10 多歲的三個兄長，都曾跟去祠堂煮飯給當塾師的祖父吃。因為當時書房的收入相當微薄，塾師的三餐都得自行打理。曾任塾師的祖父，在范士敬公學校畢業後，還曾寫字給他念。當時可能已不當塾師，因此范士敬在昭和 11 年(1936)公學校畢業後，必須另外步行到「下坪仔」吳耀仙開設的書房就讀了半年。依范士敬的講法，他由於日語學了 6 年，對於漢字則是所知有限，除了要念還要背，對他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¹⁰³

另外，邱金球校長的父親邱有火，去新埔跟著藍秀才¹⁰⁴讀了 6 年，剛好科舉

⁹⁷ 不著撰者：《桃仔園廳報》，第 20 號，1903 年 7 月 28 日，頁 145。

⁹⁸ 不著撰者：《桃仔園廳報》，第 24 號，1903 年 8 月 29 日，頁 181。另外，次於徐開祿，也得到優等成績，列為第二名的塾師是邱世濬，即後來開創陶社任社長者，詳見第三節詩社發展。最後，石光地區的塾師林澄茂，也參加了此次講習，並得到授證，參見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4。

⁹⁹ 不著撰者：《桃仔園廳報》，第 24 號，1903 年 8 月 29 日，頁 181。

¹⁰⁰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88 號，1908 年 10 月 5 日，頁 178。同前報，頁 177，同一次檢定通過者尚有邱世濬、林澄茂，也是通過修身與漢文檢定；而畢業自咸菜圃公學校，又曾受教於徐開祿的羅享錦，則通過修身、國語與算術三科的塾師檢定。

¹⁰¹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88 號，1908 年 10 月 5 日，頁 177。所以此次提及的邱世濬、林澄茂，又於明治 44 年參加了另一次的書房教師檢定，一樣只通過修身、漢文兩科的 3 年暫時有效許可，參見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95 號，1911 年 10 月 5 日，頁 116-117。

¹⁰²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95 號，1911 年 10 月 5 日，頁 116-117，前次提及的邱世濬、林澄茂，又於明治 44 年參加了另一次的書房教師檢定，一樣只通過修身、漢文兩科，得到未來 3 年，暫時有效的許可。

¹⁰³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范氏為筆者小學老師。

¹⁰⁴ 晚清日治初期在關西、新埔地區分別有 2 位藍秀才，依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20，從大陸來臺灣在咸菜圃地區設教的是藍炳然，但於明治 39 年秋 9 月即西渡不歸，回大陸發展；新埔地區的藍秀才，依《臺灣列紳傳》，頁 141，則是指祖籍廣東省潮州的藍華峰，為光緒年間

廢止，無法應考，但程度已可擔任助教。¹⁰⁵另外，邱校長與范朝燈熟識，亦曾提到在坪林的老家，之前也曾設立書房，由姓曾的老師主持，且曾教過范朝燈。¹⁰⁶但依今人曾繁蓉的傳記資料，則言其受教於尊長范兆春，於私塾讀了3年，熟背《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¹⁰⁷因書房是私人所設，通常只由一名塾師主持，常因學生來源、塾師個人因素等興廢不時，故更換老師或變更就學之處十分常見。

另徐金統曾利用寒暑假到書房「讀漢書」，即曾更換過3個地方與3位老師。徐金統是1942年坪林國民學校獨立後第一屆的畢業生，在國校一、二年級時的暑假，「為了念自己的書」，曾和堂哥徐榮坤及幾個較年長的鄰居，走5、6公里的路，到芎林的「中坑」上書房，曾念過《百家姓》、《千字文》、《增廣》、《雜讀》和《五言雜字》等童蒙書。後來又到位於下橫坑住家臨近的劉家，到一位學問、漢學很好的劉老先生處「讀漢書」；後來又曾到一位姓黃的塾師，在下橫坑彭姓「阿芎伯」家開設的書房處「讀漢書」。徐金統這樣利用一到三年級的寒暑假，輾轉就讀各地念漢書的情形，並非特例。可是到了四年級時就沒空再念了，因為為了要準備升學考試，班上有13位要升學同學，每天放學都要留下來補2小時小學校的書，寒暑假也是，由當時的導師范鼎香與呂杰全老師義務教授。¹⁰⁸可見徐金統接受的書房教育是非正式，只利用學校課餘的時間就讀。

同時，在訪談91歲的劉范鑄妹時，也提到下橫坑劉滿元家族有人教授漢書，因為她的先生劉建光雖讀過公學校，也曾在劉姓塾師處讀漢書。¹⁰⁹依位置推斷，他們提到的下橫坑劉姓塾師應為同一人，可惜皆忘了該塾師的名字。而日治時代在下橫坑任職保正的劉滿元，本身即通漢學，曾念過《三字經》、《幼學》、《增廣》等童蒙書。¹¹⁰所以家族中若有人設教，自屬可能。

以上是受過書房教育者的口述，可見書房興廢不時，又屬私人設立或主持的書房，即使官方常有調查統計，但在數量的計算上，統計資料只能針對符合官方要求，並申報「立案者」，但影響民間漢學傳承的非正式書房，數量也不少。而這些受教者，屬於日治晚期，由於1920年後地方改制，官方的報刊合一為《新竹州報》，卻不見書房設置或塾師的記載，學事事項也較少發布。無法得知這些塾師是否經過官方認證或檢定。但就昭和6年(1931)時，新竹州官方統計的書房

生員，後為新埔漢醫。藍華峰並曾擔任大新吟社社長(詳見第三節詩社發展)，其子藍森輝亦曾就讀於石光公學校。

¹⁰⁵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¹⁰⁶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稱曾姓老師為范朝燈的啟蒙老師。

¹⁰⁷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 34。

¹⁰⁸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他至今仍能用客語背出《百家姓》的內容。徐氏為筆者小學老師。

¹⁰⁹ 劉范鑄妹 2012 年 5 月 11 日口述。劉滿元是劉建光同為壽廣興宗親，同住在下橫坑，今關西鎮新力里。由於鄉下地方，居民變動不大，至今下橫坑的劉姓家族除多人遷出外，居住位置仍可清楚指出。

¹¹⁰ 樹勳、利生口述，廣義、利能撰寫：〈劉滿元先生軼事——一〇二歲人瑞——我的祖父〉，頁 135，收錄於劉立敏計畫主持：《關西坪林地區百年發展與文化記憶名錄》，頁 135-137。

數只剩 38 間。¹¹¹與筆者的訪談結果相比而言，依訪問情況或其他後人的回顧推論，影響百姓生活，且實際設置的書房，在設立上應該較官方統計數字多得多。原因即在於這些並非在上學時間開設的書房，時間較短、學生來源彈性、加上其教授的內容，既然無法被主管當局核可，自然也無法列入官方的統計。加上這些書房的開設者，通常也較不知名，於是造成統計上的困難。但是這樣傳統式的書房，既不教授新式教育的內容，教學方式也依古而行，反而成為沿續與保存漢文的重要場域。並且，這種書房在光復後，仍存在了一段時間。¹¹²

(二)受新式教育者

當學校教育早期仍有漢文科時，這些接受公學校教育者的漢文程度亦頗佳，除了足以參加詩社，若有家學淵源者，更可能在受過公學校教育後，回頭主持書房。另外，在師資培育過剩時，師範畢業者，也可能成為書房師資的來源。¹¹³本文所舉的例子無法確定其是否為被裁者，但塾師是師範畢業者，則確實可證。

依照今人吳文星的研究發現，雖然受過書房教育者之比率逐年下降，迄至 1907 年乃占半數以上，同時接受書房教育者大多在 3 年以上，在 1905 年以前，有半數甚至超過 6 年。¹¹⁴並且早期的師範生中不少人已具有相當的漢學基礎，於師範畢業後常取代舊士紳擔任公學校的漢文課程。¹¹⁵這些漢學基礎不錯的師範生擔任公學校教師後，不但在校能教授漢文課程，也常參與當地的詩社活動，例如：畢業自新埔公學校的吳建田，任教苗栗四湖公學校時，即曾參加苗栗社；後轉至關西公學校任教時，則曾參與新埔的大新吟社(詳見第五章詩社發展)。至於石光公學校畢業的呂阿全，師範畢業後回石光公學校任教，即常參與關西陶社的聯吟活動。(詳情見第三章學校教育)可見這些日治前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們，其漢文程度是相當好的。而且還有許多例子可顯示，接受公學校教育與接受漢學教育之間是不衝突的。

1、公學校畢業者

由於桃園廳特別重視書房教師的培訓，曾於明治 39 年(1906)即針對公學校與書房教師舉辦「地方學事講習會」，通過講習成績合格者並授與證書，其中接受講習後授證的書房教師中，即有咸菜礮公學校第一屆(1905)畢業的陳昌田與范慶柱，及第二屆(1906)畢業的范朝棟。¹¹⁶如前文所述陳昌田後來曾在關西山區開設馬武督書房，范朝棟的生平則見第三章後來由擔任公學校雇員，最後轉為訓導范

¹¹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¹¹² 筆者的父親今年 75 歲，在坪林國民學校畢業後，也曾念過這種短期走讀，學習童蒙教材的方式。另外，2012 年 5 月 2 日劉建榜口述，及 2012 年 5 月 11 日劉范鑄妹口述，都曾提到同一位塾師：范錫棋，但在不同的地方授課，前者說他在坪林設教；後者說他在石光國小旁設教。可見即使是同一位塾師，也可能到不同地方教授。

¹¹³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81。

¹¹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97。

¹¹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 97。

¹¹⁶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11 號，1906 年 8 月 15 日，頁 108；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1。

朝棟的生平則見第三章後來由擔任公學校雇員，最後轉為訓導，而成為學校的職員。

苗栗頭分由 1893 年科場不順的陳展鴻，正式設立向陽書院。¹¹⁷2 年後，臺灣為日本人統治，時年 9 歲的長子德秀並沒有馬上接受日式學校教育，而是在向陽書院隨其父修習漢文至 16 歲，直到 21 歲時，才就讀頭份公學校，成為該校第 6 屆的畢業生。24 歲畢業時，由於漢文頗佳，乃留任學校任雇員，教授漢文，2 年後，回任向陽書塾師及堪輿業。¹¹⁸雖然陳德秀是因家學淵源，才接受書房與公學校兩種教育，但是殖民政府在改善書房教育時，應該更歡迎這種接受過公學校教育的塾師。

另外，新竹關西地區邱運金為咸菜礮公學校第 6 屆(1910 年)畢業生，同年(1910)5 月 7 日即得到書房教師的資格證明，¹¹⁹並於大正 3 年(1914)4 月 10 日至大正 6 年(1917)3 月 31 日間，以「雇員」的資格任教於咸菜礮公學校石崗仔分校。¹²⁰離開學校後，仍在街上開設書房，楊澄清¹²¹的母親即曾於日治時期受教於邱運金。至於很多「立案的」書房，後來的教學內容皆不限於漢文而已，已有許多與學校教育相同的科目出現，尤其是前文中官方登記有案的書房更是如此。若該塾師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將如何勝任書房中新式科目的教學？因此塾師開始由受過學校教育資格者擔任，應是趨勢。

而且受過新式教育者，除了漢文科外，要通過書房教師其他各科的檢定也較為容易，例如明治 41 年(1908)10 月 5 日《桃園廳報》公告中，通過修身、國語、算術等 3 科檢定的前 2 名，即是同年(1908)畢業於咸菜礮公學校第 4 屆的羅慶喜與羅享錦。¹²²依此類推，加上明治 41 年(1908)桃園廳對塾師資格的審核及 5 種考科可知，具公學校訓導資格者，轉任塾師不但是無試驗檢定中的第一順位，而擅長塾師所需檢定的修身、國語、漢文、算術與實地教授法等 5 種考科，本就是公學校教師應具備的能力。¹²³故若因故不能任教於公學校或於公學校退休者，轉任書房教師即是可能的選項之一。

2、具師範學校資格者

有些公學校的老師於離開教職後，轉而成為書房的師資來源。例如范士敬在公學校畢業後，未繼續升學，在家人要求下，讀了半年書房，當時主持的塾師，

¹¹⁷ 陳運棟：《穎川陳氏大族譜》，頁 113，展源所撰〈向陽序〉。

¹¹⁸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237，附錄五 陳運棟先生家族族譜節要。

¹¹⁹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55 號，1910 年 8 月 25 日，頁 118；及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85 號，1912 年 6 月 26 日，頁 85。

¹²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職員名簿〉。

¹²¹ 日治後期即任教錦山國民學校，呂杰全、楊習日校長都曾督促其書法，呂杰全並贈其《岳三小集》一冊。並曾在坪林、石光、關西等校任教，以國小主任退休。

¹²²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88 號，1908 年 10 月 5 日，頁 177；

¹²³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173 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87。

即是具師範資格的公學校退休老師。¹²⁴



圖 5-2-1：范士敬石光公學校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范士敬提供

范士敬昭和 10 年(1935)畢業於石光公學校。¹²⁵昭和 4 年(1929)同族叔叔范鼎香，在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校任教，為了怕廢校積極招生，在此情況下范士敬即提早就讀，是當時班上年紀較小的。因為早讀之故，成績並不好，家境又不佳，所以畢業後並未升學。¹²⁶祖父范炳芳是傳統書房出身，讀了多年漢書，亦曾在關西暗潭主持書房，曾為傳統漢學塾師。因此他畢業後，除了在家務農耕田採茶外，並曾於昭和 11 年(1936)，至經官廳合法設於「下坪仔」的書房讀漢書。¹²⁷因為當地較偏僻，附近沒有公學校，無論是至新埔讀書或坪林就學都相當遠，學生就學相當不便，所以官廳特准設置書房。¹²⁸這樣的書房設置，屬於公學校的補充性質。此時授課的師資已產生改變，由受過傳統教育的塾師，變成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後退休的公學校教師，當時的塾師吳耀仙還是國語學校畢業的¹²⁹，有文官帽的照片為證。¹³⁰范士敬提到，到了後來位在「下坪仔」的書房也被廢止，改在當地設立「內壠國校」，至於傳統的童蒙書是沒有受到禁止的，「也不是怎樣禁啦！沒人讀啦！沒人讀就沒人買呀！」¹³¹可見到了日治後期，由於國民學校教育的日漸普及，傳統書房的教育功能漸漸被新式學校教育所取代。連書房的師資，都由受過日式教育的師範畢業生所取代。

畢業自石光公學校第八屆的陳能雲自述，幼年喪父，8 歲起於青雲書房念過 4 年中文，後因日人禁書房改上石光讀日文。¹³²之所以念書房後轉學校教育的例

¹²⁴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²⁵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91。范士敬為石光公學校第 17 屆畢業生，畢業於 1935 年 3 月，當年男 64 人，女 18 人，共計 82 人。

¹²⁶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²⁷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²⁸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後來在當地設立了內壠國校，就廢止該書房。

¹²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頁 23，1920 年臺北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生，有一人名為「吳耀先」，一字之差，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¹³⁰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還厝讀的時節該吳耀仙啊，就是頭擺日本時代的國語學校畢業，教國民學校教公學校教，退休下來……厝看他的相呀也是文官帽戴著……。

¹³¹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³² 陳能雲：〈半世紀的生活回憶〉，頁 12，收錄於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

子，是相當常見的例子，尤其當地本無學校，一旦學校設置後，很多書房的學生即被強迫進入學校就讀。例如第三章提到的苗栗國語傳習所、北埔公學校設立之時所以日治時代的漢人，早期進入學校是被政府強迫的，進入書房反而是因應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自願的情況較多。下文將舉石崗仔公學校初設時與其學區內的書房消長為例。

四、公學校的設立與書房的消長--以石崗仔公學校為例

另外，正規學校的設立與書房的消長，也呈現實際的拉距情形。新式的學校教育，由於有殖民政府為後盾，最終成為最大的贏家，而書房則只能在光復後全臺學國語熱潮中，迴光返照而已。以下將舉石光國小保存的《學校沿革誌》中提到的相關紀載，來見證書房曾在石光地區設立與發展。

在大正2年(1913)4月1日石崗仔分校剛成立時，由咸菜礮公學校教諭轉任分校主任的濱田清次郎，即將學校附近的書房生徒轉入學校就讀，一開始即招來了男生39名。¹³³這樣的情況，顯然未讓分校主任滿意。雖然8日後，分校主任即調動，由杉亨接任。¹³⁴繼任的分校主任杉亨教諭，又陸續向學區內的書房招攬學生，並在短短10天之內，即遍訪學區內一半以上的地方。4月21日分校主任杉亨教諭與學校當時唯一一名雇員陳俊湘¹³⁵，兩人一同至老煥寮的知新書房¹³⁶和東竹書房視察，但只招到了4名學生，此時學校學生增至43名。¹³⁷22日，兩人改至坪林的登雲書房，及石崗仔的青雲書房視察。¹³⁸未見招入學生的記載，可見應是招生不利。於是次日，杉亨教諭又在陳俊榜(雇員陳俊湘二哥)的陪同下，至下橫坑書房視察，未招到學生。¹³⁹休停一日後，25日，兩人除了至大旱坑的東溪書房視察外，又集合各書房教師以募集學生。¹⁴⁰終於稍微有了一些成果，至26日，又招得7名新生，使學校學生數達到50名。¹⁴¹但顯然招生情況未達滿意，因此到了4月29日，杉亨主任更在「警察大人」鈴木巡查的陪伴下，到大旱坑的東溪書房下達關閉的命令。¹⁴²於是5月1日時，又另外招得9名男生1名女生，此時全校共計60名學生。¹⁴³若不是招生數已足，就是學校因為教室有限，無法容納更多學生，所以暫停至書房招生。在往後的校史記錄中，一直要到同年年底，12

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頁12-13。

¹³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3。大正二年度開始的重大行事，記錄者有加以編碼，但並不等於此書的頁數。原書有加編碼者，依原書。以下皆同。

¹³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4。

¹³⁵ 石崗仔區茅仔埔人，當時其父陳遠芳任石崗仔區區長，積極推動石崗仔分校的設立及往後的獨立。

¹³⁶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285號，1911年6月26日，頁85。在學事事項一欄，見到知新書房的開設認可公告，書房義塾名稱為：知新書房，認可時間：明治44年(1911)6月15日，開設位置：竹北二堡老煥寮庄二百八十五番地，塾主：竹北二堡老煥寮庄二百六十三番地 韓新良。

¹³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4。

¹³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4。

¹³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5。

¹⁴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5。

¹⁴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5。

¹⁴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5。

¹⁴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5。

月 10 日，才又見到杉亨主任到南坑書房視察的記載，但未招進新生。¹⁴⁴以分校只有一名主任和雇員而言，60 位學生應該相當多了，因此接下來才未見招入新生的記錄。而且由以上資料可知，分校雖已成立，但是書房並未立即被取代。不但如此，在次年的校史大事記上，更發現石崗仔分校學區內書房的學生數，遠多於分校的學生。

大正 3 年(1914)杉亨因病請辭，由中尾治繼任。¹⁴⁵中尾教諭是歷任主任中最積極建設與辦學者，不但會說客家話，也能和學生、村民親近。¹⁴⁶中尾教諭和繼任的雇員范朝棟也積極鼓勵學生來校。¹⁴⁷但到了大正三年度 5 月 24 日的重大行事紀錄中，在學校舉行的「大葬儀遙拜式」，除了學務委員及地方有力人士參與外，竟有漢和書房塾師宋進帶領 45 名兒童、青雲書房塾師林金土帶領 19 名兒童、知新書房塾師鐘敬恭帶領 20 名兒童及東漢書房塾師鐘壺東帶領 35 名兒童等來參加。¹⁴⁸將當時到校參拜的生徒統計為 119 人，遠較石崗仔分校的 60 人為多，而此時已是教育政策第一階段的末期，可是石光地區的學生仍以書房為多，以此證明：傳統教育在日治前半期仍然盛行，而且鄉下地區學校教育的推廣遠較都市遲緩，真正的發展要在日治中期之後。

因此大正 3 年(1914)6 月 17 日分校主任中尾治，仍不得不到學區內的坪林書房視察；¹⁴⁹此外，並積極建設分校，甚至到坪林派出所與日高巡查協議，請警察督勵兒童出席。¹⁵⁰於是到了大正 4 年(1915)1 月 23 日為了督促學生能正常上學，更召集各學務委員及地方保正等到校開會，討論：如何減少學生中途退學、缺席；調查兒童家長的性格、資產、向學心；並使各保正、家長負起各保兒童的入退學及賞罰等議題。¹⁵¹參與的人員中，也出現三名書房代表，分別是林澄茂、鐘喜來、朱清火等。¹⁵²同年 3 月 30 日新生及在校學生訓話時的 4 個主題中，第 4 個主題即是「書房教育與學校教育」。¹⁵³由此可見，即使到了教育政策的第一階段末期，較鄉下的石光地區的書房生徒仍較學校的學生為多。而且剛開始的學校教育成效是相當有限的，新生招入至畢業學生流失甚多。到了大正 8 年(1919)，石崗仔公學校正式獨立有自己的畢業生時，原入學時招得的 60 人，包括 2 名女生，到畢業

¹⁴⁴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

¹⁴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

¹⁴⁶ 呂阿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收錄於校慶籌委員會：《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頁 4-5。中尾校長，善講客話，善於交際，每逢新年或節日，舉行儀後，保正地方紳士學務委員聚於一堂，宴飲談笑風生，發動民眾開拓校地運動場，不知幾次在數百人工作中，校長往來其間，對民眾慰問感謝，有說有笑……校長又是幽默大王……有溫同學，說其家有「含笑花」一株，要拿來花壇種，終而未曾拿來，成為謊話，校長在做花壇或上課中，看同學精神之低潮時，無意對溫同學說：「喂！你之『尸么 丁一么花』何時拿來？」使全體捧腹大笑。

¹⁴⁷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7。

¹⁴⁸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9-10。

¹⁴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0。

¹⁵⁰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3。

¹⁵¹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3-14。

¹⁵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4。

¹⁵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頁 15-16。前 3 個主題依次為：學校的目的、教育方針、內地的就學狀況等。

時，竟只剩 26 名男生。¹⁵⁴由此顯示，書房在鄉下地區的重要性與優勢，一直維持到日治中期。

而這些書房與塾師在最初設置時，顯然得到官方的認可，例如：坪林的登雲書、大旱坑的東溪書房，¹⁵⁵及老煥寮的知新書房，¹⁵⁶都在明治末年即得到開設許可。而其中的塾師鐘敬恭、林金土及林澄茂，都曾得到官方書房教員免許狀的授與。¹⁵⁷雖未見到其他書房開設或塾師資格得到官方的認可，但規模不小，應該跟當時石崗仔地區當時尚未設立學校有關，等到公學校已設，官方即有關閉書房的理由，而學生也有另外的學習選擇，書房就漸漸被學校教育所取代。

五、書房中的女學生

在清朝時期詩社出現女性已不是稀奇的事，到了日治時期女性就讀書房更是常見，而且在新竹州地區也並不罕見。以新竹州而言，大正 9 年(1920)書房共有 1220 人，其中女生 55 人；次年(1921)時，書房的學生共有 909 人，其中女生 38 人；11 年(1922)時，書房共有學生 511 人，其中 26 人為女生；到了大正 12 年(1923)時，書房學生增為 1498 人，其中女生 118 人。¹⁵⁸昭和 6 年(1931)底，當時全州 38 所書房中，有 29 所有女生，書房學生共有 1679 人，其中女生有 165 人。¹⁵⁹到了昭和 11 年(1936)底，書房學生只剩 356 人，其中女生仍有 46 人。¹⁶⁰雖然每年的書房學生互有高低，但就書房女生的數量而言，也類似於全臺的變化趨勢，女生就讀書房的可能性較之前增加。而且這些女生以客家人為多，因為以上這些統計資料中，閩人集中的桃園郡皆未曾設立書房。

約與官方統計同時的苗栗，即有吳紹箕在昭和年間，為苗栗英才書院教席，除教授漢文及絃索樂理外，並開辦處女會學園，招收女弟子，開女子教育的先河。¹⁶¹其子吳頌賢繼任英才書院教席，也繼續教導漢學班與女學員班。¹⁶²照理設在英才書院中，也算公開的場合，授課的教師也是傳統的儒生，但因其以處女會為名目，即有可能被列入社會教育組織中，而非列入書房。故在官方的統計中，並未見到此書房的記載。但就其授課師資與內容，實與傳統的書房無異。

¹⁵⁴ 呂杰全：〈六十週年校慶敬慕首任校長〉，頁 5；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第一屆畢業生名冊，男 26 人、女 0 人。今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無頁碼，石光公學校累年兒童之狀況一表。

¹⁵⁵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03 號，1909 年 3 月 5 日，頁 28-29。

¹⁵⁶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85 號，1911 年 6 月 26 日，頁 85。

¹⁵⁷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85 號，1911 年 6 月 26 日，頁 85；不著撰者：《桃園廳報》，第 295 號，1911 年 10 月 5 日，頁 116、117。

¹⁵⁸ 新竹州：《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大正 10 年)》(新竹州，1923 年)，頁 74；新竹州：《新竹州第三統計書(大正 12 年)》(新竹州，1925 年)，頁 89。

¹⁵⁹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4。

¹⁶⁰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 11 年)》(新竹州教育課，1938 年)，頁 65。

¹⁶¹ 吳保榮：〈革命志士吳頌賢其人其事〉，頁 15，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苗栗文化局，2001 年)，頁 11-25。本篇文章作者吳保榮為吳頌賢的孫女，其次子吳文虎的女兒，與姊姊洋明、妹妹菊美分頭採訪、搜尋資料所完成的一篇報導文學課程習作。

¹⁶² 吳保榮：〈革命志士吳頌賢其人其事〉，頁 16，有昭和 2 年「漢學園」結業和昭和 5 年「處女會」漢文班的結業照片，頁 17，則有吳頌賢與女學生的合影。



圖 5-2-2：吳頌賢塾師與女學員

資料來源：陳運棟（2001），《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11-25。

苗栗頭分的陳家開設的「向陽書院」，至日治時期由陳德秀主持，至今其後人保存的書院帳簿中，亦明列有向女性學生收費的紀錄。¹⁶³可推知當時應有女學生就讀。

畢業於石光公學校第 15 屆(1933)的陳送妹¹⁶⁴，家住關西庄上橫坑，父親陳傑昌在 1937 至 1945 年間擔任上橫坑保的保正、逢茂農園園主，逢茂農園在日治時期以經營柑橘，成為新竹州相當有名的示範農園。¹⁶⁵除了經營臺灣島內農林種苗、農具、農藥等業務生意，後來甚至成為跨日本、香港、大陸、越南、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地業務的跨國性企業。¹⁶⁶所以陳家的家境相當不錯，其兄長皆能留日，而陳送妹在讀公學校時，也曾短暫就讀書房。她曾利用下課後的時間，至學校旁「阿飄伯」的人家「讀漢書」，讀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念的是《三字經》。¹⁶⁷她後來考上基隆高等女學校，繼續升學。¹⁶⁸由此例可知，即使是女生接受了新式學校教育，且要繼續升學，但與「讀漢書」並不衝突，似乎接受這兩種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事。

前文曾提及新埔有詹金英繼承父親依鉢主持書房，其實她畢業於新埔公學校第 14 屆，與有名的詩人吳濁流(原名吳建田)是同學。¹⁶⁹她不但具有公學校的文憑，也有深厚的漢學基礎，曾參與新埔大新吟社的活動，有詩作留存，關西的陶社詩集中也可以見到她的作品。她繼承父志主持房後，是極少數的女塾師，因此也有畢業自石光公學校第 18 屆(1936)的鄧平妹前往就讀，鄧平妹說，地方上大家都知道附近有這所書房，¹⁷⁰可是在官方的統計中也未納入。

與此同時，昭和 11 年(1936)就讀「下坪仔」書房的范士敬，回憶到：當時書房約有 2、30 人左右，其中有近 6 位是女性，而且「髮辮長長、胸部鼓鼓」，可見也有成年較長的女性，因為年紀太大了，不適合進公學校就讀，就來這個書房

¹⁶³ 陳運棟 2002 年 9 月 28 日提供參閱的資料。

¹⁶⁴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第十五屆畢業名冊。

¹⁶⁵ 不著撰者：〈致力於繁榮鄉里的聖人伯〉，頁 127-129，收錄於劉立敏計畫主持：《關西坪林地區百年發展與文化記憶名錄》，頁 126-130。

¹⁶⁶ 不著撰者：〈致力於繁榮鄉里的聖人伯〉，頁 127-128；陳能雲，〈半世紀的生活回憶〉，頁 12。

¹⁶⁷ 陳送妹 2012 年月 8 日電話訪問。至今她仍能用客語背誦部分內容。

¹⁶⁸ 陳送妹 2012 年月 8 日電話訪問。

¹⁶⁹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6。

¹⁷⁰ 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

多少讀一點。¹⁷¹由以上發生相近的 2 個例子可知，無論是未進公學校的女性或畢業自公學校的女性，都可能進入書房就讀。

整體而言，日治早期女性就讀書房的人數遠少於男性，到日治後期就愈來愈常見，而且由於書房的上課時間、內容等較為彈性，社會對女性又無特別的生涯期許，若能進書房多少學一點應世智能，以應付生活所需，就變成可能的選項。但是一般而言，仍以家境許可的女性較有可能。像前文述及陳送妹與鄧平妹的家境都相當富裕，陳送妹自不必說。至於鄧平妹依其所言，當時能收租 1、2 百租之家日子即相當好過，而他們家則是收 300 租的地主，¹⁷²其家境之富裕可見一斑。但是當鄧平妹在書房讀了 7 日，覺得字太深，即退出，¹⁷³家人也尊重她的選擇。可見在這個時期，社會上對女性受教這件事雖不反對，也並不支持，進書房只是強調其識字後的「實用」目的而已。

貳、書房教學

傳統的書房教育的內容，可以分成啟蒙程度或是經學程度，臺灣的文教到晚清已有相當的進步，產生相當多的進士舉人，客家籍的進士也有 5 人，舉人更有 53 人之多。¹⁷⁴到了日治時期，臺灣雖然已經沒有科考之路，但是傳統教學的書房教育卻持續進行，雖然在啟蒙教育上由主流地位，漸漸變成正規學校教育的補充；教學內容從傳統的童蒙書，漸漸增加了日語、算術等內容；師資也由少數具有低階功名的塾師，如秀才者擔任，更多師資可能只是具有多人漢學基礎者擔任，甚至慢慢轉變成受過公學校教育，或由公學校退休的老師來擔任教學。

但整個日治時期，傳統書房教育中教漢書的方法，始終不變。但教育的內容大多偏重在識字和讀蒙書，至於應科考所需的四書、五經、吟詩作對等內容，則較不常見。以下分成日治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來說明。

一、日治前期

首先，以光緒年間苗栗陳家開設的向陽書院為例。¹⁷⁵它到了日治時期，由第三代塾師陳德秀主持，留有五本束脩帳，可詳知該年書院的學生數及束脩收入。¹⁷⁶這五本束脩帳記載的特點如下：一、上學日：每年 2 月開學，12 月解館。開學及解館日每年不同，但都是在農曆的 2 月及 12 月。二、學期中 3、4、5 月中定一日議關，所謂議關即是由地方公正人士出面邀讀學生家長，到書院商談敲定學生各應繳多少束脩金、膳米，依每位學生家境而異。當天，並由與會家長共同宴請公正人士及塾師。三、教師束脩以現金及膳米為主，偶有家長敬獻茶葉、酒

¹⁷¹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⁷² 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

¹⁷³ 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

¹⁷⁴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1684-1895)》，頁 190。吳文星相關研究指出，尚可增加 2 名客籍舉人。

¹⁷⁵ 陳運棟：《穎川陳氏大族譜》，頁 113，陳展鴻所撰〈向陽序〉。

¹⁷⁶ 陳運棟 2002 年 9 月 28 日口述及借閱；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1684-1895)》，頁 233-237，附錄五陳運棟家族族譜節要。

等物品。塾師收入因學生數多寡而不同，收入多時可達 479 日圓，米 37 斗；少的時候只有 263 日圓，米 32 斗。四、學生數：多時如大正 9 年(1920)，有 89 名之多，次年就卻變成最少，只有 39 名學生。但整體而言，都有數十名之多，是規模頗大的私塾。¹⁷⁷這樣運作良好的書房，在日治時期恐不多見。但是昭和 4 年時（1929）時，陳家在書院側旁營建新屋，向陽書院也就正式停止招生，故昭和 6 年(1931)官方的統計資料上未載¹⁷⁸。此後，陳展鴻與諸孫居住其中，日夜課其孫輩修習漢文，變成家塾，至到光復後。¹⁷⁹



圖 5-2-3：陳德秀向陽書院束脩帳

資料來源：陳運棟提供。

向陽書院的詩文集已由後人出版成書，內容分為詩作、聯語、雜文等，¹⁸⁰漢文程度頗有一定的水準，而且這並不是特例，大多數有家學淵源者，在日治早期漢文程度皆頗佳。圖 5-2-4 即是陳德秀在日治初期於向陽書院¹⁸¹，從父修習漢文時的詩題作品。

¹⁷⁷ 陳運棟：《向陽書院詩文集》（南投：臺灣省政府文化處，1999 年），頁 17；及陳運棟先生收藏之五本束脩帳。

¹⁷⁸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 91-94。

¹⁷⁹ 陳運棟：《向陽書院詩文集》，頁 17，直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展鴻派下子孫分家時，書院才變為德秀三子湘淋的住家，也就是向陽書院的家塾型式亦告終。

¹⁸⁰ 陳運棟：《向陽書院詩文集》，目錄。

¹⁸¹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1684-1895)》，頁 237。陳德秀出生於 1886 年，9 到 16 歲時在向陽書院隨父修習漢文，21 歲至 24 歲方讀頭份公學校為第 6 屆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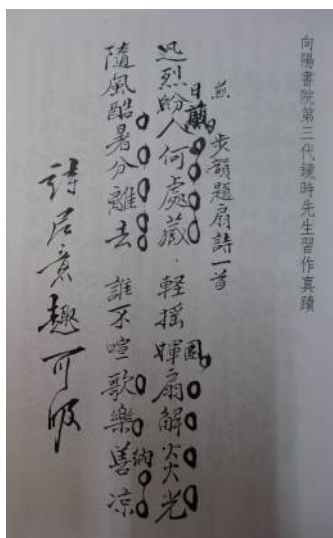


圖 5-2-4：陳德秀詩習作

資料來源：陳運棟：《向陽書院詩文集》，無頁碼。

其次，以在苗栗公館庄開設書房的劉善元為例，他曾二次應童生試，第一次不中，光緒 19 年(1893)，再次前往臺南參加考試途中，因獲家中急函，謂父繼昌公將不久人世，匆匆返回苗栗，應考之事只得作罷。¹⁸²從此再失去科考晉升之機，只得於日治時期以塾師為業，至昭和 20 年(1945)過逝。¹⁸³



圖 5-2-5：塾師劉善元及家人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說明：此照拍於 1920 年，劉善元 70 歲時，攝於五谷岡老家。右坐者即劉善元，左為其夫人傅順妹，前抱 4 子應春之次子，時年 6 歲的家修，右立者為應春長子，時年 9 歲的家駒。

當時的劉氏家塾有 2 間教室，一間為溫習功課用，即由劉善元的長子仕英擔

¹⁸² 劉國昌編：《善元劉公派下族譜》(未出版，1985 年 7 月)，頁 70。原族譜中寫為應鄉試，依照清代臺灣的科考情形，當時劉善元應考的應為童生試，通過者方有生員資格。至於鄉試，則為有生員身份者，至省應考，以求舉人資格者。故改之。

¹⁸³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提供之家族資料；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239，附錄六劉國耀先生家族族譜節要。

任助教，¹⁸⁴其文筆頗佳，由後人保管的文稿、詩文小楷皆可證。¹⁸⁵所存文稿多以《四書》、《五經》之文句命題，讓學生以此習作八股文，例如仕英的〈誨人不倦〉與〈富與貴〉文章，其題目即出自《論語》。¹⁸⁶詳見圖 5-2-6、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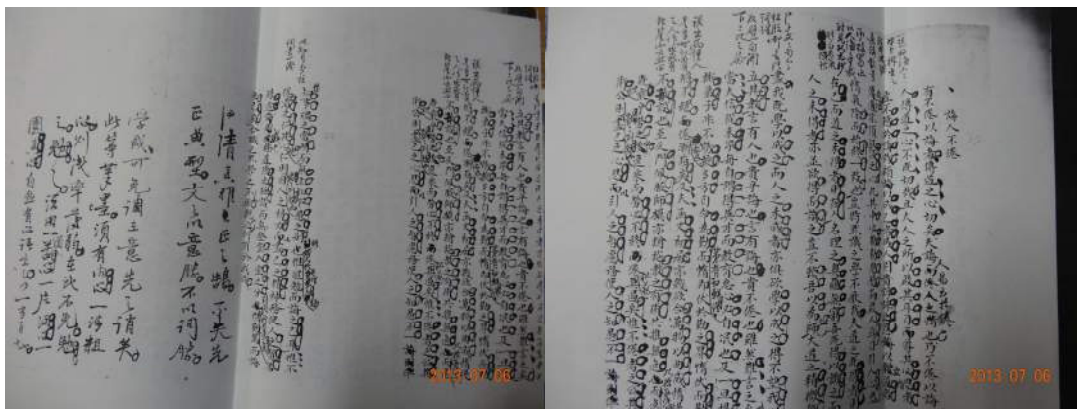


圖 5-2-6：劉仕英的〈誨人不倦〉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說明：文稿上緣及結尾的評語，及文章中圈點的部分應為紅色，由劉善元所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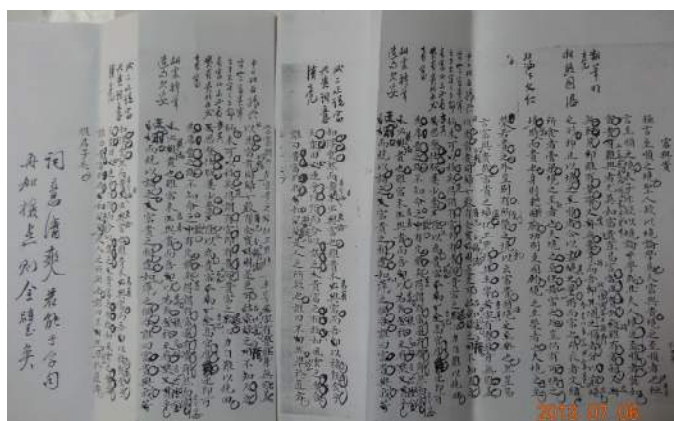


圖 5-2-7：劉仕英的〈富與貴〉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除了文章外，也有詩題之作，如出〈吳宮教美人戰〉、〈天街夜色涼如水〉、〈學然後知不足〉等出一句詞，打其中一字為主旨，請學生以此作詩文的短篇小楷留存，詳見圖 5-2-8。

¹⁸⁴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提供之家族資料；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27、239。仕英出生於 1875 年，約歿於 1915~1920 年間。

¹⁸⁵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口述及資料；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27。

¹⁸⁶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口述及資料；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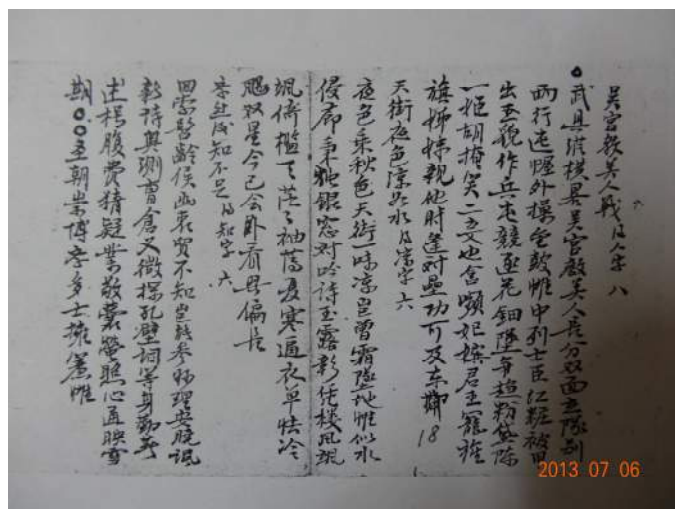


圖 5-2-8：劉仕英小楷詩文。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以上這些文筆頗佳的書房教學成果，主要是日治早期少數有家學淵源者的成就。這些塾師本身或助教等，或其下一代，大多仍走向接受公學校教育。例如：向陽書院的塾師陳德秀本身即是頭份公學校畢業，其長子毓琳，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本科農業科，曾任公館、頭份等公學校訓導。¹⁸⁷

劉氏家塾從 17 世的善元、18 世長子的仕英，仍是塾師與助教，但到了善元的次子曉春已是鶴岡公學校雇員，可能是其漢學頗佳，而獲聘至公學校教漢文。到了三子熙春已是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庄役所會計與公學校訓導；四子應春為庄役所書記；五子和春也是師範學校畢業，亦曾任公學校訓導。¹⁸⁸由此可見，即使塾師之家，亦由傳統漢學教育向新式學校教育過渡，即使他們的漢文程度仍佳，但已不如其父兄，例如熙春所留國語學校時期的漢文作文，其字體、文章即不如仕英的作品(詳見第三章)。



圖 5-2-9：劉善元家族照

¹⁸⁷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237-238。

¹⁸⁸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提供之家族資料；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239-頁 240。

資料來源：劉國耀提供，筆者影印後翻拍。

說明：1、此照攝於 1920 年，前排右 3 即劉善元，右 2 為其次子曉春，右 1 為其三子熙春，1911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¹⁸⁹，因具公學校訓導身分，故著文官服。前排左 1 為五子和春，1918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¹⁹⁰，亦著文官服。前排左 2 為四子應春。2、照片中所有的婦女衣著髮式相當一致，此時雖日治已 25 年之久，但客家婦女的髮式與衣著仍如舊朝。

二、日治後期

至於一般的家庭，或是日治後期才進書房者，所有的教學目的與學用程度，與前述迥然不同，多求識字、寫信等生活應用而已。因此大多偏重「三、百、千」、雜字、尺牘、應世智能等類別童蒙書的點段、指讀、背誦等，連寫字都難見，遑論習作文或作詩。

一般就讀書房者所提到所學的內容，都以識字、寫信等開蒙程度為主。由學生拿著自己想念、能念的書到書房，由老師用朱筆邊點邊念，有時也會講解生字或內容，但更多時候，只是讓學生在聽過發音後，背起來。¹⁹¹因此在短暫時間內，學生即可背熟這些以三、四、五、七言等常以韻語編排的童蒙書，但記得多寡或是否能理解，完全得視學生的能力而定，或等長大之後才能理解。¹⁹²而吟詩、作對，依筆者訪問到的個案，是詩社興起後，有興趣者由同好加以個別指導自學而已。¹⁹³

范士敬在石光公學校畢業後，於昭和 11 年(1936)就讀於書房，就曾鮮活的描述，他在書房上課的情形。¹⁹⁴當時范士敬讀了半年的時間，上學的情形，如公學校一般，從早上 8 點開始，每個鐘頭一節，至 11 點半；中午休息，自備便當，各人帶柴去加熱，休息至下午 1 點開始上課，又是每個鐘頭為單位，一直上到下午 4 點。至於讀的教材，由學生自行購買，老師依學生準備的內容來點書背，范士敬讀的內容有《童子尺牘》、《百家姓》、《指南尺牘》等，教學的方式與傳統相同，也都是老師點字、教發音、學生背，¹⁹⁵而且並非每一篇都教，有些有用朱筆點過，有些篇章則無。遇到特別困難的字詞，塾師也會特別圈選出來，加以解說。

¹⁸⁹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先生，說其祖父畢業於 1911 年，並有明治 43 年度 4 月起的第四學級漢文作文簿留存，經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頁 3，劉熙春為 1913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但網頁資料難免有誤，今依漢文作文簿所記時間，其畢業時間當為 1911 年，畢業校名及科別依網頁資料。

¹⁹⁰ 劉國耀 2002 年 3 月 29 日先生，說其五叔公於 1918 年畢業於國語師範學校，經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名冊 <http://r8.ntue.edu.tw/pastalu/03.htm>，頁 17，劉和春為 1918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年相同，學校及科名依網頁資料。

¹⁹¹ 徐慶松 2002 年 4 月 29 日口述；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等詳述的書房上課情況，大致相同。

¹⁹²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金統即言，雖然背誦了《百家姓》、《三字經》、《增廣》、《五言雜字》等內容，但當時其實大多不能理解，有些都是後來長大後才懂的。

¹⁹³ 徐慶松 2002 年 4 月 29 日口述。

¹⁹⁴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⁹⁵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⁹⁶范士敬也指出：因為先學日語的 50 音，所以此時反而看不懂漢字怎麼念，造成背書時的困擾。他說：

我記不得這麼多喔，個個字我也不知應怎樣讀，還一個一個這樣讀。讀一行過了換一行。讀到 1 點鐘久，就讀透了，讀透了要背，要背？怎有這麼大精神去背？讀不透啊！（大聲強調）一個字一個字我也不會讀，我讀日本書，這日本書個個也很深呀！讀不出呀！而且要用客語讀啊！¹⁹⁷

每個字都不知如何讀，卻要一個一個念，念完一行換一行，1 個小時後，念完整段了，就要用客語背起來。可是范士敬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用客語念他不懂的漢字對他而言是很大的困擾，何況是要背起來。難怪在讀了半年之後，范士敬會覺得漢書沒用，又回頭去進修日文課程。¹⁹⁸



圖 5-2-10：范士敬使用的《童子尺牘》舉例

有關上課的日數，雖然一般為每年農曆正月 15 日後開學，至 12 月 26 日左右結束，中間只有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等 6 節日放假。¹⁹⁹但是范士敬卻提到，每月的初一、十五兩天都放假，稱之為溫書假。²⁰⁰而有些書房只是開在寒暑假、放學後，或是夜間，²⁰¹以方便有心學漢書者能依可行的時間前往學習。至於設教場所更是五花八門，無論私宅或宮廟等皆有，²⁰²最特別的是學生必須自備桌椅一項²⁰³，即使是年紀尚幼，只有公學校一年級的徐金統，要徒步 5、6 公里到芎林中坑上書房，或是到下橫坑劉姓、黃姓塾師處上課，仍都要自備桌

¹⁹⁶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⁹⁷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口述為客語，為了方便理解，以國語改寫。

¹⁹⁸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¹⁹⁹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62。

²⁰⁰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²⁰¹ 利用公學校寒暑假上書房者有徐金統，公學校下課後上的有陳送妹，夜間上書房者更多，前述提及「打夜學」者。

²⁰² 無論是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62 所述，與筆者訪談結果相符合。

²⁰³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63。

椅。²⁰⁴雖然書房在教學法上顯得陳舊而呆板，但是在訪談中也多次提到塾師為了讓學生能識字、或中午回家吃飯時不會跑去玩水，因此將學生應識得的字用毛筆寫在學生的手背上，不但能使學生能習得生字，又能避免戲水的意外。²⁰⁵這樣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變通之法。雖然日治時期官方承認的書房已有新式教育的內容加入，但是在訪談關西地區的長輩時，並未遇到受教新式書房的實例，殊為可惜。

參、啟蒙教材

日治時期臺灣的書房教育承襲了晚清的教育方式與教育內容，於是流行在民間的啟蒙教材一般如舊。日治後，為了因應書房的改良，納入官方管理下，總督府也新編了一些漢文教材，大多只通用在官方立案的改良書房中。至於民間為因應時代變革，或識字所需，也開始產生各種自編式的教材。但是在實際的流通上，並不是所有官方編訂或民間自編的教材，都得到塾師的青睞，依筆者訪談的結果，在關西地區流通最廣的還是傳統的啟蒙教材，只有偶爾會聽到以客語編成的雜字類教材。以下依傳統啟蒙教材、臺灣自編啟蒙教材與實際流通啟蒙教材來說明之。

一、傳統啟蒙教材

在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調查書房概況指出，學生由7歲到16歲，學習的內容可以分成經學與藝文二類，經學類的書除了《三字經》、《幼學群芳》外，餘下的內容皆為《四書》、《五經》。²⁰⁶而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所記的書房教科配當表顯現的內容也大同小異，但多了練字一項，學生一樣由7歲到16歲，教學內容分成讀書、詩文和練字三類，其中讀書的內容除了少《幼學群芳》外，一樣由《三字經》開始啟蒙，接下來即是《四書》、《五經》等教材。²⁰⁷今人宋健行研究指出這些進度皆是沿用程端禮制定《程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的結果。²⁰⁸但就實際執行層面而言，這恐怕只是一種理想，針對傳統科考所需的經館才會採用這樣的教學進度，日治後期一般只求應世之用的蒙館與「打夜學」是不可能照這樣上課的。

日治時期臺灣有相當多傳統的啟蒙教材，除了清朝即開始在臺灣流通的傳統啟蒙教材，依羅肇錦的研究，臺灣流傳最廣的教材與內地大致相同，即為人所熟知「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此外尚有雜字、《訓

²⁰⁴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²⁰⁵ 2003 年於田野調查時遇到羅姓關西農校退休老師提及此事，令筆者印象深刻。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18 日電話訪問、林鄧平妹 2013 年 4 月 27 日口述等皆曾提到類似的識字教法。

²⁰⁶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臺北：師大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20-21。

²⁰⁷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第三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年），頁 176-177。

²⁰⁸ 宋健行：，《我國傳統啟蒙教材研究——以臺灣地區為觀察重心》（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46。

蒙教兒經》、《弟子規》、《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增廣昔時賢文》、《幼學瓊林》、《朱柏廬治家格言》、《圖解神童詩》、《二十四孝》、《龍文鞭影》等，他並指出除識字、識物等知識教育外，多是為了做人處世、求取功名等功利的要求為目的。

209

筆者曾指出臺灣也有因應不同族群教學、當地文化等需求，所編成的啟蒙教材，例如：以閩南語編成的《千金譜》²¹⁰；以客家語編成的《四言雜字》²¹¹、《七言雜字》²¹²，即是因應啟蒙教育中不同方言族群運用各自母語教學的情況所編成。²¹³其中《四言雜字》以客語編成，描述了臺灣各地的風土民情，尤以桃竹苗至臺中等客庄情況甚詳。例如丘逢甲光緒年間的詩作〈苗栗縣〉：「田制幾零畝，溪流淺急聲；亂山多近市，新縣未圍城。土瘠遲官稅，民貧長盜萌；眼前無限感，過客此孤征。」²¹⁴與清代版本的《四言雜字》有「貓裡市鎮，山水無情。往來晝夜，生疏難進。庄多雜亂，豈無賢人」²¹⁵之句頗為相合。到了日治時代版本的《四言雜字》改編後的描述是「貓裡市鎮，山水有情。往來晝夜，生疏同進。庄雖離散，豈無賢人」²¹⁶可見到了日治時代，苗栗地方的社會發展已經和諧很多，但位於山城，各庄離散情況依舊。經黃震南考證前後不同的版本，證明此書應成書於清代，日治後，經李開章等編校，故內容稍有修改。²¹⁷其實大多數的啟蒙教材，都可能依塾師教學所需加以修改、或於印編時加以調整，常常修改、抄錄者不只一人，只是前述的《四言雜字》是其中流通甚廣的版本，因此編修者的署名方得保留。

總之，這些原於晚清即在臺灣民間流傳甚廣的啟蒙教材，在科考之路堵塞後，仍有應世實用的目的，乃在書房中廣為流傳，反倒比《四書》、《五經》更為民間所熟知。尤其《三字經》、《百家姓》等幾乎是人人耳熟能詳之書，成為百姓中文主要啟蒙教材。

二、臺灣自編啟蒙教材

黃震南承襲父親黃哲永對童蒙書的愛好與蒐集，將家傳及後來蒐集的臺灣傳

²⁰⁹ 羅肇錦：〈清代臺灣書院童蒙教育初探——通行童蒙書所呈現的教學理念〉，頁 156-164。收於古鎮清總編：《崇文載道書院情》（南投市：臺灣省政府文化處），頁 156-164。

²¹⁰ 不著撰者：《千金譜》，（新竹：竹林書局，2000 年），頁 1。書中用語常出現「著」字，以連接上下語詞，如「勸人讀書著認字」、「耕作著認路，田園著照顧」、「謹作著謹收」等，明顯為閩南語式的用語，其他尚有多處可證，不一一列舉。《千金譜》非臺灣特有，但留傳入臺灣後，只見閩南用語的改編版，而不見客語版。

²¹¹ 張氏新編：《四言雜字》，（新竹：竹林書局，2001 年），頁 4。客家人稱手環戒指為「手鉅禁指」。

²¹² 不著撰者：《四言雜字》，附錄《七言雜字》。《七言雜字》中頁 6，「黃瓠」、「艾菜」等字眼是客語的用法，指南瓜、茼蒿，與閩南語稱法不同。

²¹³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28。

²¹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臺灣通誌》（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 年），卷十，藝文志文學篇第一冊，頁 528。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8，推測此詩約寫於 1889 至 1894 年間，丘逢甲 30 歲左右。他在光緒 16 年兼任全臺通誌採訪師。苗栗設縣於光緒 15 年，縣城直至光緒 20 年仍未建城垣，四週僅植竹以為城圍。

²¹⁵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73。

²¹⁶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73。

²¹⁷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36。

統啟蒙教材，尤以「創作於臺灣」或「發源地不詳，但富涵閩南特色，有可能源於臺灣者」，加以整理研究。²¹⁸其整理出 1897 年出版洪棄生編的《時勢三字編》與 1900 年出版王石鵬編的《臺灣三字經》，及《臺灣明治分類雜字》、《新改良三字經》、〈訓蒙集格言〉、《羅華改造統一書翰文》、《四字雜錄》、《精神教育三字經》、《新撰仄韻聲律啟蒙》、〈新聲律啟蒙〉、《三字集》、《新編士農工商手抄利便來往書信不求人》、《千家姓》、《和漢寫信不求人》、《皇民奉公經》等 15 本日治時期編成的臺灣傳統啟蒙教材，²¹⁹這些童蒙教材雖被編成，但流通情形恐怕有限，而實情如何也難以考究。筆者在訪談受教書房的長輩時，並未看到或聽到這些教材。

黃震南並將所有可能成書於臺灣的童蒙書，先依出版日期分為清代、日治與戰後，並將這些童蒙書依內容題材，分為三字經體、千字文體、韻對類、詩歌類、尺牘類、雜字類與基礎識字類等七種，加以舉例，分類說明之。²²⁰傳統的啟蒙教材大多沒有閩客之別，皆可使用，只有雜字類的教材，由於內容多為器物之名，在記字稱法上，多記方言用語，在使用上當以使用該語的族群為主。雖然黃氏在考證《四言雜字》時，提到此書本以客家話寫成，保存大量客語文字與傳統文化，卻因內容切合實用，因此全臺各地皆可看到這本《四言雜字》，他認為閩南籍臺灣人也在私塾中用閩南話誦讀。²²¹可見只要編得好的童蒙書即使有語言的差異，但若能切合實用，一樣能打破語言的限制，何況有時塾師只取其中某些章句、或只求識字而已，並不是所有的童蒙書都要從頭教到尾或全本背完。因此跨族群的使用當有可能，但也可能低估了客家族群在全臺的分布。在日治時期，去臺北就讀的呂榮初就寄住在客家人梁萬珍經營的學寮中。²²²而徐金統在日治後期要從花蓮農林學校逃回新竹時，即在花蓮往中央山脈的路上，也受到客家人的曾姓雜貨店老闆幫忙。²²³更不用說南臺灣其實也有很多客家庄及混居在其中的客家人。何況啟蒙教材的使用大多以應世實用為目的，故其實際的流通和使用情形如何，其實很難以書是閩客用語的編成，絕然二分。但雜字書的編成，顯然是各類童蒙教材中，最能顯現出閩客族群特色的一種。

黃震南將所蒐集的十數種雜字類材，依其內文、紙質、版本、印刷或抄寫品質、及流傳保存至今等判斷，這些雜字類的啟蒙教材，應多成書於日治時代。²²⁴其後，並於第九章章一一介紹所蒐集的雜字類教材，黃氏除了詳細考證、介紹清代即流通於臺灣的閩南語編成的《千金譜》與客語編成的《四言雜字》外，²²⁵並針對其他 15 種雜字書的內容詳加說明，並依各書中出現的物品用詞判斷，15 種

²¹⁸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6。

²¹⁹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38。

²²⁰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7-8。

²²¹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7-8。

²²²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123。

²²³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²²⁴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41。但是筆者借到幾本高祖父使用保存下來的鸞堂書或百科全書式的童蒙書，卻是晚清時代的作品，不過此處未見實物，只能依黃氏所斷。

²²⁵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62-177。黃氏蒐集的版本較完整，在解說上較筆者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提及《千金譜》與《四言雜字》的比較時，更深入。

中有 9 種為以客語編成的雜字書，如：《為人最要敬爺娘雜字》、《分類七言雜字》、《鹽油米穀四言雜字》、《七言雜字》、《讀書子三言雜字》、《士子何用先五言雜字》、《天地日月星五言雜字》、《正月是新年五言雜字》及《選抄分類雜字》等，這些雜字書皆是以客語編成。²²⁶除了上述這 9 種外，黃震南在論文謝誌時，又提到自百城堂購得兩本客語雜字，來不及列入討論文本。²²⁷可見客語雜字書的版本眾多，不能忽略。

黃氏認為：1905 年第一次大規模戶口調查時，廣東籍人口在臺灣只佔 13.06%，而這些客語雜字竟佔一半以上，推論出客家族群的經濟狀況較為清寒，或許無法將子弟送往私塾就學，但「耕讀傳家」的祖訓不能忘，故以省錢的雜字教材，快速提昇字量與吸收應世知識，是客家族群因應環境，努力向學所形成的教育現象。²²⁸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但值得再深究。客家人看重讀書識字當無疑問，但是否窮得無法上私塾，究實情而言有很大的落差。客家人也許多為佃農出身，但在日治時期，已有相當多出身佃農之家的孩子不是入書房，就是進公學校就讀，例如筆者的曾、祖父輩，1882 年出生的江立保念過 2 年私塾，1906 年出生的江接春也讀過 2 年私塾，²²⁹1920 年出生的江接松為石光公學校第 14 屆畢業生²³⁰，1927 年出生的江接斗為石光公學校第 22 屆畢業生²³¹，而江家要到光復後政府推行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後，方有自己的耕地。可見在整個日治時期，居住山區的客家人並非窮得沒辦法上私塾，反而因為注重教育，看重文字。雖然無法讓子弟接受較長期或完整的私塾教育，轉而利用這些短期即可速成的雜字教材，或利用工作之餘的短暫走讀式或「打夜學」式的書房²³²，讓子弟習得識字、記物的能力。

所謂雜字類的教材，是識字上很方便，又有彈性的教材，加上以用該族群常用語言編成，在臺灣即有閩南語和客語編成兩種，親近學生的生活，容易教導與理解，故編者多，教學上也容易有成就感，更是生活記事所必須。筆者在訪談中，由於客家人就讀的書房是以客語教學，也常有受訪者提及讀過的雜字教材，但多數只提及書名幾言，如：《三言雜字》、《四字雜言》、《五言雜字》或《七言雜字》等，並未提到雜字的內容為何，因此只能判定是以幾言編成，卻難以分辨內容是否也相同。而且雜字類教材既以器物之名為多，既不如韻語般好記好背，或者有背誦的必要，其功能乃以識字、應世為主，因此讀過後歲月日久，內容大多也被遺忘，更難以分辨內容是否相同。

²²⁶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80-185。

²²⁷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VI，致謝辭。

²²⁸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87。

²²⁹ 江立保為戶主的戶籍謄本：竹縣關戶謄字第(甲)004933。以曾祖父江立保為戶主所申請列印的戶籍謄本。詳載曾祖父江立保與大伯公江接春皆為私塾 2 年。而江家要在民國 40 年，政府推行公地放領政策之後，才逐漸擁有自己的耕地。

²³⁰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第十四屆畢業名冊。

²³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2，第二十二屆畢業名冊。

²³² 這樣利用工作之餘空閒時間就學的走讀式或「打夜學」傳統書房，一直到光復後在筆者的故鄉下橫坑維繫著，筆者的父親及同里的長輩都提到類似的經驗。

雜字類蒙書既是一種方便因應識字及教學所需而產生的教材，常因各個塾師教學所需而加以抄錄或修改，故未見編者之名，或是同為幾言，但內容未必全部相同，也就理所當然。故而黃氏的整理介紹所見各類教材時，自然會有收獲豐富，卻又無法考查作者的慨嘆。

三、實際使用的教材

就如今人吳文星所述，私自開設的書房，其教師多係傳統教育出身，未曾參加教師講習會或接受檢定，課程仍以漢文、習字為主，教材也仍是《三字經》、《幼學群芳》、《四書》、《五經》等，鮮少採用總督府編的「漢文讀本」。²³³不但如此，大部分書房使用的教材與清代流通在臺灣者差別不大，但是在日治客家地區，除了「三、百、千」等傳統童蒙教材外，雜字、尺牘類的教材最常被提及。另外，日治晚期《增廣昔時賢文》，也成為頗暢銷的一本啟蒙教材，而且這股使用的熱潮還延續到光復後。²³⁴這可能和科考之路已斷，書房所學主要以應世智能為主，特別強調生活所需的品德、識字、寫信、簿記等功能。

一、使用實例

由於書房所學之書，都由學生自行購買，可能每個學生所學、想學者皆不相同，因此差異頗大，難以形成通則。以下將筆者知道的例子，簡述如下。

苗栗的吳頌賢於英才書院授課的是《三言雜字》。²³⁵苗栗栗社詩人謝鐸庵幼時曾遠途念村塾，後雖因改隸，只得自學漢文，燈下課子，教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千家詩》、《增廣賢文》等。²³⁶

前關西陶社社長徐慶松，16歲時利用夜間，隨關西太和宮香公伯黃榮海先生學習漢文，念的教材即是《寫信必讀》、《幼學瓊林》等。²³⁷

²³³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71。

²³⁴ 楊澄清 2012 年 8 月 17 日口述，光復後楊澄清為了學國語，前往關西街上邱復金開設的私塾讀書，當時念的教材即是《增廣昔時賢文》，而他的母親也曾受教於邱，此時尚能指正其發音。可見他的母親於日治時期就讀私塾時，即曾讀過此書。

²³⁵ 吳保榮：〈革命志士吳頌賢其人其事〉，頁 95，收於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6 年），附錄，頁 90-106。吳頌賢為栗社書記，並曾繼承父職任教於苗栗英才書院，後人將其日治時期的「栗社詩集」及清朝所留的線裝書、古地契、監照戶部執照、「天香吟社」詩抄、紹基先生（頌賢父）所寫八股文、英才書院授課的《三言雜字》、公營、廟宇紀事等資料藏於深潭保留。

²³⁶ 謝霜天：〈芎蕉灣上一詩翁—詩鐸庵〉，頁 111，收於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附錄，頁 111-116。

²³⁷ 徐玉海：〈家父與詩〉，頁 566，收於林柏燕：《陶社詩集》，附錄，頁 566-567。筆者於訪談時亦得到徐慶松先生的同意，將此二童蒙書借去印影，並聽其解說如何教讀及朗聲吟詠。



圖 5-2-11：徐慶松使用的童蒙書

資料來源：前陶社社長徐慶松先生提供

昭和 11 年(1935)石光公學校畢業的范士敬，到下坪仔私塾讀的教材有《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五繪圖百家姓》、《童子尺牘》、《指南尺牘》、《白話注解指南尺牘》等。²³⁸其中《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五繪圖百家姓》，是所有訪問所見的童蒙書中，唯一使用由臺灣總督府出版者。約同一時期，陳送妹於公學校下課後，在坪林分教場旁的「阿飄伯」書房讀的書即是《三字經》。²³⁹日治時代在下橫坑任職保正的劉滿元，本身即通漢學，曾念過《三字經》、《幼學》、《增廣》等童蒙書。²⁴⁰

1937 年開始上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教場的徐金統，於公學校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寒暑假，前後念過 3 個私塾，仍記得讀的第一本書是《百家姓》。

我第一本念的書我還記得，《百家姓》「趙錢孫李，張…」(客語)《百家姓》啦！還有《千字文》啦！《增廣》、《增廣》啦！是啦是啦！還有《雜讀》啦！《五言雜字》。《雜讀》斯專門寫信方面的，教你寫信方面的。²⁴¹

而且徐金統雖然未曾提及《三字經》，但他後來背誦，並認為較容易理解的內容即出自《三字經》。²⁴²由以上諸例可知，「三、百、千」等童蒙書，仍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常見的啟蒙教材。

龍潭庄的廖德雙於 9、10 歲，二、三年間接受其父親或祖母的指導，於晚上及龍潭公學校放學後，接受傳統蒙書的教育，讀過的書有「人之初」(即《三字經》)、《昔時賢文》、《四字雜言》、《七字雜言》等。²⁴³廖德雙認為像「人之初」、「昔時賢文」是教做人的基本，還有歷史等；「雜字」則是教人生活的用品，如何稱呼等。²⁴⁴

²³⁸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²³⁹ 陳送妹 2012 年 5 月 8 日電話訪問。

²⁴⁰ 樹勳、利生口述，廣義、利能撰寫，〈劉滿元先生軼事 一〇二歲人瑞—我的祖父〉，頁 135。

²⁴¹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

²⁴² 徐金統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徐金統即言，雖然背誦了《百家姓》、《三字經》、《增廣》、《五言雜字》等內容，但當時其實大多不能理解，有些都是後來長大後才懂的。

²⁴³ 廖德雙 2002 年 10 月 20 日口述。

²⁴⁴ 廖德雙 2002 年 10 月 20 日口述。

二、「三、百、千」最常見

由以上所舉諸例可知，「三、百、千」等童蒙書，仍是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客家庄最常見的啟蒙教材。

其次為尺牘類教材，以應付生活中常用的書信寫作。鄉下地方似乎特別重視生活應用必備的尺牘類的教材，從白天上書房半年的范士敬，寒暑假進修的徐金統，到「打夜學」的徐慶松等，都有讀過尺牘類啟蒙教材的記憶。而范士敬的童蒙書至今仍保存良好，4本書中，即有3本為尺牘類的教材。如：《童子尺牘》、《指南尺牘》、《白話注解指南尺牘》等。²⁴⁵



圖 5-2-12：范士敬所用 4 本童蒙書

資料來源：范士敬老師提供

至於今人江穎川保存其丈人所使用的三本啟蒙教材，竟然皆是尺牘類的教材，分別為：《初學指南尺牘卷三》、《改良分類指南尺牘集》、《新編注解指南尺牘》等。²⁴⁶詳見圖 5-2-13。



圖 5-2-13：3 本尺牘類童蒙書

資料來源：新竹縣陶社詩會會長江穎川提供

再次為雜字類教材。雖然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各類雜字皆在桃竹苗地區的客家庄被使用，可惜未提及使用的版本或內容為何，因此僅能以流傳最廣者來推斷。且由黃震南蒐集的各種雜字書可知，即使是以客語編成的四言、五言及七言雜字，都有不同的版本，²⁴⁷可見客家人的確編出不少的雜字書，並且在使用

²⁴⁵ 范士敬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²⁴⁶ 江穎川 2012 年 5 月 1 日，借得 3 本啟蒙教材。江穎川為現任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前陶社社長徐慶松為榮譽理事。

²⁴⁷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180-185。

上也相當常見，可惜無法判斷究竟為哪一種版本。

三、《增廣昔時賢文》分析

最後，稍晚出現，卻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則是《昔時賢文》或《增廣昔時賢文》，後者簡稱《增廣》。

筆者曾將家人使用或購得的 7 種版本的《昔時賢文》及《增廣昔時賢文》²⁴⁸加以對照比較，發現版本雖多，且《昔時賢文》內容與《增廣昔時賢文》多所重複，可是並不相同，若要細分，可另歸為一類。也可能是《增廣昔時賢文》的前身，經刪訂有新版後，仍同時流傳於世。

其中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增廣賢文》、竹林書局的《增廣賢文》和世峰出版社的《增廣昔時賢文》等 3 本，是流通最廣的版本，除了燕山出版社的《增廣賢文》另編有導讀和評價，和世峰出版社的《增廣昔時賢文》以現代印刷、注解的注音版外，前述兩者的內容只有少數字句稍有出入，可能是版本失傳，經由背誦重刊的結果。大部分的內容都與竹林書局木刻版重印的《增廣賢文》大致相同。其他版本則皆為後人修訂後重刊，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訂增廣賢文》是清代同治年間的周希陶，取無名氏之《昔時賢文》，稍作刪補，以平、上、去、入四韻重新編排而成，²⁴⁹雖有修訂，由其「重訂」二字及內容，可見其為《增廣昔時賢文》的修訂版，今人朱利又加以注釋出版。

由於以上的版本大多不著撰者與成書年代，因此很難確切知道是何時何人的作品，可以肯定的是清代已有此書，且流傳甚廣。林文寶亦將此書列為清代的啟蒙雜書，並指出不知何人所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代代相傳，常加增廣，所以各地版本也不盡相同。²⁵⁰以其洗鍊的文句可知，必經如周希陶般，具一定學識之士的潤飾，始成是書。

筆者最後以竹林書局，木刻版重印的《增廣賢文》為內容，進行形式分析、內容分析、取材來源與蒙書比較等，得到以下結果。

首先，形式分析發現：1.字數：文體為長短不一的聯語，多兩兩相對，但也有 3 句一組，4 句一組者，全書 3,847 個字；2.押韻：雖有押韻，轉韻甚多，韻腳多所重出；3.修辭眾多，生動適切，就寫作形式而言，屬諺語彙編類蒙書。

其次，內容分析上，不全符合儒家思想，卻切合中國人真實生活的處世智慧，這一點應該就是此書在不重科考，只求應世的客家庄書房如此普及的關鍵。張志公將其歸為「思想教育和知識教育」，有別於軼聞掌故和歷史知識類的蒙書。²⁵¹今

²⁴⁸ 不著撰者：《昔時賢文》(新竹：竹林書局，1999 年)，木刻本重印；不著撰者：《昔時賢文註解》(新竹：竹林書局，1999 年)，木刻本重刊，內頁名為《增廣昔時賢文註解》；龍漢宸主編：《增廣賢文》(北京：燕山，1996 年)；不著撰者：《增廣賢文》，(新竹：竹林書局，2000 年)，本刻本重印，內頁名為《增廣昔時賢文》；陳世峰編譯：《增廣昔時賢文》(鳳山：世峰，1990 年)；朱利注釋：《治家格言、增廣賢文、女兒經》(上海：上海古籍，1995 年)；蔡崑山修訂：《增廣昔時賢文讀本》(新竹：竹林，1993 年)等，共 7 本。

²⁴⁹ 朱利注釋：《治家格言、增廣賢文、女兒經》，頁 23。

²⁵⁰ 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頁 68，收於《臺東師專學報》，第十一期，1983 年，頁 1-81。

²⁵¹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上海教育，1992 年)，頁 57。

人張心愷將其歸為應世智能類，注重人情世故的處世智慧。²⁵²而宋健行雖將其歸為諺語彙編類，有別於語文教育、為學之道、人倫之教與知識掌故，²⁵³但其內容與人倫之教部分有重複，仍以處世智慧為主。雖然在分類上，依各人標準而不同。整體而言，全文缺乏中心思想，有時甚至上下文看似矛盾，如「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餘」、「寧向直中取，莫向曲中求」，與「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²⁵⁴但前二句是對個人修身的要求，後二句則是處世上要避免的風險，關注不同面向，而揭露了真實的人生。周慶華甚至認為《昔時賢文》除了提供反面的警惕，更揭露了人生的光明面和黑暗面。²⁵⁵特別的是，除了修身、求學、孝道、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外，更充滿了道家守分、安命、順天、避禍與及時行樂等思想。所以《增廣昔時賢文》雖不被學者所重，卻廣為民間傳誦，較切合民情，原來即在通曉人情事故，善處人際關係上，²⁵⁶有很大的著墨有關。這是與一般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學者所主編的啟蒙教材，很不一樣的地方。筆者將內容分成世態人情、修身讀書、家庭倫理等三項，究其內涵最重要的仍是處世的智慧，就如《紅樓夢》中展現的「人情練達幾文章」的境界，也是中國人最重要的處世哲學。雖然學校教育不強調，卻是人生必須。

此外，《增廣昔時賢文》取材來源相當廣，有些雖已成傳世的諺語、格言，也很難斷定其必取自某書某處，加上字句有所調整、修改，但後人仍比較出其文句出處，推及各部經史子籍，如：《老子》、《論語》、《孟子》、《史記》、《孫子兵法》、《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說苑》、《列子》、《禮記》、《醒世恆言》、《警世通言》等。²⁵⁷至於明朝成書的《醒世恆言》、《警世通言》、《西遊記》等筆記小說，雖有語句與《增廣昔時賢文》相似，但是誰先誰後，很難斷定，可能同受到當時民間流行諺語的影響。

表 5-3 《增廣昔時賢文》取材來源

《增廣昔時賢文》文句	出 處	原 句	備 註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	《老子》	知足不辱	1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七十三章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2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論語》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1
種麻得麻，種豆得豆。	《涅槃經》	種瓜得瓜，種李得李。	2

²⁵² 張心愷：《明清時期蒙學施教所啟導之文化典範與應世智能》（臺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146。

²⁵³ 宋健行：《我國傳統啟蒙教材研究---以臺灣地區為觀察重心》，頁162。

²⁵⁴ 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頁68。

²⁵⁵ 周慶華：〈歷代啟蒙教材中兒童觀念的演變及其意義〉，頁34，收於《孔孟月刊》，37卷8期，1999年4月，頁30-37。

²⁵⁶ 朱介凡：〈「增廣賢文」的幾段公案〉，頁616，收錄於《中國民俗歷史發微》（臺北：渤海堂），1995年，頁615-621。

²⁵⁷ 朱玉娟、顏秀惠：〈《增廣昔時賢文》初探〉，頁79，收於《語文教育通訊》，22期，2000年6月，頁69-82；龍漢宸主編，《增廣賢文》，頁58-59。

表 5-3 《增廣昔時賢文》取材來源(續)

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	《漢書》卷七三〈韋賢傳〉	遺子滿籬，不如一經。	3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後漢書》〈郎顛傳〉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2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李白詩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1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唐人句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	1
今朝有醉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唐人句	同左	1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熹〈敬齋箴〉	守口如守瓶，防意如城。	2
積善成名，積惡滅身。	《說苑》〈叢談〉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2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醒世恆言》第九卷、第十九卷	夫妻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1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喻世明言》第十一卷	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	1
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將來尋死路。	《喻世明言》第三十三卷	三十不榮，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尋死路。	1
黃河尚有澄清日，歲可人無得運時？	《警世陰陽夢、陽夢》第十一回	同左	1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禪真逸史》卷一第一回	有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	1
美不美山中水，親不親故鄉人。	《西遊記》第三十七回	美不美江中水，親不親故鄉人。	1
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渴時一滴如甘露，醉後再添不如無	《清平山堂話本》卷三〈楊溫攔路虎傳〉	同左	1

說明：1.整理自龍漢宸主編：《增廣賢文》，頁 58-59。

2.整理自朱玉娟、顏秀惠：《〈增廣昔時賢文〉初探》，頁 79-80。

3.轉引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2001 年)，頁 312。

由表 5-3 整理可以發現，《增廣昔時賢文》，不但博採群書，且為了方便記誦，多有調整字句或字數者，有些並對內容加以宣揚，並非全部一字不差照錄，實乃有所變之作。所以在流傳的過程中，必有具一定學識之士加以改訂，方能如此整鍊。

最後，與其他蒙書比較，可以發現蒙書多有輾轉傳抄的特性，因此在內容上常重出或相似，《增廣昔時賢文》即在文句上與《人生必讀》、《名賢集》、《千金譜》、《太公家教》等重出，因此常被拿來比較。其中《太公家教》成書較早，為

唐人作品，其中相同的文句有「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積財千萬，不如明解一經」，²⁵⁸先後有序，較無爭議。但是與《增廣昔時賢文》同為明清通行啟蒙教材的《人生必讀》²⁵⁹、《名賢集》、《千金譜》²⁶⁰，又常有文句相似，因此常為人所混淆，例如：朱介凡即把《名賢集》列為《增廣昔時賢文》的一種，²⁶¹但仔細探究內容仍是異多於同，《名賢集》應可獨立為另一種童蒙書。其中，與《增廣昔時賢文》相似度最高的應是《人生必讀》，今人宋健行竟然可以整理出23組相同的句子。²⁶²

由此可見，《增廣昔時賢文》具有一般蒙書流傳後，屢經輾轉傳抄的特性，全書多以諺語集成，因此好讀易記，流傳廣遠，有些內容雖不合兒童，但與其成書背景，及針對成人的啟蒙教育有關。也合於鄭振鐸對「俗文學」特質的描述：大眾的、集體的創作、口傳的、新鮮但粗鄙、具想像力且轉輾傳抄、勇於引進新事物等特質。²⁶³尤其中國自古而來的啟蒙教育和教材，本來就是民間自行負責，且教授的對象並非只有兒童，更多的是未識字的成人，而兒童只是成人的預備，於是《增廣昔時賢文》的內容多取自成人社會，為應世所必備，故其成為日治時期客家庄常見的啟蒙教材，自屬合理。

在桃竹苗地區，雖然殖民政府對公學校、國民學校的設置相當積極，也招收了相當多的學生。各地一旦設置學校後，書房的學生即會在官方、學校教員與警察等的壓力下，漸漸流向學校。由於學校設置的數量，始終無法容納所有的學齡兒童，於是在不得已之下，官方遂在街庄較偏僻的地方，因該地沒有設置學校，學生上學困難，官方即同意在該地設置書房，以為學校教育的補充。這些書房既然為官方所核准，上課的塾師、內容和方式，只得改學公學校的教育內容，加開日語、算術、修身、體操等課程。這類的書房即是官方統計資料所錄的書房，以今日的觀點，或可稱之為立案的書房。但這類的書房與實際訪問所得者相比，畢竟只佔少數。

這樣學校與書房的消長，值得一提的有兩點：

首先，隨著接受公學校教育者越多，而日治早期公學校也多有漢文科的設置，於是這些受過漢文科的公學校學生或師範生，亦具有良好的漢文基礎，也有能力成為書房的教師。這類受過新式教育的塾師，更符合殖民政府對改良書房或學校教育補充的需求。而有些家學淵者，在接受公學校教育後，也會繼承父志任塾師，如苗栗向陽書院的陳德秀、新埔五分埔老學堂的詹金英等。

其次，與公學校教育相似，書房中女子受教的情形越來越普遍，也出現了女性塾師，可見女子受教育的觀念，已漸漸被鄉下地區的人民所接受。

²⁵⁸ 朱玉娟、顏秀惠：〈《增廣昔時賢文》初探〉，頁70。

²⁵⁹ 不著撰者：《人生必讀》(新竹：竹林書局，2001年)，木刻本重印。

²⁶⁰ 不著撰者：《千金譜》，木刻本重印。

²⁶¹ 朱介凡：〈「增廣賢文」的幾段公案〉，頁621。

²⁶² 宋健行：《我國傳統啟蒙教材研究——以臺灣地區為觀察重心》，表5-4：《增廣昔時賢文》與《人生必讀》相同之諺語。

²⁶³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1965年)，頁4-6。

但真正數量較大，提供一般客家居民生活所需的書房，反而是利用公學校畢業後、或上課之餘、或「打夜學」式的書房，這類「未立案」的書房，上課時間彈性，上課的內容也彈性，應學生生活所需，偏重識字、尺牘、應世智慧等內容，並用客語教學，更切合客家人的生活所需，是種活用的知識。但是這類書房大多興廢不時，常依塾師、學生等個人的情況，產生變動，卻是桃竹苗客家庄地區最常聽聞的書房，但是很明顯地有統計上的困難。

傳統書房的教育方式雖然仍是點書、教讀、背書等，但在手背寫字以識字的方式，卻令學生印象深刻。而且為了因應這些無須科考，卻要應付生活所需的學生，塾師或學生在啟蒙教材的選擇上，除了傳統的「三、百、千」外，客家庄的學生，更偏重在念尺牘類與雜字類教材，以應付生活寫信、識字、簿記所需。另外，《增廣昔時賢文》則是最常見教導應世智慧的諺語類教材。

依訪談實例可知，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就讀的書房，直至日治時期結束，都未徹底消失，只是化明為暗，規模更小罷了。到了光復初期，臺灣人為了重學國語，只好向舊時代取經，於是書房教育又一度欣欣向榮。只是新式教育的風潮已不可擋，隨著新式教育的普及，代表舊教育的書房，在日治後，少了科舉晉升的誘因；光復後，又少了愛國精神及生活所需的護衛，最終走向自然沒落的命運。

第三節 詩社發展

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本殖民政府試圖推行新式的學校教育，以教育殖民地的人民，培育恭順日本和殖民臺灣所需的人材，在人材取用上，自然取代了滿清政府統治臺灣時的府、縣學廟學制及科舉制度。但是教育文化的變革並非朝夕可成，清朝統治臺灣二百多年，實際執行教育功能的主要透過書院及民間辦理的各種私塾，後者日治時期統稱為書房。雖然考科舉求功名之路在臺灣已走不通，但是民間的生活應用、文人士子的文化氛圍，更不可能令出即變。於是臺灣的詩社在這樣新舊文化交替、衝突的時刻，因兼具文人交誼互動、廣義的社會教化，與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等多重功能交錯之下，反在日治時期大量興起。詩社雖不是正式的教育機構，卻發揮了廣義的教育功能，因此為了完整地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成效，就不可忽略傳統詩社的重要性。雖然日治時期全臺各地皆有詩社興起，設立的族群不分閩客，但配合本研究範圍，以下將分別介紹桃竹苗地區以客家文人為主或為主要參與成員的詩社。

由於詩社屬於民間自發性的團體，除了少數較大較正式的詩社有明顯的紀錄外，一般地方性的詩社，成員地位較不顯赫，有些又兼書房師生傳承，或是各詩社間常互有來往一同聯吟或徵詩的特性，並常興廢不時，雖然在成立時多會舉行成立儀式，但是並沒有正式的文件紀錄或向任何機關登記何時創社，因此創社的時間則有賴當時的報紙、遺留的詩稿或傳承耆老的口述才能得知，造成後人在研究各詩社創立的時間時，往往眾說紛云。

就如清初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書中的小姐、公子於家族集會時也要即

興一首，甚至也組詩社，²⁶⁴雖然此種家族中的聯吟集會是小說中的橋段，但也可見到了清代吟詩作對之風氣盛行於民間，這樣的風氣自然同時也影響到追求功名科舉的臺灣。雖一旦政權易主，科考無門，仍有士人遠渡海峽參與大陸的科舉考試或試圖捐官²⁶⁵，由此可見讀書人讀漢書養成的習慣未可一日而改，再加上日本殖民政府初期也未禁絕詩會，甚至想以此拉攏讀書人，於是聚會聯吟之風乃延續下來，而遇到好的聯吟作品也會想要抄寫保存。後人只能從其留傳下來的文稿推知有該吟社的存在，至於確切成立於何時，實不可考。

光緒 21 年(1895)，日治之後，臺灣文人科舉功名路斷，多有藉詩酒消愁者，而日本殖民政府為拉攏士人也未禁止，甚至還鼓勵之，在多重因素下，臺灣詩社乃蓬勃發展。²⁶⁶依連橫 1921 年所述，當時全臺詩社有 66 所；²⁶⁷《臺灣省通志稿》則記 1936 年時，全臺有超過 180 個詩社；²⁶⁸今人王文顏的研究則指出，整個日治時期全臺相繼成立的詩社多達 278 個。²⁶⁹由於詩社之興起本是士人交誼、文酒之會的產物，到了日治時期才多了振興漢學的目的。²⁷⁰因此常興廢不時，士人又常參與各地詩社的徵詩活動，或同一詩社的社員又另組詩社等，除了少數詩社有正式組織外，實在難以計算各社的會員人數。常見同一詩人，參與各地詩社徵詩活動。以附錄七日治時期桃竹苗詩社整理，即可得知。既然詩社是非正式的組織，現有資料又有查核的困難，因此實際的詩社數目實難確定。筆者只能將前人研究桃竹苗地區詩社的結果加以整理，發現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就曾出現 56 個詩社²⁷¹，依組成的地方與參與成員，又可分成閩、客籍，但是彼此之間常有酬唱、交誼，若是開放的徵詩活動，投稿者更是來自全臺各地。

以下將分成桃園、新竹、苗栗等三個地區，來介紹日治時期客家籍文人所設立的幾個詩社。最後，並介紹跨區、跨閩客的詩社聯吟活動。

壹、桃園地區的詩社

本節將先介紹桃園地區詩社的分布、創立情形，再舉南桃園最大的客籍詩社--以文吟社為例，說明之。

一、概況

²⁶⁴ 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等。

²⁶⁵ 2012 年 2 月 27 日訪黃卓權，該處藏有宣統元年（1909）客家人至戶部捐監生的證明，當時日本已統治臺灣 24 年，渡海買一個在臺無用的功名目的為何？只能說科舉功名之夢深入臺灣的漢人社會。

²⁶⁶ 林柏燕：《陶社詩集》（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1 年），〈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6-7。

²⁶⁷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附錄四〈臺灣詩社記〉。

²⁶⁸ 臺灣省文獻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22 冊），〈卷六學藝志文學篇〉，頁 29-31。

²⁶⁹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頁 65。

²⁷⁰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215，以文吟社興起之因，及創社社長吳榮棣傳承漢文之使命感。

²⁷¹ 詳見附錄七日治時期桃竹苗詩社整理。依前人研究結果發現桃園詩社共 23 個，新竹詩社 22 個，苗栗詩社 12 個，加總共 57 個，但扣除創立在龍潭庄，後移到關西庄的陶社，總共是 56 個。

日治時代桃園地區的詩社依陳欣慧的研究，可以依族群分布特性，分成北閩南客二大區。整理她的研究則發現：共有北桃園閩南族群為主的詩社 13 個，南桃園客家族群為主的詩社 10 個。²⁷²而南桃園地區屬客籍文人的詩社，主要分布在中壢郡的中壢街、平鎮庄、楊梅庄、新屋庄、觀音庄，及大溪郡的龍潭庄等 6 庄(詳見第二章)。其中只有中壢街、龍潭庄與楊梅庄 3 地曾有詩社。龍潭地區最早，先後設有龍潭吟社、陶社²⁷³、龍潭詩社等 3 個；中壢街最多，以以文吟社為核心，及其下社員為聚會之便另創的瑤玉吟社、藻社、鳳社、崑崙吟社等 4 社，又加一個昭和 17 年(1942)五社重組之大東吟社等，共 6 個；還有一個在楊梅庄，即楊梅昭和吟社，²⁷⁴請見附錄七桃園詩社部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組織成員最多、運作最興盛者為「以文吟社」。在日治時期出刊的《臺灣日日新報》的報紙中，可以查到相當多以文吟社的詩作，足以證明其興盛的情況。²⁷⁵以下將舉以文吟社為例，並兼論其相關的詩社、活動、詩人等。

二、以文吟社

以下將分成創立、成員、運作與轉折等四部分說明，以瞭解以文吟社的概況。

(一)創立

大正元年(1912)吳榮棣邀區内生員邱兆基、張燮威，宿儒楊星庭、梁盛文、古道興、劉汶青、古炳、劉世富、古清雲等作文酒之會，後有彭祝堂、賴連玉、黃鏡林、陳保梁、黃容光、許阿斗、黃德顏等參加，遂有創社之議。²⁷⁶但不知何故，真正的成立要到大正 10 年(1921) 中秋，吳榮棣為社長，其高足朱傳明為副社長，除原有會員外，更有吳鴻森、古少泉、黃坤松、蕭林石、徐代清等參加，當時有社員 34 人。²⁷⁷後來因每次例會與不同詩社聯吟，每次參與的人數皆不同，但總有數十人之多。

以文吟社得以創設的關鍵及第一任社長，是生員出身的吳榮棣。吳榮棣(字少青)原籍福建汀州，祖父以經商來臺，家住中壢，榮棣「棄牙籌而讀書」，為清光緒壬辰(1892)科秀才，設塾於家當地學子其培育。²⁷⁸日治時期，明治 30 年授佩紳章，明治 32 年(1899)任中公壢公學校教師，至明治 42 年(1909)辭職。

²⁷²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67-124，頁 125-137，頁 214-227。筆者將昭和 17 年(1942)，以文吟社為因應殖民政府要求，將原本與其相關的四個詩社重組成的「大東吟社」也列入，較陳欣慧指出全桃園共 22 個詩社多 1 個。

²⁷³ 陶社原於 1916 年創立於龍潭，於 1930 年之後遷移至關西，因此在統計上會重複，但除社長邱世濬外，參與成員多所變動，因此在桃園、新竹詩社各算 1 次。類似這樣變動的情況，也是造成後人研究的困擾之一。

²⁷⁴ 桃園詩社整研究整理最佳者為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的碩士論文，內容蒐集相關完整。

²⁷⁵ 用「以文吟社」為關鍵字，查核「日治時期臺灣資料全文影像系統」中的《臺灣日日新報》，共得出 39 筆資料，出現內容多以詩文、例會活動等為主。

²⁷⁶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15。

²⁷⁷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15。

²⁷⁸ 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學藝篇〉，頁 330；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11。吳榮棣為吳鴻森、吳鴻麟之父，吳伯雄之祖。

²⁷⁹但仍設補習夜班於私宅，傳習漢文，晚年家居復設「漱芳書社」，授讀經史，後因政府厲禁而中止。²⁸⁰常語門人曰：「日人禁吾習漢文，是欲消滅吾祖國之文化。而如何保持祖國之文化，以待臺灣之重光？則凡吾士子俱有責焉」。²⁸¹因於大正 11 年（1922）與高足朱傳明創立「以文吟社」，以讀國學之掩護，俾士子沉吟轉思，激發其故國念之。²⁸²他除了常擔任以文吟社的詞宗²⁸³外，也曾擔任新埔大新吟社的詞宗²⁸⁴。

(二)成員

以文吟社的主要社員大多有親戚、師生或地緣關係。親戚關係如下：吳榮棣與吳鴻森、吳鴻爐、吳鴻麟等是父子；梁盛文、梁廷偉是父子；方仰成、方石松是父子；朱傳明、朱傳甲是兄弟。²⁸⁵至於師生關係，最明顯的即是由吳榮棣、朱傳明師徒，及其第三代的學生黃坤松、古少泉、劉夢梅、徐碧芬等為代表。²⁸⁶至於地緣關係上，參與者以中壢地區佔一半以上，其他則來自平鎮、龍潭、楊梅、湖口、竹東、橫山等地，²⁸⁷該處皆為客家人聚居之地，可見參與成員皆以客家人為多（詳見第二章）。

此外，陳欣慧整理出以文吟社社員，約有 120 多位詩人曾參與以文吟社的社務活動，社員的職業，以教職、公職、商業、醫事與報業者為多，其中曾任教職者，有彭鏡泉、鄧庚熙、劉慶安、朱傳明、鄭步青、楊星亭、吳鴻麟、古道興、黃慶常、黃阿河、林添奎、張添慶、李水文與吳榮棣等，²⁸⁸其中古炳、鄭步青、楊星亭、吳榮棣等，不但是塾師也是公學校教師。²⁸⁹其他教職兼公職、商業等亦有，不多細述。

(三)運作

詩社的運作情形，從當時報紙刊載的情形，可略窺知一二，今引《臺灣日日新報》為例。以文吟社的作品，最早於大正 13 年(1924)6 月 13 日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上，登載有〈春情七絕〉3 首，當時的左詞宗為鄭永南，右詞

²⁷⁹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11。

²⁸⁰ 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學藝篇〉，頁 330。

²⁸¹ 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學藝篇〉，頁 330。

²⁸² 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學藝篇〉，頁 330。

²⁸³ 所謂詞宗，即指詩社聯吟時，為了評斷優劣，在定好詩題與形式後，聘請較資深擅長漢詩者擔任品評等地的工作，即今所謂的評審。一般皆請二位，一位稱為「左詞宗」，另一位為「右詞宗」，有時一位亦可。

²⁸⁴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505，與鄧廣熙擔任「四知臺」詩題的左右詞宗。查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學藝篇〉，頁 329-330，2 人皆為晚清的生員。

²⁸⁵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6。

²⁸⁶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6。

²⁸⁷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6。

²⁸⁸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5。

²⁸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397、400、401。

宗為邱世濬。²⁹⁰鄭永南為桃園吟社發起人之一，時為桃園吟社社長；²⁹¹右詞宗則為後來創立陶社，並任社長的邱世濬。到了大正 13 年(1924)10 月 27 日，同報登載以文吟社擊鉢例會的消息。該次例會由黃立枝、黃榮等，借車站前和泰米商廣間為場所，柬邀其他詩社社友參加，與會者 6 名，合計該社會員共 20 多名，以觀音竹為題，七絕齊韻，得詩 60 餘首，由式垣、少青(吳榮棣字)擔任詞宗，選出前 10 名，由值東贈禮，最後並至鼎興樓旗亭晚餐，至晚上 8 點才散會。²⁹²

大正 14 年(1925)，亦有 2 次例會活動的紀錄。其中一次，由劉慶安、黃阿傑值東，邀請八塊二隣社，共同聯吟於中壢車站前黃坤記樓上，共有 50 餘名參加，共得詩 150 餘首。詩題有二，各由二位詞宗評選：一為黃坤記樓即景，由葉連三、黃阿榮評；二為體育，由吳榮棣、黃德顏評，當晚 7 點飲宴，晚上 10 點才發布名次。²⁹³以後每年出現的例會報導尚多，不再一一舉例。由其例會活動的報導可知，通常由下午進行到晚上，並且可能邀約其他詩社的社友參加，每次例會的人數都不固定。

同年 10 月，以文吟社創立二週年時，借用中壢公學校召開祝賀會，場面可謂相當隆重。大正 14 年(1926)10 月 25 日午後 1 時，於中壢公學校舉行，會場外轅門國旗招展，橫額大書「大文蔚起」，會場內裝飾萬國旗，來賓有衛藤郡守，松隈、井上二課長，及學界紳商、各地詩人等，共百數十人，並以煙火三發開場。除了由社長吳榮棣述開會辭外，衛藤郡守也上臺道賀，並有其他詩社代表鄭養齋、簡若川、葉連三等上臺祝賀，最後並攝影留念。²⁹⁴上述報導，除了場面盛大外，也可發現以文吟社的政商關係相當良好，並與其他的詩社互相交誼，例如：簡若川曾任桃園廳埔子區區長，時為桃園吟社副社長；²⁹⁵葉連三當時為東興吟社社長，也是八塊庄庄長。²⁹⁶前述這兩位都曾參與桃園吟社前身瀛東小社的活動²⁹⁷，也一同參與桃園吟社的活動。²⁹⁸總之，這兩位都屬於北桃園閩籍詩社的大將，卻都參與以文吟社的開社二週年紀念，並成與會的重要來賓。可見桃園地區的閩客籍詩社的成立，只是以地緣關係就近組成而已，並不以族群為考量。

(四)轉折

以文吟社創立之後，也有開會時間未定、社員區域遼闊聚會不便等困擾，於

²⁹⁰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8646 號，大正 13 年 6 月 11 日，第 4 版。

²⁹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29、131。

²⁹²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8784 號，大正 13 年 10 月 27 日，第 4 版。此處其他詩社名，字跡模糊難辨。

²⁹³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9017 號，大正 14 年 6 月 17 日，第 4 版。

²⁹⁴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9152 號，大正 14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²⁹⁵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29、131。

²⁹⁶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73。

²⁹⁷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27。

²⁹⁸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29、133。

是昭和 5 年(1930) 社員梁盛文、劉世富、古清雲等，便另創瑳玉吟社，每月開擊鉢吟會一次。²⁹⁹影響區內有名私塾，亦紛紛設立詩社。以下的 4 個詩社，都是由原以文吟社的社員，在擔任塾師時，另組的詩社，如：後寮有朱傳明(字曉庵)主持的藻社、過嶺有許阿斗(字耀南)主持的鳳社、大崙有黃德顏主持的崑崙詩社等，可謂盛極一時。³⁰⁰但是到了昭和 12 年(1937)皇民化運動後，日人嚴禁漢學文化的傳布，暫停詩社活動，以文吟社也暫停，但到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成立大東亞共榮圈，始鼓勵詩社復吟，並下令區內各詩社予以統合，當時以文吟社即合併區內的瑳玉吟社、藻社、鳳社、崑崙詩社等，易名為「大東詩社」。³⁰¹由以上以文吟社與其他相關詩社的成立可知，即使社員另立詩社，但並未脫離原詩社活動。以朱傳明而言，不但是吳榮棣的門生，更是創社時的副社長，且創立藻社之後，仍參與以文吟社的活動，並在之後繼任為以文吟社社長。³⁰²像這樣一個詩人兼多個詩社身分的例子很多，更不用說詩人常頻繁參與各地徵詩活動，都會造成後人在分析詩社社員時的困擾。

這些詩社的分分合合，原有的社員轉組新詩社等，以文吟社並非特例。以北桃園最大的閩籍詩社桃園吟社而言，即是由詠霓吟社、瀛東小社，改組而來。³⁰³可見北桃園的閩籍詩社也是如此，而苗栗最大的詩社--栗社，也是從天香吟社演變而來(詳見第三節苗栗詩社)。

三、跨社詩人的代表--邱世濬

邱世濬是日治時期相當活躍的詩人，不但參與北桃園閩籍詩社的活動，也參加南桃園客籍詩社的活動，最後甘脆創立陶社。³⁰⁴邱世濬是龍潭的客家人，卻也在以文吟社創立初期擔任詞宗³⁰⁵。因為在更早期，邱氏即參與其他詩社的各項活動，且表現優異。如：明治 40 年(1907)，參加龍潭吟社「桃花源」徵詩活動掄元；³⁰⁶明治 42 年(1909)時，又參與南雅吟社的課題；³⁰⁷到了大正 2 年(1913)，又多次參與桃園吟社的活動。³⁰⁸龍潭吟社是南桃園客籍為主組成的詩社，而南雅吟社、桃園吟社則是北桃園相當有名，閩籍人為主組成的詩社。以邱世濬在日治早期活躍於桃園地區的身影可知，詩社雖以地緣關係組成，故有閩客族群之分，但是在實際活動參與上並不互斥，甚至還友好而相助之。所以當他曾在桃園各詩社

²⁹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17。

³⁰⁰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17。

³⁰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0。

³⁰²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15、217、224。

³⁰³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25-129。

³⁰⁴ 因為陶社創立於 1926 年，但 1930 年即遷移到關西，因此納入新竹詩社來介紹。

³⁰⁵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八千六百四十六號，大正 13 年 6 月 11 日，第四版。左詞宗字跡難辨。

³⁰⁶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02。

³⁰⁷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73。

³⁰⁸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30。陳欣慧因為邱世濬多次參與桃園吟社的活動即將他列入桃園吟社的一員。

如此活躍，從而受到肯定，應聘為以文吟社詞宗，自在情理之中。他也曾擔任新竹大新吟社與苗栗栗社等社的詞宗(詳見下文)。

既然邱世濬參與桃園各地詩社活動受到肯定，當他於大正 15 年(1926)於龍潭創立陶社之時，不但盛況空前，而且來賓中有 4 位是桃園地區其他詩社社長。當時他乘龍潭庄開品茶會的時機，借用龍元宮穀王廟為會場，舉辦創立大會。來賓中有吳榮棣、鄭永南、葉連三、呂傳琪等，並由吳榮棣、葉連三擔任左右詞宗。³⁰⁹吳榮棣時任以文吟社社長³¹⁰、鄭永南時為桃園吟社社長³¹¹、葉連三時為東興吟社社長³¹²、呂傳琪則為崁津吟社社長³¹³。以此次活動的參與者可知，就是啟動以後桃園地區五社聯吟的關鍵。

昭和 4 年(1929)時邱氏所組成的陶社也屢次參與桃園地區的五社聯吟活動，與中壢、大溪、桃園等地的以文吟社、崁津吟社、東興吟社、桃園吟社等詩社，共同聚會，舉辦五社聯吟，互相切磋詩文。³¹⁴到了昭和 5 年(1930)這些詩社舉行的第 4 回聯吟活動時，即由邱氏所籌組的陶社負責擔任主辦，並借用龍潭公學校作為聯吟的場地。³¹⁵在這次活動結束後，邱氏就將「陶社」遷至關西。³¹⁶由「陶社」的遷移活動可知，龍潭與關西雖然分屬兩個行政區，但自清朝起即交通相連，又同為客家人集居之地³¹⁷，因此「陶社」的遷移，並沒有很大的困難，卻使桃園與新竹兩地的詩社活動，產生了實質上的關聯。後來，又影響另一個客籍詩社的創立，即下文將出現的新埔「大新吟社」。「陶社」遷移到關西之後的發展與影響，詳見第二節新竹詩社部分。

貳、新竹地區的詩社

新竹地區的詩社發展淵源甚早，可推至清代，但是客籍詩社的興起主要受桃園地區詩社的影響，尤其「陶社」的遷移是關鍵。以下先介紹全區概況，再舉客籍詩社為例說明之。

一、概況

新竹地區的詩社在清咸豐年間由鄭用錫與林占梅兩大家族的興起，因文人集會創立了幾個詩社，當時主要集中於今日的市區，參與的人以閩籍男性為主。到了日治時期，文教的推廣如地區的發展般，慢慢由市區發展至今新竹縣的區域。

³⁰⁹ 《臺灣日日新報》，第九千四百九號，大正 15 年 7 月 14 日，第四版。

³¹⁰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224。

³¹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31。

³¹²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73。

³¹³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76-77。

³¹⁴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第 10561 號，昭和 4 年 9 月 11 日，第四版，〈桃園中壢大溪三郡五社聯吟大會〉。

³¹⁵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4 月 2 日，第 10761 號，第 4 版，〈五社聯吟盛〉。

³¹⁶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210。

³¹⁷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頁 159，1889 年 11 月 1 日記事，到龍潭埤(龍潭)去，這裡都是客家人，然後到鹹菜甕(關西)。

新竹縣的詩社多於昭和年間設置，屬於晚起且地方性的小詩社。³¹⁸據今人黃美娥的考察，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性質兼有師生切磋鼓舞學子學習漢詩和文人聯吟二種性質，在性質上與臺灣其他地區的詩社並無不同，前者如創於竹北的「來儀吟社」、「御寮吟社」和「鋤社」等，後者則如創於關西、新埔的「陶社」、「大新吟社」、「南瀛吟社」等。³¹⁹但二者之間很難截然二分，詩社的性質亦可能產生轉變，成員常常兼有亦師亦友的關係。例如「來儀吟社」、「御寮吟社」主要是由塾師曾秋濤為鼓舞漢學而創，而曾氏亦加入新竹市的「竹社」，³²⁰「鋤社」則由曾東農向曾秋濤問學後所主持，由原先的師生切磋，後來再加入新竹市其他詩社成員的吟詠後，轉變成文人聯誼社交的性質。³²¹至於「大新吟社」的首任社長藍華峰，不但先參加「陶社」，且在「陶社」內有 2 位得意門生陳旺回與吳錦來，³²²且兩社詩友之間常相唱和，因此在《大新吟社詩集》內，充滿「陶社」詩友的作品，甚至擔任詞宗等評審的角色，無法一一列舉。

這些地方性的小詩社，也因為成立地區與吟詠言語的不同，產生閩客籍不同詩社的現象，像詩社創立在竹北的「來儀吟社」、「御寮吟社」、「鋤社」等主要以閩籍成員為主，常與地緣相近，同操閩南語的新竹市文人聯吟；創立於關西、新埔地區的「陶社」、「大新吟社」、「南瀛吟社」，則以客籍成員為主。³²³雖然今人黃美娥認為語言的因素，對於當時詩社活動的進行，具有關鍵性的區隔作用。³²⁴但語言是否有絕對的區隔作用，筆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黃美娥認為「鋤社」所辦的活動尤其如此，以閩籍成員為主，但在詳閱《大新吟社詩集》時，發現早期收錄的內文中，第一回詩題「曝書」雖屬「陶社週年紀念吟會」，葉文樞即擔任左詞宗³²⁵，顯見葉文樞和陶社應頗有交誼或熟識，否則不太可能聘為左詞宗。陶社於昭和 2 年（1927）8 月的彩鳳橋徵詩，吸引了全臺不少文人投稿，到了 8 月 25 日截稿時，共有 600 多件，為了表示公平，關西當地的文人請來鹿港著名的文人陳沁園作為評審。³²⁶這回徵詩中也有葉文樞的身影，在徵詩作品的前 60 名中，葉文樞投了 3 首，分別得是第 2 名、第 8 名和第 20 名，³²⁷成績可謂相當出色。

到「大新吟社」成立之後，見到「鋤社」詩人葉文樞和郭茂松在昭和 4 年（1929）的新埔大橋徵詩活動名單中，葉文樞不但投了 5 首，首首前列，其中一首且掄元；

³¹⁸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3。

³¹⁹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3。

³²⁰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49-550。

³²¹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1,553。

³²² 林柏燕：〈關西陶社〉，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7-563。

³²³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3-554。

³²⁴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4。

³²⁵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14。

³²⁶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9 月 29 日，第 9851 號，第 4 版；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210。

³²⁷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21-29。該次徵詩啟事的作者為藍華峰，而藍氏於該次徵詩競賽也掄元。這也是為何該次徵詩啟事明明是陶社的活動，但其活動相關內容和所得之詩全收錄在《大新吟社詩集》的原因吧！這也可知當時的人，並未強調詩社間活動的區隔，反而樂於共襄盛舉。

³²⁸郭茂松的作品又出現在後來的「丹青」、「臘月立春」詩題中。³²⁹其中葉文樞的表現較佳，於是在昭和 10 年（1935）之後的詩集中，便見到葉文樞擔任「大新吟社」4 次詞宗的紀錄。³³⁰而且葉文樞也屢次擔任苗栗「栗社」的詞宗，和「南洲吟社」的詞宗。³³¹苗栗「栗社」成員閩客籍皆有，而「南洲吟社」則屬海線，閩籍參與人士較多。可見除非是聚首聯吟，否則以徵詩而言，是可以跨越地域與方言口語，只要是使用漢字即可。此外，各詩社在出題徵詩時，更是常向全臺開放的。³³²

其次，日本殖民政府初期為了拉攏臺灣的士紳並不反對漢詩，甚至有意推廣，如明治 29 年（1896）兒玉總督舉辦的「揚文會」，聲勢浩大，掄元得獎者，可以上座，享殊榮。³³³而日本人也能做漢詩，甚至加入臺灣詩社，如昭和 7 年（1932）神戶「心聲吟社」向全臺徵詩，課題是昭和天皇頒的，叫「敕題」，題目「曉雞聲」，³³⁴當時新竹縣的得獎者即有羅慶進（第 5 名，關西陶社）、盧如玉（第 28 名，大新吟社）、陳盛國（第 40 名，陶社）、郭茂松（第 45 名，新竹）、吳壽堂（第 50 名，新竹）、郭江波（第 54 名，新竹）、蘇汝岩（第 60 名，新竹）。³³⁵由於漢詩多用方言吟詠，而依其所屬詩社與地區，可知前 3 人較可能用客語吟漢詩，後 4 人居住在新竹市區則較可能用閩南語吟漢詩。由於漢詩保留了漢字聯對吟詠之美，即使用口語不同，仍能跨越和、漢和閩、客語族群的。

新竹地區的詩社，早在清朝統治時即為因應文人之間的交遊而產生，但在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地方性詩社，顯然較其他地方較晚成立，以下舉關西的陶社、新埔的大新吟社和關西的南瀛吟社為例。

二、陶社

（一）創立

陶社於大正 15 年（1926）的五月節³³⁶邱世濬（字筱園）首創在龍潭，於昭

³²⁸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頁 551-552，將葉文樞、郭茂松列為鋤社吟友；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75-79，詩題-新埔大橋。至於如何判定此葉文樞即是鋤社的葉文樞，乃因在新埔大橋的徵詩中，皆記有籍貫，葉文樞的籍貫為「新竹」，此時的「新竹」即指市區而言為閩籍人聚居之處，與新埔、關西客人聚居之地相對。而此人葉文樞又擅長且熱衷於參與徵詩活動，因此大膽推測其為「鋤社」之葉文樞。下文的郭茂松亦秉此理。

³²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103、182。郭茂松的籍貫也記為「新竹」即指市區，而非客家人聚居的新埔、關西等地。

³³⁰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387、431、439、495，葉文樞擔任 4 次詞宗，後 2 次為左詞宗。

³³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1），頁 216、221。

³³² 詳見《大新吟社詩集》、《陶社詩集》中收錄的各詩題。

³³³ 林柏燕：《陶社詩集》（新竹縣：竹縣文化局，2001 年），〈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8。

³³⁴ 當時日本佔領東北，建立滿洲國，中日關係惡化，而此題乃來自日本神話中的天照大神，為開國之神，出現之時必有公雞長鳴，旭光普照以祈和平。

³³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7-8。

³³⁶ 客語用法，即指端午節，端午節為紀念屈原又稱詩人節。

和 5 年（1930），遷址於關西。³³⁷陶社遷址到關西的可能原因有三：一為曾任龍潭郵便局局長的沈火，曾對陶社扶掖甚深，於該年調到關西郵便局任局長；二為關西熱中詩文活動的文人相當多，包括陳旺回、徐開祿、吳錦來、羅享彩；三為由羅璧玉獨資興建的關西公學堂，並將之捐給庄役場，成為當地公要的公共活動空間等。³³⁸

陶社遷到關西後，依據之前即有跨社聯吟之例，至此時更為興盛，與新竹地區的詩社辦理更盛大的聯吟盛會，如：昭和 6 年(1931)由新竹鄭家所組成的竹社，主辦全島詩社大會，這時幾乎全新竹州的詩社都參與協辦，陶社也是其中之一。³³⁹此後陶社不僅持續參與桃園地區的五社聯吟³⁴⁰，也與新埔的大新吟社持續交流，因其主要成員為陳旺回、吳錦來，與大新吟社社長藍華峰有生師之誼。³⁴¹到了昭和 9 年(1934)時，陶社也參與大溪公會堂處舉行的竹北聯吟大會。³⁴²次年(1935)，陶社即於關西公會堂主辦竹北聯吟大會。³⁴³由此可見，邱世濬個人的成就與活動經歷，是日治時期陶社得以興盛，且跨社辦理各項聯吟大會的關鍵。再配合上關西當地文人對詩文活動的熱心與參與，終使一個關西偏鄉的詩人得以參與並主辦五社聯吟的活動，甚至參與全島詩人聯吟大會，其功不可沒。

昭和 17 年（1942）後，則陶社由第二任社長沈火(字梅岩)接任。³⁴⁴其間曾與新埔之大新吟社、湖口的同光吟社聯吟，但中日戰爭時，臺灣詩社普遍解散，大新、同光兩社未再恢復，僅陶社於光復後重生。³⁴⁵

日治時期的陶社詩作保存並不完整者，靠後人抄錄保存了 44 個詩題，就今人林柏燕考證並整理當屬於昭和 4 到 6 年（1929-31）間的作品，多為聚會擊鉢所作，其中昭和 5、6 年（1930-1931），初移至關西時的詩題作品較有詳記年月日，³⁴⁶而且訂定「每週召開吟會，名土曜吟」³⁴⁷，就所錄詩集，有的只間隔 2 日就有新的詩題出現，也有間隔了 2、3 個月沒有詩題。³⁴⁸這樣的情形，主要跟作品被保留的情況有關；也可能跟詩人間除了固定集會擊鉢之外，尚有徵詩及聯誼活動

³³⁷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0。自大正 13 年（1924）創設後，至今仍吟詠不絕。

³³⁸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105。

³³⁹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3 月 4 日，第 11095 號，第 4 版，〈全島詩社大會〉。

³⁴⁰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11 月 9 日，第 11706 號，第 4 版，〈桃園聯吟會盛況〉。

³⁴¹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0。

³⁴²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9 月 29 日，第 12389 號，〈竹北聯吟大會盛開於大溪公會堂〉。

³⁴³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210-211。

³⁴⁴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0-11。沈梅岩自昭和 17 年(1942)至民國 58 年（1969）去世，共任社長 27 年之久。沈氏為關西郵局局長，屬地方名紳。第三任社長為羅享彩（1969-1979 去世）、第四任為劉錦傳（1979-1987）、第五任魏雪欽（1987-2000）、第六任徐慶松（2000-2011），後改登記為關西陶社詩會，今社長為江穎川。

³⁴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0-11。

³⁴⁶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27-226，收錄昭和年間的詩作。

³⁴⁷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70，附錄，〈陶社大事記〉。

³⁴⁸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27-226。

有關。若詳細統計陶社目前所留昭和 4 到 6 年（1929-31）年間的作品，可以發現七言絕句最多，共有 786 首，五言律詩次之，有 158 首，七言律詩則有 141 首，總共有 1,085 首。³⁴⁹這樣的情況和其他臺灣同時期的詩社以七言絕句為多的情況大致相同，³⁵⁰而且律詩也開始大量出現。另外，陶社詩人的作品，也被保留在頗有交誼的新埔大新吟社中，今由大新吟社成員的後人保存詩集原稿所出版的《大新吟社詩集》³⁵¹中，尚可見到許多陶社的詩作，可補《陶社詩集》的不足。

(二) 成員

日治時期陶社主將有徐開祿、黃德洋、陳旺回、吳錦來等，其中陳旺回、吳錦來是新埔秀才藍華峰的得意門生，藍氏於昭和 3 年（1928）於新埔另創大新吟社。³⁵²其中，徐開祿是晚清秀才，自辦私塾教學，次子徐秋旺，亦加入陶社，常代父教漢學；黃德洋除了開茶工廠外，亦兼教漢書，³⁵³可見參與詩社的人，因為重視或有受過中國傳統式教育，多兼任書房教學以傳承。另外，葉步戡頗有文才，但三餐不繼，只能側身於葉氏家廟當「香公伯」，後轉至鎮公所當職員。³⁵⁴總之，這些人在日治時期地位並不顯赫，也未被授與紳章，頂多如羅阿麟擔任保正一職，此時的成員也大多年輕，因此未任要職。³⁵⁵此外，日治後期陶社已有許多受過公學校教育者參加，以石光公學校為例，即有第 1 屆畢業生呂阿全（字岳三）、第 2 屆畢業生劉碧嵐等，不但參與陶社活動，本身即是公學校教師；第 4 屆的陳双祿於留日後回國，於關西開設有田醫院，即以「有田」為名參與陶社的活動。³⁵⁶另外，筆者核對陶社詩人與關西公學校畢業名冊後，也發現陳昌宏、徐秋旺為關西公學校第 10 屆、黃士榮為關西第 12 屆、羅享彩為第 14 屆、陳濟昌為第 17 屆等。³⁵⁷

³⁴⁹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27-226。

³⁵⁰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207，他分析詩論時，提到擔任栗社 26 回右詞宗王了庵的總評，王了庵認為「絕詩難於律詩，而五言絕尤難於七言絕。……擊鉢吟當以七絕最為得體，五言律次之，五絕似不必學也」，王了庵的評論非常符合陶社詩作詩量上的分析。王幼華並提出七絕為臺灣擊鉢吟最過合，最主要的作品，是眾所公認的事實；而五絕之作非常少，依徵詩題目要作好十分困難，較不靠知識，較需才情。

³⁵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大新吟社的詩集原稿，由創社時的副社長林孔昭的嫡孫林明瑜所提供。

³⁵²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0。

³⁵³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本名一覽表〉。其中各位成員的事蹟，依職業、名稱等判斷多為光復後，可見參與者在日治時，多數年輕，因此方能延續吟詠至光復後。

³⁵⁴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1。「香公伯」是客語的稱法，即廟公；「役場」即今鎮公所。光復後臺大醫院聘為葉步戡為漢文講師，並中醫特考第一名，後以中醫為業。第三任、第五任陶社社長羅享彩、魏雪欽皆是他的得意門生。

³⁵⁵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8-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本名一覽表〉。這些陶社成員在日治時尚年輕，在光復後，成為關西茶業、礦業、學校等各級產業或地方上基層的行政人員。

³⁵⁶ 江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及升學情況〉，頁 2、4、7，收於葉文法、王文俊主編（2013）：《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附件。

³⁵⁷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568-569，附錄〈日據時代陶社詩本名一覽表〉，陳昌宏光復後曾任關西鎮祕書、徐秋旺為徐開祿次子，常代父教漢學、黃士榮為石光創校功臣黃南琚之獨子，光復後首任關西鎮長、羅享彩光復後第二任關西鎮長、陶社社長、陳濟昌則為旺回的長子，曾留學中國上海，亦曾任東成煤礦董事長等；陳南宏、戴玉蘭總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

可見在日治時期陶社成員地位重要者不多，有些也有受日式的學校教育，直到光復後，卻能在地方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大新吟社

(一)創立

關於大新吟社的創立，今人有不同的主張。如黃美娥在〈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一文中，即討論研究者對大新吟社成立的爭論，其中王文顏、廖雪蘭、賴子清等認為成立於昭和9年(1934)，但黃旺成編的《新竹縣志·藝文志》、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則載為昭和2年(1927)，最後黃美娥引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對新埔大新吟社的報導，推定該社創立的時間應為昭和3年(1928)。³⁵⁸後來經林柏燕蒐集整理《大新吟社詩集》〈序〉中，則更詳細依現存聯吟詩題作品而推論在昭和3年(1928)之前，「大新吟社」的成員與「陶社」的詩人已有「曝書」、「彩鳳橋」、「市隱」、「秋雁」等聯吟的詩題留存，其中「祝大新吟社成立」的聯吟大會，則遲至昭和4年(1929)才舉行，並言及「經過一年多，大新吟社已成氣候，於是回全臺徵詩」³⁵⁹，可得知大新吟社創社的概況。後文並說關西陶社成立於昭和5年(1930)，比大新晚了2年，可見林氏也同意大新吟社成立於昭和3年(1928)的推論。³⁶⁰林氏於後來編成《陶社詩集》序言中，明指「藍華峰則於昭和4年，在新埔另創『大新吟社』」。³⁶¹令人讀來難免產生混淆，可見由於詩社屬私人間共同愛好者集會的性質，很難明確指出創立於何時。但為了說明清楚我們只能依照目前可見的詩集作品及其相關紀錄來推論。

首先，依林柏燕採集的《大新吟社詩集》作品可推知，較早的詩題「曝書」和「彩鳳橋」作於昭和2年(1927)，³⁶²難怪黃旺成編的《新竹縣志·藝文志》和廖漢臣《臺灣文學年表》皆載大新吟社創社於昭和2年(1927)。但若仔細推敲，則此時間似乎不宜推為創社之時，因為收錄於《大新吟社詩集》最早的詩題雖為昭和2年(1927)7月3日的「曝書」，但此詩副題為「陶社週年紀念吟會」，³⁶³可見此時應尚未有大新吟社之名，而屬新埔文人與龍潭、關西等地的陶社詩人聯吟之作。至於作於昭和2年(1927)8月的「彩鳳橋」，則明言是陶社的徵詩之作，且彩鳳橋建成於昭和2年(1927)春，是有名的關西八景之一，當時交卷寄送至「新竹郡關西庄關西陳旺回收」，³⁶⁴可見此詩題仍應列為陶社作品。至於第三個詩題「市隱」成於昭和3年(1928)11月7日，可是聯吟地點註明在「關西太和宮」，³⁶⁵由地點推論，此詩題也當列為陶社之作。

週年特刊》，頁172、173。

³⁵⁸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547-548。

³⁵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11。

³⁶⁰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11。

³⁶¹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10。

³⁶²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14、21。

³⁶³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14。

³⁶⁴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21-23。

³⁶⁵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30。

至於真正舉行成立大會而見報的「新柑」詩題，則出現於昭和3年（1928）12月9日，且依《臺灣日日新報》之報載：

新竹郡下關西大茅埔及新埔，曾聯絡大溪郡龍潭之文士，組織陶吟社詩會，今同新埔大茅埔同好者分離，由陶吟社另經組織大新吟社。去九日午前十時，在新埔文昌廟內，舉發會式。出席者由新埔、關西、龍潭、楊梅等到者三十五名，選舉役員，投票結果，選定社長藍華峰氏，副社長詹文光、林孔昭兩氏，幹事楊成泉、張桂材、吳明相三氏，顧問潘成瑞、葉心榮兩氏。正午閉會，中餐後，開擊鉢吟，以『新柑』（新埔密柑）為題，七絕韻限十五刪，詞宗選評發表後，至五時散會。³⁶⁶

綜合詩集所錄與報紙報導，可見當時大新吟社的成員正式與陶社分離而於新埔聯吟，乃為昭和3年（1928）以後的事，因此大新吟社正式創社應以昭和3年（1928）較合理。而於次年1月4日，乃有以「祝大新吟社成立」的詩題向全國進行徵詩，此次聯吟地點不在新埔文昌祠，改在新埔庄鹿鳴坑幹事楊成泉的家。³⁶⁷

由以上資料可知，詩社創立的時間為何會眾說紛云，最主要仍是因為詩社乃私人間的興趣集會，且其成員有彈性，有興趣、能力者皆可參與，因此造成後世研究者的困擾。最後依《臺灣日日新報》與《大新吟社詩集》的作品紀錄可推知，大新吟社真正創立於昭和3年（1928）年底。臺灣所有詩社，在太平洋戰爭，皇民化期間，全部息吟停鉢，禁止人民集會，故大新吟社即於昭和12年（1937）結束，戰後未再恢復。³⁶⁸

（二）成員

但若細究大新吟社成立後參與的聯吟詩人，來自臺灣各地皆有，關西陶社的邱筱園、陳旺回、陳昌宏、徐開祿等人也常參與聯吟，³⁶⁹不但昭和3年（1928）創設的「新柑」詩題有關西陶社的詩友參加，其中每一篇也都常見，無法一一列舉。在《大新吟社詩集》最後一篇「四知臺」中，半數為陶社詩人、半數為大新吟社詩人的作品，並請到有功名的士人芎林的鄧賡熙³⁷⁰和中壢的吳榮棣兩位秀才來擔任左右詞宗。³⁷¹其中邱世濬尚擔任大新吟社成立時的「新柑」詩題的右詞宗；

³⁶⁶ 轉引自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567，昭和3年12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2094號（原文放大）。

³⁶⁷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49-50，吟詩地點在新埔庄鹿鳴坑楊成泉宅，此次掄元者為吳建田，即後來以日文創作聞名的吳濁流。

³⁶⁸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12。至今保留的詩集收錄從1927至1937年，全書共有89卷，1至68卷詳列年代，結束年代乃林柏燕依作者生平所判斷，認為不會超過昭和12年。

³⁶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41、44、45、46等「新柑」詩題的作者。

³⁷⁰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10。依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頁329，他是淡水廳學生員補廩生，曾在大溪、三坑仔、高原、觀音、平鎮等地，設帳授徒，晚年宴居平鎮。（其設帳及晚居之地，皆在今桃園縣）

³⁷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506，最後一篇收錄的詩題是「四知臺」，描寫的是關西「四知

昭和 4 年 (1929) 6 月 20 日大新吟社在張桂材處聯吟的詩題「清和節」，其左、右詞宗分別為邱筱園、陳旺回；³⁷²同年 11 月的詩題「蚌珠」則明註「此卷為陶社詩人所作」³⁷³等等，陶社詩人的詩作，卻保存在大新吟社的作品集中，由此可見大新吟社和陶社詩人之間的友好關係。故編者在編《大新吟社詩集》此書時尚云，可做「陶社」詩作的補充，由此可了解二社詩友之間關係的深厚。

其後續聯吟除了新埔地區之人，也常廣向社會大眾徵詩，如昭和 4 年 (1929) 的「劉寬」和「新埔大橋」詩題等³⁷⁴，均廣向大眾徵詩，並不限於一定要親自聯吟方可。

關於創社的社長藍華峰、副社長詹文光皆有秀才身分，但因日治斷了功名之路，前者遂成為新埔街中醫，詹氏則為五分埔富農。³⁷⁵依大正 5 年 (1916) 日本官方出版的《臺灣列紳傳》所錄，藍華峰祖籍廣東省潮州，光緒壬辰年 (1892) 秀才，明治 30 年 (1897) 授佩紳章，後入於杏林，復傳名聲，當時為新埔醫生會長，資產約 4 千，德望最高，年今 45。³⁷⁶可見藍氏原本有心於功名，可惜光緒臺地改隸，不得已只得轉以行漢醫糊口，在地方上應頗有名望，方被列入。

其他如吳明相、楊成泉、陳新龍、張桂良、詹氏金英，皆曾任塾師。³⁷⁷任公學校教師者有：吳建田(即吳濁流)³⁷⁸、蔡阿進(號普雲)、羅雲清等。³⁷⁹葉心榮³⁸⁰為新埔庄長，其餘曾蘭芳³⁸¹、潘欽龍³⁸²、謝盛長，皆在鎮公所任職。³⁸³這些成員雖非聲名顯赫之輩，但在地方上皆是受過教育或小有資產之人。

由於書中只要記錄到女性時，都會在姓氏之下加個「氏」字，因此有利於性

臺」古跡，「四知」出自東漢刺史楊震的故事：昌邑令王密，半夜送十金予楊震，云：「幕夜無知者」，楊斥之「天佑、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者」，該篇半數也多為陶社詩友的作品。

³⁷²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115。

³⁷³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131。

³⁷⁴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63、75。

³⁷⁵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

³⁷⁶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141。

³⁷⁷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另據《新埔鎮誌》〈教育誌〉，頁 322-323，吳明相任教於照門「學古書房」、楊成泉任教於鹿鳴坑「啓化書房」、陳新龍任教於枋寮義民廟、張桂良任教於文昌祠「文明書院」、詹氏金英任教於五分埔老學堂。

³⁷⁸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226，吳建田與詹金英為新埔公學第 14 屆畢業生，畢業於 1916 年 3 月。

³⁷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光復後，蔡、羅皆任小學校長至退休。

³⁸⁰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編：《新埔鎮誌》〈人物誌〉，頁 463-464，光緒 7 年 (1881) 生於照門農家子弟幼聰慧，17 歲時畢業於新竹國語傳習所甲科，成績優異，7 月即任職新埔辦務署，明治 33 年轉任三角湧 (三峽) 辦務署，34 年派至桃園廳，38 年任命桃園通譯，42 年囑託以農會事務，大正 8 年轉新竹州郡役所服勤兼通譯，大正 12 年授以勳八等勳章，同時任命為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乙種試驗委員，13 年 6 月任命為地方學習會講師，7 月辭去所有本官兼官，專心任新埔庄長，至昭和 9 年積勞逝於任內。

³⁸¹ 編輯小組(1998)，《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頁 225，曾蘭芳為新埔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1902 年 3 月畢業。頁 33，光復後新埔國小第一任家長會會長。

³⁸²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編：《新埔鎮誌》〈人物誌〉，頁 471，大正 3 年畢業於新埔公學校，大正 8 年畢業於臺中中學，11 年任新埔庄書記，昭和 2 年任新埔庄協議會副會長，任新埔青年團團長等，光復後民國 40 年榮任第一屆新埔民選鎮長。

³⁸³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3，光復後，曾、潘皆曾任鎮長，詹阿福為攝影師、余成山在市場開雜貨店。

別的分辨，雖然女性參與吟詩的人數與次數不多，但若與日治時期的陶社詩集中只出現 3 位女詩人的作品相比，則大新吟社前後共出現 7 位女詩人的作品，不可謂不多，其中詹金英的作品則分別收錄在陶社與大新吟社的詩集中。³⁸⁴詹金英因為家學淵源，曾繼任其父詹際清任五分埔老學堂塾師，素有才女之稱，後入佛門。³⁸⁵而且她也是新埔公學校第 14 屆的畢業生，與吳建田同一屆。³⁸⁶由此可見，日治時期的女性，不但可入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在傳統的書房教育或詩社中，亦開始展露頭角。

在日治時代，新埔詩人曾分兩路：一是參加苗栗的「栗社」，如林孔昭、吳濁流³⁸⁷，一是參加桃園的「陶社」，如藍華峰等，而陶社於大正 15 年（1926）初創於龍潭，時龍潭屬桃園郡（今桃園縣），至昭和 5 年（1930）始移址關西。³⁸⁸昭和 3 年（1928）藍華峰、林孔昭、葉心榮等在新埔另創「大新吟社」，新埔詩人才紛紛歸隊。³⁸⁹由此例，可見桃竹苗間的詩人互間相交流的情形。³⁹⁰

四、南瀛吟社

昭和 8 年（1933）夏季，一群關西人士於關西太和宮內設置辦事處，組織「南瀛吟社」，當時的社長為羅南溪，顧問邱世濬（字筱園）、徐開祿（字錫卿）、沈火（字梅岩）、陳子春，社員有郭景澄、羅玉書、陳蒼髯、陳鈞客、陳其五、張煥章……等，其成立之擊鉢吟為「競渡」，詞宗為郭景澄與陳子春。³⁹¹但視其成員與聯吟地點，皆為關西陶社聚集聯吟之地，當視為陶社活動較佳，但若視其主要的

³⁸⁴ 林柏燕：《陶社詩集》，頁 115，「許氏玉妹」吟「蘆花」1 首；頁 193，「王環」吟「蓮」2 首，由左詞宗評論「風懷旖旎，相見作者可人如玉矣」可知當為女性；至於同篇「蓮」「金英」則吟了 3 首，此「金英」當然指的就是新埔大新吟社的才女「詹氏金英」，由此也可見陶社和大新吟社社友之間常常互相參與聯吟。連女性都能跨社聯吟，更不用說其他互有師生關係或友好交誼的詩友了。此外，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51、52，詩題「祝大新吟社成立」即有「蘇氏秀春」2 首，頁 52、56「張氏完」2 首，頁 61，「馮氏勤妹」、「鍾氏玉英」各 1 首，輔創社即可見大新吟社已有 4 位女性參與；後文尚有詩題「劉寬」，頁 64、65，「黃氏桂華」2 首，頁 66「甘氏玉燕」1 首；頁 118、119，「詹氏金英」清和節 2 首；頁 355，「甘氏玉燕」夏雨 2 首；頁 420，「詹氏金英」歲暮 2 首；頁 510，「蘇氏秀春」和「張氏完」各 1 首四知臺。

³⁸⁵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編：《新埔鎮誌》〈人物誌〉，頁 460。另據《新埔鎮誌》〈人物誌〉，頁 459-460 和鷹取田一郎（1916），《臺灣列紳傳》，頁 143。其祖父詹渠源為清例貢生，父親詹際清為光緒 19 年（1893）秀才，日人佔臺後，於明治 30（1897）年授予紳章，終身在五分埔老學堂教漢書兼新埔公學校教師。

³⁸⁶ 編輯小組（1998）：《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頁 226。

³⁸⁷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大新吟社詩集序〉，頁 11。大新吟社在昭和 4 年的首次徵詩，由吳建田奪冠。

³⁸⁸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557，附錄〈關西陶社〉，頁 557-563。

³⁸⁹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557，附錄〈關西陶社〉，頁 557-563。原文記陶社移址關西和大新吟社創立的时间皆為昭和 4 年（1928），今據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詩集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將前者改為昭和 5 年，而後者依本文推論，當為立於昭和 3 年為宜。

³⁹⁰ 林柏燕：《陶社詩集》，〈陶社的時代背景及其發展（代序）〉，頁 12，陶社第二任幹事陳昌宏於民國 64 年過世時，曾有桃園的「以文吟社」社長陳增祥、新竹湖口「同光吟社」社長徐全福、新竹新埔的「大新吟社」社長黃守漢，齊來執紼，備極哀榮。可見在光復後，這些桃園、新竹地區創立於日治時期的詩社，仍互有往來。

³⁹¹ 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1，發現其詩人與詩社設置位置皆與陶社相同，卻未交待。

社員皆為陶社中較年輕的一輩，可能是為鼓勵後進，所以另組一社，但後續的活動則未多見，仍以陶社的活動較為人所知。

這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苗栗縣的社中，王幼華在研究日治時期苗栗縣詩社時即指出「幾個詩社雖名稱不同，其成員其實是同一批人所組成，且其中不少人僅是掛名充數而已，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多『詩人』，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各地詩社。」³⁹²更增詩社數量統計上的困難。

總之，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詩社在主要的成員組成上是閩籍、客籍分立的，但是在詩社的徵詩活動中，則展現漢詩文字的特色，可以互相投稿與品評。客籍詩社由陶社的設立與活動，使得關西、新埔等客家地區的詩社活動更形活躍；並且已有少數客家女性詩文能力不錯，能參與詩社活動，算是一大突破。

參、苗栗地區的詩社

一、概況

苗栗縣地區的詩社與同一時期臺灣全島各地詩社比較起來，顯得保守，在地性強，活動範圍小，各詩社之間往來頻繁，如栗社、南洲吟社、龍珠吟社、蓬山吟社等，互有酬唱，社員跨社者多，無閩客隔閡的現象，如蔡喬材、黃芷齋為海線閩南人，而與以山線客家人為主的栗社關係密切；南庄的張春華、頭份的林為謨家族是典型的客籍家族，卻為竹南南洲吟社的主將。³⁹³而且以苗栗地區的詩社來看，並沒有純粹以客籍或閩籍文人組合的詩社，南洲吟社與栗社的主將，閩客各有其人，無法看出如王嵩昌《詩鐘格例存稿》的詩鐘派別所言「粵派尚典實，閩派主性靈」的說法。³⁹⁴若進一步推敲王幼華整理的栗社詞宗也可發現這樣的情況，在王氏所整理的栗社前 10 位詞宗中，正巧有 5 位：彭昶興、李祥甫、謝譯庵、邱筱園、鄒子襄是皆屬客籍，至於王石鵬(字了庵)、葉文樞、林榮初、莊太岳與蔡喬材等則屬閩籍。³⁹⁵

苗栗縣由清光緒 12 年(1886)設縣以來，到日治的 51 年間，行政區劃範圍時廣時狹，有時歸併於臺中縣或新竹州，因為地理環境的影響，通苑地區的文人與臺中文人較有往來，如陳滄玉、陳聯玉、鄭濟若為櫟社創始社員，苗栗、竹南地區則與新竹關係密切，如栗社初期的常任詞宗林榮初、南洲吟社社長鄭鷹秋分別來自新竹林占梅、鄭用錫家族。³⁹⁶依據《新竹州沿革史》載，苗栗郡總人口為

³⁹²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34。其後文頁 69 即指出，如南洲吟社的葉甘貞並不會作詩，其詩作或為鄭鷹秋代作，頭份林為謨、林訪鶯的作品大概是他們的叔父兼老師林碧堂代為修改或冒名發表的。何況各詩社詩集皆有許多只有字號，而不知作者究竟為誰。

³⁹³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237。

³⁹⁴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06。

³⁹⁵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214-217。閩客籍是筆者依其籍貫、身家等所判斷。

³⁹⁶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2，另頁 14 註 16 說明：林占梅家

129,630 人，臺灣籍 126,591 人，內地籍（日本籍）2,165 人，朝鮮籍 14 人，中華民國籍 500 人，其中廣東籍佔七成左右，福建籍大多居於沿海，不到三成。³⁹⁷但是王幼華考察日治時期詩社的情形發現，族群的問題幾無所見，詩社的成員有閩有客，詩社間往來十分和諧，看不出彼此間有任何糾紛，詩社社員的組成是以地理環境為區分，而非族群。³⁹⁸栗社的成員以後龍溪流域為主，南洲吟社社員來自中港溪流域，蓬山吟社、吞霄吟社、龍珠吟社則分布在西部沿海線上。³⁹⁹這樣的結果，與上文桃、竹地區的情況相同，各地方所以不同詩社，雖然會因宗親、交誼等有所親近，但分別並不絕對。各地方的詩社交流情形，與其說因方言、族群的差異，不如說是地理空間是否相近的結果。

依照王幼華的研究，苗栗在日治時期，共成立了鹿苑、天香、湖光、栗社、南洲、蓬山、篁聲、吞霄、薰洲、中南、龍聲和龍珠等 12 個吟社。⁴⁰⁰各詩社中閩客籍的詩人皆有，而且彼此之間互有往來，但由於是興復漢學或詩友之間的私人聚會，有些維持甚短，如吞霄吟社 3 年半左右即結束⁴⁰¹，因此資料查考不易，其中較有規模的當屬栗社。栗社詩人雖閩客籍皆有，但以客籍人士為主要的發起、資助與運作者，下文即以客籍人士發起組成的栗社為主加以說明，而且以資料保存、組織完整及運作興盛與持久的情況而言，栗社當屬日治時期苗栗最有代表性的詩社，殆無疑義，為完整說明，將先說明栗社的前身天香吟社，再介紹栗社。

二、天香吟社

關於天香吟社的設立究竟起於何時，由於資料的缺乏，也有各家不同的說法。何以如此，應是吟詩作對本來即是讀書人之間集會交誼時的遊戲。但演變至後來因成員增多，組織即應運而生，但不久即改組成栗社。

(一)創立

天香吟社究竟創設於何時？最早的說法是黃南球玄孫黃卓權在〈拓墾家黃南球傳〉是定為大正 2 年（1913）⁴⁰²，但是在黃卓權後來出版的《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中，只提到天香吟社成立於大正初年，後因成員增加至百餘人，乃於昭和 2 年（1927）擴組成栗社。⁴⁰³其次，今人何來美

族與鄭用錫家族，在苗栗縣擁有大批土地，組織很多墾拓商號，與本地的地主和權勢者往來頻繁，如頭份後庄徐氏家族與林占梅關係密切，蟠桃陳氏家族與鄭家有往返。林鄭兩家為土地及權勢常明爭暗鬥。

³⁹⁷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昭和 13 年）（臺北：成文，1985 年）。《新竹州沿革史》、《竹南郡要覽》等都為新竹州政府的官方出版品。

³⁹⁸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7。

³⁹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7。

⁴⁰⁰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46。

⁴⁰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46。

⁴⁰² 黃卓權：〈拓墾家黃南球傳〉，頁 49，《三臺雜誌》，第 10 期，1987 年 1 月 25 日，頁 44-49。

⁴⁰³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市：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 年），頁 214，大正初年，（運寶）隨黃仲明、李祥甫、彭祖興與弟運和、運元等，會集同儕好友，組『天香吟社』詩社，後因加入的詩人墨客日漸增多，遂於昭和二年（1927）中

在訪問栗社詩人賴江質（1907~1992），賴氏說，天香吟社成立 10 年後，改為栗社。⁴⁰⁴而栗社成立於昭和 2 年（1927），可推知天香吟社當成立於大正 6 年（1917）。此說亦被《苗栗文學史》、《重修苗栗縣志》、《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詩社》等書的作者王幼華所採，王氏將天香吟社創立的時間定為大正 6 年（1917）。⁴⁰⁵由於賴江質於 21 歲加入栗社，⁴⁰⁶可以推知他於 1938 年加入栗社，對於吟社的發展說明當屬可信。但吟社既非正式組織，亦無正式紀錄，只能推測天香吟社是栗社的前身，至於成立於何時，參酌各家說法，當有一段時間，至於是否正好 10 年，可能是約略之數，較為可信。

最後，陳運棟依照現存唯一發行於昭和 2（1927）年的《天香吟社詩集》只完整保留了第二回的「武侯」，第五回則有「歲暮感懷」10 首見於《詩報》12 號，並依其發行的內容如：發行負責人僅寫「謄錄係」，另「謄錄所」、「發行所」皆為「苗栗郡苗栗街苗栗文昌祠內天香吟社」，而且每首詩詞宗皆下評語，為其他詩集僅見、集末的第三回徵詩「社告」等，認為此社剛成立不久，並非一般所謂的民國初年。⁴⁰⁷此外，為了整理天香吟社存稿，陳運棟又發現擔任左詞宗的李詳甫秀才於 1933 年著《春園留杏集續編》中保留 1927 年 8 月至 12 月的五回擬作⁴⁰⁸，分別為「月桂」、「武侯」、「鴻門宴」、「韓信」、「歲暮感懷」等，第二回與第五回的課題與天香吟社相同，因此推估 1927 年的五回擬作及掄元作品摘錄即是天香吟社的作品，並認為天香吟社應成立於昭和 2 年（1927）。⁴⁰⁹此外，並依第一回中李詳甫擬作二首：「飄飄玉蕊表天香，不與凡花細較量；金谷著名旋已矣，只今月窟永留芳」；「從來丹桂擅芳名，托月摩空氣獨清；攀折蟾宮誇捷步，鳳凰池上冠群英。」及鄒子襄掄元之作「一種天香孕玉盤，幾人容易得高攀；任他揮盡吳剛斧，玉骨珊珊只自閒」，對月中桂樹的探討，推論此即天香吟社社名的由來，⁴¹⁰認為栗社設之詩社所以命名為天香，蓋有紀念該詩社成立於桂花飄散天香的秋月之意。⁴¹¹總之，依照目前所存文字史料，陳運棟認為天香吟社應成立於昭和 2（1927）年。

秋，與文學之士百餘人，擴組『天香吟社』為『栗社』……。101 年 02 月 27 日訪問黃卓權先生，其表示幼年亦常見其叔公黃逢良（栗社詩人）常與一些詩友聚會聯吟，長大才發現那些都是大人物，因此何必探求何時組成天香吟社，本來即是詩友之間的私人聚會，遇有好詩也會抄寫保存，可是未必組成詩社。筆者採此說法。核對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2，栗社詩人整理；與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353，表 8-3 三房世系。黃逢良確為栗社詩人，亦為黃卓權叔公。

⁴⁰⁴ 何來美：〈懷念一代詩仙--綠水先生賴江質〉，頁 32，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1 年），頁 31-42。

⁴⁰⁵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3；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75。

⁴⁰⁶ 何來美，〈懷念一代詩仙--綠水先生賴江質〉，頁 31，收於陳運棟：《苗栗之美--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1-42。

⁴⁰⁷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9。

⁴⁰⁸ 擔任詞宗者，常會先擬作以示範，鼓勵投稿者踴躍參加。

⁴⁰⁹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76。

⁴¹⁰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77。

⁴¹¹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78。

雖然天香吟社的手抄油印本《天香吟社詩集》，只完整保存了第二回徵詩的378首，詞宗李祥甫秀才的擬作2首，集末社告兩則，及版權頁一面。⁴¹²已能讓後人確認此詩社的存在與活動方式，但這只能說明天香吟社正式有出版品是在昭和2（1927）年，而且此時已有正式對外徵詩的活動，及明確的社名。但一個吟社的成立，絕不是突然就形成組織，應有先前的集會與運作。早期可能只是士人私人間的聚會活動，後來才演變成對外徵詩，早先雖有吟詩活動，卻沒詩集留存，直到昭和2（1927）年才有詩集結成冊版，到此時規模才漸漸變大。就如陳運棟所說，天香吟社既非正式詩社組織，出刊之詩集往往受到日治當局的刁難，而投稿之人又越來越多，乃於同年舊歷10月正式成立「苗栗社」。⁴¹³如此演變之下，在1938年加入栗社的賴先生才會稱栗社之前10年即有天香吟社。因此，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的知道天香吟社究竟成立於何年何月，但可以確定的是天香吟社的確存在，而且在昭和2（1927）年之前，已有組織運作。至於其組織成員，只能靠目前尚可查考的〈天香吟社詩集〉存稿來追查。

（二）成員

依照陳運棟的觀點，天香吟社是由李祥甫、黃仲明⁴¹⁴兩位秀才，黃運寶、運和、運元三昆仲，與彭昶興、吳頌賢、鄒錦福（字子襄）、湯慶榮等文士組成吟哦雅集，命名為「天香吟社」。⁴¹⁵而且依照黃仲明和黃運寶、運和、運元3兄弟之間的師生關係，⁴¹⁶天香吟社的發起，兼有師生教學與文人聯誼二種性質。至於成員，只能自目前所見的昭和2（1927）年僅留完整的第二回中得以探求，上述9人中，除了黃仲明外，其他8人的人名、字號皆出現在今人王幼華整理的「天香吟社詩人名號對照表」前列的表格中。⁴¹⁷黃仲明是黃南球家的西席⁴¹⁸，黃運寶、運和、運元三兄弟是吟社主要的財力支持者⁴¹⁹，吳頌賢及湯慶榮則是主要的謄錄者⁴²⁰。至於李祥甫秀才則在昭和2年（1927）一直擔任天香吟社的左詞宗⁴²¹，

⁴¹²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9；原〈天香吟社詩集〉影本見頁15-62。

⁴¹³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9。

⁴¹⁴ 陳運棟、王幼華皆稱其為黃仲「民」，應為傳抄筆誤。首先，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214，說明運寶的私塾老師為秀才黃文哲（字仲明，苗栗街人，為人廉潔不阿，長於詩文、書法，為苗栗近代第一書法家。運寶及弟運和、運元等，皆出共門）；其次，101年02月27日在黃南球玄孫黃卓權書房中見到其友人題贈的書法對聯上，題的卻是「仲明」二字，可見黃仲「民」，當為仲「明」之誤。

⁴¹⁵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9。王幼華亦採納陳氏的看法，但不知其所據出處為何？

⁴¹⁶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214，說明運寶的私塾老師為秀才黃文哲（字仲明），且與弟運和、運元等同受教。

⁴¹⁷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52。

⁴¹⁸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55。在黃卓權老師書房見到友人贈予黃仲明的一副對聯，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214，亦同意此說。

⁴¹⁹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62，影本的第二回詩集末有社告又告云：「第參回之徵詩左詞宗及左十四名之贈品概由苗栗街維祥街庄內麻黃運寶氏兄弟等寄附」。

⁴²⁰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62，影本最後一頁的負責者只寫「謄錄係吳頌賢、湯慶榮」，「謄錄所、發行所」皆為「苗栗郡苗栗街苗栗文昌祠內天香吟社」。

鄒子襄則於前三回徵詩中皆掄元⁴²²。由這些資料可知，天香吟社的主要資助者為黃家，而抄錄、發行的地方為何在苗栗文昌祠，乃因為擔任抄錄者吳頌賢即承接父親吳紹箕任教於英才書院，至於英才書院乃位於苗栗文昌祠內，而這些資料得以保存，也賴於吳頌賢及其後人的用心。⁴²³

王幼華並分析參與投詩者來自苗栗、銅鑼、西湖、通霄、大湖等地，參與評比的詩人有 7、80 位，在參與者的身份上有地方富紳、漢學塾師、弟子、雅好詩文者、初學者，且大部份是苗栗人士。⁴²⁴在參與者的身份上，和前文提及的關西陶社和新埔大新吟社等，大致與其他地方性質的詩社成員組成上並無不同。目前遺留的詩集冊，雖可整理出參與天香吟社徵詩者的姓名或稱號，有些只有稱號，而無法知其真實姓名。⁴²⁵但這些人也只能說是參與天香吟社徵詩者罷了，能否都列入天香吟社的社員，仍頗有疑義。因為在日治時期，參與詩社徵詩者，常常知道有徵詩活動，即針對課題徵詩投稿，不必親自參與，皆可能跨越詩社的藩籬，包括各詩社的詞宗亦復如此。或者就算列入社員，也不並如今日般嚴肅看待，倒是後來的栗社，規模及出入社則不同一般，有較嚴格的人社與退社聲明，詳見下文栗社部分。

前文中提到在曾參與鋤社聯吟，又擔任過陶社詞宗與大新吟社徵詩與詞宗的葉文樞，不但擔任栗社的詞宗，也擔任南洲吟社的詞宗。⁴²⁶至於，葉氏為新竹人，在光緒年間游庠，且名重一時，但因未入日籍，以華僑身分在臺教讀，各地受其薰陶學子，不計其數。⁴²⁷由此可見，葉文樞雖為栗社詞宗，卻未必就是栗社成員。另外，陶社的社長邱世濬也是栗社詞宗之一。

三、栗社

前面討論天香吟社究竟成立於何時？一直頗有爭議，但是發展到栗社時期，由於規模較大，也較有組織，又留下較完整的詩稿、紀錄，成立的時間較無爭議。

(一)成立

栗社資料的留存有賴於已故栗社書記吳頌賢，手刻油印，加上其次子吳文虎妥善保存。⁴²⁸栗社設立的時間和目的可以栗社書記吳頌賢先生昭和 7 年（1932）

⁴²¹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12、14、64、68、72。

⁴²²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頁 12、15、65。鄒錦福，字子襄，又號且閒居士。

⁴²³ 何來美，〈吳頌賢、吳文虎父子留下栗社詩篇〉，頁 40，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8-42，據吳頌賢孫女們表示，二次大戰時，日人推皇民化，打壓漢學，吳頌賢一度將這些詩集、儒樂樂譜及線裝書以十層油紙包裝入沈入苗栗市玉清宮附近深潭，到臺灣光復後才撈起。

⁴²⁴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3。

⁴²⁵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2。在表格中總共整理了 83 人，37 人只有字號無人名，但其中「文作」乃是黃運寶除了懶蟲外的另一字號，故應扣掉 1 人，即應為 82 人，其 36 人只有字號不知人名。古人常由稱調字號，而參與詩社作詩更常如此，造成後人考證上的困難。

⁴²⁶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216、221。

⁴²⁷ 蘇子建：《塹城詩薈》（新竹市：新竹市文化中心，1994 年），頁 142。

⁴²⁸ 何來美，〈吳頌賢、吳文虎父子留下栗社詩篇〉，頁 36，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6-42。民國 84 年夏天，聯合報記者何來美，由於報端發表「文昌祠開中門祭聖凸

的辭職感言可知：

至昭和二年，蒙前社長苑香先生乃以栗社書記相招，鄙人固推之再三，先生竟招之再四，謂余曰『予年已六十餘矣。設詩社無非為地方後學記也，今佛教盛行，聖道寂寞，豈聖道不如佛教之美也。非也，蓋老佛有徒，聖人無後耳。予等讀聖賢之書，不能聞聖賢之教，倘教兒女有知，亦當嗤我徒戴儒冠矣，何況他人乎？且文昌祀產豐足，必有餘資，可以維持，汝其勉之。』鄙人聞斯言，幡然有感，想人生求富有命，富者為子孫安逸計，名者為身後猶留之謀，輕重之別，不可不慎，遂強任之。……。⁴²⁹

可知自昭和 2 年（1927）9 月的中秋，天香吟社擴大吟會組織，網羅苗栗、竹南、大湖等地區文友 106 人成立栗社，社址仍設在苗栗文昌祠內，首任社長公推彭昶興（字苑香）擔任，吳頌賢為幹事，李詳甫為常任詞宗，每月或隔月開課並舉辦繫鉢吟會，臺中王了庵、新竹林榮初應聘為詞宗，經費半由文昌祠支付，半歸社員負擔。⁴³⁰ 彭昶興任社長未一年過逝，第二任為黃運寶，運寶為黃南球四子，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字文作、號懶蟲，喜交文士，屢為東道主，在任 9 年（1929-1938），是栗社活動最盛的時期。⁴³¹ 賴江質也認為栗社最盛的時期，是 1930-1940 年間，主要有黃運寶、運和、運元三兄弟不但出錢出力，又長於吟詩，常邀文人雅士至家中吟詩品茗，故能維持社務不墜。⁴³² 日治時期後續接任的社長有黃運和、趙廷琳、邱雲興等。⁴³³ 日治時期的栗社社長都是苗栗縣的客家人。

顯苗栗文風」的報導，提到栗社於春秋聯吟，今因詩人凋零成漸成絕響，被吳文虎看到，提及其祖父吳紹箕、父親吳頌賢皆任英才書院的教席，聯絡記者到府採訪，並將父、祖遺墨保存，後又與陳運棟再訪，並取得栗社詩集油印本的影印，最後並將吳頌賢所留栗社油印詩集、手稿及清乾隆、嘉慶年間的古地契捐給苗栗縣文化中心典藏。後並由陳運棟整理相關詩稿及他人介紹栗社詩人的相關文章出版了《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及《天香吟社詩集存稿》二書。

⁴²⁹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65。頁 63-112，收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原稿」。

⁴³⁰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9。其中王了庵，原名王石鵬，以閩南語編寫《臺灣三字經》，其生平及著作《臺灣三字經》的分析，可詳見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頁 56-63；林榮初是新竹占梅家族的後人，皆屬閩籍。

⁴³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9。王氏寫黃運寶為黃南球三男，今依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354，表 8-4 四房運寶世系，改為四子。雖然黃卓權於該書前文頁 21、25 等，仍稱運寶為三子，但借得其自校本亦更正為四子。原因在於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頁 100，因黃南球年過 30 仍未有子嗣故徵求長兄南瑞的同意將其子承眺兩房為子，故南球長子運添反而被稱為次子。後來南球正妻劉氏共生運添、運才二子，五妻林貴妹又生運寶、運和、運元、運豐及運煌等 5 子，即黃南球共生 7 子，但黃家後人習慣在其子的排行或房的稱呼上是從 2 排到 8。

⁴³² 何來美，〈懷念一代詩仙--綠水先生賴江質〉，頁 33，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1-35。

⁴³³ 在邱雲興之後，繼任栗社社長的有謝譯庵、賴江質及胡東海等人，其中除了民國 81 年（1992）於賴江質過逝後繼任社長的胡東海是臺中人外，前述幾位都是苗栗的客家人。栗社的繼任社長有不同的說法，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書中，頁 59-60，跳過黃運和與趙廷琳，由於書中未註明資料出處，本處採何來美，〈懷念一代詩仙--綠水先生賴江質〉一文，頁 32-33，親自訪問曾任社長的賴江質的說法。

(二)成員

栗社成立於昭和 2 年 (1927)，日治時期保存下來的詩集多達百餘集，超過上萬首詩，詩人也多達上百位。⁴³⁴但若照王幼華依詩集中出現的人名、字號等統計則高達 351 人。⁴³⁵為何在人數統計上有如此的落差，蓋與詩社的性質有關，何況若連公開徵詩者亦併入計算，實在填加統計上的困難。栗社的成員不少為地方富紳、地主、前清秀才、塾師、漢醫或西醫及地方官員等，⁴³⁶多屬地方領導階層 (local elite)⁴³⁷，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名望。



圖 5-3-1：栗社詩人合影

⁴³⁴何來美，〈吳頌賢、吳文虎父子留下栗社詩篇〉，頁 36，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36-42。

⁴³⁵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56-58，將所有栗社詩人名字號整理成表格。表格並無統計數字，經筆者統計後，發現全表格總計 351 人，其中 28 人只有字號，無姓名，女性共 7 人，6 人有註記為女性，筆者另依行文增加 1 人謝秀珍，故共有 7 人為女性。若按人數比例，與男性相比，只占不到 2%，女性參與詩社的比例並不高，但也如前文提及的新竹縣詩社般，已有女性參與詩社活動的情形。可見女性參與詩社活動的情形在日治時期已頗常見。

⁴³⁶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2-94。該書頁 60，稱栗社成員為「不少為地方富紳、政界精英、飽學之士，故能凝聚較多人材，形成力量」；頁 91 則言「傳統詩社的社員通常為社會的上層結構，組成份子為官員、地主、鄉紳、宿儒等」；頁 95 的社員背景分析又稱「社員泰半為官紳或知識份子，在地方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此外從事土地地書業，廟宇管理人，看風水、相地理、算命卜卦的為數多……很多的前清秀才，塾師等人轉變身份成為漢醫或寺廟管理人……社員之間也有父子（女），兄弟，夫妻等的血源關係」。筆者認為王幼華此說太高估這些人的階層身分，所謂上層或下層都是相對而言，這些人依身份或者在當地屬較上的階層，較之普通百姓較有學識或財勢，但比之中國或全臺的上層階級恐怕又稍低了些。因此，說這些人中有地方富紳尚屬合理，以黃氏兄弟為代表，其他也多有地主，但言之為「政界精英」或「飽學之士」則顯然過譽，依參與栗社者的身分背景分析，筆者認為稱「地方領導階層」(local elites)較妥。

⁴³⁷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1-16.有相關概念的探討與界定，轉引自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頁 59，即借用此「地方菁英」(local elites)來指稱這些在地方事務扮演重要地位的地方頭人，例如具有功名的知識份子，地方鄉職的總理、墾戶以及重要家族領袖等。另外，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書局，2008 年)，頁 5，則將「地方性領導階層」(local elite)或「次級領導階層」(sub-elite)等，指為在清代係指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在日治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等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統稱其為「社會領導階層」。由以上討論可知，這些熟知漢學或以詩社推廣來延續漢學者，無論其在清代或日治時期，無論是有功名、學識或財富，在地方上都屬較有威望之士，故筆者稱之「地方領導階層」(local elites)。

資料來源：吳保榮：〈革命志士吳頌賢其人其事〉，頁 17，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11-25。

最有名的地方富紳就是黃運寶、運和、運元三兄弟，他們的父親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臺灣有名的貨殖家--黃南球，在今苗栗一帶開發廣闊的土地賺得巨額的財富。⁴³⁸不但有前清秀才李祥甫參與詩社，更有塾師者如頭屋的彭昶興；銅鑼的劉新基、賴玉溪；西湖的羅明炎；頭份的陳毓琳、麥榮清、林碧堂；苑裡的鄭炳煌、陳景福；苗栗的吳紹基和竹南的陳雨亭和陳阿金等。⁴³⁹其他擔任地方基層官員者頗多，如徐海碧、鍾建英、彭松壽等為頭屋庄長，徐接升為頭屋區長，曾任栗社社長的邱雲興亦為銅鑼庄長等不一一舉例，其他如擔任新竹州參議員的方泉松、方玉山父子，曾任四湖庄協議會會員、五湖庄保正的張添增等。⁴⁴⁰漢醫有頭屋的劉慶蘭；銅鑼的邱炳秀、邱賢郎；後龍的趙廷琳等。⁴⁴¹西醫有竹南的劉添貴、方泉松；苑裡的陳南輝與公館的羅阿謹等。⁴⁴²這些人除了頗通傳統漢學外，更通曉日語，尤其是曾擔任地方基層人員者，而任職者中很大一部分更受過新式的日本教育，精通日語，如曾任社長的運寶即是臺北國語學校畢業；吳濁流曾任教四湖公學校，昭和 6 年（1931）時才正式退出栗社，「移轉至新埔街大茅埔」。⁴⁴³但他早在昭和 4 年（1929）時，已開始參加新埔大新吟社的聯吟活動，並在「祝大新吟社成立」的聯吟大會，成為 6 位值東之一，並作了 5 首七絕，其中一首掄元。⁴⁴⁴此外，黃運元為臺灣文化協會的理事⁴⁴⁵，初時為栗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卻在後來的栗社社告中，見到其退社的紀錄。⁴⁴⁶羅阿謹公醫也是文化協會會員，任職通霄公醫時，必須巡迴各校施打預防針，曾與吳建田熟識，共同關心臺灣時勢。⁴⁴⁷甚至長期任職栗社書記的吳頌賢，還因參與革命抗日而被捕下獄。⁴⁴⁸

最後藉由今人陳欣慧針對《臺灣日日新報》、《詩報》所載，以文吟社的各項活動，其 1928 年至 1936 年中，與其他詩社的聯吟活動可知，桃竹苗地區的詩社不但相當活躍，而且彼此之間交往密切，無閩客隔閡。

例如：主要有昭和 3 年(1928)11 月 14 日桃園吟社負責，開始舉辦的五社聯吟發會式，爾後約每半年聯吟一次，依序為 1929 年 4 月，以文吟社於中壢公學

⁴³⁸ 生平詳見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一書。

⁴³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2-94。

⁴⁴⁰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2-93。

⁴⁴¹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4。

⁴⁴²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4。

⁴⁴³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6。

⁴⁴⁴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頁 49-50、54、56-57、61。

⁴⁴⁵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 年），頁 267，表十二/丙、臺灣文化協會主要之幹部及會員。

⁴⁴⁶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106。

⁴⁴⁷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96。

⁴⁴⁸ 吳保榮，〈革命志士吳頌賢其人其事〉，頁 15，收於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頁 11-25。

校；1929年9月，崧津吟社於大溪公學校；1930年3月陶社於龍潭公學校；1932年4月東興吟社於八塊公學校；1932年10月又輪回桃園吟社。⁴⁴⁹陶社之後，五社聯吟稍緩的原因是1930年在新竹北郭園召開「全島聯吟大會磋商會」，竹社邀栗社、桃園吟社、以文吟社、崧津吟社、陶社等開會，討論明春新竹州輪值辦全島詩人聯吟大會事誼，當時的左詞宗為大新吟社的藍華峰、以文吟社的吳榮棣。⁴⁵⁰因此五社聯吟暫停。1931年3月22、23日兩天，全島詩社大會於新竹市公會堂召開。⁴⁵¹往後1934年分別由崧津吟社主辦，1935年由陶社值東的2次「竹北聯吟大會」召開；接著1936年在新竹公會堂又舉辦第九回全島聯吟大會等。⁴⁵²

由以上敘述可知，無論是「五社聯吟大會」、「全島詩社大會」，或是「竹北聯吟大會」，都有閩客籍詩社、詩人參與其中。而栗社除了「全島詩社大會」有參加外，五社聯吟與竹北聯吟大會乃以新竹、桃園地區為主。可是若細觀栗社的社員，與新竹地區的詩社也並非全無關聯，其中吳建田就是很好的例子。

總之，閩、客語是兩種很不相同的方言，在發聲上差異甚大，吟詩時難免南腔北調，幸好共同使用漢字，不因族群差異有所分別，也不會在徵詩時造成困擾。⁴⁵³而且在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組成为主的詩社中，也常見到閩籍文人參與的足跡，例如常在閩客籍人士組成的不同詩社中擔任詞宗的葉文樞即是鐵證，而客家籍的邱世濬也常出現在北桃園的詩社活動中。所以與其說，桃竹苗地區的詩社是因族群不同，而形成閩客分組，不如說，是因為地緣關係才造成不同的閩客分組。

歸納而言，桃竹苗地區的詩社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桃竹苗地區的詩社活動是相當活躍；第二詩社以為交誼及興漢學為設立目標；第三、由於詩社是興廢不時的民間團體，加上社員常參與各詩社的徵詩，因此詩社數和社員歸屬，實在難以明確；第四、雖然因地緣遠近形成閩客籍不同的詩社，但各詩社間關係融洽，各詩社活動常互相參與、支援，不分閩客；第五、客籍詩社成員的職業仍以教職最常見，包含了傳統的書房師生，或是公學校教師，其次則以政商之流為多；最後，此時已有客家女性詩人參與詩社活動，可見原屬男性的文教活動，已漸漸推廣到女性。

第四節 小結

這一章在討論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如何因應新政權的政策，而能保持傳統文教不輟。首先客家人自清代移民臺灣後，即相當重視各項文教活動，就如所有的漢人社會一般以私塾教育，培養參加科考的人才，或推廣識字的活動，但是在清代，臺灣的客家人尚有粵籍的舉人、進士名額保障，得以提升個人或家族的地位

⁴⁴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409-410。

⁴⁵⁰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410。

⁴⁵¹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411。

⁴⁵²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412。

⁴⁵³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17-18。

向上流動。但是到了日治之後，失去科考進仕之途的士人，只好選擇開設書房以糊口，或是參與詩社的活動。

殖民政府對書房與詩社設立的態度是不同的，但皆先寬後嚴。日治後即將各地的書房納入管理，使書房成為在學校教育尚未普及時的代用品或補充。若要合法立案，則要得到各廳或州的開設許可，甚至塾師也要參與各廳辦理的講習，並且對書房開設與塾師資格的要求越來越嚴格。首先，書房得設在離公學校一定距離之外，而且書房得開始教授新式教育的學科或教科書。一旦公學校開設後，附近的書房學生即大多被迫或主動的流入學校。再來，訂定獲得塾師資格者，必得受過師範、公學校教育、廳辦講習或是通過修身、國語、算術、漢文與教授法等科的檢定，強迫書房的師資及設置情況等，近似當時的學校教育。在這樣的條件下，經過官方同意設立的書房越來越少，並且核可開立書房的塾師也從傳統文人為多，慢慢變成具公學校訓導資格或是公學校畢業者。

在這類官方核可並列入統計的書房中，尚有一項特點值得注意，就是在男學生普遍下降時，書房的女學生反較之前增加，在桃竹苗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由於桃園郡並沒有「立案」的書房，因此桃竹苗地區這些書房的女學生，應以客家人為多。可以打破一般人認為客家女性教育不受重視的說法，如學校教育中的女性偏少相同，女性較少受教育，主要跟家庭背景與社會期許有關。

一般在討論日治時期的書房時，都偏向以官方的統計資料為主，所以討論的大多是官方資料中核可設立的書房，可是筆者在實地訪談過後發現，除了這些官方統計核可設立的書房外，非正式設立的書房反而是保存傳統文教更重要的場所。然而這類書房的上課時間更具彈性，也更興廢不時，造成數量統計上的困難，實際數量更難以得知，但以其在鄉間流傳的情形可知，應比官方核可的書房更為普遍。這類學生為了生活所需而自願參加的書房，成了傳統文教重要的保存場所，具有宣揚應世智慧與道德、保存方言與認識漢字等功能。在第二節後半教學與教材的部分，即針對這類「非立案」的書房而言。而這部分常被過去的研究者所忽略。

最後，日治前期對各地詩社的設立保持寬容與支持的態度，以拉攏士紳階級為其所用。此時桃竹苗地區的詩社相當興盛，早期以閩籍詩社為主，日治中期才有以客家人為主的詩社興起，桃竹苗地區各有以文吟社、陶社、大新吟社與栗社等為代表。可見經濟的發展，已影響各地文教活動的發展。其中中壢的以文吟社與苗栗的栗社興起於較熱鬧之處，而關西的陶社與新埔的大新吟社雖興起於較偏鄉之處，卻能參與桃竹苗或全島的詩社聯吟活動，促成陶社興盛的關鍵人物即是出身龍潭庄的邱世濬，來往縱橫於桃竹苗地區的閩、客籍詩社之間，也見證了當時的詩社活動不但無閩客之分，而且彼此來往熱絡。

此時參與詩社活動的除了傳統文人外，也有許多受過新式教育者參加，這些人除了地方行政長官、士紳、學校教師、塾師外，也漸漸普及至一般市井小民。但是至 1937 年之後，詩社的活動即在皇民化運動的要求下，戛然而止。但是當許多詩社就此消失後，以客家人為主的以文吟社、陶社與栗社等，皆在光復後繼

續活動。

由以上桃竹苗地區的書房與詩社的發展可知，客家人為了順應時勢，不但能接受新式教育，也能適應殖民政府對書房的各種管控措施，但是在私底下為了適應庶民生活所需，並保存傳統的語言文化，也能接受傳統的書房教學與教材，進而代代相傳。而詩社更是一種殖民政府認可，又能保存傳統語言、文字的活動，於是桃竹苗地區的詩社能如此興盛，而客家籍的讀書人也足以組成詩社，並沿續之，正是順應時勢與保存傳統兩種條件合作下，所開出的美好果實。總之，日治時期書房與詩社的發展，正見證了客家人「莫忘祖宗言」所代表的對保存傳統文化的堅持，但與此同時，又能順應時勢以適應社會上更好的生活。不但對於新的語言、知識樂於學習，但對於傳統的語言與價值也能保存，這正說明了客家這一族群自形成以來，即使散居全球各地也能一息尚存的原因吧！

第六章 結論與省思

第一節 結論

日治時期的桃竹苗地區，除了是全臺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區外，且有閩客族群分庄而居的特色，即使地方制度的州郡劃分，仍無法打破各地閩客分區而住的習慣，但是子弟升學的管道並無閩客之分。因此前文各章中，皆先介紹全區的教育概況；若為凸顯閩客庄間不同的教育發展情況時，再分郡、庄來論述；至於在舉教育發展實例時，則以能確認其為客家人者來說明。

由於訪談採立意取樣及滾雪球式的進行，所得到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書房、詩社等的實際運作情況，以關西地區為多，實受筆者耆老訪談來源所限之故。幸而由關西地區居民豐碩的教育成果，已能反映日治時期客家先民在教育上的傳承與努力，這樣的精神傳承，絕不是一人之力所能達成，而是全體客家先民努力的成果。雖然這樣的成果未必能類推至其他地區的客家人，但筆者從小身處這樣代代相傳的教育氛圍中，感受甚深。真正研究之後，才發現：日治時期客家人的教育史，就鋪陳在我童年課堂的記憶中，從校園、建築的創設，到師長的諄諄叮嚀，最終有此篇論文的寫作。

本章將針對前六章所討論的內容加以總結，由於本論文主要在瞭解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臺灣客家子弟對新式教育的因應情況、對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及受教情況與社會地位的關係等三大項，因此雖然在新式教育部分，會兼及與其他族群（主要是閩南人）相關教育情況的比較，但族群比較非本文研究的重點，主要仍聚焦在客家族群，如何因應日治時期不同政權、語言及教育環境改變後，仍能維持或獲得較好的教育成果，以使下一代能得到較好的生活與社會地位。主要結論有三：

壹、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勇於接受且支持新式的學校教育

早期桃竹苗地區各地學校的設置有限，客家人也對學校教育包持觀望的態度，但是在殖民政府特意拉攏各地士紳階級子弟之下，當這些受過新式教育的公學校畢業生，成為社會上的老師、醫生、庄長、企業家等精英階層，成為地方上的有力之士。以關西地區而言，雖位屬偏僻，但在咸菜礮公學校設置後，前幾屆的畢業生即培養出當地最早的西醫、庄長與農園實業家，而日治中期設立的石光公學校，前6屆的畢業生更是石光、坪林地區師資養成的搖籃，後來並促成坪林國民學校的獨立。總之，教師、醫師、律師、企業家及光復後的政治人物等，這些社會精英分子的養成，無不是拜日治新式教育之賜。

在這樣的成果之下，學校教育就轉而成為地方士紳競相支持的對象。例如：新屋庄的范姜騰受過師範教育後，得以成為教師、區長等，即大力支持新屋公學校的獨立；或是關西坪林地區的范朝燈在後悔自己未受學校教育後，轉而支持坪林國民學校的獨立，並且更注重子弟的教育，創造了光復後十子十登科的佳話。

貳、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努力進行傳統文教的傳承與轉化：漢學的延續與詩社的勃興

桃竹苗地區客家人對於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與轉化，主要表現在漢學的維持與詩社的勃興上。首先，日治時期漢學的延續主要在書房中進行，真正維持傳統的是未經官方認可的書房，經過官方認可的書房教學則是一種轉化。其次，詩社活動是傳統文人集會之處，也是教育文化成果的高度表現，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詩社數量不降反升，反映出對傳統文化的延續；但是詩社參與者的受教方式與身分的改變，及創作內容的因應時事，顯然又是一種轉化。

一、漢學的維持

客家傳統的耕讀傳家精神，自清代顯揚之後，顯然在日治時期繼續延續。雖然政權更替後，學校教育很重大的衝擊漢學推廣賴以存在的書房教育，但在桃竹苗地區的書房並沒有因學校教育的推動而立刻消失，除了納入官方管理的書房後，走向「學校化」。但是真正普及民間，維繫傳統漢學的則是未立案的短期書房。例如關西庄較偏遠的鄉下，存在甚多短期、提供庶民生活所需知識、識字為主的書房教學：「打夜學」，或走讀式書房。教學的內容以啟蒙、應世智能為主，晚清時為應赴科考所需的經學，已失去其市場。

二、詩社的勃興

桃竹苗地區於清朝時，詩社主要以新竹市區為盛，士人多聚集於此，但在日治之後，桃竹苗地區各有一個相當活躍的詩社在運作，如：以文吟社、陶社與栗社等。尤其連較偏鄉的龍潭、關西與新埔等地皆有詩社的設立，正巧這三個鄉鎮皆是客家人口居優勢區，詩社中的吟詠又以客語方言為主，雖然徵詩作品不限閩客，但擊鉢之吟，仍以客語表現為主。此表現出日治時期該地客家文人對傳統文化的懷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詩社的成員，從傳統文人，漸漸變成來自日式學校教育出身的各行各業者。例如：曾參與苗栗栗社與新埔大新吟社的吳建田，師範畢業，曾任教苗栗的四湖公學校與新竹的關西公學校，即是後來以日文創作聞名的作家吳濁流。

參、接受學校教育有助於桃竹苗地區客家精英階級的養成及家族地位的維持

最後，當傳統的、非正規、私辦的教育已被現代化、正規、公辦的學校教育取代後，能成功掌握新式教育機會的人，就能幫自己或下一代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客家人這個習慣固守傳統又勇於創新的族群，一面懷抱著「莫忘祖宗言」的祖訓，透過非正式的書房與詩社活動傳承著傳統的語言文化，卻又奮不顧身的投入新式教育的日語環境中，取得了在新時期、新政權之下安身立命的能力。顯

現出教育本身獨立的價值，不限於殖民政府只要培養臺灣人民成為社會底層的忠良國民的教育目標。人一旦接受了教育，開啟了視野，就不可能只安於社會的底層，所以大量的臺灣人，包括家住鄉下的客家人，只要有能力無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往都市就學，甚至到日本留學。一旦有鄉親介紹，有人帶領，就擋不住接下來的前撲後繼。

於是留日也好，到外地就學也罷，總有一些關鍵人物或大家族，成為迎向新式教育，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帶領者。在關西地區便發現：日治時期石光公學校就有四大家族升學的成果輝煌，包括茅子埔陳家、石崗仔的呂家、朱家，以及坪林的范家。其中，石光第一屆畢業生的呂阿全，不但影響石光呂家本身的發展，在下一代中培養出三個醫生。也影響石光公學校學區內的學習風氣，並且促成坪林國民學校的獨立與亮眼的升學成果，使教育的傳承效果生生不息。這樣的影響，一直沿續到光復以後。

此外，雖未另列篇章討論女子受教的情況，但在日治時期，無論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書房、詩社等，處處可見到女子參與或受教的身影。尤其在社會教育中，各地廣設的國語練習會、國語傳習所等，積極對女子進行的日語教學，普及度更超乎後人的想像。雖然女子的職業選擇與養成不如男性般多元，但女性成為塾師、教師或助產士等，在日治後期已屢見不鮮。可見日治時期女性除了家庭外，已被允許或期許進入職場，得到一展長才的機會。即使一般人認為客家人重男輕女，故女性較少有受教機會，但就本論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正相反，重視教育的客家庄，同時也會重視女子教育，如湖口、新埔、關西、竹東等庄，皆較臨近閩籍居優勢庄為佳。客家庄女性受教育的情形，並不受地方經濟繁榮情況所限，但各庄、各家情況未必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第二節 後續研究的省思

最後針對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及研究資料三方面，提出省思。

壹、研究主題

在研究主題上，筆者認為未來尚有四個方向待開發與思考。

首先，女子教育的狀況；由於時間與能力所限，原本預定要以專章書寫的女子教育，發現由於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傳統文教(漢學延續、詩社發展)等各章，都有提及女子在其中的發展，若另外列專章書寫，恐怕會有疊床架屋之感，很多例子也會重複。只得忍痛暫時割捨，留待以後再行研究。

其次，教育應是最有價值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筆者在歷經4次密集性的耆老訪談後，深覺得教育應是相當重要的文化或社會資本。雖然日治時期的社會階層流動，未必可以符應法國布迪厄(P. Bourdieu)衝突論的文化、社會資本概

念；¹或是美國柯曼(Coleman J.S.)，結構功能論所主張，認為資本具有生產力，可以影響下一代的人力資本創造。²但若借用其中教育是重要資本的概念，會發現日治時期這些客家庄的父母，正是善用教育這項重要的社會資本，使子弟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以奠定或改善家族原有的經濟情況。教育是一種轉換文化、社會與經濟資本最重要的投資，即使政權更替、制度轉換，誰能善用好的教育機會，誰就較有機會勝出，顯現出教育有其獨立的價值。

第三，研究區域可以南部為範圍。本研究空間範圍僅限於北臺，未來可以南部客家族群聚居之地為範圍進行研究，然後再與本文加以比較，將可以理解客家教育的全貌。

第四，可以選擇客籍人物的受教經驗為對象，進行口述歷史，更生動深入。如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早期校友中客籍女士的受教史。

貳、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有四點省思，首先，訪談後宜儘早摘要大綱；其次，影音史學是值得嘗試的研究方法；復次，理論的角色；最後則是研究倫理的議題。

一、訪談摘要

訪談法、口述史等研究，是一種非常耗時的過程，除了訪談費時、費事外，事後的整理工作更是煩雜。尤其謄逐字稿更是耗時費力的工作，雖然科技越形進步，但是遇到這種跨語言的訪談時，不要說機器翻譯有困難，連找個能打字的助手都不容易，所以筆者只能親自將重要報導人的謄逐字稿，且內容太多，無法全部以附錄方式附上。此外，雖然質性研究有些編碼的技巧，但是筆者甚少使用，只是儘量將觀察、未問的問題、可再追求的問題、想法等，附註其中。為免遺忘與幫助思考寫作論文，筆者認為最有效率的方式，還是當場的摘要筆記，及訪談後儘快的重點整理。

二、影音史學

傳統的訪談大多限於錄音取得文字，拍照取得照片或資料，其實筆者更想做的是對訪談過程進行錄影，畢竟筆者訪談的長者大多 8、90 歲以上的高齡，他們就是活的歷史，近來又有影音史學的興起，將開啓更生動、更能持久的歷史研究方法。可惜，要打開受訪者的心房實屬不易，一般皆要有熟人指引、帶領或介紹為宜，即使接受訪問，拍照還是可能遭到拒絕，何況是錄影。但是影音史學仍然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研究方式，可能未來在論文的呈現上，也會有更精采、生動的成果。

¹ Bourdieu, P.(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 Wells(eds.). *Education :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pp.46-58).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² Coleman, J. S.(1988). Society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pp. 95 -120.

三、理論角色

在論文架構中無法顯現出來的是，筆者將試著帶著族群、階層與性別等不同的理論與視角，將蒐集到的史料加以檢證、批判。但本研究的目的，絕不只是為了印證某個既有的理論而已。但是博士論文的撰寫，若乏理論的關懷則深度有限，因此筆者努力充實相關及可能的理論知識，以免有分析太過淺薄、牽強，甚至是誤用的情形發生。

其中筆者試著借用 Michael J. Sandel 提出「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的觀點，解釋客家族群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依此觀點客家族群方能維繫久遠。雖然他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為了討論道德上的議題，進一步的說，團結或成員義務的責任，其對象並不是理性人，而是與筆者們具有共同歷史的人。³為了合乎正義，人既然以其所屬團體為榮，也應該為其所屬群體的歷史共業負責，所謂「有歸屬就有責任」。⁴雖然這些被稱為「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 的哲學家，並不喜歡這個標籤，因為這樣的稱謂似乎暗示了一種相對主義，正義變成是由所屬社群說了算。⁵這使筆者反思，在客家族群形成的過程中，既然沒有一種明確的政治區域、種族或國家作為約束，何以能因此形成一個根深蒂固的群體，除了外在的客觀條件（屬事實範疇）外，顯然也有屬於這個群體成員的主觀認同（屬價值範疇）。不但可以解釋客家族群形成的原因，也是團結現在的客家族群，使之維繫並促使未來發展較好的理論。

筆者認為客家族群的產生與存在，並不只限於客觀條件的血緣、語言或文化的傳承，更是一種主觀上認同的結果。⁶而主觀的認同為最主要的條件，也就是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是因為當事人主觀「認同於客家這個社群，包含其所有的歷史共業與群體的所有責任」。至於，客觀事實條件的血緣、語言、或文化、信仰等，只是擇一或次要的條件。否則如何解釋客家人或社群內不同語系的分歧，如四縣腔、海陸腔、甚至大埔腔、饒平腔或閩南化的詔安腔，甚至是閩南化或世界各地在地化的客家人的活動與存在？即使這些「客家人」使用的語言並不全部相同，甚至未必能溝通，有相當程度的歧異性。⁷但他們卻都認同在「客家」(Hakkas) 概念之下。更不論加入客家族群且無血緣的媳婦、收養子女等，皆常

³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p.225; Michael J. Sandel 著、樂為良譯：《正義：一場思辯之旅》（臺北：雅言文化，2011年），頁251。

⁴ Michael J. Sandel 著、樂為良譯：《正義：一場思辯之旅》，頁264、262。

⁵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pp.220-1; Michael J. Sandel 著、樂為良譯，*《正義：一場思辯之旅》*，頁246-7。社群主義本是為了1980年代批評J. Rawls《正義論》而起，他們拒絕接受正當先於良善，主張正義思考不可能抽離目的與情感。即挑戰不可能會有J. Rawls《正義論》的假設「無知之幕」的存在。所謂無知之幕是指：人因為不知誰會得到優勢，故會選擇訂定對最大多數人有利的條件，以示公平，求得正義。這對現實社會而言，絕不可能。

⁶ 這樣的主張也能解決湯錦台：《千年客家》，頁308-311，將客家人與猶太人比較，具有相近的特性，如注重家庭、注重習俗傳統、注重女子教育、吃苦耐勞和注重金錢價值不揮霍等，但何謂客家人？卻又難以有共識的「客家路漫漫」的渺茫感。

⁷ 吳中杰：〈客語次方言與客語教學〉，頁289，經由臺灣客語研究著作和實地訪查之心得，發現客語有相當程度的歧異性，以次方言稱之。收於曹逢甫、蔡美慧編，《臺灣客家語論文集》（臺北：文鶴，1995年），頁289-306。

常認同於客家文化下，至於文化、信仰在各地發展的歧展性更多，像臺灣即在清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所謂「義民信仰」，不但為他地所無，而臺灣也並非只有客家人才有「義民」身分。

因此，筆者在理論上認為最好解釋客家族群產生，及有助永續發展的理論應是「社群主義」。何況客家族群大多贊同「勤儉、重農、重武、重宗族、重教育、婦女能幹、重風水等」為客家族群的特色⁸，而這種對客家族群的認同，證諸歷史，主觀因素的決定性，大於客觀外在條件的必要性。

四、誰的利益

由於這樣的研究題目，只能採用立意取樣、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到受訪者。而以筆者的出身背景，透過親戚、宗族、師生關係等皆能成為個人研究上的助力，也可能因此產生衝突。助力是因為他們是筆者論文進行中，最容易找到的受訪者，因此平常就會有些情感關係，萬一訪談之後產生任何觀念上的影響，即使是如 Patti Lather 所說的「觸媒效應」，研究可以促使被研究者去反思自己所處的情境，而產生對自己的理解進而自筆者決定或改變。⁹雖然這被 Lather 視為一份質的研究是否有效的證據，可是筆者的擔心反而是：如果研究者知道他相關的研究或訪談，很有可能使受訪者產生反思覺醒，即使不是故意的，但很這種反思覺醒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受訪者的生活，還可以堂而皇之的去進行嗎？筆者覺得這樣還是太學術本位。尤其對女子教育課題的訪談，筆者必須特別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因為身為受過高等教育、且接觸過太多理論思潮衝擊的個人，已經在思想解放與現實生活的兩難上，產生了很多的衝擊與選擇。能只以學術的目的，堂皇的去影響他人嗎？恐怕應該避免。

參、研究資料

最後，在研究資料上有兩點心得，第一、所有有價值又經過受訪者同意的史料都應公開；其次，史料只要管理得宜，應該是對全民開放的公共財。

由於研究蒐集來的資料，大多是當事者的親身經歷或文獻遺跡，都是珍貴的第一手史料。若能經過受訪者同意，筆者願將所有訪談逐字稿、文件、照片等資料全數數位化，建立開放的平臺，提供給需要者使用，相信對未來歷史的研究將更有助益，也不會只限於筆者而已。

也免去各個研究者在研究時，如筆者般冒然衝進一個不熟悉的領域，除了找不到資料，更時有被某些網域拒於「牆外」的苦惱。若要使用，除非付費，或者為特定身分或得到特定地點的網域才能使用。目前，雖然已有許多史料數位化，非常方便歷史研究者使用，亦即現在的歷史研究者，較過去的歷史研究者幸福很多。但是這些前人遺留的史料，大多都應屬於公共財。除去管理、惡意剽竊、重

⁸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頁 14。

⁹ Patti Lather.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56, no.3,1986, p. 272.

製等問題外，實在不必如此重重設限，畢竟使用前人留下的史料，以進行研究，不應該是一種特權。

參考文獻

壹、中文資料

一、史料

- 不著撰者：《人生必讀》，新竹縣：竹林書局，2001年，木刻本重印。
- 不著撰者：《千金譜》，新竹縣：竹林書局，2000年，木刻本重印。
- 不著撰者：《四言雜字》，新竹縣：竹林書局，2001年。
- 不著撰者：《昔時賢文》，新竹縣：竹林書局，1999年，木刻本重印。
- 不著撰者：《昔時賢文注解》，新竹縣：竹林書局，1999年，木刻本重印。
- 不著撰者：《清聖祖實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不著撰者：《增廣賢文》，新竹縣：竹林書局，2000年，木刻本重印。
- 朱利注釋：《治家格言、增廣賢文、女兒經》，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呂杰全：《岳三小集》，作者自刊，1978年。
- 呂順安主編：《新竹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光緒24年)，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五輯》，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 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年。
- 林柏燕：《陶社詩集》，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1年。
- 馬偕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南市：人光出版社，1996年。
- 張氏新編：《四言雜字》，新竹縣：竹林書局，2001年。
- 連雅堂序：《人文薈萃》，臺北市：遠藤寫真館，1921年。
-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陳世峰編譯：《增廣昔時賢文》，鳳山市：世峰出版社，1999年。
- 陳培桂：《淡水廳志》(同治10年)，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年。
- 陳朝龍、鄭鵬雲編：《新竹縣采訪冊》(光緒二十年)，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陳運棟：《向陽書院詩文集》，臺北市：臺灣省政府文化處，1999年。
- 陳運棟：《穎川陳氏大族譜》，苗栗市：協和嘗，2000年。
- 黃南瑠：〈石光公學校之源起〉，1927年，收於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未刊。
- 劉國昌編：《善元劉公派下族譜》，未出版，1985年7月。
-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市：大通書局，1987年。
- 蔡崑山修訂：《增廣昔時賢文讀本》，新竹縣：竹林書局，1999年修訂二版。
-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謝金蘭編、新竹文獻委員會譯：《咸菜硼沿革史》，新竹縣：新竹文獻委員會，1953年。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16年。

二、專書

Michael J. Sandel 著、樂為良譯：《正義：一場思辯之旅》，臺北市：雅言文化，2011年。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1年。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0年。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書局，2008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臺北市：南天書局，1997年。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市：正中書局，2001年。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新竹縣：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2004年。

林洋港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林桂蘭主編：《新竹縣坪林國民小學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特刊》，新竹縣：新竹縣關西鎮坪林國民小學，2002年。

施崇武、劉湘櫻、唐菁莘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上)，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9年。

施淑宜總編：《見證臺灣總督府 1895~1945(上)》，臺北市：立虹出版社，1996年。

洪六：《新竹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新竹市：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1998年。

派翠西亞·鶴見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

范明遠主編：《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創校八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新竹縣：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1993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年。

徐慶松：《八十自述--徐慶松全集》，作者自刊，2003年。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創校六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新竹縣：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1973年。

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1998年。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年。
- 張典婉：《臺灣客家女性》，臺北市：玉山社，2004年。
- 張鐸嚴：《臺灣教育發展史》，臺北縣：空中大學，2005年。
-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
- 陳志豪：《機會之庄--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新竹縣：竹縣文化局，2010年。
- 陳南宏、戴玉蘭主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新竹縣：新竹縣關西鎮關西國民小學，1999年。
- 陳運棟：《天香吟社詩集存稿》，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6年。
- 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市：苗栗文化局，2001年。
- 陳運棟：《臺灣客家族群史·人物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曾水妹主編：《春風一百希望兩千--竹東國小百週年校慶》，新竹縣：新竹縣竹東國民小學，1999年。
- 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臺北市：月旦出版社，1997年。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市：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 湯錦台：《千年客家》，臺北市：如果、大雁出版社，2010年。
-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 黃卓權：《進出客鄉--鄉土史與田野研究》，臺北市：南天書局，2008年。
-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9)》，臺北市：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年。
- 黃國憲：《關西鎮誌(稿本)》，新竹縣：關西鎮公所，2000年。
-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新竹縣：新埔鎮公所，1997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20冊)，臺北市：捷幼出版社，1999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省通志稿》(第22冊)，臺北市：捷幼出版社，1999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灣堡圖集》，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臺灣通誌》，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劉立敏計畫主持：《關西坪林地區百年發展與文化記憶名錄》。新竹縣：竹縣下橫坑文化產業發展協會，2011年。
- 劉明怡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四新竹縣》，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10年。
- 劉淑英總編輯：《飛躍110再創巔峰--建功國小一百一十週年校慶特刊(1896-2006)》，苗栗市：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2006年。
- 劉漢初主編：《滋蘭集--北師壹百週年紀念文錄》，臺北市：國立臺北師範學院，1996年。
- 潘英：《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上冊)，臺北市：南天書局，2000年

- 編輯小組：《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新埔國民小學，1998年。
-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黎芳雄總編：《百年大愛千年大隘--北埔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新竹縣：新竹縣北埔國民小學，1998年。
- 鍾王壽主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市：常青文化，1973年。
- 龍漢宸主編：《增廣賢文》，北京市：燕京出版社，1996年。
- 羅肇錦：《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年。
- 蘇子建：《塹城詩薈》，新竹市：新竹市文化中心，1994年。

三、學位論文

-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
- 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臺北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1年。
- 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臺北市：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1999年。
- 江淑美：《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1684~1895）》，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 吳衿鳳：《龍瑛宗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屏東縣：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2003年。
- 宋健行：《我國傳統啟蒙教材研究--以臺灣地區為觀察重心》，花蓮縣：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張心愷：《明清時期蒙學施教所啟導之文化典範與應世智能》，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6年。
- 許楓萱：《清代明志書院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曾絢煜：《栗社研究》，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游馥瑋：《從國語傳習所看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年7月-1898年10月)》，臺中市：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 論文，1995 年。
- 黃震南：《臺灣傳統啟蒙教材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班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11 年。
- 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 賴韻如：《戰後桃園縣南勢國民小學校史之研究》，臺北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 簡志龍：《賴和漢詩中的社會現象分析與研究》，屏東縣：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2003 年。

四、其他論文

- 朱介凡：〈「增廣賢文」的幾段公案〉，《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臺北市：渤海堂文化公司，1995 年，頁 615-621。
- 朱玉娟、顏秀惠：〈《增廣昔時賢文》初探〉，《語文教育通訊》，22 期，2000 年，頁 69-82。
- 江嬾乙：〈石光國小日治時期的升學表現及傑出校友〉，葉文滋、王文俊主編：《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百週年校慶特刊》，新竹縣：新竹縣石光國民小學，2013 年，附件。
- 吳中杰：〈客語次方言與客語教學〉，曹逢甫、蔡美慧編：《臺灣客家語論文集》，臺北市：文鶴出版社，1995 年，頁 289-306。
-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 卷第 3 期，1978 年，頁 62-89。
- 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 卷第 1 期，1988 年，頁 101-108。
- 周慶華：〈歷代啟蒙教材中兒童觀念的演變及其意義〉，《孔孟月刊》，37 卷 8 期，1999 年，頁 30-37。
- 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東師專學報》，11 期，1983 年，頁 1-81。
- 黃卓權：〈拓墾家黃南球傳〉，《三台雜誌》，10 期，1987 年，頁 44-49。
- 莊吉發：〈從現藏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文教措施〉，《臺灣文獻》，51 卷 4 期，2000 年，頁 15-31。
- 陳聰明：〈清代臺灣地區客家教育略述〉，《史聯雜誌》，18 期，1991 年，頁 156-170。
- 陳鸞鳳：〈戰後桃竹苗之客家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施雅軒等著：《第六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2002 年，頁 43-64。
-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臺北市：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5 卷 1 期，頁 91-139。
- 賴玉玲：〈清代咸菜甕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客家人拓墾〉，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論文集》，2002 年，頁 101-122。
- 羅肇錦：〈清代臺灣書院童蒙教育初探--通行童蒙書所呈現的教學理念〉，古鎮清總編：《崇文載道書院情》，南投市：臺灣省政府文化處，1999 年，頁 156-164。

貳、日文資料

-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市：谷澤書店，1916年。
- 不著撰者：《苗栗廳報》，苗栗廳，1904-1908年。
- 不著撰者：《桃園廳報》，桃園廳，1903-1920年。
- 不著撰者：《新竹州報》，新竹州，1920-1927年。
- 不著撰者：《新竹廳報》，新竹廳，1901-1920年。
- 五味田恕編：《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市：菅武雄，1938年。
- 片崗巖：《臺灣風俗誌》，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年。
-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手書稿，未出版。
-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年。
- 江立保為戶主的戶籍謄本，竹縣關戶謄字第(甲)004933，2012年5月7日列印。
- 江兆和使用：《公學校家庭通信簿》，未明單位，1932-1938年。
- 江兆和使用：《軍隊手牒》(陸軍)，未明單位，1944年。
- 江阿德為戶主的戶籍謄本，竹縣關戶謄字第(甲)004933，2012年5月7日列印。
-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一)》，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08年排印，1985年重刊。
- 社會課編纂：《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手帳》，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2年，江兆和使用本。
-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臺北市：成文書局，1906年排印，1985年重刊。
-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大正10年)》，新竹州，1923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大正11年)》，新竹州，1924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三統計書(大正12年)》，新竹州，1925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大正13年)》，新竹州，1926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昭和6年)》，新竹州，1933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三統計書(昭和8年)》，新竹州，1935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六統計書(昭和6年)》，新竹州：1938年。
- 新竹州：《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13年)》，新竹州：1941年。
- 新竹州：《新竹州要覽(昭和12年版)》，新竹州，1937年。
- 新竹州：《新竹州要覽(昭和15年版)》，新竹州，1940年。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一覽(昭和4年)》，新竹州，出版年不詳。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新竹州：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1932年。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8年)》，新竹州教育課，1933年。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9年)》，新竹州教育課，1936

- 年。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 10 年)》，新竹州教育課，1937 年。
- 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 11 年)》，新竹州教育課，1938 年。
- 新竹州衛生課：《新竹州衛生概況(昭和 11 年度)》，新竹州衛生課，1938 年。
- 新竹廳：《新竹廳統計摘要(明治 41 年)》，新竹廳，1909 年。
- 新竹廳：《新竹廳統計摘要(大正 7 年)》，新竹廳，1919 年。
-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898-1935 年。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南天書局，1939 年初版，1995 年重刊。
-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計要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12 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戶口統計(昭和 18 年)》，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4 年。
-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二十八年報》，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2 年。
-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事第三十六年報》，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0 年。
-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八年)》，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4 年。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 31 年統計摘要》，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36 年。
- 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花蓮訓練所，《第二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員名簿》，1943 年，12 月。
- 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新竹訓練所，《第三十一回勤行報國青年隊名簿》，1944 年 3 月。
- 臺灣總督府新竹第二青年特別鍊成所，《第二回隊員名簿》，1944 年 9 月。

參、英文資料

- Derrick Armstrong. Historical voice : philosophical ideal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voice'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32, no.2, pp.201-217, 2003.
-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P. Brown, H. Lauder, and A. S. Wells (eds.). *Education :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pp.45-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 S. Coleman. Society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pp.95 -120.
-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Patti Lathe.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56 no.3, pp.257-277, 1986.

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E. Patricia Tsurumi ,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肆、網路資料

天主教內思高工--在台復校五十週年校誌(1954-2004)，〈肆章、筆路藍縷、胼手胝足〉，網址：http://www.savs.hcc.edu.tw/50years/htm/04_r_3.html，查詢日期：2013年3月1日。

苗栗縣大同國小網頁，〈校史沿革〉，網址：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3/C0331360136/dt.htm>，查詢日期：2013年6月7日。

苗栗縣通霄國小網頁，〈沿革大事紀〉，網址
http://www.te.mlc.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2&Itemid=1171，查詢日期：2013年6月7日。

徐養齡，〈關西陳家出 19 醫生可開綜合醫院〉，網址：
<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8098>，查詢日期：2013年2月1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歷屆校友名冊〉，網址：
<http://r8.ntnu.edu.tw/pastalu/01-06.htm>，查詢日期：2013年1月11日。

張致遠，〈苗栗縣各族群語言的變遷初探〉，網址：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6-4.htm>，查詢時間：2012年8月20日。

陳板，〈南湖陳隆昊老屋要整修〉，網址：
<http://blog.nownews.com/article.php?bid=736&tid=18709&tyid=D>，查詢日期：2013年2月1日。

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鑑〉，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amesyang-007/article?mid=40698&prev=-1&next=4067>，查詢日期：2013年2月28日。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五十年來教育統計概況〉，網址：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Edu.htm>，查詢日期：2013年3月4日。

臺灣歷史辭典-八畫-〈青年訓練所〉，網址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08/cca220003-li-wpkbhisdict001754-0541-u.xml>，查詢日期：2013年3月2日。

鹹菜甕客家文化工作室，〈關西文化旅遊行腳-1 百年老樹生態之旅〉，網址：
<http://archives.hakka.gov.tw/blog/josef5274/articleAction.do?method=doViewBlogArticle&articleId=NzEzODM=>，查詢日期：102年2月19日。

鹹菜甕客家文化工作室，〈關西文化旅遊行腳-3 關西三合院古宅之旅(一)〉，網址：<http://land.ihakka.net/blog/josef5274/none>，查詢日期：2013年2月19日。

鹹菜甕客家文化工作室，〈關西鎮大同里陳家茄苳樹〉，網址：<http://travel.hsinchu.gov.tw/page.aspx?wtp=1&wnd=182&id=593>，查詢日期：2013年2月19日。

附錄一 採訪日誌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紀	時間	地點	說明
1	徐金統	男	83歲	2012年 04月25日(二) AM9:00~12:00 7月12日 去電，將相片於8月中歸還	新力里徐宅	1、1943.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公學校 1~3 的暑假曾遠征芎林念私塾。 2、中學考上花蓮農林學校，戰時休學，光復後轉學至桃園農校畢業 3、民 42.09.01~78.08.01 任職坪林國小教師 3、筆者國小 3、4 年級 (71、72 學年度) 老師 4、 借得 30 張老照片。【要護背，再歸還】 5、 口齒清晰、記憶力佳的重要報導人。
2	江金棟	男	1951-61歲	2012年 04月25日(二) PM7:00~8:30 7月12日 去電，棟嫂接，資料可慢慢用，整理好再還。	新力里江宅	1、與筆者同高祖父江永發 (1837.1.9-1908.8.18，永發乃祖譜名、日治戶籍謄本為阿德)，呂里長提供的清代古文書有高祖父代筆 2 張，各用永發及阿德署名，留有「義民嘗總經理江永發」木牌一塊。 【依留下文書推論其文筆程度頗佳，當上過私塾】 2、 借得高祖父留下祖譜、童蒙百科；堂伯江兆和 (1925.6.12-2005.6) 石光公學校家庭聯絡簿、畢業證書 (1938)、紀念冊，及青年團小隊長訓練等各項資料。【記得整理成冊，再歸還】 3、為筆者堂哥，是永發長子立本、次男接養、3 男兆和 (原為長子接技 4 子過繼次男接技) 長子；筆者為永發 4 子立保、次男接松、長男兆二次女。
3	范光建	男	83歲	1、2012年 4月27日 (四)AM 10:30-11:30 2、同上 PM: 3:00-4:00 3、5月 7日	1、坪林元和宮 2、上林里范宅	1、1943.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 2、中學考上花蓮農林學校，念至三上，光復後轉桃園農校畢業。 3、與花蓮農林學校的校友聯繫佳，每 2 個月到花蓮開同學會。 3、其女兒范美華曾任國大代表。 【向其歸還之前向其女兒借得之《十子十登科----范朝燈》一書】 4、曾指導 4 位日本的博士生到訪台灣研究日治時代台灣相關的教育，並與對方父母成好友。5 月 8 日至 15 日，其中一位的父母到訪，與范光銘 (范朝燈 5 子) 老師同為招待。 5、翻拍坪林國民學校畢業紀念冊。

			(一) AM: 9:00~10: 00			
4	呂里長清浪	男	70歲左右	2012年4月29日(日) PM: 7:00	新力里呂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擁有祖父留下的前清時代古文書(其中有2張為筆者高祖父代筆),及日治時期相關資料,借拍及借得相片檔。 2、祖父呂廣就,又名呂阿常。 3、姪子呂勝春(1943-)加州大學生化博士,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2004-7),現任台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所教授、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4、介紹江穎川伯、石光國中退休老師鍾志豪、郭寶珠夫婦。
5	邱總務主任秀惠	女	50歲左右	2012年4月30日(一) PM: 1:00 -3:00	石光國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由范光建老師電話介紹,為其堂姪媳。 2、借得影印昭和4年重編的《學校沿革誌》活頁資料,保留日治時期重要的學校師生等相關資料,用小楷寫成,有些有頁碼,有些則無,日治時期重要學校大事記詳實。經多人前後增補資料,筆跡不一。 3、另借得2份昭和年間畢業紀念冊翻拍檔。 4、拜見現任潘校長淑華,明年(2013年)為石光百週年校慶,允助編校史。 5、巧遇堂嫂,在該校任工友,堂叔兆鑑曾任該校4任(13、16、17、18)家長會會長。
6	江穎川	男	1937歲	2012年5月1日(二) AM: 9:00~11: 30 7月12日 去電,8 月中還 書。	西安里江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呂里長介紹為其姐夫,後確認為「同年」關係,非親姐夫。 2、詢問父親為前國大代表江順裕叔叔,父母曾為其助選。同為六桂宗親會的宗親。 3、曾任關西社區大學教吟詩作對及禮俗等,傳承客家語言文化。 4、現任第一屆「新竹陶社詩會」理事長,100年立案,榮譽會長為前陶社社長徐慶松,仍在世。 5、借得《新編註解初學指南尺牘》、《改良分類指南尺牘》,及《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合訂本》各1本。前2本蒙書為其丈人所用書,前本有朱筆紅點,後1本較小本則無。至於百年之書乃因封面為吳秀才榮棟創立以文吟社住宅。(今桃園縣縣長吳志揚的曾祖父) 6、記得將訪問錄音檔傳給呂里長:7月12日已傳mail,但錄音檔太大,8月中北上改送隨身碟。
7	范士敬	男	1923歲	2012年5月2日(三) AM:	上林里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石光公學校第17屆(1935.3)畢業生,認識江兆和堂伯(20屆畢業生,1938.3),戰時同青年團受訓。 2、畢業後曾上過半年私塾,祖父范炳芳也曾任塾師。 3、借得《童子尺牘》、《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圖百家姓》各1本及《白

			90 歲	9:00~11: 30 7月12日 去電，畢 業證書等 已遺失， 預定8月 中還書。	宅	<p>話註解初學指南尺牘》2本，共4本。</p> <p>4、坪林國小教師（1946.7.1-1947.9.1；1961.9.5-1980.9.1 退休）。</p> <p>5、為筆者小一上學期的導師，後由黃玉春老老師接任，2班合為1班。</p> <p>6、口齒清晰、記憶力佳的重要報導人。</p>
8	劉 建 榜	男	83 歲	2012年 5月2日 (三) PM: 3:00~4:0 0	新 力 里 劉 宅	<p>1、1943.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p> <p>2、初中考上花蓮農林學校。</p> <p>3、可再訪問，但問題要更具體。</p>
9	劉 士 賢	男	約 76 歲	2012年 5月5日 (六) AM: 8:00~11: 30	坪 林 國 小	<p>1、坪林國小 70 週年校慶，遇到很多國小老師：范士敬、徐金統、賴院香、劉士賢老師等，劉士賢老師介紹可訪劉建燈老師、陳送妹老師及邱金球校長等。也遇到劉建榜、范光建老師。</p> <p>2、並遇見筆者國中時的女童軍團團長張明英老師，現任新埔國中校長，事後上網查，新埔初中成立於民國 35 年，光復後。</p> <p>3、另外黃平金老師介紹邱福興伯（坪林國小第三屆畢業生，光復前一屆）。</p> <p>4、另外，母親指點認識了范光銘老師。</p>
10	范 光 銘	男	83 歲	2012年 5月7日 (一)AM 10:00~1 1:40	南 和 里 范 宅	<p>1、1943.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p> <p>2、考上新竹中學校，除了成績好外，父親是范朝燈可能更關鍵。</p> <p>3、范朝燈的 5 子，前面的哥哥留學日本，後面的弟弟留學美國、加拿大。筆者國中同學的父親，有山地園林途經筆者老家，從小就聽聞奶奶指著跑步中的背影，得知其名。</p> <p>4、民 78 年關西農校退休。</p> <p>5、拍得「二宮尊德」石像。</p> <p>6、稱范光建為兄，同一家族，感情良好。</p>
11	江 阿 德 、 江 立 保	男		2012年 5月7日 (一)PM 3:00~3: 30	關 西 戶 政 事 務 所	<p>1、調出日治時期高祖父江阿德及曾祖父江立本的戶籍謄本，才發現族譜中高祖父的名字是永發，戶籍登記的卻是阿德。</p> <p>2、高祖父江阿德：1837年(道光 17)7月19日~1908年(明治 41)8月18日逝，享年 72 歲。曾祖父江立保：1882年(光緒 8)8月10日~1949年12月24日因心筋炎在本籍地死亡，享年 68 歲。</p> <p>3、家中所有外姓女性，皆為童養媳，有 4 個月即抱來者，如高祖母姜賢妹；5 歲的立本妻黃完妹、立興妻陳秀妹，6 歲的立禎妻呂熊妹，9 歲的立保妻彭位妹，10 歲的立龍妻張足妹；接枝妻彭拈</p>

						<p>妹 1 個月大即入籍，接養妻 1 歲半即入籍；接陞妻楊喜妹 10 歲入籍。</p> <p>4、另訪，三叔婆（1927-）本為陳家人 3 歲大即被當家 80 多歲的婆賣給葉家當童養媳，另買入一男嬰為其弟，其後續弟妹皆有讀書，只有她沒讀書。但與葉家人無緣，海外戰死，22 歲嫁入江家。</p> <p>5、立保的戶籍謄本上記載立保為佃農，在教育程度上與其長子接春皆為「私二」，經問三叔婆為何大伯公沒念公學校？回答他可能有念私塾，因此可以判斷立保雖為佃農，但與長子都有接受過私塾教育。次子接松、三子接春皆為「高小」，經查石光國小 90 週年校慶特刊中的畢業生名冊，發現分別為第 14 屆（1932.3）及第 22 屆（1940.3）的畢業生。【依時間判斷，祖父念石光公學校時，學校仍有教授漢文，因此其國、日語皆通，生平簿記出現日文也就不奇怪了。依此推斷我幼時見過的國語、修身等日語課本當為祖父的課本。】</p>
12	邱福興	男	82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二) PM3:00 ~5:00	新埔鎮新關路邱宅	<p>1、1945.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三屆畢業生（光復前一屆），夫妻為同學，感情良好，妻為賴香妹女士，一同受訪。前些年辦同學會，邀請師長參加，近年體力下滑才暫停。</p> <p>2、日治時為新力里佃農，與筆者祖父江接松熟識，其兄長為邱福相，為避當兵，考上警察，光復後曾任 20 幾年新力里里長。</p> <p>3、電話介紹同學楊美蓮老師。</p> <p>4、並約下週一同去平鎮拜訪楊美蓮老師。5 月 14 日電詢，邱伯及楊師皆先後感冒暫，停訪問，留待下次。</p> <p>5、要筆者轉交一張相片要給陳送妹老師【未成，陳師拒受訪】。</p> <p>6、7 月 12 日去電，告知尚未將相片送給陳送妹老師，8 月中會再次到訪。</p>
13	賴香妹	女	82 歲	5 月 8 日 (二) PM3:00 ~5:00	同上	<p>1、1945.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三屆畢業生（光復前一屆）</p> <p>2、邱福興夫人</p>
14	楊美蓮	女	82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二) PM4:30 ~5:00	電話訪問	<p>1、1945.3 坪林國民學校第三屆畢業生（光復前一屆），依邱福興伯的講法，她從小成績優秀又美麗是男同學的夢中情人。</p> <p>2、光復後曾任坪林國小教師（1948.11.3-1954.4.3），其父為楊習日，坪林光復後第 2 任校長（1949.2.26-1972.10.1），第 4 任家長會長（1974.9.1-1977.9.1）。</p>
15	陳送妹	女	93 歲	2012 年 5 月 8 日 (二) PM5:30	電話訪問	<p>1、日治時期逢茂農園的經營者陳傑昌的女兒，陳潤源的姐姐，許貝妹女士的二姑。</p> <p>2、曾教過邱福興伯、劉士賢與賴院香等，日治時期即任教坪林國小 1940.3.1-1950.8.1。</p>

				~6:00		3、不樂意受訪，另推薦陳嫦娥老師【南和里人，但沒有要到電話】 4、 <u>事前劉士賢老師即說，最好是他或許貝妹女士等親自帶訪。</u>
16	劉建燈	男	88歲	2012年5月9日(三)AM 9:30~11:30	新埔鎮劉宅	1、石光公學校第20屆畢業生，與江兆和、邱金球校長是同學。 2、曾任職坪林國小(1942.2.1-1991.2.1)，中間亦曾調至照門國小和關西國小。
17	高玉嬌	女	81歲	2012年5月9日(三)AM 9:30~11:30	同上	1、新埔國校畢業，曾考上高等科但念一學期即光復未繼續，頗遺憾。 2、劉老師建燈的夫人，感謝年輕時筆者父親常幫她忙。
18	邱金球	男	88歲	1、2012年5月10日(四)AM9:00~11:00 2、2012年5月15日(二)AM10:00~12:00 與潘校長一同採訪	竹北市邱宅	1、石光公學校第20屆畢業生(1938.3)，與江兆和、劉建燈老師(坪林國小退休)、陳雙錦老師(石光國中教英文、退休)是同學。 2、《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頁223，新埔國小高等科第17屆畢業生第5名，1941年3月。 3、昭和17年(1942.3.31-1943.3.31)任石光國民學校助教1年，後考上臺南師範屏東預科，1946.5.25-1950.7.31坪林國小教員，1953.9.1-1954.9.1任石光教導主任1年。 4、與兆和伯是同學也是好朋友，對新力里、坪林與上林里的往事、故人如數家珍，更填范朝燈頗多祕辛，雖多次受人訪問，但仍相當仔細清楚。 5、其堂弟邱金鑑曾教筆者父親，其妻劉香蘭為下橫坑(今新力里)保正劉滿元的女兒。夫人曾任教照門、坪林(1946.5.25-1950.7.31教員)、山崎等，後照顧小孩辭職在家縫紉貼補家用，再因民57年推行國教重返職場，任教石光國小至80年退休。(夫人經歷由其長女及校刊補) 6、5月16日(三)9:40來電更正太平國小講習所講師劉煥堂、林阿「亮」，並說「有空再來」 7、 <u>5月18日(五)AM11:15來電。建議：1、應將論文列大綱2、44歲至今有寫日記習慣留下重要資料3、出版相關教育作品已整理、4編有邱氏族譜可送我，可補充祖父事蹟5石光畢業至20屆皆有認識的人等。</u> 8、7月12日去電，大姐接，預定8月中再次到訪。邱校長已將紀念冊中熟識者圈出上百人。
19	劉范鏞	女	91歲	2012年5月11日(五)	石光里	1、為劉建燈、劉建榜兄弟的大嫂，其夫建光日治時即在庄役場工作，雖考上警察，因家族反對，未上任。 2、本以為其未上學，卻得到其對日文推廣的說明，在三年正規的講

	妹			AM9:00 ~10:00	劉宅	習所外，尚在元和宮請淦元全老師，為 20 歲以上失學的人，以婦女為多，進行日語對話教學(講習所)。 3、此為其 5 弟媳黃平金老師帶訪。
20	曾秋梅	女	82 歲	2012 年 5 月 11 日 (五) AM10:00~10:20	石光里美容院	1、劉建榜夫人對筆者父母讚不絕口，尤其是母親。 2、為童養媳，雖然警察有「調單」通知應去講習所上課，但被二哥建燈說已將名字劃掉，因此未去。 3、雖沒機會上學，但因公公劉永木為甲長，請上過公學校懂日語的婦人，教家中採茶的女工日語，參與者近 10 位。

北上待訪人名：

- 1、石光國中宿舍：石光國中退休老師鍾志豪、郭寶珠夫婦（呂清浪里長介紹）。
- 2、石光國中宿舍：石光國中退休英語老師陳雙錦，電話(省略)。邱金球校長國小同學、好朋友。
- 3、之前電訪的楊美蓮（邱福興伯）、陳送妹老師（許貝妹、劉士賢）。
- 4、呂耀樞、范碧蓮夫婦（呂阿全子媳，竹東呂內科）。
- 5、再訪邱金球校長（贈相片）、范士敬師（還書）、徐金統師（還相片）。
- 6、陳嫦娥老師（南和里人、劉香蘭老師好朋友、陳送妹老師推薦，可向邱校長要電話）
- 7、馮老師（寶石補校女教師，教母親以客語讀昔時賢文、日本歌者）。

二次北上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紀	時間	地點	說明
1	徐金統	男	83 歲	2012 年 8 月 9 日 (四)PM : 2:00~4:00	新力里徐宅	1、歸還老照片作成冊，並附上掃描檔。 2、多聊徐老師回原鄉修祖墳、捐宗族獎學金及助學一事。祖籍蕉嶺(鎮平)，15 世麟鳳公於清末來台。
2	邱金球	男	88 歲	2012 年 8 月 10 日 (五)AM 9:00~11:00 (1925~)	竹北市邱宅	1、邱校長講解他所認的第 1 屆至第 14 屆之間較有成就或他認識的人。 2、第 8 屆第一位是陳能雲，受陳逢茂賞識，在農園工作，後來 2 個兒子(陳全育、陳全仁)拿到博士，與范朝燈起在坪林國小設置博士獎。後移民加拿大。 3、介紹陳俊玖(接羅享錦任關西庄長)、陳俊深(開發馬武督，昭和 17、8 年招待石光的教師旅遊)、陳俊樓(留日習法律，後回台為新埔初中第一任創校校長)、陳俊宏(新埔醫生)、陳俊明(關西有明的醫生)5 兄弟，是關西茅子埔非常出名的家族。--可再追查 4、應將石光的學校沿革誌留給校長一分，應可勾起他更多回憶。 5、邱校長編有邱氏族譜，但書已少無法借得。封面為丘念台(丘逢甲子)題字、寫序。 6、借得一本《新竹縣鄉土史料》，記得還。

3	范士敬老師	男	90歲	2012年8月14日(二)AM 9:00~11:00	上林里范宅	<p>1、歸還4本童蒙書，借拍得老師公學校畢業證書及其他生平履歷證書，及日治戶籍謄本。忘了拍退休匾額。</p> <p>2、問得范家簡易傳承，如其祖父輩為范傳芳、范炳芳。傳芳有4子洪正、洪添、洪漢、烘灶。范朝燈為洪添長子，朝棟、朝珍。范朝棟關西國小第2屆畢業生曾任教石光公學校，即范鼎香之父，鼎香生4子長子為范揚浩，坪林國小第二屆畢業生。范炳芳是其祖父，生子洪熙，洪熙生4子文賢(明治35)、士珀(明37)、士弘(明40)、士敬(大正12)。</p> <p>3、辨明國語講習所、國語夜學會、同窓會、國語演習會的不同，及關西公會堂的設置(羅碧玉出資建)。</p> <p>4、坪林博士獎設置於60年左右。</p> <p>5、日本人有4大節：新年、明治、天長、紀元等(節日不太確定)</p>
4	江穎川	男	75歲	2012年8月14日(二)PM 3:00~4:00	西安里江宅	<p>1、說明未還書的理由。</p> <p>2、閒聊穎川伯的出國經歷</p> <p>3、介紹他的大哥公學校畢業後到日本半工半讀做鐵工(戰時)</p> <p>4、他的大姐公學校畢業後念到高等科。</p> <p>5、有竹東朋友借他一本日本童謠歌本。-應借至街上影印。</p> <p>6、轉贈陶社詩會課題第八期。並講解其中詩的好壞、典故，及如何修改。第九期是徐慶松堅毅事蹟。(見到關西國小退休教師黃金秀之名，及羅慶堂之名，羅慶堂應與關西的羅享錦等有關，可進一步追問。其中也有85歲的梁煜堃可訪問。)</p>
5	陳双錦	男	88歲	2012年8月15日(三)AM 9:30~11:00	石光國中老師宿舍	<p>1、邱金球校長、江兆和伯的石光公學校同學。</p> <p>2、父為陳立德，日治時為地主，收租。兄陳双祿，大其17歲。留學日本習醫。故其也於公學校畢業後，留日念崗山的關西中學5年，後升一所私立大學至大二時，日戰敗回台。</p> <p>3、陳双祿石光公學校畢業，考上竹中念5年，考上高等學校理科念3年，留學日本公立崗山縣的醫學大學。(邱校長：在關西開設有田醫院)</p> <p>4、介紹球友余新源(89歲，關西鎮公所祕書退休，妻曾教國語講習所)，及楊澄清(87歲)、邱永貞夫婦(國小教師曾任教坪林及關西)接受訪談。以上3位皆是日治時期在關西公學校畢業。</p> <p>5、呂里長提及的鍾石豪、郭寶珠夫婦住陳老師隔壁，但夫人說鍾為外省人，郭為閩南人，故決定取消訪談。</p> <p>6、電話追問：A 父親之前家住何處？茅子埔(今大同里)B 鼓勵范朝燈送光霖留日的陳阿郎是否認得？建議問范光建 C 兄陳双祿回台後在何處執業？關西有田醫院，今其子仍在關西執業。D 陳老師說若找到日博士生的論文可借閱。</p>
6	余	男	89	2012年	北	<p>1、父為余逢春(和旺)，關西公學校畢業(第5屆)，農業實驗場出來，</p>

	新源祕書		歲，日大正13年	8月16日(四)AM 10:00~11:50。	山里余宅	<p>在庄役場工作，任產業技手。父親幼時在家中即會教其日語。</p> <p>2、本身關西公學校(33屆)6年畢業，考上桃園農校5年，畢業後經父親友人介紹至新竹州廳上班半年，後被徵兵訓練，半年後即光復。</p> <p>3、妻范氏日妹，關西公學校(35屆)任班長和楊澄清是同學)畢業後，念關西農業補習學校2年，後在太和宮教幼稚園。</p> <p>4、借得日治時期第二屆桃園農林學校相關相簿一本，拍完盡速歸還。(已還)育有2子，小身子余俊傑在電信局上班，弟為余新禧已逝。</p> <p>5、關西有3家大地主(有錢人)上南片的羅屋、坪林范家、茅子埔的陳家，陳俊玖(關西庄長)、樓(新埔初中首任校長)、明(關西名醫，子為銘德牙醫師)是兄弟，父為陳遠芳；但陳俊深(子陳興盛曾任關西鎮長)、宏(新埔名醫)另為兄弟。</p> <p>6、介紹關西公學校33屆畢業生上百人只有13人左右升學(皆可指出姓名)，到6年級時要升學的導師太田棟吉(1班導師)、蔡清亮(2班導師)會於課後免費留校指導，蔡師較嚴格，因此升學的學生狀況較好，有3位余玉振、葉清燕、林安富念竹中，後2位並於畢業後留日，一未有成就，一游泳溺死。其中有4位皆為在校老師的子女。</p> <p>7、認得的師長有陳興城、魏庚全(前二者為夫妻)、田賢雲(女田焄招)、鄭揚萍(子奕招)、朱金鑑、朱新在等，其他林潤木(子修竹)、羅慶增(子吉煊，後為彰銀董事)等，括號中4子女皆升中學。</p>
7	楊澄清主任	男	87歲	2012年8月17日(五)AM 9:00~11:40	西安里楊宅	<p>1、關西公學校35屆畢業生。</p> <p>2、後任國小教師、教導主任。曾任教坪林、關西。(訪前資料)</p> <p>3、父母念過私塾，母塾師為邱運金，會糾正其《增廣》的讀音。應補問其父母大名。</p> <p>4、關西公學校6年，升關西農林專科學校(應為關西農業補習學校)2年，考上竹師簡易師範1年，派錦山國民學校教2年，後33年3月轉回關西教至39年，後曾任教石光、東安、坪林、關西等校。與陳雙錦、鍾志豪是好朋友。</p> <p>5、受到呂杰全老師賞識，派其為東安國小教導主任，受贈《岳三小集》一冊，可惜訪問時未找到，找到可借。(已在呂杰全媳范碧蓮處借得影印)</p> <p>6、公學校時受教於田賢雲(1、2)、翁廷嘉(3)藤井老師(4、5)、木本正二(6)等老師，農校時則受到高木勇老師賞識，高木老師後轉至新竹女子高等學校任教，其在新竹廳工作時曾住其家，另師範的羽場老師及夫人，亦待他們同學甚好，曾請羽場老師到臺灣玩，分別由臺北、新竹、臺中及高雄的學生接待，也曾在羽場老師過</p>

						<p>逝後集資給奠儀及到日本辦同學會順便安慰師母。【師生感情深厚】</p> <p>7、對國語講習所頗多認識，錦山因失學者眾，開班較多，<u>主事為劉碧嵐老師，但講師多為女性，因為講習所女學生為多。</u>例如余新源妻范日妹女士(讀女生班)，楊澄清與范弟綱湖是同學。</p>
8	邱永貞老師	女	83歲	2012年8月17日(五)AM 9:00~11:40	西安里楊宅	<p>1、關西國民學校 38 屆(民 31 年 3 月)畢業生。</p> <p>2、坪林、關西教師(頁 142，坪林校長邱創城的一、二年級啟蒙老師)(訪前資料)</p> <p>3、楊澄清夫人的母親為邱貝妹(芎林人)、父黃德助(入贅)在鐵路局工作，會日語，其姑姑黃月妹受德助之助，於關西公學校畢業後念台北第三高女，檢定後有訓導資格，在關西公學校教，也至關西農林專科學校(應為關西農業補習學校)兼課，擅長音樂、跳舞，教學嚴格。是關西有名的美人。經楊澄清主任指稱關西百年紀念校刊 55 頁的陳魏庚全女士照片其實是黃月妹老師。楊任教關西時曾為黃月妹同事，其言當屬可信。</p> <p>4、一年級由姑姑黃月妹教，二、三年級小川アヤ、四年級座間味盛榮、五年級曾被蔡清泉、渡邊老師(女，和尚妻)，最後由盧仁祥老師教至畢業，<u>盧仁祥於錦山國民學校高島校長離職後接任校長一職。【雖錦山屬偏僻地區，但日治時台人可接校長者稀少。】</u></p> <p>5、後因母過逝(2、3 歲時)，交由黃月妹照顧。父親搬至臺北另娶後母，邱永貞於公學校畢業後，至臺北依父，考試後念中山北路的宮前女中(即淡江高等女學校)，為馬偕辦的學校之一，光復後併入淡江中學。學校有教會老師，也曾被馬偕的後人教到，但學校以日本老師為多，學生來源來自全島各處教會信眾，但沒有信仰者亦可考入就讀。</p>
<p>2012 年 8 月 18 日訪後心得：</p> <p>1、關西公學校的校長是關西街教育權力最大者，屬市區學校，日籍老師較石光、錦山、坪林為多。就讀關西的余新源、楊澄清、邱永貞在公學校至少遇到一半的老師為日籍，就如楊所說日臺籍老師為一半一半；反觀石光、坪林，除了校長一定為日籍外，公學校六年可能只遇到一位日籍老師，或者全部被臺籍老師教到畢業。</p> <p>2、更不用說日臺薪資是不對等的，一樣是訓導或教員心得，薪資就差了 5 分之 2 左右。</p> <p>3、依楊澄清主任 18 歲就進行教學研究的示範教學工作，及其說明；加上石光《學校沿革誌》中的記載，研究會常在坪林分校辦理，常由一些年輕或新進教師負責，少部分會出現較資深優秀的老師，如書法特優的呂杰全老師。由此可知：教學研究會與今日教學觀摩相近，沒有人喜歡示範教學給眾人品評，常指派一些年輕的臺籍教師示範。【就是這份工作大家都不喜歡，就指派一些年輕或新進老師負責。古今同矣！】</p> <p>4、查閱了關西 100 週年、石光 90 週年、坪林 60 週年的校慶特刊中的教職員名錄與畢業學生名冊後，發現：早期的畢業生常成為在地的早期的臺籍教師，符合日治時期的教育目的，一般人受公學校教</p>						

<p>育培養國民的美德即可；較優秀的人才即入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培養成公務員或公學校教師，而這些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畢業後也大多返鄉任教。所以常見到石光畢業的學生若不回石光教，也多至關西，關西畢業的學生也多回關西或至石光、坪林、錦山等校任教。【與今日學校評鑑的教授所說的：今日高中的教師多是該校在地的教師。因此明星學校的形成並不是有特別優秀的師資，而是在入學時學生依成績分發選擇的結果。古今同矣！】</p>						
9	關西長老教會	組織	1922~	2012年8月19日(日)AM9:00~PM1:00	關西鎮老街26號	<p>1、之前看過馬偕博士日記，問弟妹，弟妹原生家庭即參加嘉義長老教會，回新竹會至關西長老教會禮拜。得知禮拜進行用客語。弟妹自學客語並參加初級檢定通過。</p> <p>2、週三下午散步至教會地址，問鄰居長輩，何時到訪方便？回答週日禮拜會有8、90歲長輩可受訪。</p> <p>3、首先認識蔡明珠長老，家族自曾祖父於日治時期即開始信教，一家五代都是教徒，工作分散各地，但假日都會回教會禮拜。蔡婆婆(鄒子英)、一女(煮愛餐、借我八十週年特刊)一子(將國語宣教譯成客語)，媳蒙秋蘭在中科院工作，本是臺北人，嫁入教會家庭即參與教會活動，非常注意、照顧我參訪的細節，留我的手機電話，說她姪子考上高雄大學有機會到高雄。一孫幫忙煮愛餐，態度大方自在。</p> <p>4、陳治仁傳道50歲，男，碩士論文寫的是1960至？加拿大的移民教育，專長是教育。幼教孩子叫他胖叔叔。是目前負責教會宣導的人，原是加拿大人，傳道觀念先進，有傲骨。通國、英、日語，正在學客家話。活動多，教會平日常空城。</p> <p>5、另一位「麥牧師」負責青少年的主日學課程，對我的參訪有提點協助的效果，非常感恩。使會眾瞭解並接受我的參訪目的。</p> <p>6、心得：並非第一次接觸教會，卻是最感動又最有收穫的一次，有空我應該會再去。</p> <p>7、論文資料若引用，答應會贈送論文。</p> <p>8、有些似乎是書中才會出現的人，如馬偕的家人，信徒鍾阿妹、胡姓的抗日先輩(不會是胡阿錦吧!)，竟然都從訪談中問到。</p>
10	廖金德	男	邁向80歲	2012年8月19日(日)AM9:15~AM9:30、PM12:00~15	關西鎮長老教會	<p>1、錄音筆電池裝反，第一段沒錄到音，只能用筆記，第二段太吵，吃飯中。趕快補記。</p> <p>2、父為廖梁水，吃双姓。父親於50歲左右，昭和年間去龍潭看中元節，打風時，都好躲在龍潭的教會的門前，聽講試到不錯似信教。開始歸家人似信教。父前妻生3子，金德為繼室所生下有一弟一妹，本身耕種、種茶，生有5子3女，以前也信教，工作後子女即分散各地。(今日只有孤身前來)</p> <p>3、家住銅鑼圈(屬桃園龍潭)，雖龍潭、關西皆有長老教會，但來關西只要3公里，龍潭要6公里，因此來此參加。記得7、8歲時來參加主日學，最記得是日本人發每家屋下一尊天照皇太神，</p>

						<p>該是騙人的，上帝才是唯一真神。該下主日學由石光人的嚴寬准傳教。</p> <p>4、 厝讀銅鑼圈國民學校，讀 5 年斯光復了，斯是這下的高原國小。該下的先生一年生是校長才「今」校長教、2 年生宋勝發、3 年生林亮政是日本人、5 年生是山村老師、6 年生是李傳進先生，該下光復了。哪年麻人教記不得安詳細了。也有分廖德添教到，佢算厝姪子。該毛筆字斯佢寫的，今年 93 歲了。他來仔是現任的立法委員廖正井。厝等是日治後期才分家。試到日本先生打人下嚴。</p>
11	蘇添明	男	78 歲，1935~(民國 24 年)	2012 年 8 月 19 日(日) PM12:15~40	關西鎮長老教會	<p>1、 厝阿公開始斯信教，厝阿太撈阿公是抗日分子，綁尾阿太講佢下後生，斯喊佢走。綁尾阿太斯不見了，麻介也沒。阿公安到<u>胡傑榮</u>斯走去淡水讀該<u>牛津學堂</u>，在該下開始信教。想在該下安全，該外國人下有勢力，未知沒讀幾多年未畢業，斯分日本人知道了，斯沒讀了。佢的骨骸這下放到觀音山。</p> <p>2、 厝祖先是福建永定人。厝叔公的名仔當特別安到胡老牛。厝爸安到蘇文壇。厝有一個阿叔安到胡文壇在台東關山做牧師，活到 101 歲去年才過身，很鏘，編有布農族的聖經。厝有 9 個妹妹。</p> <p>3、 厝讀關西公學校 4 年斯光復，光復後第二屆畢業，關西初農第 3 屆畢業。</p> <p>4、 透過嚴寬准牧師娘會教羅馬拼音，來教會斯參加主日學校，日本時代有 20 零儕，光復後很多人有 30 零儕。</p>
12	鄒子英	女	85 歲，1928~(昭和 3 年)	2012 年 8 月 19 日(日) PM12:30~40	關西鎮長老教會	<p>1、 字較難掌握，由蘇添明幫助詢問及說明，並轉頭向其回答。【女性長輩的訪談通常較慢熟，或由熟人訪問效果較佳，像之前的劉建光妻即是如此】感謝蘇長老。</p> <p>2、 厝阿公的時代斯開始信教，厝公安到鄒慶來，該下是日本時代，有 6 個來仔，滿子 bio 病，斯喊人來跳童子(乩童)，沒知跳跳仔還是死掉，厝公很哀。該下厝等住赤柯山(今玉山里)，客人很多、也有蕃仔。該下鍾阿妹(男)傳道，佢講你信不對神，厝公很哀很煞，斯撈屋下的神牌麻介拆掉，丟到河壩去。</p> <p>3、 該下在赤柯山行到錦山要點零鐘，厝 13 歲的時節斯搬出來，搬到東安該位住。錦山該下一年有 2 班，才 70 零儕，細妹仔 30 零儕。厝 1 到 3 年是分吳火錦教，4、5 年生是杜老師，全部是客人，沒著該黑黑的衫(意指師範畢業的文官服)，6 年斯到關西公學校讀，有 4 班，厝讀第一班，全部是細妹仔，分日本人松田老師教。</p> <p>4、 該下嚴寬准的牧師娘，學歷比佢下高，她是淡水女學校畢業，會傳道、教羅馬拼音。該下有羅馬拼音的聖經。不過厝不是她教的，厝是厝姆教，她會念羅馬拼音的聖經，她教厝。她是新竹香山該遍的的九間埔人。</p>

13	范碧蓮 (呂耀樞妻)	女	82歲	2012年8月24日 (五)AM 9:00~12:15	台北市呂宅	<p>1、范鼎香(石光第3屆畢業生，臺北師範畢業，任教石光、坪林與呂杰全促使坪林獨立設校、提高升學率；光復後坪林首任校長；後因故離開校長一職轉任石光信用合作社總幹事)的女兒</p> <p>2、坪林第一屆畢業生(民32年3月畢)，徐金統、劉建榜等同學</p> <p>3、畢業後考上臺北第三高女(24屆畢業生)</p> <p>4、民國39年3月1日至3年2月1日任教坪林國小</p> <p>5、嫁給呂杰全的長子呂耀樞</p> <p>6、借得坪林設校紀念照片翻拍。</p> <p>7、未訪前一日天秤颱風襲臺，主動來電看是否改期；24日到訪後，相談甚歡，表示：歡迎有空多來訪，呂已好久沒說話，今天是說最多話的一天，而且可以刺激他用腦。</p> <p>8、忘了拍照，表示隨時有空再來補拍。</p>
14	呂耀樞	男	83歲	2012年8月24日 (五)AM 9:00~12:15	臺北市呂宅	<p>1、呂杰全(石光第一屆畢業生，考上國語學校乙科，後改為臺北師範學校，4年後畢業即回石光、坪林任教；與范鼎香合作促使坪林獨立設校、提高升學率；參與陶社字岳三，民68年出版有《岳三小集》，書法了得，常示範教學並得獎；光復後關西第一任校長為楊習日3個月，第二任即呂，教導楊澄清書法，並贈予《岳三小集》一冊。)長子。</p> <p>2、石光第23屆畢業生(1941年3月)</p> <p>3、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受考上該校高等科的堂哥呂榮初說，尋常科可直升高等科、帝國大學等，故報考)，直升高等科(3年)，再直升臺大醫學院。</p> <p>4、畢業後開設竹東呂內科</p> <p>5、借得呂杰全的《岳三小集》影本、封面照，及相關求學、家族影片翻拍。</p> <p>6、免疫力低持續看診中，講話小聲，但記憶力仍佳，若不清楚，范碧蓮老師會進一步解釋。</p>

北上待訪人名2

- 1、之前電訪的楊美蓮(邱福興伯)、陳送妹老師(許貝妹、劉士賢)
- 2、再訪邱金球校長(贈相片、還書、送《學校沿革誌》影本)。
- 3、陳嫦娥老師(南和里人、劉香蘭老師好朋友、陳送妹老師推薦，可向邱校長要電話)
- 4、馮老師電話(寶石補校教母親客語昔時賢文、日本歌者)

三次北上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受訪年紀	時間	地點	說明
1	徐	男	89	2013年	石	1、石光第20屆畢業

	玉竹		歲	3月10日	光國小	<p>2、徐玉竹在學時即是班長，石光公學校畢業後，高等科畢業。於滿20歲後，考上警察學校受訓6個月任巡察，21歲時即擔任警察，專辦刑事，1年後即升便衣刑警，22歲即任刑警是當時全臺最年輕者。光復後，又受6個月警察訓留用，最後以公職退休。</p> <p>3、與張秀嬌尚有聯絡，住中壢，與住臺北的張秀嬌一起回石光參加校友會。</p>
2	張秀嬌	女	88歲	2013年3月10日	石光國小	<p>1、石光第20屆畢業</p> <p>2、張秀嬌即是第一屆畢業生張金輝的長女，新埔高等科2年畢業後，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與劉香蘭、陳嫦娥為同學。畢業後，歷任教職，光復後，亦擔任國小教師至退休。</p>
3	陳嫦娥	女	87歲	2013年3月10日 AM10:40-11:20	石光國小禮堂	<p>1、石光第22屆畢業</p> <p>2、陳阿郎姪女，得知其父為陳登龍，其叔原名陳登郎，念日本書後改名陳阿郎。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她一直認為是臺師大前身，但應為國北師前身才對：)</p> <p>3、陳嫦娥與前一屆畢業的劉香蘭一同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成為同學，畢業後，一同返鄉任教，於昭和19年(1944)3月31日返回石光母校任「助教」，共教4年5個月。光復後，結婚後調到坪林國校，後來與先生一同調新埔鎮新星國小，即搬至新埔國小，後與夫同搬至臺北，因小孩年幼沒有任教，後來遇到學妹，在臺北教派來臺的日本人太太中文。</p> <p>4、記憶力超好，開朗健談，留下電話。住臺北建國南路。</p> <p>5、訪談後補充：為了念家政女學校還自己種菜、上學前蹲在菜市場賣以賺取上學的學費。因為她念書時，父親已生病。</p> <p>6、母親生有6個女兒，長女40幾歲肝癌過逝，二姐24歲嫁人當繼室(24歲為老小姐)，三、四、五姐皆被祖母賣掉，連她母親都不被知會，要長大後多方奔走方得聯繫，有的至今失聯。她最小，又吵著要上學，母親才讓她上新竹家政女學校，石光公學校畢業即考上，後來回石光、坪林教書。石光光復後第4屆的學生在校時，陳嫦娥仍在石光教書。</p>
4	呂嬉美	女		2013年3月10日 AM	石光國小禮堂	<p>1、石光光復後第4屆，在校時，陳嫦娥任教石光。</p> <p>2、為呂義星長女，因父親常調動，是眾姐弟中唯一畢業於石光者。</p>
5	呂榮初	男	96歲	2013年3月10日	竹東寶	<p>1、石光第13屆畢業</p> <p>2、呂阿全二哥岳朗長子</p> <p>3、更正資料他的父親念過漢書不是塾師，竹東庄下坪仔的家境不</p>

				PM:2:5 0-3:30	順 安 養 院	佳，回石光依祖母生活。 4、新竹中學校 4 年級後，即考上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乙組，後直升臺灣帝國大學醫科。
<p>記事：</p> <p>1、2013 年 4 月 20 日(六)回石光專題演講一日治時期關西地區教育發展(石光坪林地區)</p> <p>2、2013 年 4 月 27 日(六)石光校慶，校友回校。</p>						
四次北上訪談						
編號	姓名	性別	受訪年紀	時間	地點	說明
1	呂金福	男	96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六) 上午	石光國小操場	1、石光第 13 屆畢業生，與呂榮初為同學，且同一家族，但不同房。 2、較之醫生輩出的呂家，多以務農為主，並未升學。
2	朱其章	男	98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六) 上午	石光國小操場	1、石光第 11 屆畢業生 2、眼睛看不到 3、但記憶力頗佳，可向潘校長確認聯絡方式。
3	林鄧平妹	女	93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六) 上午	石光國小禮堂	1、石光公學校第 18 屆畢業生(10 歲入學-16 歲畢業) 2、17、8 歲在茶工廠工作認識先生，20 歲嫁人。 3、娘家住關西旱坑，今留祖宅南陽堂為關西最老之厝，日治時為「300 租」地主，為有錢之家，一般人 100、200 租就很好過。 4、公學校畢業後，曾與詹金英學過 7 日漢書，記得最深的即是老師每日在手背上用毛筆字寫字，要其認字。 5、說當時要念新竹師範不用考，但覺念書累就不想念。 6、當小姐時雖為長姐下有 3 弟也很好命不用工作，出嫁至林家才開始辛苦。 7、父為鄧水金讀過漢書，家有柑仔園、田(租人)、西瓜園
4	呂劉益妹	女	92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六) 上午	石光國小	1、石光第 19 屆畢業生 2、目前家住龍潭 3、視力不佳，記憶力也較不佳，聽力不錯。 4、多說其家族之事，較少提及個人。(有電話可補問)

					禮堂	5、提及三叔劉鵬元，其滿叔劉朝棟與其同年為同學，成績較好升學當老師，她則未升學。
5	黃浩文	男	79歲	2013年4月27日(六)下午	石光國小校長室	<p>1、民國 53 年畢業於臺師大，民 59 後轉考高考，服公職。</p> <p>2、時為桃園以文吟社副社長,至今社友仍在吳志揚服務處，即創社之地，每月舉行擊鉢吟，2 月一次課題。會員有 40 人左右，為全臺第二大，關西陶社只剩約 20 左右，且未固定例會。</p> <p>3、稅捐處退休後，加入以文吟社。</p> <p>4、提及日治末的傳聞及光復初期的情況</p>
<p>記事：1 階級複製理論：財富資本轉為教育資本，維繫財富資本+文化(教育)/社會資本</p> <p>2 女性對教育及社會對女性受教這件事的期望皆不高，如鄧平妹、曾秋梅；且常因子女而放棄教職，如：劉香蘭、陳嫦娥。</p>						

附錄二 受訪人物照片

編號	姓名	受訪 年紀	時間	照片及說明
1	劉國耀	50 多歲	2002年3月29日	 <p>攝於臺北市劉宅客廳</p>
2	許昌琦	72 歲	2002年4月28日	未拍照
3	徐慶松	82 歲	2002年4月29日	 <p>攝於關西鎮徐宅</p>
4	陳運棟	70 歲	2002年9月28日	未合照
5	廖德雙	73 歲	2002年10月20日	未拍照
6	徐金統	83 歲	1、2012年4月25日 2、2012年5月7日 3、2012年8月9日	 <p>徐金統老師為筆者小學3、4年級導師。與徐</p>

				金統老師拍於坪林國小 70 週年校慶。
7	江金棟	61 歲	2012 年 04 月 25 日	1、父江兆和為石光第 20 屆(1938)畢業生。 2、借得江兆和公學校家庭聯絡簿、畢業證書、紀念冊、勤行報國青年隊名冊、證書、手帳等。(資料照片詳見各章)
8	范光建	83 歲	1、2012 年 4 月 27 日 2、2012 年 4 月 27 日 3、2012 年 5 月 7 日	 <p>與范光建老師拍於坪林國小 70 週年校慶。</p>
9	邱秀惠	約 50 歲	2012 年 4 月 30 日	借得石光國小存，日治時期毛筆寫成的《學校沿革誌》影本。此照為封面頁。 
10	江穎川	75 歲	1、2012 年 5 月 1 日 2、2012 年 8 月 14 日	 <p>與陶社詩會理事長江穎川合照於江家。</p>

<p>11</p>	<p>范士敬</p>	<p>90 歲</p>	<p>1、2012年5月2日 2、2012年8月14日 3、2013年3月10日</p>	  <p>以上2次拜訪，皆攝於關西坪林范宅</p>  <p>攝於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活動</p>
<p>12</p>	<p>劉建榜</p>	<p>83 歲</p>	<p>2012年5月2日</p>	 <p>請其5弟媳黃平金老師協助拍攝，攝於關西鎮新力里劉宅公廳前</p>

13	范光銘	83 歲	2012年5月7日	 <p>右為范光銘老師，左為范光建老師。拜訪范光銘老師時，正巧范光建老師來訪，二者為堂兄弟。攝於關西鎮南和里范宅公廳前。</p>
14	江葉梅 妹	86 歲	2012年5月7日	未合照
15	邱福興	82 歲	2012年5月8日	 <p>與筆者同為下橫坑人，並與筆者祖父、父母熟識。攝於新埔鎮邱宅。</p>
16	賴香妹	82 歲	2012年5月8日	 <p>賴香妹女士為邱福興先生的夫人，二人為坪林國民學校同班同學。攝於新埔鎮邱宅。</p>
17	楊美蓮	82	2012年5月8日	電話訪問無合照

		歲		
18	陳送妹	93 歲	2012年5月8日	電話訪問無合照。
19	劉建燈	88 歲	2012年5月9日	 <p>劉建燈為筆者的小學老師。攝於新埔鎮劉宅。</p>
20	高玉嬌	81 歲	2012年5月9日	 <p>高玉嬌女士為劉建燈老師的夫人。攝於新埔鎮劉宅。</p>
21	邱金球	88 歲	1、2012年5月10日 2、2012年5月15日(與潘淑華校長同訪) 3、2012年8月10日	 <p>右1為邱金球校長，中為其夫人劉香蘭老師。</p>

				 <p>左 1 為邱金球校長，中為其夫人劉香蘭老師。 皆攝於竹北市邱宅。</p>
22	劉范鏞 妹	91 歲	2012 年 5 月 11 日	 <p>由其 5 弟妹黃平金老師帶訪，攝於關西鎮石 光里劉宅。</p>
23	曾秋梅	82 歲	2012 年 5 月 11 日	<p>在美容院遇到，無合照。</p>
24	陳双錦	88 歲	2012 年 8 月 15 日	 <p>攝於關西鎮石光里陳宅客廳。</p>

25	余新源	89 歲	1、2012年8月16日 2、2012年8月20日	 <p data-bbox="884 577 1501 667">攝於關西鎮北山里余宅前庭院，請鄰居協助拍照。</p>  <p data-bbox="884 1055 1501 1144">余祕書以相本解說桃園農林學校的建築、課程、畢旅等。</p>
26	楊澄清	87 歲	2012年8月17日	 <p data-bbox="884 1491 1490 1581">左為楊澄清主任，右即其夫人邱永貞老師。 攝於關西鎮楊宅前，請鄰居協助拍攝。</p>
27	邱永貞	83 歲	2012年8月17日	<p data-bbox="1107 1588 1262 1626">照片如上。</p>
28	關西長老教會	1922 ~	2012年8月19日	

				關西長老教會蔡明珠長老(前坐右 1)一家人，後排右 1 為其子，右 3 為其弟，右 4 為其弟媳，前排中坐者為其母鄒子英女士。前排左 1 即蘇添明先生。
29	廖金德	79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無合照
30	蘇添明	78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照片及說明，見關西長老教會。
31	鄒子英	85 歲	2012 年 8 月 19 日	照片及說明，見關西長老教會。
32	范碧蓮	82 歲	2012 年 8 月 24 日	因訪談甚歡忘記拍照，等記起時，呂耀樞醫師已午休。范碧蓮老師即婉拒，並言隨時歡迎再訪再補拍。
33	呂耀樞	83 歲	2012 年 8 月 24 日	借得呂阿全《岳山小集》詩文冊影本。  左圖為呂耀樞的兒子呂紹嘉，現為旅德國際知名指揮家。2013 年中將在國家音樂廳演出。
34	徐玉竹	89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拍於石光百週年校慶活動，老校友回娘家。

<p>35</p>	<p>張秀嬌</p>	<p>88 歲</p>	<p>2013年3月10日</p>	 <p>坐著畫燈籠者即為張秀嬌老師，後立者為陳嫦娥老師。</p>
<p>36</p>	<p>陳嫦娥</p>	<p>87 歲</p>	<p>2013年3月10日</p>	 <p>左3坐者即為陳嫦娥老師，左2為其姪子兼石光公學校同學，其他為石光國民學校光復後第4屆畢業生，左4坐者為呂嬉美。</p>  <p>於4月27日石光百週年校慶再度喜相逢。</p>

37	呂嬉美	77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p>後排左 4 即為呂嬉美，呂榮初為其堂哥。此圖為與石光國小校長潘淑華(右 3)、石光里長(右 1)，及石光校慶嚴永熊主委(左 3)及夫人(右 2)等，一同拜訪石光日治時期 13 屆校友呂榮初(前坐者)。</p>
38	呂榮初	96 歲	2013 年 3 月 10 日	 <p>訪問結束，開心與呂榮初醫師合照。攝於竹東寶順安養院門口。</p>
39	呂金福	96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p>左 1 為范士敬老師，左 2 即呂金福先生。攝於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p>

40	朱其章	98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p>朱其章先生雖已失明，但聽力良好，記憶力驚人。攝於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p>
41	林鄧平妹	93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p>左 1 即為林鄧平妹女士，由其外孫協助拍照、錄影、受訪。攝於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p>
42	呂劉益妹	92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p>照片同上，右 1 即為呂劉益妹，與林鄧平妹一同受訪。</p>
43	黃浩文	79 歲	2013 年 4 月 27 日	 <p>左 1 為桃園以文吟社副社長黃浩文，中為其夫人。攝於石光國小百週年校慶。</p>

附錄三 桃竹苗地區的公學校

市郡 (優勢族群)	市街庄	學校名	所在地	學級	職員總數	兒童數	創立以外 畢業生總數	創立年月	編號	備註
桃園郡 (閩)	桃園街	桃園公學校	桃園街 武陵	22	23	1351	1851	明治31年 4月 ¹	1	原臺北國語傳習所桃仔園分教場，明治31年10月開校，明38年改稱桃園公學校。39年時男生250，女生65，共315年，6學級，3教諭、3訓導、2雇員。(P226)
		埔子公學校	同街埔子	5	5	234	77	昭和3年4月	2	
	龜山庄	龜山公學校	龜山庄 新路坑	8	8	408	354	大正4年7月	3	①
		坪頂公學校	同庄坪頂	5	5	244	86	昭和3年4月	4	
	蘆竹庄	南崁公學校	蘆竹庄 南崁廟口	7	7	337	702	明治32年 2月	5	①明治39年男生110、女生39，合計149，編成3學級。P227
		蘆竹公學校	同庄大	7	7	319	163	昭和3年4月	6	

¹ 原書資料誤植為昭和31年，依該區的繁榮與日本統治臺灣只到昭和20年而言，此校正確的設立時間應為明治31年。

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教育(1895-1945)

			竹圍					月		
		坑子公學校	同庄坑子外	5	5	277	197	大正7年4月	7	
	大園庄	大園公學校	大園庄大園	8	8	370	559	明治37年4月	8	①?大坵園分校為南崁公學校分校，明治37年7月創，39年男生125人，編成2學級。P228
		竹圍公學校	同庄竹圍	5	5	229	128	昭和3年4月	9	
	八塊庄	八塊公學校(八塊厝公學校)	八塊庄八塊	7	7	410	584	明治32年1月	10	①明治32年1月創立，原為仁和公學校，38年4月改稱八塊厝公學校，39年男106、女7人，計113人，編成2學級。
		大湳公學校		5	5	284	103	昭和3年4月	11	
大溪郡	大溪街(閩)	大溪公學校(大崙崁公學校)	大溪街大溪	15	15	891	1273	明治31年4月	12	①本為臺北國語傳習所大崙崁分教場，明治31年10月1日開校，33年2月女子教

										育開始，(續下)…34年11月6千餘圓新築校舍，39年男238，女生92年，計330，六學級，內柵分校男67人。P227
		內柵公學校 (從前者分出)	同街內柵	5	6	245	216	同34年9月	13	明治34年7月內柵分校設立
		同八結分教場	同街八結	2	2	90	-	昭和3年4月	分1	
		員樹林公學校	同街員樹林	7	7	400	378	大正2年4月	14	
		溪西公學校	同街缺子	4	4	169	124	昭和3年4月	15	
	龍潭庄(粵)	龍潭公學校 (龍潭陂公學校)	龍潭庄四方林	12	14	665	992	明治32年3月	16	原名龍元公學校，明治31年11月創立，38年4月改稱龍潭陂公學校，生徒年增，校舍新築擇校園一隅新築教員宿舍。39年男165、女73人，編成3學級。P228
		三坑子公學校	同庄三坑子	6	6	281	239	大正7年4月	17	
		銅鑼圈公學校	同庄銅鑼圈	5	5	280	289	同4年4月	18	

中壢郡(粵)	中壢街(粵)	中壢公學校	中壢街中壢	23	25	1340	1586	明治32年2月	19	明治31年12月創設，36年10月以5千圓新築校舍，39年153、女生36，編成3學級。(P227)
		大崙公學校	同街大崙	6	6	291	265	大正8年4月	20	
	平鎮庄(粵)	南勢公學校	平鎮庄南勢	8	9	482	603	明治45年4月	21	
		同宋屋分教場	同庄宋屋	1	1	70	-	昭和6年4月	分2	
	楊梅庄(粵)	楊梅公學校(楊梅壢公學校)	楊梅庄楊梅	17	18	981	1516	明治33年5月	22	明治33年5月設立，34年費3千6百圓新築校舍，39年男97人，分成2學級。(229頁)
		同草湳坡分教場	同庄草湳坡	3	3	190	-	昭和4年4月	分3	
		伯岡公學校	同庄伯岡	6	6	304	152	同3年4月	23	
	新屋庄(粵9成)	新屋公學校(新屋分校)	新屋庄新屋	10	11	548	612	明治38年11月	24	原楊梅壢公學校的分校，明治38年10月開設，入學生徒男78人。(229頁)
		大坡公學校	同庄大	5	5	237	226	同44年4	25	

			坡					月		
		崁頭厝公學校	同庄崁頭厝	5	5	261	124	昭和4年4月	26	
	觀音庄(粵6成5)	觀音公學校	觀音庄觀音	7	7	365	468	明治38年3月	27	?石觀音分校，為南崁公學校分校，明治38年1月創立，男71人、女4人。P228
		新坡公學校	同庄新坡	5	5	280	100	昭和3年4月	28	
新竹市(閩)	新竹市	新竹第一公學校	新竹市新竹東門	26	29	1576	2473	明治31年(1898)9月	29	今東門國小
		新竹第二公學校	同市水田	12	13			明治32年(1899)4月	30	
		新竹第三公學校	同市埔頂	5	5			昭和3年(1928)4月	31	
		新竹女子公學校	同市新竹東門	15	17			大正5年(1916)4月	32	
		市計4所		58	64	3357	4355			
新竹郡(粵)	舊港庄(閩)	新社公學校	舊港庄新社	6	6	306	232	大正12年(1923)4月	33	
		舊港公學校	同庄糠榔	6	6	310	338	大正7年(1918)4月	34	
		貓兒錠公學校	同庄貓兒錠	4	4	188	-	昭和6年(1931)4月	35	
		市計3所		16	16	804	570			
	紅毛	紅毛公學校	紅毛庄	6	6	274	306	大正10年	36	

	庄(粵)		新庄子					(1921)4月		
	湖口庄(粵)	湖口公學校	湖口庄湖口	12	13	711	758	大正7年4月	37	於新埔公學校分出。 ²
		同下北勢分教場	同庄下北勢	3	3	150	-	同12年月	分4	
	新埔庄(粵)	新埔公學校	新埔庄四座屋	16	17	944	1427	明治31年(1898)4月	38	
		枋寮公學校	同庄枋寮	5	5	255	48	昭和4年(1929)4月	39	
		照門公學校	同庄照門	6	6	326	286	大正6年(1917)4月	40	
		南分教場 ³	石頭坑					昭和16年(1942)3月		
	關西庄(粵)	石光公學校	關西庄石岡子	7	8	396	575	大正2年(1913)4月 ⁴	41	
		同坪林分教場	同庄坪林	4	4	186	-	大正12年(1923)4月	分5	1、分教場成立時間應更正為大正9年 ⁵ 2、1942年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
		關西公學校(原咸菜礮公學校)	同庄關西	16	17	902	1225	明治32年(1899)4月	42	① 明治32年2月創立，37年5月，以5千餘圓新築校舍，39年男生121人，編成2學級。

² 《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頁26，學校沿革。

³ 依《新埔國小百週年校慶特刊》，頁26，〈學校沿革〉資料所加。

⁴ 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校史資料中保存的統計紀錄，石光分教場應創立於大正2年(1913)，正式獨立於大正7年(1918)。

⁵ 依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校史資料中保存的統計紀錄，坪林分教場應創立於大正9年(1920)，今依校史資料改正。

		錦山國民學校 ⁶						昭和 15 年 (1941)		
	六家庄(粵)	六家公學校	六家庄 鹿場	6	6	332	442	明治 39 年 7 月	43	①
	香山庄(閩)	香山公學校	香山庄 牛埔	9	10	510	554	明治 43 年 6 月	44	①
		鹽水公學校	同庄鹽 水	5	5	228	82	昭和 3 年 4 月	45	
竹東郡 (粵)	竹東庄	竹東公學校	竹東庄 上公館	17	18	977	1291	明治 32 年 3 月	46	①
		二重埔公學校	同庄二 重埔	4	4	228	115	昭和 3 年 4 月	47	
	芎林庄	芎林公學校	芎林庄 芎林	9	10	500	740	明治 32 年 3 月	48	①
		鹿寮坑公學校	同庄鹿 鳴寮坑	5	5	289	175	昭和 3 年 4 月	49	
	橫山庄	橫山公學校	橫山庄 橫山	6	7	285	259	明治 41 年 5 月	50	①
		同大山背分 教場	同庄大 山背	2	2	93	-	大正 12 年 4 月	分 6	
		沙坑公學校	同庄沙 坑	6	6	279	269	同 6 年 4 月	51	
	北埔庄	北埔公學校	北埔庄 北埔	10	11	535	1012	明治 31 年 12 月	52	①
	峨眉	峨眉公學校	峨眉庄	6	7	286	661	明治 31 年	53	①

⁶ 依陳南宏、戴玉蘭總編(1999),《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庄		峨眉					12月		
		同富興分教場	同庄富興	2	2	74	-	大正7年3月	分7	
	寶山庄	寶山公學校	寶山庄寶山	5	5	268	216	大正5年4月	54	
		新城公學校	同庄新城	5	5	235	178	明治31年12月	55	①
竹南郡	竹南庄	竹南公學校	竹南庄鹽館前	19	20	1101	1469	明治31年12月	56	
	頭分庄(粵)	頭分公學校	頭分庄頭分	19	19	1120	1912	明治31年12月	57	①
		尖山公學校	同庄尖山下	6	6	280	159	大正12年4月	58	
		斗換坪公學校	同庄斗換坪	6	6	319	217	同9年3月	59	
	三灣庄(粵)	三灣公學校		3	6	219	563	明治31年12月	60	①
		同大河底分教場		3	2	172	-	昭和4年4月	分8	
	南庄(粵)	南庄公學校		6	6	285	463	大正7年12月	61	①
		大南埔公學校		6	6	276	250	同	62	
	造橋庄(粵)	造橋公學校		6	6	328	344	大正5年4月	63	①
	後龍庄	後龍公學校		10	11	551	810	大正7年4月	64	
		公司寮公學校		4	4	185	166	同7年3月	65	
		外埔公學校		5	5	211	148	同7年4月	66	

								月		
苗栗郡(粵)	苗栗街(粵)	苗栗第一公學校		21	21	1309	2288	明治31年10月	67	①
		同第二公學校		6	6	301	-	昭和5年4月	68	
	頭屋庄(粵)	頭屋公學校		6	6	299	391	大正9年4月	69	①
	公館庄(粵)	鶴岡公學校	公館庄 鶴子岡	7	8	383	818	明治39年9月	70	
		同南河分教場		2	2	90	-	大正7年5月	分9	
		公館公學校		15	14	885	1343	明治34年9月	71	①
	銅鑼庄(粵)	雞隆公學校	銅鑼庄 老雞隆	6	6	286	593	明治32年8月	72	(例外)
		富士公學校	同庄銅鑼	11	12	523	1114	同	73	
	三叉庄(粵)	三叉公學校		9	10	469	774	明治37年5月	74	①
		同鯉魚潭分教場		1	1	74	-	大正12年4月	分10	
	苑裡庄	苑裡公學校		13	14	696	1018	明治31年10月	75	①
		山腳公學校		7	7	354	595	大正5年4月	76	
	通霄庄(粵)	烏眉公學校		4	4	207	263	大正7年4月	77	
		通霄公學校		10	11	530	845	明治39年	78	①

								6月		
		南和公學校		4	4	195	162	大正10年 4月	79	
	四湖 庄(粵)	四湖公學校	四湖庄 鴨母坪	6	6	153	455	大正4年4 月	80	①
		五湖公學校		6	6	265	249	同9年4 月	81	
大 湖 郡 (粵)	大湖 庄(粵)	大湖公學校		6	6	328	452	明治44年 4月	82	①
		南湖公學校		4	4	238	161	大正7年4 月	83	
	獅潭 庄(粵)	獅潭公學校		5	5	178	146	明治39年 7月	84	①
		八角林公學校		4	4	164	43	昭和3年4 月	85	
	卓蘭 庄(粵)	卓蘭公學校		7	7	379	576	明治35年 9月	86	①
合 計		86 分10		72 8	76 8	39770	48263			

出處：1、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昭和7年/1932)，《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頁18-27。

2、桃園廳編(明治39年排影本，1985)，《桃園廳志》，頁225-9。備註說明部分頁數。桃園廳中的樹林公學校、三角湧公學校，屬於海山堡後來屬於臺北的樹林、三峽，故略。樹林公學校原臺北國語傳習所樹林分教場，明治31年11月1日開校，34年2月新築校舍，39年男135人，分成2學級。(227頁)三角湧公學校，明治33年1月創設，38年10月費7千5百餘圓新築校舍、教員宿舍，39年男179人、女46人，合計235人，分成4學級。(228-9頁)桃園小學校，原名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設在桃園為內地人的兒童教育，明治35年4月設置桃仔園尋常高等小學校，有高等小學科二學年，38年4月改稱桃園小學校，39年男13人，女22人，合計35人編成二學級。(229頁)

說明：

- 1、昭和 6 年(1931)12 月末統計
- 2、粗體字者為客家人優勢區。
- 3、各庄最早創立的公學校多在明治年間，且多以各庄名為校名，可見公學校最初多設在各庄較繁榮之處。
- 4、依總人數與學級數平均，各班人數少則在 40 人以上，多則可遠至 70 人以上，是大班式的編班，而且每一班平均由一位老師任教，少數才有多一位故員，可見多數校長仍要帶班。
- 5、桃竹苗區在昭和 7 年底時，共有 87 所公學校，另有 10 所分校。⁷這些分校將在日治後期陸續獨立，以關西庄一區為例，石光公學校的坪林分校即在昭和 17(1942)年時獨立，關西庄即有 3 所國民學校，另外加上 1941 年關西分校的馬武督分校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於日治時關西庄即有 4 所國民學校。依此可推估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的基礎教育學校已有上百所。
- 6、其中位於客家人優勢街庄的學校有 64 所，分校 8 所。若依分校設置區的情況亦可知客家人居住地多在較晚開發之地，因此多有分校之設，等到後期人口漸多、文教漸廣之後，這些分校才慢慢獨立。
- 7、由《桃園廳志》中關於學校的紀錄可知，公學校多承自國語傳習所而來，而學校的分設與獨立多從分校(或分教場)開始，等員額、規模夠大後才獨立成校。學校乃是由人口較多的街市開始創設，等就學者眾後，地方有力支持學校的經費乃另設之。

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410，昭和 7 年全臺公學校有 762 所。

附錄四 日治時期臺灣的中學校

編號	校名	戰後	修業年限	創校時間	變遷	備註
1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	省立臺北建國中學	5年	明治 31 年(1899)	1、1898 年原名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尋常科，設於戰後的臺北一女中。 2、1907 年，單獨設置，改名總督府中學校。 3、1914 年改名總督府臺北中學校。 4、1921 年改為臺北州立，並移至建國中學現址。	1 昭和 17 年度日人占 80.1% 昭和 18 年度日人占 69.6%
2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省立臺北成功中學	5年	大正 11 年(1922)		2 昭和 17 年度日人占 29.2% 昭和 18 年度日人占 21.9%
3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中學校	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5年	昭和 12 年(1937)	1、昭和 12 年 3 月 31 日設置。 2、昭和 13 年 12 月 5 日位置變更。	3 昭和 17 年度日人占 80.1% 昭和 18 年度日人占 69.6%
4	臺北州立臺北第四中學校	已停辦 歸併臺北建國中學	5年	昭和 16 年(1941)	原校舍與建國中學毗鄰	3
5	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	省立基隆中學	5年	昭和 2 年(1927)	1、昭和 2 年 3 月 31 日設置。 2、昭和 3 年 3 月 5 日位置變更至今址。	2
6	臺北州立宜蘭中學校	省立宜蘭中學	5年	昭和 17 年(1942)		3
7	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	省立新竹中學	5年	大正 11 年		2

	竹中學校	竹中學	年	年(1922)		
8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省立臺中第一中學	5年	大正4年(1915)		1 昭和17年度日人占16.3% 昭和18年度日人占26.5%
9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	省立臺中第二中學	5年	大正11年(1922)	1、原校地戰後由臺中農校使用，該校校舍戰時被毀。 2、戰後校舍為前臺中第二高女校舍。	2 昭和17年度日人占77.8% 昭和18年度日人占74.7%
10	臺中州立彰化中學校	省立彰化中學	5年	昭和17年(1942)		3
11	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	省立臺南第二中學	5年	大正3年(1914)		1 昭和17年度日人占71.2% 昭和18年度日人占80.8%
12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省立臺南第一中學	5年	大正11年(1922)		2 昭和17年度日人占21.9% 昭和18年度日人占24.3%
13	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	省立嘉義中學	5年	大正13年(1924)		2
14	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	省立高雄中學	5年	大正11年(1922)		2
15	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	已停辦併入前	5年	昭和19年(1944)		3

	校	校				
16	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	省立屏東中學	5年	昭和13年(1938)		3
17	臺東廳立臺東中學校	省立臺東中學	5年	昭和16年(1941)		3
18	花蓮港廳立花蓮港中學校	省立花蓮中學	5年	昭和12年(1937)		3
19	私立國民中學校	已停辦	5年	昭和14年(1939)		3
20	私立臺北中學校	臺北市私立泰北中學	5年	昭和13年(1938)		3
21	私立淡水中學校	臺北縣私立淡江中學	5年	昭和13年(1938)		3
22	私立長榮中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	5年	昭和14年(1939)		3

出處：

- 1、臺灣教育會編(1995)，《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809-10，昭和 13 年 9 月 22 日政府公布的告示，詳列當時臺灣所設立的中學校名稱、位置及設立的時間。
- 2、汪知亭（1978），《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64-6，日據時代臺灣公私立中學校一覽。頁 58，日臺學生的入學比率。

說明：

- 1、日治時期的創設的公私立中學校共有 22 所，公立有 18 所，私立的 4 所，其中 2 所為教會學校。
- 2、第一階段(1919 年之前)設置的中學較少，全臺只有 3 所，分布於北、中、南。
- 3、第二階段(1919 年~1937 年前)臺灣教育令公布後，開始增設中學校，有 7 所，大多設置於大正年間。
- 4、第三階段(1937 年之後)共設置了 12 所中學，其中 4 所為私立學校，私校中北淡水、南長榮都是天主教長老教會設置的學校。此一時期，顯現中學校教育開始推廣至臺灣東部，也允許私校的設立。可見各地方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口較多，連帶產生升學需求的增加，及反映民間設置能力的增加。
- 5、日治時期設置的中學校，除少數收併外(只有 2 所)，戰後多數都能延續辦學。可見日治時期的學校教育設置，的確為臺灣往後的現代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礎。

附錄五 日治時期臺灣公私立高等女學校

編號	校名	戰後	修業年限	創校時間	變遷 (與附錄四中學校對照)	備註
1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省立臺北第一女中	4年	明治37年(1904)		1 昭和17年度日人占61.7% 昭和18年度日人占78.9%
2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已停辦	4年及2年	大正8年(1919)	原校舍戰後由臺灣省農林廳使用	2
3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省立臺北第二女中	4年	明治30年(1897)	1、原為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 2、1902年改名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 3、1919年改稱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4、1922年起改稱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1 昭和17年度日人占21.3% 昭和18年度日人占19.7%
4	臺北州立臺北第四高等女學校	已停辦	4年	昭和17年(1942)	原校舍戰後由省立臺北高級助產護理職業學校使用	3
5	臺北州立基隆高等女學校	省立基隆女中	4年	大正13年(1924)	1、較基中早3年。	2
6	臺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	省立蘭陽女中	4年	昭和13年(1938)	1、較宜蘭中學早4年。	3
7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省立新竹女中	4年	大正13年(1924)	1、較竹中晚2年	2
8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高等女學校	省立臺中女中	4年	大正8年(1919)	1、較臺中一中晚4年	2 昭和17年度日人占81.3% 昭和18年

						度日人占 79.7%
9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高等女學校	已停辦歸併省立臺中女中	4年	昭和16年(1941)	1、戰後校舍被省立臺中二中使用。	3 昭和17年度日人占24.7% 昭和18年度日人占33.0%
10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省立彰化女中	4年	大正8年(1919)	1、較彰中早23年	2 昭和17年度日人占21.7% 昭和18年度日人占29.5%
11	臺南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	省立臺南女中	4年	大正6年(1917)	1、較南一中晚3年	1 昭和17年度日人占68.7% 昭和18年度日人占71.9%
12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已停辦歸併臺南女中	4年	大正10年(1921)	1、較南二中早1年	2 昭和17年度日人占25.7% 昭和18年度日人占22.7%
13	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	省立嘉義中學	4年	大正11年(1922)	1、較嘉中早2年	2
14	臺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	省立虎尾女中	4年	昭和15年(1940)	無對應的男校	3

	校					
15	高雄州立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	省立高雄女中	4 年	大正 13 年(1924)	1、較雄中晚 2 年	2
16	高雄州立高雄第二高等女學校	已停辦併入高雄女中	4 年	昭和 18 年(1943)	1、較雄二中早 1 年，戰後皆停辦併入前者。	3
17	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	省立屏東女中	4 年	昭和 7 年(1932)	1、較屏中早 6 年	3
18	臺東廳立臺東高等女學校	省立臺東女中	4 年	昭和 15 年(1940)	1、較東中早 1 年	3
19	花蓮港廳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	省立花蓮女中	4 年	昭和 12 年(1937)	1、與花中同年設立	3
20	澎湖廳立馬公高等女學校	已停辦歸併省立馬公中學	4 年	昭和 18 年(1943)	戰後原校舍由省立馬公中學使用，可見日治時並未設立馬公中學。	3
21	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	臺北縣私立淡江中學女生部	4 年	昭和 13 年(1938)	1、戰後改稱臺北縣立純德女中，後又併入淡江中學為該校女生部。 2、與淡水中學校同時設立。	3
22	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	臺南市私立長榮女中	4 年	昭和 14 年(1939)	1、與私立長榮中學校同時設立	3

出處：

- 1、台灣教育會編(1995)，《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869-70。
- 2、汪知亭(1978)，《灣教育史料新編》，頁 72-4，日據時代臺灣公私立高等女學校一覽。同書 74 頁備註，其中私立靜修女中創校於 1917 年，日治時名為「私立靜靜女學校」，因未立案，故表列無其校名。頁 58，日臺學生的入學比率。

說明：

- 1、日治時期的創設的公私立高等女學校共有 22 所，其中私立女校只有 2 所，都是天主教長老教會所立的女校，與男校同時設立，臺灣北部、南部各 1 所。分別為北部的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和南部的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
- 2、在整體的數量比較上，高等女學校的校數大致與中學校相當，各州、廳的男女中學數量幾乎是 1 比 1 對等而設，甚至在臺南州的虎尾和澎湖廳的馬公 2

處，日治時，只有設女校卻無男校的情況。可見依學校設置數量而言，日本殖民政府致力於推廣女子教育，至少在設置數量上幾乎是男女平等的，甚至是公立女校多於公立男校。而且在相對應而設的男女學校中，無論早晚各地的中等學校大部分設立時間皆相近，其中有 8 地的女校是早於男校，其中彰化高等女學校竟早於彰中 23 年而設，頗令人意外。何以如此，可能和高等女學校是女子的能受的最高教育有關，而男生在接受中學教育後，卻有管道可以繼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例如日治時期的高等學校、帝國大學等就無女性就讀。

- 3、於是在校數上若以性別來比較，看似公允，甚且女優於男，但若考慮到修業年限的差異(男校為 5 年，女校為 4 年)，及實際的受教內容等，可見男女兩性在受教品質上仍有差異。
- 4、第一階段(1919 年之前)設置的高等女學校較少，全臺只有 3 所，分布於臺北 2 所、臺南 1 所。
- 5、第二階段(1919 年~1937 年前)臺灣教育令公布後，開始增設中學校，共有 8 所，大多設置於大正 10 年(1920)前後。
- 6、第三階段(1937 年之後)共設置了 11 所中學，其中 2 所為私立學校，私校中北淡水、南長榮都是天主教長老教會設置的學校。而且這 2 所教會學校的設置時間等同於男校，可見教會中對男女性別較具平等意識。
- 7、日治時期設置的高等女學校，戰後歸併了 6 所，較男校只歸併 2 所，顯然較多，甚至馬公高等女學校竟變成馬公中學，但大體上，戰後多數學校都能繼續辦學，占了 73% 左右。可見日治時期的高等女學校設置，的確為臺灣的女子現代化教育奠下良好的基礎。

附錄六 石光公學校畢業生升學情況—《學校沿革誌》摘要

◎大正七年度(1918/第一屆)

3月20日：國語學校乙科¹ニをノ通り入學許可

呂阿全、張金輝、朱新本、陳興城、陳登榜²

【黃本源大正10年任石光公學校訓導心得³，光復後接任校長。⁴】

【陳登彬大正9年任石光公學校訓導心得⁵】

◎大正八年度(1919/第二屆)

4月1日訓導心得陳開華⁶范金立⁷當校勤務拜命【陳、范畢業於咸菜礮公學校13、14屆畢業生】

4月4日右兩心得赴任【指陳范赴任】

5月13日：台北師範學校豫科⁸：朱盛淇、戴連秀、戴振鐘、范朝坤⁹，四名入學許可。

【范朝宗後任坪林里長¹⁰，是坪林第一屆畢業生范光順之父，有助於坪林獨立的有功地方人士之一。¹¹】

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603-4，國語學校沿革一覽表及文字說明；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制度》，頁71，國語學校沿革一覽表，及頁115文字說明。大正8年(1919)1月4日臺灣教育令公布後，4月1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將原來的國語學校本校改為臺北師範學校，臺南分校改為臺南師範學校。以上5位學校雖然招生時是考入國語學校乙科，但正式入學後，就讀學校已變成臺北師範學校，且應進入豫科就讀，因為依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628-9，依臺灣教育令第二十八條，師範學校設置有豫科1年和本科4年，第二十九條則規定師範學校豫科入學資格是修完公學校6年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修完豫科才能就讀本科。另依徐金統老師2012年4月25日徐金統老師口述，極推崇教他1、6年級的呂阿全老師及2-5年級的范鼎香老師，並說他們都是臺北師範畢業的。

²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第一屆畢業生名冊(民國8年3月)。

³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職員名簿〉，無頁碼，大正10年3月31日，至昭和6年1月6日，9年10個月，訓導心得。

⁴ 101年8月10日邱金球校長口述。

⁵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職員名簿〉，無頁碼，大正9年4月17日，至昭和12年8月17日，17年4個月，訓導心得。

⁶ 陳南宏、戴玉蘭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73，光復前第十三屆(民國6年3月畢業)，第一行第一人為陳開榮，疑為陳開華之誤。

⁷ 陳南宏、戴玉蘭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173，光復前第十四屆(民國7年3月畢業)，第一行第3人。

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628，依臺灣教育令第二十八條，師範學校設置有豫科1年和本科4年，第二十九條則規定師範學校豫科入學資格是修完公學校6年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修完豫科才能就讀本科。因此大正8年(1919)度的畢業生在入學時即言名為臺北師範學校豫科的人學許可。

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第二屆畢業生名冊(民國9年3月)。

¹⁰ 邱金球校長101年8月10日口述。

¹¹ 范光順，〈慶祝母校獨立六十週年校慶有感〉，載於林桂蘭主編：《坪林國小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特刊》，頁34。

【朱新芳似乎也有擔任老師¹²】

◎ 大正九年度(1920/第三屆)

4月1日訓導心得范金立咸菜礮公學校へ轉ズ

訓導心得范朝棟¹³當校勤務ヲ命セラル

【涂元全曾任教坪林元和宮國語講習班的講師¹⁴，考試及格的文官¹⁵】

1月5日：台北師範學校入學志願者九人願書ツ送附ス

2月18日：左ノ通り北師入學ヲ許可サル

劉碧嵐、劉鏡華、呂義星、朱金鑑、范鼎香、朱新在¹⁶

【朱金鑑在師範學校時曾擔任班長¹⁷】

【陳俊樓後留日，光復後第一任新埔國中校長。¹⁸】

大正十年度(1921/第四屆)

5月9日：陳開華訓心台北師範學校講習生トシニノ入學¹⁹，為メ 本日出發

【陳双祿考上新竹高等學校(5年)，再升高等學校理科3年，到日本崗山縣念公立醫學大學(5年)。²⁰關西有田醫院。²¹】

【黃鷺登疑為黃南琚之父，若是如此，可見早期學生較少，故收學生較不限年齡。】

◎大正十一年度(1922/第五屆)

4月7日：范朝欽、葉金興²²台北師範入學試驗及第通知アリ

¹² 邱金球校長 101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¹³ 陳南宏、戴玉蘭編：《百年榮耀鹹菜甕——關西國小創校百週年特刊》，頁 171，光復前第二屆(民前 6 年 3 月畢業)，第一行第 2 人。2012 年年 8 月 14 日范士敬口述：范朝棟為范鼎香的父親，范朝燈的兄長。依曾繁蓉：《十子十登科的父親——范朝燈》，頁 34-5，根據范家的習慣每房只有長子才能接受正式教育，故只有范朝棟受正式教育，排行第二的范朝燈因為只受私塾教育而耿耿於懷，據此遺憾故特別重視子女教育。但依照 2012 年年 8 月 24 日范朝棟孫女范碧蓮的說法，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日治初期當地人稱日本學校為狗學，可見並非人人想入學，反而是老實質樸的長子沒得選就去念了。按照 2012 年 5 月 2 日同為范家人的范士敬口述，前有 3 位兄長，長其 1、20 歲，日治初期因為鄉里大家怕念日本書要當日本兵因此未去上學。由此可見，日治初期常是不得已才接受日本教育，到後期日本殖民統治較穩定後，才成為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女教育選擇。

¹⁴ 劉范鑄妹 101 年 5 月日口述。

¹⁵ 邱金球校長 101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¹⁶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劉碧嵐、劉鏡華、呂義星、朱新在等 4 人是第 2 屆畢業生(民國 9 年 3 月)；朱金鑑、范鼎香是第 3 屆畢業生(民國 10 年 3 月)。

¹⁷ 邱金球校長 101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¹⁸ 邱金球校長 101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¹⁹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628-9，依臺灣教育令第二十八條，師範學校設有公學校教員講習科一年的設置，至於第二十九條提到的公學校教員講習科的入學資格則由臺灣總督訂定。

²⁰ 陳双錦 2012 年 8 月 15 日口述。陳双祿為陳双錦之兄長，父立德為地主，只育有其兄弟二人，相差 17 歲，後双錦於公學校畢業後，也至崗山縣念關西中學(5 年)。

²¹ 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8 月 10 日口述。

²²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7，范朝欽為第 3 屆畢業生，葉金興

陳俊樓、陳興錦²³台中第一中學²⁴入學試驗及第通知アリ

張氏玉春²⁵台北第三高女²⁶入學試驗及第通知アリ

4月22日陳俊深訓導文官試驗受験為メ上北ス

4月29日范朝棟²⁶氏送別會ヲ開催ス

【范朝欽曾任上林里長²⁷】

【楊習日為第五屆畢業生(1923年3月)，後來也穿文官服應為正式師範畢業，²⁸但大正12年度後，未見各年度的升學紀錄】

【林阿亮曾為太平國語講習所講師²⁹】

大正十二年度(1923/第六屆)

4月2日：呂阿全³⁰訓導新任式舉行】

【朱金波是朱金鑑弟，為開業醫師；呂乾星留日做官；邱深基是邱金球校長的叔叔；黃德權開藥房。³¹】

【傅招裕昭和12年3月31日任石光公學校訓導³²，民國43年8月1日太平國小獨立後首任校長。³³】

大正十三年度(1924/第七屆)

【朱盛秋是范士敬老師的老師為第六屆畢業生，亦師範畢業，娶范烘灶女身范綢妹(第八屆畢業生)為妻，傳為地方美談】

為第四屆畢業生。

²³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2人皆為第3屆畢業生。

²⁴ 依照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809-10，此時全臺的男子中學校已有8所，包括較近的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也已設立，不知這2人為何仍要到臺中一中就讀，可能的解釋是如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57，臺中一中是臺籍學生集中的學校。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746，其總則三條，第一條雖說設立目的是為了臺灣男子高等教育的預備，但第二條的修業年限4年和第三條的入學資格是年滿13修完公學校第四學年課程或同等學力者。其程度明顯比日本人中學5年，小學修業6年方能入學的程度寬濫，如何能與日本人競爭升學？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61，除前2點外，又提到日語及實業科目的時數其多，實業科目為必修科，英語為隨意科。

²⁵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第四屆畢業生中唯一的女生。

²⁶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職員名簿〉，無頁碼，大正9年4月1日，至大正11年3月31日，2個年，訓導心得。

²⁷ 邱金球校長2012年8月10日口述。

²⁸ 徐金統2012年4月25日口述，並提供昭和17年坪林師長照片。

²⁹ 邱金球校長2012年5月10日口述。另2012年8月10日指賴瑞麟在法院工作，朱炳錦開茶工廠。

³⁰ 依呂阿全大正7年度(1919年3月31日)在石光畢業，念完臺北師範豫科1年及本科4年後，一畢業。即於大正12年度(1923年4月2日)返回母校任職。

³¹ 邱金球校長101年8月10日口述。

³² 石光國小存：《學校沿革誌》，〈職員名簿〉，無頁碼，昭和12年3月31日，至民國37年8月31日，11年4個月，訓導。同前書，無頁碼，昭和十二年度職員，傅招裕為新任坪林分校訓導。

³³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23，民國38年8月1日太平分校獨立為太平國民學校；邱金球校長2012年5月10日口述。

大正十四年度(1925/第八屆)

3月31日：徐嶽生訓導依願退職，張金輝湖口公學校ヨリ轉補

大正十五年度(昭和元年度/1926/第九屆)

3月31日：朱新本、呂義星兩訓導□□勤務拜命

昭和二年度(1927/第十屆)

昭和三年度(1928/第十一屆)

2月19日：關西公學校學藝會...合唱(青年歌)：職員呂阿全、呂義星、范鼎香

昭和四年度(1929/第十二屆)

【江兆統畢業證書】

4月4日：戴連秀隈本道雄兩訓導，新任式ヲ舉行ス

4月15日：本日ヨリ晝會ヲ行フ

第一部 五六年 主任 張金輝訓導

第二部 一三四年 主任 朱盛淇訓導

5月31日：坪林分教場ニニノ左ノ通り研究會ヲ開リ

二年 話方 教授者 范鼎香訓導

三年 修身 教授者 陳登彬³⁴准訓導

6月19日：一、職員會議...

二、職員體育會 庭球

戴連秀、陳登彬 陳開華、朱盛淇 黃本源、呂阿全

呂義星、范鼎香 北島、張金輝

2月27日：ヨリ三月間石光家長會職員出席講演

下南片 陳登彬 石岡子 張金輝

老煥寮 呂義星 大旱坑 朱盛淇

3月31日：附左記發命

補內柵公學校訓導 陳氏玉賢

補石光公學校教員心得 范何氏英妹【范鼎香妻】

月薪三十丹ヲ給フ

昭和五年度(1930/第十三屆)

3月18日：朱盛淇訓導退職上□□送別會ヲ行フ

3月31日：左記發命

石光公學校教育員心得ヲ命ズ

教心大澤重藏

³⁴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87，第1屆畢業生名冊(民國8年3月)。

月薪四十冊ヲ給フ
石光公學校訓導ヲ命ズ 訓導朱盛秋

昭和六年(1931/第十四屆)

【古沐金於昭和 17 年任坪林助教、江接松為 14 屆畢業生³⁵】

11 月 1 日職員會開催

青年團ノ設立之關六件
体育會開催ノ件

11 月 6 日州主催國語演習會(桃園)

卒業生徐龍耀³⁶出席□□良好ナリ

1 月 9 日石光青年團發團式下打合□□下召集ヲ為ス十九名參集

講演 北島校長 青年團ノ責務
呂阿全訓 青年ノ修養

2 月 4 日石光青年團□團式舉行

新竹群弓課長及視學臨席
北島校長ノ青年讀 課長訓話 庄長祝辭 青年團宣誓
ラ次ヲ閉式 參集會員二十名 式後茶話會ヲナス

2 月 19 日：午後職員會議

- 一、學藝會ノ件
- 二、教育總會研究發表者決定 內田訓導
- 三、主婦會講演割當 下南片北島陳登彬 下橫坑北島呂義
石岡子何教心 茅子埔何教心
老煥寮朱新本 坪林呂阿全
大早坑呂義星

3 月 4 日新埔公學校開催郡主催國語演習會并ヒ學藝會ヒ校長次ト出席

坪分四年吳鳳劇出演

昭和七年度(1932/第十五屆)

【陳送妹昭和 16 年度教特設一任石光助教，為第 15 屆畢業生³⁷】

12 月 7 日ヨリ一週間州主催青年團中堅者指導講習會開催サル團員百名

本村視學田中右左屬主トレテ指導

石光關西兩青年團員二十名チベフテ特ヒ參加受講ス

³⁵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第 14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1 年 3 月)。古沐金於昭和 17 年任坪林助教，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借得昭和 17 年度畢業冊師長相片為證。

³⁶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88，第 9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16 年 3 月)。

³⁷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第 15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2 年 3 月)。

日治時期臺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教育(1895-1945)

昭和八年度(1933/第十六屆)

【江兆意畢業證書】

【劉煥堂日治時曾任民意代表及任教太平國語講習所講師，³⁸為 16 屆畢業生³⁹】

昭和九年度(1934/第十七屆)

【范士敬老師為 17 屆畢業生⁴⁰】

昭和十年度(1935/第十八屆)【開始詳列當時師資】

【職員名簿：昭和 19 年 1 月 31 日至民 37 年 7 月 31 日，4 年 6 個月，助教。為 18 屆畢業生。⁴¹】

5 月 18 日國語講習所開所式舉行

昭和十一年度(1936/第十九屆)

【呂氏潤玉於昭和 17 學年度任石光助教、彭贊銜於昭和 17 學年度在坪林任助教，2 人皆為石光第 19 屆畢業生⁴²】

昭和十二年度(1937/第二十屆)

【邱金球為 20 屆畢業生於昭和 17 學年度任石光助教⁴³】

【職員名簿：朱氏月英昭和 18 年 3 月 31 日，至民國 34 年 7 月 30 日，2 年 3 個月，助教。富田秀子(張秀嬌)昭和 19 年 3 月 31 日，至民國 36 年 12 月 31 日，3 年 9 個月，助教。徐文芳昭和 20 年 3 月 31 日至民 35 年 3 月 31 日，一年，助教。皆為 20 屆畢業生。⁴⁴】

5 月 27 日保護者會總會開催 役員決定

會長 朱金鑑

副會長 林石火 范朝燈

昭和十三年度(1938/第二十一屆)

³⁸ 邱金球 2012 年 5 月 10 日校長口述。

³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0，第 16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3 年 3 月)。

⁴⁰ 范士敬老師 2012 年 5 月 2 日口述

⁴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18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5 年 3 月)。

⁴²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19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6 年 3 月)。彭贊銜於昭和 17 學年度在坪林任助教，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借得昭和 17 年度畢業冊師長相片為證。

⁴³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20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7 年 3 月)。

⁴⁴ 同上。

【職員名簿：朱氏金雀昭和 19 年 9 月 30 日-民國 36 年 8 月 31 日，2 年 11 月，任石光助教。為第 21 屆畢業生。⁴⁵】

【劉氏香蘭為 21 屆畢業生。⁴⁶石光畢業後，念一年新埔高等科後，即考上新竹家政女學校，與陳嫦娥為同學。⁴⁷】

10 月 17 日劉德彰訓導軍通譯トヒテ從軍出發見送り

昭和十四年度(1939/第二十二屆)

【職員名簿：陳氏嫦娥昭和 19 年 3 月 31 日至民國 37 年 8 月 31 日，為石光助教。為 22 屆畢業生⁴⁸】

昭和十五年度(1940/第二十三屆)【改校名為國民學校、改日本姓名】

【呂耀樞為 23 屆畢業生第一名，直接考取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⁴⁹】

昭和十六年度(1941/第二十四屆)【教頭之稱出現—首任張金輝】

4 月 1 日新任式 訓導明星アヤ子、助教陳氏送妹

3 月 28 日異動發表 坪林初代校長 富山貢

轉出大浦訓導(新埔旭校へ)【劉德彰】

明星訓導(苗栗東校へ)

徐助教退職

新任助教 宮本潤子【呂潤玉】⁵⁰、邱金球⁵¹

昭和十七年度(1942/第二十五屆)

【坪林獨立，第一屆畢業生 13 名升學：7 名徐金統、范光建、劉建榜、謝金臺、譚仁誠、羅欽章(已逝)、姜洪章等念花蓮農林學校、1 名范光銘竹中、1 名范碧蓮臺北第三高女、范光順(臺北)、楊燕雄(臺北)、⁵²】

【朱金鑑的兒子朱向陽考上竹中⁵³】

⁴⁵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2，第 21 屆畢業生名冊(民國 28 年 3 月)。

⁴⁶ 同上。

⁴⁷ 2012 年 5 月 16 日二訪邱金球校長，劉香蘭女士為其妻。翻拍得同窗照片。

⁴⁸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2，第 22 屆畢業生名冊(民 29 年 3 月)；2012 年 5 月 16 日二訪邱金球校長，其夫人劉香蘭女士在新竹女子家政學校時的同學，畢業時，劉將坪林的教員缺讓給陳，自己到照門國校代課。

⁴⁹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

⁵⁰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19 屆畢業生名冊；邱金球校長 2012 年 5 月 10 日口述：呂潤玉後來改名為宮本潤子，呂潤玉即呂阿全的女兒。

⁵¹ 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1，第 20 屆畢業生名冊。邱金球校長今年 88 歲，與劉建燈老師、江兆和伯為同學，2012 年 5 月 10 日邱校長訪談提到另一班長徐玉竹(石光)、副班長蘇仁通(下橫坑人後移民巴西)、陳雙錦老師(石光國中英文老師退休)等為同學。

⁵² 徐金統老師 2012 年 4 月 25 日口述，13 名升學，但仍少 2 人，可請教劉建榜老師或譚仁誠伯。

⁵³ 2012 年 5 月 16 日第二次訪問邱金球校長，時任助教，見朱金鑑與范朝燈在慶祝朱向陽考上竹中餐會，上演大和解。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93，第 25 屆畢

3月27日異動發表

轉出 星野訓導 竹南郡後龍國民學校
退職 邱金球助教 台南師範入學
新任 助教范士敬 朱氏月英

昭和十八年度(1943/第二十六屆)

◎昭和十九年度(1944/第二十七屆)

3月23日中等學校⁵⁴入學發表⁵⁵

新竹中	富山三雄	劉坤炎	台北三中	岡本學典【呂學典】
新竹工	宮本紹男	黃駿迪【26屆畢業生】	基隆水產	呂榮爵
新竹農	李宏源		新竹高女	宮本綾子
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	富田英子		中壢農業實踐女學校	潘氏竹春

業生名冊(民國32年3月)。

⁵⁴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65，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1922年(大正11年)創校，光復後為省立新竹中學。頁65，臺北州立臺北第三中學校，1937年(昭和12年)創校，光復後為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依頁57，汪氏將其列為日籍學生集中的學校。頁85，新竹州立新竹工業學校，1944年(昭和19年)創校，光復後為省立新竹工業職校。頁86，臺北州立基隆水產學校，1943年(昭和18年)創校，光復後為省立基隆水產職校。頁72，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1924年(大正13年)創校，光復後為省立新竹女中。頁87，家政女學校設於都市的，應改辦商業實踐女學校；設於鄉區的，改辦農業實踐女學校…這類學校，多數就是現在各縣市的初級中學或初級職業學校。【相當於國中程度，例如劉香蘭老師念的新竹家政女學校，於光復後就變成她兒子念的新竹一中】

⁵⁵林仁煥主編：《石光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特刊》，頁94-5，第27屆畢業生名冊，查得劉坤炎、呂學典、宮本紹男、呂榮爵、李宏源及潘氏秀春等人；同前書，頁94，第26屆畢業名冊，查得黃駿迪。但改成日名的富山三雄、宮本綾子、富田英子則不知其原名為何？經查《學校沿革誌》昭和十五年度職員名冊，張金輝改名為富田英治，故二書核對後只能推富田英子可能為張氏秀英；宮本綾子可能原姓呂，因呂何全於昭和十六年度改名為宮本樂三，富山三雄則查無線索。

附錄七 日治時期桃竹苗地區詩社一覽表

附表 7-1：桃園地區的詩社

編號	詩社	年代	地點	說明	備註	出處
1	大嵙崁詩社	光緒 20年 (1894)	大嵙 崁 (大 溪)	日本巡查齊藤所設，以研究詩學、團結日臺人心為目的。是桃園地區最早的詩社。	北桃 園，閩 籍為主	3：67
2	南雅吟社	明治 30年 (1897)	大嵙 崁 (大 溪)	為大嵙崁郵便局長星野親敏所倡參與者有邱倬雲、呂鷹揚、呂喬姜、黃趾仁、林徵、呂建邦等	北桃 園，閩 籍為主	3： 68-69
3	崁津詩會	明治 38年 (1905)	大嵙 崁 (大 溪)	由公醫木村武次郎、壽山、長岡等倡組，起初只有呂鷹揚、王式璋、廖珍、江建臣、洪子欣、黃玉麟、洪鏡堂等 10 餘人參加。後因課徵詩贈禮，參加者幾遍桃屬。	北桃 園，閩 籍為主	3：71
4	詠霓吟社	明治 38-39 年 (1905- 6)	桃園	劉篁村、黃純青、王百祿、王雲滄等共同發起。社名為板橋趙一山所號，取眾仙同日詠霓裳之意。無社長，社員橫跨臺灣中北部。	北桃 園，閩 籍為 主。 <u>桃 園吟社 的前 身。</u>	3：125
5	龍潭吟社	明治 40年 (1907)	龍潭	大略於明治 40 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詞林〉載有徵詩前 15 名的詩作，編輯黃植亭標註評語，邱世濬(後來的陶社社長)掄元。	南桃 園，客 籍為主	3： 101-10 2
6	崁峰詩社/南雅詩社	明治 42年 (1909)	大嵙 崁 (大 溪)	崁峰詩社於 1909 年重組改稱南雅詩社，約有 10 多名日臺人參加。	北桃 園，閩 籍為主	3：72
7	瀛東小	明治	桃園	由樹林區長黃純青聯合	北桃	3：126

	社	43-44年 (1910-1)		王名受、王雲滄等籌組，範圍較詠霓吟社窄，初期有社員 18 名，包括新竹鄭十洲鄭邦吉、中港陳心南、桃園黃守謙等。	園，閩籍為主。 <u>桃園吟社的前身。</u>	
8	桃園吟社	明治44年 (1911)	桃園	因瀛東小社社員散各地聯絡不易，但社員以桃園最多，故別創詩社，時簡若川任桃園廳埔子區區長，鄭永南甫獲臺灣總督府紳章，故倡議詩社。組織完善，有社長、副社長、顧問、幹事等，首任社長為呂鷹揚，社員約有 60 餘人。	北桃園，閩籍為主。	3：129
9	以文吟社	大正10年 (1921)	中壢	大正元年(1912)吳榮棣邀區内生員邱兆基、張夔威，宿儒楊星庭、梁盛文、古道興、劉汶青、古炳、劉世富、古清雲等作文酒之會，後有彭祝堂、賴連玉、黃鏡林、陳保梁、黃容光、許阿斗、黃德顏等參加，遂有創社之議。正式設立於大正10年(1921)中秋，吳榮棣為社長，其高足朱傳明為副社長，有吳鴻森、古少泉、黃坤松、蕭林石、徐代清等參加，共有社員 34 人。	南桃園，客籍為主。	3：125
10	東興吟社	大正13年 (1924)	八塊庄	葉連三(號秋園)，於時人節所創時任八塊庄庄長，成員皆該庄人，有葉泉清、邱創乾、呂昌有、呂希閔、邱快齊等 10 人。	北桃園，閩籍為主	3：73
11	崁津吟	大正	大崙	呂傳琪(鈞璜)於乞巧節	北桃	3：

	社/南雅吟社	14年 (1925)	崧	所創，執教大溪時，創設育英書塾，故設崧津吟社，參與者有黃樹林、黃茂炎、簡伯仁、呂傳命等16人，皆當地人，後有江上鵬、李傳亮、溫武卿、廖大德等10餘人入社。	園，閩籍為主	76-77
12	陶社	大正15年 (1926)	龍潭	本係龍潭與關西人士合組之詩社，大正1年7月10日在龍潭庄龍元宮穀王廟舉行創立式，當時社長為邱世濬（字筱園）。	南桃園，客籍為主。	1/2/3 : 103-104
13	龍潭詩社	大正15年 (1926)	龍潭庄	龍潭郵便局長沈火倡設。	南桃園，客籍為主	3:119
14	楊梅昭和吟社	昭和3年 (1928)	中壢庄	社長王華斌，副社長鄭王滿、楊景亭，幹事6名，會計1名，編輯1名，發會式出席會員42名。	南桃園，客籍為主	3:121
15	瑳玉吟社	昭和5年 (1930)	中壢(宋屋)	以文吟社社員梁盛文、劉世富、古清雲等因以文吟社開會時間未定、社員區域遼闊聚會不便，另創詩社。	南桃園，客籍為主。以文吟社社員另組。	3:217
16	藻社	昭和5年 (1930)	中壢(後寮)	朱傳明主持，原為設私塾，傳授漢學，另組成詩社。	南桃園，客籍為主。以文吟社社員所設私塾。	3:217
17	鳳社	昭和5年 (1930)	中壢(過嶺)	許阿斗(字耀南)主持	南桃園，客籍為主	3: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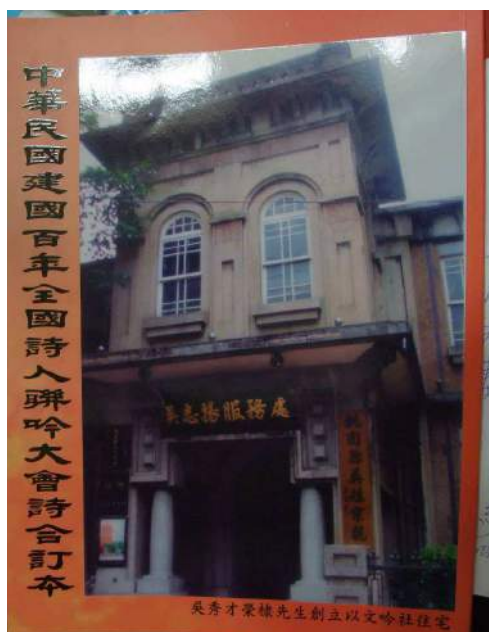
					。以文吟社社員所設私塾。	
18	崑崙吟社	昭和5年(1930)	中壢(大崙)	黃德顏主持	南桃園，客籍為主。以文吟社社員所設私塾。	3：217
19	新鶯吟社	昭和6年(1931)	桃園街	徐清祿邀地方人士創立，取「新鶯學疇，期待將來」之意。會務組織有：社長陳文慶、顧問4人、庶務3人、編輯4人、會計係4人，及會員11人等，共26人	北桃園，閩籍為主	3：93
20	樹村吟社	昭和5年(1930)10月之前	桃園	參加者以度以黃姓人士居多與桃園吟社、新鶯吟社社員有互通聲息之誼，設立時間應相近。	北桃園，閩籍為主	3：97
21	詩學研究會/大溪詩學研究會	昭和7年(1932)左右	大溪	昭和7年4月1日開始有詩登在《詩報》	北桃園，閩籍為主	3：99
22	鶯社	昭和17年(1935)左右	鶯歌	昭和17年舉行賀社員黃用端(字舜民、鶯新醫院主)五十榮壽徵詩。	北桃園，閩籍為主	3：101
23	大東吟社	昭和18年(1943)	中壢	以文吟社合併區內原有的瑳玉吟社、藻社、鳳社、崑崙詩社，應付日人的管理。	南桃園，客籍為主。以文吟社相關詩社重組。	3：220

資料出處：

- 1、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錄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46-556。
- 2、林柏燕：〈關西陶社〉，收錄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7-563。
- 3、陳欣慧：《「詩」的權力網路：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 67-124；頁 125-137；214-227。

說明：

- 1、陳欣慧對日治時期桃園地區的詩社，有相當詳盡的調查，透過當時報刊對詩社活動與詩文的記載，加上對後人保留資料、各式廟宇聯對、現存詩社以文吟社等資料蒐集豐富，整理出桃園地區有 22 個詩社。筆者認為最後敷衍殖民政府的大東吟社也應納入，則桃園詩社總數應為 23 個。
- 2、陳欣慧訪查得的詩社，北桃園以閩籍為主的詩社共 13 個，南桃園客籍為主的詩社共 9 個，若加大東吟社則共 10 個，以粗黑字體標示。
- 3、以文吟社民國 38 年(1949)正向管轄政府辦理詩社登記，69 年(1980)正式立案，現為桃園縣僅存的傳統詩社，僅每月例會一次。(陳：214)
- 4、筆者於 2013 年參加石光國小百年校慶時巧遇現任以文吟社副社長黃浩文，黃為石光校友。以文吟社仍設在吳榮棣後人桃園縣長吳志揚服務處。目前社員仍有 40 人，每 2 月課題一次，每月擊鉢一次。



附圖 7-1：以文吟社今址。

資料來源：翻拍至江穎川借閱《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討合訂本》封面。

附表 7-2：新竹地區的詩社

編號	詩社	年代	地點	說明	備註	出處
1	耕心吟社	大正12年 (1923)		鄭家珍主持，成員有曾秋濤、許尚軒、鄭紫珠、謝森鴻、林麗生等。		3
2	青蓮吟社	大正14年 (1925)		鄭香團主持，成員有鄭玉田、江尚文、黃植三等	3	3
3	大同吟社	昭和元年 (1926)		鄭家團主持，成員有葉文樞、葉文游、鄭家珍等	3	3
4	陶社	昭和元年 (1926)	原龍潭，後移關西	本龍潭與關西人士合組之詩社，大正1年7月10日在龍潭庄龍元宮谷(穀)王廟舉行創立式，當時社長為邱世濬(字筱園)。昭和5年(1930)，遷至關西，使關西文運更隆盛。關西陶社除社長邱世濬外，社友陳子春、沈梅岩等30餘人，每週六聚吟一次，因此又稱「土曜吟」，且常與桃園、以文、東興、崁津等詩社舉辦五社聯吟會。	客籍為主	1/2/3
5	大新吟社	昭和3年 (1928)	新埔	於昭和3年12月9日，在新埔文昌廟內，舉發會式，出席者由新埔、關西、龍潭、楊梅等到者35名，投票選定社長藍華峰、副社長詹文光、林孔昭，幹事楊成泉、張桂材、吳明相，顧問潘成瑞、葉心榮，正午閉會。中餐後，開繫鉢吟，以新柑為題，	客籍為主	1/2/3

				七絕韻限十五刪，詞宗選評發表後五時散會。		
6	讀我書社	昭和4年 (1929)		葉文樞主持，成員有莊禮耕、蕭獻三、鄭指薪、郭茂松等。		3
7	切磋吟社	昭和5年 (1930)		黃潛淵主持，成員為黃潛淵師徒。		3
8	竹林吟社	昭和6年 (1931)		謝森鴻主持，陳竹峰、謝景雲、許尚軒、鄭炳煌、王火土、郭仙丹等。		3
9	來儀吟社（或作萊儀）	昭和6年 (1931)	竹北	新竹郡貓兒碇庄（今竹北）曾秋濤為鼓舞青年人作漢詩，乃與曾銀鏤提倡組成「雅宜吟社」。於2月18日下午一時，在竹圍曾家，舉發會式，開繫鉢吟例會，題擬「春雨」。成員有曾秋濤等師徒16、7人。	閩籍為主	1/3
10	漁寮吟社（或作御寮）	昭和8年 (1933)	竹北	新竹郡舊港庄魚寮保正戴墩，有鑑於八年舊港庄下公學校欲廢止漢文，乃與同地改良書房講師曾秋濤會力招募舊港庄下篤志青年，組設漢文普及會，經于3日在魚寮舉行發會式，訂6日起，4個月間，開漢文講習會。 載還浦及其門徒	閩籍為主	1/3
11	南瀛吟社	昭和8年 (1933)	關西	置辦事處於關西太和宮內，當時社長為羅南溪，顧問邱筱園、沈梅岩、陳子春，成立之繫鉢吟，題為「競渡」，詞宗為郭景澄與陳子春。	客籍為主	1/3

				成員與原關西成員大致相同。		
12	柏社	昭和9年 (1934)		張純甫及其門徒		3
13	鋤社	昭和12年 (1937)	竹北	曾東農向曾秋濤問學後所辦，因曾秋濤忙於書房教學，遂將來儀吟社交由學生曾東農主持，但詩社成員並不相同，許多新竹市區人士也來與會。曾氏於昭和14年遷居花蓮，鋤社即結束。	閩籍為主	1
14	聚星詩學研究會	昭和12年 (1937)		徐錫玄主持，力邀地方人士。		3
15	柏社同意吟會	昭和15年 (1940)		拱曉峰主持，成員有黃潛冤、謝載道、周春渠、駱耀塘、謝少漁、黃燧初、郭仙丹、陳厚山等		3
16	朔望吟會	昭和17年 (1942)		鄭濟卿、羅百祿主持，成員有林榮初、吳蔭培、吳瑞聰、黃曉峰、王緘三、彭嘉南、陳楚材、張極甫、謝景雲、張奎五、郭茂松、曾寬裕等。		3
17	竹風吟會	昭和17年 (1942)		高華袞、林榮初主持，成員有周德三		3
18	同光吟社		湖口	湖口人張添慶大湖口公學校畢業，曾入文杏書房。曾任漢文教師同光吟社副社長、同光吟社社長、湖口庄協議會員等職。	與陶社聯吟，以客籍為主。	2/3：399，張添慶。
19	敦風吟					1

	會				
20	寒鷗吟社				1
21	梅社				1
22	竹社				1

資料出處：

- 1、黃美娥：〈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收錄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46-556。
- 2、林柏燕：〈關西陶社〉，收錄於林柏燕：《大新吟社詩集》，附錄，頁 557-563。
- 3、許楓萱：《清代明志書院研究》，頁 199-201。

說明：

- 1、未標明地點的詩社，依主持人及參與成員判斷，應位於新竹市區，例如前三所即是新竹鄭用錫家族後人所主持。
- 2、日治時代新竹的詩社約有 22 個，大多設於新竹街，以閩籍為多，目前可知以客籍為主的詩社只有 4 個，以粗黑字體標示。
- 3、至今仍運作的是關西陶社，於民國 100 年主案為新竹縣陶社詩會，目前由江穎川擔任理事長，參與成員尚有 20 多名，每月出一課題，每年端午詩人節皆辦吟詩大會。



附圖 7-2：江穎川擔任第一屆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賀匾



附圖 7-3：江穎川與擔任第二屆新竹縣陶社詩會理事長賀匾

附表 7-3：苗栗地區的詩社

編號	詩社	年代	地點	說明	備註
1	鹿苑吟社	光緒 23 年 (1897)	彰化縣 苗栗縣	鹿港許劍漁、苑裡蔡吞運共創詩社，以地為名，兩地文人往來酬唱。流寓才人梁子嘉亦為社友。	
2	天香吟社	大正 6 年 (1917)	苗栗市 (文昌祠)	苗栗名儒彭祖興與吳頌賢、湯慶榮等，於苗栗文昌祠（英才書院）聚會吟哦，黃運寶昆仲贊助。	栗社前身/客籍為主
3	湖光吟社	大正 6 年 (1917)	大湖	大湖庄長謝長清、吳秉哲等組成。	
4	栗社	昭和 2 年 (1927)	苗栗市	彭祖興、鄒子襄與黃運寶、運和、運元三昆仲倡設，入社 80 餘人。大湖湖光吟社亦來合併，社員遂有 106 人。	客籍為主要發起、運作者
5	南洲吟社	昭和 2 年 (1927)	竹南	鄭鷹秋於 16 年潤中秋成立。	
6	蓬山吟社	昭和 7 年 (1932)	苑裡	苑裡陳聯玉、王清淵、陳南輝等，於農曆 2 月 12 日成立。	
7	篁聲吟社	昭和 7 年 (1932)	竹南	割台後，漢學衰頹，竹南人士有鑑於此，特於 116 年聘四川名師設教，以續漢學。待學者有基礎後，於 21 年 4 月 1 日成立詩社，以廣文風。	
8	吞霄吟社	昭和？年 (193?)	通霄	湯樹梅秀才等成立，歷時約三年半左右。	湯樹樹為客籍
9	薰洲吟	昭和 12	竹南	民國 26 年，鄭鷹秋鑒於	

	社	年 (1937)		每月例課，刊載有名無實的女詩人作品，恐有損社譽，將南洲吟社改組為薰洲吟社，取薰蕕判矣之義。擴大規模，公司寮蔡喬材等加入，社員有 38 人。
10	中南吟社	昭和 12 年 (1937)	竹南	竹南陳阿金、鄭啓賢等，於 26 年成立，與南洲吟社相互酬唱。「中南」為南第一家紙廠名。
11	龍聲吟社	昭和 1? 年 (193?)	後龍	頭屋人林傳富至東明里王爺公廟成立，學生有翁薛梓兄弟等人。
12	龍珠吟社	昭和 12 年 (1937)	後龍	26 年晚秋成立。集會者有黃祉齊、陳如璧、范慕庵、謝鐸庵（客）、蔡喬材等。

資料出處：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頁 46。

說明：

- 1、在苗栗的 12 個詩社中，以客籍為主的只有 4 個，以粗黑字體標示。
- 2、客籍為主的栗社是全苗栗成員最多的詩社，最有組織，運作最多，一直延續到光復後，於民國 89 年立案為苗栗詩會。
- 3、以上桃園 23 個詩社，新竹 22 個詩社，苗栗 12 個詩社，扣掉重複的陶社，總計桃竹苗地區共 56 個詩社。